

马克思传

弗·梅林著

C1.7
547.1
C.2

马 克 思 传

弗·梅 林 著

樊 集 译 持 平 校

人 民 出 版 社

Ф. Меринг
КАРЛ МАРКС
ИСТОРИЯ ЕГО ЖИЗН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转译。原著为德文，
书名为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马 克 思 传

〔德〕弗·梅林著

樊集译，持平校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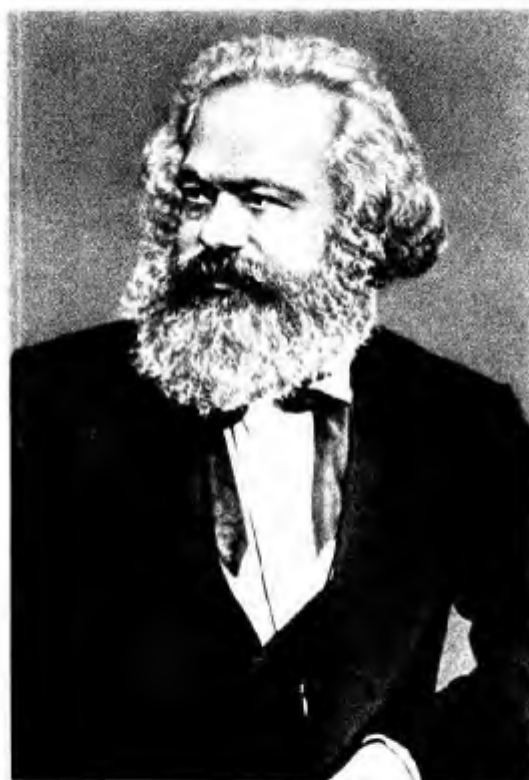
社 学 各 居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85年7月第1版

1972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11001·221 每部1.80元



卡尔·马克思 (1872年)

献给克拉拉·蔡特金

09821

3/10 5/2 3/2 6

出版者说明

本书作者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

《马克思传》是梅林的主要著作之一，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他逝世以后（1919年）才出版。这部著作是梅林长期收集、研究、校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遗著的总结。在这部著作里，梅林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经过；叙述了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和活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第一国际建立的历史。

梅林的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和意义的错误理解，在某些问题上为巴枯宁辩护，以及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福格特先生》等重要著作的意义估计不足，等等。译者已在本书书后的译者注释中分别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

本书是根据1957年出版的俄文译本转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60年德文原本、纽约科维奇与弗里德出版社1953年英文译本、东京大月书店1953年日文译本和三联书店1953年中文译本（罗稷南译）。为便于读者阅读起见，译者对书中的一些历史事件、组织、掌故等做了注释，全部附在书后。脚注是从俄文版摘译的。

目次

出版者說明

序言	1
第一章 青年时代	5
(一) 家庭和學校	5
(二) 燕妮·馮·威斯特華倫	11
第二章 黑格爾的弟子	16
(一) 柏林的第一年	16
(二) 青年黑格爾派	24
(三) 自我意識的哲學	31
(四) 博士論文	36
(五) 《輯文集》和《萊茵報》	44
(六) 萊茵議會	51
(七) 鬥爭的五個月	58
(八)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	69
(九) 結婚和被逐	72
第三章 流寓巴黎	77
(一) 《德法年鑑》	77
(二) 哲學的展望	85
(三) 論猶太人問題	90
(四) 法蘭西文化	96
(五) 《前進報》和被逐	103

第四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15
(一) 办公室和兵营	115
(二) 英国文化	122
(三) 《神圣家族》	127
(四) 社会主义的奠基	136
第五章 亡命布魯塞尔	142
(一) 《德意志意識形态》	142
(二) 真正的社会主义	146
(三) 魏特林和蒲魯东	152
(四) 历史唯物主义	158
(五) 《德意志—布魯塞尔报》	168
(六) 共产主义者同盟	176
(七) 布魯塞尔的宣傳	181
(八) 《共产党宣言》	189
第六章 革命和反革命	196
(一) 二月和三月的日子	196
(二) 六月的日子	199
(三) 对俄战争	204
(四) 九月的日子	211
(五) 科倫的民主派	218
(六) 弗萊里格拉特和拉薩尔	223
(七) 十月和十一月的日子	226
(八) 伏击	233
(九) 又一次伏击	239
第七章 流寓倫敦	243
(一) 《新萊茵評論》	243
(二) 金克尔案件	248

(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254
(四) 流亡中的生活	263
(五) 雾月十八日	269
(六)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275
第八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	285
(一) 天才和社会	285
(二) 无叉的联盟	292
第九章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301
(一) 欧洲政治	301
(二) 大卫·烏尔卡尔特、哈尼和琼斯	307
(三) 家庭和朋友	312
(四) 1857 年的危机	320
(五) 《政治经济学批判》	326
第十章 王朝的兴替	336
(一) 意大利战争	336
(二) 同拉薩尔的爭論	343
(三) 流亡者之間的新斗争	352
(四) 插曲	364
(五) 《福格特先生》	372
(六) 家事和私事	377
(七) 拉薩尔的鼓动	388
第十一章 国际的創始	401
(一) 成立	401
(二) 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	409
(三) 同施韦澤的决裂	416
(四) 倫敦第一次代表会议	422

(五) 德国战争	431
(六) 日内瓦代表大会	440
第十二章 《資本論》	451
(一) 陣痛	451
(二) 第一卷	455
(三) 第二卷和第三卷	467
(四) 《資本論》的遭遇	478
第十三章 国际的全盛时代	486
(一) 英国、法国、比利时	486
(二) 瑞士和德国	494
(三) 巴枯宁的鼓动	502
(四)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511
(五) 巴塞尔大会	518
(六) 日内瓦的紛爭	525
(七) 《机密通知》	532
(八) 爱尔兰大赦和法国全民投票	538
第十四章 国际的衰微	542
(一) 色当以前	542
(二) 色当以后	550
(三) 法兰西内战	558
(四) 国际和公社	567
(五) 巴枯宁主义的反对派	574
(六) 倫敦第二次代表會議	586
(七) 国际分裂的根源	592
(八) 海牙代表大会	600
(九) 余痛	610

第十五章 最后十年	619
(一) 马克思在家里	619
(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	626
(三) 无政府主义和东方战争	635
(四) 曙光	639
(五) 暮色	650
(六) 最后一年	653
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659
译者注释	672
马克思传记年表	752
人名索引	758
人名译名对照表	798
报刊索引	819
报刊译名对照表	828





序 言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有一段小小的掌故。有人提出要出版馬 25
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表示同意
(这件事必須得到她的同意)这个建議，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
要我作为她的代理人参加該通信集的編輯工作。1910年11月10
日，她从德拉伐尔写了一份委托书来，全权委托我作一些我认为必
要的注釋、說明和删节。

然而实际上，我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力。在出版者們之間，或者
更确切些說，在出版者伯恩施坦(因为倍倍尔只是挂个名而已)和
我之間，并未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分歧。如果不是必要，那末我去干
涉他的工作，当然是沒有理由、沒有权利的，我也不願意这样做，否
則就不符合委托者的初衷了。

但是，在編輯該通信集的很长一段时期中，由于以往多年研究
而在我脑海里已經成型的卡尔·馬克思的形象，变得更为鮮明突
出了。因此，不由地想写一部傳記来刻划这个形象。而且我知道，
这个主意一定会使拉法格夫人非常高兴。我之所以获得她的信任
和友情，絕不是因为我在她心目中是她父亲的最博学最賢明的学
生；而是因为，在她看来，我比别人更了解他的为人，因而也就能够
在这方面描写得更为真实。她曾不止一次地写信并且口头告
訴我，說一些几已忘怀的关于她父母在世时的家庭往事，她在看到我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特别是馬克思遺著中的描述以后，

又重新回忆起来了；还说她当年常听父母提到的一些人名，也因为
我而跟具体事例联系起来。

遺憾的是，当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出版时，这位品格高尚的妇女已經去世好久了。她在死前几小时还写了一封信来，对我致以亲切的問候。她禀承了父亲的豁达胸怀。她信任我出版馬克思遺著中的許多珍貴材料，并且让我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毫无干
26 涉之意。例如，虽然她明明从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已經知道，我曾經怎样經常在有关拉薩尔同她父亲的爭論問題上坚决地替拉薩尔辯护，她还是将拉薩尔致馬克思的信交给了我。对于这一点，我将永远感激她，至死不忘。

然而，这位妇女所具有的寬宏气度，在馬克思主义的两位卫道者身上却一点也找不到。当我着手执行自己的計劃，即着手撰写馬克思傳的时候，他們两位就义憤填膺地大叫大嚷起来了。其理由是我在《Neue Zeit》〔《新时代》〕上竟沒有完全迎合党内流行的說法，而就拉薩尔、巴枯宁两人和馬克思的关系問題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見。首先，考茨基斥責我“反对馬克思”，特别是斥責我“辜負”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而因为我仍然坚持要把馬克思傳写下去，他竟然撥出《新时代》的如此宝貴篇幅中的整整六十頁来刊载梁贊諾夫的抨击文章¹。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企图确证我犯了最可耻的背叛馬克思的罪行。他对我大加非难，其言詞之歪曲捏造只能和其論点之荒誕无稽相媲美。由于某种感情（为了礼貌起見，我不願說出这是一种什么感情）的驅使，就听任这些先生們肆意謾罵去吧，但是应该声明，我对于他們这种精神上的恐吓手段不曾絲毫让步，并且在本书中叙述拉薩尔、巴枯宁两人和馬克思的关系时始終以历史的真实为依据，而完全不理会党内流行的說法。当然，这时

我仍然避免作任何爭論，只是在关于参考文献的說明中对于考茨基和梁贊諾夫向我提出的主要責难略加嘲諷，以便对做这方面工作的較年輕的人們有所助益，因为这些年輕人現在正應該养成习惯，对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們的气势汹汹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如果馬克思在实际上真像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們所贊賞的那樣，是一个循規蹈矩的少年，那末我就不会醉心于写他的傳記了。我的贊美，正和我的批評一样，——在一本好的傳記中，这两者需要有同等分量——是針對着一位偉大人物而言的，这个人在讲到他自己时常常喜欢說：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²。把馬克思的偉大形象不加修飾地重新塑造出来——这就是我給自己提出的任务。

目的本身已經决定了达到这个方法。历史向来同时既是艺术又是科学，傳記尤其应当如此。現在我已記不起是哪一位古板的学者曾經发表过这样一种“不朽的”言論，說在历史科学的²⁷領域內，美学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可是我應該坦白承认，——也可以說是我引以为愧的，——甚至資產階級社会，也不像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家們那樣使我深恶痛絕，他們只是为了打击伏尔泰老人，就宣称傳記只能用枯燥无味的体裁来写³。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也被认为是糟糕的，因为他同意他所喜欢的古希腊人的观点，把克利俄算作九个繆斯之一⁴。实际上，只有被繆斯看不起的人，才咒罵繆斯。

倘若我可以假定讀者对本书所采用的体裁会予以贊同，那末我还得請求他在內容方面不要苛求。事先，我已經不得不考虑到，虽然这本书應該写得至少使文化程度較高的工人觉得通俗易懂，但也万万不可篇幅过大。可是現在的篇幅已經超过原計劃一半了。我常常因此而不得不把一行紧縮为一个字，一頁紧縮为一行，

一印張緊縮為一頁！在分析馬克思的科學著作的時候，尤其為此感到苦惱。为了不使讀者有任何誤解起見，我把偉大作家傳記中慣用的副標題“他的生活和著作”中的著作二字刪掉了。

無疑的，馬克思之所以無比偉大，主要是因為思想的人和實踐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結合着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同樣無疑的是，在他身上，作為戰士的一面是永遠勝過作為思想家的一面的。在這方面，我們事業的所有偉大先驅者們，都有一致的看法。有一次拉薩爾說：只要實際行動的時機一到，他就定會心甘情願地擱下筆來，不再寫他所知道的事了。他們的看法有多么正確，在我們的時代，我們有着觸目驚心的體會：那些用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時間來專心考究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逗點的一本正經的研究者們，本來到了可以而且必須像馬克思那樣行動的歷史時機，却只是像風信標那樣吱吱啞啞地繞軸自轉。

不過，老實說，我並不自負比別人更能透徹地了解馬克思所掌握的淵博的知識。甚至為了要在我所敘述的狹小範圍內，讓讀者對《資本論》第二、三卷有個充分清晰的概念，我還請了我的朋友盧森堡幫忙。因為她欣然接受我的請求，寫了第十二章的第三節，讀者們一定會像我一樣地感激她。

我的這本書由於她的珍貴手筆而增色，我為此感到慶幸；此外我們的共同朋友克拉拉·蔡特金允許我的小船打着她的旗幟駛出公海⁵，我也同樣感到慶幸。在那么多“社會主義的英勇而堅決的先進戰士們”被大風暴像秋風掃落葉似地掃掉的年代里，這兩位婦女的友誼，對我來說無上的安慰。

梅 林

柏林，斯得格里茲，1918年3月



第一章 青年时代

(一) 家庭和學校

1818年5月5日，卡尔·亨利希·馬克思生于特利尔。他的家系已无从查考，因为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連年战火中，萊茵省的戶籍册都已錯乱失散了。要知道，就連亨利希·海涅出生在哪一年，至今还是一个众說紛紜的問題哩！

当然，就馬克思來說，問題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因为他生在一个比較承平的时期。不过，当他的一位姑母在五十年前逝世并且留下一張被认为无效的遺囑时，法庭为查明合法继承人所进行的調查，始終也沒有能确定她的父母即卡尔·馬克思的祖父母的生卒日期。

他的祖父原名馬克思·列維，后簡称馬克思，是特利尔的一名犹太律法学家⁶，他大概是在1798年逝世的，至少在1810年时他已不在人世了。他的妻子叶娃(娘家姓莫澤斯)在1810年还活着，一般认为她是在1825年死去的。

这对夫妇生了許多子女，其中有两人——希尔舍和薩繆尔——从事学术。薩繆尔在父亲死后继承了特利尔的犹太律法学家的职位。他的儿子莫澤斯作为犹太律法学家职位的候补人，到西里西亚的格萊維茨去了。薩繆尔生于1781年，卒于1829年。希

尔舍,卡尔·馬克思的父亲,生于1782年。他学法律,在特利尔当律师,后来又做了司法参事。1824年,他接受了基督教洗礼^①,取名亨利希·馬克思。他是在1838年逝世的。亨利希·馬克思同一位荷兰女子罕丽达·普列斯堡結了婚。据她的孙女爱琳娜·馬克思說,她的祖先一連許多代都是犹太律法学家。罕丽达在1868年逝世。她同她的丈夫身后留下了許多子女,但是在确定继承权³⁰(馬克思家庭的譜系資料就是从这项有关继承的文件中取得的)的时候,这些子女中只有四人还活着,这就是卡尔·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菲亚——馬斯特里赫特的律师施馬里豪森的未亡人;爱米利亚——特利尔的工程师康拉第的妻子;路易莎——卡普施塔特的商人优塔的妻子。

卡尔·馬克思的双亲的婚姻是极其美滿的,因此,作为仅次于长姊索菲亚的最大的男孩子,卡尔·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度过的。他的“輝煌的天賦”在他父亲心中唤起希望,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才能終将用于造福人类的事业;母亲則把儿子称做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但是卡尔·馬克思既不像歌德那样只受母亲的影响,也不像席勒和莱辛那样只受父亲的影响。他的母亲虽然也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关怀备至,却完全被家务纏身。她甚至終生都沒有学会正确地讲德国話,也根本沒有参与过儿子的思想斗争,——只是有时不禁以一个母亲的心情为她的卡尔发愁,想到假如他走上了正路的話,他的成就会有多大。后来,卡尔·馬克思似乎同他母系的荷兰亲屬,特别是同他的一位“舅舅”菲力浦斯接近起来。他不止一次地怀着深切的感情談到这位“了不起的

^① 參閱本书第8頁上的注。

老头儿”，这人在他生活困难的时刻曾經在物质上帮助过他。

但是就連馬克思的父亲有时也暗中怀着忧惧注視着爱子心灵中的“魔”。不过他在卡尔剛过二十岁生日儿天以后就死去了。使他感到苦恼的不是那种梦想儿子有一个光輝前程的家庭妇女式的渺小忧虑，而是对儿子性格中某种像大理石一般坚硬的东西所感到的隱隱的恐惧，这种东西是和他自己的柔和秉性格格不入的。作为犹太人、萊茵省人和法学家，他似乎應該有三重的武装来抵御易北河东岸容克地主們的一切誘惑。然而亨利希·馬克思是一个普魯士的爱国者，不是現时所謂的那种庸俗的爱国者，而是一个老式的普魯士爱国者，像我們这一輩人当中最年长的人还見过的瓦尔德克和齐格勒那样的爱国者。他受过彻头彻尾的资产階級教育，真誠地相信“老弗里茨”^①式的开明改革⁷，——总之，他是拿破侖很有理由憎恶的那些“思想家”中的一个。被拿破侖称做“思想的梦囈”的那种东西，燃起了馬克思的父亲对这个征服者的仇恨，尽管拿破侖曾給予萊茵省的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利，并且給予萊茵省以拿破侖法典⁸——一个不断受到旧普魯士反动派侵犯而为萊茵省人民所悉心維護的珍宝。

即使普魯士政府可能曾經强迫亨利希·馬克思改变宗教以保 31
持他的职位，他对普魯士君主政体的“守护神”的信念也不曾因此而动摇过。这一点，就是那些一般說来洞悉內情的人也不止一次地肯定过，他們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辯护或者至少是寬恕那既不需要辯护、也不需要寬恕的事情。即使是从純宗教的观点来看，一个同洛克、萊布尼茨和萊辛一样信奉“对上帝的純粹信仰”的人，在犹

① 即弗里德里希二世。

太教教堂里也已經是无事可做的了。无宁說他更容易在普魯士的国家教会的庇护下找到一个容身之所，因为当时的普魯士国家教会中盛行着一种相当寬容的理性主义，即所謂理性宗教，这种精神甚至在 1819 年的普魯士书报檢查令⁹上也留下了某些印迹。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棄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的行动，而且主要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行动。犹太教并不曾參預我們的卓越思想家和詩人的偉大精神劳动。莫澤斯·門德尔森曾力图以他那微弱的火炬把自己的“民族”引导到德国精神生活的領域里去，但是白費力气¹⁰。正好在亨利希·馬克思改宗基督教的那些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犹太青年的小組，想走門德尔森的道路。虽然这些青年人当中有爱德华·甘斯和亨利希·海涅这样的人物，但他們的努力也終告失敗。甘斯，这只小船的舵手¹¹，第一个放下旗帜而皈依了基督教。海涅¹²呢，虽然他恶狠狠地罵了甘斯一句：“昨天还是英雄，今天就成了坏蛋”，但是他自己不久以后也不得不为“欧洲文化的入場券”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他們两人都在上世紀德国的精神发展中起过历史性的作用。而他們过去的那些矢忠于犹太精神的伙伴們，却早已湮沒无聞了。

可見，在好几十年当中，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間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进进一步的表现。亨利希·馬克思和他的家人在 1824 年受基督教洗礼^①，这件事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而不能从其他意义上来理解。不过，某些外部条件，虽然并未决定改宗一事本身，却可能决定了改宗发生的时间。在 20 年代的农业危机期間，犹太人加紧收购庄园和土地的行为，在萊茵省引起了强烈的仇犹

① 1824 年亨利希·馬克思給他的孩子們施了洗礼；他本人則是在 1816 年，他的妻子是在 1825 年加入路德派教会的。

情緒。像老馬克思这样一个无可訾議的正直的人，不但认为他不該受到这种憎恨，而且认为，为了自己的孩子們，也沒有权利受到这种憎恨。也許，他母亲的死也促成了他的改宗。她正好是在这个时候逝世的，她一死，亨利希·馬克思就沒有必要再去尽那种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孝道了。还有，在他改宗基督教的那一年，他的长子达到了入学的年龄，这个情况也可能有一部分影响。

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亨利希·馬克思树立了一种現代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見，而他就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給了他的卡尔。在他写給他的做大学学生的儿子的相当多的信中，找不到一星半点犹太人性格的特征或缺点。这些信都是用流行于 18 世紀的那种旧式的温情笔調写的。他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爱的时候如痴如狂，怒的时候就暴跳如雷。做父亲的完全沒有小市民的狭隘观点，喜欢在信中过問儿子的精神兴趣，只是对于儿子想当一名“平庸的詩人”的願望坚决地——而且是完全有理由地——加以反对。这位“白发蒼蒼而精神有些抑郁”的老人，虽然对他的卡尔的未来做着美梦，却不禁有时給自己提出一个問題：卡尔的心灵是不是和他的头脑相称；在他身上是不是存在着能够在痛苦的人世間給人以慰藉的那种比較柔和的世俗的感情。

从他的角度來說，他的疑虑是有根据的。他“蘊藏在心灵深处”的爱子之心並沒有使他盲目，却使他眼光明亮。但是一个人往往不能預見自己的行为的结果，因此，亨利希·馬克思沒有想到，也无法預料，他自己毫不吝惜地贈送給儿子的資产階級敬养的礼物，只是有助于解放那个危险的“魔”，这个“魔”，他不知道究竟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¹³。拉薩尔或海涅在他們生活的早期曾

为之作过剧烈搏斗并因而受到不愈的創伤的許多东西，卡尔·馬克思还在父母家里做儿子的时候就已經把它們輕而易举地降服了。

中学生活曾經給予正在成长的馬克思一些什么，就更不清楚了。卡尔·馬克思从来沒有提到过他的任何一个中学同学，而我們也沒有看到他們当中任何一个人所写的关于馬克思的回忆。他相当早就在本城的中学毕了业；他的毕业证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835年8月25日^①。证书上照例地写着对这个有才华的青年的祝福，以及关于他的各科成績的老一套的考語。但是，毕业证书上特別指出，卡尔·馬克思能很好地翻譯和解釋古典作品中最艰深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与其說难在文詞的晦澀、无宁說难在內容和思想的邏輯关系的地方；他的拉丁文作文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和对題义的深刻理解，不过与主题无关的議論往往过多。

在毕业考試中，他的神学考得不好，历史学也考得不太好。不过在德語作文里他表述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在主考人看来是“很有意思”的，而在我們看来更是意味深长的。这篇作文的題目是《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主考人在評語中批示說：卡尔·馬克思的文章以丰富的思想和完美謹严的結構而引人注目，但是作者在这里又表現了他所常犯的一个毛病——过分追求文詞的华美和生动。下面接着一字不漏地摘引了一句原話：“我們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們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們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們能够对它們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經在某种程度上被規定了。”^②可見，还在少年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閃現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揮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貢獻。

^① 梅林在这里弄錯了。馬克思的毕业证书上的日期是1835年9月24日。

^②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頁。

(二)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835年秋天，卡尔·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看来，在那里的第一年与其说是在研习法学，不如说只是“住大学”。

我们没有掌握马克思在波恩时期的生活的第一手材料。但是，从马克思的父亲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来判断，他是在纵情享受青春的欢乐。后来，当父亲发怒的时候，他曾在信中指責儿子的“放浪形骸”。但是这时，父亲还只是抱怨儿子给他寄来一些“既没有关联、也没有结算的卡尔式的账单”。不过说到账单，那末，这位货币流通的经典理论家就是到后来也从来没有弄清楚过。

在波恩的充满欢乐的第一年结束时，马克思正好达到十八岁的幸福年龄；这时，他同他儿时的游伴訂了婚。这位姑娘是他姐姐索菲亚的密友，索菲亚是把这两颗年轻的心撮合在一起的人。马克思的訂婚，虽然看起来也是学生时代的一种轻率的举动，实际上却是这位天生的领袖所获得的第一个最辉煌的胜利。马克思的父亲最初认为儿子的胜利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直到他在卡尔的未婚妻身上也发现有“某种天才的东西”，发现她能够作出一般女孩 34 子所做不到的牺牲时，他才理解这次胜利的意义。

确实，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不但生得异常美丽，而且具有非凡的才智和品德。她比卡尔·马克思大四岁，但也只是二十出头。她正当美貌年华，身边围绕许多爱慕者，并且，以她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的女儿，无疑是会有一个辉煌的前途的。而她却为了一个如老马克思所说的“艰险莫测的未来”牺牲了所有这一切。马克思的父亲有时甚至觉得，那些烦扰着他的惊恐和不安，在她的

心灵里也存在着。但他却深深地相信这位“天使”，这位“迷人的女郎”，并且向他儿子預言，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一位爵爷。

未来确实比亨利希在最不祥的預感中所想像的还要艰險莫測。然而燕妮·馮·威斯特华倫（她的少女时代的肖像至今还焕发着天真的魅力）却以毫不动摇的英雄气概，在最艰苦的坎坷生活中矢志于她所选择的人。也許，就寻常的含义來說，她并没有能帮助減輕他生活的重担，因为她从小嬌生慣养，不是总能像一个飽經風霜的无产者妇女那样未应付日常生活上的微小困难。但是，就另一种更高的含义來說，在理解她丈夫的事业方面，她却是他的当之无愧的伴侣。她的那些保存下来的信，都散发着真正的女性的气息。她具有歌德笔下的人物的那种性格，無論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从欢乐的日子里的談笑風生，直到穷困夺去她的孩子而她甚至无力为他安置一个像样的坟墓时的尼奧巴^①式的悲慟，——都是同样真誠的。燕妮的美常使她丈夫引以自豪；在1863年，当他們共同生活了几乎整整二十年之后，他回特利尔去安葬母亲时写信給她說：“每天我都去瞻拜那个圣地——威斯特华倫家的旧居（在羅馬街）；这所小房子比所有的羅馬古迹都更能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幸福的青年时代，曾有一个时期它收藏过我最珍貴的宝物。而且每天从四面八方都有人来問我，特利尔的这位第一美人和舞会上的皇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記憶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时，他簡直有說不出的高兴。”^②当馬克思弥留之际，这位与感伤情緒一向无缘的人，却怀着

35 深沉的悲痛談到这位妇女所带給他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① 希臘神話中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儿女的母亲的形象，母性的悲哀的象征。

^② 參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頁。

这一对年轻人没有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就订了婚，这种情况使马克思的正直的父亲担受了不少惊恐。不过很快威斯特华伦家也就同意了。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虽然有着显赫的身家地位，却既不属于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也不属于旧普鲁士官僚阶级。他的父亲菲利浦·威斯特华伦是德国军事史上的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他在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大公手下担任过机要秘书。斐迪南大公曾经率领一支英国出钱雇佣的杂牌军，在七年战争¹⁴期间胜利地抗击了野心勃勃的路易十五和龐巴都侯爵夫人，保卫了德意志西部。菲利浦·威斯特华伦成了公爵的参谋总部的实际首脑，尽管全军中有许多德国将军和英国将军。他的功绩受到如此的重视，以致英王有意任命他为全军的侍从武官长，然而威斯特华伦谢绝了这个建议。他仅仅抑制了自己的市民精神，接受了赐给他的贵族身分；他这样做，也只是出于那曾经迫使海德尔和席勒忍受同样屈辱的同一个理由。菲利浦·威斯特华伦之所以委曲求全，是为了能够 and 一位苏格兰男爵的女儿结婚；这位姑娘是到斐迪南公爵的军中来探望她的姐姐——英国策应军一位将军的妻子的。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就是这对夫妇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历史声名，而他母亲的祖先的名字也唤起了伟大的历史回忆：直系祖先当中有一个人在苏格兰争取宗教改革的斗争中被处以火刑；另一个祖先，阿契波德·阿盖尔伯爵，在反抗詹姆斯二世的解放斗争时期被当作叛乱者在爱丁堡的市場广场上斩首。这样的家族传统本身就使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脱出了贫乏而又骄傲的容克地主和狂妄自大的官僚的氛圈。最初他在不伦瑞克公爵手下任职，甚至当这个小小的公国被拿破仑合并于威斯特伐里

亞王国的时候，他还不打算离职。他显然不大重视那些世袭的维尔夫們¹⁵，却较为关心法国征服者企图用以治愈他的祖国的潰瘍的那些改革。但是对于外国統治本身，他却也抱着否定的态度，因此在1813年遭到达烏元帅的严厉懲处。以后，他在薩尔茨維德尔做县长，在那里，于1814年2月12日生了女儿燕妮，两年以后，又被調到特利尔去做樞密顧問官。因为，普魯士国家的首相哈登堡在初期励精图治，認識到应当把一些不怀有容克偏見的精干人物派到人心依旧向往法国的新收复的萊茵省去。


卡尔·馬克思終生都对路德維希·馮·威斯特华倫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戴的心情。他称威斯特华倫为“父亲般的亲爱的朋友”，并且向他报以“子弟之爱”¹⁶，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威斯特华倫是他的岳父。威斯特华倫能够从头到尾背誦荷馬詩中的許多段，能够用德語和英語背誦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劇作。在“威斯特华倫家的老宅子”里，卡尔·馬克思获得了他父母的家所不能給他而学校更不能給他的精神食粮。他自己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老威斯特华倫所鍾爱的孩子，而威斯特华倫同意他們的訂婚，还可能是由于他想到自己父母的美滿婚姻。因为，在世人的眼里，以一个古老貴族的男爵世家出身的姑娘嫁給一个既貧穷且非貴族的普通平民出身的机要秘书，也并不是一个門当戶对的姻緣。

路德維希·馮·威斯特华倫的长子絲毫沒有承襲他父亲的崇高的精神品质。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和名利之徒。不仅如此，在50年代的反动时期，当他担任普魯士国家內务大臣职务的时候，他曾为了維護最頑固不化的地方容克的封建要求，甚至反对首相曼托伊費尔，而达位首相毕竟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斐迪南比燕妮大十五岁，而他同这个妹妹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亲近的。他只

是她父亲的前妻所生的异母兄长。

燕妮的亲兄弟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在信念方面比父亲更左一些，正如斐迪南比父亲更右一些一样。他曾在他姐夫的一些共产主义文告上签过名¹⁷。但是他并没有成为卡尔·马克思的固定的同志；他漂泊在海外，饱经变化莫测的祸福，时来时往，行踪不定；凡是谈到他的人莫不认为他根本过不惯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但是对于他姐姐燕妮和姐夫卡尔·马克思，他始终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他热爱他们，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第二章 黑格尔的弟子

(一) 柏林的第一年

37 还在卡尔·马克思订婚以前，他的父亲就决定让他到柏林去继续求学了。从保存下来的一份 1836 年 7 月 1 日的正式文件里，我们知道亨利希·马克思不仅允许，而且希望他的卡尔在下学期转到柏林大学去继续攻读已在波恩开始的法学和财政学课程。

卡尔的订婚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加强了老马克思的这个决定。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由于他们的结婚将要推迟到很久以后，因此他认为使这对爱人彼此离得远一些是有益的。他之所以选择柏林，也许是出于普鲁士的爱国主义，也许还由于柏林大学没有旧式大学生生活中那种寻欢作乐的习气，而在这位关怀备至的父亲看来，卡尔·马克思在波恩已经十足地沾染上了这种习气。关于柏林大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说过：“比起这儿的习艺所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店。”^①

无论如何，这个青年学生自己并没有选择柏林作为进修大学学业的地方。卡尔·马克思喜欢他的阳光明媚的故乡，而对于普鲁士的首都则终生都是厌恶的。黑格尔哲学虽然在它的创立者死

^① «L.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费尔巴哈的书简和遗著》), 莱比锡, 1874 年, 第 183 页。

后比他生前更加風行于柏林大学，然而它也不能把卡尔·馬克思吸引到柏林去，因为当时黑格尔对他來說还完全是陌生的。何况，他还必須同他所热恋着的姑娘分离。不錯，他曾經答应过，他要以她同意将来和他結婚为滿足，而暂时控制一切感情的流露。但誓言总是“写在水上的”，恋人們的这一类誓言尤其是如此。馬克思³⁸后来告訴他的孩子們說，由于对他們的母亲的爱，他在那些年里簡直如痴如狂，而在他得到允許和未婚妻通信以前，他那青春的热情始終无法平靜下来。

但是，直到他来到柏林一年以后，他才接到她的第一封信。关于馬克思在这一年中的生活情况，我們所掌握到的材料，在某些方面要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年都更为准确和詳細。这些材料是1837年11月10日馬克思写給父母的一封长信提供給我們的，他写这封信是为了让父母“在过去的一年結束之际，对他如何在这里度过这一年”有一个了解。这个值得注意的文件使我們看到了这个人在青年时代就已經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給了爭取真理的斗争。他表现出如饥如渴的求知欲，无穷无尽的精力，无情的自我批評精神，和那种只要情感迷失方向就能压倒情感的战斗精神。

1836年10月22日，卡尔·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但是他对那里的課程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在九个学期当中，他只不过修了十二門課程，主要是法学必修課，而且就是这十二門課程，他大概也很少去听讲。在正式的教师当中，只有爱德华·甘斯一人对卡尔·馬克思的精神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他听甘斯讲授刑法和普魯士国家法，而甘斯本人曾证明馬克思在听他的課时是“极为勤奮”的。但考語照例总要夹杂一些个人情面的成分。比这样的考

話更有說服力的，是馬克思在最初几篇論文中跟历史法学派¹⁸所进行的无情論爭。富有哲学修养的法学家甘斯也曾义正辞严地斥責了这个学派的偏狹和愚鈍，以及它对法律和立法的发展的有害影响。

不过，据馬克思自己說，他在大学修法学課程只是次要的；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才是主要的課程，但就是这两門課程他也很少去听讲，而仅仅选修了加布勒尔所开的必修課邏輯学。加布勒尔是黑格尔的正統继承者，然而也是黑格尔的所有平庸的附和者当中最平庸的一个。作为一个思想家，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經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識，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輸的話，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

初到柏林的时候，馬克思沉溺在一个“新的世界、爱情的世界”中。“沉醉于爱情而希望渺茫的”他，把自己的感情傾泻在写滿了三册的詩篇¹⁹中，这些詩篇都是献給“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馮·威斯特华倫”的。这些詩到达燕妮手里时已經是1836年12月，而她，就像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在寄往柏林的信中所說的，“含着悲喜交集的眼泪”讀了这些詩。一年以后，作者本人在写給父母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繆斯的产儿作了十分苛刻的評判：“模糊而不成形的感情；不自然；純粹是从脑子里虛构出来的；现实和理想之間的完全对立；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詩的意境……”。要知道，开列這張罪状的正是这位青年詩人本人啊。虽然他也附带声明說，在这些詩中“或許有某些热情和对大胆飞翔的追求……”^①，但是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7頁。

如果这些可嘉的品质还能够作为減輕罪状的条件，那也只是就席勒的那些“劳拉之歌”²⁰的意义和程度而言。

总地說来，这些青年时代的詩作散发着平庸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很少响彻着真实的音調。而且，詩的技巧是笨拙的，这种情况在海涅和普拉頓之后是不應該再出現的。这样，馬克思表現在他的学术著作中的高度艺术才能，一开始就是沿着一条奇特的道路发展的。就語言的气势和生动來說，馬克思可以和德国文学上最优秀的大师媲美。他也很重視自己作品的美学上的諧調性，而不像那些淺陋的学者那样，把枯燥无味的叙述看成是学术著作的基本条件。但是，在繆斯放在馬克思的搖籃里的許多天賦之中，毕竟沒有韵文的才能。

不过，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給父母的长信中說，詩歌只能是而且也只應該是一种附帶的事。他认为自己的本分是研究法律，而他最迫切的願望是想在哲学方面試試自己的力量。他研究了海尼克修斯、提波和各种典籍，把羅馬法全书的头两卷譯成德文，并且試圖在法的整个領域內創立一种法哲学体系。这部“倒楣的著作”，据他說，已經差不多写到三百印張之多，不过这个数字可能只是一个笔誤。最后，馬克思看出“这全盘是一个錯誤”，便投入了哲学的怀抱，打算創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随后他又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这期间，他养成了給所有讀过的书——例如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尔的《艾尔温》、文克尔曼的《艺术史》、路登的《德意志人民史》——写摘要的习惯，并且在頁边⁴⁰空白处批注自己的感想。同时，他还翻譯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奧維狄烏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也就是說依靠語法书学习英語和意大利語，虽然一时收不到什么效果。他还讀了克莱

因的《刑法》和他的《編年記》，以及所有的文學新作，不過後者只是順便讀讀罷了。到學期終了時，他又一次獻身於“繆斯的舞蹈和薩提爾的音樂”²¹；這時，一個真正的詩歌王國像遙遠的仙宮一樣突然在他面前閃現了一下，而他自己所創作的一切便全都化為灰燼了²²。

這第一個學期的結果是，“熬過了許多的不眠之夜，進行了許多次戰鬥，經受了許多的內部和外部刺激”，然而所得甚少。在這個期間，馬克思拋開了大自然、藝術和整個世界，疏遠了朋友。加之，他的年輕的身體疲勞過度，因此他遵照醫囑遷居到施特拉勞去，這地方當時還是一個安靜的小漁村。在那裡，他很快就恢復了健康，重新開始緊張的精神搏鬥。在第二個學期里，他也吸取了極為廣博的各種知識，但是在他的學習方面，黑格爾的哲學越來越明確地成為變換不息的現象中的一個固着點。當馬克思初次接觸到黑格爾哲學的片斷時，他並不喜歡它的那種“古怪而粗獷的格調”；但是在又一次生病的時候，他從頭到尾地研究了它，並且加入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博士俱樂部”。在那裡，通過思想論爭，他越來越接近於這個“現代世界哲學”，不過，他內心的一切豐富的聲音當然不免靜止下來，而“在這樣多的東西遭到否定之後”，他陷入了“一種真正的諷刺狂”²³。

卡爾向自己的父母傾吐了這一切，並且在信的結尾處請求允許他立刻回家，而不要像他父親以前所允許的那樣等到第二年復活節的時候。他希望向父親訴說他精神上的“極度動蕩不寧”。只有在父母的“慈顏”之前，他才能平息那些“不安的幽靈”^①。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年俄文版，第6—16頁。

这封信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但是对于他的父母，这封信却产生了很不愉快的印象。那时已经病魔缠身的父亲，又在儿子身上看到那个老早就曾使他担忧的“魔”。自从他把“某人”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钟爱以来，自从一个非常可敬的家族同意缔结一段看来将使爱女遭遇生活的坎坷和暗淡莫测的前途的姻缘以来，他更是加倍地惧怕这个魔影了。他也绝不致于固执到要给儿子规定生活的道路，只要卡尔能够选择一条使自己有可能完尽“神圣的天职”的生活道路。但是这位父亲现在只看见前面是一片波谲汹涌的海洋，而没有一个安全的碇泊之所。

因此，尽管亨利希·马克思很“软弱”，——这一点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还是决定“破题儿严厉一番”。他在12月1日^①的回信（这是一封以他所特有的方式措词“严厉的”回信）中，就用了一种夹杂着沉痛的叹息的过分夸张的词句。父亲问卡尔是怎样履行他所承担的责任的，接着自己回答说：“让上帝来判断吧!!!毫无秩序；杂乱无章地涉猎各门学问；在油灯的昏暗灯光下胡思乱想；不是拿着酒杯撒野，而是穿着学者的睡衣、蓬头散发地在那里撒野；愁眉不展地落落寡合，不近人情，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毫不关心。处世之道只局限在骯髒的小屋里。那里，在极端的杂乱无章中，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含泪书成的温谕，大概都被当作卷烟纸使用了，当然，这总比漫不经心地让它们落到不相干的人手里要好些。”写到这里，父亲被悲伤压倒了，为了保持严厉无情的态度，他不得不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丸来自持。接着他严厉地训

^① 梅林在这里说得不确切。亨利希·马克思的信的日期是12月9日。

斥了卡尔的枉費：“就好像我們是財主一样，少爷一年之內，不顧一切規劝，違反一切习惯，胡乱花了差不多七百塔勒，而有錢人还花不到五百塔勒。”当然，卡尔并不是一个揮霍无度的浪蕩儿，但是一个几乎每星期都在創立新体系和攙毀旧体系的人，难道会去注意这些生活小节嗎？大概是随时随地都有人欺騙他，随便什么人都把手伸到他的錢袋里去。

这封信就这样繼續写下去，而在結尾处，他严詞拒絕允許儿子回家。

“现在就回来是胡鬧。我知道，反正你是不会認真上課听讲的，虽然你大概也会照付学费；不过，我希望起碼要顾全体面。我不是社会輿論的奴隶，但是我也不喜欢被人議論。”到复活节时卡尔可以回家，甚至可以提前十来天回家，因为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拘泥細节的人。

从这一頓牢騷之中，可以看出他是在責备儿子的冷漠无情。后来，馬克思也曾多次受到这种指責，但是由于这里是第一次，而且
42 似乎理由最为充足，因此不妨在此地說几句需要說的話。現時流行的所謂“尽情享受生活的权利”这句口号，原是我们的莽尊处优的文化为了掩飾率怯的利己主义而发明的。这个口号当然不是一个令人滿意的回答。而旧时关于天才应比常人享受更多的“天才的权利”的說法也是如此。相反，卡尔·馬克思对最高認識的不倦的追求，是发源于他內心的最深厚的情感。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說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間”；或者像胡登所說的，上帝曾經賦与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別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別人感受得更深切。从来沒有人比卡尔·馬克思做过更多的鏟除“人間忧患”根源的工作。他在大

海上的航行总是充满了风险：他的船始终穿行在恶风浪和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虽然他的旗帜永远骄傲地飘扬在桅杆上，但船上的生活无论对于船员或对于船长来说都不是轻松安宁的。

因此绝不能说，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是冷漠的。他的战斗精神能够暂时压低他内心的声音，但是从来不能把它彻底淹没。他在中年时期就常常哀痛地诉说，在他的多舛的命运下，他最亲近的人所受的苦要比他自己所受的更多。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对父亲的抱怨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不但放弃了立刻回特利尔的打算，而且在复活节也没有回去，这一点使他母亲感到伤心，但是却使父亲大为称心，他的怒气和烦恼很快就几乎全消了。虽然父亲在以后的信中仍然发牢骚，但是已经不再夸大其词了。父亲自己承认，在抽象议论的本领上，他确实不是卡尔的对手；而要在进入圣殿之前学习那些术语，他已经太老了。他写道，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任何超验的东西都无补于事，而正是在这个问题——金钱的问题——上，儿子慎重地保持着高傲的缄默。看来，卡尔还不懂得钱对于一个养家的人的价值。但是，父亲表示，由于疲倦，他“准备放下武器”了。这句话包含着比他这封信里重新流露出来的轻松的幽默更为严重的意义。

这封信是在1838年2月10日写的。那时亨利希·马克思刚刚在病卧五个星期之后起来。但是病情的好转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的病——大概是肝病——又复发了，而在三个月之后，即1838年5月10日，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与世长辞了。死来得正是时候，它使父亲的心免于因痛苦和失望而逐渐破碎。

卡尔·马克思终生以真挚的感激心情怀念着自己的父亲。正43
像父亲曾经把对儿子的爱珍藏在内心深处一样，儿子也把父亲的

形象銘記在心中，直到走進墳墓²⁴。

(二) 青年黑格爾派²⁵

從 1828 年春天喪父以後，卡爾·馬克思又在柏林住了三年。在這一段時間里，他同“博士俱樂部”的成員們交往，而這個俱樂部中的精神生活為他開辟了通向黑格爾哲學的道路。

黑格爾的學說當時還被認為是普魯士的國家哲學。文教大臣阿爾坦施泰因和他的樞密顧問官約翰·舒爾采給予這個學說以特殊的保護。黑格爾把國家尊崇為倫理觀念的化身，尊崇為絕對合乎理性的東西和絕對的目的本身。因此他認為國家對個人具有無上的權威，而個人的最高義務則是成為國家的一員。這種國家學說極其適合普魯士官僚的口味，因為它使查究“煽動者”²⁶ 這樣的罪惡行為也蒙上了光彩。

黑格爾的哲學絕不是偽善的。黑格爾之所以把君主政體（在這種政體下國家官吏必須盡其所能）看做理想的政體，是由於他本人的政治發展水平所致。他雖然認為各統治階級有在某種程度上間接地參與統治的必要，但是這也要有嚴格的等級限制。關於現代立憲意義下的全民代議制，他就像普魯士國王和他的賢哲梅特涅一樣，是根本不予考慮的。

但是，黑格爾為他自己創立的體系，同他作為一個哲學家所宣揚的辯證方法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存在這個概念同時，產生了不存在這個概念，由於這兩者之間的鬥爭，就產生了變易這個更高的概念。一切事物是存在着的，同時又是不存在着的，因為一切都在流動，一切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產生和消逝。在黑格爾看

来，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形成着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想用他的渊博学识在历史科学的各个领域证明这一过程，不过当然他只是在符合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形式之下这样做的。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事件不过是绝对观念的不同 44 发展阶段；他认为，绝对观念是整个世界的创造精神，此外，他不曾对它作过其他任何说明。

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王朝的国家之间的联盟只是一种利害打算的婚姻。只要双方认为还有利可图，这种联盟关系就维持下去。在卡尔斯巴德决议^①和查究“煽动者”期间，情况大抵就是如此。但是当1830年的七月革命给欧洲的发展以强大推动时，黑格尔的方法就显得比他的体系更加可靠得不可比拟了。当七月革命在德国引起的微弱反响刚一被窒息，而诗人和思想家的园地重新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时，普鲁士容克地主就连忙重新搬出中世纪浪漫主义²⁷这个老朽的废物来反对现代哲学。这一点他们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黑格尔与其说赞扬了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本身，不如说赞扬了较为开明的官僚政治。事实上，黑格尔尽管推崇官僚国家，却丝毫没有帮助维持人民的宗教信仰，而维持人民的宗教信仰正是封建主以至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

于是，第一次的冲突就发生在宗教领域内。黑格尔认为，圣经故事应该当作世俗文学来看待，而关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实的知识是同信仰毫无关系的。他的学生，年轻的士瓦本人大卫·施特劳斯非常认真地听信老师的话，他要求对福音书故事进行历史的

^① 1819年8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上制定的反动决议，规定对大学实行预先检查、监督，禁止学生会和加紧镇压“煽动者”。

批判。他以自己的《耶穌傳》一書证明了这种要求的合理性；这本书在1835年出版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就通过这部书接近了資產階級启蒙运动，而黑格尔是曾經輕蔑地把这个运动称做“伪启蒙”的。但辩证思維的才能使施特劳斯对这个問題的提法比老雷馬路斯即萊辛的“无名氏”²⁸深刻得多。施特劳斯已經不把基督教简单地看成騙局，把使徒們看成一群騙子，而是把福音书中的神話部分解釋为早期基督教教团的无意識的創作。但是他仍旧承认福音书中的許多地方是关于耶穌生平的历史叙述，而耶穌本人則是一个历史人物。在耶穌生平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上，施特劳斯都找到了历史真实性的內核。

在政治上，施特劳斯是完全无害的，他終生都不过問政治。《Hallische Jahrbücher》（《哈雷年鉴》）的政治調子却更激烈一些，它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是由阿尔諾德·卢格和泰奥多尔·艾希特迈耶尔在1838年創办的。誠然，这个杂志也討論文学和哲学問題，而最初它只不过是跟黑格尔右派的发霉生鏽的机关刊物，柏林的《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科学評論年鉴》）对抗的东西罢了。在阿尔諾德·卢格的面前，早死的艾希特迈耶尔很快就退居于次要地位。卢格过去曾参加过大学生运动²⁹，并在瘋狂迫害“煽动者”的黑暗年代里在科本尼克和科尔堡坐过六年半。但是卢格並沒有对自己的命运悲观失望。在获得哈雷大学讲师职位之后，他娶了一位有錢的太太，过起富裕的生活来，这使他不顧一切地宣称普魯士国家制度是自由公正的。其实卢格并不反对以他本人来证实老普魯士官僚們的一句恶意的戏言，即在普魯士，再也沒有比变节的“煽动者”能更快地飞黃騰达的了。然而这一点却并未实现。

卢格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更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功名心重，有教养，能苦干，并且具有作为一个学术刊物的好领导人所需要的那种战斗精神。他有一次曾经自称为精神货物的批发商，这并不是不恰当的。他主编的《哈雷年鉴》成了所有那些不安分的学者们的汇集之所；这些人拥有使刊物变得生气勃勃的才能，虽然这种才能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来是很不利的。大卫·施特劳斯所吸引的读者，远远多过那些唾沫横飞地捍卫福音书之神圣无谬性的神学家们所能吸引的读者。虽然卢格自己保证说，他的杂志是忠于“黑格尔的基督教和黑格尔的普鲁士”的，但本来就受到浪漫主义反动派^①逼迫的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却不信任他的和解诚意。而对于卢格要求国家承认他的功绩并加以任用的不断请求置之不理。于是，明智的《哈雷年鉴》就重新意识到必须打碎那束缚着普鲁士的自由和公道的种种镣铐了。

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的三年中所与之交往的柏林青年黑格尔⁴⁸分子，也是《哈雷年鉴》的撰稿人。“博士俱乐部”是由一些大学讲师、中学教员和作家组成的。这些人都正当盛年，精力充沛。鲁滕堡——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称他是自己在柏林“最亲密的”朋友——在柏林士官学校当地理教员。他被开除了，据说是因为一天早晨有人看见他醉倒在水沟里，而实际原因却是，人们怀疑他在莱比锡和汉堡的报刊上写过“恶意的”文章。爱德华·梅因给一个发表过马克思的唯一两首有幸问世的诗的短命杂志撰稿^②。当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在一个女校任教的麦克斯·施

① 浪漫主义反动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把中世纪的制度和风尚加以理想化的派别。

② 指马克思在1841年发表在柏林的《Athenäum》（《艺文》）杂志上的《狂歌》。

蒂納是否也已經參加了這個俱樂部，還沒有弄清楚。也沒有直接的材料證明馬克思和施蒂納見過面。這個問題並不十分重要，因為他們兩人之間從來沒有過任何精神上的共同性。實際上，對馬克思影響最大的是“博士俱樂部”的兩個最傑出的成員：柏林大學講師布魯諾·鮑威爾和多羅特恩施塔特實科中學教員卡爾·弗里德里希·科本。

卡爾·馬克思加入“博士俱樂部”的時候剛剛二十歲。但是，正像後來所常常發生的那樣，每當他加入一個新團體之後，他立刻就變成了這個團體的精神中心。鮑威爾和科本都比他大十來歲，但他們很快就承認了馬克思的卓越的才智，認為沒有比這個青年更好的戰鬥伙伴了，雖然這個青年還能向他們學習許多東西並且實際上也學習了許多東西。科本在1840年為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誕生²⁹一百周年而寫的非常激烈的小冊子^①，就是“獻給我的朋友、特利爾的卡爾·亨利希·馬克思”的。

科本是一位稀有的天才歷史學家，他在《哈雷年鑑》上發表的文章至今還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應當感謝他的是，他是第一個給法國大革命的紅色恐怖時期作出了真正歷史的評價的人。他非常正確而中肯地批判了和他同時的一些歷史學家如利奧、蘭克、勞麥和施洛塞爾。他也曾在歷史研究的各種不同領域中試過自己的身手——從可與雅科布·格林和路德維希·烏蘭德的著作媲美的北歐神話導論，直到關於佛陀的巨著（這本書就連素不賞識這位老黑格爾主義者的叔本華也大加贊許）。如果像科本這樣的才智之士都渴望普魯士歷史上最凶惡的暴君的“精神復活”，並且要

① 指科本的《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敵人》）一書。

“用冒着火焰的劍消灭一切阻碍我們进入天国的敌人”，那末这就可以想見，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是生活在一种多么奇特的环境里了。

不过，这里不應該忽略两种情况。浪漫主义反动派以及和它一鼻孔出气的一切人都千方百計地抹黑关于“老弗里茨”的記憶。正像科本所形容的，这是“最可怕的群猫大合奏：新旧約的喇叭、道德的口琴、益世的風笛、历史的巴松和其他烏七八糟的响器，其中还夹杂着古条頓人用粗嘎的低音吼唱出来的自由頌歌”。其次，当时对于这个普魯士国王的生平和事迹，还没有任何批判的科学研究，哪怕是試图作出一个公正的評价。其实，这种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能够据以再現他的历史的那些最主要的史料，都还没有公开发表供人利用。弗里德里希被认为是一位“开明的”君主，而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受到一些人的憎恨，受到另一些人的贊揚。

科本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恢复18世紀启蒙运动的精神。卢格在談到鮑威尔、科本和馬克思的时候曾說，他們的特征是同資产階級启蒙运动有联系的。他們是哲学上的山岳党^①，并且在風雨如晦的德国天空上书下了“弥尼、弥尼、提客勒、烏法珥新”³⁰一行大字。科本駁斥了那些反对18世紀哲学的“庸俗的贅言”。他证明說，虽然德国启蒙运动者的言論有时是枯燥无味的，但我們还是应当大大地感謝他們。糟糕的只是，他們还不够开明。科本主要是想开导那些沒有头脑的黑格尔摹仿者，那些“懶悔的思想家”，那些“邏輯学的老婆罗門”，他們永远一动不动地盘腿靜坐，單調地喃喃自語，反复背誦着三部《吠陀經》³¹，只是不时地向舞妓投以淫蕩的一瞥。无怪乎万哈根在黑格尔右派的机关刊物

① 山岳党是18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时期国民議会中的革命民主集团。

上把这本小册子叫做“令人作嘔的”了。特別刺痛了他的是科本对“泥坑的癩蛤蟆”的粗暴的批評，說这种害虫沒有宗教，沒有祖国，沒有信念，沒有良心，沒有感情，不冷不热，无喜无忧，无爱无憎，既
48 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是一些徬徨在地獄門口，連进地獄也不够資格的渺小的可怜虫。

科本只是把这位“偉大的君主”頌揚成一位“偉大的哲学家”，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犯了一个甚至从当时的知識水平說来都不應該犯的大錯誤。他写道：“弗里德里希不像康德那样具有双重的理性，一种是理論的理性，它相当直率而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一切怀疑、問題和否定；另一种是實踐的理性，它起着前者的官方监护人的作用，替它弥縫过失，隱瞞它的学生式的胡鬧。只有最幼稚的小学生才会认为，弗里德里希的理論的、哲学家的理性比起他的實踐的、国王的理性来是极端超驗的，认为老弗里茨会时常忘掉桑苏西宮³²中的隱士。正相反，在他身上，国王是从来不落在哲学家后面的。”^①今天，如果任何人敢于重复科本的这种論調，那末他必定西此而暴露出自己的小学生般的幼稚无知，甚至从普魯士历史科学的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就是在1840年，把康德这样一个人所毕生努力的启蒙工作看得比波魯西亚^②专制君主和那班自甘降低身分做他的宫廷小丑的法国才子們一起玩的启蒙游戏³³还要低，也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科本的这一失策，表現出了对一般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发生了不良影响的那种柏林生活的閉塞、貧乏和空虛。这一点也特別强烈地表现在科本所真心誠意地写出的战斗性政論小册子上，虽

① 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萊比錫，1840年，第13—14頁。

② 普魯士的拉丁語名称。

然他似乎应该比其他人更坚强些。在柏林，资产阶级的自觉还没有得到像莱茵省的高度发达的工业所给予它的那种强有力的支持。而当斗争转到实际问题方面的时候，普鲁士的首都不但落在科伦后面，甚至连莱比锡和科尼斯堡都不如。关于当时的柏林居民，东普鲁士人瓦列斯罗德写道：“当他们坐在咖啡馆里，学着街头无赖汉的腔调，拿大人先生、国王和时事等开心取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享受着多么了不起的自由哩。”柏林主要是一个军人的城市和国王驻蹕之所，它的小资产阶级居民用恶意的无聊诽谤来补偿自己在宫廷马车前所表现的那种怯懦的卑躬屈节的屈辱。这类反⁴⁹对派经常聚集的地方就是这个万哈根本人所主持的闲话沙龙，而这人是只要一想到科本所理解的弗里德里希式的启蒙，就要在自己身上画十字的。

毫无疑问，年轻的马克思的观点是和这本使他的名字第一次光荣地和公众见面的小册子一致的。他同科本非常接近，并且从这位年长的伙伴学到了不少写作方法。虽然他们不久以后就分道扬镳了，但他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二十年后，当马克思重访柏林时，他发现科本“还是那个老科本”，并且一起欢庆了他们的重逢。此后不久，在1863年，科本便逝世了。

(三) 自我意识的哲学

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真正首领不是科本，而是布鲁诺·鲍威尔。他是黑格尔的最卓越的弟子，并且被公认为如此，特别是当他以思辨哲学家的傲慢态度抨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并受到施特劳斯的猛烈还击的时候³⁴。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保护了这个大

有前途的天才。

尽管如此，布魯諾·鮑威尔却不是—个虛榮心重的人。施特勞斯曾預言他將要老死于正統派³⁵首領亨格斯坦堡的“僵死的經院哲學”之中，这个預言却落了空。恰恰相反，1839年夏天，布魯諾·鮑威尔同亨格斯坦堡展开了一場筆戰，因为亨格斯坦堡想把《旧約》里的那个复仇和憤怒的上帝奉为基督徒的上帝。固然，他們的爭執並沒有超出学院式的論戰的範圍，但是，衰老而胆小怕事的阿尔坦施泰因却宁可把自己的被保护人調离那些虔誠而又复仇心切的、多疑的正統派。1839年秋天，他把布魯諾·鮑威尔派到波恩大学去当讲师，准备在一年內提拔他为教授。

但是，正像布魯諾·鮑威尔給馬克思的信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鮑威尔当时正經歷着思想上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他远远超过了施特勞斯。他着手对福音书进行批判，并且彻底扫除了施特勞斯还不曾拆除干淨的那座大厦的殘垣断壁。布魯諾·鮑威尔断言，在整个四部福音书中沒有絲毫历史的真实，它們的全部內容都是福音书作者的杜撰。他进一步证明，已成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不是强加于古希腊羅馬世界的，而是那个世界本身的产物。这样，鮑威尔就为科学地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开辟了唯一可能的道路。无怪乎如今那位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粉飾福音书的时髦的宫廷沙龙神学家哈尔納克，要把按照布魯諾·鮑威尔指出的方向所取得的进展罵作是“不幸的”了。

当这些思想在布魯諾·鮑威尔头脑中成熟起来的时候，卡尔·馬克思是他的不可分离的同伴。鮑威尔本人把这个比他年輕九岁的朋友看成是一个最能干的战友。他剛一在波恩定住下来，就开始坚持要馬克思也到那里去。鮑威尔写道，波恩的教授俱乐

部比起柏林的“博士俱乐部”来简直是“庸俗鄙陋”，在“博士俱乐部”中精神生活方面的趣味还总算比较丰富。在波恩，他也时常欢笑，但是从来没有像在柏林同马克思一起漫步街头时笑得那样痛快。鲍威尔催促马克思赶快了结他的“无聊的考试”，说为应付这场考试，只要读读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就行了。他说，长期为这种胡闹奔忙，把这种逢场作戏的事情看得过分认真，是不值得的。他写道，波恩的教授们，马克思是能够应付裕如的，而主要的事情是必须毫不迟延地马上开始合办一个激进的杂志。柏林人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那些空洞乏味的东西已经变得不能忍受了；他为卢格惋惜，但卢格为什么不把这些害虫赶出自己的杂志呢？

这些信的腔调有时候是十分革命的，但是鲍威尔所考虑的从来都只是哲学上的革命，并且他指望的是国家政权的支持而不是它的反对。1839年12月，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普鲁士似乎注定要通过一次耶拿战役^①才能前进，虽然这个战役并不一定要在尸陈遍野的战场上进行。几个月以后，当他的保护人阿尔坦施泰因和老国王^②差不多同时死去时，鲍威尔就开始宣誓效忠于德意志国家的最高观念，效忠于四百年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应有的关系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家族传统。鲍威尔宣布说，科学将要不倦地捍卫国家的观念，以反对教会的僭越；国家有时也会弄错，会以怀疑的态度对待科学，甚至对科学采取强制手段，但理性是国家所固有的，因而国家的迷误是不会长久的。对于

① 在耶拿战役(1806年)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的军队打败。这次失败在普鲁士加速了某些资产阶级改革的实行(1807—1812年)。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鮑威尔的这种效忠的表白，新国王的回答却是任命反动的正統派分子艾希霍恩为阿尔坦施泰因的继任者；而艾希霍恩則迫不及待地⁵¹在与国家观念有关的範圍内牺牲了学术的自由，即学院的自由³⁶，以滿足教会的要求。

鮑威尔在政治上的不坚定远甚于科本；科本或許会錯誤地估价一个超过了自已的家族水平的霍亨索倫王朝的人，但他絕不会錯誤地估价这个王朝的“家族傳統”。科本不像鮑威尔那样深深地陷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里。但是不应忽視，鮑威尔在政治上的眼光短淺只是他在哲学上的远見的反面。他看出福音书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沉淀物。从純思想体系的观点看来，他的下面这样一种看法是合乎情理的，即如果夹带着古希腊羅馬哲学殘渣的基督教尙且能够战胜古代文化，那末，現代辯证法的明确而自由的批判当然能够更容易地甩掉基督教德意志文化的重担。

給了他这种有力的信念的是自我意識的哲学。自我意識的哲学是古代希腊几个哲学学派——怀疑派、伊壁鳩魯派、斯多葛派——的統称；这些学派产生在希腊国家衰落的时期，并且对基督教的形成起过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学派在思辨的深度上不能和柏拉图相比，而在知識的淵博上也不能和亚里士多德相比，因此，黑格尔是相当輕視它們的。这些哲学学派的共同目的是解放那些因重大災变而丧失了他們曾經依以为生的一切的个人，使他們超脫一切外界事物，把兴趣集中于自己的內心生活，并教导他們在精神的宁靜中去寻求幸福，这种宁靜纵然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崩潰也是絲毫不为所动的。

但是，鮑威尔說，在这崩潰了的世界的廢墟上，受苦受难的“自我”这个唯一的力量对自己感到畏惧，并且把自己的自我意識異化

出来，把它当作一种異己的全能的力量同自己对立。“自我”給羅馬的那个大权在握的世界統治者、执掌生杀予夺的主宰者創造了一个兄弟——虽然是敌对的兄弟，但仍是兄弟。这就是福音书中的“主”，他吹一口气就能战胜自然規律和自己的敌人，并且已在地上宣布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和裁判者。但是，人类在基督教的奴役下經受鍛炼，只是为了以后更加彻底地为爭取自由鋪平道路，并且在終于获得自由的时候更加牢固地保有自由。返回自身、理解自身并認識自己本质的无限的自我意識，是有力量控制它的自我異化的創造物的。

如果抛开当时哲学語言中的那些寓意的說法，那末就能够簡單明了地說明，究竟是什么东西使鮑威尔、科本和馬克思傾心于希腊的自我意識哲学。实际上，他們也是想通过这种哲学同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結合起来的。古希腊的自我意識学派沒有产生过像最古的自然哲学家德謨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或較晚的思辨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样的天才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些学派仍然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它們为人类精神开拓了广闊的視野，打破了希腊文化的民族界限，粉碎了奴隶制度的社会界限，而这种界限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不曾超越的。它們产生了原始的基督教，受苦难和被压迫的人們的宗教，这个宗教只是在它墮落为剝削者和压迫者的宗教之后，才承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尽管黑格尔曾以否定的态度对待自我意識哲学，但他也承认，在羅馬世界統治者的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当个人精神上的一切美好崇高的事物都受到橫暴摧殘的时候，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因此，18世紀的資產階級启蒙运动就以希腊的自我意識哲学，以怀疑派的怀疑、伊壁鳩魯派对宗教的敌視和斯多葛派的共和主义

观点来武装自己。

科本在談到他的启蒙英雄弗里德里希二世时，就是持着这样的論調的。他說：“伊壁鳩魯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論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經、肌肉和內臟；它們的自然的、直接的統一决定了古代的美与善，而当这个有机体瓦解时，它們也随着瓦解了。弗里德里希把这三者兼收并蓄，并以惊人的力量駕御着它們。它們构成了他的世界观、他的性格和生活的基础。”而科本关于这三个哲学体系同希腊生活的关系的說法，馬克思认为是“有着更深刻的意义的”。吸引着他的年长的朋友們的問題也同样地吸引着他，但是他对这个問題当然是另有不同的看法。他既不到宗教这个歪曲形象的凹鏡里，也不到专制君主的无謂的哲学空談里去寻求“人类自我意識”这个独一无二的“至上的神”；他宁可去追溯这种哲学的历史根源，把这种哲学看作理解希腊精神的真正历史的钥匙。

(四) 博士論文

当 1839 年秋天布魯諾·鮑威尔催促馬克思赶快了結他的“无聊的考試”时，他的这种焦急情緒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馬克思已經在大学里度过了八个学期。但是他大概不会认为馬克思真地
53 会在这场考試面前怯場，否則他就不会断定，他的年輕的朋友一交手就能把波恩的哲学教授們打垮了。

不論是在当时，或是在此后的一生中間，馬克思的性格的特征都是：不知饜足的求知欲迫使他迅速地投身于最困難的問題，而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却妨碍他同样迅速地解决这些問題。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工作的話，那末他显然就会深深地陷进希腊哲学了。

哪怕单是把那三个自我意识的体系完全研究清楚，也不是在几个学期里能够做到的事。鲍威尔自己写作得非常快，——他写得太快了，以致他的作品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因此他是不能充分理解这一点的。恩格斯是比较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但是后来当马克思陷入无止境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就连他也有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

此外，在这个“无聊的考试”中出现了另一种复杂情况——如果对鲍威尔来说不是如此，那末对马克思来说却是如此。还在父亲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就决定献身于学术，不过当然他仍有必要从事一门实际的职业。但是自从阿尔坦施泰因死后，“教授生涯”中足以弥补它的许多不利因素的最诱人的一面，即大学讲坛上讲授哲学的相对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关于学院式的假发^{36a}别无其他好处这一点，鲍威尔曾在从波恩写的信中绘影绘声地谈到过。

不久以后，鲍威尔就第一次亲身嚐到了普鲁士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独立性”的滋味。在1840年5月阿尔坦施泰因死后的几个月当中，曾由办公厅主任拉登堡代理文教大臣之职。他非常尊重自己的老上司，因此打算履行他的诺言，把鲍威尔提升为波恩大学的教授。但是后来艾希霍恩被任命为文教大臣，而波恩的神学系又以这会破坏系内的团结一致为由，拒绝接受鲍威尔为教授。这个拒绝是“理直气壮”地提出的；当德国教授确信上级在暗中赞助他们时，他们总是表现得这样的“理直气壮”。

鲍威尔是在柏林渡过了秋季休假之后正要返回波恩时获悉系里的这个决定的。当时在他的朋友们当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表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无可挽回的破裂，一个从事科学的

人屬於神學系是否與良心相容。但是鮑威爾本人却堅持對普魯士國家制度抱樂觀主義態度，拒絕了要他從事著述並領取國家津貼的半官方的建議。他斗志昂揚地回到波恩，希望同不久就隨着他前來的馬克思共同掀起一場風波。

他們兩人都沒有放棄合辦一種激進報紙的打算，但是馬克思在這個萊茵省的大學里任教的希望卻非常渺茫了。他必須事先估計到，波恩的教授們會對他懷有敵意，因為他是鮑威爾的朋友和同道；而按鮑威爾所建議的那樣去向拉登堡或艾希霍恩求情，又絕不是他肯做的事，因為在這類問題上，馬克思向來是特別嚴格的。即使他有意走上這條泥滑的道路，也可以預料，他將會在這條路上摔倒。艾希霍恩不久就原形畢露：為了徹底打垮那些已經衰朽僵化了的黑格爾分子，他把當時竟然相信啟示的老頭子謝林請到柏林大學去，並且下令懲誡那些向作為校長的國王上書請求任命施特勞斯為哈雷大學教授的哈雷大學學生。

在這種遠景之下，具有青年黑格爾派觀點的馬克思完全放棄了在一个普魯士的大學里通過考試的念頭。他不願意讓一個什麼艾希霍恩的唯命是從的幫手們作弄他，但這絕不意味着他放下了武器，放棄了鬥爭。恰恰相反！他決定在一所較小的大學接受博士文憑，同時發表自己的博士論文，作為自己的才學和勤奮的證明，並附上一篇大膽的挑戰性的前言，然後在波恩定居下來，同鮑威爾一道出版擬議中的報紙。這樣，波恩大學就不能完全向他關門；根據大學的章程，他只要取得一個“外邦”大學的 Doctor promotus^① 的身分，再辦理某些手續，就可以取得在大學里做講師的

① 博士學位獲得者。

权利。

馬克思把这个計劃付諸实行了。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根据他的一篇論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的差別的論文，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他以博士学位。这篇論文只是一部更大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在这部著作中，馬克思打算全面論述伊壁鳩魯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同整个希腊思辨思維的关系。在这里，他只是举一个例子來說明这种关系，而且只談到同較古的思維体系的关系。55

在最古的希腊自然哲学家当中，德謨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最为彻底。沒有任何东西是从无中产生的；沒有任何存在着的東西会化为烏有。一切变化都仅仅是各个部分的結合或分离。沒有偶然发生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而且是由原因必然地产生出来的。除了原子和虛空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其他的一切都是臆想。原子的数量是无穷的，形式是无限多样的。当原子在无限的虛空中永恒地降落时，較大的原子降落得較快，撞击着較小的原子；由此而产生的偏离的运动以及漩渦，就成了世界形成的基础。数不清的世界在同时地和依次地形成着和崩潰着。

伊壁鳩魯从德謨克利特那里承受了他的自然观，但是作了某些改变。在这些改变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原子的偏斜”的理論。伊壁鳩魯断言，原子不是垂直降落的，而是稍許偏离直綫而降落的。对于伊壁鳩魯的这个在物理学上不可能的論断，一切批評者，从西塞罗和普卢塔克到萊布尼茨和康德，都曾无情地加以嘲笑；他們认为他一味模仿德謨克利特，却又歪曲了他老师的面貌。

但是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另一种傾向。这种傾向把伊壁鳩魯

哲学看作古代最完善的唯物主义体系。这是因为，伊壁鳩魯哲学在卢克莱茨的教育詩³⁷中保存流傳了下来，而德謨克利特的哲学則在經過許多世紀的風暴之后，流傳至今的只是所余无几的殘篇了。同一个康德，在斥責原子偏斜說为“无耻的”臆造之后，又认为伊壁鳩魯是和最卓越的重理智的哲学家柏拉图相反的感觉論的杰出代表人物。

馬克思决不否认伊壁鳩魯的学說在物理学上是不合理的。他承认伊壁鳩魯“在解釋某些物理現象时表現出一种极端疏忽大意的态度”，但他解釋說，在伊壁鳩魯看来，只有感性知觉才是真理的准繩。例如，伊壁鳩魯认为太阳的直徑是两尺，因为視觉告訴他是如此。但馬克思并不是用一两句貶詞打发掉这些显然是荒謬的东西，而是竭力在伊壁鳩魯的物理学說的不合理中去探求哲学上的合理。他遵守了他自己在博士論文的一个附注中提出的捍卫先师黑格尔的一段良言。他在这个附注里說：当一个哲学家有了某种
56 牵强附会的缺点时，他的門徒不应当責备老师，而应当用产生这种缺点的根源——原則之不完善——来解釋这个缺点，从而使看来是良心上的收获变成学术上的收获。

在德謨克利特看来是目的的东西，在伊壁鳩魯看来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伊壁鳩魯來說，重要的不是認識自然，而是可以支持他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对于自然的观点。古代的所謂自我意識哲学分为三派；按照黑格尔的說法，伊壁鳩魯派代表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識，斯多葛派代表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識；这两派都是片面的独断論，而怀疑派則反对这两派的片面性。或者，这种关系就像現代的一位希腊哲学史家所下的定义：在伊壁鳩魯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中，主观精神的个别的方面和普遍的方面，即个体的原子性的孤

立和它在整体中的泛神的溶合，以同等的权利不可调和地互相对立着；而这种对立则被中和于怀疑论中。

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尽管有着共同的目的，却由于出发点不同而越离越远。溶合于整体，使斯多葛派变成了哲学上的决定论者。在他们看来，一切存在物皆有其必然性，这是自明之理。在政治上，他们则成了坚决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在宗教方面，斯多葛派还没有摆脱迷信的神秘主义。他们接近于赫拉克利特。在赫拉克利特学说中，溶合于整体这一点采取了最鲜明的自我意识的形式；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对待赫拉克利特却像伊壁鸠鲁派对待德谟克利特一样，是颇为不恭的。反之，伊壁鸠鲁派的孤立的个体的原则，使他们变成了哲学上的非决定论者。他们承认个人的意志自由，而在政治方面则极端容忍。圣经上的一句格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³⁸，就是伊壁鸠鲁的遗训。然而在宗教方面，他们却摆脱了一切束缚。

马克思通过一系列辉煌的研究阐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解释说，德谟克利特注重的是原子的物质存在，而伊壁鸠鲁则还说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质料和形式，以及它的存在和本质。他不仅把原子看作现象世界的物质基础，而且也看作孤立的个体的象征，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形式原则。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垂直降落得出一切存在物都是必然的这一结论；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的降落稍许偏离直线，因为否则就会像卢克莱茨（伊壁鸠鲁哲学的最优秀的解 57 释者）在他的教育诗中所提出的那样：哪里还会有自由意志，不受命运摆布的、生物的意志？作为现象的原子和作为本质的原子之间的这种矛盾，贯穿着伊壁鸠鲁的全部哲学，并造成了在古代就传为

笑柄的对物理現象的极端牵强的解釋。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的一切矛盾只是在天体中才得到解决，然而天体的普遍而永恒的存在又破坏了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識的原則。因此，伊壁鳩魯摒棄了一切物质的假面，而作为一位像馬克思所称的“最偉大的希腊启蒙者”，他对那从天空高处以凶恶的目光恫吓人类的宗教进行斗争。

就在这第一部著作中，甚至在他对伊壁鳩魯所做的解釋的一些細节上尚可商榷的地方，并且特别是在这样的地方，已經显示出了馬克思的創造性智慧。因为，可以提出異議的实际上只有这一点，即馬克思比伊壁鳩魯本人更深入地思考了伊壁鳩魯的基本原理，并且从中得出了更明确的結論。黑格尔曾說伊壁鳩魯的哲学总地說来是肤淺的。这种哲学的創始人，像所有的自学者一样，非常重視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因而当然不会使用馬克思在闡釋伊壁鳩魯主义时所用的那些黑格尔哲学的玄妙語汇。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成了这位黑格尔的学生授給自己的毕业证书；他熟练地运用着辯证法，他的語言表现出那种为黑格尔所特有而他的学生们早已失去了的活力。

但是在这部著作中，馬克思还完全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場上。乍讀起来，現代的讀者会对馬克思关于德謨克利特的不以为然的評判感到惊奇。馬克思說，德謨克利特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設，这个假設是經驗的結果，而不是經驗的能动的原則，因此始終沒有实现，并且将来对自然界的实际研究也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同他对待德謨克利特的这种态度相反，馬克思推崇伊壁鳩魯，說尽管他随意地解釋物理現象，尽管他宣揚了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識，他还是創立了原子論的科学，虽然馬克思自己也承认，这种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識取消了真正的科学，因为个别性并不是

事物本性中占統治地位的本原。

原子論作为关于不可分的单位物质的学說和关于一切現象通过它們的运动而发生的学說，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它被用来解釋声、光、热傳播的規律以及物体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就这一点而言，这門科学的創始者是德謨克利特，而不是伊壁鳩魯，这在 58 今天已是无须证明的了。但是对于当时的馬克思來說，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說，思辨哲学，还是一門科学；这一点使他当时的观点，如果不是表现出他的性格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很难为今天的我們所理解。

在馬克思看来，生活永远是工作，而工作永远是战斗。他所以对德謨克利特有反感，就是因为后者缺乏“能动的原則”；像他后来所說的，这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①。德謨克利特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形式、直观的形式去加以考察，而不是主观地，作为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去加以考察。而在伊壁鳩魯那里，吸引着馬克思的正是使这位哲学家大胆地奋起反对宗教压力的“能动的原則”：

“不惧神威，不畏閃电，
也不怕天空的惊雷……”^②

馬克思附在这篇献給他岳父的博士論文前面的序言，充滿着烈火般的不可抑制的战斗热情。他說：“只要还有一滴血在哲学的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中跳动着，哲学就永远会像伊壁鳩魯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喝道：‘那擯棄庸众所信的神灵的人，不是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頁。

^② 參閱馬克思：《博士論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頁。

敬神灵的人；那附和庸众关于神灵的意見的人，才是不敬神灵的人。”哲学公开地贊同普罗米修斯³⁹的自白：

“說老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对于那些抱怨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的人，哲学像普罗米修斯回答諸神的僕役海尔梅斯一样地回答道：

“你要知道，我宁肯忍受痛苦，
也不願受人奴役。”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①——馬克思用这句话结束了他的斗志昂扬的序言。这篇序言甚至使他的朋友布魯諾·鮑威尔都大为吃惊。但是，被鮑威尔看成是“火气过旺”的地方，实际上正是这个在自己的斗争和苦难中注定要成为普罗米修斯第二的人的自白。

(五)《軼文集》和《萊茵报》

59 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新得到的文凭放进口袋里，他寄托在文凭上的全部生活计划，便由于浪漫主义反动派的新的迫害而被打破了。

1841年夏天，在艾希霍恩的压力下，各大学神学系对布魯諾·鮑威尔开始进行可耻的攻訐，因为他批判了福音书。除了哈雷大学和科尼斯堡大学以外，所有的大学都背叛了新教的讲学自由的原则，而鮑威尔终于被迫屈服。这样一来，馬克思插足于波恩大学

① 參閱馬克思：《博士論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頁。

的一切可能性就都消失了。

同时，出版一个激进报纸的计划也落空了。新国王^①以出版自由的“捍卫者”闻名，根据他的指示，制定了一道温和的书报检查令，于1841年底颁布。但是这个国王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出版自由不得超出浪漫主义情绪的范围。就在同一个1841年夏天，他表明了他是怎样理解出版自由的。按照他的敕令，卢格在莱比锡由维干德出版的《年鉴》应接受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否则他的杂志将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这就使卢格充分认清了“自由公正的普鲁士”，因而迁居到德勒斯顿去，并从1841年7月起在那里以《Deutsche Jahrbücher》（《德意志年鉴》）为名出版他的杂志。从这时起，他的刊物的论调变得比以前激烈了，因此，过去正是嫌这个杂志不够激烈的鲍威尔和马克思，便决定给这个杂志撰稿，而不再创办他们自己的杂志了。

马克思没有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它的直接的目的已经失去了意义；而且，据作者后来表示，要等到这部著作发展成为一部综述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派哲学和怀疑派哲学的著作之后再行出版。但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政治工作和哲学工作”阻碍了马克思完成自己的这个计划。

在这些工作当中，首要的一件是要证明，不仅老伊壁鸠鲁、而且老黑格尔都是地道的无神论者。1841年11月，维干德出版了一本“最后通牒”，题名为《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这本匿名小册子的作者伪装成一个正统派教徒，用一种圣经里的先知的腔调哀叹黑格尔的无神论，并且以摘引黑格尔的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60 著作的方式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黑格尔确实是个无神論者。这本小册子引起了轰动,这特别是因为最初誰也猜不出,甚至连卢格也猜不出,在这个假面具下面隐藏着的是誰。实际上,《末日的宣告》是布魯諾·鮑威尔写的。他同馬克思一道打算繼續对黑格尔进行批評性的分析研究,并且根据黑格尔的《美学》、《法哲学》等著作来证明,继承了导师的真正精神的不是黑格尔右派,而是黑格尔左派。

这时这个小册子被禁止出售了,而維干德也給續篇的出版制造了困难。而且,馬克思本人害病,他的岳父也在臥病三个月之后,于1842年3月3日逝世了。这种种情况使得馬克思沒有能够“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1842年2月10日他仍旧給卢格寄去了“一篇小稿子”,并且表示願意尽力为《德意志年鉴》效劳。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評論根据国王敕令重新制定的并且放宽了的书报檢查令⁴⁰。馬克思就以这篇文章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他一步步地证明了这道新法令在浪漫主义的誇張詞句掩盖下的邏輯上的荒謬,从而对它作了毀灭性的批判。这和那些“伪自由主义的”庸人、甚至許多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欢呼雀跃是針鋒相对的,这些人为檢查令中表現出来的“国王的意旨”而欢欣鼓舞,以为“太阳正在天空高照”。

在随稿附上的一封信里,馬克思請求尽快刊登这篇文章,“除非檢查机关查禁了我的檢查”。他的預感並沒有錯。2月25日,卢格写信回答他說,《德意志年鉴》受到了最严峻的檢查,“你的文章不可能发表了”。卢格又說,他那里有許多篇这样的被迫不能采用的稿子,他有意把它們編成一本“精彩而辛辣的东西”的集子,用《Anekdoten philosophica》〔《哲学界軼文集》〕⁴¹为名在瑞士出版。馬克思在3月5日的复信中对这个計劃大为贊同,他写道:“由于薩

克森式的书报检查的突然复活，我的《論基督教艺术》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出版了，这篇文章本来是应该作为《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发表的。”^①他建議把这篇文章改写后载入《軼文集》，并且还答应給这个文集写一篇批判黑格尔有关国家内部制度的自然法的文章，以反对君主立宪制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卢格欣然同意了他所有的建議，但是，除了那篇評书报检查令 61 的文章外，他什么也沒有收到。

馬克思在3月20日的信中說道，他希望使論基督教艺术的文章摆脱《末日的宣告》的那种夸張的語調和黑格尔的沉重拘謹的文体，而代之以更流暢、因而也更透彻的叙述方式。他答应在4月中完成这件工作。4月27日他写道，文章已“将近完成”，并請求卢格再寬候几天；他还补充說，将要寄去的文章是大为压縮了的，因为在写作过程中它已几乎发展成为一本书了。以后，馬克思又在7月9日写道，他簡直不想为自己辯解，即使他是由于“不愉快的外务纏身”。同时他保证，不把給《軼文集》的文章写完，决不做別的事。最后，卢格在10月21日的信中写道，文集已經編好了，就要寄交苏黎世的“文学社”去出版；他还保留着篇幅等待馬克思的文章，虽然直到这时为止馬克思只是让他怀着希望，而沒有滿足他的希望；不过他很清楚，馬克思是只要决心去做一件事，就能够做出很大的成績来的。

卢格比馬克思大十六岁，但是他也像科本和布魯諾·鮑威尔一样，非常敬重这个年輕人的才能，虽然馬克思曾使他这个当編輯的人的耐心受到严重的考驗。無論对于合作者或是对于出版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98頁。

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与人方便的作者，但是他們当中沒有一个
人把这种迁延归咎于疏忽或怠惰，因为这种情况只是由于馬克思
的思想过于丰富和不知餒足的自我批判精神而造成的。

这一次，在卢格看来，还有一种情况可以为馬克思辯解，这就
是：馬克思已經被一种远比哲学更强烈的兴趣吸引住了。自从他
写了評书报檢查令的文章以后，他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現在
他在《Rheinische Zeitung》（《莱茵报》）上繼續进行这个斗争，而不
再到《軼文集》上去紡他那哲学的綫了。

《莱茵报》于1842年1月1日在科倫創刊。它最初并不是一个
反对派报纸，而宁可說是政府的机关报。自从30年代科倫发生
62 主教風潮^①以来，拥有八千訂户的《Kölnische Zeitung》（《科倫日
报》）捍卫着教皇至上論派⁴²的主張；这一派人士在莱茵地区拥有
非常強大的势力，給政府的宪兵政策造成不少麻煩。《科倫日报》的
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神圣的热忱和对天主教的忠誠，而是出于生
意經上的考虑，是为了討好那些根本不願理睬“柏林的圣上”的讀
者。《科倫日报》的壟断地位保持得異常巩固；它的出版人排挤了
它所有的竞争者，收买了他們的报纸，甚至当他們領取柏林的津貼
的时候。同样的命运也威胁着《Rheinische Allgemeine Zeitung》
（《莱茵总汇报》）。这家报纸在1839年12月得到了出版許可证，
而許可它出版的目的是为了打破《科倫日报》的独占。但是，在
最后关头，由科倫的富戶組成了一个股份公司来根本改組該报。

① 指普魯士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間就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結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
仰問題发生的冲突。这个冲突开始于1837年科倫主教的被捕（他由于拒絕服
从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而被控以叛國罪并被逮捕），而以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魯士政府的投降告終。

政府鼓励这一步骤，并且给这个易名为《莱茵报》的报纸暂时保留了给予它的前身的许可。

对于那仍被莱茵省居民视为一种外来政权的普鲁士政府，科伦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想使它为难。生意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资产阶级忘记了他们对法国的同情，而当关税同盟^①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开始要求普鲁士统治全德意志。他们的政治要求是极其温和的。居于首要地位的是旨在促进莱茵省当时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经济要求：节约国家财政开支、扩大铁路网、降低诉讼费和邮费、参加关税同盟各邦采用共同的旗帜和派遣共同的领事，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普通愿望。

但是，两个负责物色编辑人员的青年人，高等文官格奥尔格·荣克和陪审官达哥伯特·奥本海姆，都是热诚的黑格尔分子，并且受了莫泽斯·赫斯的影响。赫斯也和他们一样，是莱茵省商人的儿子。他除了通晓黑格尔哲学以外，还熟悉法国的社会主义。他们在自己的同道（包括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征求撰稿人。其中，鲁滕堡甚至加入了编辑部，负责主编国内政治版。他是马克思介绍进去的，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次推荐并没有给他增光。

63

马克思显然从一开始就同《莱茵报》很接近。3月底，他决定从特利尔迁居科伦，但是他感到科伦的生活太喧闹，于是他在波恩定居下来。这时布鲁诺·鲍威尔已经离开了波恩，因此马克思说：“……如果这里不留下一个人来惹那班圣人們生气，那将是一件憾事。”^② 马克思开始从波恩给《莱茵报》写文章，很快就压倒了所有

① 确立了共同的关税边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同盟。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普鲁士。同盟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各邦，并在以后促进了德国的政治统一。

②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46页。

其他的撰稿人。

《萊茵報》最初显然是由于荣克和奥本海姆的私人关系而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工具的。但是如果說这种情况未經報紙股東們的同意，甚至不為他們所知悉，那也是難以設想的。应当認為，股東們是相當精明的，他們能夠看到在當時的德國再也找不到更有才能的撰稿人。青年黑格尔派是親普魯士的，而他們的文章中的那些在科倫資產階級看來是不可理解的或值得懷疑的地方，很可能被資產階級看成是無害的怪癖了。不管怎樣，當報紙創辦的头几个星期中柏林方面不斷抱怨該報的“顛覆傾向”，而在第一季度末該報受到查禁的威脅時，股東們也不會表示過任何異議。當魯騰堡進入該報時，柏林的聖上特別驚恐。這人被公認為一個危險的革命家，受到嚴格的政治監視。甚至在1848年三月革命的時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還害怕這個人，認為他是革命的主謀。如果說《萊茵報》暫時還沒有受到致命的打擊，那首先是由于文教大臣的關係。艾希霍恩儘管反動，却主張必須設法對抗《科倫日報》的教皇至上論傾向。也許他認為《萊茵報》的傾向“更不可靠”，但是他想，它不過是在玩弄思想，而這些思想是誘惑不了那些在生活上站穩了腳跟的人的。

在這方面，馬克思為《萊茵報》寫的那些文章當然是最無可非難的。他對待每個問題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顯然比布魯諾·鮑威爾或麥克期·施蒂納的文章更能使報紙股東們容忍青年黑格尔主義。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在他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几个月以後，在1842年10月，股東們就請他做了該報的主編。

64 在這里，馬克思第一次顯示了他那善于從實際出發，能使僵死的生命活動起來按照他自己的旋律翩翩起舞的無比才能。

(六) 萊茵議會

馬克思写了五篇长文，来分析一年前在杜塞尔多夫开了九个星期会的萊茵省議会的辯論。各省的省議會都是无力的、虛設的代議机构，是普魯士国王企图用来掩盖他背棄 1815 年的立宪諾言⁴³这一事实的。它們关着門举行會議，只是在一些瑣碎的地方性事务的討論上发生过某些微不足道的影响。自从 1837 年在科倫和波茲南同天主教会发生冲突以来，省議會就根本沒有再开过。在萊茵和波茲南的議會中，可能比其他議會更早出現一个反对派，虽然那只是教皇至上主义的反对派。

这些可敬的机构是保險不会产生自由主义情緒的，因为拥有地产是当选議員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議員的半数是貴族地主，三分之一是拥有地产的城市居民，六分之一是农民。然而，这个体面的原則并不是在一切省份都充分得到貫徹的，例如在新收复的萊茵省，就必须对时代精神作某些让步。但就是在那里也可以看到，貴族在議會中控制着三分之一以上的票数；由于決議必須有全体議員三分之二的多数才得通过，因此，違反貴族的意志就什么也做不成。城市地产資格还受到下列条件的限制，即必須拥有土地十年以上的才得以当选。此外，政府还有权不批准任何城市公務人員的当选。

这些議會理所当然地受到世人的輕視，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在他即位以后，在 1841 年重新召开了議會。他甚至把它們的权利稍加扩大，但这只是为了哄騙那些國債的持有者，因为早在 1820 年，政府就向他們保证，只有得到以后召开的等級會議的同意

和担保才能另借新債。約翰·雅科比曾在他那著名的小冊子⁴⁴里向各省議會呼喚，奉勸它們把宣布國王所約許的憲法看成是自己的權利。但是各省議會對他的呼喚充耳不聞。

甚至萊茵省議會也毫無作為，而且正是在政府最担心的教會政治問題上毫無作為。它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否決了一個無論從自由派觀點還是從教皇至上論派觀點看來都完全合情合理的提案——或是把非法逮捕的科倫大主教提交法庭審判，或是把他送回他的主教區。省議會根本沒有觸及憲法問題。科倫市民向省議會提出了一份有一千多人簽名的請願書，要求允許公眾自由到議會旁聽，每天全文發表會議記錄，在報刊上自由討論省議會辯論的內容和一般省內政治問題，並制定出版法以代替書報檢查制度。省議會用最卑怯的方式對待這份請願書：它只乞求國王允許在省議會會議公報中發表發言人的姓名，並不要求廢除書報檢查並代之以出版法，而只要求一個可以遏制檢查官的專橫的書報檢查法。省議會的卑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國王連這一點也拒絕了。

省議會只是在涉及地產的利益的時候才活躍起來。當然，要恢復封建的威勢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方面的一切企圖都遭到萊茵省居民的痛恨。從東部各省派到萊茵的官員也向柏林報告說，居民不會容忍這種做法。萊茵省居民特別堅持保有自由劃分地產的權利，他們既不為“貴族階層”的利益、也不為“農民階層”的利益而放棄這個權利，雖然正像政府不無理由地警告的，這種無限制的劃分已經使全部土地面臨支離破碎的危險。政府提出的對地產劃分加以某種限制“以保持一個強大的農民階層”的提案，以四十九票對八票的多數被否決了。但是，省議會却在通過政府提出的林木盜竊法和偷獵法（森林、狩獵和牧場“違禁”法）方面得到補償。這

样，立法权就寡廉鲜耻地和丧尽天良地为大地主的私人利益服务了。

馬克思按照預先拟定的龐大計劃，开始同萊茵省議會打起了笔墨官司。第一篇論文——分六次連載——分析了省議會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會議記錄問題的辯論。国王曾准許公布會議記錄而不发表发言人的姓名，这总算是国王試圖用以鼓励省議會的一个微小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却在省議會本身遇到了极其强烈的抵抗。固然，萊茵省議會还不像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省議會那样，干脆拒絕公布會議記錄。但是，它也表现出那种愚蠢的自負，把議員看成高人一等的人，首先是可以不受自己选民批評的人。“省議會見不得阳光。在私人生活的黑暗中，我們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那么輕信別人，以致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給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寬厚大方地接受省的信任。省剛剛以信任他們这一事实表明了对他們的判断，但是，如果要求他們也以同样的态度报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們自己、他們的劳动、他們的人格交給省去判断，那就十分荒誕了……”^①。馬克思用十分动人的幽默的語調嘲笑了他后来称之为“議會迷”并且为他終生所厌恶的那个东西。

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劍，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論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鋒利。卢格曾毫不妒嫉地承认，“关于出版自由，以及在捍卫出版自由方面，从来没有、甚至也不可能有比这說得更深刻更透彻的了。在我們的时論中，出現了这样有真才实学、有气魄、善于理清普通的概念混乱的文章，真是值得我們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56 頁。

幸。”馬克思在這篇文章的一處地方談到了他的故鄉的溫和宜人的氣候，而這篇論議會的文章至今還閃耀着萊茵河兩岸滿是葡萄園的丘陵上的夏陽的光輝。黑格爾曾談到“一個壞報紙的可憐的、敗壞一切的主觀性”，而馬克思則回到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在《萊茵報》上論證了康德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①。但是他在返回這個問題時，他的政治和社會眼界已經為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所打開而大大地豐富了。只要把他在《萊茵報》上的文章同雅科比的《四個問題》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馬克思已經前進得多么遠。雅科比一再強調國王在 1815 年所作的實施憲法的諾言，把它看成是整個憲法問題的基石，而馬克思卻認為它根本不值一提。

馬克思頌揚自由的報刊——人民的敏銳的眼睛，把它拿來同受檢查的報刊對比；後者的根本缺陷是偽善，而從偽善又產生其他一切缺點，包括從美學觀點看來也是令人厭惡的消極性。但儘管
67 如此，他並沒有忽視自由報刊也可能遇到的危險。城市代表當中的一個發言人要求把出版自由當作行業自由的一部分來爭取。馬克思反駁他說：“難道降低到行業水平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嗎？作家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

.....

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把出版物貶為單純物質手段的作家應當遭受外部不自由——檢查——對他這種內部不自由的懲罰；其實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對他的懲罰了。”^②馬克思用他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他向作家要求的東西：作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100 頁。

② 同上書，第 87—88 頁。

的写作永远是目的本身，对于他自己或别人都不是一种工具；必要的时候，作家可以为作品的生存牺牲他个人的生存。

第二篇评莱茵省议会的文章，如他给莱克的信中所说的，是关于“大主教事件”的。整篇文章都被检查机关删去而始终没有发表，虽然卢格曾建议把它收入《軼文集》。1842年7月9日，马克思写信给卢格说：“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理想国里。办《莱茵报》这样一个报纸，需要最坚强的毅力。我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谈到教会纠纷问题的论文，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了。在这篇文章里，我说明国家的捍卫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捍卫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由于愚蠢的科伦天主教徒中了圈套，而捍卫大主教的言论又可以招引订户，因此这件事对《莱茵报》来说就更加不利。但是，您不能想像那班当权的人物卑劣到何等程度，以及他们在同正统教派的愚人打交道时行为何等可耻。不过事情好歹总算是结束了：普鲁士当着全世界的面吻了教皇的鞋子，而我们政府的那些没有头脑的人又恬不知耻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了。”^①最后这句话是指下面这个事实而言的：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罗马教庭进行了和平谈判，而罗马教庭则为了表示答谢，按照梵蒂冈的策略常规着实把他愚弄了一番。

马克思给卢格的这封信，不应该理解为马克思是在为了笼络 68
科伦的天主教徒而认真地捍卫大主教。他无可辩驳地解释说，大主教因有关教会事务的行为而遭到非法逮捕，以及天主教徒要求把他们的非法被捕的主教交付法庭审判，是因为国家的捍卫者站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48页。

在教會的立場上，而教會的捍衛者則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他的這種解釋是合乎邏輯的。在一個顛倒混亂的世界里採取正確的立場，對《萊茵報》來說是一個生命攸關的問題，因為，正如馬克思在這封信的下文中所說的，《萊茵報》所激烈反對的教皇至上論派是萊茵省最危險的勢力，而反對派又太習慣於在教會範圍內反對政府。^①

第三篇論文分成五個大段落在報上連載，是評論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的。在這篇文章里，馬克思不得不“回到人間”。他自己承認，他由於必須談到黑格爾思想體系中所沒有考慮過的物質利益問題而感到為難。當時，他對於這個法令所提出的問題，還不像晚年時處理得那樣明快。這裡，問題是在於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最後殘余之間的鬥爭，在於剝奪人民群眾的所有權所引起的殘酷戰爭。在1836年一年中，普魯士國內經法庭審理的二十萬零七千四百七十八件刑事案件中，約有十五萬件即將近四分之三，是關於盜竊林木、侵占牧場、違犯狩獵法和森林違禁法的案件。

在萊茵省議會中討論林木盜竊法時，土地私有者最無耻地通過了自己的剝削方案，甚至超過了政府所提出的法案。這時，馬克思挺身而出，為保衛“政治上和社會上各受壓迫的貧苦群眾”而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但不是從經濟方面，而是從法律方面加以論證的。他要求保存貧民的習慣權利，並且認為這種權利的基础是某些性質不確定的占有形式，這些占有形式既不完全是私人占有形式，也不完全是公共占有形式，而是我們在中世紀一切體制中所看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年俄文版，第248頁。

到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結合。理智廢除了这些中間的、不确定的占有形式，而把从羅馬法中拿来的抽象的私权这一范畴应用于这些形式。但是在最貧苦階級所保持着的习惯权利中，却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权利感。这种权利感的根源是实在的，合法的。

从历史观的意义上來說，馬克思的这篇文章还带有“某种不稳定的性质”，但尽管如此，或者更正确地說，正因为如此，它却显示出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馬克思成为一个保卫“最貧苦階級”的偉大战士。他描写了那些踐踏邏輯和理性、蹂躪法律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也侵害了国家利益的林木占有者的卑鄙无耻，描述了他們怎样牺牲貧民而发财致富；在这些描写中流露出了他的深切的憤怒，因为，“为了保证自己对森林条例違反者的控制，省議會不仅打断了法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臟”^①。馬克思想通过这个例子來說明，如果认真委托这种代表私人利益的等級代議机构去从事立法，可以期待它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在这里，馬克思仍然遵循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說。但是他不像黑格尔的正統派門徒那样頌揚普魯士国家，把它奉为理想。他的黑格尔主义观点是在于：他用从黑格尔的哲学前提中引伸出来的理想国家来衡量普魯士国家。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个偉大的机体，在这个机体中体现着法律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自由，而每个公民在遵守国家的法律时，仅仅是在遵守自己的人的理性的自然規律。馬克思用这个原則很好地处理了省議會关于林木盜窃法的辯論。討論反偷猎法的第四篇文章大概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来处理的。但是在提出地产分割这个“地地道道的人世問題”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78頁。

总大成的第五篇文章中，这种观点似乎已不再适用了。

馬克思和萊茵省的資產階級都主張土地的自由分割。限制农民分割土地的自由，就等于在他們的物质貧困之上再增添一层法律的貧困。但是法律观点并不能解决問題。法国的社会主义早就指出，土地的无限制的分割产生着貧苦无依的无产階級，并且把这种土地分割同手工业的原子式的孤立置于同等地位。既然馬克思想要研究这个問題，他就必須說明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70 馬克思当然意識到了这种必要性，而且，如果他在《萊茵报》的全部写作計劃得以实现的話，他当然也不会避开这个問題。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实现。当他的第三篇論文在《萊茵报》上发表的时候，他已經是該报的主編，而在他能够从理論上解决社会主义之謎以前，他已經在實踐中面对着这个謎了。

(七) 斗争的五个月

在夏季期間，很可能是在赫斯的倡导下，《新萊茵报》在社会問題的領域內进行了几次小規模的远游。一次是轉載了魏特林的杂志上的一篇論柏林住宅問題的文章，作为論“当前重大問題”的一篇論文。另一次，在发表斯特拉斯堡学者會議（在这次會議上也討論了社会主义問題）的报告时，《萊茵报》附加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按語，說如果无产者要求占有中等阶层的財產，那末这就可以和1789年中等阶层反对貴族的斗争相比；但是这一次問題将通过和平的途徑解决。

但甚至这样一些无关痛痒的話，都被奧格斯堡《Allgemeine Zeitung》（《总汇报》）用作借口来指責《萊茵报》，說它向共产主义

送秋波。其实在这方面,《总汇报》自己也是心亏理短的,它发表过海涅論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更成问题的文章。《总汇报》是唯一具有全国意义甚至国际意义的德国报纸,而《莱茵报》对于它的统治地位是一个威胁。虽然它进行猛烈攻击的动机绝不是高尚的,但它的攻击却是恶毒的和相当巧妙的。它挖苦地说什么富商子弟虽然幼稚地玩弄社会主义思想,却决不打算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科伦的手工业者和搬运伙。此外,它还提出了更严重的谴责。《总汇报》证明说,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拿1789年法国贵族的命运来吓唬刚刚开始自由呼吸的中等阶级,那是小孩子的想法。

在马克思做了主编以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击这些恶意的攻击,而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他一点也不愿庇护那些在他看来也是“浅陋的”著作,而且,他甚至不能说出,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因此,他尽可能地把战火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指出《总汇报》本身在偷运共产主义。但同时他也老实地承认,《莱茵报》不应该单靠空话来解决两个民族所力求解决的任务。他写道,《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今形式下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能希望这些思想在实际上会实现,或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它仍旧准备“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对这些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因为像勒鲁、孔西德朗这样一些人的著作,特别是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是不能靠灵机一动的肤浅的想像来批判的⁴⁵。

的确,后来马克思说,这种论争使他对《莱茵报》的工作失去兴趣,于是他“贪婪地”抓住重新回到自己的书房的机会⁴⁶。但是,正像人们在回忆往事时所常发生的那样,他把原因和结果纠缠在一

起了。当时馬克思还是全心全意地从事于自己的編輯工作的，他把这个工作看得那样重要，以致为了它而不惜同所有在柏林的老朋友們决裂。自从“精神生活方面的趣味还比較丰富”的“博士俱乐部”因书报檢查令的緩和而变成了一个所謂“自由人”的团体以后，同这些人往来就沒有有什么意义了。在这个“自由人”⁴⁷的团体中，几乎汇集了所有住在普魯士首都的三月革命以前的文人。这些瘋瘋癲癲的庸人在那里扮演着政治革命家和社会革命家的角色。还在夏天时，“博士俱乐部”里发生的事情就使馬克思深感不安；他說，宣布自己的解放是一回事，这是正当的；但为自己大肆宣揚則是另一回事，这就有些自我吹噓的意味。不过他想，幸亏布魯諾·鮑威尔在柏林，他会設法至少不讓他們搞出“荒唐事”来。

可惜馬克思的判断錯了。看来，科本倒是沒有参預“自由人”的胡鬧。但布魯諾·鮑威尔却同他們混在一起，甚至不耻于在他們的滑稽戏里充当一名旗手。他們在大街上列队行乞；他們在酒樓妓院里胡作非为；他們下流地侮辱毫无防卫的牧师；布魯諾·鮑威尔在施蒂納的婚礼上从自己的編織的錢袋上解下一对銅环交給牧师，說用它們来代替結婚戒指是再好不过的了；——这种种行徑使“自由人”变成了胆怯的庸众半惊半惧的对象。但同时，这也无可挽回地糟蹋了他們自称为之效力的事业。

这种街头頑童式的恶作剧，对于“自由人”的精神活动当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此馬克思不得不費很大力气来处理他們投到《萊茵报》的稿件。許多这种稿件都被檢查官的紅笔勾掉了，但是，正如馬克思給卢格的信中所說的，“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檢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那一伙人寄給我們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翻轉乾坤的廢料；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綴上

一点无神論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来没有研究过）。在魯滕堡負責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处理事务的才能，‘自由人’已习惯于把《萊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則决定不容許他們再像以前那样高談闊論下去。”^①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最后的决裂是在 1842 年 11 月海尔維格和卢格来到柏林时发生的。海尔維格当时正在作他的有名的周游全德的凱旋旅行⁴⁸。在科倫，他結識了馬克思，并且立刻和他建立了友誼；在德勒斯頓，他会見了卢格，并和他一道前往柏林。在柏林，他們自然看不慣“自由人”的那些胡作非为。卢格同他的合作者布魯諾·鮑威尔爭吵起来，因为鮑威尔“要他相信荒謬絕倫的东西”，例如，應該把国家、私有財產和家庭作为概念来加以揚棄，至于在现实中它們将是怎樣的，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海尔維格也不喜欢“自由人”。于是“自由人”就对这位詩人的不恭进行报复，尽情地嘲笑他覲見国王的有名事件，以及他同有錢的女继承人訂婚一事。

双方都想在《萊茵报》上展开爭論。海尔維格在卢格的同意下，要求《萊茵报》刊登一項声明，其中說，“自由人”作为个别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人物，但是，正如他自己和卢格曾對他們坦率地說过的，他們的政治浪漫主义、恃才傲物和狂妄的自我吹嘘，却危害了自由的事业和自由的党派。馬克思在自己的报上刊登了这个声明，接着，梅因就代表“自由人”接二連三地給他寄来一些粗暴的信。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 年俄文版，第 251 頁。

最初，馬克思实事求是地回信，力求把“自由人”对《萊茵报》的
73 投稿引上正路。“我向他們提出了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論，少說些漂亮話，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确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識。我声明說，像他們这种在偶然写写的剧評之类的东西里偷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的手法，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們，如果真要討論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彻底地加以討論。我还要求他們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局勢的批判來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宗教的批判來批判政治局勢，因为这样做才更加符合报刊事业的本质和广大讀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而随着那以宗教为理論的被顛倒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們建議，如果真要談論哲学，那末最好少卖弄无神論这块招牌（这使人想到小孩向任何願意听他講話的人保证他不怕妖怪），而多向人民宣傳哲学的內容。”^①从这些话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則來編《萊茵报》的。

但是，在他这封劝告的信寄到以前，馬克思就接到梅因的一封信“蛮横无礼的信”，信中恰恰是要求《萊茵报》不要“表現得穩健持重”，而要“以最极端的方式”來行动，換句話說，就是要《萊茵报》为了迎合“自由人”而让自己遭到压制。这终于使馬克思忍无可忍。他写信給卢格說：“这一切都显示出梅因的那种难于置信的虛榮；他不懂得，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吹牛家的；而他所考虑的只是他那个小集团的事情……”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2—253頁。

由于我們現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檢查的折磨，忙于同部里的书信往来，应付省长的牢騷、省議会的指責、股东的怨言等等，而我坚守在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我有义务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計劃，——因此您可以想見，我是有点被梅因的信激怒了，并且回了他一封措詞相当尖銳的复信。”^①这实际上就是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自由人”从布魯諾·鮑威尔到爱德华·梅因在政治上都落得不同程度的悲惨下场：鮑威尔后来給《Kreuzzeitung》（《十字报》）和《Post》（《邮报》）撰稿，梅因則終老于《Danziger Zeitung》（《但澤报》）的編輯任內。梅因也牢騷滿腹地揶揄自己虛度的一生，說他只能嘲笑新教的“正統派公牛”⁴⁹了，因为报纸的自由派股東們为了怕得罪天主教徒的訂戶，不許他批評教皇的圣諭。“自由派”的其他人士則到半官方的甚至官方的报刊里去混事，例如，魯滕堡在几十年后就是在担任《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普魯士国家通报》）的編輯时死去的。

但是在那时，在1842年秋天，魯滕堡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人，政府要求他离开《萊茵报》。整个夏天，政府都在用吹毛求疵的檢查刁难这个报纸，但是还没有封閉它，为的是希望它自行死去。8月8日，萊茵省省长馮·沙培尔向柏林报告說，《萊茵报》的訂戶减少到了八百八十五戶。但是10月15日馬克思接任主編，11月10日沙培尔就报告說，訂戶数目不断上升，从八百八十五戶激增到一千八百二十戶，而报纸的傾向也变得更加放肆和敌視政府了。恰好那时《萊茵报》編輯部得到了一份极其反动的婚姻法草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3頁。

案，把它刊載了出來。國王對於事先公布這個法律草案非常惱怒，尤其是因為這個法案將增加離婚的困難，因而引起居民的很大不滿。國王勒令《萊茵報》交代出給它這份草案的人，否則就要立刻封閉該報。但是部長們事先就知道，該報是不會這樣屈服的，並且他們也不願意把殉道者的花冠戴在他們所痛恨的這家報紙頭上。他們只打發魯滕堡離開科倫，並且作為一種懲罰而要求任用一個負責的主編，要他代替出版者倫納德簽發報紙。同時，任命候補法官維塔烏斯為檢查官，來代替以偏狹出名的多里沙爾。

11月30日，馬克思寫信給盧格說：“魯滕堡已經被解除了在德國欄負責的職務（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主要是加加標點符號），而且只是由於我的請求，才把他暫時調到法國欄去。正是這位魯滕堡，由於我們的聖上的極度昏庸，卻有幸被當成是一位危險人物，儘管除了對《萊茵報》和對他本人之外，他對任何人都不是危險的。當局
75 向我們提出了解除魯滕堡職務的斷然要求。普魯士的聖上——這個 despotisme prussien, le plus hypocrite, le plus fourbe^①——使出版負責人擺脫了一件麻煩事，而這位新的受難者魯滕堡則學會了用相應的表情、舉止和語氣相當巧妙地表現了受難者的意識，正在利用這個大好機會。他寫信遍告全世界，寫信到柏林，說他是《萊茵報》的被逐的原則，而《萊茵報》在對待政府的態度上已開始採取另一種立場。”^②馬克思是在談到他同柏林“自由人”的分歧的尖銳化時提起這件事的，不過他對“殉道者”魯滕堡的嘲笑也許有點過火了。

馬克思所說的“斷然勒令”開除魯滕堡並且使出版人倫納德擺

① 最偽善、最狡猾的普魯士專制主義。

②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年俄文版，第251—252頁。

脫了一件“麻煩事”等話，只能这样来理解，即編輯部迫于“威勢”，放棄了保留魯滕堡的任何嘗試。这样的嘗試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使出版人擺脫一件“麻煩事”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个不懂政治的书商是不适合于写报告书的。而只是由他签字的一份反对封閉該报的威胁的抗議书，根据科倫市档案館保存的手稿看来，却是馬克思起草的。

这份文件里說，《萊茵报》“迫于威勢”，同意暫時辞退魯滕堡并任命一个負責的主編，同时准备在符合于一个独立报刊的尊嚴的範圍內尽一切可能使它免于毀灭。它保证在內容容許的範圍內在叙述形式方面尽量緩和。抗議书写得这样謹慎和富于外交詞令，这在作者一生中是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的。但是如果說在个别詞句上挑毛病是不公正的，那末，說年輕的馬克思在起草抗議书时特別違犯了他当时的信念也同样是不公正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他关于該报的亲普魯士情緒的說法里也不存在。除了同敌視普魯士的奧格斯堡《总汇报》进行論爭和鼓吹德国西北部也加入关税同盟外，該报的亲普魯士情緒首先表現在它不断提到北德意志学术的功績，来同法国和南德意志的肤淺理論相比。抗議书中宣称，⁷⁶《萊茵报》是萊茵省和整个南德的报刊中第一个致力于把北德精神移植到南方并因而促进了分散的各族的精神团結的报纸。

省长沙培尔的回答是相当无情的，他表示，就是馬上辞退魯滕堡并且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个更适当的主編，对《萊茵报》的出版是否給予最后的許可，也还要看該报今后的表現如何而定。給报纸物色一个新主編的期限是到12月12日为止，但是事情并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因为到12月中又爆发了新的战斗。两篇来自柏恩卡斯特尔的关于摩塞尔农民的困苦状况的通訊，引起了沙培尔的

形式粗暴而內容空洞的更正。《萊茵報》試圖再一次逆來順受，稱贊這個更正的“平靜而尊嚴的口吻”，說這足以使警察國家的走卒們感到羞愧，並且大大有助於“消除猜疑，增強信任”。但是，在預先搜集了必要的資料之後，《萊茵報》在1月中旬一連發表了五篇文章⁵⁰，其中引用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說明政府殘酷地壓制了摩塞爾農民怨憤的呼聲。萊茵省的最高長官被這件事弄得聲名打地。可以告慰他的是，1843年1月21日的內閣御前會議已決定查封這個報紙。1842年年底發生了幾件終於惹惱國王的事件：海爾維格從科尼斯堡給他寄來一封激動而傲慢不恭的信，而《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萊比錫總匯報》）未經作者知悉和同意就發表了它；最高法院在約翰·雅科比被控叛國和侮辱聖上的案件上宣布他無罪；末了，《德意志年鑑》在新年宣言中宣稱它擁護“民主制及其實踐任務”。《德意志年鑑》立刻被查封了，《萊比錫總匯報》也被禁止在普魯士境內發行。接着，又決定順便也查封“它在萊茵的淫亂的姐妹”，特別是因為它曾強烈地抗議前兩家報刊的查封。

查封《萊茵報》的形式上的理由是該報沒有許可證。如馬克思所說的，“就好像在普魯士這個沒有警察局發的號牌連狗也不能存在的地方，《萊茵報》不履行法定手續也能出版一天似的”。“實際的原因”則是新老普魯士關於什麼可惡傾向的濫調，亦即馬克思所嘲笑的那種“關於什麼思想惡劣、空談理論的一派胡說和其他鬼話”。當局為了照顧股東們的利益，允許報紙在三個月的期限內照常出版。馬克思寫信給盧格說：“在執行死刑以前的這一段時間，報紙要受到雙重的檢查。我們的書報檢查官，一個還算不錯的人，還得再受這裡的行政區長官，一個唯命是從的蠢貨馮·蓋爾拉赫

的檢查。我們印好的報紙必須送到警察局去，讓他們在那里嗅一嗅，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什麼非基督教、非普魯士的氣味，當天的報紙就休想再問世了。”^① 陪審官維塔烏斯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他辭去了檢查官的職務。為了這一點，科倫市的合唱團為他唱了一首夜曲以示敬意。從柏林派來了內閣秘書聖保爾來接替他的職位。由於這人熱心地執行劊子手的職責，所以雙重檢查制就顯得不必要而在2月18日被取消了。

《萊茵報》的查封，被看成是對整個萊茵省的侮辱。訂戶數目一躍而增加到三千二百戶，同時有幾千人簽名向柏林請願，要求停止即將來臨的打擊。股東們也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柏林去，但是國王沒有接見。居民的請願書如果沒有使那些敢於在上面簽字的官吏受到嚴厲斥責，那就會統統被扔到內閣的廢紙簍里去了。但最可悲的是，股東們希望用降低報紙的格調的辦法來達到他們用請願沒有達到的目的。這是促使馬克思在3月17日就辭去主編職務的主要原因，當然，這並沒有妨礙他攪擾檢查官到最後一分鐘。

聖保爾是一個年輕的“浪蕩子”。在柏林時，他和“自由人”一起狂飲作樂，到科倫後又同妓院門口的守夜人打架。但他是一個飽經世故的老油子，很快就發現了《萊茵報》的“理論中心”和它的理論的“活的源泉”。在他寫給柏林的報告里，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對馬克思的敬意。馬克思的智慧和品德顯然使他深為折服，儘管他自以為發現了馬克思的“思維上的大錯誤”。3月2日聖保爾向柏林報告說，馬克思“鑒于目前狀況”已決定脫離《萊茵報》並且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年俄文版，第253—254頁。

离开普魯士。柏林警察机关的智囊們在自己的文件里指出，这对
78 于普魯士并不是一个大損失，因为“馬克思的极端民主观点是根本
不符合普魯士国家的基本原则的”。这一点确实无可爭議。3月18
日，这位可尊敬的檢查官欢呼道：“整个报纸的 Spiritus rector^① 馬
克思博士昨天终于离开了編輯部，接替他的是奥本海姆，这是一个
极其溫和而又平庸的人物。……我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高兴，因
为現在我在这份报纸上所花費的时间还不到先前的四分之一。”他
甚至写信到柏林說，既然現在馬克思已經离去，就可以安心地让报
紙照旧出版了。这是对离去的主編的贊揚。但是，圣保尔的上級
却比他更加卑怯，他們教他秘密收买《科倫日报》的主編，一个叫海
尔梅斯的人，并且教他恫吓它的出版人（他早已感到《莱茵报》的成
功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而这个奸險的勾当居然成功了。

馬克思自己早在1月25日，也就是查封《莱茵报》的消息到达
科倫的那一天，就写信給卢格說：“我一点也不惊奇。您知道，我从
一开始就对书报檢查令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
个必然的結果。我把《莱茵报》的查封看成是政治意識上的某种
程度的进步，因而我便辞职不干了。而且，在这种空气里，我簡直感
到窒息。就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討
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闊斧的做法。伪善、愚昧、粗暴的专断
使我感到厌倦，委屈求全、周旋应付和字斟句酌地对付吹毛求疵的
生活我也过够了。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給我了……”

在德国，我已再没有什么可为。在这里，人們自己作賤自
己。”^②

① 精神领导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4—256頁。

(八)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

在同一封信里^①，馬克思告訴卢格說他已收到刊載着他的第一篇政治論文的文章集。这个文集分两卷出版，名为《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德国現代哲学和政論界軼文集》）。它是在1843年3月初由苏黎世的“文学社”⁷⁹出版的。这家出版社是尤利烏斯·弗呂貝尔为逃避德国书报檢查的作家們建立的一个避难所。

在这本文集里，青年黑格尔派的老卫士們又作了一次进軍，尽管他們的队伍已不整齐。在他們当中，那位埋葬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的大胆的思想家也出現了。他宣称“绝对精神”就是神学的死去的精神，因而就是一种純粹的鬼魂信仰；他认为，哲学的全部奥秘的解决就在于对人和自然界的直观。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在《軼文集》上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⁵¹一文，对于馬克思也是一个启示。

后来恩格斯认为，費尔巴哈对青年馬克思的精神发展的巨大影响，是从早在1841年就出版了的費尔巴哈的名著《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开始的。恩格斯說，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驗过的人才能理解；他說：“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們一下子都成了費尔巴哈派了。”^②但是，在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里，还看

① 梅林在这里說得不确切：关于收到文集的事，馬克思是在1843年3月13日、而不是在1月25日通知卢格的；文集出版的日期不是在1843年3月初而是在2月。

② 参閱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頁。

不到費爾巴哈的影響。馬克思只是在《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鑑》）上才第一次表示“熱誠地歡迎”這個新的世界觀，雖然也作了某些批判性的保留。《德法年鑑》是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從名稱就可以看出它同費爾巴哈思想過程的某種聯繫。

《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的思想無疑地已經包含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之中，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使恩格斯的記憶有錯誤，那也是非本質的。但是他的錯誤又是不可忽視的，因為它模糊了費爾巴哈和馬克思之間的思想聯繫。雖然費爾巴哈只是在鄉村的隱居生活中才感到怡然自得，但他仍不失為一位戰士。他像伽利略一樣，認為城市對愛好沉思的性情來說是一所監獄；相反地，自由自在的鄉村生活卻把大自然這本書展開在每個善於讀它的人的眼前。費爾巴哈總是用這樣的話來抗禦對他在布魯克堡的幽居生活的攻擊⁵²。他愛鄉居的幽靜，並不在於這個詞的老式的含義：生活在幽靜中的人是幸福的；而是因為在孤獨和幽靜中，他汲取了進行鬥爭所必需的力量。作為一個思想家，他感到需要集中精神，遠離日常生活的喧囂擾攘，以便不受干擾地對自然界——生活及其奧秘的偉大本源——進行沉思。

80 雖然生活在幽靜的鄉間，費爾巴哈卻仍然站在參加當代偉大鬥爭的人們的前列。他發表在盧格的雜誌上的論文，使得這個雜誌具有真正的鋒芒。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證明，不是宗教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宗教；我們的幻想所創造的最高本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本質的虛幻的反映。正當費爾巴哈的書問世的時候，馬克思走上了政治鬥爭的舞台，這使他陷入了社會生活的紛擾之中。但是這場鬥爭是不能用費爾巴哈在論基督教的書中所打造的那種武器來進行的。就在這個時候，當黑格爾哲學已經無力解

决馬克思在《萊茵报》所遇到的那些物质問題的时候，費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发表了。它致命地打击了黑格尔哲学——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和合理的支柱。这个《綱要》給馬克思的印象很深，虽然他当时就保留了批判它的权利。

他在3月13日給卢格的信中写道：“費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滿意，这就是：他过多地注重自然界，而过少地注重政治。然而，唯有把二者結合起来，現今的哲学才能成为真理。如果像在16世紀时那样，除了醉心自然界的人之外还存在着醉心国家的人，那末一切就会走上軌道了。”确实，費尔巴哈在他的《綱要》里只是附帶地提了一下政治，而且与其說比黑格尔前进，无宁說比他还要后退。馬克思抓住了这一点。他像費尔巴哈研究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一样彻底地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說。

在馬克思于3月13日給卢格的信里，还有一处显出当时費尔巴哈对馬克思的影响多么强烈。馬克思剛一认清他不能在普魯士的书报檢查制度压迫下写作，不能在普魯士的空气中呼吸，他就立刻决定帶着未婚妻离开德国。早在1月25日，馬克思就写信問卢格，他是否可以参加海尔維格当时准备在苏黎世出版的《Deutsche Bote》（《德意志信使》）的工作。但是海尔維格的計劃并未实现，因为他被逐出了苏黎世。这时卢格就向馬克思提出其他一些合作的建議，包括共同編輯那个經過改組和更換了名称的《年鉴》，并且請馬克思在結束他的“編輯工作上的苦恼”之后到萊比錫去，以便面洽“我們复兴的地点”。

在3月13日的信中，馬克思接受了去萊比錫的建議，而“暂时”只就“我們的計劃”表示了如下的意見：“当巴黎被攻陷的时候，有些人主張拥立拿破侖的儿子为君主，同时任命一个摄政；另一些人

主張擁立別爾納多特；最后，还有一些人主張擁立路易-菲力浦。但是达来朗回答說，‘不是路易十八，就是拿破侖。这是原則，其余的一切都是陰謀。’

同样地，我也想說，除了斯特拉斯堡（或万不得已时，瑞士）以外，几乎其余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則，而是陰謀。篇幅超过二十印張的书，就不是以民众为对象的书。至多，这里能够做出的决定是，它應該是一个月刊。

即便《德意志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們至多也只能得到那个已故出版物的暗淡无光的翻版，而这一点現在已經不够了。相反地，《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則，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①这里可以听到费尔巴哈的《綱要》的回响，与生活和人水乳交融的真正的哲学家，必須具有高卢-日耳曼的血統。它的心臟必須是法国的，头脑必須是德国的。头脑要改革，心臟要革命。只是在那有运动、热潮、激情、血性和感性的地方，才有精神存在。只有莱布尼茨的睿智，他的富有血性的唯物而又唯心的精神，才第一次把德国人从压制着他們的学究习气和經院哲学的統治下解救出来⁵³。

卢格在3月19日的回信中表示完全同意这个“高卢-日耳曼原則”，但是这件事情的事务方面的安排还是拖了几个月。

（九）結婚和被逐

在初次登上社会斗争舞台的狂风暴雨的一年里，馬克思还不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5—256頁。

得不同某些家庭困难作斗争。他不願意談这些事情，而总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談到它們。同那些为了个人身边瑣事而忘掉世界的庸人的可怜命运相反，馬克思能够为了“人类的偉大目的”而超然于最痛苦的不幸之上。生活給予他的鍛炼这种能力的机会太多了。⁸²

从我們所知道的馬克思第一次提到这种“私人瑣事”的那些話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对待这类问题的态度。在1842年7月9日写給卢格的信中，他为了不能如約寄去几篇給《軼文集》的文章而向卢格表示歉意。他列举了他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接着說：“余下的時間都浪費在最不愉快的家庭糾紛上了。虽然我的家庭是相当富裕的，但它給我設下的重重障碍有时使我陷进了极困难的境地。我决不想用談論这些私人的瑣事来打攪您。所幸的是，公众的瑣事使一个性格坚毅的人根本不致为私人的瑣事所困恼。”^①那些慣常“为私人的瑣事所困恼”的庸人，早就把馬克思的这种異常坚强的性格的表現說成是馬克思的“冷漠无情”的证明。

我們不清楚这些“最不愉快的家庭糾紛”究竟是什么；馬克思只是在和卢格商議出版《德法年鉴》的問題时再一次提到这些事，而且也只是泛泛地提到。他写信对卢格說，在出版这个杂志的計劃一經确定之后，他就要到克罗茨納赫（他的岳母自她丈夫死后就住在那里）去，并且在那里結婚；他打算婚后在岳母家里再住几个月，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我們无论如何得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可以毫不带浪漫主义意味地对您說，我已經从头至脚陷进了情网，而且陷得极深。我訂婚已經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我进行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47頁。

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摧毁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其中坐守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甚至比许多年龄三倍于我们并且经常谈论自己的‘人生经验’……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①。除了这个简短的暗示以外，关于马克思在结婚以前所不得不经历的那种斗争，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新杂志的出版不是没有困难的，但它还是相当快地出版了，马克思甚至用不着到莱比锡去。在相当有钱的卢格以六千塔勒的83 投资入股“文学社”以后，弗吕贝尔就决定负责出版该杂志。马克思被聘为编辑，年薪五百塔勒。有了这样的前景，他就在1843年6月19日同他的燕妮结了婚。

《德法年鉴》的出版地点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三个地方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亚尔萨斯的城市⁵⁴对于青年的马克思夫妇最具有吸引力，不过，在弗吕贝尔和卢格到巴黎和布鲁塞尔去初步了解过以后，终于选定了巴黎。诚然，在布鲁塞尔比在巴黎有更多的出版自由，因为巴黎实行着保证金制度和九月法令⁵⁵。但是，在法国的首都，编辑部可以比在布鲁塞尔更接近德国的生活。卢格写信鼓舞马克思说，在巴黎，只要有三千法郎或者再多一点，就能过得很舒服了。

按照原订计划，马克思在岳母家中度过了新婚的最初几个月，而在11月间这对新夫妇就到巴黎去了。他在祖国的生活的最后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6页。

訊是1843年10月23日^①从克罗茨納赫寄給費尔巴哈的一封信，請費尔巴哈为《德法年鉴》創刊号写一篇批判謝林的文章。他写道：“看到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再版序言⁵⁶，我差不多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結論說，您在写一本关于謝林的詳尽的著作，或者至少在打算关于这个腹中无物的吹牛家再写点什么。实际上，这将是一场初次上演的好戏！”

謝林先生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一开始是使懦弱的折衷主义者庫辛，后来甚至使天才的勒魯——上了钩。要知道，比埃尔·勒魯之流一直认为，謝林是一个用理性的现实主义代替了超驗的唯心主义，用有血有肉的思想代替了抽象的思想，用世界哲学代替了行帮哲学的人！……

因此，如果您馬上給創刊号写一篇評論謝林的文章，那您就是为我们所創办的事业、尤其是为真理，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貢獻。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謝林的直接对立面。現在謝林为要实现他青年时代的真挚的思想，——即便是我們的敌人，我們也应该承认他的一切优点，——已經除了想像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能力，除了虛荣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力量，除了鴉片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刺激剂，除了妇人般的多愁善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庫官⁸⁴了。謝林青年时代的这个真挚的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場青春的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大丈夫的严肃事业……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权威所指派的、謝林的必然而自然的对手。”^②这封信的口气是多么亲切，它多么清楚地流露出对偉大斗争的欢欣的希望啊！


① 馬克思給費尔巴哈的这封信的日期是1843年10月20日。

②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8頁。

但是費尔巴哈躊躇起来了。他最初曾向卢格表示贊助他的新杂志,但是后来却拒絕为它撰稿。甚至援引他自己的“高卢—日耳曼原則”,也沒能說服他。他的著作曾經比其他一切著作更强烈地触怒了掌权者,于是,警察的大棒就打杀了德国仅存的哲学思想自由。而哲学反对派如果不想怯懦地投降,就只有逃亡国外以自保。

投降,費尔巴哈是不情願的,但是勇敢地投入那蕩滌着死寂的德意志土地的浪濤,他又沒有决心。費尔巴哈对馬克思的热情召喚作出了虽然是友好的和关怀的、但終究是否定的回答的那一天,对他來說是一个阴暗的日子。从此以后,他在精神方面也必然离群独处了。





第三章 流寓巴黎

(一)《德法年鉴》

新的杂志是生不逢时的，它只在1844年2月底出版了一期合刊号。85

“高卢—日耳曼原则”，或者如卢格所改称的“德法精神联盟”，并没有实现。“法国的政治原则”瞧不起德国的陪嫁——黑格尔哲学的“逻辑的明彻性”，并不利用它作为玄学领域内的可靠的指南针，而在卢格看来，法国人正是在玄学的领域内失去方向而随波逐流的。

据卢格说，他们打算首先吸收拉马丁、拉梅耐、路易·勃朗、列鲁和蒲鲁东。单是这个名单就够杂乱了。这些人当中只有列鲁和蒲鲁东稍微懂一点德国哲学，而列鲁住在外地，蒲鲁东又暂时丢开了写作，埋头于发明一种排字机。其余的人都根据这种或那种宗教上的古怪理由拒绝合作。甚至路易·勃朗也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哲学上的无神论会导致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

然而，这个杂志却争取到一批著名的德国作家的合作。除了出版人以外，还有海涅、海尔维格、约翰·雅科比这样一些第一流的名手，以及一些名气虽然不大但很值得注意的人物，如莫泽斯·赫斯和普法尔茨的青年法学家贝尔奈斯，至于撰稿人中最年轻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更不消說了。他在屢試筆鋒之后,第一次在这里全身披挂地公开投入了战斗。但是就連这一批人也是够参差不齐的。有許多撰稿人不懂得黑格尔哲学,更不懂得它的“邏輯的明彻性”。尤其是,在两个出版人之間很快就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使任何进一步的合作都成为不可能的了。

86 这杂志的第一期合刊号(也是它的唯一的一期)一开头就是馬克思、卢格、費尔巴哈和巴枯宁之間的“通信”。巴枯宁是一个年輕的俄国人,他在德勒斯頓結識了卢格,并且曾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过一篇引起人們重視的文章⁵⁷。“通信”共有八封,都签署了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馬克思三封,卢格三封,費尔巴哈一封,巴枯宁一封⁵⁸。卢格后来把这批“通信”称做他所創作的一場戏,虽然他又說,他利用了“原信的一些片断”。他甚至按照他特有的方式把这些“通信”收入了他自己的文集;把它們加以恶意的歪曲,并且略去了馬克思署名的最后一封信,尽管这封信里包含着通信的全部精髓。这些信的内容毋庸置疑地表明,那些签署了姓名第一字母的人是真正的作者。如果把这批“通信”看成一个整体,那末这一合奏中的第一小提琴手就是馬克思。然而,卢格曾經按照自己的意思修改了馬克思的信,也修改了巴枯宁和費尔巴哈的信,这也是无可否认的。

結束“通信”的是馬克思,而用一个短而震撼人心的强音开始了全部“通信”的也是他。他說,浪漫主义反动派在导致革命;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滑稽戏是办不到的。滿載愚人的船或許会有一段时间順風而行,但是它終究会駛向不可幸免的厄运,这是因为愚人們根本沒有料到这一点。卢格的复信是一篇冗长的哀訴,叹息德国庸人的綿羊般的无穷耐性。他的信,就像他自己所說

的，“充滿了責難和絕望”，或者，就像馬克思當下給他的回信中較為客氣地說到的：“我親愛的朋友，您的來信是一支出色的哀曲，一首使人心碎的挽歌，可是它毫無政治內容。”^①倘若世界是屬於庸人的，那末就值得研究一下世界的這個主人。當然，所謂庸人是世界之主，只不過是說世界上充滿了庸人及其伙伴，正如屍體里鑽滿了蛆蟲一樣；而只要庸人是構成君主制的材料，君主就只不過是庸人之王而已。普魯士的新國王比他父親清醒而富有朝氣，他希望在庸人國家的基礎上來消滅這個庸人國家。但是只要普魯士人仍舊原封不動，國王就不能把他自己或他的臣民變成真正自由的人。於是，結果只能是又回到舊的僵化了的奴僕國家。但是，這種絕望的狀況使人產生了新的希望。馬克思指出了統治者的無能和凡事 87 都聽天由命的奴僕和臣民的冷漠。但是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就足以造成一次大災難。他指出，庸俗主義⁵⁹的敵人，即一切有思想的和受苦難的人們，都已經互相取得了諒解，甚至舊式臣民的那種消極的繁殖制度，也在每日給新人類提供新兵。工商業的制度，私有制和剝削人的制度，正在快得多地引起現今社會內部的分裂，這種分裂，舊制度是無法醫治的，因為它根本就不醫治，不創造，它只是存在和享樂而已。我們的任務是要徹底揭露舊世界，並且為建立一個新世界而積極工作。

巴枯寧和費爾巴哈也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用鼓舞的語調寫信給盧格。盧格在回信里表示，“新的阿納卡西斯和新的哲學家”⁶⁰說服了他。費爾巴哈把《德意志年鑑》的垮台比作波蘭的覆滅。他說，當時，在一個已經崩潰的社會的泥淖里，少數人的努力是徒勞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408 頁。

卢格在他給馬克思的一封信里回答这一点說：“是的。天主教信仰和貴族的自由挽救不了波兰，同样，神学的哲学和老爷的科学也解放不了我們。不跟过去彻底决裂，我們就不能成为过去的继承者。《年鉴》已經消逝了，黑格尔哲学是屬於过去的。我們将在巴黎创办一个刊物，并在其中充分自由地和开誠布公地討論我們自己和整个德国的問題。”^①他保证他将負責刊物的物质方面，而請馬克思就杂志的計劃发表意見。

馬克思是“通信”中第一个說話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說話的人。他說，很明显，必須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們寻找一个新的集合点。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問題没有什么疑問，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問題却很糊塗。“姑且不談普遍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們中間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沒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条式地預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謎語的答案都在哲学家們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張开嘴来接受絕對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現在哲学已經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識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渦。如果我們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們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現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謂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縮。”^②馬克思写道，我們不打算豎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在他看来，像卡貝、德薩米、魏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363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15—416頁。

特林所鼓吹的那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抽象观念。目前在德国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不管这两种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拿任何现成的制度，例如《伊加利亚旅行记》⁶¹中的制度，来和它们对立。

马克思唾弃那些“过激的社会主义者”的见解，这些人认为研究政治问题是有失身分的。从政治国家的冲突中，即从国家的理想的使命和现实的前提之间的矛盾中，到处都可以引出社会的真理。“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政治中的党派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①这样，马克思就把新杂志的纲领归结为下面这个公式：

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

但是达到这种认识的只是马克思，而不是卢格。从“通信”就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领导者，卢格仅仅是被领导者。而且，卢格来到巴黎以后就病了，不能积极参加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一点使得他无法发挥他那卓越的编辑才能，而在他看来马克思在编辑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卷，第417—418页。

89 方面是“过于拘泥小节”的。卢格沒有能使这个杂志具有他认为最合适的那种面貌和傾向，甚至沒有能在上面发表自己的文章。然而，当創刊号出版时，他还没有对它抱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发现，“这里面有許多出色的东西，必定会在德国引起很大的兴趣”。但是他又責备說，这里面也有一些“粗糙的东西”，是仓卒中搞出来的，如果由他来处理，他一定会加以修改。如果不是有外来障碍的干扰，这个杂志大概是可以繼續出版的。

首先，“文学社”的資金很快地用完了，弗呂貝尔已經揚言，事情再不能进行下去了。接着，普魯士政府一听到《德法年鉴》出版的消息，就立刻着手对这个杂志进行討伐。

普魯士政府的这次討伐甚至沒有得到梅特涅的贊助，更不用說基佐了，于是它只好在1844年4月18日用通令通告各省省长，說《年鉴》犯有預謀叛国及侮辱圣上的罪行。同时，还授意各省省长命令警察机关，在卢格、馬克思、海涅和貝尔奈斯一跨进普魯士国境时就不事声張地加以逮捕，并且沒收他們的证件。这个通令本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劊子手在把一个人捉拿到手以前，是不能把他絞死的。但是普魯士国王的毒計是很危险的，他开始气势汹汹如临大敌地把守着国境。在莱茵河上的一艘汽船上搜出了一百本《年鉴》，在法国和普法尔茨边界上的貝尔格薩本沒收的《年鉴》大大超过了二百本。如果考虑到这个杂志的发行量本来就很小，那就知道，这是重重的当头一棒。

内部磨擦一旦发生，就总是容易由于外来的困难而加剧。据卢格說，外来的困难加速了、甚至造成了他和馬克思的破裂。这話也許有一部分道理，因为馬克思对于錢財問題总是非常淡漠，而卢格却像个小商店的老板似地斤斤計較。他竟恬不知耻地按 truck-

system^①的办法，用《年鉴》来支付应当付給馬克思的薪金。而且他仅仅为了一个他所設想的理由而大为恼怒，认为以他这样一个对于出版业毫无經驗的人，如果繼續負起这杂志的出版业务，那将是拿他的财产来冒險。在同样的情况下，馬克思的确會要求自己拿出錢来冒險，但是很难說他會希望卢格这样做。也許，他曾經劝⁹⁰过卢格不要在初次失利之后就放下武器；但是，卢格已經由于有人建議他牺牲几个法郎来出版魏特林的著作而暴怒如狂了，于是他从馬克思的劝告里嗅到了图謀他的錢袋的气味。

此外，卢格自己也解釋过分裂的主要原因，說直接的导因是关于海尔維格的一場爭執⁶²。卢格——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也許的确是过份激烈地”——把海尔維格称做“无賴”，而馬克思却坚持說海尔維格有“远大的前途”。事实证明卢格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海尔維格并没有“远大的前途”，而他当时在巴黎的生活方式是很成問題的。甚至海涅也曾十分严厉地譴責过他；卢格认为，馬克思自己也并不喜欢海尔維格的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暴躁”而“苛刻”的馬克思由于寬厚而犯的錯誤，却仍然强似“正直”而“高尚”的卢格所引以自豪的天生的猜忌多疑。因为，馬克思所考虑的是革命詩人，而卢格所考虑的不过是小市民的美德。

这就是使两个人永远分开的那件細故的更为深刻的基础。对馬克思來說，同卢格的破裂不像后来同布魯諾·鮑威尔或蒲魯东的分歧那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一个革命者，馬克思大概早就对卢格感到憤慨了，而关于海尔維格的爭端，如果真像卢格所描繪的那樣，只不过使他終于忍无可忍罢了。

① Trucksystem——以商品支付工資的制度。

如果要了解卢格的最好的一面，那就應該讀一讀他在二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这四卷《回忆录》一直写到《德意志年鉴》停刊时为止，这时，卢格的生活正是那些靠小买卖和大幻想过活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中小学教师和大学生中的文学前卫——的典型。《回忆录》中包含着生长在吕根平原和上波美拉尼亚地方的卢格童年时代的一些迷人的風俗画。它也追述了大学生协会和残酷查究“煽动者”的生气勃勃的时期，其文笔的生动是德国文学上絕无仅有的。不幸，当卢格的《回忆录》出版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已經拋开了大幻想，而去开创一个大买卖的紀元。因此，卢格的这部

91 书就几乎无人問津；同时，另一部無論从历史方面或文学方面說来都远为逊色的同类著作，即罗伊特的《Festungstid》〔《獄中》〕^①，却博得了暴風雨般的喝采。卢格是大学生协会的实际参加者，而罗伊特只不过是一个偶然混进去逢場作戏的人罢了。但是资产阶级这时已經在向普魯士的刺刀送秋波了，因此他們非常欣賞罗伊特在嘲笑查究“煽动者”这种卑鄙的違法乱紀行为时所表現的那种“无伤大雅的幽默”。他們偏爱罗伊特的笑談，而不喜欢卢格的“粗魯的幽默”。按照弗莱里格拉特的恰当的说法，卢格精彩地描述了坏蛋們怎样沒有使他屈服，而囚室怎样給了他自由。

但正是从卢格的这些生动的描述中，人們可以感觉到，三月革命⁶³以前的自由主义尽管慷慨激昂，毕竟是純粹的庸俗主义，而它的发言人也終究是一些庸夫俗子。卢格在他們当中还算是最富有热情的，并且在他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限度以內他曾經相当勇敢地进行过斗争。但是当他在巴黎面临着当代社会的巨大矛盾时，这

^① 指罗伊特的《Ut mine Festungstid》（《獄中生活片断》）一书。

种热情也同样急速地使他后退了。

他曾經把社会主义当作修談哲理的慈善家的一种賞心乐事而加以容忍，但是巴黎手工业者的共产主义却引起了他的市民的惊恐——甚至不是为了自己的脑袋，而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錢袋。实际上，卢格曾經在《德法年鉴》上給黑格尔哲学宣讀了送終禱文，然而就在同一个1844年，他却对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最畸形的产儿——施蒂納的书⁶⁴——表示欢迎，认为它是使人摆脱共产主义的救星；而在卢格看来，共产主义是一切愚蠢之中最大的愚蠢，是傻瓜們所宣揚的新基督教，它的实现将使人类社会变成一座齷齪的畜栏。

馬克思和卢格从此永远分手了。

(二) 哲学的展望

因此，《德法年鉴》是一个死产儿。既然它的出版人反正无法长久携手并进，那末，他們在什么时候和在怎样的情况下分手，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件事情及早发生反倒更好。因为这样，馬克思就可以沿着“为自己弄清問題”的道路向前迈进一大步。

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⁹² 92 导言》，另一篇是对布魯諾·鲍威尔論犹太人問題的两本书的評論⁶⁵。虽然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問題极不相同，但它們在思想內容方面却是密切相关的。馬克思后来把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綜述如下：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不是黑格尔所贊揚的国家，而是他所輕視的社会⁶⁶。关于这一点，他在第二篇文章中比在第一篇文章中發揮得更为詳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篇文章的相互关系正如方法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一样。第一篇从哲学上概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第二篇则从哲学上概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两篇文章都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显示了作者思想发展的严密的逻辑连贯性。第一篇文章直接接着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实质上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一切其他批判的前提。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是，——马克思这样开始了他自己的推理，——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也就是间接地反对这个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世界的斗争。而自从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要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因此，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律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在德国，这一历史任务只能由哲学来解决。即使否定了1843年德国的状况，那末，按照法国的年代计算法，也很难说已经达到了1789年，更不用说处于现代的焦点了。一旦对现代政治社会的现实进行批判，那末批判就会超出德国的现实，因为否则批判就会站在低于自己对象的实际水平上来看自己的对象。德国历史，就像一个笨拙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一直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重复陈旧的历史操练。作为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马克思举出了“现代的主要问题”之一——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同政治界的关系。

这个问题只是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才引起了德国人的兴趣。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

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朝霞而受到欢迎。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在那里，紐結正被解开；在这里，紐結剛被系紧。

但是，如果不是从历史方面說来，而是从哲学方面說来，德国人仍然是本世紀的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曾由黑格尔作过最彻底的探討，而对这个哲学进行批判，就接触到了现代的那些关键性问题的核心。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确定了对《莱茵报》中并存的两个派别⁶⁷以及对费尔巴哈的明确态度。费尔巴哈把哲学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但是，馬克思說，要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那就不应该忘記，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他对那些“棉花骑士和鋼铁英雄”說：你們要消灭哲学，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們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反过来，他对自己的老朋友鲍威尔及其拥护者說：你們要把哲学变成现实，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消灭哲学，就不能把它变成现实。

对法哲学的批判归结于只有通过一个办法——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德国怎样才能实现一个符合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同样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它怎样才能一个筋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即越过它实际上应该看做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并且应该作为自己的目的来争取的那些障碍呢？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論

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但是彻底的革命仍旧需要被动的因素，需要物质的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只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
94 现实本身也应该力求趋向思想。但是这种情况在德国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戏剧式的，而是史诗式的。就连德国资产阶级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只是以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狭隘庸俗性的总代表这种意识为依据的。而德国市民社会的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表现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了自己的狭隘本质，以致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

但是，这还不是证明，德国不可能有彻底的、全人类的革命。只有不彻底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在德国才是不可能的。德国没有实行这种革命的必要前提：一方面，德国没有一个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这种解放，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另一方面，德国也没有一个阶级集中了社会的一切缺点，没有一个特殊的社会领域可以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以致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最接近他们却又和他们截然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

马克思从不彻底的革命的不可能性出发，作出了彻底的革命的“实际可能性”这一结论。这种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

体的等級；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領域，这个領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領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領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領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結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級來說，就是无产階級。”^① 德国无产階級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为組成无产階級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貧民，而是人工制造出来的貧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群众，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过程、特别是由于中間等級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不言而喻，自发产生的貧民和基督教德意志的农奴等級也在不断地——虽然是逐渐地——充实无产階級的队伍。

哲学把无产階級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階級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沒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哲学不消灭无产階級，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階級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己。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啼来宣布⁶⁸。

就形式和内容來說，这篇文章在保存下来的馬克思早期作品中都是居于前列的。这里对它的内容所作的簡略的概述，甚至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466 頁。

能近似地表达馬克思的警句般精炼的形式所蘊涵的丰富盈溢的思想。德国教授們认为这篇文章風格怪誕, 极端乏味, 其实这种看法只是证明他們自己的怪誕和乏味罢了。誠然, 就連卢格也认为这篇文章的“警句”过于“矯揉造作”, 并且責备馬克思“章法混乱而又过事雕琢”, 但是, 他仍旧在这篇文章里发现了一种“有时把辯证法运用得过火的批判的天才”。这个判断不是沒有道理的: 年輕的馬克思有时很欣赏他那鋒利而沉重的武器的鏗鏘声。火气本是一切有才能的青年人的天赋。

这篇文章只是对于未来的哲学上的展望。誰也不能比后来的馬克思更合乎邏輯地证明, 沒有一个民族能够一个筋斗翻越它的历史发展的各个必要阶段。他的坚强的手在这篇文章里給未来勾画了一个并非不正确的、而仅仅是模糊的輪廓。虽然后来事件的发生在細节上和他所預言的不尽相同, 但总地說来一切都像他所預言的那样发生了。德国資產階級的历史和德国无产階級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 論犹太人問題

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 就形式而論不如第一篇那样引人入胜, 但是就批判分析的力量而論却也許更为卓越。在这篇文章里, 馬克思就布魯諾·鮑威尔的两篇論犹太人問題的文章⁹⁶探討了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之間的差別。

这个問題在当时还没有像現在这样陷到反犹派和亲犹派的泥坑里。作为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有勢力的代表而力量不断增长的整整一个居民阶层, 由于它的宗教的緣故而被剝夺了一切公

民权利，或者仅仅由于它的高利贷活动而享有种种特权。那位“开明专制”的著名代表者，桑苏西宫的哲学家⁷⁰，在这个意义上作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他把“基督教银行家的自由”赋予了那些帮助他伪造钱币和干其他暧昧的财政勾当的犹太高利贷者。同时，他容忍哲学家莫泽斯·门德尔森居住在他的领土上，这并不是因为门德尔森是一位哲学家，不是因为他力图引导自己的“民族”进入德国的精神生活，而是因为他给一个享有特权的犹太高利贷者担任会计。一旦失去这个职位，门德尔森就会处于法律保护之外。

但是就连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除了少数例外，对于为了宗教信仰而迫害整整一个居民阶层的做法也不感到特别愤慨。他们厌恶犹太教，因为犹太教是宗教偏执的典型，它甚至把“诽谤人类”传授给了基督徒。犹太人本身对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也丝毫不感兴趣。当启蒙派批判他们自己自古以来就咒骂的基督教教义时，他们就兴高采烈，但是当任何人对犹太教进行同样的批判的时候，他们却责备他背叛人类思想。他们要求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但不是平等意义下的政治解放；他们无意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却宁愿加强这种地位。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由的原则，只要这些原则违反了犹太人的任何特殊利益。

青年黑格尔派所展开的宗教批判，自然也推而及于犹太教，因为97
他们把犹太教看成是基督教的准备阶段。费尔巴哈认为，犹太教是利己主义的宗教。“犹太人把他们的种种特点一直保持到如今。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是世界上最实际的原则——利己主义，而且是以宗教为形式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使人集中注意于自己……但是又在理论方面使人变得偏狭，因为它使人漠视一

切跟他的切身利益无关的东西。”^① 布魯諾·鮑威尔也發揮了同樣的見解。他說，猶太人鑽到資產階級社會的裂縫和罅隙里去剝削它的不穩定分子，就像伊璧鳩魯的諸神住在天地間，擺脫了任何固定的工作一樣。布魯諾·鮑威尔說，猶太人的宗教是禽獸為滿足其官能需要而施用的陰謀詭計。猶太人自古以來就是反對歷史進步的，而且由於他們仇恨其他一切民族，他們就給自己的民族創造了一種前路渺茫、命途多舛的生活。

費爾巴哈從猶太人的本質出發來解釋猶太教，而布魯諾·鮑威尔則仍舊透過神學的眼鏡來考察這個問題，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在研究猶太人問題時所表現的透徹、大膽和深刻也曾受到馬克思的贊揚。他認為，像基督徒一樣，猶太人只有克服了自己的宗教以後才能獲得自由。基督教國家按其宗教本質不能解放猶太人，同樣，猶太人的宗教本質也阻礙了他們的解放。基督徒和猶太人要想獲得自由，必須不再是基督徒和猶太人。但是，由於猶太教作為一種宗教落后於在宗教方面勝過它的基督教，因此，猶太人獲得解放的道路要比基督徒的更加漫長而艱難。按照鮑威尔的意見，猶太人只有首先學會基督徒的經驗並且通過黑格爾哲學，他們才能走上通向自由的道路。

馬克思駁斥了這一論點，他說，只是探討誰來解放和誰被解放是不夠的。批判還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這裡指的是哪一種解放？是政治解放還是人類解放？在有些國家里，猶太人和基督徒都獲得了完全的政治解放，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他們也獲得了人類解放。可見，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是有差別的。

^① 參閱《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下卷，第146頁。

政治解放的本质，就是现代国家的充分发展，而这个国家同时 98 也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因为基督教德意志国家，即特权的国家，还不是完备的国家；它还是神学的、尚未表现出政治纯粹性的国家。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政治国家则既不要求犹太人废弃犹太教，也不要求一般人废弃宗教。它解放犹太人，而且就它的本质来说也必须解放他们。就是在那些宪法明文规定政治权利与宗教信仰无关的地方，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仍然不被认为是正派人。可见，宗教跟国家的完备性并不矛盾。犹太人、基督徒、一切宗教信仰徒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解放。当人还没有摆脱某种限制的时候，国家就可以摆脱这种限制，这就是政治解放的限度。

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国家作为国家，否定私有财产。在北美许多州所发生的取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情况，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宣布废除私有财产。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管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公民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国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消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其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不仅不消除这些实际差别，而且以这些差别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普遍性。完备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人的类生活。物质生活这种利己主义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生活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而且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而存在的。政治国家和它的前提（不

論这些前提是私有财产这种物质的要素，还是宗教这种精神的要素)的关系，不外就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人作为特殊宗教的信徒跟他的公民身分，以及跟作为社会成员的其他人的冲突，归根到底就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

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正如古代奴隶制是古代国家的基础一样。现代国家以宣布一般人权确证了自己的起源，而一般人权也和政治权利一样，是犹太人应当享有的。一般人权承认利己主义的市民个人以及构成他的生活状况的内容、构成现代市民生活的内容的各种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无限制的运动。一般人权并不使人摆脱宗教，而是给人以宗教的自由；并不使人摆脱私有财产，而是给人以私有的自由；并不使人摆脱牟利的骯髒勾当，而是给人以牟利的自由。政治革命摧毁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制度，摧毁了使人民脱离他们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切等级、公会、行帮，从而建立起了市民社会。它创造了政治国家这种普遍的事务，这种真正的国家。

马克思这样表述了自己的思想：“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43页。

剩下还要考察的是所謂基督徒比犹太人更易于获得解放这个論点。鮑威尔企图从犹太教的本质来解釋这个論点。馬克思則同意费尔巴哈的看法——费尔巴哈用犹太人的特性来解釋犹太教，而不是从犹太教引伸出犹太人的特性。但是馬克思超过了费尔巴哈，他揭示了反映在犹太教上的特殊的社会因素。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么？金錢。“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錢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現实的犹太教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現代的自我解放。100

一种社会組織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組織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識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異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①馬克思在犹太教中看到了一般性的現代反社会的因素。犹太人从这个坏的方面积极参与的历史发展，使犹太教达到目前这样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必然要瓦解。

馬克思通过这篇文章取得了双重的成果：他說明了社会和国家之間相互关系的基础。国家并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道德观念的現實，是絕對合理的东西和絕對的目的本身。相反，它应当滿足于一个謙遜得多的任务——保护那个把国家当做自己的卫兵的資產階級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个社会里盛行着人反对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446 頁。

个人反对个人的普遍斗争，由于个性而彼此愈益分离的一切个人之间的战争。这个社会里盛行着摆脱了封建桎梏的自发生命力的无限制的运动，盛行着仅仅貌似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的实际上的奴隶制。个人把自己的异化了的要素如财产、工业、宗教的无限制的运动看做自己的自由，其实这无宁说是完全的奴隶制和非人性。

其次，馬克思說明，当前議論紛紛的宗教問題只具有社会意义。他不是从宗教理論方面、而是从工业和商业的实践方面来考察犹太教的发展，并且把犹太教看作这个实践的虚幻的反映。实践中的犹太教，无非就是完备的基督教世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彻头彻尾地浸透了商业的犹太人本质，因此犹太人是这个社会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且能够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正如能够要求一般人权一样。但是人类解放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全新的組織，在这种組織下，人将成为自己的生活来源的主人。在这里，一幅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显现了出来，虽然这幅图景的輪廓还不清晰。

在《德法年鉴》上，馬克思还在耕耘着哲学的田地；但是在他用批判的犁开出来的隴沟里，唯物史观的幼芽已經生长起来，它們在法兰西文化的阳光下很快就揚花抽穗了。

(四) 法兰西文化

根据馬克思通常的工作方法来判断，論黑格尔法哲学和論犹太人問題的两篇文章很可能是他还在德国的时候，在幸福的新婚的头几个月里就打好了草稿，至少是拟好了大綱的。既然这两篇文章已經涉及了法国大革命，所以，当巴黎的流寓一旦使馬克思有可能对法国革命的史料以及它的前史即法国唯物主义的史料和

它的后史即法国社会主义的史料进行研究时，他钻研这个革命的历史的必要性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当时的巴黎是有理由以资产阶级文化的先驱自诩的。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经过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幻想和灾难之后，终于巩固了它在1789年大革命中所开始的东西。它的人才都已泰然自若地高枕而卧。但是，当旧势力的抵抗还远未被粉碎时，新势力又已经抬头了，而思想斗争的浪潮不住地汹涌，其程度之猛烈超过了欧洲任何地方，更不用说那死气沉沉的德国了。

马克思挺着胸膛投进了这个使他得到锻炼的浪潮。1844年5月卢格写信给费尔巴哈——其中并没有赞扬的意思，因而他所提供的证据就更加可信——说，马克思读了许多书，并且正在非常勤奋地写作，但是一无所成；工作总是中断，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沉没到无边无际的书海里。他又写道，马克思变得暴躁易怒了，特别是在他累病了和一连工作三、四夜不睡觉以后。他又把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工作搁置起来，想利用居住巴黎的机会写一部国民议会史。卢格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这个计划，并且说，马克思已经为他这部历史搜集了许多材料并且拟定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观点。

102

马克思没有写国民议会史，不过这个事实并不能推翻卢格的报道，反而使它更为可信了。马克思对1789年革命的历史本质钻研得越深，他就越容易放弃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再把它当作“为自己弄清”当代意向和斗争问题的手段。尤其是，他不能只限于研究国民议会史，因为，国民议会虽然也是政治能力、政治势力和政治理性的最高表现，但在对付社会无政府状态方面却是无能为力。

可惜，除了卢格的这一点零星的記述外，关于馬克思在 1844 年春夏所进行的研究，沒有保存下来任何材料。但是，这些研究的大体情况是不难想見的。对法国革命的研究，推动馬克思去考察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兴起的“第三等級”的历史文献⁷¹。这些文献大都出自一些极有才华的人的手笔。他們的目的是把本階級的历史追溯到 11 世紀，以便把中世紀以来的法国历史描述为一連串的階級冲突。多亏这些历史家，——他特別指出其中的基佐和梯叶里，——馬克思获得了关于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历史本质的知識。他从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其中他首先指出李嘉图——的著作学会了对这个斗争进行經濟学的解剖⁷²。馬克思本人始終否认自己是階級斗争学說的首創者。他所做的只是证明：階級的存在仅仅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階級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階級专政，而无产階級专政本身不过是走向一切階級消灭、走向无階級的社会的过程⁷³。这一系列思想是馬克思在他流寓巴黎的时期发展起来的。

“第三等級”在 18 世紀同統治階級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最輝煌而鋒利的武器是唯物主义哲学。馬克思在他流寓巴黎期間曾經热心地研究了这种哲学。在这种哲学的两个派別中，馬克思不大注重发端于笛卡儿而发展为自然科学的一派，而較为注重导源于洛克而汇流于社会科学的另一派⁷⁴。爱尔維修和霍尔巴赫是照耀着年輕的馬克思在巴黎的研究工作的两颗明星⁷⁵。他們把唯物主义学說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把一切人的智力的天然均等、理性的进步与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当做自己

108 的学說的基础。馬克思把他們的学說称做“真正的人道主义”。他也这样称呼费尔巴哈的哲学，不同的只是，爱尔維修和霍尔巴赫的

唯物主义已經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

巴黎为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馬克思还在《萊茵报》时就表示了这种意图——提供了最广阔的机会。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丰富得几乎令人目眩的思想和人物的图景。精神园地中到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甚至像《Journal des Débats》〔《辯論日报》〕^①这个从政府領取丰厚津貼的、当权的金錢貴族的老牌机关报，也不能完全置身于这个潮流之外，虽然这一点只不过表现在它发表了欧仁·苏的一些所謂社会主义的庸俗小說⁷⁶一事上。另一极的代表人物是像列魯这样一些已經是来自无产阶级的天才思想家。两极之間有圣西門派的殘余，和以孔西得朗为首的、拥有自己的机关报《Démocratie pacifique》（《和平民主日报》）的活跃的傅立叶派；其次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例如天主教神甫拉梅耐或过去的燒炭党人毕舍⁷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西斯蒙第、毕莱、裴柯尔、維达尔⁷⁸，以及文艺界中的一些同样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他們的許多卓越的作品中，例如在貝朗热的詩歌和乔治·桑的小說中，都閃耀着各种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⁷⁹。

但是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学說的特点在于，它們都把希望寄托在有产阶级的明智和善意上面，想通过和平的宣傳使有产阶级相信社会改革或社会变革的必要。这些社会主义学說是由于对大革命感到失望而产生的；因此，这些学說的宣揚者都不肯再走那条导致这种失望的政治道路。在他們看来，必須帮助那些无力自救的受苦受难的群众。30年代的工人起义⁸⁰都遭到了失败；确实，这些起义的最坚决的領袖，像巴尔貝斯和布朗基这样的人，都沒有一套

^① 《Journals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的简称。

社会主义理論，也不知道达到社会变革的明确的实际途徑。

但是工人运动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而海涅曾以詩人的預見如下地描述了这样一些条件下所产生的問題：“共产主义者是法国唯一值得重視的党派。我也同样关心圣西門主义的殘余，它的信徒們仍旧在奇怪的招牌下存在着；还有傅立叶主义者，他們仍旧表现出蓬勃的朝气和充沛的精力。但是这些可尊敬的人只是在口头上慷慨激昂，而社会問題對他們說来仅仅是一个問題，一个傳統概念罢了。他們还没有被魔鬼般的必然性所推动。他們不是最高的世界意志用来实现它的巨大决定的命中注定的奴僕。或早或迟，圣西門派的殘部和傅立叶派的整个总部都将并入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大軍，为极端迫切的需要找到創造性的語言，并且担負起教父的使命。”⁸¹这段話是海涅在1843年6月15日写的。不到一年，那个負起海涅所要求于圣西門派和傅立叶派的使命的人就来到了巴黎，他为“极端迫切的需要”找到了創造性的語言。

大概当馬克思还在德国的时候，至少是当他还从哲学角度来思考問題的时候，他就已表示反对关于未来的空論，反对一劳永逸地解決問題，反对树立教条主义的旗帜⁸²，反对认定研究政治問題有失身价的“过激的”社会主义者。他证明，光是思想力求趋向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也必須力求趋向思想⁸³。而他所提出的这个条件实现了。在1839年的最后一次工人起义⁸⁴被鎮压下去以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开始沿着三个方向接近起来。

首先是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党⁸⁵中接近起来。这个党从社会主义方面來說是相当薄弱的，因为它是由小資产階級分子和无产階級分子組成的。写在它的旗帜上的口号——劳动組織和劳动权利——都是一些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小資产階級的空

想⁸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按照这个社会存在的条件組織起来的，也就是說，是以雇佣劳动的形式組織起来的，而雇佣劳动是以資本为前提并且只能随着資本的消灭而消灭的。劳动权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也就是說，只有通过消灭資產階級社会，劳动权才能实现。但是这个党的領袖們——路易·勃朗、賴德律-洛兰、斐迪南·弗洛孔——却郑重其事地拒絕根除这个制度。他們既不願做共产主义者，也不願做社会主义者。

然而，尽管这个党的社会目的完全是空想，它却毕竟前进了一大步，選擇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它宣布說，沒有政治改革，任何社会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夺取政权是劳苦大众得救的唯一手段。它要求实现普遍选举权，这个要求在无产階級当中得到强烈的响应，因为无产階級已經对一小撮阴谋家的暴动感到厌倦，正在为自己的階級斗争寻找一种更有效的武器。

更大的一批群众集合在卡貝所举起的工人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卡貝最初是一个雅各宾党人，但是通过讀書，特别是在托馬斯·莫尔的《烏托邦》的影响下，他轉而信仰共产主义。正像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公开地否定共产主义一样，他公开地宣揚共产主义，不过他們之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政治民主是一个必經的过渡阶段。因此，卡貝試图描繪未来社会的《伊加利亚旅行記》远比傅立叶关于未来的天才幻想受欢迎，虽然在其他方面卡貝的书由于眼界狭窄而比傅立叶的著作大为逊色。

最后，从无产階級内部发出了洪亮的声音，这声音清楚地宣布：这个階級已开始成熟。馬克思还在《萊茵报》时就知道列魯和蒲魯东；这两个人作为排字工人，都是屬於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当

时就表示过要切实研究他們的著作。他之所以對他們的著作感到兴趣，这特别是因为列魯和蒲魯东极力想把自己的理論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虽然他們是带着很大的誤解这样做的。馬克思本人证实，他曾和蒲魯东进行长时间的、常常是通宵的談話，竭力給蒲魯东讲解黑格尔哲学。他們接近过，但不久又分开了。但是在蒲魯东死后，馬克思心悅誠服地承认，蒲魯东的初次登場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而他本人无疑就亲自感受到这种推动力。蒲魯东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拋棄了一切空想，把私有财产称做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并对它进行了彻底而无情的批判。馬克思把这部著作称做現代无产阶级的第一篇科学的宣言^①。

所有这些派別都为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結合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派別都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其中的每一派都是剛走了几步就陷入新的矛盾。对馬克思來說，当前重要的事情是在研究了社会主义以后轉而研究无产阶级。1844年7月，卢格写信給
108 他們在德国的一个共同的朋友說：“馬克思正埋头于此間的德国共产主义——当然，这只是指同它的代表人物的直接交往而言，因为，要說他认为这个可怜的运动具有政治意义，那是不可想像的。工匠們，以及这里的少数几个被这个运动俘虏过去的人所能給德国造成的那种小小的伤害，是德国甚至无须医治就能經受得住的。”但是，卢格很快就明白，为什么馬克思如此重視“少数几个工匠”的創举。

^① 指蒲魯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1840年巴黎版)。梅林这里所引的是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此书所作的早期的评价(参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7—67頁)。对这本书的全面的批判性评价見1865年1月24日馬克思給施韦澤的信(参阅《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8—166頁)。

(五)《前进报》和被逐

关于馬克思在流寓巴黎时期的私人生活，我們知道得很少。他的妻子給他生了第一个女儿，然后帶回祖国去向親屬們显示。馬克思同科倫的朋友們仍然保持着旧有的关系。他們給他寄去了一千塔勒，这一点大大帮助了馬克思，使他在这一年里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馬克思同亨利希·海涅来往很密切；1844年之所以成为詩人創作生活的高峰，多少是應該归功于馬克思的⁸⁷。馬克思是《冬天的童話》、《織工之歌》以及一些諷刺德国专制君主的不朽詩篇的教父之一。他和这位詩人的交往总共不过几个月，却始終忠实于他，甚至当庸人們咒罵海涅更甚于咒罵海尔維格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海涅在病中違反事实地引用馬克思的話来证明他从基佐內閣領取津贴是无可指責的时候，馬克思寬宏大量地保持了沉默。馬克思几乎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曾經梦想过詩人的桂冠，因此他始終保持着对詩人的深切同情，寬容地对待他們的小缺点。他认为，詩人都是一些古怪的人物，必須容許他們自行其是，而不能用常人或者甚至非常人的尺度来衡量他們。要他們歌唱，就必須恭維他們，而不应对他們严加批評。

此外，馬克思不仅把海涅看成一位詩人，而且也把他看成一位战士。白尔尼和海涅之間的爭論，当时已成为一种考驗各种观点的試金石，而馬克思是坚决站在海涅一边的。在馬克思看来，基督教德意志的蠢驴們对海涅論白尔尼的著作⁸⁸的那种愚蠢的誤解，是德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沒有前例的，虽然它的各个时期都

107 不乏蠢材。关于虛构的海涅叛国的叫嚣，甚至影响过当时还很年輕的恩格斯和拉薩尔，但是从来没有迷惑过馬克思。海涅有一次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請求馬克思原諒他的字迹潦草时說道：“我們用不了多少符号就能互相了解。”他的話有着比字面更为深刻的涵义。

当馬克思还在中学讀書的时候，海涅就已在 1834 年发现，我們的古典文学中的“爱好自由的精神”，表現在“学者、詩人和文学家当中的，要比表現在广大积极的群众、手工业者当中的少得多”。十年后，当馬克思住在巴黎的时候，海涅又发现，“領導着无产階級进行反对現存制度的斗争的是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最偉大的哲学家”。要充分估价这个判断的独立不羈和确实可靠，必須記住，海涅当时曾辛辣地嘲笑那些流亡者秘密集会上的无休无止的空談，而白尔尼在这些秘密集会上是扮演偉大的仇視暴君者的角色的。海涅懂得，白尔尼或者馬克思同“少数几个工匠”来往，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把海涅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的，是德国哲学的精神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是对基督教德意志的寄生性和装腔作势的条頓狂的深恶痛絕，这种条頓狂用激进的口号把古老德国的笨拙的外衣改制成比較时髦的样式。在海涅的諷刺詩中名留后世的馬斯曼和費奈迭之流，毕竟是跟着白尔尼的脚印走的，虽然白尔尼在智能和才华方面都超过他們。白尔尼有一句常被人援引的話：歌德是押韵的奴才，黑格尔是不押韵的奴才。从这句话可以判断，白尔尼对艺术和哲学是一窍不通的。但是，白尔尼在同德国历史的偉大傳統断絕关系以后，并没有同西欧文化的新力量建立密切的精神联系。相反地，海涅却不能拋棄歌德和黑格尔，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拋棄他自己。同时，他还如饥似渴地投身于法国社会主义，把它当作

精神生活的新泉源。他的作品保持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力，至今仍在激起孙儿辈的愤怒，就像它们曾经激起祖父辈的愤怒一样。而白尔尼的作品则被人们遗忘了，这与其说应归咎于它们的那种“短缩速步”⁸⁹的文体，不如说应归咎于它们的内容。

当白尔尼和海涅还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时候，白尔尼就暗中散布过中伤海涅的谣言。马克思发现了这一点，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没有想到白尔尼竟是这样地无聊和卑鄙。而白尔尼的那些文学继承人从他的遗稿中发现了这些谣言以后，竟愚蠢到把它们公之于世。然而即使白尔尼像他原来计划的那样，在报刊上公开谈论这场争执，马克思仍旧不会怀疑这个中伤者的无可争辩的诚实。在社会生活中，再也没有比那些心胸偏狭的激进的空谈家更恶劣的假道学了。这些人披着美德这件破外衣，肆无忌惮地诋毁那些眼光敏锐而富于自由思想的人，仅仅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历史生活的更深刻的联系。马克思永远是站在后一种人这一边的，尤其是因为他根据亲身经验深知那些“有德行的人”是怎样的一类人。 108

在晚年，马克思常谈到他流寓巴黎期间那些关怀过他的“俄国贵族”，当然，他同时补充说，这并没有很大的价值。他解释说，俄国的贵族们都在德国上大学而在巴黎渡过青年时代。他们总是如饥似渴地追求西欧所提供的最极端的東西；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踏进衙门就变成坏蛋。马克思的这些话看来或者是指俄国政府的密探、某个托尔斯泰伯爵而言的，或者是指其他某个人而言的⁹⁰。但是他在说这话时，绝不是也不可能是指那位当时在思想发展上受过他巨大影响的俄国贵族，即米哈伊尔·巴枯宁。甚至当他们两人的道路已经离得很远的时候，巴枯宁也承认马克思对他的影响。而在马克思和卢格的争论中，巴枯宁是坚决站在马克思

一边反对卢格的，虽然在此以前卢格曾經是巴枯宁的維護者。

這場爭論在 1844 年夏天重新爆发起来，而且这一次是公开的。从 1844 年 1 月起，在巴黎出版了一个每周两期的刊物 «Vorwärts!» (《前进报》)，这个刊物創办的目的远不是高尚的。它的出版人是一个名叫亨利希·伯恩施坦的人，他原是經營戏院和其他方面的广告业务的。这个报纸是为他的商业利益服务的，并且靠作曲家梅尔伯的慷慨施舍来維持。从海涅的著作中我們知道，这位特別喜欢住在巴黎的普魯士王家音乐总指揮喜好人家对他广为吹捧并且需要这种吹捧。但是伯恩施坦作为一个善于钻营的生意人，他給《前进报》披上了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并且把阿达尔貝特·伯恩施太德聘为編輯。伯恩施太德早先是普魯士軍官，現在当了国际間諜，他是梅特涅的“心腹”，同时又拿柏林政府的錢。实际上，《德法年鉴》刚一出版，就遭到《前进报》的迎头痛罵，而且很难說这謾罵主要是出于愚蠢还是出于粗暴。

109 尽管如此，事情却并不順利。伯恩施坦建立了一个翻譯作坊，以便把巴黎的新脚本极其迅速地推銷給德国各剧院的經理；而为了这个翻譯作坊的利益，他必須排挤“青年德意志”⁹¹的剧作家們。为了在充滿叛逆情緒的庸人們当中达到这个目的，伯恩施坦不得不含糊其詞地談論些什么“溫和的进步”，并且表示既拒絕左的“极端”，又拒絕右的“极端”。伯恩施太德也必須按照同样的精神来行事，以免吓跑流亡者的小組；因为，和这些流亡者交往而不引起他們对自己的怀疑，乃是他領取間諜津貼的条件。但是普魯士政府已昏聩到了这种程度，竟連自己国家的利益都不懂得。它在自己境內禁止了《前进报》，接着德国其他各邦的政府也相繼效法了它的榜样。

5月初，伯恩施太德歇手不干了，因为他认为这个报纸是没有希望的。但是，伯恩施坦却没有灰心。他无论如何总得搞好自己的小买卖，因而他以一个善于钻营的投机商人的冷静态度下定决心，一旦《前进报》在普鲁士被禁止，那就必然会使这个报纸具有一种违禁出版物的吸引力；那时候，普鲁士的庸人将会急于设法通过走私弄到这份报纸。因此，当年轻热情的贝尔奈斯给《前进报》投来一篇措词非常激烈的文章时，伯恩施坦感到很高兴，而经过一番争执之后，贝尔奈斯终于被聘为报纸的编辑，来接替伯恩施太德。在这以后，又有几个流亡者由于没有其他任何机关报而给《前进报》写稿，不过他们不属于编辑部，而是文责自负。

卢格也是第一批这样做的人中的一个。他也一开始就以自己的名义同伯恩施坦展开争论，而且甚至好像得到马克思的完全同意似地，替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辩护。几个月以后，他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评论普鲁士政策的几则短评，另一篇是关于普鲁士王朝的诽谤性的长文，其中谈到“好酒贪杯的国王”和“瘸腿的王后”，以及他们的“纯精神的”婚姻，等等。但是这两篇文章已经不署他自己的名字，而是署名“普鲁士人”，这就使人以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马克思。因为卢格本人是德勒斯顿市参议员并且以这个身分被列入了萨克森驻巴黎公使馆的人员名单；贝尔奈斯是普法尔茨的巴伐利亚人；而伯恩施坦则出生在汉堡，后来长期住在奥地利，从来没有在普鲁士住过。

现在已经很难断定，卢格在自己的文章上签署这个使人扑朔迷离的笔名，究竟居心何在。从他写给亲友的信可以看出，那时他已经恨透了马克思，竟至骂他是“卑鄙的人”，“不要脸的犹太人”。¹¹⁰同样无可辩驳的是，两年以后，他向普鲁士内务大臣呈递了一份悔

过书，并在其中出卖了流亡巴黎的同志們，把他自己在《前进报》上所犯的罪过推到这些“坏透了的年轻人”身上。不过，也可能卢格给自己的文章署名“普鲁士人”，是为了给这些文章增加一些分量，因为两篇文章都是评论普鲁士政策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他的行为也是极其轻率的，因此，马克思急忙给这个假“普鲁士人”以回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当然是以恰如其份的方式给予这一反击的。在他的反驳文章中，他利用了卢格关于普鲁士政策的某些所谓客观的评论，并且用如下的一行脚注同那篇关于普鲁士王朝的诽谤性的长文划清了界限：“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要声明，本文是我在《前进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①顺便说说，这也是他在该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实际上，问题涉及的是1844年的西里西亚織工起义⁹²。卢格不重视这次起义，认为这次起义没有政治精神，而在他看来，没有政治精神，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反驳的实质早已在他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里申述过了。政治权力不能治愈任何社会恶疾，因为国家没有力量消除它本身所由产生的种种条件。马克思猛烈地抨击空想主义，他证明，社会主义不经过革命是不能实现的；但他也同样激烈地反对布朗基主义。他证明，如果政治理智企图靠一些没有目标的小小暴乱向前推进，那末政治理智就会蒙蔽社会本能。马克思用一个精辟的警句道出了革命的本质：“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②像卢格所要求的那种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68页。

② 同上书，第488页。

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有其合理的意义。一般的革命——推翻現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是政治行为。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組織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拋棄了政治的外壳。

这些思想是馬克思从他的論犹太人問題的文章里发展出来¹¹¹的，而西里西亚織工的起义很快就证实了他关于德国階級斗争軟弱无力的論断。他的朋友荣克从科倫写信給他說，現在在《Kölnische Zeitung》〔《科倫日报》〕上比在“已故的”《萊茵报》上出現了更多的共产主义。《科倫日报》为死难的或被捕的織工的家屬举办了募捐。在欢送退职的县长的一次宴会上，也为了这个目的而向高官富賈募集了一百塔勒。到处的資產階級都对那些危险的叛乱者表示同情。“几个月以前在你們那里被认为是大胆的新穎的提法，現在显然已經成了老生常談。”馬克思举出人們对織工的普遍同情，作为反对卢格輕視起义的一个論据。但是馬克思畢竟沒有被“資產階級对社会傾向和社会思想竟不进行什么抵制”^①这一情况所迷惑。他預見到，一旦工人运动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它就会冲淡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翻騰和矛盾，而把政治領域內的一切敌意都轉移到自己身上。馬克思揭示了資產階級解放运动和无產階級解放运动之間的极深刻的区别，证明前者是社会康宁的产物，而后者是社会貧困的产物。参加政治生活的障碍，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原因；参加人的生活、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障碍，是无產階級革命的原因。既然离开人的生活而孤立，比离开政治生活而孤立无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82頁。

可比拟地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充滿矛盾,那末,消灭这种孤立状态,哪怕是像西里西亚織工起义这样的局部的事件,其意义就更加深远,就好像人比公民、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的意义更加深远一样。

由此可见,馬克思对这次起义的评价是和卢格完全不同的。“首先請回忆一下織工的那支歌⁹³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沒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銳地、直截了当地、威風凜凜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結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識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西里西亚起义的进程本身也同样具有这个优点。被毀掉的不仅是机器——这些工人的勁敌,而且还有眼簿和财产契据。其他一切工人运动首先只是打击工业企业的老板,即明显的敌人,而这次运动同时还打击銀行家,即陰蔽的敌人。最后,英国的工人起义沒有一次像这样勇敢,这样有計劃,这样坚强。”^①

联系着西里西亚起义,馬克思提到了魏特林的天才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在論述的技巧方面不如蒲魯东,在理論方面却有很多地方胜过他。“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論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諧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論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輝灿烂的处女作比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較一下,我們就能够預言德国的灰姑娘⁹⁴将来必然长成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83頁。

一个大力士。”^① 馬克思把德国无产階級称做欧洲无产階級的理論家，把英国无产階級称做它的經濟学家，而把法国无产階級称做它的政治家。

馬克思关于魏特林的著作所說的話已經由后世的判断所证实。魏特林的著作在当时說來是天才的，这尤其是因为，这位德国裁縫帮工还在路易·勃朗、卡貝和蒲魯东之前并且比他們更为有效地为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結合作了准备。在今天看来有些奇怪的是馬克思关于西里西亚織工起义的历史意义的評价。他把显然同这次起义无关的一些傾向加給了这次起义。卢格认为这次起义仅仅是一次沒有多大深刻意义的饥饿騷动，看来他的这个評价是更为正确的。但是正如他們以前关于海尔維格的爭論一样，这一次更加清楚地表明，庸人即使比天才正确，归根到底他还是不正确的。到头来，偉大的心灵总是要战胜渺小的智力的。

为卢格所蔑視而为馬克思所热心研究的“少数几个工匠”，組織了一个“正义者同盟”⁹⁵。这个組織在30年代由于同法国的一些秘密团体合并而发展起来，并在1839年同这些团体一道被摧毀了。不过这一点也有对它有利之处，即离散了的分子不但在旧的中心巴黎重新集合起来，而且把它的活动扩展到英国和瑞士；在这些地方，集会結社的自由使它获得了更为广闊的活动天地；結果，新的嫩枝比老的树干生长得更加旺盛了。同盟在巴黎的組織的領導者是但澤人海尔曼·艾韦貝克。他曾把卡貝的《烏托邦》譯成德文，同时他本人也成了卡貝的劝善的空想主义的俘虏。在瑞士进行宣傳活动的魏特林在思想上远胜过艾韦貝克，而同盟的倫敦領袖們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83頁。

也胜过他，至少是在革命决心方面。领导倫敦組織的是钟表匠約瑟夫·莫尔、鞋匠亨利希·鮑威尔和卡尔·沙佩尔，后者曾經是学森林学的大学生，后来有时当排字工人、有时当語文教师，借以維持生活。

馬克思大概是从恩格斯那里第一次听到关于这“三个真正的人”的“深刻印象”的。恩格斯在1844年9月路过巴黎时拜訪了馬克思，并且同他相处了十天。在这次会晤期間，他們观点的完全一致（这一点早在他們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就已表明），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当时，他們的老朋友布魯諾·鮑威尔在他所創辦的《Literatur-Zeitung》（《文学报》）上撰文反对他們观点。馬克思和恩格斯恰好是在他們聚首巴黎的时候得知他的批評的。他們馬上决定回答他，而且恩格斯立即写出了他所分担的那一部分。馬克思却按照他的老习惯，比最初設想的钻得更深些，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經過緊張的工作，写了二十个印張。他在1845年1月完成了这部著作，同时他流寓巴黎的时期也就此結束了。

貝尔奈斯自从担任《前进报》的編輯以后，就非常猛烈地攻击柏林的“基督教德意志的蠢材”，而且在“侮辱圣上”方面也无所顾忌。海涅更是对准了柏林城堡里的“新的馬其頓的亚历山大”射出一枝又一枝的火箭⁹⁶。于是，正統的王权就向非正統的法国資產階級王国的警察大棒提出要求，要它对《前进报》采取暴力措施。但是基佐却装聾作哑。他尽管反动，却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而且他知道，如果他充当了普魯士暴君的暗探的角色，他会使国内的反对派多么高兴。可是，当《前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市长捷希謀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事件的“卑劣文章”时，基佐就变得比較可以通融了。經內閣會議之后，基佐表示决意对《前进报》采取措施，而且甚

至是双重的措施：以未交保证金的罪名对負責編輯处以違警罰金，¹¹⁴其次，在刑事方面，以教唆謀刺国王的罪名把編輯交付陪审法庭⁹⁷审訊。

柏林方面採納了第一个建議，但是这个办法却没有产生任何結果。貝尔奈斯由于未繳納法定的保证金而被处以两个月的监禁和三百法郎的罰金，但是《前进报》馬上就宣布它将改为月刊出版，而月刊是无須繳納保证金的。至于基佐的第二个建議，柏林政府連听都不想听，因为它担心巴黎的陪审法庭不会为了普魯士国王的緣故而違背自己的良心，而这种担心是不无理由的。因此，普魯士政府坚持要求基佐把《前进报》的編輯和撰稿人逐出巴黎。

經過长時間的交涉之后，法国大臣終於在压力下让步了。这件事，像当时人們所推測的以及像恩格斯后来在馬克思夫人墓前演說中所重提的那樣，是通过亚历山大·馮·洪堡尔特的十分不体面的調停而发生的。洪堡尔特是普魯士外交大臣的姻戚。不久以前，有人企图替他洗清在这件事情当中的罪責，理由是，普魯士政府的档案中沒有任何能证实他的过錯的文件。但是这种說法不能成为反证：第一，关于这件不光彩的事件，保存下来的文件极不完全；第二，这一类的勾当照例是不見諸文字的。从档案中发现的真正新的材料，无宁說证明了某些决定性的場面是在幕后演出的。

柏林方面最恼恨的是海涅，因为他在《前进报》上針对着普魯士內政和国王发表了十一篇最尖刻的諷刺詩。但是，另一方面，对基佐說来，海涅的問題却是他在这整个棘手的事件中最棘手的事情。因为，海涅是全欧洲闻名的詩人，法国人几乎把他看成是本民族的詩人。由于基佐不便亲自說出这个最主要的困难，于是大概有个傳話的鳥儿在普魯士駐巴黎公使的耳边唧喳了几句，因为 10

月4日公使突然向柏林報告說，海涅只在《前進報》上發表過兩首詩，未必是編輯部的成員。於是，柏林方面也就領會了這個報告的含義。

因此，海涅沒有受到刁難，但是一大批其他的流亡者，在《前進報》上寫過文章的或是有撰稿嫌疑的，都在1845年1月11日接到了離開法國的命令，其中包括馬克思、盧格、巴枯寧、伯恩施坦和貝爾奈斯。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得以幸免：伯恩施坦保證停止出版
115 《前進報》；盧格奔走在薩克森公使和法國議員門前，向他們證明他是怎樣忠誠的一個公民。馬克思當然決不肯這樣做。他遷居到布魯塞爾去了。

馬克思流寓巴黎的時間只不過一年多一點，但這是他修業和流浪的生涯的最重要時期。這一年中他獲得了豐富的閱歷和經驗，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位戰友，為了完成他畢生的偉大事業，他越到后來越感到需要這位戰友。





第四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一) 办公室和兵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生在巴門。和馬克思一样，他不是从父母的家中取得自己的革命观点的。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也和馬克思一样，不是由于个人的穷困，而是由于卓絕的智慧。他的父亲，一个殷实的工厂主，是一个保守分子和正統派信徒；在宗教方面，恩格斯比馬克思有更多的障碍需要克服。 116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上中学，但是在毕业考試前一年就离开了学校，从事商业。像弗莱里格拉特一样，恩格斯成了一个能干的商人，虽然他从来不曾把这“該死的商务”放在心上。当他还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在不来梅的領事洛伊波德的商行里当练习生时，他在写給格雷培兄弟的信中，便初次显露出他的为人；格雷培兄弟是他在中学的同学，此时正在神学系学习。这些信中很少談到商业和生意，却用开玩笑的口吻暗示地提到同學們的欢聚痛飲。恩格斯在年輕的时候就像后来在老年时一样，喜欢和朋友們一道开怀暢飲；他在不来梅市政厅的地下室酒店里，虽然不像豪夫那样耽于幻想，也不像海涅那样引吭高歌，却常以豪放不羈的詼諧語調談述这家名声悠久的酒店里举行的“豪飲”。

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样，最初曾在詩歌方面一試身手，但是他也

像馬克思一樣，很快就意識到詩人的桂冠不是他能夠得到的。他在1838年9月17日——那時他還不滿十八歲——寫的一封信里曾說，由於受到歌德“給青年詩人”的勸告的影響，他放棄了關於自己在詩歌方面負有使命這種信念。這裡他指的是歌德的两篇短文，在這兩篇文章中，這位偉大的長者解釋說，德國語言已經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每一個人都可以輕鬆愉快地用詩歌來表達自己，因此，任何人都應該把這種才能看得了不起。

歌德用四句詩結束了自己的勸告：

“青年們，請注意：
當心靈翱翔之際，
繆斯只會相伴随行，
而不會在前指引。”

年輕的恩格斯感到歌德的勸告對自己非常適用；它告訴他，他的詩對藝術不會有任何貢獻。因此，他決定把詩歌創作僅僅當作像歌德所說的“愉快的消遣”，並且仍不時把自己的詩送到雜誌去發表，因為“別的青年人都是這樣做的，他們也是和我一樣的蠢材，甚至是比我更大的蠢材；同時也因為，我這樣做，並不會提高或降低德國文學的水平”^①。恩格斯說話時常用的那種德國大學生式的不拘儀節的語調，就是在青年時代也不帶有輕浮的意味。在這封信里，他請求自己的朋友從科倫給他寄一些民間讀物⁹⁸——《齊格弗里特》、《滑稽大王歐倫什皮格爾》、《海倫娜》、《屋大維》、《鄉下佬》、《海蒙的孩子們》、《浮士德博士》。他還寫道，他在研究雅科布·伯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年俄文版，第264頁。

麦⁹⁹。“这是一个神秘的、然而思想深邃的人。如果想对他有所领悟,就必须下苦功夫钻研他……”^①。

正是这种寻根究底的欲望不久就使年轻的恩格斯抛开了“青年德意志”的肤浅文学。稍后,在1839年1月10日^②的一封信里,他攻击了这些“花花公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是虚构的。“这个泰奥多尔·蒙特胡乱写什么他偶然想到的‘用跳舞来表现歌德的’塔里约尼小姐;他从歌德、海涅、拉希尔和施梯格利茨那里剽窃了一些东西来装饰自己;他还写了些关于蓓蒂娜的极端可笑的胡说。然而这一切是这样地时髦,以致任何下流作家、任何虚荣淫荡的年轻太太小姐都必定喜欢读它……还有亨利希·劳贝!这家伙十分起劲地捏造了一些并不存在的人物,写了些不成游记的游记,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是可怕!”^③恩格斯认为,文学中的“新精神”是从“七月革命的霹靂”以后开始出现的,而七月革命¹⁰⁰是“解放战争时期以来人民意志的最光辉的表现”。他认为,这种精神的代表人物是倍克、格律恩、雷瑙、英梅尔曼、普拉顿、白尔尼和¹¹⁸歌德,还有谷兹考,他确信谷兹考是高于“青年德意志”派的其他著名人士的。从1839年5月1日的一封信可以看到,恩格斯曾经给这些“顶顶了不起的、正直的人”所出版的《Telegraph》(《电讯》)杂志写过一篇文章¹⁰¹,但是他要求编者对他的作者身分严守秘密,因为否则他就要陷于“难堪的窘境”。

“青年德意志”派所发表的争自由的宏论,并不能使恩格斯看不到他们的作品之缺乏艺术价值。但是他绝不因为这一点而宽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65页。

② 恩格斯的信的日期是1839年1月20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73页。

反动派和正統派对“青年德意志”的攻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完全站在受迫害者一边，甚至自己也署名为“青年德意志”分子。他威吓他的朋友說：“让我告訴你，弗里茨，既然你就要成为牧师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个正統派教徒；可是，如果你成了一个虔誠主义者¹⁰²，咒罵‘青年德意志’……那末，小心点，你可得和我打交道了。”^①他对白尔尼特别怀有好感，也是由于这种感情所致。年輕的恩格斯认为，白尔尼攻击告密者門采尔的那部著作^{102a}，以文笔而論是德国最优秀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由于这一点，他有时罵海涅是“骯髒家伙”。确实，当时正是反对这位詩人的情緒高漲的时候，甚至年輕的拉薩尔也在他的日記里写道：“这个人竟拋棄了爭自由的事业！这个人从自己头上扯下了雅各宾派的小帽，而把一頂飾有金銀絲縷的礼帽戴在他的尊貴的卷发上！”^②

但是，既不是白尔尼，也不是海涅，更不是任何其他詩人給年輕的恩格斯指出了他的生活道路，而是他的命运把他鑄造成他所成为的那樣一个人。恩格斯生在巴門，长在不来梅。这两个城市都是北德意志虔誠主义的堡垒。摆脱虔誠主义束縛的斗争，就成了貫穿着恩格斯光荣一生的爭取解放的偉大斗争的开端。当他談到自己对儿时的信仰进行的斗争的时候，他的語調的柔和是他通常所沒有的。他写道：“我每天、几乎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有了怀疑以来我就开始这样做，但是我仍然不能回到您的信仰上来……”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異常激动。但是我感到，我是不会毁灭的，我会回到我一心渴望着的上帝身边。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81頁。

② 《拉薩尔日記》，彼得格勒，1918年，第127頁。

而这也是圣灵的见证；对此，我敢以生命来担保，哪怕圣经里说过一万次相反的话。”^①在这种精神磨难下，青年恩格斯离开了当时 119 正统派的首领亨格斯坦堡和克鲁马赫尔，很可能由于踌躇不决，中途在施莱艾尔马赫尔那里停留过一个时期，而最后走向了大卫·施特劳斯；这时他向他的学神学的朋友们承认说，他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恩格斯写道，一个普通的理性主义者，或许能够丢开施特劳斯关于奇迹的自然观，丢开他的平淡无奇的道德说教，而钻回正统派的紧身衣里去；但是哲学的思辨却不能从那“披覆着朝日光辉的高峰”，降落到正统派的“烟雾迷漫的谿谷”。“我正处在变成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边沿上。我会不会变成黑格尔主义者，我确实还不知道，但是施特劳斯已经为我解释了黑格尔，我以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此外，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简直好像正说在我的心坎上。”^②同教会的决裂，直接导向政治上的异端。当恩格斯谈到一个牧师在布道时称颂迫害“煽动者”的罪魁、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时，他像莽汉潑息¹⁰³似地厉声叫道：“只有当皇帝被人民的耳光打得晕头晕脑时，只有当他的宫殿的玻璃窗被革命打得粉碎时，我才能期望他办些好事。”^③

抱着这样的观点的恩格斯，当然超越了谷兹考的《电讯》而达到了《德意志年鉴》和《莱茵报》的水平。当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期间他作为志愿兵在柏林的近卫炮兵营中服兵役的时候，他就不时给这两个杂志写稿。炮兵营的驻地是在库弗尔格拉班，离黑格尔曾经生活并老死其中的那所房子不远。他最初用弗里德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09页。

② 同上书，第330页。

③ 同上书，第338页。

希·奧斯渥特这个笔名，是为了避免引起他的保守的正統派家庭的不安，而当他穿着“王家制服”时，他就有更重要的理由来保持这个笔名了。1842年12月6日，谷茲考为了安慰一个被恩格斯在《德意志年鉴》上严厉批評过的作家¹⁰⁴而写信給这位作家說：“遺憾的是，把弗·奧斯渥特引进著作界的这个不幸的功劳是屬於我的。几年以前，一个名叫恩格斯的店員，从不来梅給我寄来关于烏培河谷的通訊。我修改了这些文章，刪掉了过分尖刻的人身攻击部分，把它們发表出来。此后他又寄来一些別的文章，我不得不經常給他改写。突然間，他对我的修改提出抗議，开始研究起黑格尔来，把奧斯渥特这个名字据为己有¹⁰⁵，給其他的刊物去写稿了。就在他批評您的那篇文章出来以前不久，我还往柏林給他寄去十五个塔勒哩。这些新手差不多全都是这样的。他們全靠我們才学会了思考和写作，而他們的第一个行动却是精神上的弑父。当然，如果没有《萊茵报》和卢格的刊物去加以迎合，这种恶行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谷茲考的这番話与其說像饥饿之塔里年老的穆尔¹⁰⁶的悲叹，不如說像母鸡看見它孵出的小鸭离开自己向水中游去时的咯咯惊叫。

正像营业所的职务把恩格斯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商人一样，兵营里的訓練也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軍人。从他服兵役的时候起直到他生命的終結，軍事科学始終是他所爱好的一門学問。經常地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幸运地填补了他的哲学意識在思辨的深度上可能有所不足的地方。在服志願兵役的时候，恩格斯时常参加柏林“自由人”的欢聚痛飲，有时也参加他們的斗争，为他們写了几本小册子。当然，这还是在“自由人”的运动墮落以前的事情。1842年4月，萊比錫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一

本五十五頁的匿名小冊子，題為《謝林和啟示》^①。在這本小冊子里，他批評了“反動派對自由哲學的最新圖謀”。恩格斯就是這樣稱呼在柏林大學開設講座、想用自己的啟示學說把黑格爾哲學排擠出去的謝林的企圖的。盧格以為這本小冊子是巴枯寧寫的，他大加贊美地說：“這個可愛的青年把柏林所有的老蠢材都拋在後面了。”^②實際上，恩格斯的這本小冊子在最極端的結論上也還是代表着青年黑格爾派哲學的，雖然另外一些批評家不無道理地認為，它與其說是尖銳的批判，不如說是一種詩意的哲理的傾訴。

差不多同時，在布魯諾·鮑威爾被解職這個新的刺激之下，恩格斯在蘇黎世附近的諾伊閔斯特同樣用筆名發表了由四章組成的《基督教英雄敘事詩》，諷刺了戰勝“惡魔之首”而使之“大為驚恐”的“信仰的凱旋”。在這首詩中，恩格斯充分利用了青年人藐視吹毛求疵的批評的權利。他描寫自己以及描寫尚未面晤的馬克思的 121
那些詩句，使我們可以窺見這個作品的風貌的一斑：

“那走在最左面，穿着胡椒色的褲子，
怀着胡椒般辛辣的心的，
長腿的人是誰？是奧斯渥特——山岳黨人！
不論何時何地，他都堅決而凶狠。
他只擅長一種樂器——彈奏斷頭台這種琴，
他只愛唱一首抒情調，
其中不斷重復着一句疊韻：

①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年俄文版，第394—445頁。

② A. Ruge,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 (盧格：《1825—1880年間的通信和日記》，第1卷，柏林，1886年，第273頁。

Formez vos bataillons! aux armes, citoyens! ①

.....

誰跟隨在他¹⁰⁷ 身後，風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爾之子，他有一顆暴烈的心。
 他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風馳電掣地飛奔。
 鷹隼般的眸子，大胆無畏地閃爍，
 緊攏拳頭的雙手，憤怒地向上伸，
 好像要把蒼穹扯下埃塵。
 不知疲倦的力士一味猛沖，
 好一似惡魔纏了身！”②

恩格斯服完兵役之後，在 1842 年 9 月底^③ 回到父母家中，兩個月以後，又從那里動身前往曼徹斯特，到他父親與人合夥經營的大紡紗廠“歐門—恩格斯”公司里去當一名辦事員。路經科倫的時候，他訪問了《萊茵報》編輯部，在那里第一次會晤了馬克思。但他們的這次會見是相當冷淡的，因為這事正好發生在馬克思同“自由人”決裂的時候。恩格斯受鮑威爾兄弟的信的影響，對馬克思存有成見，而馬克思則把恩格斯看成是柏林“自由人”的同道¹⁰⁸。

(二) 英國文化

恩格斯這次在英國住了二十一個月，這段時間對恩格斯的意義，正像巴黎生活的一年對馬克思的意義一樣。他們兩人都出身於德意志哲學學派，並且從這種哲學出發，在國外達到了同樣的結

① “擺好你們的隊伍，拿起武器，公民們！”

②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 年俄文版，第 482、483 頁。

③ 恩格斯是在 1842 年 10 月 10 日前後從柏林回到巴門的。

論。不过，馬克思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

英国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比法国还早一个世纪，但正因为如此，它是在远不如法国成熟的条件下实现这个革命的。革命的结局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它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帝国。英国的“中产阶级”用不着像法国的“第三等级”那样对王权和贵族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战争。在法国，历史科学只是在回顾过去时，才理解到“第三等级”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而在英国，当无产阶级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时期开始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思想就仿佛从新的源泉涌现了出来¹⁰⁹。

其所以有这种差别，是由于大工业在英国比在法国根基深得多。它是在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发展过程中消灭了旧的阶级，创立了新的阶级的。在英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比在法国要清楚得多。恩格斯根据历史，并根据对英国工业的本质的研究，理解到经济现象——这种东西直到当时为止还根本不为历史科学所重视，甚至为它所轻视——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至少在现代社会中是如此。他理解到，经济现象是现代阶级矛盾产生的基础，而这些由于工业的发展而充分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本身又成为政党、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成为全部政治史的基础。

此外，恩格斯还由于职业的缘故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关系方面。他给《德法年鉴》撰稿，就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的，正像马克思是从法哲学批判开始的一样。他那篇短小的论文尽管还带着青年人的火气，却已证明了他的判断的异常成熟^①。只有德国教

^①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596—625页。

授才会把这篇文章叫做“极端混乱的小作”；馬克思却非常正确地称它为“天才的大綱”¹¹⁰。这正是一篇“大綱”，因为，恩格斯关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經濟理論的議論还發揮得很不透彻，甚至也不完全正确，而他反駁这些理論的許多道理，可能有一部分已經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說过的。但是，試图从資产階級經濟矛盾的真正根源——私有財產——来引伸出这一切矛盾的做法，却是真正天才的。由于这一点，恩格斯远远超过了蒲魯东，因为蒲魯东只是企图在私有財產的基础上反对私有財產。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談到資本主义竞争的灭絕人性的影响，談到馬尔薩斯的人口論¹¹¹，談到資本主义生产不断增长的狂热性，談到危机和工資規律，談到科学的成就(这些成就在私有財產的統治下从解放人类的手段变成了进一步奴役工人階級的手段)，等等。他所談到的东西包含着科学共产主义在經濟学方面的茁壮的根苗，而恩格斯确实是第一个发掘出这些根苗的人。

他本人对于自己的功績的評价是过于謙虛了。有一次他說，給他的那些經濟原理作出最后的、精确的表述的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所有的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快些。”^①他又說，他所提出的一切，馬克思迟早也都会发现的。实际上，在他們年輕的时候，在應該进行并且确实进行了决战的那个領域內，恩格斯是給予者，而馬克思是承受者¹¹²。在哲学方面，馬克思无疑有着更高的天賦，首先是受过更有系統的思維訓練。如果有人想做一次与历史研究毫无共同之处的“假如和倘若”这类孩子式的猜謎游戏，那末就可以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恩格斯是否能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384頁。

够像馬克思那样解决以較复杂的法国形式出現的他們两个人的共同任务？但是，恩格斯同样成功地解决了以較简单的英国形式出現的同一任务，而他的这一功績是沒有得到足够估計的。然而，如果单从經濟学的观点来評論他的政治經濟学批判，那末有些地方是可以引起異議的。使这一批判具有特色并且标志着重大进步的那个东西，作者是得自黑格尔的辯证法的。

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第二篇文章，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他在这篇文章里描述了英国的状况，評論了卡萊尔的一部著作，指出这部著作是文学界全年的收获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书。英国文学的这种貧乏同法国文学的丰富形成鮮明的对比。恩格斯就这一点談到了英国貴族和資產阶级的精神的枯竭。他断言，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是根据这些人来判断英国的民族性格的——是执迷于种种偏見、主要是宗教偏見的世界最可鄙的奴隶。“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 124
人、英国的賤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們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們，他們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們沒有受过教育，但他們也沒有偏見，他們还有力量从事偉大的民族事业，他們还有前途。”^①恩格斯指出，像馬克思所說的，哲学正开始扎根于这块“純朴的人民的土壤”。施特劳斯的《耶穌傳》，沒有一个体面的作家敢于翻譯它，也沒有一个有名望的出版商敢于出版它；但是，一位社会主义的宣傳家却把它翻譯出来，以每册一辨士的售价在倫敦、北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人当中銷售。

恩格斯譯出了卡萊尔用最阴暗的色調描繪英国状况的这丰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628 頁。

“书中經常可以碰到的奇美的段落中最精彩的几段”。但是他引用了布魯諾·鮑威尔和費尔巴哈的說法来駁斥卡萊尔所提出的解救办法：一种新的宗教，泛神論的英雄崇拜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他证明說，宗教已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費尔巴哈收入《軼文集》中的《綱要》所永远埋葬了的泛神論，也是如此。“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問題：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問題：神就是人。人只須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現代的謎了。”^①正如馬克思把費尔巴哈的人解釋为人的本质，即国家、社会，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历史，历史“对我们來說就是一切”，我們比过去的一切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視历史，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終究不过是檢驗他的邏輯結構的工具罢了。

根据恩格斯和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各两篇)来探溯一下，看看他們两人怎样产生同样的思想，而又各具不同的色彩，那是非常有趣的。他們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輝，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輝，——这两者都是开創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历史的偉大历史变革。尽管色彩不同，他們的思想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馬克思从人权推演出資產階級社会的无政府本质，而恩格斯則用下面的話来解釋竞争这个“經濟学家的主要范畴，他的最寵爱的女儿”：“我們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給它开辟道路的規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規律。”^②馬克思得出結論說，只有当人把自己的力量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651 頁。

② 同上书，第 611、614 頁。

組織成为社会力量并因而成为类的存在物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实现。而恩格斯則說：只有像人那样有意識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分散的原子那样无意識地进行生产，才能終止一切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

由此可見，他們的思想的一致，达到了几乎連用語都不謀而合的地步。

(三)《神圣家族》

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是他們同自己的哲学良心进行的一次清算。这次清算采取了和《Allgemeine Literatur Zeitung》（《文学总汇报》）論战的形式；这家报纸是布魯諾·鮑威尔同他的兄弟埃德加尔和艾格伯特于1843年12月在沙洛頓堡出版的。

在这个刊物上，柏林的“自由人”企图論证他們的世界观，或他們称之为世界观的东西。弗呂貝尔曾邀請布魯諾·鮑威尔合办《德法年鉴》，但鮑威尔終于沒有下定决心参加这个刊物，而是繼續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哲学的自我意識不放。鮑威尔的这种固执，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自我意識被馬克思和卢格所深深觸痛。他关于“已故的《莱茵报》”、“激进派”、“1842年的聪明人”的那些辛辣的說法，从他的观点来看，是有实际根据的。《德意志年鉴》和《莱茵报》刚一从哲学轉向政治，就被浪漫主义反动派迅速而彻底地加以摧毀，而“人民大众”对这场“精神”的“大屠杀”又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这一切都使得鮑威尔深信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看到，唯一的出路是回到純粹的哲学、純粹的理論、純粹的批判上

去，而在思想意識的九霄云外，他是不難把哲學捧為世界的全能主宰的。

《文學總匯報》的綱領，就其尚可理解的內容而言，曾由布魯諾·鮑威爾綜述如下：“迄今為止，歷史上的一切偉大活動之所以
126 从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實際成效的，就是因為它們引起了群眾的關懷和喚起了群眾的熱情。換句話說，這些活動之所以必然遭到非常悲慘的結局，是因為它們的主導思想是這樣一種思想：它必須滿足於膚淺的理解，因而也就必然指望博得群眾的喝采。”“精神”和“群眾”對立，是《文學總匯報》上所有的文章的中心思想。這個報紙說，精神現在已經知道它應該到哪裡去尋找它的唯一的對頭，——就是要到群眾的自我欺騙和軟弱無力中去找。

因此，鮑威爾的報紙對當代的一切群眾運動，對基督教和猶太教、赤貧現象和社會主義、法國革命和英國工業，都抱着一筆抹殺的蔑視態度。恩格斯在談到這個報紙的傾向時，他的評論還不算太不客氣：“它是一個老太婆，而且將來仍然是一個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無靠的黑格爾哲學。這個哲學搽脂抹粉，把她那干癟得令人厭惡的抽象的身體打扮起來，在德國的各個角落如飢似渴地物色求婚者。”^①黑格爾哲學確實已被鮑威爾兄弟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在黑格爾那里，絕對觀念只是事後才作為創造的宇宙精神出現在哲學家的意識中的，這樣，他實際上就是說，絕對精神只是在想像中創造歷史的。因此，黑格爾曾經十分堅決地防止一種錯誤的理解，即認為哲學家本人就是絕對精神。而鮑威爾兄弟和他們的信徒卻恰恰相反，他們以為自己就是批判的化身，絕對精神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2頁。

化身，而绝对精神是通过他们有意識地实现它的宇宙精神的作用，以与其余的人类相对立的。这种幻梦，即使在德国的哲学气氛中，也必然会很快地破灭，因为就是在“自由人”的圈子里，《文学总汇报》也受到相当的冷遇。不管是本来就袖手旁观的科本，还是施蒂纳，都没有参与这个报纸。施蒂纳甚至还暗中准备清算它。既然连梅因和鲁滕堡也拉不到，于是除了唯一的一个孚赫以外，鲍威尔就只得同“自由人”的第三等角色——一个荣格尼茨和一个笔名为施里加的普鲁士中尉馮·齐赫林斯基——为伍了。齐赫林斯基活到1900年才死去，死时是步兵上尉。不出一年，这整个海市蜃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一个人它为它哀悼。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批判《文学总汇报》的时候，它不但已经死去，而且已经被人遗忘了。

这个情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作的著作——《对 127 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是他们自己给它的命名），或《神圣家族》（这是出版人建议的名称）——是非常不利的。反对者立刻就嘲笑作者，说他们是在打落水狗。甚至恩格斯本人在接到印好的书时也表示说，书是好书，只是篇幅太大了。这本书在论述批判的批判时所持的那种极端轻蔑的态度，同它的二十二印张的篇幅大大地不相称。此外，恩格斯还认为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将是广大公众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将不会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在今天，这个见解比在当时还要正确。然而，这书现在却具有一种在它出版时所体会不到的、至少是不如现在体会得这样深刻的魅力。

一位现代的批评家在指出这书的一切缺点（如词句上的吹毛求疵、无谓的争论，甚至思路的骇人的迂回曲折）之后说，它包含着某些最辉煌的天才的流露；这些章节，以形式的精巧和语言的洗练

來說，是屬於馬克思的最優秀的著作之列的。

馬克思在該書的這些章節里，表現出是一個善于以事實擊敗空想的創造性批判的能手。這種批判，在它摧毀的時候也正是在創造，在它破壞的時候也正是在建設。馬克思以他關於法國唯物主義和法國革命的輝煌的論述，反駁了鮑威爾關於這些歷史現象的批判的空論。針對着布魯諾·鮑威爾關於“精神”和“群眾”、“思想”和“利益”的對立的胡言亂語，馬克思冷冷地反駁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任何在歷史上捍衛了自己的群眾利益，當它以思想的形式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時，總是遠遠地超出自己的實際界限，而和全人類的利益混同起來。這就是傅立葉稱之為每個歷史時代的色調的那種錯覺。“資產階級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決不是‘不成功的’，它‘壓倒了’一切，並獲得了‘實際成效’，儘管‘激情’已經消失，儘管這種利益用來裝飾自己的搖籃的‘熱情’之花也已經枯萎。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黨的斷頭台、拿破侖的劍，以及教會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① 資產階級在1830年¹¹³實現了他們在1789年的願望，所不同的只是，他們的政治啟蒙運動現在已經結束。他們不再通過立憲代議制來致力於實現理想國家、世界福利和達到全人類的目的，而是把立憲代議制看做他們的排他的權力的官方表現和他們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確認。只有對於那些其政治觀念不符合於其實際利益的群眾來說，這次革命才是失敗的。因此，他們的真正的生活原則和革命的生活原則並不一致。群眾獲得解放的現實條件，和資產階級借以解放自身和整個社會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03頁。

条件是根本不同的。

布魯諾·鮑威尔断言，国家把市民社会的各个原子连接起来。馬克思反駁他說，把市民社会的原子连接起来的是下面这个事实：他們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像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們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們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① 針對着鮑威尔輕視工业和自然界对历史認識的意义的論調，馬克思反問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論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初步的——对历史现实的認識嗎？“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維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②

正像馬克思在批判的批判面前捍卫法国革命一样，恩格斯在批判的批判面前捍卫英国工业。这里他所要对付的是年輕的孚赫，这人在《文学总汇报》的所有撰稿人当中还是比较重視尘世的现实的。看看恩格斯当时怎样正确地闡釋了資本主义的工資規律，是很有意思的；二十年后，当拉薩尔又提出这个規律的时候，恩格斯把它称做“腐朽的李嘉图規律”而打入地獄。尽管孚赫有着恩格斯所揭露的那樣一些重大錯誤，——他在1844年还不知道英国的結社法已經在1824年被廢除¹¹⁴，——但是恩格斯自己有时也有些在文字上吹毛求疵。他在一个主要之点上也犯了錯誤，虽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54頁。

② 同上书，第191頁。

129 这个錯誤和孚赫的恰恰相反。孚赫嘲笑艾釋黎勛爵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¹⁵，說它是不能根除罪惡的“肤淺的中庸的措施”，恩格斯却认为它是彻底激进的原則的一种表現（虽然是极微弱的表現），因为这种措施不仅能够砍伤对外貿易并从而砍伤工厂制度，而且能够挖它的老根。恩格斯以及馬克思当时都把艾釋黎勳爵的法案看成是把反动枷鎖套在大工业头上的一种企图，而这个枷鎖必然要在資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碎^①。

恩格斯和馬克思都还没有完全摆脱他們的哲学的过去。在序言的一开头，他們就提出費尔巴哈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来反对布魯諾·鮑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他們无条件地承认費尔巴哈的天才結論，承认他为批判一切形而上学創造了偉大而巧妙的基本原理的功績，承认他用人来代替了旧的哲学廢品，包括那无限的自我意識。但是他們通过費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前走得更远，走向了社会主义；通过抽象的人走向了历史的人，并且以惊人的洞察力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最复杂的問題。他們揭露了飽食終日的資產階級玩弄社会主义詞句的秘密。甚至人們的貧困和被迫接受布施这种最深的耻辱，也成了金錢貴族和文化貴族的賞心乐事，使他們的利己主义得到滿足，挑逗起他們的自大狂。法国和德国的大批慈善团体，英国的許多以慈善为目的的唐·吉訶德式的义举，形形色色的音乐会、舞会、演出、舍飯，乃至为救济受災者举行的募捐等等，其意义都在于此。

在偉大的空想主义者当中，傅立叶对《神圣家族》的思想影响最深。但是恩格斯已經能够把傅立叶和傅立叶主义区别开来；他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3—18頁。

說，被稀釋了的傅立叶主义，即«Democratie pacifique»〔《和平民主日报》〕所宣揚的傅立叶主义，无非是一部分資產階級慈善家的社會學說而已。他和馬克思总是一再強調連那些偉大的空想主義者也不理解的东西：历史的发展，工人階級的独立的运动。恩格斯在反駁埃德加爾·鮑威爾時寫道：“批判的批判什麼也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一切，甚至以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會使得整個批判感到羞愧。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這一點。”^①而對於那臭名遠揚的所謂“精神”和“群眾”的互不相容的对立，馬克思駁斥說，廣大群眾的运动在實踐上从一开始就是和空想主義者們的共產主義批判相適應的。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須知道法國和英國的工人的勤勉好學，他們的知識欲、精神力量和不倦地追求精神發展的渴望。

因此，對於埃德加爾·鮑威爾在《文學總匯報》上翻譯蒲魯東著作的拙劣譯文，特別是他的那些曲解蒲魯東的荒謬的評注，馬克思感到特別強烈的憤慨，這是可以理解的。當然，那種認為馬克思在《神聖家譜》中頌揚蒲魯東而幾年以後又猛烈抨擊他的說法，不過是一種學究式的詭辯罷了。馬克思只是反對埃德加爾·鮑威爾抹殺蒲魯東的真正功績的那些空論。馬克思承認蒲魯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开辟了新途徑，正如他承認鮑威爾在神學批判領域內有着同樣的功績一樣。但同時，馬克思攻擊布魯諾·鮑威爾對待神學問題的狹隘性，也攻擊蒲魯東對待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狹隘性。

蒲魯東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观点把私有制看成是一種內在矛盾，而馬克思反駁他說：“私有制，作為私有制來說，作為富有來說，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2頁。

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对立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①

同时，马克思坚决地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当他把这种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43—44页。

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时，他是在把无产阶级看作神。他说：“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① 马克思并且一再着重指出，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不断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确的地步。

在《神圣家族》中，除了不断涌出生命之流的许多清新的泉源以外，也可以遇到一些荒蕪的不毛之地。论述可敬的施里加的了不起的智慧的长长的两章就是这样的，这两章对读者的耐性简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要最公正地估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书，就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45页。

該把它看成是一部即興之作，而它顯然也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就在恩格斯和馬克思初次面識的那些日子里，他們在巴黎收到了《文學總匯報》的第八期，在這裏面，布魯諾·鮑威爾企圖隱晦地然而非常尖刻地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鑑》上所闡述的觀點。

大概就在這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用一種輕鬆活潑的諷刺筆調寫一本小冊子來回答他們的老朋友，並且打算把它儘快地出版。恩格斯當真馬上就寫完了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總共只有一個印張多一點，而當他知道馬克思把書寫到二十個印張的時候，他不禁大吃一驚。使他感到“奇怪”和“滑稽”的是，這本書他只寫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他的名字却也印在扉頁上，甚至排在馬克思的名字前面¹¹⁶。顯然，馬克思是以他平素的那種認真徹底的方式來進行這件工作的，就像一句有名的並且非常正確的老話所說的，他大概沒有時間把它弄短；此外，也可能是他有意把這部東西寫得很長，以便利用超過二十印張的書籍所享有的免于檢查的規定。

《神聖家族》的作者們告訴讀者，他們的這本論戰性著作不過是一些獨立的著作的先聲，在這些獨立的著作中，他們將各自闡述自己對現代哲學和社會學說的态度。他們的這個意圖是如何地嚴肅認真，從下面這個事實就可以看出，當恩格斯接到《神聖家族》的第一本樣書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這些獨立著作中的頭一部著作的初稿。

(四) 社會主義的奠基

這部著作就是 1845 年夏天由《德意志年鑑》的前出版人維干

德在萊比錫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几个月以前，維干德出版了施蒂納的《唯一者》^①。当施蒂納这个黑格尔学說的末代后裔在論述資本主义竞争的肤淺理論时，恩格斯却在自己的书中为那些通过費尔巴哈及其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揚棄而走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几乎所有的——德国理論家打下了基础。他描写了英国工人階級的可怕的、然而正是資產階級統治下典型的真情实况。

当恩格斯在差不多五十年之后再版这部书的时候，他把它叫做現代国际社会主义在胚胎发育中的一个阶段¹¹⁷。他說，正如人的胚胎在发育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現我們的祖先魚类的鳃弧一样，同样，在这本书中也到处可以找到現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但是，这一点只是在下述限度之內才是真实的，即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这些痕迹已經比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里少了。在这本书里，恩格斯已不再談到布魯諾·鮑威尔，不再談到費尔巴哈，而关于“朋友施蒂納”，也只提到过几次，和他开开小玩笑。可以說，德国哲学对这本书的主要影响决不是落后的，而无疑是进步的。

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决不在于它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統治下的英国无产階級的困苦状况的描写。在这方面，恩格斯有毕萊、盖斯克尔等他常常征引的先驅者¹¹⁸。甚至他对于那个使工人群众遭受最可怕的苦难的社会制度的由衷憤怒，他对这种苦难的动人心魄的真实描写，他对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牺牲者的深厚而真挚的同情，——甚至这一切也不是他这部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这部

^① 指 M. Stir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 1845年在萊比錫出版。

书中最令人惊叹并且从历史上看来最有意义的是，这位二十四岁的作者如此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并且根据这种了解不仅说明了资产阶级的上升，而且说明了它的不可避免的衰亡，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的贫困，而且说明了它摆脱贫困的前景。这部书的目的在于指出，大工业怎样产生了现代工人阶级，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失去人的资格的、降低到一般动物水平的、在生理上备受摧残的种族；以及现代工人阶级怎样由于历史的辩证法（他分别地阐释了历史辩证法的各个规律）而正在成长并且必然要成长到能够推翻自己的创造者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就是无产阶级在英国取得统治权的道路。

134 但是，只有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自己的血肉并且能够把它从头足倒置的状态搬正过来的人，才能作出这种研究。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这部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而这也正是作者的意图。不过，当恩格斯的书问世时，它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它所包含的纯属事实的内容。如果说，像一位学究老爷带着可笑的自负所说的那样，恩格斯的书使社会主义“有资格上大学”，那末这不过是说，曾经有不只一位大学教授在这部书上碰折了自己生锈的长矛。使得博学的批评家们洋洋得意的，首先是恩格斯曾经预言的那个即将来临的英国革命毕竟没有发生。但是，恩格斯本人在五十年后完全有理由说，他感到奇怪的不是他以“青年人的热情”所作的某些预言没有实现，而是它们竟实现了那么多，虽然不像他所推测的那样是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的。

在今天看来，这种对“不久的将来”寄托了很多希望的“青年人的热情”，正是恩格斯这部书的一个最大的魅力。没有这个阴影，

就显不出这部书所放射的光芒。天才的眼光在从现时遥望将来时，要比“健全的”理性看的清楚得多，因而也逼近得多。“健全的”理性很难习惯于午饭桌上不一定有汤这种想法。另一方面，当时除了恩格斯以外，许多人都认为，英国革命已经迫在眉睫。甚至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喉舌《Times》（《泰晤士报》）也是这样说的。但是那些心地不干净的人只是害怕革命中的烧杀抢掠，而社会主义者的先知的眼睛却看到了从旧事物的瓦砾中生长起来的新生命。

1844年尾到1845年初的那个冬天，恩格斯的“青年人的热情”不仅表现在这一部书上。当他在铁砧上打造这部书的时候，在他的炉火上还锻炼着新的铁块：除了这部书的续篇（按照恩格斯的打算，它应当成为一部更大的英国社会史著作的一章）外，恩格斯还打算同莫泽斯·赫斯一起出版一种社会主义月刊，然后再出版外国社会主义作家的丛书，写批判李斯特的文章，以及其他许多工作。他不住地催促马克思一起工作，因为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计划。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思想已经成熟，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要像我那样干，给你自己规定一个期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斯塔德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
135
须尽快出版。”^① 甚至对于使他“大吃一惊”的《神圣家族》的庞大篇幅，他也自慰地认为这也不坏。他写道：“现在就把这样多的东西发表出来，那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否则，谁知道它还会在你的写字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8页。

台里擱多久呢。”^①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他有多少次不得不用同样的话来催促马克思啊！

尽管恩格斯在催促马克思写作时是缺乏耐性的，但是当马克思的天才进行着艰苦的自我斗争时，当马克思为生活坎坷所折磨时，他却以最大的耐性帮助马克思。马克思被逐出巴黎的消息一传到巴门，恩格斯就认为有必要为他筹措款项，他说：“让我们按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分担你所付出的额外开支吧。”他通知马克思说，筹款“进行得很顺利”，又说：“我不知道这个数目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因此，我的第一部关于英国的东西的稿费，我当然非常乐意交给你去支配。这笔稿费我不久就能收到，至少是收到一部分，而我自己没有它也过得去，因为我可以向我父亲借。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使你陷于经济困难而感到快意。”^②

尽管恩格斯在他的青年时代的书信里用了这样轻松愉快的口气，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却决不是轻浮的。他那样毫不在乎地提到的“第一部关于英国的东西”，在七十年当中一直是一部极有份量的著作。它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当恩格斯写这部书并且用它把那些学院的假发拍打得尘土飞扬的时候，他不过二十四岁。但是恩格斯不是那种在温室里很快地开花结果而后又更快地雕谢的早熟的天才。他的“青年人的热情”是发自崇高思想的真正不熄的火焰，这火焰温暖着他的老年，正如它曾经燃烧着他的青春一样。

当时，他在父母家中过着一种只有“头号的庸人”才能希求的“虔敬而按部就班的宁静生活”。但是他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7页。


只是他年老的父母的“愁眉苦臉”才使他再一次回到商业方面来。但是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在春天离开，首先到布鲁塞尔去。由于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巴門和爱北斐特的共产主义宣傳活动，他的“家庭糾紛”更加严重了。他写信給馬克思，談到共产主义者的三次集会，第一次参加的有四十人，第二次一百三十人，第三次二百人。他說：“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共产主义成了人們的主要話題，每一天我們都有新的信徒。烏培河谷的共产主义已經成为事实，并且几乎已經成为一种力量。”^①当然，这种“力量”在警察的一道命令之下就烟消云散了，而且它本来就显得够奇怪的。恩格斯自己就說过，只有无产階級才站在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外边，而“最愚蠢、最庸俗、最无所用心的人們，对世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的人們，却开始对它热心起来了”^②。

这一点和恩格斯在同一时期关于英国无产階級的前途所說的那些話是不相称的。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从头到脚都了不起的人，他永远向前，朝气蓬勃，目光銳敏，孜孜不倦，同时又脫不了那种同热情而勇敢的青年十分相称的可爱的稚气。



①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 卷，第 18 頁。

② 同上。



第五章 亡命布魯塞爾

(一)《德意志意識形態》

137 被逐出巴黎之后，馬克思帶着他的家人遷居布魯塞爾。恩格斯擔心他在布魯塞爾也會遇到麻煩；確實，馬克思在那里从一开始就受到刁難。

馬克思在給亨利希·海涅的信中說，他剛一來到布魯塞爾，就被傳到“社會治安機關”去，要他提出不發表評論比利時政局的任何言論的書面保證。馬克思坦然地簽署了這個保證，因為他既不打算、也不可能過問這些事情。但是，普魯士政府繼續向比利時當局提出驅逐馬克思的要求。由於這個緣故，馬克思就在這一年（1845年）的12月1日脫離了普魯士國籍。

在當時以及後來，馬克思始終沒有取得任何其他國家的國籍，儘管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為了對他表示敬意曾在1848年春天向他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像海涅一樣，馬克思不願取得外國國籍；而弗萊里格拉特，這位常被人們提出來給這兩個“沒有祖國的人”做德意志愛國主義榜樣的人，在亡命英國期間，卻毫不猶豫地歸化了英國。

1845年春天，恩格斯也到了布魯塞爾。兩位朋友一起到英國去^①，為了研究英國而在那里作了六個星期的旅行。馬克思在巴黎

時已經開始研究麥克庫洛赫和李嘉圖，而在這次旅英期間，他更深入地研讀了英國的經濟學文獻。但是據馬克思自己說，他這一次只讀了一些在曼徹斯特能夠弄到的書，以及恩格斯所收藏的著作¹³⁸和抄本。

恩格斯在他第一次居住英國期間已經給羅伯特·歐文的刊物《New Moral World》（《新道德世界》）和憲章派的報紙《Northern Star》（《北極星報》）寫稿了。他利用這第二次的旅行來恢復一些舊日的交誼。因此，兩位朋友同憲章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者建立了新的關係。

在這次旅行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開始合寫一部著作。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後來言簡意賅地寫道：“我們決定共同鑽研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思想體系的見解之間的對立，實際上是清算一下我們過去的哲學信仰。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八開本兩厚冊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稿子已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這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把原稿留給老鼠用牙齒去批判了。”^①老鼠果真完成了這個任務，不過原稿殘留的部分也足以說明，為什麼作者本人對於自己的不走運並未感到十分傷心。

如果說他們過去清算鮑威爾兄弟的那部過於詳盡的著作對讀者說來已經是一個夠堅硬的胡桃，那末這個篇幅達五十印張的兩厚冊巨著就是更加堅硬的胡桃了。這部著作的標題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

① 大約在1845年7月12日。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10頁。

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①。恩格斯后来根据回忆断定，单单是批判施蒂納的那一部分，篇幅就有施蒂納本人的书那样大。而《德意志意識形态》的已經出版的片断，证明恩格斯的記憶是不錯的。这部著作甚至是比《神圣家族》中最枯燥的部分都更加冗贅煩瑣的“超論爭”。此外，虽然这里也有时出現沙漠中的綠州，但比起《神圣家族》来要少得多。而当辯证法的鋒芒在个别地方显现的时候，它也很快就被瑣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爭論所代替了。

当然，我們現在的鉴赏力比那时是更苛刻了。但是这并不足以說明一切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較早期的和較晚期的著作，甚至就是同时的著作，都足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他們是具有进行精辟鋒利的批判的輝煌才能的，而且他們的行文向来絕少冗长煩瑣的毛病。这一次的情况可以这样来解釋，即当时这整个思想斗争是在少数人的小圈子里展开的，而且这些人又大都非常年輕。同样的現象在文学史上，在莎士比亚以及与他同时代的戏剧家們身上也可以看到。从論敌那里断章取义地摘出一段文字，然后像对付野兽一样加以穷追猛打。用望文生义或随意曲解論敌的思想的办法，极力使这个思想具有尽可能愚蠢的含义。所有这一切手法，也像漫无边际的夸大傾向一样，都不是以广大观众为对象的，而是以內行人的洞烛隱微的理解为对象的。莎士比亚的妙語所以有时是我們所不能品味或甚至不能理解的，就是因为莎士比亚在創造它們时有意无意地考虑到格林、馬洛、約翰遜、弗勒彻和波蒙会怎样想。

^① 1932年苏联第一次出版德文版，1933年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出版俄文版。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

当馬克思和恩格斯同鮑威尔、施蒂納以及其他玩弄純思維把戏的老伙計們打交道的時候，他們有意或無意地使用的那種筆調，大抵也出于這個原因。如果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於費爾巴哈說了些什麼，那一定是更有教益的，因為在這裡問題會不僅僅限於純粹否定的批判。可惜，該書的這一部分始終沒有完成。不過，馬克思在1845年所寫的而由恩格斯在幾十年後發表的關於費爾巴哈的警句^①卻在這方面使我們有足夠清楚的了解。馬克思在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里面發現了他在學生時代從唯物主義的始祖之一德謨克利特那裡發現的同樣缺點，缺乏“能動的原則”。按照馬克思的見解，以往的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發展了，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 140 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的。換句話說，費爾巴哈在拋棄整個黑格爾時，把不該拋棄的東西也拋棄了。任務是在於，把黑格爾的全部革命化的辯證法從觀念世界轉移到現實世界來。

還在巴門的時候，恩格斯就以他所特有的果敢作風寫信給費爾巴哈，請他站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費爾巴哈作了友好的回答，但是拒絕了——至少是在當時——他的建議。費爾巴哈答應說，如果他能辦到，他將在夏天到萊茵省去。於是恩格斯希望，屆時將“說服”費爾巴哈務必也搬到布魯塞爾來。同時，恩格斯介紹費爾巴哈的一個學生海爾曼·克利蓋去見馬克思，說他是一位“出色的

^① 指《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3—6頁。

鼓动家”¹¹⁹。

但是費尔巴哈并没有去萊茵，而他不久后发表的著作表明，他根本不会脱掉自己的“旧靴子”¹²⁰。費尔巴哈的学生克利盖也令人大为失望。誠然，他曾經把共产主义学說远涉重洋地带到美国去，但是他在紐約的胡作非为，对那些开始集結在馬克思周圍的侨居布魯塞尔的共产主义者发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在計劃写的这部书的第二卷中討論各式各样的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并且对“德国社会主义的一切荒誕不經和枯燥乏味的文献”給以毁灭性的批判。

这是指的莫澤斯·赫斯、卡尔·格律恩、奥托·吕宁、海尔曼·皮特曼以及其他一些作家，这些人写过相当多的著作，包括在許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杂志就是：1845年夏到1846年夏出版的月刊《Gesellschaftsspiegel》（《社会明鏡》）；1845年和1846年出版的两卷年刊《Rheinische Jahrbücher》（《萊茵年鉴》）和《Deutsches Bürgerbuch》（《德国公民手册》）；从1845年創刊一直出到德国革命时期的《Westphälische Dampfboot》（《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月刊；还有几种日报，如《Triersche Zeitung》（《特利尔日报》）等。

卡尔·格律恩有一次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諷刺地借用了这个名称）的这种怪現象，存在的時間并不长。
141 到1848年，“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已經无影无踪了，随着革命的第一声枪响，这个派別就自行消失了。它对馬克思的思想发展沒有

发生过任何影响，因为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它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显示出馬克思比它高超。但是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作的严厉的裁判，却并不能充分表明馬克思对它的态度。有一个时期，馬克思认为尽管“真正的社会主义”有那样多的荒謬之处，但它还是能酿出好酒来的。恩格斯也抱着同样的見解，而且更加坚持。

恩格斯曾和莫澤斯·赫斯一起出版《社会明鏡》杂志，馬克思也曾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在布魯塞爾时代，他們两人都同赫斯合作过，而且有一个时期赫斯似乎已經完全領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馬克思有好几次想邀請亨利希·海涅給《萊茵年鉴》写稿。如果不是馬克思本人，那末至少是恩格斯曾經在皮特曼出版的《萊茵年鉴》和《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过文章¹²¹，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給《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写过稿。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德意志意識形态》第二卷中到目前为止曾发表出来的唯一的一节；对于卡尔·格律恩关于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一部杂文式的著作的彻底而尖銳的批判^①。

“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是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中产生出来的；由于这个緣故，有时候人們断言，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最初也是屬於“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派的，因此他們后来才那样严厉地批判它。但是这种說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确实，双方都是从黑格尔和費尔巴哈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对法国革命史和英国工业发展的研究来研究社会主义的，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只是滿足于把社会主义的公式和标語口号翻譯成“陈腐的黑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573—628頁。

格尔式的德語”。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超过这种水平，而且相当公正地把这整个派别看成是德国历史的产物。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格律恩及其伙伴们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关于人的本质的实现空洞思辨——拿来同康德的观点相比，因为康德也是把法国大革命的意志表现仅仅理解为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这种比较，无疑是对格律恩等人的莫大尊重。

142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导师般地关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表现了巨大的耐心，但是也很严格。1845年恩格斯同赫斯合编《社会明镜》的时候，他对善良的赫斯的许多做法容忍迁就，虽然这些做法肯定是极不合他的心意的。但是到了1846年，恩格斯就在《德国公民手册》上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大伤脑筋了。“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的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沒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化，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①恩格斯就是这样评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

决定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态度的首先是

^① 参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卷，第859頁。

无产階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者当中，他們攻击得最厉害的是卡尔·格律恩。这不仅仅因为格律恩事实上暴露的弱点最多，而且因为格律恩住在巴黎，在工人当中造成了极有害的混乱，并且对蒲魯东发生了很坏的影响。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上用极端尖銳的詞句和对他們的旧友赫斯的毫不含糊的諷刺清算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在国际无产階級当中展开实际的鼓动工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原諒“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一套笨拙的小学生作业看得极为郑重庄严，并且大言不慚地加以吹嘘”的那种“自命博学的天真”，但是不能原諒他們对政府的所謂支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想把資产階級反对三月革命以前的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斗争当作“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从背后攻击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真正的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从——僧侶、学監、頑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順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資产階級的一个稻草人。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鞭子枪彈 143 給德国工人起义吃苦头的时候所加的甜味罢了。”^①这些话实际上是大大夸张了的，而对所涉及的这几个人来说是完全不公平的。

馬克思本人曾在《德法年鉴》上指出了德国的特殊情况：資产階級如果不同时引起无产階級对自己的反抗，它就不能反抗政府。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自由主义还具有革命性的地方支持它，在它已經变得反动的地方反对它。在某些場合下，这个任务是很不容易完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时候把自由主义当作仍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96—497頁。

是革命的而加以支持，实际上它已經是反动的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則常常陷到相反的方向去；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譴責自由主义，而这样做只能使政府高兴。在这方面卡尔·格律恩犯的錯誤最大，莫澤斯·赫斯和他差不多，而《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的主編奧托·呂宁錯誤最小。但是不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有多大的過錯，他們的過錯总还是由于愚蠢和无知，而絕不是由于想支持政府。在他們的一切隱想受到死刑宣告的革命期間，所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站在資產階級左翼方面。不用說曾經在德国社会民主派队伍中作战的赫斯，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其他代表者，也沒有一个人投到政府方面去。在这一点上，他們是問心无愧的，这是其他所有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社会主义，不論是当时的或現在的，都不能相比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厚的敬意，即使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們感到难堪的时候，他們仍然把自己的刊物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他們之所以沒有能够改掉自己的老毛病，这不是由于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而是由于明显的思想混乱。他們喜欢全世界的庸人都爱唱的那个老調：靜靜地，靜靜地，不要喧鬧；也就是說，一个年輕的党不應該过于严格；如果爭論是不可避免的，那末至少也應該溫文尔雅地进行，避免过激，不要冲撞对方；对于像鮑威尔、卢格、施蒂納这样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必須照顾情面，等等。这一切当然都不是馬克思所喜欢的。有一次馬克思在談到这一点时說：“这些老太婆的特点是，他們想把所有真正的党派斗争都掩飾一下并且加一点糖……”^①。但是在有些場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4頁。

合下馬克思的这些健康的观点也得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同 144
情。例如，和吕宁有亲戚关系并且同他合編过《威斯特伐里亚汽
船》的約瑟夫·魏德迈，就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的拥护者
之一。

魏德迈原是普魯士军队里的炮兵軍官。由于政治信仰的关
系，他辞掉了軍职，在卡尔·格律恩思想影响下的《特利尔日报》任
副主編，落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圈子。1846年春天，不知是
为了专誠拜訪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由于其他原因，魏德迈来到布
魯塞爾。总之，他很快就同他們接近，并且坚决反对因馬克思和恩
格斯的无情批判而发出的一片叫囂，尽管他的姻亲吕宁也参加了
这种叫囂。魏德迈出生在威斯特伐里亚，是一个稳重而略微有些
迟鈍的人，有着威斯特伐里亚人出名的那种忠厚而坚毅的特性。
他没有什么突出的文才。回到德国以后，他当了科倫——明登铁
路修建工程的測量师，只是在工作的余暇才去参加《威斯特伐里亚
汽船》的編輯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天生的实践家，他还极力帮助馬
克思和恩格斯解决另一种越来越感到迫切的需要：为他們寻找一
个出版家。

由于卢格从中捣鬼，苏黎世的“文学社”已經对馬克思和恩格
斯关了門。虽然卢格明知馬克思不会写出什么坏作品来，他却逼
迫他的合伙人弗呂貝尔同馬克思断絕一切关系。青年黑格尔派的
主要出版人，萊比錫的书商維干德，早就拒絕出版批評鮑威尔、費
尔巴哈和施蒂納的著作了。所以，当魏德迈在自己的故乡威斯特
伐里亚找到两个富有的共产主义者（他們的名字是尤利烏斯·迈
耶尔和雷姆佩尔）同意为創辦一家出版社提供所需的資金时，馬克
思和恩格斯真是高兴異常。事情立刻就准备大張旗鼓地办起来。

他們打算馬上至少出版三種書刊，《德意志意識形態》，社會主義作家叢書，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合編的季刊。

然而，輪到要拿錢的時候，這兩個資本家却違背了他們不僅對魏德邁、而且對赫斯作過的諾言，縮回手去了。偏巧在這時發生了一些“業務上的困難”，使得他們不能用事實證明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的精神。145 這樣一來，魏德邁（他本人當然也不希望這樣）就給馬克思和恩格斯帶來了巨大的失望。更使他們失望的是，魏德邁曾把《德意志意識形態》交給其他許多出版者，但是都沒有成功；於是為了幫助馬克思解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他在威斯特伐里亞的同志當中募集到幾百法郎。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進一步跟他交往當中很快就忘記了這些幫倒忙的事情，這一點也足以說明他的誠實和正直。

但是不管怎樣，《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手稿現在只好“留給老鼠用牙齒去批判了”。

（三）魏特林和蒲魯東

遠比對於黑格爾以後的哲學家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批判更富於戲劇性和更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是馬克思同兩位天才的無產者的衝突，這兩個人在他活動的初期曾對他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魏特林和蒲魯東都出身於工人階級，都有着健全堅強的性格和豐厚的天賦。他們兩人的環境又都是這樣有利，以致他們很可能毫不費力地成為那少數例外者的範例，這些例外者抱著一種庸俗的信念，認為工人當中每一個有才能的人都有機會上升到有產

階級的地位。但是魏特林和蒲魯東兩人都摒棄了這條道路，自願地選擇了窮人的命運，以便為自己的同階級和共患難的弟兄們進行鬥爭。

他們兩人都生得身材魁梧，儀表堂堂，精力充沛，仿佛天生來就是為了享受生活的一切樂趣的。但是他們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却甘願忍受最難堪的困苦。“一張狹窄的床，時常是三人合住一間的小房間，一塊權當書桌的粗糙木板，有時候有一杯黑咖啡，”——當魏特林的名聲使世間的當權者戰慄的時候，他就是這樣生活的。而當蒲魯東已經成為全歐洲聞名的人物時，他在巴黎的一間斗室裡也過着同樣的生活：“身穿一件毛織衣，腳踏一雙呱達呱達響的木屐。”

兩人身上都交融着德國的和法國的文化。魏特林是一個法國軍官的兒子，剛一成年，他就趕到巴黎去汲取法國社會主義的源泉。蒲魯東生在古老的勃艮第伯國，這個伯國在路易十四時期曾併入法國。人們常責備蒲魯東說，他有着一副德國人的頭腦，甚至是德國人的混亂的頭腦。不管怎樣，當蒲魯東的精神自覺剛一覺醒，他就嚮往着德國哲學，而相反地，魏特林卻認為德國哲學的代表僅僅是一些“雲霧播散者”。另一方面，蒲魯東找不到足夠尖刻的字眼來表達他對偉大的空想主義者們的否定態度，而魏特林則相反，認為自己的一切最好的東西都應歸功於這些空想主義者。 146

魏特林和蒲魯東享有同樣的榮譽並且遭到同樣的命運。他們是在歷史上向世界證明了工人階級的崇高精神和力量，證明了現代工人階級能夠自謀解放的第一批現代無產者。他們首次打破了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在這以前所陷入的那個迷魂陣。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活動是劃時代的，他們的創作和鬥爭是後來幾代戰士們

的榜樣，他們對萌芽的科學社會主義發生了有益的影響。沒有人比馬克思更多地贊許過魏特林和蒲魯東的初期活動。在他看來，蒲魯東和魏特林乃是他批判地克服了黑格爾哲學以後通過思辨而達到的那些思想的化身。

但是，上面已經說過，魏特林和蒲魯東不但享有同樣的榮譽，而且也遭到同樣的悲慘命運。儘管他們看得深，看得遠，魏特林終究是一個德國的手工業者，而蒲魯東也不過是一個法國的小資產者。因此他們終於同那個卓越地完成了他們所輝煌地開始了的事業的人分手了。造成分歧的原因不是個人的虛榮，不是任性的執拗，雖然也許後來隨着魏特林和蒲魯東開始感到歷史發展的潮流把他們推上淺灘，這種動機也出現了。魏特林和蒲魯東同馬克思的衝突表明，他們根本就不理解他所追求的是什麼。他們受着一種狹隘的階級意識的支配，而正因為這種狹隘性是他們所不自覺的，因此它才更其頑強。

1846年初，魏特林來到布魯塞爾。他在瑞士進行的鼓動由於內部矛盾而陷於停頓，後來又招致了野蠻的迫害。於是he到倫敦去，但是在那裡又不能同正義者同盟的人們很好的相處。為了要擺脫無情的命運，他自命為先知，但是正因為如此，他變成了無情的命運的犧牲品。這時候，憲章運動¹²²的浪潮在英國正日益高漲。但是魏特林沒有投身於這個運動，卻埋頭研究他的一套思維和語言的體系，並且計劃創立一種世界語。這種玩意竟成了他的癖好。
147 他輕率地擔負起這些時常是他不能勝任的任務。由於這一點，他變得越來越孤癖，離開了他的力量的真正源泉——他自己的階級的現實生活。

遷居到布魯塞爾，無論如何是魏特林所採取的一個最明智的

步驟，因為如果說還有什么人能够在思想方面挽救他的話，那末這人就是馬克思。馬克思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這一點不僅恩格斯談到過，就連魏特林本人也談到過。然而，他們之間在思想上的相互理解終于是不可能的。1846年3月30日，在布魯塞爾共產主義者的一次集會上，馬克思和魏特林之間發生了非常激烈的沖突。這場沖突是由魏特林的使人難堪的攻擊引起的，正如他自己在給赫斯的信中所談到的那樣。當時正在就組織一個新的出版社進行洽商，魏特林忽然硬說馬克思要切斷他的“經濟來源”，要獨攬“報酬優厚的翻譯工作”。但就是在這以後，馬克思還是繼續盡力幫助魏特林。5月6日，赫斯也是根據魏特林自己的話，從佛爾維耶寫信給馬克思說：“雖然你和魏特林發生了沖突，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對他緊閉你的錢袋，只要那里面還有一點東西。”然而馬克思的錢袋里確實已經寥寥無幾了。

但是幾天以後，魏特林就把事情弄到無可挽回的決裂的地步。海爾曼·克利蓋在美國進行的宣傳既有負於流亡者的期望，也有負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期望。克利蓋在紐約出版的《Volks-Tribun》（《人民論壇》）周刊，除了幼稚地夸大的和荒誕的感傷主義而外一無所有。這個周刊當然是和共產主義原則毫不相干的，它在工人隊伍當中起了直接敗壞士氣的作用。更糟的是，克利蓋竟向美國的富豪們寫了一些荒唐的懇求信，為他的雜誌乞討幾塊美元。同時，他自稱是德國共產主義在美國的著作界代表。這樣一來，共產主義的真正代表們自然認為有必要抗議這種有損名譽的牽連了。

5月16日，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朋友們決定以通告的形式向同志們發表這種列舉理由的抗議，並且想把這份通告首先

寄給克利盖的杂志去发表¹²³。只有魏特林提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借口，不願意在这份抗議上签字。他說：《人民論壇》是完全适合于
148 美国条件的共产党的机关报。共产党在欧洲本身已經有这样多的强敌，它不必再对美洲举起武器，尤其是不應該在那里掀起一場兄弟相殘的战争。魏特林还不满足于拒絕參加抗議，他还写信給海尔曼·克利盖，要他防备“恶毒的阴谋家們”。他写道：“这个臭名昭著的同盟，大概是由十二个或者二十个人組成的，它拥有十分雄厚的資財。他們只有一种怪念头：把我当作反动派来斗争。首先他們要砍掉我的头，然后砍掉其他人的头，然后再砍掉自己朋友们的头；最后这些先生們就动手互相割断喉管。……他們現在有大批的錢来干这些阴谋，而我却找不到一个出版人。我和赫斯完全站在这伙人以外；但是赫斯也像我一样，是失寵被黜的。”在他写了这封信以后，連赫斯也同这个步入迷途的人断絕了来往。

克利盖发表了布魯塞尔共产主义者的抗議书，这份抗議书后来又由魏德迈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轉載。但是克利盖同时刊登了魏特林的信，或者至少是其中最激烈的部分，作为一种抵消。此外，克利盖还說服全国改革协会¹²⁴——把克利盖的周刊当作自己的机关报的德国工人組織——聘請魏特林为編輯并寄旅費給他赴美。于是，魏特林就从欧洲消失了。

就在同一个5月里，馬克思和蒲魯东的决裂也酝酿成熟了。由于沒有自己的机关报，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就发行鉛印的或石印的通告（就像反克利盖的通告那样），来尽可能地弥补这个缺陷。同时，他們竭力在有共产党人居住的那些大城市設置常任的道訊員。布魯塞尔和倫敦已經有这样的通訊委员会¹²⁵，在巴黎也准备設立。馬克思請求蒲魯东同他合作。蒲魯东在1846年5月17日从

里昂寄出的信中表示同意，并且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不能保证常写和多写。但是同时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自己的收信人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訓話，这篇訓話使馬克思看到了他們之間的鴻沟已經深到什么程度了。

蒲魯东写道：“在經濟問題上，我現在宣揚的几乎是絕對的反教条主义。”他坚持地劝告馬克思不要墮入他的同胞馬丁·路德所曾墮入的那种矛盾，因为馬丁·路德在推翻了天主教神学以后馬上就热心地举起了新教神学的旗帜，并且一味濫施革教和破門的手段。“不必用制造新的思想混乱来給人类增添新的麻煩；我們應該給世界树立一个明智的和眼光远大的寬容精神的榜样；我們不要 149 要扮演一种新宗教的使徒的角色，即使这种宗教是邏輯和理性的宗教。”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蒲魯东对待理論上的混乱的态度是馬馬虎虎的，而在馬克思看来，消灭这种混乱乃是共产主义宣傳取得成功的首要前提。

对于自己曾經长时期相信过的革命，蒲魯东現在連听也不願听了。“我宁肯用文火燒毀私有制，也不願为有产者安排一个巴托罗繆之夜¹²⁶，从而使私有制获得新的力量。”蒲魯东表示将在他的已經印好一半的著作中詳細地論述如何解决这个問題。馬克思可以在这部著作出版后对它大張撻伐，蒲魯东保证心平气和地加以接受，而准备随后給以报复。“我必須順便告訴您，法国工人階級的意願显然是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的；我国的无产者对知識的渴望是这样地强烈，倘若有誰除了血以外不能給他們別的飲料，那他們就会对他老实不客气。”最后，蒲魯东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卡尔·格律恩。这是对馬克思的一封信的回答，馬克思曾在这封信中要蒲魯东提防格律恩对黑格尔学說的曲解，蒲魯东写道，由于他不

懂德語，他不得不依靠格律恩和艾韋貝克來研究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著作，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格律恩還打算把蒲魯東最近的著作譯成德文。蒲魯東請馬克思幫助推銷這本書的德文版，說這對大家都會是榮幸的。

蒲魯東這封信的結尾簡直帶有挖苦的意味，雖然他也許并非有意開罪于馬克思。無論如何，當蒲魯東舞文弄墨地把馬克思描繪成一個嗜血者的時候，這對於馬克思很難說是愉快的。而卡爾·格律恩的功勞只是加深了這種不滿。

由於這個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恩格斯決定在1846年8月暫時遷往巴黎，擔負起該城的通訊聯絡工作，因為巴黎仍舊是共產主義宣傳的最重要的中心。此外，還必須讓巴黎的共產主義者了解同魏特林決裂的事，關於在威斯特伐里亞辦出版社的事，以及其他一些當前的重大事件。其所以需要這樣做，主要是因為艾韋貝克、特別是貝爾奈斯不能勝任巴黎共產主義者的堅強可靠的領導。

開頭，恩格斯寄給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和寄給馬克思本人的報告，都還充滿着樂觀的情緒，但恩格斯漸漸開始明白，格律恩已經把事情徹底“搞糟”了。秋天，蒲魯東的新著出版了；這部著作表明，正像作者的那封信所預示的那樣，他已經完全陷入了泥坑。馬克思於是按照蒲魯東表示過的願望，毫不遲延地對它“大張撻伐”。但是蒲魯東有言在先的報復卻沒有隨着出現，如果不算他作為回答的一通謾罵的話。

(四) 歷史唯物主義

蒲魯東給自己的書定名為《經濟矛盾的體系》，副標題是《貧困

的哲学》。馬克思作为回答，把自己的书題为《哲学的貧困》，并且为了更准确地打击論敌，把它用法文写了出来。但是馬克思的直接目的并没有达到。蒲魯东对法国工人以及对一般罗曼語系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影响不但没有减退，反而继续在增长，因而馬克思在此后許多年中仍然不得不同蒲魯东打交道。

但是《哲学的貧困》一书的价值以及它的历史意义，絲毫也没有因此而减色。这部书不但是馬克思生活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之点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闡发。这些原理在馬克思过去的著作中都曾經出現过，不过在那里它們只是像火星似地偶一閃現罢了。后来他也对这些观点作了簡明扼要的叙述。但正是在反駁蒲魯东的这部著作中，他以一种无往不胜的論战所特有的令人信服的明确性發揮了这些原理。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是馬克思最大的科学業績。他以此而对历史科学作出的貢獻，正和达尔文对自然科学所作的貢獻一样。

在这方面，恩格斯也有一份功劳，而且这功劳比他自己所謙遜地承认的要大得多。但是恩格斯把那基本思想的經典式的表述完全归功于馬克思，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据恩格斯說，还在1845年春天他們在布魯塞爾会晤的时候，馬克思就以十分完整的形式向他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¹²⁷；每一历史时代的物质生产以及必然由它的条件产生出来的社会結構，乃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史的基础；因此，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被剝削者和剝削者、被奴役者和奴役者之間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被剝削和被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 151

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奴役和压迫而获得解放，就不能使它自身摆脱压迫者和奴役者阶级即资产阶级而获得解放。

这个基本论题也就是《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基石。这部书中所包含的光芒四射的丰富思想，就像集中于一个焦点似地集中在这个基本论题上，跟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进行的冗长而有时令人厌倦的论战相反，《哲学的贫困》的特点是异常的简练和明确。船已不再是在沼泽上逶迤行进，而是乘风破浪地扬帆疾驶了。

这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如拉萨尔有一次说的，马克思是作为变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而出現的。在第二部分中，马克思是作为变成了经济学家的黑格尔而出現的。李嘉图曾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是按照该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进进行交换的。蒲鲁东则主张，商品的这种“价值”应该被认为是“构成的”，以便在所耗费的劳动量相等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直接把一件产品和另一件产品相交换。他想要通过这种办法来改造整个社会制度：所有的人都应该变成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相等的劳动量的基础上直接交换产品。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早就试图从李嘉图的学说中得出这种“平等的”结论并把它付诸实施，但是他们的“交换银行”很快就破产了。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为解放工人阶级而设想出来的“革命理论”，实际上是使工人阶级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李嘉图从自己的价值规律中合乎逻辑地引伸出工资规律：“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产品的生产的必要劳动量来衡量的。没有阶级矛盾的个人之间的交换是资产阶级的幻想。承认蒲鲁东的原理，就等于承认资产阶级

社會中存在着任何人都不可靠犧牲別人發財致富的永恆的正義和協調。

但是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馬克思在談到這一點時是這樣講的：“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①蒲魯東想靠自己的“構成價值”保證工人獲得由於集體勞動的不斷進步而日益增多的勞動產品。作為對這個空想的回答，馬克思舉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使英國工人從1770年到1840年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二十六倍的生产力的發展，是建立在階級矛盾基礎上的一系列歷史原因造成的。這些歷史原因就是：私人資本的積累，現代的分工，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僱傭勞動制。要使這種剩餘勞動成為可能，就必須有階級存在，其中一些階級靠它發財，另一些階級由於它而貧窮沒落。

蒲魯東舉出金銀作為“構成價值”的最早的典型，硬說這些金屬只是經過君權的神聖化才變成貨幣的。馬克思回答說，事實根本不是這樣。貨幣不是東西，而是一種社會關係；就像個人交換一樣，貨幣是與一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其實，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法律只是對事實的公認。”^②君主們在鑄造錢幣時，不是確定某一塊金子的價值，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04頁。

② 同上書，第121—122、124頁。

而仅仅是确定它的重量。金銀恰恰最不能表現“构成价值”。正是作为价值的表征，金銀才是唯一不由生产费用来衡量其价值的商品。因此金銀在貨幣流通中可以用紙币来代替，这是李嘉图早就說明了的。

馬克思暗示了共产主义的最終目的，他說：蒲魯东所追求的“供求之間的正确比例”，只有当生产資料有限，交換在非常狹小的範圍內进行，而需求支配着供給，消費支配着生产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自从大工业兴起以后，这样的比例就不可能維持了。大工业所使用的工具、机器等等要求以越来越大的規模进行生产。大工业不能等待需求；它仿佛是在服从一种物理的規律，以自然的必然性无法遏制地經過繁荣、蕭条、危机、停滯、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在現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換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災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現代生产資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沒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須放棄个人交換来保存生产力。”^①

《哲学的貧困》的第二章比第一章更为重要。在第一章里，馬克思談到李嘉图，对他还抱有某种科学上的偏爱，例如，馬克思当时还无保留地承认李嘉图的工資律。在第二章里，他談到了黑格尔，而在这里馬克思就如魚得水一般地胜任愉快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109 頁。

蒲魯東完全不理解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他繼續墨守着這種方法的當時已變得反動的一面，認為現實世界是從觀念世界中產生出來的；同時，他又反過來否定了辯論方法的革命的一面，即觀念的能動性，觀念首先肯定自身，然後否定自身，借以在這一鬥爭中顯示那個在揚棄雙方的矛盾形式時保存了它們的物質內容的更高的統一。蒲魯東卻相反，他把每一個經濟範疇劃分成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並且尋求一種能消除壞的方面而保存好的方面的綜合，科學公式。在他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強調好的方面，社會主義者指責壞的方面。而他自己則以為，有了他的公式和綜合，他就既超越於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又超越於社會主義者。

對於蒲魯東的這種自命不凡的說法，馬克思回答說：“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又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 154 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為一種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總合的錯誤。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①當然，在這裡，不應當把小資產者和小資產階級庸人混為一談。馬克思一向把蒲魯東看成是一個有頭腦的人；他只是斷定，這人的觀點無論如何超不出小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

要指出蒲魯東所使用的方法之站不住腳，在馬克思是沒有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158 頁。

难的。如果随便割断辩证的过程,把它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如果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简单的抵消,那末观念就成为完全没有生命的了。它不再发生作用,它既不能把自己确立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作为黑格尔的真正学生,马克思清楚地知道,正是蒲鲁东到处要消灭的那个坏的方面在创造历史,因为它引起斗争。如果人类给自己规定任务,要仅仅消除封建制度的消极的一面——农奴制、特权、无政府状态,而保存它的美好的方面——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城市手工业的发达,那末这就会毁灭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扼杀萌芽中的资产阶级。这就等于给自己提出一个荒唐的任务——把历史一笔勾销。

马克思用下面一段话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① 马克思从资产阶级身上也看到了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在其中运动的那些生产关系不是单纯的和划一的,而是复杂的和双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同时产生着贫困。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也发展着无产阶级,而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也随着在发展。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形成一个阶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尚未发展到足以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154—155 页。

人看到解放无产階級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无产階級理論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們只能凭空想出一些万应的体系。“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階級斗争的日益明显，他們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識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們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創立体系的时候，当他們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們认为貧困不过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学了。”^①

在馬克思看来，經濟范疇只是社会关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們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們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創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疇。”^②馬克思把那些大談资产階級社会的“永恒的天然的制度”的资产階級經濟学家比做正統派神学家，他們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神的启示，其他一切宗教都是人們的臆造。

馬克思接着根据蒲魯东企图用来应用他的方法的一系列經濟范疇来证明这个方法站不住脚。这些范疇就是：分工和机器的作用問題，竞争和壟断的問題，土地所有权和地租的問題，罢工和工人同盟的問題。和蒲魯东的見解相反，分工不是一个經濟范疇，而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57—158頁。

^② 同上书，第144頁。

156 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形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看来，分工的必要前提是工场。但是和蒲鲁东的设想相反，工场并不产生于劳动伙伴之间的友好协议，甚至也不产生于古老的行会内部；成为现代工场的主人的，不是中世纪的行会师傅，而是企业主—商人。

同样，竞争和垄断也不是天然范畴，而是社会范畴。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这种斗争不是围绕产品进行的，而是围绕利润进行的。和蒲鲁东的见解相反，竞争绝不是人类灵魂的属性；竞争是在18世纪由于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在19世纪，它也可以由于新的历史需要而消灭。

蒲鲁东认为，土地所有权的产生不是决定于经济的原因，而是起源于与物质财富的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个见解也是同样错误的。蒲鲁东说，地租的任务是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马克思回答这一点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①地租，即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润和利息在内）的余额，是在而且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发生的。地租是资产阶级形式的土地所有权，是为资产阶级生产条件所左右的封建所有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180页。

最后，馬克思闡明了罢工和工人同盟的历史意义，而这是蒲魯东所根本不願承认的。尽管社会主义者和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从相反的动机出发，都警告工人不要运用这种武器，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罢工和同盟仍将不可避免地发展。竞争把工人分开，但尽管如此，他們还是有着一个共同的利益：把工資維持在哪怕是現有的水平上。共同的反抗思想使他們結成同盟，在这一同盟中包含着¹⁵⁷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資產階級当初也是首先結成反封建主的局部性的同盟，然后才形成为階級，并且作为已形成的階級而变封建制度为資產階級制度的。

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对抗是一个階級反对另一个階級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一次全面的革命。社会运动并不排斥政治运动，因为沒有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只有在沒有階級的社会里，社会进化才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制度根本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結論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¹²⁸馬克思用乔治·桑的这句话結束了他的书。

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同时也为自己对德国哲学的观点作了总结。他由于返回到黑格尔而超越了費尔巴哈。当然，官方的黑格尔学派已經完全破产。它把偉大导师的辩证法变成了純粹的公式，拿来到处乱套，而且往往做得极其笨拙。关于这班黑格尔主义者，人們完全有理由說：他們一窍不通，却又无所不写。

当費尔巴哈宣布摒棄思辨概念的时候，黑格尔派的丧钟就敲响了¹²⁹。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它的形式方面。但是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缺乏“能动的原則”；它沒有超出自然科学的範圍，并且

排除了历史的过程¹³⁰。馬克思不滿足于这样的唯物主义，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毕希納和福格特出現了，他們成了这种唯物主义的廉价推銷者，而他們那种狹隘的庸人观点曾經迫使費尔巴哈也宣布說，往后退时，他是完全同唯物主义者在一起的，但往前进时，他就跟他們完全不同道了¹³¹。恩格斯會說：“平庸的資產階級理性这四笨拙的駕馭馬在划分本质和現象、原因和結果的鴻沟面前自然会一筹莫展地踟躕不前了。但是，在抽象思維这个十分崎嶇險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騎駕馭馬的。”¹³²

但是黑格尔派远非黑格尔。黑格尔派只能夸耀自己的无知，而黑格尔本人却是古往今来最博学的人們當中的一个。他比其他哲学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事物。这种
158 观点使他有广泛的可能来理解历史，尽管这种理解所具有的唯一形式好像通过一面凹鏡来反映事物，把全部历史进程仅仅設想为观念发展的实际例证。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现实的内容，是費尔巴哈不曾領悟的，而黑格尔派則把它拋棄了。

馬克思承受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个最可貴的因素，但是他把黑格尔哲学翻轉过来，使得他的出发点不再是“純粹思維”，而是现实这个无情的事实。这样，馬克思就給唯物主义带来了历史的辯证法，并因而使唯物主义获得了那种“能动的原則”，这种原則不仅要求說明世界，并且要求变革世界。

(五)《德意志—布魯塞爾報》

为了出版他的反駁蒲魯东的篇幅不大的书，馬克思找到了两个德国出版人，一个在布魯塞爾，一个在巴黎。但在出版这书时馬

克思不得不自負印刷的費用。而从1847年夏天起,当«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开始出版时,他又掌握了这个報紙的支配权;这个出版物使他有可能积极地从事社会活动。

这个報紙从1847年年初起每周出两期,出版人是阿达尔貝特·馮·伯恩施太德,这人曾經是伯恩施坦出版的《前进报》的主編。根据柏林和維也納政府的档案材料,現在已經完全可以确凿地断定,伯恩施太德曾受雇于奥地利和普魯士政府。唯一不能确定的是,他在布魯塞爾期間是否也从事密探活动。当时人們也曾对伯恩施太德发生怀疑,但是下面这个事实又消除了这些怀疑,即普魯士駐布魯塞爾公使曾极力唆使比利时政府反对伯恩施太德的報紙。当然,这样做也可能只是为了混淆視听,以便在云集布魯塞爾的革命者眼中确立伯恩施太德的声誉。王座和祭坛的保卫者們在追逐他們的“崇高目的”时是根本不擇手段的。

無論如何,馬克思不相信伯恩施太德是个叛徒。他說,伯恩施太德的報紙尽管有許多缺点,还是有一些功績的。如果这个報紙存在着許多缺点,那末就應該糾正这些缺点,而不應該在伯恩施太德“不好”这种便宜的借口下置之不理。8月8日馬克思給海爾維格写了一封措詞非常辛辣的信,信中說:“他們时而說不喜欢他本 159
人,时而說不喜欢他的妻子,时而說不喜欢報紙的傾向、它的風格、它的开本,或者說推銷上有某种危險……我們德国人总是准备好成千条格言来解釋他們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任何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机会只会使他們为难。”^①接着,馬克思抱怨他的手稿受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5頁。

到了和《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同樣的待遇，並且在結尾處嚴厲地斥責了那些“蠢駝”，因為那些人責備他寧肯用法文出版這部稿子，而不願根本不出版。

即使馬克思為了想“利用現成的機會”而不够重視對伯恩施太德的懷疑，這也難怪。當時出現的機會確實是非常有利的，僅僅由於懷疑而放過這個機會是不智的。1847年春天，財政上的急需迫使普魯士國王召集了由過去的各省議會聯合而成的聯合省議會¹³³。這是一個封建等級制的代議集團，就像1789年春路易十六迫於同樣的局勢而召集的那個議會一樣¹³⁴。誠然，在普魯士，事情還不像法國當時發展得那樣快，但是不管怎樣，聯合省議會根本不打算慷慨地拿出錢來，它斷然向政府聲明，在政府擴大議會權力並作出定期召集議會的保證以前，它將不撥給政府任何款項。事情有了轉機，因為政府的財政困難是嚴重的。跳舞早晚是要從頭開始，因此伴奏越早開始越好。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寫的文章就是順着這條思路寫的¹³⁵。有一篇評論聯合省議會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的文章是未署名發表的，不過從內容和風格來判斷，顯然是恩格斯寫的。他當時深信，德國資產階級需要高額保護關稅，不僅是為了使自己不受外國工業的壓迫，而且尤其是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並戰勝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因此，恩格斯也勸告無產階級支持爭取保護關稅制度的運動，哪怕僅僅是為了這個理由。他說，保護關稅論者的真正權威李斯特寫出了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文獻中最優秀的著作¹³⁶，但他又補充說，李斯特的備受推崇的全部學說是從大陸體系¹³⁷理論的創始人、法國人費利叶那里抄襲來的。

160 而且他提醒工人，要他們不要被關於“工人階級的福利”的騙人鬼

話牽着鼻子走。他警告說，不論是自由貿易的捍衛者還是保護關稅的擁護者，都挂着一塊漂亮的招牌，在這塊招牌後面隱藏着同樣利己的活動。不管是在自由貿易制度下，還是在保護關稅制度下，工人的工資都將一如往昔。因此，恩格斯僅僅是把保護關稅制度當做一個“資產階級的進步措施”來加以支持的，而馬克思也持有同樣的見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了一篇長文¹³⁸，來回擊基督教封建社會主義在《Rheinischer Beobachter》（《萊茵觀察家》）上發動的攻擊。《萊茵觀察家》是不久前政府為唆使萊茵省的工人反對萊茵省的資產階級而在科倫創辦的一家機關報。年輕的海爾曼·瓦蓋納在這個報紙上表現得特別賣力，就像他自己在《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馬克思和恩格斯由於和科倫方面有密切聯繫，大概是知道這一點的。在他們的答復文章中，不斷地反復嘲笑那個“頭髮梳得溜光的國教顧問”，而瓦蓋納那時正是馬格德堡的國教顧問。

這一次，《萊茵觀察家》利用了聯合省議會的失敗來引誘工人落入圈套。它說，由於資產階級拒絕滿足政府的財政需要，資產階級就表明了它只是想攫取政權；它對人民的福利是漠不關心的。資產階級把人民發動起來，僅僅是為了吓唬政府。在資產階級看來，人民只是它對政府發動猛攻時的炮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一點的答復的正確性在今天已是無可懷疑的了。他們說，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和政府不抱任何幻想。它只是問自己：更符合自己的目的是什麼，是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是政府的統治；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只消把德國工人的地位同英、法工人的地位比較一下就夠了。

《萊茵觀察家》不惜採取最卑鄙的煽動手段大喊大叫地說：“幸運的人民呵，你們在有關原則的問題上已經占了便宜！假如你們

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就让你们的代表讲给你们听吧;你们在听他们的长篇演说的时候,大概会忘掉饥饿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以辛辣的嘲笑回答说,单是《莱茵观察家》使用了这样的挑拨性的言词而不受惩罚这件事,就足以证明德国的出版是真正“自由”的。接着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很清楚有关原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他们谴责议会,并不是因为议会实现了这些原则,而是因为它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议会不是仅限于提出扩大它的等级权利的要求,而是除此以外还提出实行陪审制¹³⁹、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那末它就会得到无产阶级最有力的支持。

然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地批驳了企图压倒共产主义的基督教的社会原则。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有过一千八百年的发展,它并不需要普鲁士的国教顾问做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一事进行辩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原罪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順从馴服，总之，頌揚愚民的各种特点；然而对于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說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帶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①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領導着这个无产阶级去同君主們的社会改革釣餌作斗争。含着眼泪感謝賞給的一脚和扔給的一文錢的人民，只存在于国王的幻想中。真正的人民，无产阶级，用霍布斯的話來說，是一个結实面調皮的孩子。他怎样对付企图愚弄他的国王，可以从英国的查理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的下場得到說明¹⁴⁰。

这篇文章簡直像一場冰雹似地摧毀了封建社会主义的禾苗，¹⁶²虽然有些冰雹並沒有击中要害。馬克思和恩格斯替联合省議會拒絕撥款給不务正业的反动政府的做法辯护，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們认为議會否決政府所提出的征收所得税的提案也是出于同一动机，这就未免把这个議會抬得过高了。这个提案无宁說是政府为资产阶级設置的一个陷阱。廢除大城市工人負担最重的磨粉稅和屠宰稅并首先以征收有产阶级的所得税来弥补財政赤字的要求，最初是由萊茵省的资产阶级提出的。他們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正和英国资产阶级反对谷物稅的理由相同。

这个要求本是政府极度仇視的，因为要实现它，就不得不也触犯大地主的利益。而且，磨粉稅和屠宰稅仅仅是在大城市里征收的，因此地主們不能指望廢除这种稅会降低他們所剝削的无产阶级的工資。政府所以毕竟向联合省議會提出了相应的法案，是出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218頁。

于打击議会的威望和抬高自己的威望这种不可告人的意图。因为它預計到这个封建等級制的代議集团絕不会贊同一項靠損害有产階級的利益来哪怕暫時減輕一下工人階級重担的賦稅改革。政府的估計是十分有根据的，这从議会对政府法案表决的結果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王公、地主和官僚都投反对票。同时，政府特別走运的是：当事情临到决定性关头的时候，一部分資产階級体面地打了退堂鼓。

半官方的報紙这时开始利用議会否决所得稅一事大做文章，說它是資产階級的謊言和欺騙的明证。《萊茵观察家》更是死死抓住这点不放。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正确的：他們向“国教顧問”先生說，当他断言所得稅几乎可以減輕社会贫困时，他“在經濟問題上是个……最大最无耻的蠢汉”。但是，当他們把議会否决所得稅說成是对政府的一个正当打击而为之辯护时，他們却錯了。这个打击完全沒有击中目标，因为政府保住原来的磨粉稅与屠宰稅而不去在征收所得稅方面伤脑筋，无宁說是巩固了它的財政地位。这是因为，磨粉稅与屠宰稅的效用和进項是完全經過檢驗的。163 而所得稅的征收，特别是当必須向有产階級征收时，却时常是极其靠不住的；古往今来的經驗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已經变得反动的資产階級看成是仍旧革命的了。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时常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动。因此，当資产階級开始准备应战的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便决定再一次出来反对这个派别，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这个目的，馬克思在《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写了許多篇評論来反对“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还有一篇沒有发表的論文，是恩格斯写的，不过也可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合写的¹⁴¹。不管是在評論里还是在

论文里，都主要是从文学和美学方面来清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最薄弱的方面，或者也可以說是它最强有力的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艺术謬誤的时候，并不总是充分正确地估价艺术的权利的。例如，在这篇文章的手稿中，就曾对弗萊里格拉特的杰作《Ça ira》〔《就这么办》〕¹⁴²进行了不公道的尖銳批評。馬克思也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上对卡尔·倍克的詩《穷人之歌》做了过分苛刻的評論，认为它是“小資产阶级的幻想”。不过，他在評論倍克的时候，却正确地預言了五十年后出現的自以为是的自然主义的悲惨命运。他說：“倍克歌頌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風气，歌頌‘穷人’，歌頌 pauvre honteux^①，怀着卑微的、虔誠的和互相矛盾的願望的人……然而并不歌頌倔强的、威風凜凜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②除卡尔·倍克外，倒楣的格律恩也又一次受到追究，因为他在一本現在早就被遺忘了的書里丑化了歌德，“从人的观点”分析歌德，也就是說，用这位偉大詩人身上的所有一切渺小的、无聊的和鄙俗的性格虚构了一个“真实的形象”。

比所有这些抨击更为重要的是一篇長文¹⁴³。在这篇長文里，馬克思以不減于斥責政府的“社会主义”空談时所用的那种尖銳語調斥責了庸俗的激进詞令。卡尔·海因岑在反对恩格斯的論爭中，用权力來說明財產关系上的不公平。他說，任何一个攻击資产阶级发財欲而不敢碰一碰国王权力欲的人，都是懦夫和愚人。海因岑是个平庸的空談家，不值得特別注意，但是他所代表的这些观点却異常投合那些“开明的”庸人的口味。他认为，君主制之所以能

① 耻于乞討的穷人。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223—224頁。

164 够存在，只是因为許多世紀以來人們失去了健全的人的理智和自尊心；而現在，當人們重新獲得了這種可貴品質的時候，一切社會問題就都在“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這個問題前面消失了。這個高明的論調和君主們的同樣高明的論調恰成對照，因為君主們說，一切革命運動都僅僅是由于“煽動者”的惡意而引起的。

但是，馬克思卻證明，並且首先是以德國歷史為例來證明，是歷史創造了君主，而不是君主創造了歷史。他指出了君主專制產生的經濟原因。它產生在一個過渡時期，那時舊的封建等級趨于衰落，中世紀的市民階級正在形成為現代資產階級。在德國，君主專制發生較晚，維持較久，這只能以德國市民階級的畸形發展過程來說明。因此，統治者所扮演的暴虐而反動的角色，是有其經濟上的原因的。君主專制從前也保護過工商業並鼓勵過資產階級興起，認為這是使國家富強、使自己光耀的必要條件。而現在，君主專制卻到處都在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因為工商業在已經變得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變成了越來越危險的武器。它那胆怯而魯鈍的目光又從使它繁榮的搖籃——城市，轉到了它從前埋葬強敵的地方——鄉村。

這篇文章包含着許多有益的思想，但是要打動虔誠的庸人的“健全的人的理智”卻不那么容易。馬克思在這裡為了替恩格斯反駁海因岑而捍衛的那同一個關於權力的理論，在三十年以後，恩格斯又不得不為了替馬克思反駁杜林而加以捍衛了。

(六) 共產主義者同盟

1847年，僑居布魯塞爾的共產主義者人數大大地增加了。當

然，其中沒有一個人能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有時候，看來似乎不是莫澤斯·赫斯就是威廉·沃尔弗——他們兩人都是《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的撰稿人——可以加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聯盟而居于第三位。但是結果他們都沒有做到。赫斯始終沒有擺脫他的哲學迷宮，而《共產黨宣言》上對他的著作所作的无情的严厉批判，終於使他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決裂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威廉·沃尔弗之間的友誼建立得較晚，因 165
為沃尔弗直到 1846 年春天才來到布魯塞爾。這個友誼雖然歷經
忧患，却始終保持不變，直到沃尔弗早死為止。但沃尔弗並不是一個
獨立的思想家。作為一位作家，他和馬克思及恩格斯不同之處
不僅在於“行文通俗”這個優點。沃尔弗出身於西里西亞備受壓迫
的農奴階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進入大學。在大學里對古代偉
大思想家和詩人的研究，使他培養了對他的階級的壓迫者的刻骨
仇恨。有幾年光景，他作為一個“煽動者”被囚禁在西里西亞的
各個監獄里。後來，他在布勒斯勞做了私人教師，並且對官僚政治和
書報檢查制度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小型戰爭¹⁴⁴，直到最後又受到控
告，才不得不逃亡國外，以免憔悴在普魯士獄中。

在布勒斯勞，沃尔弗同拉薩爾結為朋友，以後又結識了馬克思
和恩格斯。這三個人都用不朽的桂冠裝飾了他的墳墓。沃尔弗是
一個品格高尚的人；這種人，用詩人的話來說，是用他本人的價值
來支付的。他的堅定不移的性格、堅貞不二的忠誠、清白無瑕的良
心、一絲不苟的忘我精神和始終如一的謙遜，都使他成為革命戰士
的典範。由於沃尔弗的這些品質，他永遠受到他的政友和政敵的
高度尊敬，不論他們是愛他或是恨他。

離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圈子稍遠的有和威廉·沃尔弗同

姓的斐迪南·沃尔弗，还有写了一本关于三月革命前的柏林的好书的恩斯特·德朗克¹⁴⁵。这本书被指控犯有辱君之罪，而德朗克为此曾被判处两年徒刑。他从威塞尔的監獄里逃了出来，来到布魯塞爾时要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晚得多。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較密切的还有格奥尔格·維尔特，他是恩格斯还在曼彻斯特当職員的时候就相識的；他也是布萊得弗德的一家德国商行的職員。維尔特是一位真正的詩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完全擺脫了詩坛的迂腐习气。他也死得很早；还没有一只敬爱的手来收集他那些大量地零散发表在各种出版物上的充滿了真正战斗无产階級精神的詩作¹⁴⁶。

后来，有一些有才干的工人也参加了这个知識分子集团，首先是卡尔·瓦劳和斯蒂凡·波尔恩，他們两人都是《德意志—布魯塞爾报》的排字工人。

布魯塞爾，这个自詡为資产階級君主制典范国家的比利时的首都，是最适于建立国际聯絡的地方，特别是当九月法令在仍然是革命运动发祥地的巴黎逞凶肆虐的时候。在比利时，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参加1830年革命的人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德国，特别是在科倫，他們都有一些故交和新知；除了格奥尔格·荣克以外，主要有德斯特尔和丹尼尔斯两位医生。在巴黎，恩格斯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著作界代表人物路易·勃朗和該党机关报《La Réforme》（《改革报》）的主編斐迪南·弗洛孔建立了联系。关系更为密切的是宪章派革命派——《Northern Star》〔《北极星报》〕的主編朱利安·哈尼，和在德国受过教育的厄内斯特·琼斯。这些宪章派領袖对“民主派兄弟协会”¹⁴⁷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协会是一个国际組織，其中也有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卡尔·沙佩尔、約瑟夫·莫尔等人。

正义者同盟在 1847 年 1 月間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它以“倫敦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的名义同“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不过它們之間的关系是相当冷淡的。一方对“讀書人”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他們不能了解“工人的疾苦”，而另一方也对“流浪工匠”，亦即对当时还盛行于德国工人当中的手工业行会偏狭性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在巴黎，恩格斯不得不做許多工作以便使那里的“流浪工匠”摆脱蒲魯东和魏特林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倫敦的“流浪工匠”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不过他仍然把正义者同盟在 1846 年秋天就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¹⁴⁸所发表的宣言称为“胡說八道”。他說，同盟的代表人物从英国人那里学到的正是最荒謬的东西，完全不善于考虑现实情况并且不能理解历史发展进程。

十年后，馬克思談到他此时对正义者同盟的态度时說：“当时我們出版了一些小册子，部分是鉛印的，部分是石印的。在这些小册子里，我們对构成同盟当时的秘密学說的法、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們提出，應該把对資產階級社会的經濟結構的研究作为唯一可靠的理論基础，来代替这种混合物。最后，我們以通俗的形式說明，問題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自觉地参加正在我們眼前进行着的社会革命改造的历史过程。”^① 据馬克思說，这些出版物促使正义者同 167 盟于 1847 年 1 月派它的中央委員、钟表匠約瑟夫·莫尔到布魯塞爾去，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因为同盟准备接受他們的观点。

^① 參閱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3 頁。

可惜，除了反克利盖的通告外，馬克思所說的那些小冊子一本也沒有保存下來。在這個通告里，克利盖被嘲笑為秘密的“埃薩伊同盟”¹⁴⁹——正義者同盟——的使徒和先知。通告說，克利盖把歐洲各國共產主義的實際歷史發展神秘化了，把共產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歸功於這個“埃薩伊同盟”的荒唐的、神奇的、虛構的陰謀，並且散布關於這個同盟的威力的最荒唐的幻想。

既然這個通告對正義者同盟發生了影響，可見同盟的盟員畢竟不是什麼“流浪工匠”，他們從英國歷史學到的東西比恩格斯所設想的要多。儘管通告中很不客氣地提到他們的“埃薩伊同盟”，他們卻比魏特林更重視這個通告；通告雖然並沒有觸及魏特林本人，但他卻跑到克利盖方面去了。在倫敦這樣一個世界中心，正義者同盟確實比在蘇黎世或甚至在巴黎保持着更多的生機和活力。原來以在德國工人當中進行宣傳為目的的同盟，在這個世界都市中具有了國際性質。同盟的領導人同各大國的流亡者都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而且親眼看見憲章運動的蓬勃發展。這種情況擴大了他們的見識，使他們的眼光大大超出了通常的手工業觀念。除了較老的領袖沙佩爾、鮑威爾和莫爾外，又出現了在理論認識方面超過了他們的海爾布隆的微型彩畫家卡爾·普芬德和紹林吉亞的裁縫工人格奧爾格·埃卡留斯。

莫爾帶着沙佩爾在1847年1月20日所寫的一份委託書，到布魯塞爾來找馬克思，然後又到巴黎去找恩格斯。這份委託書的措詞還是很審慎的。它全權委託送信人報告同盟的狀況，并就一切重要問題進行說明。但在面談的時候，莫爾就隨便得多了。他邀請馬克思加入同盟，並且打消了馬克思原先的疑慮，因為他告訴馬克思，同盟中央委員會準備在倫敦召開代表大會並將在會上提

出一篇宣言，宣布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观点为同盟的学說。所需要的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协助同盟克服种种陈腐因素的抵抗，¹⁶⁸而要做到这点，他們两人必須加入同盟。

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接受这个建議。但是 1847 年夏天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还只不过把同盟的組織加以民主化，以适应一个被迫进行秘密活动却又不抱任何密謀目的的宣傳团体的任务。在組織上，同盟由支部（每个支部至少三人，至多十人）、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組成。同盟的任务是：推翻資产階級，建立无产階級的統治，消灭奠基在階級斗争之上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沒有階級和私有财产的新社会。

按照同盟（已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民主性质，新章程首先交由各个支部討論。最后决定則要留待年底前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去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預定要討論同盟的新綱領。馬克思沒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廉·沃尔弗作为布魯塞爾支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七）布魯塞爾的宣傳

共产主义者同盟认为自己的任务首先是成立一些德国工人教育小組，以便能够进行公开的宣傳，并且从这些小組中吸收最适当的分子来补充和扩大自己的队伍。

小組的組織到处都是一样的。規定每周一天进行討論，一天进行文娛活动（唱歌、朗誦等）。各处都成立了图书室，有条件的地方还给工人开班讲授基本知識。

德国工人协会¹⁵⁰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于 8 月底在布魯塞爾

成立的；不久它就拥有大約一百个會員。莫澤斯·赫斯和瓦勞当选为主席，威廉·沃尔弗当选为書記。协会每星期三和星期日晚間举行集会。星期三討論有关无产階級利益的重大問題，星期日則由沃尔弗作例行的每周政局評論，——他不久就表现出闡述政局的特殊才能。在他报告以后就是有妇女参加的余兴。

169 9月27日，这个协会举行了一次国际宴会，来表示各国工人相互間的友情。当时，为了进行政治宣傳，时常利用宴会的形式，以便在公共集会上避免警察的干涉。除此以外，9月27日的宴会还有一种特殊的原因和目的。它是由伯恩施太德以及德国侨民当中的其他心怀不滿的分子組織起来的，他們的目的，正如当时正好在場的恩格斯写給正好不在場的馬克思的信上所說的，“是想使我們在恩貝尔以及比利时民主主义者面前居于次要地位，并且成立一个比我們可怜的工人协会更加堂皇而包罗万象的团体”^①。但是恩格斯却及时地挫敗了这个阴谋。他甚至同法国人恩貝尔一道当选为副主席，虽然他會由于自己“看起来太年輕”而竭力推辞。梅利奈將軍被推选为宴会的名誉主席，而律师若特兰則被推选为执行主席。这两个人都是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老战士。

出席宴会的有一百二十位客人——比利时人、德国人、瑞士人、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俄国人。宴会在許多人作了演說之后，决定按照“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样式在比利时成立“民主协会”¹⁵¹。恩格斯也当选为筹备委員之一。但是他在这以后不久就离开了布魯塞尔，因此他在写給若特兰的信中建議由馬克思接替他的位置。他說，假如馬克思能够出席9月27日的集会，他无疑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82—83頁。

也会当选的。“因此，不是馬克思先生代替我为委員，而无宁說是我代替馬克思出席了集会。”果然，当“民主协会”于11月7日和15日組織起来的时候，恩貝尔和馬克思当选为副主席，而梅利奈被批准为名誉主席，若特兰被批准为执行主席。协会章程由比利时、德国、法国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签署——总共大約有六十人签名。签名的德国人中除了馬克思外，还有莫澤斯·赫斯、格奥尔格·維尔特、两个沃尔弗、斯蒂凡·波尔恩和伯恩施太德。

“民主协会”的第一次盛大集会是11月29日召开的波兰革命周年紀念会。斯蒂凡·波尔恩代表德国人在会上发言，他的演說很受欢迎。馬克思是协会派往倫敦去出席“民主派兄弟协会”在同一天为同一理由举行的大会的正式代表。他的演說貫穿着无产阶 170
級的革命精神。

他說：“毫無疑問，旧波兰已經死亡了，我們絕對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經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們來說并不是一种損失，而一切現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①馬克思认为，无产階級对資产階級的胜利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而英国无产階級对英国資产階級的胜利則是导致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們的压迫者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因此，解放波兰不应当在波兰进行，而应当在英国进行。如果宪章主义者战胜了自己国内的敌人，那末他們也就因此而消灭了整个旧社会。

“民主派兄弟协会”在回答馬克思的致詞时用同样的語調說：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10頁。

“你們的代表、我們的朋友和兄弟馬克思將告訴你們，他的來臨和宣讀你們的致詞曾受到怎樣熱烈的歡迎。所有的眼睛都放射出喜悅的光芒，所有的喉嚨都向他歡呼，所有的手都友愛地伸向你們的代表……我們以最大的喜悅接受你們向我們提議的聯盟。我們的協會已經成立了兩年，它的口號是：人人皆兄弟。在我們上次的周年紀念會上，我們提議召開各國民主義者代表大會，而當我們知道你們也公開提出了同樣的建議時，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國王們的陰謀要用各族人民的陰謀來加以粉碎……我們深信，要實現博愛，必須面向真正的人民，面向無產者，面向在現存社會制度壓迫下每天流血流汗的人們……主張博愛的人們和優秀的人類救星將走出茅屋，閣樓或地下室，離開耕犁，工廠和鐵砧，將走上並且已經走上同一條道路。”“民主派兄弟協會”建議各國民主義者代表大會於1848年9月在布魯塞爾召開，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對抗1847年9月在那裡召開的自由貿易派代表大會¹⁵²。

向“民主派兄弟協會”致送賀詞並不是馬克思的倫敦之行的唯一目的。緊接着紀念波蘭革命的集會之後，就在同一所房子——沙佩爾、鮑威爾和莫爾於1840年創立的倫敦德國工人教育協會¹⁵³的會議廳——里，共產主義者同盟召開了代表大會來最後通過章程和討論新的綱領。恩格斯也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離開巴黎後，於11月27日在奧斯坦德同馬克思會晤，然後他們一同到英國去。經過十多天的討論以後，他們兩人受托起草一篇公開的宣言來闡述共產主義原理。

大約在12月中，馬克思回到了布魯塞爾，而恩格斯則繞道布魯塞爾回到巴黎。看來，他們並沒有急于完成受托的任務。至少，倫敦中央委員會在1848年1月24日曾極力催促同盟的布魯塞爾

區部，要它通知公民馬克思，說如果他所承擔起草的共產黨宣言在2月1日前還沒有送到倫敦，那就要對他採取進一步的措施。遲延的原因，現在已經很難斷定了。或許是因為馬克思所特有的那種不論幹什麼都非常徹底的习惯，或許是因為這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分住兩個城市，妨礙了他們的合作。也可能是因為倫敦的人們聽說馬克思照舊專心致力於自己在布魯塞爾的宣傳工作，因而開始感到不耐煩。

1848年1月9日，馬克思給“民主協會”作了一篇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¹⁵⁴。這篇演說本是他準備在布魯塞爾自由貿易派代表大會上作的，但是那時他沒有獲得發言的機會。在這篇演說中，他證明並且揭露了自由貿易派的欺騙，因為自由貿易派談論“工人福利”，硬說這就是他們所發起的運動的真正動因。雖然自由貿易肯定是犧牲工人來為資本家謀利益的，馬克思却仍然因此而承認，而且正是因此而承認，自由貿易是符合資產階級經濟的原則的。貿易的自由就是資本的自由，資本為了自身活動的完全自由而把一些仍然限制着它的民族障礙排除掉。自由貿易引起過去的民族的瓦解，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達到了頂點。這樣，自由貿易就加速了社會革命，而馬克思正是在這種革命意義上贊成自由貿易制度的。

同時，他對自己捍衛保護關稅制度的嫌疑作了聲明，而他捍衛自由貿易制度是同他承認德國的保護關稅制度是“進步的資產階級措施”這一點並不矛盾的。像恩格斯一樣，馬克思完全是從革命的立場來考察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整個問題的。德國資產階級需要保護關稅制度作為反對專制政權和封建主義的武器，作為聚
集力量來實現國內自由貿易和建立大工業的手段，而大工業又必

然要依賴世界市場，也就是說，要或多或少依賴自由貿易。馬克思的這篇演說受到“民主協會”會員們的热烈歡迎，協會決定自己出錢把它用法語和法蘭德斯語出版。

比這篇演說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在德國工人協會所作的關於僱傭勞動與資本的講演。馬克思的出發點是：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而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一定量的生產勞動的那一部分。勞動的價格像任何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是由它的生產費用決定的。簡單勞動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這種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工資像任何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隨着競爭的波動時而高於生產費用，時而低於生產費用，但是在這種波動的範圍內則是和僱傭勞動的工資的最低額相等的。

然後，馬克思轉而闡述關於資本的問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硬說，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馬克思在回答這一論斷時說：

“什麼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種人。上面的說明和這個說明是一樣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係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係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係，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好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沙糖本身並不是沙糖的價格一樣。”^①資本是社會生產關係，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一定量的商品，一定量的交換價值之所以變成資本，是由于它作為一種獨立的社会力量，即作為一種屬於社會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換直接的、活的勞動力而保存下來並增殖起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486頁。

来。“除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的劳动充当进行 173
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① 资本和劳动是相互制约并且相互产生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的确，工人若不受雇于资本家，工人就会灭亡，而资本家若不剥削工人，资本家也会灭亡。生产资本增长得越快，工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资本家需要的工人就越多，而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因此，使工人能够勉强过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使生产资本尽快地增长。

马克思证明说，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显著增长是以生产资本的更为迅速的增长为前提的。如果资本增长了，工资也是可能增长的，但是增长得更快的将是资本的利润。因此，工人的物质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是以他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的：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更加扩大了。当有些人说资本的最迅速的增长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的时候，这只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是迅速地增加和扩大那个与它敌对的力量，即增加和扩大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的财富，它就越是能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继续为加强资本的权力而工作并且越是有机会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自己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488—489页。

然而，——馬克思接着說，——資本的增加和工資的提高根本不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斷言的那樣，是密切聯繫着的。說資本長得越肥，它的奴隸也吃得越好，這是不正確的。生產資本的增長包含着資本的積累和積聚。資本的集中導致越來越細的分工和越來越多地採用機器。更細的分工使工人的特殊技能失去價值，那些需要特殊靈巧性和體力的工作，現在被那些任何人都能完成的工作所排擠，因而工人之間的競爭加劇了。

174 分工使一個工人能夠完成三個人的工作，因而這種競爭就更加激烈。機器的應用也導致同樣的結果，而且更加嚴重。生產資本的增長迫使工業資本家把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投入生產；這就使得一些小工業家破產並把他們拋到無產階級的行列里去。此外，信貸資本的利率隨着資本的積累而降低，因此小食利者就由於不能再靠自己的利息過活而投入工業，並增加了無產者的人數。

最後，生產資本的增長迫使它為市場進行越來越多的生產，而市場的需要却是它所不知道的。生產越是超過需要，供給就越是竭力強行製造需求，而危機這種工業上的地震也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猛烈；在危機中，工業界只是由於埋葬掉一部分財富、產品以至生產力才得以維持下去。資本不光靠剝削勞動來生活；這個顯貴而殘酷的統治者還要把自己奴隸的屍體，即在危機時期死掉的大批工人的屍體，也隨身帶到墳墓中去陪葬。馬克思作出結論說，如果說資本長得快，那末工人之間的競爭就長得更迅速無比，也就是說，工人階級就業和獲得生活資料的機會就縮減得越厲害。但儘管如此，資本的迅速增長對僱傭勞動却是最有利的條件。

可惜，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向德國工人所作的這篇講演，保存下來的只有這一片斷。不過，單是這一片斷也足以說明他在進行宣

傳時是多么認真和多么深思熟慮了。

但是，巴枯寧却對這篇講演抱有不同的看法。巴枯寧由於在波蘭革命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而被驅逐出法國之後，這時正好來到布魯塞爾，並在1847年12月28日寫信給他的一个俄國朋友說：“馬克思在這裡仍舊像從前一樣搞那一套虛夸的事情——他毀了工人們，因為他把他們變成了一些空談理論的人。還是那種理論狂和不知滿足的自我滿足。”^①在給海爾維格的信中，巴枯寧更加尖刻地攻擊馬克思和恩格斯：“總而言之，謊言和愚昧，愚昧和謊言。在這伙人當中簡直無法自由暢快地呼吸。我躲開他們，並且堅決表示不加入他們那個手工業者的共產主義團體，也不想同他們發生任何關係。”^②

巴枯寧的這些話之所以值得注意，並不是由於他用了這種激怒的語調來攻擊馬克思，——巴枯寧不論在以前或以後都沒有這樣責罵過馬克思，——而是由於這些評語暴露出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後來在這兩個革命家之間引起了激烈的鬥爭。 176

（八）《共產黨宣言》

在這期間，《共產黨宣言》的原稿已經寄往倫敦付印。

一部分準備工作是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完成的，這次代表大會曾決定把共產黨綱領的討論移到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去進行。這項任務自然要由運動的理論家來執行，於是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便擬出了幾份草稿。

① 米·亞·巴枯寧：《著作與書信選集》，1936年俄文版，第3卷，第284頁。

② 同上書，第282頁。

这些草稿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就是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4日，也就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的那一份：“请考虑一下‘信条’吧。我想我们最好还是丢开那种问答体而把这东西叫做《共产党宣言》。由于这里面不得不多少谈到历史，因此现有的这种体裁是根本不适宜的。我把我在这里拟就的一份草稿¹⁵⁵带来。这是用平铺直叙的叙述体写的，但由于仓促，写得很糟糕。”^①恩格斯又说，这个草案还不曾提交给巴黎各支部去讨论，不过他希望它——除了一些细节之外——会得到通过。

恩格斯的这份草案还完全是用问答体写的，这种体裁与其说会有损于叙述的平易，无宁说会有助于这一点。就直接的宣传鼓动任务来说，恩格斯的草案要比在内容和它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宣言》的定稿更适合些。但恩格斯仍然从一开始就为了历史的叙述方式而舍弃了他那二十五条问答，这一点证明了他的赤诚。他认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表现出来的宣言，按照希腊历史家的定义，应当是一部永垂不朽的作品，而不是一本供流览的论战性的小册子。

《共产党宣言》的古典形式本身确实使它在世界文献中占有一个巩固的地位。但这绝不等于说某些蠢人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些人抽出个别的词句，想据以证明《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剽窃了卡莱尔、吉本、西斯蒙第或其他人的著作。这样的指责是不折不扣的招摇撞骗。《宣言》完全是一部独立的、独创的作品。只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没有一种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在他们过去的各种著作中表述过的。《宣言》并不是一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30页。

种新的启示，它只是在一面极小的而又一尘不染的明鏡中反映了作者們的新的世界观。根据文章的風格来判断，馬克思大概在最后的修改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不过从恩格斯的草案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在理解方面并不低于馬克思，因此他理应被认为是《共产党宣言》的同等权利的作者。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已經过了一个世紀的三分之二，而这六、七十年是充滿了最重大的經濟、政治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在《宣言》中都不是沒有触到的。在某些方面，历史的发展和《宣言》的作者們所預料的有所不同，主要是緩慢得多。

他們的視綫越是深入未來，未來在他們眼中就越显得逼近。但是，可以說，沒有阴影就沒有光。萊辛早就发现了那些“非常正确地瞻望未來”的人的这种心理現象：“對他們說來，那些在自然界需要經歷數千年的東西，在他們生存的時期內就要成熟。”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錯了几千年，但他們畢竟錯了好几十年。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們就认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經发展到甚至在今天也未必达到的高度。这一点在恩格斯的草案中比在《宣言》本身中表达得更为清楚。他断言，在文明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門都实行了工厂生产，几乎在所有的劳动部門中，手工业生产 and 手工劳动都已被大工业所排挤。

《共产党宣言》中所列举的为数不多的工人政党的萌芽，是同这一論断特別有矛盾的。甚至这些党派中最重要的一个，英国的宪章派，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小資產階級分子的影响，更不用說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了。瑞士的激进党人以及那些把农民解放看成是民族解放的必要条件的波兰革命者，当时还只不过是牆上的影子罢了。《宣言》的作者們后来自己也指出，当时无产階級运动傳

播的范围是多么狭小，并且特别着重指出这个运动在俄国和美国都还不存在。“当时，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而向美国境内移民又疏散了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曾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充当着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因此，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都是当时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①在后来的三十年中，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宣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那种“高度的革命作用”，事实上比《宣言》的作者们所预料的要经久得多。但是，难道这一点就足以把《宣言》驳倒吗？

谈到这一点，应该着重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宣言》第一章中所包含的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气势磅礴而引人入胜的描述，是再真实不过的，虽然关于这个斗争的叙述有点过于笼统。现在已经不能把下述事实当做一种普遍现象：现代工人和以前的被压迫阶级不同，那些阶级至少还有能够维持他们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而现代工人却不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表现出这种趋势，但是工人阶级广大阶层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也毕竟为自己争得了甚至高于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生活条件的生存条件。

当然，不应当像资产阶级批评家一样由此得出结论说，《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贫困化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断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这种生产方式占居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的群众陷于贫困的这个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很久，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页。

斯开始写作以前就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家、激进的政治家，甚至首先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曾发挥了这个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企图美化“贫困化理论”，把它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贫困化理论”反映了一定的实践，甚至统治阶级的立法碰到这种实践也免不了要栽筋斗。统治阶级制定了济贫法¹⁵⁶并且为贫民建造了许多巴士底狱¹⁵⁷，在那里，贫穷被看成是穷人的罪过并因而受到惩罚。马克思和恩格斯绝不是这种“贫困化理论”的发明者，相反地，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它。当然，他们并不否认群众贫困化这个本身无可怀疑的公认的事实，不过他们证明，贫困化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个完全可以消除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将被产生它的同一种生产方式的后果所消灭。

在这方面，《宣言》只有一点是可以指摘的，即它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贫困化理论”的观点。《宣言》仍旧从李嘉图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所发展了的工资规律出发，而过分轻视了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工会组织，认为它们实质上只是为政治性的阶级斗争进行操练和演习的战场。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他们看成是“原则的胜利”。当时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法案仅仅是加在大工业身上的一个反动的桎梏。总之，《宣言》还不承认工厂法和工会组织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一些阶段；这一斗争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这一斗争必须进行到底，直到实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否则千辛万苦赢得的最初成果也将会失去。

因此，《宣言》过于片面地、只是从政治革命的观点来考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贫困一事的反应。作者们把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视为范例；他们预料，将进行几十年的国内战争和民

族戰爭，而在這種溫室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將迅速地達到政治上的成熟。當作者們談到德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時候，他們的觀點表現得非常明確。《宣言》主張，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無產階級就同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君主專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租。同時，《宣言》又教導說，一分鐘也不要忘記，必須培養無產階級尽可能明確地認識他們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敵對關係。

《宣言》接着說：

“共產黨人現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是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是因為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所以，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①就在《宣言》出版後不久，德國果然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使革命得以進行的那些條件卻發生了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們使資產階級革命半途而廢，而幾個月以後的巴黎六月戰鬥使資產階級，特別是德國資產階級的任何一點革命念頭都煙消雲散了。


這樣，時光磨蝕了《宣言》的某些恰像雕刻在大理石上的論斷。早在1872年，在新版本序言里，作者們自己就承認他們的綱領的“某些地方已經陳舊了”，但是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加上一句：《宣言》中所闡述的基本原理總地說來仍舊是完全正確的。只要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世界歷史性的鬥爭沒有結束，這些原理就總會是正確的。《宣言》的第一章無比精辟地闡述了這一鬥爭的關鍵性的理論原理，而第二章也以同樣完美的文字闡述了現代科學共產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503—504頁。

主义的基本思想。构成第三章的内容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批判，虽然只叙述到 1847 年，但是它如此深刻地掌握了革命过程的原理，以致其后兴起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派别，没有一个不曾在《宣言》的这一部分被批判地分析过。甚至第四章和最后一章关于德国的运动发展的预言，虽然和作者原来所设想的的不同，也是正确的；在萌芽中就凋萎了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¹⁵⁸，只是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蓬勃开展的一个序幕。

《共产党宣言》的根本真理是不可动摇的，甚至它的错误也是富有教益的，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献。全部世界历史都响彻着《宣言》结尾处提出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六章 革命和反革命

(一)二月和三月的日子

180 1848年2月24日，革命推翻了法国的资产阶级王权¹⁵⁹。随后布鲁塞尔也被卷进了革命的浪潮，但是比利时的国王列奥波特这个老于世故的狡猾的科布尔克家族的人¹⁶⁰，比他那在巴黎的岳父¹⁶¹更加巧妙地摆脱了困境。他向他那些自由主义的大臣、议员和市长表示，只要人民愿意，他是可以退位的。这种做法大大地感动了那些软心肠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结果他们竟然把一切犯上作乱的想法全都放弃了。

跟着国王就命令军队驱散广场上的人民集会，要警察搜捕外国流亡者。马克思这时受到了特别粗暴无理的治疗。警察不仅拘捕他本人，而且拘捕他的妻子，把她同妓女一起监禁了一夜。对这一无耻行径负责的警官后来被撤了职，拘捕令也立即撤消，但是驱逐出境的命令却依旧有效，尽管这种做法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侮辱。

因为，马克思本来已经准备动身到巴黎去。二月革命爆发之后，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立刻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布鲁塞尔的区部委员会，后者由于布鲁塞尔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而在3月3日授权马克思在巴黎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是

被临时政府3月1日由弗洛孔签署的一封满怀敬意的信约请到那里去的。

3月6日马克思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发言反对那种想以武力攻入德国以便在那里引起一场革命的冒险计划,表现了他的惊人的见识。这个计划是伯恩施太德想出来的,而遗憾的是,这个可疑的人物却把海尔维格拉到他那一边去了。巴枯宁也曾同意这个计划,不过后来又后悔了。临时政府支持伯恩施太德的计划,但不是出于革命的热情,而是另有打算,想在失业现象严重的情况下摆脱外国工人。临时政府给他们提供行军营地,并且给他们每人每天五十生丁作为开往国境的行军费。海尔维格本人并没有为临时政府的这种做法所迷惑,他知道这种做法乃是出于“政府的一种利己的动机,那就是乘机把同法国人竞争的几千名外国手工工人清除出去”。但是由于缺乏政治的眼光,结果他使这一冒险行动在尼德多森巴赫遭到了悲惨的结局^①。

马克思一方面坚决反对这种玩弄革命的行为,——革命于3月13日在维也纳¹⁶²,3月18日在柏林¹⁶³取得胜利之后,这种行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能真正推动共产主义者所最重视的德国革命的方法。根据他被授予的权力,他组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参加它的都是同盟先前的成员,其中一部分是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一部分是伦敦的(鲍威尔、莫尔、沙佩尔)。新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宣言¹⁶⁴,这篇宣言“为

^① 这里是指德国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于1848年3月在法国领土上组织的以攻入德国并在那里成立共和国为目的的德国流亡者武装军团的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海尔维格打算把革命和共和制“输入”德国的冒险计划。1848年4月海尔维格的军团越过国境之后,就在巴登的尼德多森巴赫被纽伦堡的军队击溃了。

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提出了十七点要求，其中有：宣布全德国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武装全体人民，把各邦君主的領地和其他封建領地、矿山、矿井、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建立国家工厂，实行普遍的免費的国民教育，等等。当然，这些要求所提出的只是共产主义宣傳的一些主导性的方針。因为馬克思自己最清楚，要真正实现这个綱領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需要經過长期的革命发展过程的。

一直是一个少数人的組織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没有力量推进革命运动。事实表明，大陆上同盟的改組只是刚刚开始。不过这一点已經无关紧要：由于革命使工人阶级有了进行公开宣傳的手段和可能，保存同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鉴于这种情况，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巴黎建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在那里劝告工人不要参加海尔維格組織的进攻德国的队伍，而要个别回到祖国去从事革命运动。他們就这样把几百名工人送回了德国，而通过弗洛孔的斡旋，他們为工人取得了临时政府給予海尔維格的义勇軍的那种相同的优待。

同盟的大部分盟員就用这个办法进入了德国，而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同盟成了培养革命人才的优秀学校。凡是革命运动发展得特別順利的地方，都有同盟盟員在那里領導着：沙佩尔在拿騷，沃尔弗在布勒斯劳，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其他各地也分別有人負責。波尔恩給馬克思的信里有句話說得很对：“同盟解散了——它无处不在而又到处都不存在。”作为一个組織來說，同盟确实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了，但是，作为宣傳來說，它却存在于具备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现实条件的一切地方，虽然这只是德国較小的一部分地区。

馬克思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們都到德國最先進的地區萊茵省去。拿破侖法典在那里給了他們比普魯士法在柏林所能給予的更大的活動自由。他們利用了部分民主派和部分共產主義者為了出版一張大型報紙而做的那些准备工作。當然也還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難。比如說，恩格斯就失望地認為，烏培河谷的共產主義遠不是實際存在的事物，更談不上是一支力量，而在當前的革命到來之後，它就變成了過去的幻影。4月25日恩格斯從巴門寫信給科倫的馬克思說：“關於股份（創辦中的革命報紙的股份）^①，遺憾的是在這裡很難有什麼指望……這些人像逃避瘟疫似地迴避討論社會問題；他們把這稱為煽動……”

從我的老頭子那裡根本弄不到任何東西。在他看來，《科倫日報》是一切叛亂的中心。他情願對準我們發射一千發霰彈，也不願幫助我們一千塔勒。”^②恩格斯总算又募到了十四股，結果《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萊茵報》）就在1848年6月1日創刊了。

馬克思擔任該報主編，恩格斯、德朗克、維爾特和兩個沃尔弗都參加了編輯部的工作。

（二）六月的日子

《新萊茵報》自稱是“民主派機關報”，但它並不代表議會中的左派。它也並不希望取得這種榮譽，它認為當務之急是對民主派加以監督。它表示，它的理想決不是黑紅金共和國¹⁶⁵，雖然只有在

^① 括號裏面的話是梅林加的。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115頁。

共和国的基础上它才能开始反对派的活动。

报纸完全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尽力想按照革命运动当时的情况来推进革命运动。由于在3月里争得的革命地盘到6月里已越来越多地失掉，这项任务就更加成为迫不及待的了。维也纳的阶级矛盾还不十分尖锐，因此在那里到处呈现出一种散漫的无政府状态。在柏林，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不久就把政权重新交给在三月革命中被打倒的统治者。在中小各邦，自由主义的大臣们都神气起来，但他们和他们的封建前辈不同之处，完全不是在于他们在王座面前表现了丈夫气概，相反地，倒是在于更会曲意奉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作为一个具有主权的政权机关，本来负有统一德国的使命，但是从5月18日刚一开会起就暴露出它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清谈俱乐部罢了¹⁸⁶。

在《新莱茵报》的创刊号上，就把这些幽灵清算得如此彻底，以致它那本来为数不多的股东又有一半打了退堂鼓。这时报纸对议会的英雄们的见识和勇气并没有提出过高的要求。它在批判法兰克福议会左派的联邦共和制的主张时指出，由君主立宪国、小公国和小共和国组成的、以共和政府为首的联邦，不能是德国国家组织的最終形式。但是它补充说：“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 a priori [预先] 宣布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終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对东方的战争。国家制度的最終确立不能依靠颁布命令的办法，而要在我们即将进行的运动中实现。因此问题不在于实现这个或那个意见、
184 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问题在于理解发展的进程。国民议会只应

該採取一些在最近期間切实可行的步驟。”^①然而國民議會却做了按照任何邏輯規律來說都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它推選奧地利的大公約翰為帝國攝政，這樣就有力地幫助了王公們把持這一運動。

柏林事件比法蘭克福事件更加重要。在德國境內，普魯士邦是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儘管3月18日的革命把它推翻了，但是由於歷史情況，勝利果實被資產階級所攫取，接着他們就迫不及待地把革命出賣了。為了保持“法制的連續性”，說得更確切些，為了放棄自己最初的革命意圖，資產階級的康普豪森—漢澤曼內閣召開了聯合省議會¹⁶⁷，以便借助於這一封建等級組織確立新的資產階級憲法的基础。這一點反映在4月6日和8日發布的法律上面：前者把一系列的公民權規定為新憲法的基础，後者為議會選舉規定了普遍、平等、不記名和間接的選舉權，而議會則應同國王協商制定新憲法。

由於有了臭名昭著的“協商”原則，柏林無產階級在3月18日對普魯士近衛軍團所取得的勝利實際上就被取消了。新議會的決議必須經過國王批准才能實施，這樣一來，國王就重新取得了自己過去的統治權。結果事態就發展成這樣：或者是國王獨斷專行，或者是發動第二次革命來制裁他，而這第二次革命正是康普豪森—漢澤曼內閣不惜全力加以扼殺的。它製造了許多小糾紛來使5月22日召開的議會陷於癱瘓，而自己則甘當“王朝之盾”¹⁶⁸，同時它又召回了面懾於群眾的憤怒而於3月18日逃亡英國的反動透頂的王位繼承人——普魯士親王，使當時還沒有首領的反革命有了首領。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7頁。

当然，柏林議會也沒有坚持革命的原則，然而它究竟不像法兰克福議會那样游蕩在幻想的世界里。它不惜承认那抽掉它的精髓的“协商”原則，但是当柏林市民在6月14日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并进攻軍械庫¹⁶⁹的时候，它总算采取了比較大胆的行动。这样一来，把康普豪森推倒了，然而汉澤曼却仍旧賴在那里。他們之間的不同之处是：康普豪森还因为資產階級思想的某些残余而感到苦恼，汉澤曼則毫无羞耻地卖身于資產階級的商业利益。为了替这种利益服务，他更加在国王和容克地主面前阿諛逢迎，更加腐化議會并且对群众进行空前殘暴的迫害。反革命方面有充分的理由暂时让他留在原位上。

《新萊茵报》极其坚决地反抗了事情的这种非常不幸的发展。它指出說，康普豪森根据大資產階級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它督促柏林議會，特别是它的左派，要他們坚决地行动起来。議會曾由于在攻打軍械庫时毁坏了一些旗帜和武器而表示憤慨。相反地，《新萊茵报》在談到这一点时却贊揚了人民群众的正确判断，因为他們以革命的精神不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而且反对自己过去的那些美妙幻想。它警告左派不要为在議會中取得的胜利的 surface 光彩所蒙蔽；旧势力只要是能够把一切要职把持在自己手里，他們是乐得把这些胜利奉送给左派的。

《新萊茵报》預言了汉澤曼內閣的悲惨結局¹⁷⁰。这个內閣指望借助于同旧的封建警察国家实行妥协来确立資產階級的統治。“在解决这种双重矛盾的任务的过程中，办事內閣随时都看到，反动派怎样用封建专制的精神来顛覆剛剛建立起来的資產階級統治，并顛覆內閣本身，——而內閣是注定要失敗的。如果事先沒有爭取全

体人民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沒有为了爭取人民而多少表现出一些民主精神，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取得統治的。”^①《新萊茵报》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力图把农民的解放——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合法的任务——变为可笑騙局的企图：“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沒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②因此，按照《新萊茵报》的意见，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對1789年的法国革命的諷刺而已。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一个諷刺。德国革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它的胜利只是使无产阶级得以参加政权的法国革命的一个余波。当然，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资产阶级对德国革命的背叛是正当的，而只能说明这种背叛的原因。然而，几乎就在6月的日子里，当汉澤曼內閣着手葬送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才从这场恶梦中掙脱出来。在持續了四天的极其激烈的巷战¹⁷¹中，巴黎的无产阶级被击潰了。资产者的一切阶级和党派全都为资本效劳，为资本充当劊子手。

在德国，《新萊茵报》从战尘中举起了“胜利的战敗者”的旗帜。关于民主派在阶级斗争中应当站到资产阶级方面还是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的问题，馬克思作了如下的輝煌的論述：“有人問，难道我們对那些在人民的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軍，对別动队，对共和国近卫軍，对現役軍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气，不发一言嗎？

国家将关怀他們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頌揚他們，隆重的殯仪将送他們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們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281頁。

② 同上书，第331頁。

派将从东方到西方到处贊揚他們。

但是平民則受尽飢餓的折磨，遭到報刊的誣蔑，得不到醫生的幫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縱火者和流刑犯；他們的妻子兒女更是貧困不堪，他們的那些幸免于難的優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給這些臉色嚴峻陰沉的人戴上桂冠¹⁷²，是一種特權，是民主報刊的權利。”^①

這篇到今天還燃燒着革命熱情的火焰的輝煌論文¹⁷³使《新萊茵報》失掉了另一半的股東。

(三) 對俄戰爭

在對外政策方面，對俄戰爭是《新萊茵報》的中心論題。該報認為俄國是革命的真正可怕的敵人，如果運動擴大到全歐範圍，那末俄國肯定是會參加鬥爭的。

該報在這個問題上執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就在它要求對俄國進行革命戰爭的時候，俄國沙皇曾向普魯士親王表示願意提供俄國軍隊來幫助普魯士用暴力重建專制政體。這一情況是該報當時所不能知道的，但是現在已由文件千真萬確地證實了。一年¹⁸⁷以後，俄國熊就用它那笨重的前掌壓死了匈牙利革命，從而挽救了奧地利的專制政體。德國革命不摧毀普魯士和奧地利的警察國家就不能取得勝利，但是這個目的在沙皇的實力被擊潰以前是不能實現的。

該報希望對俄戰爭能促使革命力量的爆發，就像對封建德國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157頁。

的战争曾引起 1789 年法国革命中革命力量的爆发一样。用维尔特的话来说，即使该报把德国人民 en canaille [当作一群败类] 来看待，它这种痛恨情绪也还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它在七十年中间，在美国和法国，在意大利和波兰，在荷兰、希腊和其他国家，犯下了反对其他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罪行¹⁷⁴。“现在，当德国人在抛弃自己身上的羁绊的时候，也应当改变一下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全部政策。不然的话，我们的年轻的、几乎是刚刚预感到的自由就会被束缚在我们用来束缚别的民族的锁链上。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① 该报揭露了马基雅弗里式的政策¹⁷⁵，这种政策尽管在德国国内的基础已经动摇，却引起了同德国人的世界主义的性格格格不入的种族仇恨。这样看来，这一政策力图麻痹民主力量，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入歧途，从而为国内压迫铸造武器。

“尽管几乎所有的德国报刊都发出了爱国主义的吼声”^②，《新莱茵报》从一开始就为波兹南的波兰人，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和匈牙利的匈牙利人进行辩护。它嘲笑了“阴险狡猾的勾当”和“荒诞的历史奇闻”：正当德国人对本国的各邦政府进行斗争的时候，却策划要他们在这些政府的统率下对波兰、波希米亚和意大利的自由发动一次十字军征讨。“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像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锁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卷，第 178 页。

② 同上书，第 235 页。

解放。”^①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該报在保卫波兰人方面是特別热情的。1848年的波兰运动只限于普魯士所屬的波茲南省¹⁷⁶，因为俄屬波兰被1830年的革命¹⁷⁷削弱了，而奧屬波兰又被1846年的起义¹⁷⁸削弱了。波兰的态度是相当溫和的，它所要求的至多不过是1815年的条約所許諾而未給的东西，那就是用当地軍隊代替占領軍，起用当地人担任一切官职。在3月18日以后惊惶情緒剛剛开始的时候，柏林当局曾答应对波兰进行“民族的改組”¹⁷⁹，当然，他們心里明白，他們是不会把这一点付諸实施的。波兰人是十分老实的，他們相信柏林当局的善良意图，可是柏林当局却唆使波茲南的德国居民和犹太居民去反对波兰居民，并且有計劃地挑起了一場內战。这样看来，挑撥內战的行动和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慘禍几乎完全要由普魯士負責。在殘暴的压迫之下被迫起来进行武装抵抗的波兰人英勇地进行了战斗，他們好几次——例如，4月30日在米洛斯拉夫——打败了在人数上和装备上都比他們强大的敌人。当然，用波兰人的镰刀来反抗普魯士人的榴霰彈的战争到底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在波兰問題上，德国資產階級的行为照例是既愚蠢而又背信棄义的。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时候，他們清楚地知道德国問題同波兰問題之間有何等密切的联系。而且就是在3月18日以后，他們的那些明智之士也还在所謂法蘭克福預备議會中郑重宣称，重建波兰乃是德国人民的神圣义务。然而这种表示絲毫不曾妨碍康普豪森在这个問題上也扮演了普魯士容克地主分配給他的那个獄卒的角色。他可耻地背棄了进行“民族的改組”的諾言，而把波茲南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235—236頁。

省的土地一块又一块地剥夺了去，这些土地总共占它的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外，他又迫使联邦议会把从波兹南那里剥夺来的这些土地并入德意志联邦。而这个联邦议会那时正在普遍蔑视的重压下处于垂死状态，只剩下咽最后一口气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得不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它应当不应当承认从波兹南省被合并过来的地区选出的议员为合法的成员。在三天的辩论之后，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果然不出人们所料：革命的这个逆子在为反革命的恶行祝福了。

《新莱茵报》何等重视这一问题可以从下述情况看出来：它用八九篇很长的文章详细讨论了法兰克福议会的辩论¹⁸⁰，这同它平时报道议会辩论时的那种轻蔑的简短完全不同。一般说来，这是《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最长的文章。从内容和风格来看，这些文章¹⁸⁹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笔。至少可以肯定，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因为这些文章带有恩格斯的笔法的明显痕迹。

文章最引人注目并且取得了极大荣誉的一点是它们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对波兰人玩弄的卑鄙的把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种绝非善心的庸夫俗子所能设想的深刻义愤，完全不同于罗伯特·勃鲁姆在法兰克福为受压迫的波兰人发表的那些悲天悯人的同情论调。“最庸俗的废话——纵然是（但愿如此）范围很广、说得很高明的废话”^①——这番话正是对着这位著名的左派演说家讲的，而且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懂得，背叛波兰人就是出卖德国革命，因为，这样一来，德国革命就失掉了对抗自己的死敌沙皇的必不可少的武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00页。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各族人民的普遍友爱”也列为“最庸俗的政治廢話”之一，因为这种說法不考虑各个民族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只想籠統地使所有的人和睦相处。“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独立”这些字眼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多多少少是說教的空話，这些空話尽管十分动听，但是在历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問題上照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这种“現代的神話”一向就引起他們的厌恶。而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中，只有一个口令對他們是特別重要的，这就是“贊成还是反对？”。

在《新萊茵報》上发表的有关波兰的論文都充滿了真正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使得这些論文大大超过了一般民主派所写的那些同情波兰人的悲天憫人的空談。这些論文直到今天也沒有失去它們的意义，因为它们雄辯地证明了作者最深刻的政治远见。但是它們在涉及波兰历史的时候仍未免有一些錯誤。如果說指出波兰爭取独立的斗争只有当它同时是农民民主制对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的胜利的时候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一点是重要的，那末，从另一方面來說，认为波兰从1791年宪法¹⁸¹实施时起就懂得了这种联系，就是不正确的了。下面的一种說法也同样是同实际情况不符的：在1848年，貴族民主制的旧波兰早已死去并被埋葬了，但是它却留
180 下了一个强壮的儿子，即农民民主制的波兰。波兰的容克地主們为了把本民族从东方列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曾在西欧的街垒上进行过英勇的战斗。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人看成是波兰貴族的代表者。但是实际上，在斗争的烈火中受到鍛炼、受到淨化的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都已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就如同早先胡登和济金根超越了德意志的騎士阶级，而不久之前克劳塞維茨和格奈澤瑙超越了普魯士的容克地主阶级一样。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放棄了這一錯誤的見解，但是恩格斯却把《新萊茵報》對南方斯拉夫大小民族爭取獨立的鬥爭的那種蔑視態度永遠地保持下來。就和在1849年同巴枯寧論戰時一樣，恩格斯在1882年仍然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在1848年7月人們會懷疑這位俄國革命者是俄國政府的奸細。這種懷疑是《新萊茵報》上發表的該報駐巴黎記者艾韋貝克的通訊提出的，並且得到哈瓦斯通訊社同一時期的類似報道的證實。然而很快就判明這一消息是不真實的，於是編輯部在百般道歉之後把它收了回來。後來當馬克思在8月底和9月初到柏林和維也納去的時候，他就同巴枯寧恢復了過去的友誼，並且堅決反對普魯士在10月間驅逐巴枯寧的行動。恩格斯也在反駁巴枯寧給斯拉夫人的呼喚書時首先聲明巴枯寧是“我們的朋友”，然後才對巴枯寧的小冊子的泛斯拉夫主義傾向展開尖銳而中肯的批判¹⁸²。

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也首先是革命的利益起着決定作用。在維也納政府反對德國和匈牙利革命者的鬥爭中，奧地利的斯拉夫人，除波蘭人以外，都是站在革命敵人一邊的。他們圍攻起義的維也納，把它出賣給皇室和王家的酷吏，任憑他們對它進行無情的報復。就在恩格斯攻擊巴枯寧的時候，奧地利的斯拉夫人發動了鎮壓起義的匈牙利的戰爭。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精辟地論述了匈牙利的革命戰爭。他對這一戰爭抱着熱烈的同情，他過高估計了馬扎爾人¹⁸³的歷史發展水平，就和他過去過高估計了波蘭人一樣。巴枯寧要求保障奧地利斯拉夫人的獨立，對於這一要求，恩格斯回答說：“我們不打算這樣做。對於那些以最反革命的民族的名義向我們所說的關於博愛的悲天憫人的漂亮話，我們的回答是：恨俄國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德國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自從革命開始以

191 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們才能够同波兰人和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我們現在知道，革命的敌人集中在什么地方：他們集中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斯拉夫地区；无论什么花言巧語或关于这些国家的渺茫的民主未来的指示，都不能阻止我們把我們的敌人当作敌人来对待。”^①这样恩格斯就宣布了一場对“出卖革命的斯拉夫民族”的无情的殊死的斗争。

恩格斯并不是由于看到奥地利斯拉夫人卑躬屈节地为欧洲反动派效劳而在激怒的情緒下写了这段話的。恩格斯认为一切斯拉夫民族——除去波兰人、俄国人，可能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在历史上都是沒有任何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沒有具备为独立和維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②。根据他的意見，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使他們成了沙皇政府的盲从的工具，而泛斯拉夫主义民主主义者的好心的自我欺騙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文明的大民族的革命发展的历史权利比起这些支离破碎而又无能为力的小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来是更重要的。如果这时有几朵嬌嫩的民族花朵枯死，那是沒有什么关系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民族才能参加共同的历史发展，而如果任凭他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这种发展就会同他們完全无緣了。恩格斯还在1882年时說，当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要求解放的愿望同西欧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是根本不会为沙皇政府的这些走卒落泪的。政治中是不能有詩人的同情的。

恩格斯认为各个斯拉夫小民族在历史上沒有前途，这是不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42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328頁。

的。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当这个基本思想同庸夫俗子的“诗人的同情”发生冲突的时候，《新莱茵报》也总是十分坚决地捍卫这个基本思想。

(四)九月的日子

这里谈的是普鲁士政府在3月18日以后根据德意志联邦¹⁸⁴的指示而开始的对丹麦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霍尔施坦是德国的地区，并且参加了德意志联邦。什列斯维希¹⁹²没有参加这个联邦，至少它的北部地区主要是由丹麦人住着的。这两个公国几百年来一直同丹麦王国在同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结合在一起¹⁸⁵，而丹麦王国本身只是比这两个地方面积略微大些和人口略微多些。丹麦王朝同时也实行女系继承的，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则只是实行男系继承的。两个公国通过同君联合这种密切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并在这种密不可分的状态中具有国家的独立性。

根据国际条约，丹麦同两个公国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在19世纪初以前，德意志精神在哥本哈根居于主导地位，德语是丹麦王国的官方语言，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贵族在丹麦的官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化了。丹麦由于始终不渝地忠于法国革命的遗产，而不得不根据维也纳条约放弃挪威。争取国家生存的斗争促使丹麦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合并过来，这特别是由于丹麦王室的男性继承人行将断绝，而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得两公国转入旁支

之手的日子越来越近,从而有使它們从丹麦完全分离出去的可能。因此丹麦便开始千方百計地摆脱德国的影响,并人为地推行斯堪的那维亚化,力图把自己同挪威、瑞典結合成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因为,要創造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它本身是太小了。

丹麦政府想完全占有易北河两公国的企图遭到了两公国的最頑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很快地就变成了德国全国性的問題。經濟繁荣的德意志,特别是在关税同盟成立之后,懂得突出于两海之間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半島对于它的商业和海上往来是何等重要。它日益欢欣鼓舞地欢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对丹麦的宣傳的反抗。从1844年开始,《大海环抱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是德国風尚的可靠保卫者!》这支歌曲几乎成了国歌。当然,这一运动并没有超越三月革命前的运动的那种緩慢的、懶散的步調,然而德国各邦政府依然不能不受它的影响。当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八世在1847年决定采取强力措施,在一封公开信中把什列斯維希公国、甚至霍尔施坦公国的一部分称为完整的丹麦国家的組成部分的时候,以至联邦議會¹⁸⁶都鼓起勇气來提出了軟弱无力的抗議。至少它这一次沒有像往常那样,在需要抵制諸侯的暴行来保卫德意志民族的时候宣称自己沒有这样的权限。

《新萊茵报》对于“大海环抱的”霍尔施坦人的那种資產階級的、酒后的热情是毫不同情的。它认为这只是同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相对的另一极。它抨击这种斯堪的那维亚主义,說它“歌頌殘酷的、粗暴的、海盜式的古諾曼人的民族性格,即极端的閉关自守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用以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的不是語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妇女,經常酗酒,时而瘋狂好战(Berserkerwut)^①,时而

① Berserker 是斯堪的那维亚傳說中凶猛武士的形象。

又泪眼汪汪多愁善感。”^①在那里，全部情况颠倒错乱到如此奇怪的程度，以致在丹麦的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反动旗帜下作战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对派，即所谓“埃德尔丹麦人”党¹⁸⁷；他们渴望把什列斯维希公国变为丹麦的领土，渴望扩大丹麦的经济领域，以便通过现代宪法加强一般国家体制，而另一方面，两个公国本身为它们的古老的、有文献记载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则或多或少是争取封建特权和王朝的表面光彩的斗争。

1848年1月，弗里德里希七世登上了丹麦的王位。他是王朝男系的最后一个后裔，他遵照父亲临终时的嘱咐，着手为丹麦和两公国准备一部自由主义的共同宪法。一个月之后，二月革命在哥本哈根引起了暴风雨般的人民运动。这一运动使得“埃德尔丹麦人”党取得了政权，而这个党立刻就开始不屈不挠地努力实施自己的纲领——把什列斯维希直到埃德尔河的地方并入王国的版图。两公国对这一行动的回答是，与丹麦国王断绝关系，组成了一支七千人的军队并且在基尔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贵族，但是贵族并没有发动足以与丹麦当局相抗衡的全国力量去进行斗争，却向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政府去求救，因为他们认为这二者对他们的封建特权不会有任何危险。

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政府表示非常愿意给两公国的贵族以支持。在它们看来，“保卫德国的利益”乃是从革命的沉重打击下恢复元气的一个十分方便的手段。普鲁士国王特别感到迫切需要恢复他那在3月18日的街垒战中为柏林革命战士所击溃的近卫军的¹⁹⁴声誉，因此打算要近卫军到弱小的丹麦去作一次军事旅行。他憎恨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64页。

“埃德尔丹麦人”党，把它看成是革命的余孽，但是他认为就是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人也是反对神所建立的政权的乱党，因此命令自己的將領尽可能馬虎地执行“为革命奔走的任务”。他通过自己的密使馮·維登布魯赫少校照会哥本哈根方面說，他力图首先为国王公爵保存易北河两公国，而且他之出面只不过是防止过激分子和共和分子进行有害的干涉罢了。

但是丹麦並沒有上他的当。丹麦方面也向列强請求保护，而英国和俄国則乐得給它这种保护。它們的援助使得小小的丹麦把老大的德国像揍頑皮的小学生那样狠狠地揍了一頓。丹麦的战舰使德国的貿易受到沉重的損失。另一方面在普魯士將軍弗兰格尔統率下突入易北河两公国的德意志联邦的軍隊，尽管弗兰格尔的战略并不高明，却仍然赶跑了弱得多的丹麦軍隊。但是列强的外交干涉却使这支軍隊完全不能有所作为。5月末，弗兰格尔从柏林接到了撤出日德兰的命令。对此，国民議会在6月9日决定，有关两公国的問題，作为同整个德国有关的問題，是屬於它的职权範圍之內的，它将要維護德国的荣誉。

战争确实是以德意志联邦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应当由国民議会和6月28日被国民議会任命为帝国摄政的哈布斯堡大公来領導这一战争。但这种情况並沒有使普魯士政府感到为难，它完全沒有考虑帝国摄政所提出的条件，完全沒有考虑是誰传达了这些条件，便在8月28日在英国和俄国的压力下同丹麦在瑪尔摩締結了一項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条件对德国來說是极为可耻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临时政府宣布解散，在停战协定有效期間，最高行政权交給一个亲丹麦的人士；前临时政府的法令均予廢除，什列斯維希的軍隊同霍尔施坦的軍隊分离。同样，德国

在軍事方面也不得不开始退却，尽管停战协定的有效时期是在丹麦舰队不能封鎖德国的港口的冬季，而严寒却可以使德国的军队从冰上越过小貝尔特海峡，占領芬宁島，并把丹麦压制在一个西兰島上。

締結停战协定的消息在9月初的日子里对于法兰克福国民議會 195 会來說簡直是一个晴天霹靂；它“像洗衣婆和中世紀經院哲学家那样絮絮叨叨地”討論未来帝国宪法的紙上的“基本权利”，竟至討論到发昏的程度。在最初的惊惶失措之下，它于9月5日决定停止实施停战协定，并且因此而引起了帝国内閣辞职。

《新萊茵报》对这一决定是极为滿意的，尽管它并未抱任何幻想。《新萊茵报》不管条約所批准的权利而要求对丹麦作战，认为这是以历史发展为依据的权利。“丹麦人民無論在貿易、工业、政治和文学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賴德国的地位。大家知道，丹麦的京城实际上不是哥本哈根，而是汉堡……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資料，正如获得物质資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的拙劣的翻版……

.....

根据法国人据以夺取了弗朗德里亚、洛林和亚尔薩斯以及迟早会侵占比利时的那种权利，德国正在夺取什列斯維希，这种权利就是：文明对于野蛮的权利，进步对于停滞的权利……

我們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进行的战争是真正的革命战争。

.....

誰一开始就站在丹麦一边呢？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强国：俄国、英国和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政府自始至终进行的只是虛假的战争，

只要回想一下維登布魯赫的照會、普魯士政府根据英国和俄国的声明下令从日德兰撤退的决心以及两次停战协定就清楚了！普魯士、英国和俄国这三个强国最害怕德国的革命和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德国的统一。普魯士怕德国统一以后自己不能再存在，英国怕因此不能再剝削德国的市場，俄国怕因此民主制度不仅会推广到維斯拉河，甚至会推广到德維納和德涅泊河。所以普魯士、英国和俄国共同密謀反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反对德国和反对革命。

目前由于法兰克福的决定而可能引起的战争也許会成为德国反对普魯士、英国和俄国的战争。这将是反对三个反动强国的战争，无精打采的德国运动正需要这种战争，这场战争将真正使普魯士和德国溶为一体，将使德国绝对需要和波兰结成联盟，将立刻使意大利获得解放，这场战争将要反对的恰恰是德国在1792—1815年的旧的反革命同盟者，它将使‘祖国遭到危险’并从而拯救祖国，因为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将以民主制的胜利为转移。”^①

《新莱茵报》的这些話所清楚而又尖锐地表明的东西是符合于群众的革命本能的：成千上万的人从周边五十哩的地方涌到法兰克福来，准备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但是正如该报所正确指出的，这一革命斗争会把国民议会本身扫除掉，而且国民议会是宁肯因胆怯而自杀，却不願因英勇而自杀的。9月16日国民议会批准了瑪尔摩的停战协定，而且甚至它的左派（除去其中的少数）都拒絕以革命的国民议会的身分出现。事情只发展到法兰克福城内的小規模的街垒战斗，而勇敢的帝国摄政甚至故意让这一战斗稍稍扩大，

①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64、466、467、468頁。

以便随后把一支人数远远超过法兰克福革命实力的军队从联邦要塞美因兹调来，并且把有主权的国民议会置于刺刀的统治之下。

同时，汉泽曼内阁在柏林落了个悲惨的结局，这一点正是《新莱茵报》早就向它预示过的。这个内阁仿佛是加强了反对“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政权”，而实际上却帮助在3月18日垮掉的旧普鲁士官僚、军事和警察国家重新站了起来。同时汉泽曼甚至未能迫使国王保障资产阶级的纯收益，虽然他正是为了这种利益才出卖革命的。首先，正像柏林议会的一位议员所抱怨的那样，“在三月革命期间被抛棄的旧的军事制度，全部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而从巴黎六月革命以来，这一制度的佩刀又在刀鞘中鸣响起来。普鲁士政府要把弗兰格尔和他的近卫军调回柏林郊区并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反革命打击的意图，决不是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的一个次要的原因，这一点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的。因此柏林议会就在9月7日鼓起勇气，要求陆军大臣发布命令，警告军官们，要他们放棄一切反动的意图，而在他们的政治信念同宪法的规定不一致的时候，则責成他们把退役当作一种光荣的义务。 197

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这一类的命令过去对于文官也往往是不发生作用的。但就是这样一点点事情军人也不愿意按照文官内阁的要求做。汉泽曼的内阁垮台了，普富尔将军组成了一个纯官僚的新内阁。这个内阁泰然地发布了议会向它要求的给军官的命令，这样就向全世界证明，军阀不但不害怕文官的政权，甚至对这一政权采取嘲弄的态度。

《新莱茵报》关于“玩弄小聪明、嘍嘍不休和缺乏果断的”柏林议会的预言就这样地实现了。左派终有一天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议会内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一种失败。反革命报刊叫嚣說，左派之所

以取得胜利，只是因为柏林的人民群众向議會施加了压力，而为了回答这种叫嚣，該报完全没有采取自由主义报刊所采取的那种拙劣的做法，否认施加压力的事实，而是直截了当地宣布說：“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議會，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議会的立場——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風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議會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①对于1848年9月的日子里的“議會迷”的这种暗示，既适用于法兰克福議會也同样适用于柏林議會。

（五）科倫的民主派

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九月危机对科倫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萊茵諸省是最使反革命势力感到不安的。那里駐有大批从东部諸省招募来的軍隊。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普魯士軍隊駐扎在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因此发动小規模的起义是无济于事的，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組織，以便准备有朝一日从局部的革命发展为真正的革命。

建立民主組織的决定是在有八十八个民主团体的代表参加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六月代表大会上作出的。这个民主組織
198 只在科倫有坚实的骨架，而在德国其余的地方都是十分不巩固的。科倫的民主派是由三大团体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团体都有几千名會員：以馬克思和律師施奈德尔为首的“民主协会”¹⁸⁸、莫尔和沙佩尔領導的工人联合会¹⁸⁹以及候补法官海尔曼·貝克尔在其中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480頁。

起最大作用的“工人业主联合会”。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宣布科倫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中心之后，这些团体就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8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在科倫召开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民主团体的代表大会¹⁹⁰。参加大会的有代表四十人，他们代表着十七个团体，这十七个团体都承认科倫三个团体的中央委员会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区域委员会。

馬克思成了这一組織的灵魂，就像他是《新莱茵报》的灵魂一样。他有一种使别人服从的天才，而这种天才当然是庸俗的民主主义者所最不能容忍的。卡尔·叔尔茨在科倫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见了馬克思。当时叔尔茨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大学生，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了馬克思：“那时他才三十岁，但他已经是社会主义派的公认的領袖了。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前額寬大，黑头发，大鬍子，眼睛又黑又亮。他立刻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人們談到他的专长时，說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馬克思的言談切实而有内容，清晰而合乎邏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人在发言时像他那样咄咄逼人，像他那样高傲得使人难以忍受。”^①而且这位资产阶级英雄清楚地記得馬克思說到“资产者”这个词儿时的那种尖刻挖苦的声調，就仿佛是把唾沫吐到他的臉上一样。

泰霍夫中尉在同馬克思晤談后两年，用同样的口气写道，“馬克思給我的印象是，他不仅有稀有的超人的才智，而且还是一位品格卓越的人物。如果他的感情像他的才智一样丰富，他的爱像他的恨一样强烈，那末我就甘願为他赴湯蹈火，尽管他不仅旁敲侧击

① 参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5頁。

地，而且最后竟完全公开地表示了他对我的极大蔑视。我认为在我們所有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有领导才能，并且能够在重大事件当中不糾纏于細节的人。”^①但是接着他就发出了这样的哀叹，說什么馬克思的最危險的个人虛榮腐蝕了他的整个灵魂。

一位美国的傅立叶信徒、《紐約每日論壇报》的記者阿伯特·布里茲倍恩在1848年的夏天曾和这家报纸的出版人查理·德納一道住在科倫。布里茲倍恩对馬克思的評价却是不同的，他說：“我在那里見到了人民运动的領袖卡尔·馬克思。当时正是他春風得意的时候。这个人大概有三十岁，身体茁壯，面容英俊，有着一头濃密的黑发。从他的相貌可以看出他的精力十分充沛，在他的含蓄后面可以感到一个勇敢的灵魂的热情火焰。”馬克思当时确实在慎重而又十分勇敢地領導着科倫的民主派。

尽管九月的危机引起了群情的激奋，法兰克福議会却未敢发动革命，普富尔內閣也未敢发动反革命。因此，一切地方性的起义都沒有希望了。可是正因为这个緣故科倫当局却更加想激起暴动，以便輕而易举地加以血腥的鎮压。在他們所捏造的并很快就被他們自己放棄了的借口之下，当局对民主派的区域委员会的委員以及《新萊茵报》編輯部的人員进行了司法的和警察的迫害。馬克思曾警告大家提防敌人的阴谋詭計；在沒有任何重大問題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注定要失敗的时候，试图举行起义是沒有意义的。可是在最近的将来必然会发生重大的事件，而在决定性关头到来的前夕，是不应当使自己喪失战斗力的。如果国

^① Carl Vogt, Mein Proc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控告》，日内瓦，1859年，第151頁。

王敢于发动反革命的话，对人民说来，新的革命的钟声就敲响了。

但是9月25日，也就是貝克尔、莫尔、沙佩尔和威廉·沃尔弗被逮捕的那一天，事情仍旧发展到了小規模騷动的地步。当人們得到消息說，軍隊正在开来驅散旧市廣場上的民众集会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街壘修筑起来。但是軍隊並沒有出現，直到事件完全平靜下去以后，警备司令才敢于在科倫宣布戒严。这种情况决定了《新萊茵报》的命运，該报在9月27日停刊了。原来，这次毫无意义的暴行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掉《新萊茵报》，几天之后普富尔便宣布取消戒严令。这次打击确实是沉重的，因为直到10月12日报紙才重新在戰場上出現。

報紙的編輯部拆散了，因为大多数編輯人員为了避免被捕而不得不逃到国外去，——比如，德朗克和恩格斯逃往比利时，而威廉·沃尔弗則逃往普法尔茨，——直到后来才陸續回来。1849年1月初，恩格斯还在伯尔尼；他是在徒步走了一大段路之后才穿过法国到达那里的。然而首先報紙的財政基础彻底动摇了。在股東們退出之后，報紙只是靠增加发行份数勉强維持着。在这次新的打击之后，報紙所以还能維持，只是因为馬克思把報紙当作“个人的财产”接了过来，換句話說，就是他把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或是用未来的遗产作抵押而取得的少量資金全都花在報紙上面了。关于这件事，他本人从来不曾提过一个字，但是他妻子的信以及朋友們的公开的证明都可以确定这一点。他們估計，馬克思在革命的一年里用于鼓动工作和報紙的那笔款項大約有七千塔勒。当然，重要的不是款項的数目，而是馬克思为了保卫要塞不惜战斗到最后—发子彈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在另一方面，馬克思的处境也是十分艰难的。革命爆发之

后，联邦議会在3月30日决定，德国的流亡者如果返回德国并宣布自己願意重新取得公民权，他們也可以享有国民會議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魯士政府也确认了这一决定。馬克思履行了保证給他以公民权的条件，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权利要求登記为普魯士公民了。科倫市政委员会在1848年4月馬克思提出申請之后，就确实立刻把公民权給了他。馬克思向科倫警察局长弥勒声明，在事情尚未最后确定下来的情况下，他不能把全家从特利尔迁到科倫来。于是弥勒向他保证說，就是行政区政府也会承认馬克思的重新归化的，根据旧的普魯士法律，应当由行政区政府来批准市政委员会的决定。那时《新萊茵报》已开始出版，然而8月3日馬克思从警察厅长盖格尔那里接到正式通知說，国王政府“目前”认为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把普魯士的公民权給予一个外国人，因此馬克思在今后仍将被視为一个外国人。8月22日馬克思向内务大臣写了一份申訴书，对这一措施表示强烈不滿，然而他的申訴被駁回了¹⁹¹。

但是他这位最溫存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还是把自己的一家人在“事情尚未最后确定下来的情况下”接到科倫来了。在这期間，家里又添了人口：1844年5月生了第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起了和母亲相同的名字——燕妮，在这之后，1845年9月生了第二个
201 女儿劳拉。继而，大概相隔不久，又生了儿子埃德加尔；在这些孩子以及在后来生的孩子当中，他是唯一无法确定誕生年月的孩子。海倫·德穆特从在巴黎的时候起就跟着他們一家，成为他們全家的忠实的守护者。

馬克思不是那种見面就跟人称兄道弟地表示亲热的人。不过他却能恪守忠誠和友誼。就在那次科倫代表大会上，虽然据說他曾

以他那种令人难堪的傲慢把那些願意同他接近的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然而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他結識了两位終生友情不渝的朋友，这就是特利尔的律师席利和克雷費尔特的教員伊曼特。如果說，他那孤高的性格在叔尔茨和泰霍夫之流的半革命者的眼里看来是无法容忍的，那末，正是在科倫居住期間，他那精神上的魅力却不可抗拒地把弗萊里格拉特和拉薩尔这样一些真正的革命者吸引过来。

(六) 弗萊里格拉特和拉薩尔

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比馬克思大八岁。在青年时代，他受过很深的虔誠的宗教徒的教育，而当他在海尔維格被逐出普魯士后写詩嘲笑这位詩人的不成功的凱旋旅行的时候，他曾受到旧《萊茵报》的痛击。但是三月革命前的反动很快地就把他从保罗变成了扫罗¹⁹²。在布魯塞尔亡命期間，他只是仓促地然而友好地会見了馬克思，而正像他所說，会見了这个“有趣的、亲切而作风朴实的人物”。在这件事上弗萊里格拉特的判断是十分高明的。要知道，弗萊里格拉特本人是个絲毫不追求虛荣的人，因此別人身上有一点点自命不凡的影子，他也会銳敏地感觉到的。

他和馬克思之間的真正友誼是到1848年的夏天和秋天才結成的。他們两人在萊茵的运动中都为捍卫共同的革命原則表現出了坚强果敢的性格，而对于这种性格的相互尊重就把他們結合到一起了。“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十分正直的人……这是我只能贈給少数人的贊語。”^①这就是馬克思在給魏德迈的信中怀着真正尊敬的心情所写的話，而且馬克思还劝魏德迈要“奉承一下”弗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20頁。

202 萊里格拉特，因為詩人是這樣一類人，他們喜歡別人贊揚，如果人們想要他們歌唱的話。還有一次，一向不輕易吐露心情的馬克思在他們發生爭執的時候寫信給弗萊里格拉特說：“我坦白地承認，我不能由於一些小的誤會而失掉我所愛的少數真正朋友當中的一位。”^①在極端貧困的時候，馬克思除了恩格斯之外，就沒有比弗萊里格拉特更加忠實可靠的朋友了。

這種友誼的純朴和真誠一直引起庸夫俗子的气憤，他們認為這是愚蠢的。他們時而說什麼詩人的热情的想像力在拿他惡作劇，把他拖入居心不良的人們的一伙中去，時而又說什麼一個惡魔一樣的煽動家從精神上毒害了天真無邪的詩人，使他變得沉默了。對於這種胡言亂語，如果不是人們用了不對症的药物作為解毒劑（比如，有人想把弗萊里格拉特描寫成一個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消說這種看法也是不正確的），本來是用不着再多費唇舌的。弗萊里格拉特之為一個革命者，乃是出於詩人的直觀，而不是出於科学的信念。他把馬克思看成是一位先進的革命戰士，而在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則把馬克思看成是當時無與倫比的革命先鋒。但是《共產黨宣言》的歷史思維過程對他來說却多少是有些陌生的，而從另一方面來說，他的奔放的想像力也不能滿足於那種“往往是簡陋、穩重而煩瑣的鼓動方式”。

斐迪南·拉薩爾却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人物。他在這一個時期里同馬克思的來往是很密切的。他比馬克思小七歲。在那時以前，他只是因為熱心地為受丈夫虐待並為本階級所摒棄的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打抱不平而出名。1848年2月拉薩爾曾因所謂教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97頁。

唆盜竊文件匣的罪名而被逮捕¹⁹³，但是他在出色地為自己進行了辯護之後，在8月11日被科倫的陪審員宣告無罪。此後，他才參加了革命鬥爭。由於拉薩爾“對任何偉大的力量都懷有無限的同情”，所以他對這一鬥爭的領導者馬克思十分折服。

拉薩爾受過黑格爾學派的訓練並且充分掌握了老師的方法。他對這種方法的無謬性並不懷疑，然而卻沒有後繼者所特有的那種淺陋。在拉薩爾訪問巴黎的時候，他研究了法國的社會主義，而海涅的銳敏的眼光預見到了他的偉大前途；但是對這個青年人的殷切期待後來卻由於這個青年人的本性的某種二重性而受到了抑制。而他在對一個被壓迫種族的消極的遺產進行鬥爭時並未能徹底消除這種二重性：在他父親的家里，波蘭猶太人的那種鄙俗習氣還是占着絕對的上風。在拉薩爾維護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鬥爭中，即使是思想比較自由的人也並不總是承認他所說的以及從他的觀點看來有權利說的話，這就是：在這一個別的事例中，他是在對垂死的時代的社會罪惡進行鬥爭。根本就不大喜歡他的弗萊里格拉特，帶着蔑視的口吻談論這件“家庭丑事”，而在拉薩爾看來，全部世界歷史都是在環繞着這件“家庭丑事”旋轉的。 203

七年之後，馬克思表示了差不多是同樣的意見：拉薩爾是自命不凡的，因為他曾經在一件私事中，表現得無所顧忌，就仿佛一個杰出的人物真地能夠為了這樣一件小事犧牲自己一生中的十年似的。又過了幾十年，恩格斯說馬克思從一開始就對拉薩爾抱着強烈的反感，還說馬克思故意儘可能不去注意拉薩爾為哈茨費爾特夫人所進行的訴訟，因為他不願意在這樣的事情上表示和拉薩爾有任何共同之處。但是這一次恩格斯卻記錯了：《新萊茵報》在9月27日停刊之前，曾非常詳細地報道了有關盜竊文件匣的案件，

而从它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件案子是有它的不光彩的一面的。正像馬克思本人在他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里所提到的，馬克思在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困难的时候，也曾帮过她的忙，从自己的为数无多的錢里拿出一部分来借给她。而当馬克思刚到科倫生活非常穷困的时候，他在这个有許多老朋友的城市，除了依靠弗萊里格拉特之外，还曾依靠过拉薩尔。

当然，恩格斯在下述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这就是：馬克思也同恩格斯与弗萊里格拉特一样，用通俗的說法來說，干脆对拉薩尔抱有反感——不过这种反感是沒有任何理性的根据的。但是却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馬克思並沒有为这种反感所左右，乃至不承认对哈茨費尔特的庇护的比較深刻的意义，更不用說拉薩尔的强烈的革命热情，他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杰出天才，以及最后，这位比馬克思年輕的战友对馬克思所表示的那种忠实的友情了。

必須正确地闡明拉薩尔同馬克思之間的关系从一开始是怎样形成的，但这并不是为了拉薩尔，因为拉薩尔的历史权利是早已受到了維護的。这无宁說是为了維護馬克思，使他不致受到任何誤解，因为他对拉薩尔的态度乃是他一生中一个最复杂的心理問題¹⁹⁴。

(七)十月和十一月的日子

204 当《新萊茵报》从10月12日起重新开始出版并声明弗萊里格拉特参加了編輯部的时候，它有幸迎接一次新的革命¹⁹⁵。10月6日維也納的无产阶级狠狠打击了哈布斯堡反革命勢力的狡猾的計划。这一計划的內容就是，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之后，先

是在斯拉夫諸民族的協助下击潰叛亂的匈牙利，然后再收拾德國的叛亂者。

从8月28日到9月7日，馬克思留在維也納发动那里的群众¹⁹⁶。从現存的很少一点報紙上的报道来判断，他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維也納工人的覺悟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正因为如此，对于維也納工人抗击奉命进攻匈牙利的团队的進軍的那种真正革命的本能，也就应当給以更高的評價。他們用这种办法把反革命的第一次打击引到自己身上来——这是匈牙利貴族所作不出的一次慷慨的牺牲。匈牙利貴族想依靠自己的那些载入宪法的权利进行爭取本国独立的斗争，而匈牙利的軍隊則只敢进行胆怯的进击，这种进击不仅沒有給匈牙利起义者的生死斗争带来方便，相反地，却給这一斗争增加了困难。

德國民主派的态度也不見得更好一些。他們清楚地認識到，就是对他們自己來說，維也納起义的成敗也是关系重大的。如果反革命势力在奧地利的首都取得胜利的話，那末反革命势力也会在普魯士的首都施加决定性的打击，因为它早已在那里伺机待动了。但是德國的民主派却只是沉浸在感伤的悲叹、无益的同情里，一味地向无能为力的帝国摄政哀呼求援。10月末第二次在柏林召开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①发表了由卢格起草的、保卫被包圍的維也納的呼吁书，而正如《新萊茵报》所中肯地报出的，这份呼吁书用說教者的慷慨激昂的呼号来代替革命毅力的不足，掩飾思想和热情的完全缺乏。馬克思用有力的散文而弗萊里格拉特用精彩的

^① 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召开的，大会沒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动员群众对反革命进行斗争，却一味在那里空談和作出一些无用的、相互矛盾的決議。

詩歌在報上發出了熱情的號召，要求給予維也納人以唯一能夠拯救他們的援助——在本國戰勝反革命¹⁹⁷。但是這些號召成了曠野中的呼聲。

維也納革命的命運就這樣地決定了。被本國的資產階級和農民所出賣、而只是在大学生和部分小資產階級中間找到支持的維也納工人，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10月31日晚上，圍攻的軍隊猛襲成功，而在11月1日巨大的黑黃旗¹⁹⁸就飄揚在聖斯蒂芬塔上面了。

在維也納的這場激動人心的悲劇之後，緊接着就有一幕奇妙的悲喜劇在柏林開場了。普富爾的內閣倒了台而代之以勃蘭登堡的內閣，這個內閣命令議會遷居到外省的城市勃蘭登堡去，而弗蘭格爾則率領着近衛軍團開入柏林，用武力來執行這一命令。霍亨索倫家族庶出的勃蘭登堡過分得意地把自己比做一头踏死革命的大象。《新萊茵報》却更加確切地把勃蘭登堡和他的同謀者弗蘭格爾稱為“兩個沒有頭腦、沒有心肝、沒有主見而只有胡子的人物”。但是，作為這樣的人，他們對於可尊敬的協商派議會來說，倒不愧為旗鼓相當的對手。

確實，“單是胡子”就足夠把議會吓倒了。誠然，議會曾拒絕離開憲法給它規定的柏林會址，而當一個打擊接着一個打擊而來的時候，當市民自衛軍被解散並宣布了戒嚴的時候，議會曾宣布內閣各部大臣為國事犯，並且把他們告到檢察官那里去。但是議會却拒絕了柏林無產階級所提出的用武力來恢復受到踐踏的國家法律的建議，並宣布了自己的“消極抵抗”，換句話說，就是宣布了用脊背承受敵人打擊的高尚決心。當弗蘭格爾的軍隊把議會從一間大廳趕到另一間大廳去的時候，議會並沒有抵抗，直到最後看到了刺

刀逼到会場上的时候，它才憤怒地宣布：只要議會还不能自由地在柏林开会，勃兰登堡的内閣就没有权利处理国家财政和征收捐稅。然而，議會剛剛被驅散，議會議长馮·翁魯就为議会的宝贵的尸体焦心了，他召集議會秘书处的人員，要他們在議事录中載明，議會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有关不承认征稅权利的決議，由于某些形式上的缺陷而不能生效。

《新萊茵报》實无旁貸地要对政府的暴行給以应有的反抗。它认为，第二次革命必然会战胜反革命的那个决定性的时刻业已到来。該报逐日地說服群众用各种暴力行动来回答暴力。消极的反抗 206 必須有积极的反抗做基础，否則这种反抗就只能像小牛在屠夫手里的掙扎罢了。用来掩盖資產階級的卑怯行为的妥协理論的一切法律上的詭辯，都受到了坚决的駁斥。該报写道：“普魯士国王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理直气壮地以专制国王的身分与議會相对抗。但是議會却沒有理直气壮地进行活动，沒有以专制議會的身分来与国王相对抗……但是旧官僚不甘淪为資產階級的奴僕，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資產階級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願为資產階級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緣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資產階級看作是異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雕萎。

資產階級把‘受命于天’的非凡的权利变成以文件作根据的平凡的权利，把貴族血統的統治变成一紙公文的統治，把王国的太阳变成資產階級的星灯。

因此，王权沒有接受資產階級的花言巧語的劝說。国王用彻底的反革命回答了資產階級的不彻底的革命。他把資產階級推回

革命的怀抱，推回人民的怀抱，因为他宣布說：

勃兰登堡在議會，議会在勃兰登堡。”^①《新萊茵報》把反革命的這個口號十分精采地翻譯成這樣的話：“警備部在議會，議会在警備部”。它指望人民能利用這個口號取得勝利，它認為這個口號就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墓志銘。

當柏林議會通過了拒絕納稅的決議的時候，民主主義者區域委員會在11月18日由馬克思、沙佩爾和施奈德爾簽署的呼吁書¹⁹⁹里要求萊茵省各民主團體採取如下措施以實現這一決議：各地都應當用一切手段反對強行徵稅；各地都必須組織民團，抗擊敵人；應由市鎮出錢或靠募捐來購置武器和彈藥以供應貧民；如果當局拒絕承認並履行議會的決定，則應當成立安全委員會，並尽可能同市鎮委員會取得協議；市鎮委員會如果反對立法會議，則應由該地全民投票重新選舉。由此可見，民主主義者區域委員會所採取的措施本來正是柏林議會所應採取的措施，如果柏林議會認真對待它那拒絕納稅的決定的話。但是柏林議會的英雄好漢們現在却害怕自己的英勇行為了，他們趕忙跑到自己的選區去偷偷地取消自己的決定，然後又跑到勃兰登堡去繼續議事。議會的這種行動使得自己的聲望貶低到這種程度，以至12月5日政府竟能一舉而把它驅散，悍然頒布了新憲法和新選舉法。

這樣一來，就是萊茵區域委員會也在為軍隊所充斥的本省無能為力了。11月22日，熱情地響應了呼吁書的號召的拉薩爾在杜塞爾多夫被捕。科倫檢察官向在呼吁書上簽名的人們提起了公訴，但是不敢逮捕他們。2月8日，他們由於被控號召武裝反抗軍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6卷，第16—17頁。

事与民政当局而受到科倫陪審法庭的审判。

馬克思在一次輝煌的发言中粉碎了檢察官的这样一个企图，这就是，他想根据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亦即政府通过武装政变所破坏的那些法律，来論证議会的錯誤，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論证被告的有罪。順利地进行革命的人可以絞死自己的敌人，但是不能判他們的罪；可以把他們作为战敗的敌人清除掉，但是不能把他們作为罪犯来审判。用已經成功的革命或反革命所推翻的法律来反对这些法律本身的捍卫者，这只能是一种怯懦的伪善。至于国王或議会究竟誰对的問題，这是一个历史問題，而历史問題是只能由历史而不能由陪審法庭来解决的。

但是馬克思更进了一步，根本拒絕承认4月6日和8日的法律。他說，这些法律是联合議会任意制造出来的东西，它想借这些法律使国王可以不承认他在3月斗争中的失敗。不能根据一个封建团体的法律来审判代表現代资产阶級社会的議会。硬說社会以法律为基础，这只是法学家的幻想。恰恰相反，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現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 Code Napoléon [拿破侖法典] 并没有創立現代的资产阶級社会。相反地，产生于18世紀并在19 208 世紀繼續发展的资产阶級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錢的廢紙。你們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創立旧社会关系一样。”^① 柏林議会不理解它在三月革命后所处的历史地位。檢察官指責議会拒絕接受任何和解，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为議会的不幸和錯誤正是在于它把自己从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292頁。

一个革命的国民議會貶低为模稜两可的协商派团体：“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別之間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間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間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間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間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識的社会之間的斗争。”^①在这两个社会之間不可能有和平，而只能有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檢察官的可笑的說法相反，拒絕納稅并不会动摇社会的基础，而只是社会为反抗威胁着社会基础本身的政府而采取的一項自卫措施。

議會不承认征税的权利，这并没有違反法律，但如果它宣布进行消极的反抗，这却是違法的行动了。“可是，如果征税被宣布为非法的，难道我不应当用暴力来反抗用暴力实行的非法行为嗎？”^②

由于拒絕納稅的先生們害怕拿脑袋去冒險而不敢走革命的道路，所以人民才不得不在拒絕納稅时站到革命的立場上来。“国民議會本身没有任何权利——人民委托給它的只是維護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給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人民就亲自出台，并且根据自己的自主的权力来行动。……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它。”^③馬克思在結束自己的发言时指出，现在戏剧的第一幕已經結束了。此后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許只有在反革命成功之后，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

在馬克思讲完这些充滿革命自豪感的話之后，陪審員們就宣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01頁。

② 同上书，第305頁。

③ 同上。

布被告无罪，而且首席陪審員还为了这一富有教益的演說对发言人表示感謝。

(八) 伏击

由于反革命勢力在維也納和柏林取得了胜利，德国的命运就决定了。在革命的成果当中，剩下的只有法兰克福議會了，但这个議會也早就失去任何政治上的信用了，它把自己的精力全部耗費在无休无止地討論紙上的宪法上面。而实际上，关于这一宪法的命运只有一件事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是用奥地利的佩刀还是用普魯士的佩刀把它刺穿？

《新萊茵报》在12月間通过一系列的卓越的論文²⁰⁰重新論述了普魯士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而在1849年年初，它又把期待的日光轉向法国工人階級的起义，指望这一起义会导致世界战争。“英国这个把許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負欧洲复辟費用的国家，这个在自己内部階級矛盾发展得最尖銳最无耻的国家，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濺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社会。英国統治着世界市場。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經濟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子里的風浪而已。每个国家內的工业和貿易关系都依賴該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都受該国和世界市場的关系的制約。但是英国統治着世界市場，而資產階級又統治着英国。”^①因此，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174—175頁。

都要遭到英國資產階級的破壞，遭到大不列顛工業和貿易上的世界霸權的破壞。法國以及整個歐洲大陸的任何局部性的社會改革，只要想把它進行到底，都不過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善良願望罷了。而
210 老舊的英國只有世界戰爭才能把它推翻。只有這樣的戰爭才能為
憲章派這個英國的有組織的工人政黨提供條件，使它能夠反對強大的壓迫者進行勝利的鬥爭。只有當憲章派領導英國政府的時候，社會革命才能從空想的領域轉入現實的領域。

對未來的這些期望的前提並沒有實現。從六月革命以來，受到嚴重創傷的法國工人階級已無力進行新的發動。從巴黎的六月革命開始，歐洲的反革命進行了一次巡迴，它經過法蘭克福、維也納和柏林，而在12月10日由於假波拿巴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而暫時結束了自己的行程。革命只在匈牙利還堅持着，而這時已返回科倫的恩格斯則是革命的最能言善辯的和最有才能的捍衛者。在其餘的方面，《新萊茵報》不得不僅限於對進攻的反革命進行小規模的戰爭，而它在這種戰爭中同在前一年的大會戰中一樣，是戰鬥得勇敢頑強的。內閣對這家被它看成是“一切壞報紙中最壞的報紙”接二連三地提出了訴訟，但報紙卻對這些訴訟報之以冷嘲熱諷，說帝國政權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權當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權。對於易北河東岸容克地主在柏林政變後常以“普魯士的風格”相夸耀的做法，《新萊茵報》給予了應有的嘲笑：“我們萊茵省居民很幸運，在維也納買賣人口的大市場上得到了一位萊茵河下游的‘大公’，不過他後來並沒有履行他在被宣布為‘大公’時所許下的那些條件²⁰¹。對於我們來說，‘普魯士國王’只是由於柏林國民議會的決議才存在，可是對我們這位萊茵河下游的‘大公’來說，柏林國民議會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對我們來說，任何‘普魯士國王’

都不存在。我們所以落到了萊茵河下游的大公的手里，是因為販賣人民的結果！當我們成長到能夠不承認販賣人口的生意的時候，我們將要求‘萊茵河下游的大公’拿出他的‘領地所有證’來！”^①而這些話正是在反革命最猖狂的時候寫的！

有一件事情看來應該以顯著地位出現在《新萊茵報》上，但是它卻並沒有出現。這就是關於當時德國工人運動的詳細的報道。這個運動甚至已經深入到易北河東岸各地區，而且決不是無足輕重的。它有自己的代表大會，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報紙。它的最有才能的領袖斯蒂凡·波爾恩早從布魯塞爾和巴黎時期起就同恩格斯和馬克思友好。就是這時，他仍然從柏林和萊比錫為《新萊茵報》寫稿。波爾恩對《共產黨宣言》的理解很深刻，儘管他未能很好地使《宣言》適應於德國大部分地區無產階級的很低的覺悟水平。只是在後來，恩格斯才對波爾恩當時的活動提出了不公平的尖銳指責。波爾恩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在革命的年代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不會對他當時的活動講過一句不滿的話。這是完全可信的。但他們兩人在某件事情上對他不滿，這也是可能的。不管怎樣，他們兩人在1849年春天就接近了這個並非在他們的影響下產生的工人運動。

《新萊茵報》起初對這一運動注意得不够，部分是因為科倫工人聯合會當時在科倫出版了一種每周兩期的自己的機關報（該報主編是莫爾和沙佩爾），但主要則是因為《新萊茵報》認為自己首先是“民主派機關報”，這就是說，它保衛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以反對專制制度和封建主義。這確實是最為必要的，因為這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87—88頁。

样才能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展开搏斗奠定基础。但是民主派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却日益动摇起来，他们每当受到比较严重的考验时，就都垮了下来。像梅因和从美国回来的克利盖这样一些人也参加了1848年6月在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五人中央委员会。在这样一些人的领导下，这个组织很快地就衰落了；而当它在普鲁士政变前夕在柏林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时候，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如果说当时也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并且还有在私交上和政治上都同马克思接近的德斯特尔参加的话，这也不过是开一张远期的支票而已。柏林议会的左派在十一月危机时期不能有所行动，而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则越来越深地陷进了卑鄙的妥协泥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马克思、威廉·沃尔弗、沙佩尔和海尔曼·贝克尔在4月15日宣布退出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①。他们是这样说明自己退出的理由的：“我们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于庞杂，这势必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我们认为最好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②与此同时，科伦工人联合会退出了莱茵省民主联合会，随后便召集所有拥护社会民主派原则的工人团体和其他团体参加5月6日的省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是组织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人联合会的问题，以及是否应参加由莱比锡工人联谊会所召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问题。领导莱比锡工人联谊会的是波尔恩，而代表大会预定6月在莱比锡召开。

① 声明的日期是1849年4月14日。《新莱茵报》(第273号)则是在同年4月15日发表了这一声明的。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509页。

还在这些声明之前,《新莱茵报》就在3月20日发表了威廉·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²⁰²这篇号召农村无产阶级发动起义的情绪激昂的论文。4月5日马克思本人也发表了文章。他发表了他在布鲁塞尔工人协会所作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报告²⁰³。以前,该报曾以1848年的大规模群众斗争为例来证明:任何一次革命运动,甚至当它的目的看来离开阶级斗争很远的时候,只要是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取得胜利,就必然会遭到失败。现在,该报想转而探讨作为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工人的被奴役的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了。

但是这个很有希望的计划却被维护纸上的帝国宪法²⁰⁴的斗争打断了,这个宪法就是法兰克福议会最后制造出来的。关于这个宪法本身,人们是值得为它流哪怕是一滴血的。宪法想加到普鲁士国王头上去的世袭皇冠,无宁说更像一顶丑角的尖帽。国王并没有接受这顶皇冠,但也并没有拒绝它。他想同德国各邦王公们就帝国宪法达成协议,暗中期望他在他用普鲁士之剑摧毁德意志中小各邦革命力量的最后残余时,这些王公们会承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这是对革命尸体的劫掠,它又煽起了新的革命火焰。发生了一连串的起义,帝国宪法虽然赋予了这些起义以名称,却没有赋予它们以内容。但宪法毕竟体现了人民的主权,因此暗中消灭这一主权以便恢复王公的主权的准备工作就在进行。在萨克森王国、在巴登大公国、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都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斗争,而普鲁士国王到处都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但正是他所挽救的那些统治者却欺骗了他:他们拒绝为他作为刽子手的服务支付报酬。在莱茵省也发生了个别的起义,但是这些起义都在 213 刚一萌芽的时候就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镇压下去了,因为政府

在它所不放心的这个省里驻扎了大批的军队。

当局终于鼓起了足够的勇气对《新莱茵报》施加决定性的打击。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征兆的加强，在报纸的篇幅上也日益熾烈地燃烧起革命热情的火焰。它在4月和5月出版的一些号外就是致人民的呼吁书，这些呼吁书号召人民准备起义。当时《新莱茵报》曾受到《Kreuzzeitung》〔《十字报》〕的光荣的赞扬。这家报纸说，《新莱茵报》“胆量之大超过了钦波拉索火山²⁰⁵”，而1793年的《Moniteur》〔《通报》〕在《新莱茵报》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了。政府很久以来就想扼杀该报，但是它哪里有这样的勇气！在莱茵陪审员当时的情绪下，对马克思的两次审讯结果都使他取得了新的胜利。当柏林方面要科伦重新宣布戒严的时候，胆小的要塞司令部竟不敢这样做。它宁愿向警察厅长建议把马克思作为“危险人物”驱逐出境。

处于困境的警察厅长去找科伦行政区政府，行政区政府又到曼托伊费尔那里去诉苦，因为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是行政区政府的上司。3月10日，警察厅长报告说，马克思虽然在科伦没有居留权，却还呆在科伦，而他主编的报纸也和先前一样地宣传极其有害的思想，教唆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毫不犹豫地嘲弄人们所尊敬并奉为神圣的一切事物。报告认为该报所以能发生更加有害的影响，正是因为它的无耻行为和文章的语调使得它的读者圈日益扩大。但是警察厅长怀疑要塞司令部提出的有关驱逐马克思的建议是否适当，他认为政府会承认他的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只是由于报纸的危险倾向”，“而没有特别的外部原因”便加以驱逐，这只会引起民主派方面的抗议。

曼托伊费尔接到了这个报告之后，就去征求莱茵省省长艾希

曼的意見。

3月29日，艾希曼回答說，驅逐馬克思的做法尽管是正当的，但是在馬克思还没有犯什么罪过的时候，这却不是一个稳妥的办法。在这之后，曼托伊费尔在4月7日表示他并不反对驅逐，但是他要科倫政府决定什么时候才是适宜的；他认为最好是在馬克思²¹⁴有什么罪名的时候再动手。驅逐的行动实际上发生在5月11日^①，但并不是由于馬克思有什么特別的越軌行动，而是因为《新萊茵報》的危險傾向。換句話說，政府在5月11日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进行伏击，而在3月29日和4月7日它还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不久之前从档案庫里找出了下面这一文件的普魯士教授显然是想称赞弗萊里格拉特的詩人的遠見；弗萊里格拉特在对驅逐馬克思的行动記憶犹新的时候写道：

不是正正堂堂的战斗中光明正大的打击
而是卑鄙的西方卡尔梅克人²⁰⁶
使用了阴谋詭計，
突然間把我打倒在地。

(九)又一次伏击

当驅逐令送到的时候，馬克思正好不在科倫。尽管《新萊茵報》一直在发展扩大以至有了六千左右的訂戶，然而它的財政困难依旧沒有消除。訂戶增加了，开支也增加了，然而进款却又不能立刻到手。馬克思到哈姆去同雷姆佩尔进行談判。雷姆佩尔就是曾在

^① 驅逐馬克思的命令是在5月12日发出的。

1846年同意成立共产主义出版社的两个资本家中的一个。但是这位大胆的雷姆佩尔现在也把钱袋抓得很紧。他要马克思去找前中尉亨泽，亨泽过去确实曾借给该报三百塔勒，而由马克思个人负责归还。后来被证实是奸细的亨泽，当时也受到警察的迫害。他和马克思一道来到科伦，而马克思就在那里看到了“警察局的逐客令”。

《新莱茵报》的命运就这样地决定了。还有几个编辑人员也作为“外国人”被驱逐了，其余的人则受到了法律上的追究。5月19日出版了红色的最后一号^①，在这一号上刊载了弗莱里格拉特的著名的告别诗和马克思的词锋锐利的告别词²⁰⁷。马克思在这里对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那末你们为什么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② 报纸警告科伦工人不要进行任何发动；从科伦军事戒备情况来看，他们是毫无希望的。编辑们对工人们的同情表示感谢，并且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③

此外，马克思还履行了他作为沉船的船长所担负的义务。亨泽借给马克思的三百塔勒、马克思从邮局那里收到的一千五百塔勒的订费、马克思私人所有的印刷机和其他财物，全部被马克思用

① 这一号的报纸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603页。

③ 同上书，第619页。

来偿付报纸拖欠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纸商、会计、通讯员和编辑部人员等等的债务。他个人留下来的只是属于他的妻子的一套银器，但这套银器也被他送到法兰克福的当铺里去了。这套银器所当的二三百盾，是他全家仅有的生活费用，这时正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那样，他们又不得不在“贫困的国土”上漫游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从法兰克福到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场去。他们先到卡尔斯卢厄，后来又去凯泽尔斯劳恩，在那里会见了临时政府的中心人物德斯特尔。马克思从德斯特尔那里接受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委派他作为德国革命党的代表到巴黎国民议会的山岳党那里去。山岳党是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并且准备对秩序党²⁰⁸及其代表人物假波拿巴施加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凯泽尔斯劳恩返回的途中因为参加起义的嫌疑被黑森军队逮捕。他们被押解到达姆斯塔德，而后又被送到法兰克福，并且在那里获释。于是马克思就直接到巴黎去，恩格斯则返回凯泽尔斯劳恩，成了普鲁士前中尉维利希所组织的志愿军的副官。

6月7日马克思从巴黎写信来说，比在基佐当政时期更加可怕的保皇党反动派在那里十分猖獗，但是革命火山的巨大爆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眼前²⁰⁹。不过，他的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山岳党所策划的打击遭到了全面的而且是相当悲惨的失败。一个月之后马克思本人遭到了胜利者的报复，7月19日内务大臣²¹⁶通过警察局长下令马克思移往莫尔比昂省²¹⁰。正像弗莱里格拉特在知道这一命令时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这是一次卑怯的打击，是一个“极其卑劣的行为”。“丹尼尔认为莫尔比昂是法国最不利于健康的地区之一，这是一片热病流行的沼地。这里可以说

是布列塔尼地方的彭提亚沼地²¹¹。”馬克思並沒有對這一“偽裝的殺人企圖”屈服，他上書內務大臣，結果竟使命令暫緩執行。

由於馬克思的為數不多的錢已完全花光，因而生活極端窘迫。他請求弗萊里格拉特和拉薩爾給他幫助。兩個人都盡力幫助了他，但是弗萊里格拉特卻不滿意拉薩爾的不慎重的做法，因為拉薩爾使得馬克思的處境成了所有坐酒館的人們的話題。馬克思對這種做法感到十分痛心。他在7月31日寫給弗萊里格拉特的回信里說：“我寧肯忍受極大的貧困也不願到外面去向人乞討。關於這一點我已寫信告訴了他^①。這件事使我憤怒到難以形容的地步。”^②但拉薩爾的一封信卻驅散了馬克思的不快。拉薩爾在信中說他是“極其慎重地”處理這件事的，儘管這種說法多少使人感到懷疑，但這封信還是充滿了善意的。

8月23日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他離開法國，而在9月5日他又寫信告訴弗萊里格拉特說，9月15日他的妻子要隨他同行，可是他還不知道怎樣籌得她的旅費和遷居到一個新的地方去所必需的款項。在馬克思的第三次亡命中，伴隨着他的是重重的憂慮，而且看來，這種憂慮一直是他的形影不離的伴侶。



① 指拉薩爾。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57頁。

第七章 流寓倫敦

(一)《新萊茵評論》

在馬克思从巴黎寄給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里，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說，他有可能在倫敦創辦一个德文杂志，而且一部分錢已經有了着落²¹²。恩格斯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敗后就作为一个流亡者住在瑞士。馬克思在信里請他立刻到倫敦去，于是恩格斯应邀从热那亚乘帆船前往倫敦。

現在已經无从查明，他們打算創辦的这个杂志的經費从何而来。無論如何，这笔錢的数目不会是很大的，而且，他們显然也并未指望这个杂志能长久存在下去。馬克思希望三、四个月后会爆发世界战争。1850年1月1日，《卡尔·馬克思主編的〈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招股启事》在倫敦登了出来，由康拉德·施拉姆作为企业的出版負責人署名。启事中說，《新萊茵报》的同人們去年夏天在南德和巴黎参加了革命运动，以后他們又聚集在倫敦，决定在这里繼續出版报纸。这报纸暂时将只是以月刊的形式出版，每期篇幅近五印張。但是只要經濟条件一旦允許，报纸便将改为双周刊，甚至在可能的时候改为像英、美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然后，当情况允許回到德国时，再立刻把周报改为日报。接着，启事征求认

股，每股五十法郎。

但是大概並沒有征得多少股份。杂志是在汉堡印刷的。那里
218 有一家书店承办代銷业务，从每份每季訂閱价格二十五銀格罗中
中抽取百分之五十作为佣金。这家书店沒有为这事卖很大的力
气，特别是因为普魯士的軍隊占領汉堡这一情况使它不能这样做。
不过，即使它更热心一些，情况也不会更好。拉薩尔在杜塞尔多夫
还征集不到五十个訂戶，而預訂了一百份在法兰克福推銷的魏德
迈，半年中也只收回五十一盾的款子。他說：“虽然我已經够惹人
厌烦的，但是，人們还是不顧我的一再催促而不肯急于付款。”馬
克思夫人在写給魏德迈的信中完全有理由痛心地說，这项出版事
业是被粗心和混乱的經營給毀了，不知道哪方面應該負更大的責
任：是书店、科倫的熟人和管理人員的疏忽大意，还是民主派的
态度。

刊物的編輯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这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而这
工作实际上全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担負的。1月号的原稿直到2
月6日才寄到汉堡。但是，这計劃总地說来还是付諸实行了，这
是后世應該感謝的，因为如果再延迟几个月，革命情緒的迅速低
落就会使得它根本不可能实现。六期《評論》是一个珍貴的見证，
证明馬克思——像馬克思夫人所說的——“由于自己的毅力，由于
平靜、明确而沉着地意識到自己的本质”，能够超然于生活的繁瑣
忧虑之上，而这些生活瑣事是每日每时都在“最惱人地”干扰着
他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后者更甚于前者——特別是在年輕的时
候常把未来的事情看得过分迫近。他們时常在花几乎还没有开的
时候就希望立刻摘取果实。为了这一点，他們有多少次被斥責为

假預言家啊！而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被稱做假預言家並不是一件特別榮幸的事。但是應該分清，這些錯誤的預言究竟是出於明確而敏銳的思維的大膽信念，還是出於對自己的善良願望的虛榮的自我陶醉。在後一種情況下，失望會使人意氣消沉，而幻想也隨之煙消雲散；但在前一種情況下，信念反而會加強，因為思想家將追尋自己的錯誤的根源並從而獲得新的認識。

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無情而真摯地進行自我批評的政治家，大概是從來沒有過的。有一種毫無根據地固執己見的態度，儘管面對着最慘痛的幻滅，却還要一味繼續自我欺騙，說什麼假如某件事情按照另一種方式發生，而不是像實際發生的那樣，那就會是正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完全沒有這種態度。他們也不做任何廉價的自作聰明的否定，沒有任何無益的悲觀主義；他們從失敗中 219 吸取教訓，以便以更大的力量重新為取得勝利作準備。

隨着 6 月 13 日巴黎起義的失敗，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的失敗，以及沙皇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整整一個革命階段已經結束了。新的革命高潮只有在法國才可能出現，因為那裡的革命還未定局。馬克思十分堅定地相信這個高潮會到來。但是這一點非但沒有妨礙、反而促使他對法國革命的過去一個時期進行了嘲笑一切幻想的無情批判。他從內部的根源出發，即從經濟矛盾出發闡明了這個錯綜複雜的鬥爭過程，而這一過程是空談理論的政治家們通常認為不可能解釋清楚的。

因此，他在發表於《評論》頭三期上的幾篇文章中，用兩三句簡短而中肯的話就解決了當時的一些最錯綜複雜的問題。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們乃至於教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在巴黎國民議會中曾經費了多少唇舌來議論勞動權的問題，而馬克思則用几

句話就詳盡無遺地說明了這個口號在歷史上的意義和毫無意義。他說：“在六月事變以前制定的最初憲法草案中，還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勞動權，還提到這個初次概括無產階級各種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現在這個公式却已轉化為 droit à l’assistance——享受社會慈善救濟權，——但是試問哪一個現代國家不是這樣或那樣飼養着自己的乞丐呢？勞動權在資產階級的意義上說乃是一種胡說，乃是一種可憐的善良願望，其實勞動權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表示占有生產資料，使其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僱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係。”^① 馬克思首先以法國歷史為例，透徹地說明了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飛輪。確實，階級鬥爭特別明顯地以古典的形式出現在中世紀以來的法國歷史上，而這一點也正足以說明馬克思為什麼對法國歷史特別偏愛。發表在《評論》上的這篇文章²¹³，以及關於波拿巴政變和後來關於巴黎公社的另几篇文章，都是馬克思的小部頭歷史著作寶庫中最晶瑩燦爛的寶石。

220 在《評論》的頭三期上，恩格斯為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所描繪的一幅小資產階級革命圖²¹⁴，和馬克思的文章相反是喜劇性的，雖然也不免有一個悲劇性的收場。每月評論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執筆，在這些評論中，他們主要注意經濟生活的發展。他們在2月號中就已談到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說這個事實“其意義超過了二月革命”，而它所引起的後果甚至會比美洲大陸的發現所引起的大得多：“在緯度30度上的漫長海岸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富饒的地區之一，以前它幾乎是荒無人迹的地方，而現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47頁。

在它在我們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馬來亞人，从克里奧洛到美斯提左²¹⁵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以及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貿易——文明世界。世界貿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現在从波士頓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貿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金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洋，起着偉大的世界交通航綫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現在的地中海一洋成为內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要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現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現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換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創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①但不幸的只是，不久以后这些輝煌的預言的两位作者自己就不得不承认，現代革命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發現而“被沙掩沒”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还合写了一些文章来批判三月革命前的文坛 221
巨擘們——德国的哲学家道梅尔、法国的史学家基佐和英国的奇才卡萊尔——企图剖析革命的一些著作²¹⁶。道梅尔出身于黑格尔学派，基佐对馬克思有过重大影响，而卡萊尔則对恩格斯有过重大影响。但是現在拿到革命的天平上来称一称，这三个人都显得分量太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道梅尔宣揚“新时代的宗教”的那一套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7 卷，第 263—264 頁。

难以置信的老生常談歸結為下面這樣一幅“動人的圖畫”：德國哲學扭絞著雙手慟哭在它的養父——德國小市民階級——的靈床前。他們在書評中以基佐為例證明：即使舊制度下最聰明的人物，即使無論如何也不能不認為是天才歷史學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變弄得昏頭昏腦，以致完全不能理解歷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過去的行動。如果說基佐的書證明資產階級的才能已趨於衰落，那末卡萊爾的兩本小冊子則表明他的文學天才在尖銳化的歷史鬥爭中沒落了，因為他企圖違抗歷史鬥爭，堅持自己那不為人所承認的、直觀的和預言家式的靈感。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卓越的書評中證明了革命對於三月革命前的文壇巨擘們的毀滅性影響，但他們絕不像他們有時被人指責的那樣，相信革命有什麼神秘的力量。革命並不會造成把道梅爾、基佐和卡萊爾吓得要死的那種景象；它只不過是把掩蓋著這種景象的幃幕撕去罷了。在革命中，歷史的發展並不改變自己的方向，而只是加速了自己的進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下，馬克思把革命稱做“歷史的火車頭”^①。愚昧的庸人相信“和平面合法的改革”，認為它勝過一切革命爆發；這種想法當然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格格不入的。在他們看來，暴力也是一種經濟的力量，是每一個新社會的產婆。

(二) 金克爾案件

1850年4月《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四期出版以後，這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卷，第99頁。

个刊物就不再按期出版了，其原因之一无疑是4月号上的一篇短文。它的作者們事先就說过，这篇文章将引起“所有溫情的伪善者²²²和民主主义清談家的憤懣……”^①。这篇文章是对哥特弗利德·金克尔1849年8月7日在拉施塔特軍事法庭上所作的辯护詞的一个簡短而致命的批判。金克尔是因为参加革命志願軍而在这个法庭上受到审判的。1850年4月初，他把他的这篇辯护詞发表在柏林的一家报纸上。

这个批判本身是完全有道理的。金克尔在軍事法庭上背棄了革命和自己的战友。这个軍事法庭判决了他的二十六位同志死刑，而他們都英勇地就义了。然而就在这同一个軍事法庭上，金克尔却頌揚“霰彈亲王”并且欢呼“霍亨索倫帝国”万岁。不过，当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金克尔的时候，他正在監獄里。一般人认为，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国王报复的牺牲品；他本来被軍事法庭判决監禁在要塞中，但根据国王的敕令，改判屈辱性的一般苦役刑。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金克尔釘在政治耻辱柱²¹⁷上的做法，是会引起許多人的强烈抗議的，而这些人并不一定都是“溫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的清談家”。

后来金克尔案件的档案材料公开了，从这些材料来看，整个事情都是一場錯綜的悲喜剧式的誤会。金克尔本是一个神学家，而且还是正統派神学家。但是他离开了“真正的”信仰，并且由于娶了一个离过婚的天主教徒而招致了正統派的深恶痛絕。这一点使他获得了远远超过他的真正功績和品德的“自由英雄”的名声。金克尔跑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里来，只是出于“誤会”，他在政治上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351頁。

从沒有超过流行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同时，他那从神学家的活动继承下来的“該死的口才”（像弗莱里格拉特所形容的），有时把他远远地推向左面，有时又把他远远地推向右面，就像他在拉施塔特的辯护詞中所表現的那樣。平庸的詩才又使他比他那一流的其他民主主义者博得了更大的名气。

在維護帝国宪法的运动中，金克尔加入了維利希的志願軍团，同恩格斯和莫尔并肩战斗过。他在战斗中表現得很勇敢。在牟尔克城的最后一役中，莫尔牺牲了，他則头部受輕伤并且被俘。軍事法庭判处他終生監禁在要塞中，但“霰彈亲王”——或者像金克尔在他的辯护詞中更恭敬地称呼的“我們的王位继承者，普魯士亲王殿下”——却不滿足于这一点。柏林的总檢察官呈請国王取消軍事法庭的判決；他证明金克尔应被判处死刑，并請求由軍事法庭重新审理該案。

內閣全体反对这种做法。內閣虽然也承认对于叛国犯來說原判过于寬大，但是仍然建議国王批准原判，“以示皇恩”而順輿情。同时；政府认为让金克尔在“民事監禁場所”服刑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把他当做一名要塞囚徒来对待，那就会引起“民憤”。国王采納了內閣的建議，却不料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他們希望避免的“民憤”。“輿論”认为，把連軍事法庭也只判处要塞監禁的叛国犯送到普通監獄里去服苦役“以示皇恩”，这簡直是一个毒辣的玩笑。

然而輿論弄錯了，因为它不了解普魯士刑罰制度的內情。金克尔并不是被判处要塞監禁，而是被判处要塞軍事監禁，这种刑罰比在普通監獄里服苦役更要严厉而难堪。被判处这种徒刑的犯人一二十人挤在一間狹小的牢房里，睡在硬鋪板上，得到的食物既少

且坏；他們被派去做最下賤的工作，例如清理污水坑、打扫街道等，稍有过失，就要挨皮鞭。內閣畏懼“輿論”，因此想让被监禁的金克尔免于这种难堪的生活。但是当“輿論”对这件事作了相反的理解的时候，內閣又因畏懼“霰彈亲王”和他的报复心切的党而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人道”意图。它宁可让国王蒙受嫌疑，即使这种嫌疑会大大損害他的声誉，而且确实甚至在他那些善意的臣民眼中已經損害了他的声誉。

由于这次不成功的庇护行为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內閣不願再因金克尔在監獄中的遭遇而引起新的“民憤”，但是它只敢下一道指令，無論如何不許以体罰加于金克尔。內閣还想使金克尔免于强制性的体力劳动，建議最初囚禁金克尔的瑞加尔德監獄典獄长就这一点自行負責酌情处理。但是这个頑固的官僚竟坚持执行他所接到的敕令，叫金克尔去搖紡車。这件事引起了輿論的大嘩。有人創作了一首《紡車歌》，到处傳誦；画着“紡車旁的詩人”的画片泛濫于全国。金克尔本人也写信給他的妻子說：“命运的作弄和党派的狂暴已經达到了瘋狂的地步，以致曾为德国人民写过《射手奥托》²¹⁸的这只手，現在搖起紡車来了。”但是，有句老話說，庸众的“义憤”結果往往以貽笑大方收場，这句老話这一次也应驗了。

石德丁的行政区当局被抗議的喧嘩吓坏了；由于它比內閣更有胆量，——然而为了这一点却有人立刻指控它具有“民主观点”，——它下令金克尔改做文书工作。但是金克尔本人却宣称，他宁可留在自己的紡車旁，因为輕体力劳动不妨碍他随心所欲地去思考，而整天伏案抄写却会伤害胸部并有損健康。

因此，盛傳的所謂金克尔在獄中由于国王的敕令而受到特別严酷的待遇的說法是毫无根据的，虽然，他当然不得不忍受許多痛

苦。璫加尔德監獄的典獄長施努赫爾是一個死硬的官僚，但並不是一個毫無人性的人。他用“你”來稱呼金克爾，但是允許他多到戶外放風。他對金克爾的妻子營救丈夫的不斷努力也表同情。相反地，當金克爾於1850年5月轉移到施潘道監獄的時候，那里的獄吏用“您”來稱呼他，但是却強迫他剃掉頭髮鬍鬚。那里的典獄長，一個名叫耶澤利希的虔信宗教的反動分子，為了想指引金克爾走上真理之道而不斷糾纏他，而且立刻就同“金克爾老婆”發生了討厭的爭吵。然而，當內閣就金克爾的妻子的請求征詢耶澤利希的意見時，連這個人販子也未十分作難。金克爾的妻子請求釋放她的丈夫到美洲去，條件是他以名譽担保不再從事政治活動并永不返回歐洲。耶澤利希甚至表示這樣的意見：以他對金克爾的了解來說，住在美洲會使金克爾最快地改邪歸正。不過他仍舊建議，金克爾至少應監禁一年，以張法紀。一年以後，才能允許他移居國外。當然，如果金克爾的健康由於長期監禁而受到損傷，那就另當別論；不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這種徵兆。耶澤利希的報告呈交了國王，但是國王卻比內閣和典獄長報復心更重。按照“聖旨”，決定在金克爾監禁一年以後不放他到美洲去，相反地，要使他受到遠比以前更大的屈辱。

225 圍繞着金克爾所掀起的喧囂，不能不激怒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的人。他們從來都憎惡庸人們的這種起哄的做法。恩格斯在論述維護帝國憲法的鬥爭的文章中就曾經氣憤地指出過，人們只是百般關懷五月起義中的“有教養的犧牲者”，而關於那些戰死沙場、活活爛死在拉施塔特囚牢中或在流亡中忍受窮困更甚於所有其他流亡者的成百成千的工人，卻沒有人說過一句話。而且，就是在“有教養的犧牲者”當中，也還有許多人比金克爾受到嚴酷得多的考

驗，而且比他英勇得多地忍受了自己的命運。但是，誰也沒有替他們說過一句話。只要提一提奧古斯特·勒克爾就夠了。這位藝術家的才能至少是和金克爾不相上下的。他在瓦爾德海姆苦役監獄中受到極殘酷的虐待乃至體罰；但是在受了十二年難忍的折磨以後，他都不肯為求得赦免而低頭。由於反动派感到無法挫折他的傲氣，最後只好可以說用武力把他趕出監獄。而勒克爾並不是這種人當中唯一無二的一個。無寧說，金克爾才是絕無僅有的例外，他在並非不能忍受的幾個月監禁之後就公開表示悔過，發表了他在拉施塔特軍事法庭上的辯護詞，並以此喚起了庸眾的同情。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個辯護詞的嚴厲批評完全是適時的，同時他們也完全有理由說，這種批評非但沒有惡化、而且還改善了金克爾的處境。

事情的進一步發展表明他們在另一方面也是正確的。一般人对金克爾的狂熱崇拜使得資產階級解囊輸捐，賄賂了施潘道監獄的一個獄吏，於是在1850年11月，由卡爾·叔爾茨安排金克爾越獄成功。這就是國王居心報復所落得的結果。如果他允許金克爾在以名譽擔保的情況下移居美洲並永不從事政治活動，那末金克爾會很快就被遺忘了；這一點，連典獄長耶澤利希都明白。金克爾在越獄成功之後，成了一個聲譽倍增的鼓動家，而國王却還要忍受嘲笑。

但是國王自有國王的辦法。關於金克爾逃亡的報告使他產生了一個連他自己也老實承認是不乾淨的念頭。他命令他的曼托伊費爾在“有用的”施梯伯的協助下破獲這件陰謀並懲罰罪犯。施梯伯當時在社會上名聲已經很臭。甚至柏林的警察廳長興克爾代（這個人被迫害政治反對派的問題上是非常心安理得的）也激烈反

对重新起用施梯伯来担任警察职务。但是任何抗議都无济于事，
226 而作为一种試驗，施梯伯利用盜窃和伪造证件等方法制造了科倫
共产党人案件。

就卑鄙齷齪的程度來說，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要比金克尔案件
超过十倍。但是沒有听到任何一个好心腸的資產階級人士为此发
出义憤的呼声。也許，这个可尊敬的階級是要证明，馬克思和恩格
斯从一开始就把它看透了吧。

(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

总地說来，金克尔案件的意义无宁說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际
的。从这个案件上最容易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倫敦流亡者之間
爭論的实质。但是这个案件本身并不是這場爭論中的一个最重要的
表現，更不是它的直接原因。

在1850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出版《新萊茵報。政治經濟
評論》外，还以全副力量从事了两件創举，这两件事可以使我們清
楚地看到他們同其余的流亡者的关系以及与他們分离的原因。其
一是成立了流亡者委員會²¹⁹。当瑞士当局对流亡者采取日益敌对
的态度以后，流亡者大批地涌入倫敦。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鮑
威尔、普芬德、維利希一起成立了流亡者委員會来援助这批人。另
一件創举是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恢复同盟的活动已經成为迫切
必要的事情，因为胜利的反动派已肆无忌惮地剝夺了工人階級的
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进行公开宣傳的一切手段。馬克思和
恩格斯同流亡者的團結一致总地來說可以說是生活上的，而不是
政治上的。他們与流亡者同甘苦共患难，但是不和他們一道幻想；

他們甘願為流亡者貢獻出最后一文錢，但是絲毫不犧牲自己的政治信念。

德國的流亡者，特別是其他各國的流亡者，是一個成分極為駁雜而混亂的混合體。所有這些人都希望革命再起，使他們能夠返回祖國。所有的人都朝着這個方向工作，這一點看來似乎可以把他們聯合在一致的行動中了。但實際上，試圖聯合起來的一切嘗試都不免遭到失敗。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發表一紙宣言，其內容的空洞和詞句的堂皇恰成正比。只要一開始行動，立刻就發生最討厭的爭吵。爭吵的原因根本不在於這些人的性格；流亡者的窮困的處境頂多也只是促使衝突尖銳化罷了。真正的原因是在於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決定了革命的進程，並且在流亡生活中繼續存在下去，儘管有些人千方百計試圖幻想它不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開始就看出這種企圖是毫無用處的，因此從不參與其事。但是這一點卻使流亡者的各種派別至少有了一個一致的意見，即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切分歧的真正的不可救藥的罪魁惡首。

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了他們在革命以前就已開始的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從1849年秋天起，除了在牟爾克城一役中陣亡的莫爾以外，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老盟員差不多全都聚集在倫敦。沙佩爾於1850年夏天來到倫敦，威廉·沃爾弗則在一年以後才從瑞士遷來。此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力量，如前普魯士軍官奧古斯特·維利希。在巴登—普法爾茨戰役期間，維利希表明是志願軍團的一個非常能干的將領。當時給維利希當副官的恩格斯，現在把他爭取過來。維利希是個很有才干的人，但是在理論方面頭腦相當混亂。隨後又來了一些年輕人：商人康拉德·施拉姆，教師威廉·皮佩爾，以

及肄业于德国的一些大学但在巴登起义和瑞士流亡中才通过毕业考試的李卜克内西。在这些年間，他們都团結在馬克思周圍，但是他們当中只有李卜克内西成了馬克思的最忠实的朋友。对于另外两个人，馬克思有时是不大贊揚的，因為他們不时給他招惹了不少麻煩。但是我們不應該从字面上來理解他在个别場合談到他們時所說的話。当康拉德·施拉姆还很年輕就死于肺結核時，馬克思贊揚了他，稱他為黨的“莽漢潑息”；而关于皮佩尔，馬克思也說，他“無論如何是一條好漢”。通过皮佩尔的介紹，哥丁根的律師約翰·米凱尔同馬克思开始了通信联系，后来也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馬克思显然把他看做一个有头脑的人，而米凱尔在許多年当中都是忠于共产主义旗帜的。但是后来，他和他的朋友皮佩尔一样，退回到自由主义的陣营去了。

为了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3月发表了一份由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告同盟书》。亨利希·鮑威尔以特使的身分把这份《告同盟书》帶到德国。作者們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信念，即新的革命即将爆发，这个革命“将……由法国无产阶级²²⁸的独立起义所引起，或由神圣同盟²²⁰对革命的巴比倫的侵犯所引起”^①。正如三月革命使资产阶级获得胜利一样，新的革命将給小资产阶级帶來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則又将出賣工人阶级。《告同盟书》对革命的工人政党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作了如下的規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別；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來謀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②小资产阶级要利用胜利了的革命來改良资本主义社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90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291頁。

会，使它变得对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更合适，更容易忍受。但是无产阶级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它的温和的要求一得到实现之后，自然就会力争尽快地结束革命；相反，工人的任务则是要使革命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①。

因此，《告同盟书》警告工人不要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团结和协调的宣传所欺骗，不要使自己降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相反地，他们必须形成尽可能巩固而强大的组织。当革命胜利以后，——像以前一样，工人将仅仅凭靠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来取得革命的胜利，——工人应迫使小资产阶级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覆灭的根苗。这样就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以后很容易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并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 229 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负责加以领导。”^② 在国民议会选举的时候，工人应该到处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甚至在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也应如此，而不要为民主派的任何诺言所迷惑。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应提出纯粹共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7 卷，第 292 页。

② 参阅同上书，第 294 页。

主义的措施；但是他們能够对民主派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們尽可能多地从各方面触动現存的社会制度，阻碍現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們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集中到国家手中。首先，工人不应容許在消灭了封建制度之后，把封建地产变成农民自由支配的财产，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这将使农村无产階級繼續存在下去，同时会产生一个农民小資产階級，这个階級一定会像法国农民那样在一貧如洗和債台高筑中兜圈子。相反地，工人应当要求把沒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場，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階級利用大規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資产階級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則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

用这份《告同盟书》武装起来的鮑威尔很成功地完成了他在德国的使命。由于他对那些在反革命猖獗中幸存下来的工人、农民、日工的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殘余組織有巨大的影响，因此他得以重新接上一些断了的綫，并且建立了一些新的联系。由斯蒂凡·波尔恩所建立的一个最有影响的工人联誼会²²¹的會員，也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正如当时被某个瑞士流亡者組織委派周游德国的卡尔·叔尔茨在給苏黎世写的报告中所說的，同盟“把一切有用的力量都拉过去了”。中央委员会在1850年6月发表的第二篇《告同盟书》中报道說，同盟已在德国的許多城市中站稳脚跟并且成立了领导中心，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领导中心在汉堡，梅克倫堡的领导中心在息韦林，西里西亚的领导中心在布勒斯劳，薩克森和柏林的领导中心在萊比錫，巴伐利亚的领导中心在紐倫堡，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领导中心在科倫。

这篇《告同盟书》把倫敦区部称做同盟最有力的支柱，因为它

差不多独力承担了同盟的全部經費，領導着倫敦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以及那里的大部分流亡者。此外，倫敦的中央委员会还同英国人、法国人和匈牙利人的革命政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是，从另一方面來說，倫敦区部也是同盟最薄弱的地方，因为它使同盟糾纏在流亡者之間的越来越激烈和无休无止的斗争中。

1850年夏天，革命很快会再起的希望显然已經消失了。法国廢止了普选权²²²，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工人阶级的起义。斗争只是在法国王位僭求者路易·波拿巴和反动的帝制派国民議會之間进行。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了政治舞台，而自由资产阶级則参加了普魯士所干的掠夺革命尸体的勾当。同时，普魯士受到追随着奥地利步武的德意志中小各邦的欺騙，而沙皇則气势汹汹地用鞭子抽打着所有这些德意志国家。但是，真正的革命越是退潮，流亡者就越是狂热地想要制造一种人为的革命。流亡者对所有这些不利的征兆作出自欺的解釋，并且寄希望于他們准备用頑强的意志来創造的奇迹。流亡者对来自他們自己队伍的一切自我批評也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以明彻而冷靜的眼光估計真情实况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自己和流亡者之間的距离越来越大了。邏輯和理性的呼声怎么能抑制住这群越来越絕望的人的暴風雨般的狂热呢！这呼声是这样地微弱无力，以致这种普遍的如醉如狂的情緒也渗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倫敦区部，并从内部震撼了它的中央委员会。

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上，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同盟的六个委員反对四个委員：老近卫軍馬克思、恩格斯、鮑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和后輩康拉德·施拉姆反对維利希、沙佩尔、弗廉克尔和列曼。后者当中只有一个老委員沙佩尔。恩格斯

231 曾經恰当地給他起了一个綽号叫“原始革命家”。他沉湎于革命的自发势力，因为他在整整一年当中身临其境地看到反革命逞凶肆虐，而且前不久才来到英国。

在这个决定性的會議上，馬克思用下面一段話來說明业已发生的分歧的实质：“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們对工人說：不仅为了改变現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統治的能力，你們或許不得不再經歷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战和国际冲突。而你們却相反地对工人們說：‘我們必須馬上夺取政权，否則我們只好躺下睡大觉。’我們特別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階級不够成熟，而你們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級偏見阿諛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詞变成圣物一样，你們則用无产階級这个詞来玩这套把戏。”^①事情发展到激烈爭吵的地步，以至于施拉姆竟向維利希提出决斗，尽管馬克思坚决譴責这种做法。决斗在安特卫普附近举行了，結果是施拉姆身受輕伤。但是要达到某种一致已是不可能的了。

多数派试图把領導机构迁到科倫来挽救同盟。他們建議科倫区部选举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而原来的倫敦区部則将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各自仅仅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的区部。科倫区部同意了這個建議，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少数派拒絕承认它。他們在倫敦区部里、尤其是在德国工人教育协会里拥有較多的支持者，于是馬克思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便退出了德国工人教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65頁。

育協會。維利希和沙佩爾另外成立了一個同盟，但這個同盟不久就消失在冒險主義的革命遊戲中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評論》第五——六期上比在9月15日的會議上更為詳盡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這兩期在1850年11月作為合刊號出版，而在这之後雜誌就停刊了。在最後一號上，除了恩格斯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論述1525年農民戰爭的一篇長文²²³外，還刊登了埃卡留斯關於倫敦縫紉業狀況的一篇文章。馬克思興²³²高采烈地歡迎了這篇文章，他寫道：“無產階級還在街巷里和戰場上贏得勝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精神的勝利宣告自己統治的來臨。”^①埃卡留斯自己在倫敦的一家縫紉作坊中做過工，因此他了解，小手工業企業的衰落和被大工業所排擠是一種歷史上的進步現象。但同時他也懂得，由於大工業的成就和後果，歷史為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並且還在日復一日地從新創造着現實的條件。馬克思認為，比起魏特林以及攻擊現存制度的其他工人作家的那種悲天憫人的、勸善說教的、心理的批判來，埃卡留斯關於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發展的純唯物主義的、毫無溫情氣息的观点，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埃卡留斯關於社會現象的唯物主義观点是馬克思不倦教育的結果，而且是他切望看到的結果。

然而，這雜誌最後一號的重心却是關於5月至10月這段時期的政治經濟述評。馬克思和恩格斯經過周密的研究以後，弄清楚了政治革命與反革命的經濟原因，並且證明政治革命產生於嚴重的經濟危機，而政治反革命則根源於生產的新高漲。他們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486頁。

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产力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爭吵虽然使彼此丢臉出丑，却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爭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們的一切道义上的憤懣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①

233 在述評的結尾处，这种明确而有說服力的闡述同馬志尼、賴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签署的一份欧洲中央委员会²²⁴的宣言恰成对照。流亡者的一切幻想都在这篇宣言中扼要地陈述出来了。它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个别領袖的野心勃勃的勾心斗角和各种各样的人民导师的观点冲突。它宣布自己的信仰是自由、平等、博爱、家庭、社会、国家、祖国——总而言之，是以上帝及其規律为頂峰而以人民为底层的一种社会制度。

这篇述評发表于1850年11月1日。此后，两位作者在同一城市里合作写文章的活动就中斷了整整二十年，因为恩格斯又回到曼彻斯特去当“欧門-恩格斯”紡紗厂的職員，而馬克思則留在倫敦，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513—514頁。

(四)流亡中的生活

1850年11月的这些日子差不多正好是馬克思前半生的結尾，而且不仅仅从表面說来是馬克思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轉折点。他自己深切地感到这一点，而看来恩格斯也許比他感觉得更深切。

恩格斯在1851年2月写信給馬克思說：“你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流亡生活是一所学校，其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一个傻瓜，一只蠢驴或者干脆变成一个騙子，除非他完全和这种生活脫离关系，并且滿足于一个坚决不过問所謂‘革命党’的独立作家的地位。”^①馬克思回信說：“我很喜欢我們两人現在所处的这种真正的高群索居的状况。这完全适合我們的地位和原則。为了面子的关系而互相忍让和不置可否的一套做法，以及在公众面前为这个党和所有这些蠢材的可笑行徑負責的义务，現在总算告一結束了。”^②接着，恩格斯又以同样的精神給馬克思写信說：“我們現在終于又有一次——长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机会表示：我們既不需要名望，也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党派的支持，我們的立場 234是和这些无聊的东西完全无关的。从現在起我們只對我們自己負責了。……实际上，我們甚至不能过份抱怨这些 *petits grands hommes* (渺小的大人物)也迴避我們；許多年來我們不是装做有这样一个天曉得的党嗎？其实我們沒有任何党，而我們至少在形式上认为是屬於我們党的人……甚至都不理解我們的基本理論。”^③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70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169—170頁。

③ 參閱同上书，第173頁。

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傻瓜”、“騙子”这样的字眼，也不能拘泥于文字地来解释其他諸如此类的激憤之詞。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有朝一日人們能够理解他們的事业以前断然脱离流亡者的无結果的爭吵，并且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样“在某种孤独状态下”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他們的一条自救之道。毫無疑問，他們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这种脱离并不像后人在回顾时所看到的那样彻底，那样迅速。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几年的通信中，还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同流亡者之間的斗争的余波。这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而成的两派之間的不斷磨擦所引起的。而且，这两个朋友虽然决定不再参預流亡者的爭吵，却絕不打算放棄任何政治斗争。他們沒有停止給宪章派的刊物撰稿，对于《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的停刊更是不肯罢休。

巴塞尔的出版家沙貝利茨打算負起繼續出版《評論》的任务，但这件事毫無結果。住在科倫的海尔曼·貝克尔起初主編《Westdeutsche Zeitung》（《西德意志报》），而在該报被禁以后經營着一个規模不大的出版社。馬克思會同他談判出版自己的著作集以及出版一种季刊（預定在列日出版）的事情。这些計劃由于貝克尔在1851年5月被捕而落空了，但是《海尔曼·貝克尔版著作集》仍旧出了一册。按照計劃，《著作集》应分两卷出版，每卷約二十五印張。在5月15日以前訂购这两卷的人将得到分成十册的两卷，每册定价八銀格罗申；超过这个期限，每卷价格就提高到一塔勒十五銀格罗申了。第一册很快就卖完了，但是魏德迈說卖掉一万五千册，这个說法大概是錯誤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卖掉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就是极大的成功了。

在拟定这些计划的时候，“謀生的迫切需要”对馬克思來說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他当时生活十分困难。1849年11月他的第四个孩子，一个名叫格維多的儿子誕生了。母亲亲自給这孩子哺乳，她在談到这个孩子时写道：“我可怜的孩子在吃奶时从我身上吸去这样多的忧虑和隱痛，以致他总是生病，日日夜夜受着极大的痛苦。从他出生以来，他沒有一夜睡到两小时以上的。”^① 这不幸的孩子生下来一年就死了。

馬克思和他的一家从他們最初在切尔西的住宅里被粗暴地赶了出来，因为虽然他們向二房东付了房租，二房东却没有把錢付給房主。后来，他們經過許多困难和麻煩才在萊斯特广场附近的萊斯特街的一家德国旅館找到了一个落脚处，不久又从那里搬到索荷广场区第恩街二十八号，在那里的两小間房里住定下来，一直住了六年。

但是这并未能使他們摆脱貧困。相反，貧困日益压得他們喘不过气来。1850年10月底，馬克思写信給法兰克福的魏德迈，請他贖出并且卖掉典当在那里的当鋪里的銀器；只有屬于小燕妮的一套儿童餐具一定要保留下来。他写道：“現在我的处境是，無論如何要弄到錢，以便能够繼續工作。”^② 正好在这一时期，恩格斯迂回曼彻斯特去从事那“倒楣的商务”，他决定这样做，显然首先是为了帮助他的朋友。

在这个困难的时期，馬克思的其他朋友越来越少了。馬克思夫人在1850年写信給魏德迈說：“真正使我深感痛苦、于心不安的是，我的丈夫必須为这些小小的不幸操心，而能够帮助他的人又很

① 參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0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86頁。

少，他曾經那麼樂於幫助別人，但他在這裡卻得不到任何援助。然而親愛的魏德邁，請不要以為我們要向什麼人提出要求。我丈夫向那些在思想上請教過他、求他幫過忙的人們只會要求一件事情，這就是為他的雜誌付出更大的力量，積極地參加這一工作。我能夠自豪而大胆地肯定這一點。這是他們應該為他做的一點小事情，做這點事誰也不會受到什麼損失。我就是為這件事感到痛苦。但我的丈夫却不以為然。即使在情況最惡劣的時候，他也從來沒有對未來失去信心，而總是保持着极好的興致，當他看到我很愉快而親愛的孩子們向母親撒嬌的時候，他就心滿意足了。”^①正如當朋友們沉默冷落的時候她關心丈夫一樣，當敵人張牙舞爪的時候他也關心她。

1851年8月馬克思也寫信給魏德邁說：“你當然了解，我目前的境況很淒慘。如果這種狀況長久繼續下去，我的妻子會送命的。接連不斷的憂慮和極瑣碎的日常生活上的煩擾正在消磨她的體力。此外還要加上我的敵人們的卑鄙無恥；他們甚至壓根兒不想就實質問題攻擊我，而是散布關於我的難以名狀的誹謗，敵壞我的名譽，來報復他們自己的無能……

對於這些卑鄙醜惡的勾當，我當然只是一笑置之，從來也沒有讓它們妨礙過我的工作。可是你知道，我的妻子害着病，從早到晚都陷在最不愉快的日常窮困里，以致她的神經系統已經受到損害，而當那些愚蠢的撥弄是非的人日復一日地給她帶來傳播民主主義瘟疫的陰溝里的惡臭時，這對她是會起什麼好作用的。某些人在這方面表現出來的不近人情，簡直令人難以置信。”^②幾個

① 參閱《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07頁。

月以前（在3月間），馬克思的女兒弗蘭契斯卡誕生了。馬克思夫人雖然在分娩時並不困難，但“由於一些物質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原因”，很久臥病不起。家里一文錢都沒有，“還說我剝削了工人！並且一味要求專政！”^①——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極其郁憤地說。

馬克思本人則在科學研究中找到了無窮的安慰。他從早晨九點鐘到晚上七點鐘坐在大英博物館²²⁵里面。在談到金克爾和維利希的虛夸時，他曾寫道：“民主派的頭腦簡單的人們的靈感是‘從天而降’的，當然不需要下這樣的功夫。這些幸運兒為什麼要辛辛苦苦地研究經濟的和歷史的資料呢？因為正如可尊敬的維利希所常說的，這一切都是這樣地簡單。都是這樣地簡單！不錯，在這些空无一物的腦袋里確是如此！真是些頭腦簡單的人！”^②當時馬克思希望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完成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且已經開始 237 尋找出版人，但是這種努力也接二連三地給他帶來了失望。

1851年5月，馬克思的一個完全可以信賴的忠實朋友來到了倫敦。在以後的幾年當中馬克思也一直同他保持着親密的友誼。這就是斐迪南·弗萊里格拉特。但是接踵而來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5月10日，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特使，裁縫諾特萊克在萊比錫被捕。他是為了宣傳的目的到萊比錫去的。警察從他隨身帶着的文件發現了同盟的存在。接着，科倫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們被捕，而弗萊里格拉特只是由於來到了倫敦才得以幸免，雖然他極本沒有想到他所面臨的危險。當他一出現在倫敦，德國流亡者中所有的小派別都爭相拉攏這位著名的詩人。但是弗萊里格拉特宣布，他將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20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02頁。

只支持馬克思和他的亲密的朋友。因此，他拒絕了約他參加訂于1851年7月14日召开的集会的邀請。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再一次試圖把德国流亡者联合为一个整体。这个嘗試也像过去的历次嘗試一样失败了，只引起了新的爭吵。7月20日，成立了卢格領導下的“鼓动联盟”，而在7月27日，成立了以金克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这两个团体不久就不仅在倫敦、而且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馬克思当然是以辛辣的嘲笑来对待这场“鼠蛙之战”²²⁶的。交战双方的两个魁首的思想方式在他看来都是同样可厌的。《新萊茵报》曾特別巧妙而引人入胜地評論过卢格在1848年想要“編纂事变的意义”的企图，同时也不时以重炮轰击“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²²⁷“阿尔諾德·文克尔里德·卢格”²²⁸，說他的著作是“泛流着德国民主派的一切骯髒爭辯和一切矛盾”的“阴沟”。但是尽管卢格在政治方面一团混乱，他还是完全不同于金克尔的另一种人。金克尔自逃出施潘道監獄来到倫敦以后，正如弗萊里格拉特用諷刺的口吻所說的，就“时而在酒館里，时而在沙龙里”拚命扮演社交界之獅的角色。馬克思这时对金克尔特別注意，因为維利希也加入了金克尔一伙，組織一个高級的騙局——一次合股經營的新革命。1851年9月14日，金克尔到了紐約，他的使命是預先取得有名望的侨民的合作，把他們抬出来給“为推进当前的共和革命而征集的两百万美元”德国国債做担保人，同时还要募集两万塔勒的临时基金。固然，头一个想出携带錢囊漂洋过海去为革命筹集資金这条妙計的是科苏特。但是金克尔却以較小的規模同样热心而毫不客气地干了起来。先生和学生双双在北部各州宣傳反对蓄奴制，而在南部各州宣傳拥护蓄奴制。

和这种鬧剧相反，馬克思同新大陆建立了真正的联系。由于生活越来越困难，——“不可能再这样活下去”^①（馬克思在7月31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說），——馬克思便考虑同威廉·沃尔弗一起为美国报纸出一种石印的《通訊》；但是几天以后他接到北美銷路最广的报纸《New-York Daily Tribune》（《紐約每日論壇报》）聘請他做經常撰稿人的通知。这个聘請是該报的出版人德納提出的。馬克思和德納早在科倫时就相識了。馬克思的英語当时还没有熟练到可以用来写作的程度，所以起初恩格斯帮助他，为他写了几篇論德国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²²⁹。此后不久，馬克思终于在美國出版了他的一部用德文写的著作²³⁰。

（五）零月十八日

在革命年代里，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結識的老友約瑟夫·魏德迈就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家民主报纸的編輯崗位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日益猖狂的反革命后来查封了这家报纸。而自从警察发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存在以后，作为同盟最积极的成员之一的魏德迈就不得不設法避开跟踪他的暗探。

起初他躲藏在“薩克森豪森的一家清靜的客店”里。他想在那里避避風險，同时为人民写一本通俗的政治經济学。但是气氛越来越令人窒息，而且，“鬼才能这样沒完沒了地东躲西藏！”由于他有妻子和两个很小的孩子，他感到沒有携带家眷在瑞士或倫敦勉强維持生活的希望；因此他决定移居到美国去。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260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不願意失去这个忠实的同志。馬克思費尽心机、想方設法要給魏德迈找到一个工程师、铁路職員或者諸如此类的职位,但是枉然。“一旦你到了大洋彼岸,誰又能担保你不会在239 辽远的西部的某个地方就此湮沒下去呢? 而我們的力量是这样地薄弱, 我們必須格外珍惜我們現有的人才才行。”^① 但是既然他非走不可, 那末有一个共产主义利益的精明代表駐在新大陸的首府, 也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恩格斯說:“我們在紐約正是缺少一个像他这样可靠的人, 而且, 毕竟紐約也不在世界之外, 至于魏德迈, 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 在必要的时候, 他是会一呼即至的。”^② 因此, 他們祝福了魏德迈的計劃。魏德迈在9月29日从哈佛尔动身, 經過大約四十天的充滿風險的航行, 到了紐約。

馬克思在10月31日就写信給魏德迈, 建議他从事书籍出版事业, 从《新萊茵报》和《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中选出最精彩的文章作为单行本出版。魏德迈在給馬克思的信中痛罵小商人心理, 說这种心理在哪里也不像在新大陸表現得这样令人作嘔地露骨; 同时告訴馬克思, 他准备从一月初起出版一种周刊, 名为《Revolution》〔《革命》〕, 并請馬克思尽快地寄文章去。馬克思立刻催促所有的共产主义作家們动起手来——首先是恩格斯, 然后是弗莱里格拉特(魏德迈特別希望得到他的詩), 还有埃卡留斯、維尔特以及两个沃尔弗。他責备魏德迈在預告他的周刊出版的消息时沒有提到威廉·沃尔弗的名字。他写道:“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够写得像他那样通俗。他非常謙虛。尤其应当避免使他觉得, 我們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1版, 第25卷, 第111頁。

②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1卷, 第261頁。

把他的合作看成是多余的。”^①馬克思自己則答應除了一篇詳論蒲魯東新著的文章以外，還要寄去一篇專論12月2日波拿巴的政變的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是當時歐洲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不久就成了大批著作的主題。

這些著作中有兩部著作特別有名，它們給著者帶來了丰厚的報酬。後來馬克思談到他自己的著作和這兩部著作的不同之處時說：“維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侖》²³¹……只是對政變的發動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諷刺的嘲罵。事變本身在他筆下竟被描繪成了晴²⁴⁰天的霹靂。他把這個事變只是看做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察覺到，當他把這個人說成具有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輕蔑而是抬舉了這個人。蒲魯東呢，他想要把政變描述成為先前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於這個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於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²³²。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那班所謂的客觀歷史家所犯的錯誤。反之，我則指出法國階級鬥爭怎樣創造了一些條件和情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能夠扮演英雄的角色。”^②

馬克思的著作問世時，和那兩個更幸運的姊妹相比就好像灰姑娘一樣。但是那兩部著作早已被遺忘的塵埃掩蓋了，而馬克思的著作卻至今仍然放射着不朽的光輝。

在這部閃爍着智慧和機智的著作中，馬克思以前無古人的技巧，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透徹地分析了當代的事件。這部著作的形式和它的內容一樣輝煌。這裡我們只引該書開頭處所作的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21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219—220頁。

个光輝的对比就够了：“資產階級革命，例如 18 世紀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連不断地取得胜利的。在这种革命中，戏剧性的效果一个比一个更加眩目，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繽紛的火光照耀得燦爛輝煌，每天都充滿着乐极狂欢。然而这种革命总是为时暫短，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頂点，而社会在还未冷靜地傾略其疾風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反之，无产階級革命，如 19 世紀的革命，則經常自己批評自己，往往在進行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把这些事情从头再做一遍；它們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們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壯地在它們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們在自己无限宏偉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²³³①

241 在結論中，我們看到了充滿信心的預言：“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从汪东圓柱²³⁴頂上被推下来。”②

而这部惊人的著作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啊！在种种不幸当中，下面这个不幸还是最小的：魏德迈由于缺乏資金，在周刊出了第一期以后就不得不“打住”了。关于这一点他写道：“从秋天以来，失业現象在这里空前严重，以致每一个新企业都遭到巨大的困难。而且，近来工人們还受到各式各样的盘剝。最初是金克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8 卷，第 125 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 227 頁。

尔,接着是科苏特,而大多数人都愚蠢到宁可送一块錢給敌視他們的宣傳,而不願出一分錢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土壤对人們起着一种极大的腐蝕作用,而同时人們却开始以为,他們比旧大陆的同志們高瞻远矚得多哩。”但是魏德迈并没有絕望,他希望能够使他的周刊以月刊的形式复活;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有两百美元这样一笔小小的数目就够了。

远为不幸的是,在1月1日以后,馬克思就害了病,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工作:“很久以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像这該死的痔疮这样弄得我精疲力尽的了,甚至最近在法国发生的丑事²³⁵都不能相比。”^①但是最使他苦恼的是他經常缺少“臭錢”。2月27日他写道:“一星期以来,我已經达到了这样一个美妙的境地:由于上衣送进了当鋪,我不再出門;由于肉鋪不肯賒賬,我已不能再吃肉。”^②3月25日,他終於把最后一部分原稿寄給了魏德迈,同时就魏德迈通知他又生了一个小革命家的事表示祝賀:“要出生在世界上,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时刻了。到了从倫敦到加尔各答只要走七天的那个时候,我們两个人的脑袋早就該被砍掉或是由于衰老而搖晃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新的世界公民将不能理解,我們的世界曾經小到什么程度。”^③想到人类发展的广闊前景,馬克思尽管置身于个人的种种困苦中,却仍然保持着开朗而平靜的心緒。

但是极其悲慘的日子还在不久的将来等待着他。魏德迈显然²⁴²曾在3月30日的信中告訴他,他寄去的稿子沒有出版的希望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21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368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47頁。

這封信本身沒有保存下來，但是從威廉·沃尔弗4月16日的措詞激烈的信中聽到這封信的余音。沃尔弗的信是在馬克思的一個孩子安葬的那天寫的，是在“幾乎所有的熟人都遭到各方面的失敗和不幸並且處于可怕的窮困之中”的時候寫的。信中充滿了沉痛地責備魏德邁的話，雖然後者自己的生活也並不是玫瑰花壇，而且他已經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復活節前后的這些天對於馬克思和他的一家是可怕的。死去的孩子是他們在一年前生的女兒，這件事在母親的日記里有過這樣一段動人心弦的描寫：“1852年復活節，我們可憐的小弗蘭契斯卡得了嚴重的支氣管炎。可憐的孩子和死亡搏鬥了三天，受了許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屍體停放在後面小房間里。我們都搬到前面房間來，晚上我們睡在地板上，——三個活着的孩子同我們睡在一起，我們都為停放在鄰室的冰冷而蒼白的小天使痛哭。親愛的小女兒正是在我們生活上最窮困的時期死去的……我慌亂地跑到一位住在附近、不久前曾拜訪過我們的法國流亡者那里去……他立刻極友善而同情地給了我兩英鎊。這樣才付清了小棺材的錢，現在可憐的孩子終於安然躺在里面。小女孩出世時沒有搖籃睡，而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小棺材。當我們把我們的小女兒送進墳墓時，我們是多麼傷心啊！”^①就在這個黑暗的日子里，魏德邁的那封帶着壞消息的信來到了。馬克思為他的妻子深感不安，因為她在兩年之中親眼看到他所創始的一切事業都失敗了。

然而，在這不幸的時刻，魏德邁的另一封信已經在橫渡大洋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個星期了。這封信是在4月9日寫的，信中一開

^① 參閱《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8頁。

头就說：“意外的援助終於扫除了出版那本小册子的种种障碍。在我发了前一封信以后，我遇到我們的一个从法兰克福来的工人，一个裁縫，也是去年夏天才到这里的。他立刻把他的全部积蓄——四十美元——通通交给了我。”我們應該感謝这位工人，否則《雾月十八日》是无法出版的。魏德迈甚至連他的名字都沒有提，——不过他叫什么名字是无关紧要的。引导他这样做的是那甘願为自己的解放不倦地作出牺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²⁴³

《雾月十八日》构成了魏德迈所打算出版的那个月刊《革命》的第一期。第二期，也就是最后一期里載有弗莱里格拉特致魏德迈的两篇詩体信，其中弗莱里格拉特以輝煌的幽默笔調揭露并且嘲笑了金克尔在美国的求乞旅行²³⁶。这个刊物就此結束了；恩格斯寄去的几篇文章都在中途遺失了。

魏德迈印了一千部《雾月十八日》，其中将近三分之一都寄往欧洲；但是这一部分也沒有进书店，——党内的朋友們在英国、特别是在莱茵把它們推銷出去了。甚至“激进的”书商也不肯經售这样“不合时宜”的一部著作。由皮佩尔翻譯并經恩格斯潤飾过的《雾月十八日》的英譯本也同樣銷路不暢。

由于在波拿巴政变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科倫共产党人案件，馬克思要找到一个出版人就更加困难了。

(六)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

自 1851 年 5 月的逮捕以来，馬克思就密切注視着官方的偵查过程。但是“由于缺乏起訴的客观根据”（連科倫上訴法院的檢察院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偵查工作一步一停頓，因此一时很少进

展。对于十一位被告，除了参加秘密宣傳团体这一条以外，沒有任何罪名可加，而参加秘密宣傳团体按刑法典是不能加以任何懲罰的。

但是按照国王的旨意，“有用的”施梯伯必須“一显身手”，在普魯士公众眼前排演一出期待已久的破获陰謀和惩治叛逆的好戏，而施梯伯又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不会不去执行他的主子和国王的旨意。他以合乎他的身分的方式从撬鎖窃盜着手，指示他的一个爪牙撬开了維利希派的同盟的秘书、名叫奧斯渥特·迪茨的人的写字台。施梯伯用他那灵敏的警察鼻子嗅出了这个同盟的魯莽行动为他的崇高使命大开方便之門，而这一点是从“馬克思派”那里期望不到的。

244 利用这些盜来的文件，在形形色色的奸細的协助下并使用警察所慣用的种种伎俩（政变前夕的波拿巴政府的警察也给了他大力的帮助），施梯伯果真制造成功了所謂“巴黎的德法密謀”²³⁷。結果，巴黎的陪审法庭就在1852年2月判处几个不幸的德国工人以各种不同刑期的徒刑。但尽管施梯伯用尽手腕，却没有能把这个案件同科倫的被告們联系起来；根本找不到他們参加“德法密謀”的任何证据。

相反地，由于巴黎案件的发生，“馬克思派”和“維利希—沙佩尔派”之間的对立更加尖銳了。1852年的春天和夏天，这两派之間の磨擦加剧了，这特别是由于維利希仍旧和金克尔一致行动，而金克尔之从美国回来，重新在流亡者当中挑起了旧日的爭吵。金克尔沒有募集到准备用作革命公債基金的两万塔勒。他只募到了这个數目的将近半数，而民主派流亡者們为了討論如何利用这笔錢的問題，不仅絞尽腦汁，而且彼此打得头破血流。最后，决定把一

千英鎊存入威斯敏斯特銀行作為第一屆臨時政府的基金，其餘的款項則都作為旅費和其他開支報銷了。金克爾的這筆錢從來沒有用於這個原定目的，但是十五年後，這筆錢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報紙克服了創辦時的某些困難，因而這出鬧劇总算有了一個圓滿的收場。

當環繞着尼伯龍根寶藏²³⁸掀起的這場糾紛還在鬧得火熱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幾篇人物素描²³⁹中描述了這些勾心斗角的英雄們，但是可惜這些文章都沒有給後人保存下來。他們的這些文章是應一個名叫班迪亞的匈牙利上校的請求寫的，這人自稱是匈牙利流亡團體的警務總監，並且向他們出示一份科蘇特的親筆證件來證明這個身分。其實班迪亞是一個國際間諜，他的假面具正是在這一次被撕破了：馬克思托付給他的手稿本來是應當交給柏林的一個出版家的，但被他交給了普魯士政府！馬克思立刻寫了一個署名的啟事寄到《紐約刑法報》上揭露了這個騙子²⁴⁰，但是手稿已經遺失，至今下落不明。如果說普魯士政府曾極力要弄到這些手稿，以便從中找到可供科倫案件利用的材料，那末這只是“痴心妄想”。

由於不可能搜集到不利於被告們的罪證，政府無可奈何，只得²⁴⁵一再延期開庭審理這個案件，以致可敬的公眾的不耐煩情緒達到了極其緊張的程度。1852年10月，政府終於不得不決定開幕公演。然而，甚至警察們硬捏造出來的偽證也不能證明被告們同“德法密謀”有任何關係。因為，這個密謀是在科倫的被告們已經被捕在押以後才由警探們製造出來的；而且，它所涉及的組織是和被告們處於公開敵對關係之中的。於是施梯伯想出了另一個花招，向法庭提出了一份“馬克思派的原本記錄”，其中有馬克思和他的同謀者

討論他們罪惡的世界革命計劃的歷次會議的記錄。這個文件是一個卑鄙的偽造品；它是在一個名叫格萊夫的警監指示下由密探查理·弗略里和威廉·希爾施在倫敦粗制濫造地編出來的。不用說它的內容如何荒唐，單是從它的外形就可以一眼看出偽造的痕迹。但是施梯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仔細挑選出來的陪審員的資產階級昏庸和對郵件的嚴格檢查上面，指望用這種辦法來防止從倫敦方面寄來任何解釋。

但是，這卑劣的計劃却由於馬克思的周密有力的對策而全盤失敗了，雖然馬克思對於這場連續許多星期的疲勞鬥爭是準備得很不夠的。9月8日，他寫信給恩格斯說：“我的妻子在生病，小燕妮在生病，琳蘅害着一種神經熱。醫生，我過去不能請，現在也不能請，因為沒有錢買藥。八至十天以來，我們全家只靠麵包和土豆過日子，而今天我是否能弄到這些東西還成問題。……”

給德納的文章我沒有寫，因為我連買報紙的一個辨士都沒有……

最好的並且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就是房東太太會把我攆出去。那樣我就至少可以擺脫一筆二十二鎊的賬了。不過這樣大的恩賜，她大概是會給的。此外，還有麵包鋪、牛奶鋪、茶葉鋪、蔬菜鋪的賬，以及肉鋪的老賬。我怎麼能還清這一切鬼賬呢？在最近八到十天中，我終於跟某些住戶借了幾個先令和辨士；我最討厭這種事，但是為了不致倒斃，非如此不可。”^①馬克思不得不在這種
246 極端窘迫的情況下同敵人的優勢力量進行鬥爭，而在这场鬥爭中他和他那堅強的妻子都忘記了家計的艱難。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446—447頁。

当胜利誰屬还有待揭曉的時候，馬克思夫人写信給一个在美国的朋友說：“由于必須从这里提出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捏造，我的丈夫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然后还必须把所有的文件轉抄六份甚至八份，經法兰克福、巴黎等等各种不同的路綫寄往德国，因为所有寄給我丈夫的信件以及所有从这里寄往科倫的信件都被拆开和沒收了。在目前，所有这一切都构成警察和我丈夫之間的斗争，他們把一切东西，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案件的领导統統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請原諒我这封毫无条理的信，因为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曾經抄写又抄写，直到手指酸痛。因此这封信写得这样乱。剛才收到了維尔特和恩格斯为了安全地轉寄文件、信件等等而寄来的几整包商人姓名地址和伪装的商业信件。現在我們这里已經成立了一个完整的办公室。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其余的人弄錢来給写东西的人維持生活，并向旧的官方世界提出证据，证明前所未聞的丑聞。再加上我的三个淘气的孩子老是唱歌，吹口哨，因而常常受到她們的父亲的严厉斥責。这是一种多么忙乱的生活啊！”^①

馬克思終於在這場斗争中贏得了胜利，还在开庭审理以前，伪造就已被揭发，于是檢察官不得不亲自从证据当中剔除了那个“倒楣的紀錄本”。然而这个胜利对于大部分被告却成了禍事。五个星期的审判暴露出警察的这样一大堆可耻行为，而这些行为又都是在普魯士国家最高当局的协助和参与下干出来的，以致宣告全体被告无罪将使这个国家在全世界面前顏面扫地。为了挽救这种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66頁。

局勢，陪審員們只好毀損自己的榮譽和良心，判了十一名被告中的七人圖謀叛國罪：雪茄廠工人勒澤爾、作家畢爾格爾斯、裁縫幫工諾特榮克被判处要塞監禁六年；工人賴夫、化學技工奧托、前候補法官貝克尔——五年；裁縫幫工列斯納——三年。店員埃爾哈特、醫生丹尼爾斯、雅科比和克萊因被宣告無罪。但是被宣告無罪的人當中有一個人受害最深，丹尼爾斯由於在一年半候審期間的單獨監禁中染上了肺結核而在幾年以後死去了。丹尼爾斯夫人在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中向馬克思轉達了她丈夫的最後致意。對於丹尼爾斯的死，馬克思深感痛惜²⁴¹。

這個可恥的案件的其餘犧牲者都比他活得遠為長久，其中有一部分人又回到資產階級社會里去，如畢爾格爾斯成了進步黨²⁴²的國會議員，貝克尔做了科倫市長和普魯士上議院議員。他“由於他那崇高的愛國情操”而深得宮廷和政府的榮寵。在始終忠於自己的旗幟的被判罪者當中，諾特榮克和勒澤爾還參加了復興的工人運動的初期階段，而列斯納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活了許多年，是他們在流亡中的最忠實的同志之一。

科倫案件之後，共產主義者同盟瓦解了，而維利希—沙佩爾派的同盟不久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維利希移居美國，在解放黑奴的戰爭中作為北部各州的一個將軍獲得了應有的榮譽，而沙佩爾則終於悔悟並回到老同志身邊²⁴³。

馬克思接着就着手從道義方面痛擊那個在科倫陪審法庭前如此可恥地占了上風的當局。他寫了《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²⁴⁴，想在瑞士發表出來，如有可能，也在美國發表。12月7日，他寫信給美國的朋友們說：“如果你們想到，這本小冊子的作者由於沒有褲子和鞋子，無異處於被軟禁的狀態，而他的家庭每時每刻都曾經而

且正在面临着陷于赤貧的絕境的危險，那末你們就会更加欣賞这本小册子的幽默。这个案件使我在貧困中越陷越深，因为五个星期当中我必須为党工作，同政府的阴谋詭計作斗争，而不能掙錢謀生。不但如此，这个案件使得德国的那些出版家完全离开了我，而我本是希望同他們簽訂关于出版我的政治經濟学的合同的。”^①但是在12月11日，承印关于科倫案件的小册子的小沙貝利茨从巴塞尔写信告訴馬克思說，他已經讀了該书的初校样。他写道：“我深信这本小册子将引起极大重視，因为它是一部杰作。”沙貝利茨打算印二千册，每册訂价十銀格罗申，因为他估計到这书至少会有一部分要被沒收。

可惜，当这一版小册子在巴登的一个靠近边界的小村里存放了六星期后正要运进德国內地时，不是部分、而是全部被沒收了。3月10日，馬克思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訴恩格斯，并且沉痛地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难道不会失去写作的欲望嗎？老是在‘pour le roi de Prusse’^②而工作。”^③这件不幸的事究竟是怎样发 248 生的，完全沒有人知道。起初馬克思怀疑出版人，不过事实很快就证明，这种怀疑显然是沒有根据的。沙貝利茨曾打算把他那里剩下的五百册在瑞士推銷，但是看来也沒有多少效果。对于馬克思，这件事不久以后还在物质方面引起了一个不愉快的周折：三个月以后，虽然不是沙貝利茨本人，却是他的合伙人安伯格要求小册子的作者賠償四百二十四法郎的印刷費。

在瑞士遭到失敗的事情，至少在美国获得了成功；不过，当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69頁。

② “为普魯士國王”。

③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18頁。

馬克思的《揭露》在美國問世并不能使普魯士政府特別感到不安。它刊登在波士頓的《New-England Zeitung》(《新英格蘭報》)上,同時,恩格斯自費向該報訂印了四百四十冊單行本,打算由拉薩爾幫助在萊茵省推銷。馬克思夫人曾就這件事同拉薩爾通信,拉薩爾表示十分熱心。但是從他們的通信中無法斷定預定的目的是否已經達到。

馬克思的這本小冊子在美國的德文報刊上得到了頗為熱烈的反應,而維利希就在這些報刊上進行了反對這個小冊子的活動²⁴⁵。這促使馬克思寫了一本小冊子來反駁維利希,這本小冊子以《高尚意識的騎士》為題于1853年底出版²⁴⁶。現在似乎不值得重提這篇久已被遺忘的著作了。在這種鬥爭中,往往雙方都有錯誤,而取得勝利的馬克思很樂於放棄對戰敗者炫耀勝利。1860年他在談到流亡初期的事情時就肯定地說,要為流亡時代作辯護,最好的辦法是把它歷史同當時的政府和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作一比較。除去少數人例外,流亡者也只是耽於幻想和做過某些蠢事,此外別無其他可以指責的地方,而前一種錯誤多少是可以用當時的條件來加以諒解的,後一種錯誤則是由於亡命者突然處於非常的环境中而必然發生的現象²⁴⁷。

當馬克思在1875年準備再版《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時,他曾猶豫了一下,是否要從書中刪去關於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那一章。結果他仍舊保留了這一章,但僅僅是因為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認為對於原本的任何改動都是對歷史文件的偽造。他只是表示:“革命遭到的暴力鎮壓,在參加革命的人們的頭腦里,特別是在那些遠離故土亡命他鄉的人的頭腦里留下了那樣的震蕩,甚至使堅強的人都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失去自制力。他們看不清歷史的進程,

他們不願意理解，運動的形式已經改變。於是他們拿密謀和革命當兒戲，而這是對他們自己 and 對他們所從事的事業都有害的。沙佩爾和維利希的過失就是由此而來的。維利希在北美內戰中證明了他並非單純是一個幻想家，而沙佩爾終生都是工人運動的先進戰士，他在科倫案件結束後不久就認識到並且承認了自己一時的迷誤。許多年以後，沙佩爾躺在臨終的病榻上，用辛辣的譏諷口吻對我說起這個‘流亡者的胡鬧’的時期。——從另一方面來說，寫《揭露》時的環境，說明了這篇文章在攻擊共同敵人的不自覺的幫凶時為什麼採取了那樣苛刻的態度。在危機時刻失去冷靜的頭腦是對黨的罪行，應當公開贖罪。”^① 特別是當人們把“嫵婉的語氣”看得高於堅持明確的原則的時候，這番話真是金石良言！

當戰鬥已經結束而勝利已經取得的時候，馬克思是最不念舊惡的。他甚至過份地去遷就流亡者當中的敵人；當弗萊里格拉特在1860年嚴厲地提到那些鑽到同盟里來的“來歷不明的壞透了的分子”時，他回答說：“在風暴中會有塵土飛揚，在革命的時候嗅不到玫瑰油的芳香，總有人有時候要濺一身污泥，——這都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他完全正確地補充說：“然而，如果我們想一想整個官方世界怎樣全力以赴地對付我們，他們為了要毀滅我們，不是隨便翻閱一下刑法典，而是深入地鑽研了刑法典；如果我們想一想‘愚蠢的民主派’怎樣惡毒地誹謗我們，他們不能原諒我們的黨比他們自己的黨具有更高的智慧和品格；如果我們熟悉同一時期的其他一切政黨的历史；最後，如果我們捫心自問，能夠提出什麼事實……來反對整個黨，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說，在這個19世紀，我們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201—202頁。

的党由于它的純洁无瑕而出类拔萃。”^①

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联系着馬克思和德国社会生活的最后几根綫就断了。从此以后，流亡的国土，“好人的故乡”，就成了他的第二祖国。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6頁。



第八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

(一) 天才和社会

我們說，馬克思在英國找到了第二祖國，但祖國這個詞的涵義 250 當然不應該理解得過於廣泛。在英國，馬克思從來不曾因為他的革命宣傳活動而受到迫害，雖然這種活動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反對英吉利國家的。這個“貪婪而嫉妒的小店主”的政府比那些大陸國家的政府具有更大的自尊和自信；大陸國家的政府由於良心有愧而心懷恐懼，不惜揮舞警棍來迫害自己的反對者，甚至當後者並沒有越出討論和宣傳的範圍的時候也如此。

但是就祖國這個詞的另一種更深刻的涵義來說，那末，自從馬克思用他天才的眼光看穿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底蘊之後，他就再也沒有祖國了。在這個社會中，天才的命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發表過各種各樣的見解——從庸人關於天才終將勝利的貧乏的、自欺欺人的預言，直到浮士德的憂郁的話語：

“那少數通曉事理的人，
都有幾分優氣，不知道明哲保身，
他們向庸眾吐露了自己的見解和真情，
只落得在十字架和火刑堆上喪命。”^①

^① 參閱歌德：《浮士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 部，第 31 頁。

馬克思所制定的历史方法，使我們有可能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庸人之所以預言每个天才終將胜利，正因为他們是庸人。即使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天才沒有被送上十字架或是火刑堆，而是获得了承认，那也只是因为他終于甘願让自己变成了庸人。如果没有发辮垂在肩际，歌德和黑格尔也是永远不会成为資產階級社会公认的天才的²⁴⁸。

251 資產階級社会在这方面只不过是一切階級社会中表现得最明确的一种形式，而且不管这个社会有多少功績，它却从来不是天才的关怀体贴的祖国。它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天才的内在本质就在于：它唤醒人类自发力量的创造性的迸发，而这种迸发是反对傳統的遗产和破坏階級社会所賴以生存的壁垒的。在西尔特島上，有一处埋葬着被海水冲上岸的无名尸体的孤寂的墓地，墓門上刻着这样一个虔誠的題銘：“髑髏地²⁴⁹的十字架——无家可归者之家”。这句话无意識地但是中肯地道出了階級社会中天才的命运：天才在这个社会里是无家可归的，他只有在髑髏地的十字架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当然，当天才同資產階級社会作某种妥协的时候，則是例外。当他帮助資產階級社会推翻封建社会的时候，他好像具有无比的威力。但是，当天才一旦自行其是，这种威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天才就至多只被允許在圣海倫那島的岩石上了結自己的余生²⁵⁰。有时候，天才穿上了市僧的闊綽的常礼服，这时他就可以一帆風順地爬上魏瑪的薩克森大公国国务大臣²⁵¹或者柏林的普魯士欽任教授²⁵²的地位。但是，如果天才以高傲的独立精神和不屈的气节同資產階級社会相对立，如果他从資產階級社会存在的最深的根源来揭露它灭亡的秘密，从而預言这个社会的即将来临的

毀滅並且為它的毀滅作準備，如果他為給這個社會以致命打擊而打造武器，那末，災禍就將降臨到天才的身上。資產階級社會為這樣的天才準備的只有摧殘和折磨；這些摧殘和折磨表面看來也許不像古代的受難者的十字架和中世紀的火刑那樣野蠻，但實質上卻比這些刑罰更加殘酷。

在19世紀的天才人物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經受過比一切天才中最偉大的天才——卡爾·馬克思——所經受的更痛苦的命運了。還在他開始進行社會活動的頭十年當中，他就不得不同經常的窮困進行搏鬥，而從移居到倫敦時起，他就面臨着亡命生活的全部可怕的遭遇。但是真正當他通過不倦的努力在年富力強之際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時候，他却遭到了真正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命運，而成年地、成十年地為日常生活需要所纏累，為一塊必不可少的面包而操心苦惱。一直到逝世，他都沒有能夠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為自己爭取到一個哪怕是勉強過得去的生活。

而且，馬克思所過的絕不是庸人們所說的那種庸俗的流行意義下的“天才的”生活。他的過人的勤奮是和他那過人的精力相稱 252的。日日夜夜的過度工作很早就開始損壞了他那一度是鋼鐵般的軀體。在馬克思看來，失去工作能力對於每個人來說等於是宣告死刑，只要他不是天生就的畜類，——他是一本正經地這樣說的。當他身患重病而不得不一連幾個星期躺在牀上時，他寫信給恩格斯說：“在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時期里，我讀了卡本特爾的生理學和洛爾德的生理學，科利克爾的組織學，施普茨海姆的大腦系統及神經系統解剖學，施旺和施萊登關於細胞的著作。”^①馬克思盡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3卷，第209頁。

管好学不倦，却从不忘記他自己在青年时代說过的一句話：一个作家不應該为謀生而写作，而應該为写作而謀生²⁵³。不过，馬克思从来都是懂得“謀生的絕對必要性”的。

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由于一个敌視他的世界的仇恨、憎恶或至少是畏惧而遭到失敗。甚至那些在其他場合下装出一副独立不倚的恣恣的德国出版家，也被这个大名鼎鼎的“煽动者”的名字吓得退避三舍。德国所有的党派都同样誹謗他，而只要他的真正面貌在什么地方透过人为的云雾显示出来，在那个地方，有計劃地保持緘默的卑鄙陰謀就起着作用。从来也沒有一个最偉大的思想家像馬克思这样长久地完全被排除于本国人民的視野之外。

唯一能够为他奠立一个比較穩固的立足点的工作，是他从1851年起在整整十年中間为《New-York Daily Tribune》（《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的工作。这家报纸当时拥有二十万訂戶，是美国的一家讀者最多而資力最雄厚的报纸；而由于它鼓吹一种美国式的傅立叶主义，它要比純粹資本主义企业的鄙俗的刮錢主义略胜一筹。馬克思为这家报纸撰稿的条件本身是相当有利的：他每星期必須为該报写两篇論文，每篇論文得稿酬两英鎊（合四十馬克）。这也就是說，每年可以有大約四千馬克的收入，而有了这笔錢，馬克思就能够在倫敦勉强維持生活了。当弗莱里格拉特刚开始他的商业活动时，他的收入也不比这更多，而他就自认为可以为吃到“流放中的牛排”而自豪了。

当然，这里問題并不在于馬克思从这家美国报纸得到的稿酬是否抵得上他的文章的文学与科学价值。資本主义的报业只考虑市場价格，而在資產階級社会中它是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的。馬克思也并不要求更高的待遇。但即便是在資產階級社会中，他也有

权要求遵守已經簽訂的合同，而且恐怕也还有权要求稍稍尊重他的著作。但是，他無論从《紐約每日論壇報》方面或是从該報的出版人方面都沒有得到这些东西。德納这个人虽然在理論上是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但在實踐上却是一个铁石心腸的美国佬。正如恩格斯在激怒的时候所說的，德納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卑鄙的小資產階級的招搖撞騙。德納知道得很清楚，馬克思对于他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撰稿人，他經常在訂戶們面前拿馬克思来炫耀，甚至时常把馬克思的信冒充为自己的編輯部的文章；这种做法會引起写信人的正当的憤怒。但是尽管如此，他照旧用資本主义剝削者对待他所剝削的工人的慣常的无礼态度来对待馬克思。

德納不但在報紙的營業剛一下降的时候就把汇給馬克思的稿酬减掉一半，而且只付給他已发表的文章的稿酬，同时毫不慚愧地把不适合于自己的买卖的文章都扔到桌子底下去。有时候，一連三个星期甚至六个星期，馬克思寄去的文章都被扔到廢紙簍里去了。当然，馬克思临时为之撰稿的那些德文報紙，例如維也納的《Presse》〔《新聞報》〕，也并不表現得更好些。因此，馬克思說他为報紙写稿掙的錢还不如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投稿人，这是一点不錯的。

还在 1853 年，馬克思就渴望能有几个月的空閑来进行他的学术研究。他說：“但是，显然我是得不到这种空閑的。不断地为報紙乱写凑数文章已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許多時間，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毫无益处。不管你怎样力图独立不倚地写作，你总归要受到報紙和它的讀者的約束，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靠領取現款維持生活的人。純学术工作就完全不同了……”^①。在德納的軟鞭子下又工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5 卷，第 195 頁。

作了几年之后，馬克思說話的語調完全不同了：“跟这号人为伍，还不得不认为是件幸事，这真是令人厌恶。一个人注定要在这种行业中进行政治工作，只不过是像习艺所里的貧民把骨头研碎熬湯一样。”^①不仅在生計的艰难方面，尤其是在生活的朝不保夕方面，馬克思是和現代无产階級完全共命运的。

馬克思在他写給恩格斯的那些信里，激动人心地詳細描述了那些过去只是被人們約略知道的事情。他写到，有一次他由于沒有衣服和鞋子而不得不呆在家里；另一次，他缺少买紙或买报的几个辨士；又一次，他为了弄到寄稿子的邮票而在城里到处奔走。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同小店老板們的无休无止的爭吵，因为他不能如期付清賒购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的欠款；至于那个时时刻刻威胁着要查封他的財物的房东就更不用說了。最后，当鋪乃是他經常出入的一个避难所。当鋪的重利盘剝，从馬克思手中夺去了最后一点足以把忧虑的暗影排除于家門之外的东西。

而忧虑的暗影不仅光临馬克思的家門，而且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馬克思夫人，这位心灵高尚的妇女，从小过慣了物质方面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时不免在殘暴的命运的打击下灰心丧气，以致不止一次地祈求死亡降临到自己和孩子們的身上。从馬克思的一些信里，可以看到家庭不和的迹象。他有时竟认为，对于一个心怀大志的人來說，最大的蠢事莫过于結婚，因为結婚使一个人的生活为瑣碎的家务所煩扰。但就是在妻子的抱怨使他煩惱时，他仍旧原諒她并为她辯解。他說，对她來說，忍受那些难以形容的屈辱、折磨和惊恐，要比他自己更加沉重得多，这尤其是因为她不可能像他一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198 頁。

样，在科学的殿堂里寻求避难之所。但是，当做父母的看到孩子们童年的天真欢乐是怎样地受到限制时，两个人的心上是同样感到沉重的。

这位崇高的人物所遭遇的这种命运本身就已經够悲惨的了，但是使它真正达到悲剧的顶点的是这一事实：馬克思是自願地担負起他那长达数十年的殉道者的事业的。他拒絕了一切妥协的誘惑，虽然他完全有可能不失尊严地获得資產階級的一官半职以安度此生。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只是毫不夸張地简单地談到需要說的一切：“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而不让資產階級社会把我变成一架賺錢的机器。”^①把这位普罗米修斯束縛在岩石上的不是赫菲斯特的鎖鏈²⁵⁴，而是他自己的铁的意志，这种意志像磁針一般毫不动摇地指向人类的最高目的。他的整个素质是一块柔韧的鋼。最令人惊異的是，有时在同一封信里，馬克思似乎完全被最殘酷的忧患压倒了，突然同，他又以惊人的彈性振作起来，像一个从不为瑣碎的忧虑皱眉的智者一样心緒宁靜地解决各种最困难的問題。

但是，馬克思毕竟十分痛切地感受到資產階級社会对他的打 255
击。也許有人問：对于一个首先只是指望得到后世承认的天才來說，落到馬克思头上的这些苦难又算什么呢？这样的提法，是一种愚蠢的苦行主义的观点。那种只要可能就希望每天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报上的文人的虛荣心当然是庸俗不堪的，然而，一切創造力却需要有一个表現这种力量的必要的場所，需要从它所引起的反应来汲取进行新的創造的力量。馬克思并不是拙劣的剧本或小說中的装腔作势的饒舌家，他是一个像萊辛一样热爱生活的人，而萊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36頁。

辛在臨終前給他青年時代的一位老友寫的信中的那種情緒，對馬克思來說也不是陌生的。萊辛說：“我相信，您不會認為我是一個渴望得到別人贊揚的人。但是世人把某些人看得一尤其是處的那種冷漠態度，即使不使人悲痛欲絕，至少也使人心灰意懶。”馬克思在他五十壽辰的前夕所寫的一段話，也含着同樣的苦痛：年已半百，依然是個貧民！²⁵⁵有一次他說，他寧可埋在土里百丈深處，也不願像這樣庸庸碌碌地活下去。又一次，他禁不住發出絕望的呼號說，他甚至不願讓他最凶惡的敵人陷進他已陷進去兩個月的泥坑，在這兩個月當中，無謂的爭吵使他頭腦麻木，不能工作，以致心中充滿了極大的憤怒。

當然，馬克思並不是像他自己有時开玩笑地自稱的“愁眉苦臉的狗”。恩格斯說他的朋友從來沒有垂頭喪氣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說馬克思喜歡把自己稱做硬漢，那末，不幸的熔爐把他磨煉得更硬了。曾經覆蓋着他青年時代的著作的晴朗天空，逐漸被陰沉的烏雲所遮蔽，他的思想像閃電一般透過這些烏雲射出光芒。他對敵人、有時甚至也是對朋友的評判變得那樣地鋒利，以致它們所刺傷的不僅僅是那些精神上軟弱的人。

不過，有些人咒罵他是一個冷冰冰的煽動家，還有一些人像魯莽的下級軍官一樣，把這位偉大戰士僅僅看成是一個穿着長官制服在練兵場上神氣活現的木偶人，這兩種人不多不少同樣是錯誤的。

（二）無雙的聯盟

馬克思在生活中的勝利不僅應歸功於他自己的巨大能力。所

有的人都认为,如果没有恩格斯这样一位朋友,他也终究会被环境所压倒;关于恩格斯对他的自我牺牲的忠诚,直到现在,在他俩的通信发表以后,我們才清楚。256

像这样的友谊,是史无前例的。在一切时代里都有过历史所夸耀的友谊。在德国也曾有过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在共同的事业中不分你我地紧密溶合在一起。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存在着独特的意志、独特的思想这样一些不可消除的东西的残余,或者至少是暗地里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个性——照诗人的说法,这是“人间儿女的最高幸福”——的表现。路德终于把梅兰希通看成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学者,而梅兰希通则认为路德只不过是一个粗野的农夫²⁵⁶。只有缺乏真正的嗅觉的人才不能觉察席勒和歌德的通信中存在的那种大枢密顾问官和小宫廷顾问官之间的貌合神离²⁵⁷。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在一起的友谊,却丝毫不带有这种人类的浅薄;他们的思想和创作越是交织在一起,他们各自的个性就越是完整。

他们两人在外表上就是非常不相同的。恩格斯是个浅色头发、身材颇长的德国人,而且像一个观察者所描写的,有着英国人的风度;由于不仅在兵营里而且在营业所里受过严格的训练,他总是衣冠整洁的。他曾经说过,他用六个办事员组成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六十个政府顾问官所组织的要精简实用一千倍,因为这些顾问官甚至连字也写得认不出,而且会把册籍弄得乌七八糟,以致最后鬼都不能辨识。虽然恩格斯是曼彻斯特证券交易所的受人尊敬的一员,经常参加英国资产阶级的业务和娱乐,从事猎狐和圣诞节宴会之类的活动,他却仍然是一个思想工作者和战士。在该城的边沿座落着他的小屋,那里珍藏着他的宝贝——一个普通的爱尔

兰姑娘。同她在一起，他可以擺脫使他厭煩的庸人而獲得休息。

和恩格斯相反，馬克思却是一個墩實粗壯的人。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漆黑的鬍鬚般的頭髮，表明了他的閃族人的血統²⁵⁸。他是不修邊幅的。馬克思深受家室之累，從不涉足於這個世界首都的種種社交活動。他專心致志地埋頭於他的精神勞動，常常廢寢忘食地一直干到深夜，因而損耗了他的體力。馬克思是個不知疲倦的思想家，對於他來說，思維就是最高的享受；在這方面，他是康德、費希特、特別是黑格爾的真正繼承者。馬克思常常重復黑格爾的話說：“即使是惡棍的犯罪思想也比天上的一切奇蹟更為崇高而輝煌。”但是和這些哲學家不同的是，思想不斷地推動馬克思走向行動。他在小事情上不實際，但在大事情上卻是實際的。當他不得不去安排自己的小家務時，他是完全束手無策的，但是在組織一支軍隊並率領它去改造世界方面，他却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天才。

文若其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作家來說也很不相同。他們兩人在文章風格方面都是獨樹一幟的大師，並且都有語言天才；兩人都精通許多種語言，甚至方言。在這方面，恩格斯還要勝過馬克思，但是當他用自己的祖國語言哪怕是寫一封信，更不用說寫準備出版的著作時，他却非常小心地不讓自己的文字織物中夾雜一絲外國的纖維，同時也不讓自己陷到條頓語言純潔論的偏見中去。他的文字是明白曉暢的，他的行文有如清徹見底的一灣流水。

馬克思的文体却不那麼謹嚴而且是比較晦澀的。他青年時代的書信，也像海涅年輕時所寫的信一樣，使人強烈地感到他還在致力於語言的錘煉，而在他成年時期的書信中，主要是從他移居英國時起，他就在德文中夾雜着使用英文和法文了。確實，就是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也可以遇到一些並非不可避免的外國字眼，以及不少

英語和法語的表現方法。尽管如此，他却是这样一位德國語言的大師，以致在把他的文字翻譯成外文時不免要失去許多神韻。當恩格斯讀過他朋友的著作的法譯本的一章（馬克思曾親自仔細潤飾過這個譯本）後，他發現這一章的力量、神采和生命全都“蕩然無存了”。歌德有一次寫信給馮·施泰因夫人說：“在運用譬喻方面，我可以和桑喬·判札²⁵⁹的諺語比一比高低。”同樣，馬克思在語言的驚人的形象化方面，也是可以和最偉大的“譬喻大師”萊辛、歌德和黑格爾媲美的。萊辛說過，在完美的敘述中，概念和形象應當像夫婦一樣地互相結合在一起，而這一點馬克思是很懂得的。難怪那些大學里的學究們，從老將威廉·羅雪爾直到最年輕的講師，都為了這一點而攻擊馬克思，大罵他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時含糊不清，“用譬喻的補釘把它們綴合在一起”。馬克思在說明他所要說明的問題時，總是給讀者留有余地，讓他們自己去進行有益的思考。他的文字就好像是汪洋大海里跳躍着的波濤。

恩格斯總是承認馬克思的天才高過自己，並且認為在他們共同的事業中他自己不過是第二提琴手²⁶⁰。但是他絕不僅僅是馬克思的解釋者和助手；他是馬克思的一個才能不同然而旗鼓相當的獨立的合作者。在他們建立友誼的最初時期，在一個重要的知識領域內，恩格斯是所予多於所取的，這一點，在二十年後馬克思本人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證明。他寫道：“你知道，首先，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其次，我總是踏着你的腳印走。”^①恩格斯攜帶的是輕便武器，因而行動迅速得多；他的眼光十分敏銳，能夠一眼看透任何問題或形勢的本質，但是不夠深入，不能立時看到使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3卷，第209頁。

重要問題的解答复杂化的各种反面論点。对于一个行动者來說，这个缺点却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而馬克思不先同恩格斯商量，从来不作出任何政治决定，因为恩格斯总是能击中要害的。

馬克思在理論問題上也时常征詢恩格斯的意見，但是由于上述的同一个原因，恩格斯的意見却不像在政治方面那样有益。在理論方面，馬克思总是超过他的朋友。特别是当恩格斯坚持要馬克思赶快結束他的主要科学著作的时候，馬克思总是不肯听从。恩格斯曾劝告他說：“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馬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讀者來說，它已經是太好了。重要的是把这部东西写成并出版；你自己所看到的那些缺点，蠢材們是不会发现的。”^①这些话反映了恩格斯的真正性格，正如馬克思拒絕朋友的劝告反映了馬克思的真正性格一样。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恩格斯比馬克思更适于做政論工作。馬克思曾對他們的一个共同的朋友說：“他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百科全书。不分昼夜，不論饥飽，他都能写作，写得飞快，机灵得出奇。”显然，在1850年政天《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停刊后，他們打算在倫敦再开始合办一个事业。至少，馬克思在1853年12月曾写信給恩格斯說：“要是我們两个当时在倫敦办成了英国通訊社，那你就不会呆在曼彻斯特受那个营业所的折磨，而我也不会受債務的折磨了。”^②但是恩格斯却宁可留在父亲的公司里当一名職員，而沒有到倫敦去办通訊社，这是因为馬克思的經濟状况很困难，而且他自己也希望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他絕沒有打算永远干那“該死的商务”。还在1854年春天，恩格斯就考虑他是否要回到倫敦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36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89頁。

去从事写作。但这是最后的一次动摇了。从这时起，他就决定永远忍受他所憎恶的桎梏，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只是根据这一点恩格斯才作出自己的牺牲，而馬克思才接受他的牺牲。作出这样的牺牲和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

許多年以后，恩格斯才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在那以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经济状况也并不十分好。但是从他移居曼彻斯特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帮助馬克思，而以后也从来没有厌倦过。一英镑、五英镑、十英镑的汇票，后来甚至上百英镑的汇票源源不绝地寄往伦敦。恩格斯从来没有失去耐心，虽然他的耐心有时由于馬克思夫妇不善理财而受到并非必要的重大考验。馬克思有一次忘记了以他的名义开出的一张期票的金额，当临到付款期限时弄得手忙脚乱；恩格斯对此却连头都没有摇。又一次，当恩格斯不得不再度把他们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时，馬克思夫人出于一种错误的情面上的考虑，隐瞒了一大笔债务，希望从日常开销里节约出来逐渐还清。结果，尽管恩格斯作了一切努力，他们还是开始陷入旧有的困境。恩格斯任凭他的朋友去得到某种伪善的满足，去抱怨什么“显然经常需要加以监督”的“妇人的愚蠢”，而他自己却只是好脾气地告诫说：只要留心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就行了。

为了馬克思的缘故，恩格斯不但白天在营业所和交易所里服苦役，而且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晚间休息时间，直到深夜。起初，这样做是为了替馬克思修改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或把它们从德文译成英文，因为那时馬克思还不大精通英文，还不能熟练地用英文写作。但是后来，当这个最初的原因已经不存在的

时候，恩格斯仍旧继续他的这种默默无闻的合作。

但是这比起恩格斯所作的最大的牺牲来，还算不了什么。这个最大的牺牲就是，他放弃了他那无比巨大的才能和优异的天赋可能使他在学术上达到的建树。关于恩格斯在学术方面的爱好，也只能从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的通信中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在这些书信中，关于恩格斯在语言和军事科学方面的研究的材料是够多的。恩格斯之所以对这种研究特别感兴趣，一半是由于他的“老癖好”，一半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际需要。不管他怎样痛恨一切玩票式的治学态度，——他曾鄙视地说，“这纯粹是胡闹”，——不管他治学的方法是多么严谨，他仍然和马克思一样，
260 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对他来说，科学上每一种新的创造发明只要能够促进无产阶级摆脱枷锁，就都是加倍有价值的。

例如，他为了下面这样一个“理由”而开始研究斯拉夫各族语言，即为了即将来临的世界搏斗，“至少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应该懂得那些不久就要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語言、历史、文学和社会制度。东方局势的复杂化使他转而注意东方的語言。阿拉伯文的四千个字根吓退了他，但是他写道：“波斯語，这簡直是小孩子的游戏”，又说，他将在三星期内把它攻下来。然后他转到德国的各种語言方面。他写道：“我完全钻到烏尔菲拉里面了。真该学完这该死的哥特語，而我直到现在还只是顺便地学学。使我吃惊的是，我断定我知道的比我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如果我能再搞到一本参考书，我估计完全能在两星期内把它学会。然后我将转到古挪威語和盎格魯一撒克逊語上来，这两种語言我总算有过一点底子。到目前为止我是在沒有字典和任何其他参考书的情况下学习的；我手头只有一本哥特語課本和一部格林的著作，不过这老头真是

了不起。”^①当 60 年代发生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时，恩格斯研究了“弗利西亚—英格兰—日德兰—斯堪的那维亚語言学和考古学”。而当爱尔兰問題再度发生时，他“搞了一下凱尔特—爱尔兰語”等等。在国际总委员会中，他的广博的語言知識对他大有用处。真的，在总委员会中人們都說，“恩格斯能結結巴巴地用二十种語言講話”²⁶¹，因为他在激动的时候有点口吃。

由于恩格斯更热心地和深入地钻研过軍事科学，因此人們又給他起了个綽号叫“將軍”。在这方面，也是实际的革命政治需要引发了他的“老癖好”。恩格斯考虑到了“在不久以后的运动中軍人的重要性”。同那些在革命时期站在人民方面作战的軍官們合作共事的經驗并不十分成功。恩格斯說：“这班兵痞滿腦子都是莫名其妙的等級思想。他們彼此恨入骨髓，为了极激小的奖賞而像小学生那样互相妒嫉，但是在对待‘平民’的态度上却又完全一致。”恩格斯力图做到从理論上来討論軍事問題，以免當場受窘。

在曼彻斯特定居下来以后，恩格斯立刻就“苦攻軍事”。他首先研究那些最普通最平常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在准尉和尉官考試中必定被提出、因而在所有的軍事书中早就被认为是尽人皆知的 ²⁶¹ 事情的东西”^②。他研究了軍隊学說的所有技术細节，初步的战术，筑城学（从沃邦直到現代的堡垒体系），浮桥的架設和野战掩体的构筑，各种类型的軍械，直到野战炮架的各种組織体系，战地医院的伤员护理，以及其他許多事項。然后他轉而研究軍事通史，特别热中于研究英国的納皮尔、法国的若米尼和德国的克劳塞維茨。

恩格斯根本不想按照淺薄的自由主义精神来議論战争在道德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504 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5 卷，第 109 頁。


上的不合理性。相反地，他竭力闡釋戰爭的历史意义，而他的这种做法曾不止一次地使得舞文弄墨的民主派怒不可遏。拜倫曾向在滑铁卢之战中充当了封建欧洲的旗手而对法国革命的继承人給以致命打击的两位統帥²⁶²发泄过自己的满腔怒火。由于一个偶然的機會，恩格斯在写給馬克思的信中也对勃留赫尔和威灵頓作出了历史分析²⁶³。这个分析虽然非常簡略，但却是这样地明确而中肯，以致就是从現代的軍事科学的水准看来也是无須加以些微修改的。

恩格斯所爱好并下过許多功夫的第三个知識領域是自然科学。但是在数十年当中，为了給一个他认为比自己高明的人創造科学研究的条件而不得不干商业这份苦差事，所以，他在这个領域內也未能完成自己的研究。

因此，恩格斯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但是恩格斯从来不悲叹自己的命运；他和他的朋友一样，从来不是多愁善感的。他总是认为，能够同馬克思并肩战斗四十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尽管他朋友的更为高大的身影把他遮沒了。馬克思逝世后，在十年当中，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无可爭辯地成为这个运动的第一提琴手。就在这时，他也并没有一种迟来的滿足之感。相反地，他认为，人們所給予他的巨大荣誉，是他当之无愧的。

两个朋友整个地溶合在一个共同的事业里面了；每个人都毫无怨尤也毫不夸耀地对这个事业作出了不同然而相等的偉大牺牲。他們的友誼成为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联盟。





第九章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一) 欧洲政治

1853年年底，当马克思用反对维利希的小册子结束了他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玩弄革命的行为”的斗争的时候，随着克里木战争²⁶⁴开始了欧洲政治上的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的欧洲政治在随后的几年里受到马克思的很大注意。 262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主要发表在他给《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上。尽管这家报纸极力想把他贬低到普通的报纸通讯员的地位，然而马克思仍旧有充分的权利说：“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他才从事真正的报纸通讯工作”。他忠于自己的信念，把借以糊口的文笔生涯也变成了崇高的事业。由于他在写作论文时经过深入刻苦的研究，他就使这些论文具有了不朽的价值。

这些财富大部分还没有被人们发掘出来，而要使它们同世人见面，是要经过一定的努力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把马克思的论文可以说只是看成一种原料，随意把它们投进字纸篓，或是用自己的名义发表；而且正像马克思气愤地指出的，它常常只把一些“糟货”用他的名义发表出来。因此，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恢复马克思给美国报纸写的文章的本来面目了。而且，即使这一点能够做到，那也必

須加以細心的審查，以便精確地判斷哪些是真正出自他的手筆。

直到不久前恩格斯和馬克思的《通信集》出版的時候，才出現了進行這一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參考文獻。比如說，從《通信集》我們知道，過去一向被認為是馬克思的作品的、關於德國革命和反革命的一組文章，原來大部分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筆。此外我們還弄清楚，恩格斯不僅像人們早就知道的那樣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了有關軍事問題的論文，而且還在該報上發表了其他方面的許多論文。除去上面提到的那一組文章外，人們還從《紐約每日論壇報》匯集了他的有關東方問題的論文。但是這個論文集無論就它已收或未收的材料而論，都比前一本集子有更多可以爭論的地方，因為前一本集子只不過是真正作者的名字被弄錯罷了。

這種批判性的審查還不是這一工作的最困難的部分。儘管馬克思把日常為報紙撰稿的工作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他究竟不能把它提高到超過這一工作本身所能容許的高度。甚至最偉大的天才也不能為了趕上星期二和星期五的輪船，每星期兩次作出新的發現或是產生新的思想。在這樣的條件下，正像恩格斯有一次所說的，幾乎總不免會有“過分匆忙的情況——這時就只能憑記憶了”。此外，為報紙撰稿的工作總是受到當前的各種新聞以及這些新聞所引起的不斷變化的情緒的影響，而為了不致把文章寫得枯燥乏味是必須注意到這種情況的。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四大卷《通信集》中如果沒有那成百的矛盾，那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他們的思想和鬥爭的偉大原則正是通過這些矛盾才發展起來的！

從克里木戰爭開始以來，他們的歐洲政策的主導方針，即使沒有那些被埋藏在《紐約每日論壇報》里等待我們去把它復活的大量材料，在今天也是十分清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歐洲政策在某

种意义上可以称做一个转折。《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后来的《新莱茵报》一样，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德国上面。后来这个报纸又热情地保卫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独立，最后更要求对俄国这个欧洲反革命势力的强大后备军作战。继而马克思的报纸便日益激烈地宣传对英国发动世界战争，认为只有在这样一场战争的条件，社会革命才能从空想变成现实。

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马克思的欧洲政策的出发点就是沉重地压在整個欧洲身上的“英俄奴役”。他欢迎这一战争，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战争会限制沙皇俄国由于反革命的胜利而取得的优势。然而这决不表明，他同意西方列强对俄作战时所采用的方法。恩格斯的意见也是这样。恩格斯把克里木战争说成是一出独一无二的錯中錯大喜剧，在这出戏里，每一分钟人们都不能不自问：究竟这里誰是受騙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法国，特别是英国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尽管它吞噬了成百万的生命和亿万金钱。

无论是假波拿巴还是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都未打算给俄国巨人以致命的打击，就这一意义来说，这场战争确实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他们相信奥地利将会把俄军的主力牵制在西部国境，因此他们才把战争转到克里木去，但是在那里它们却碰上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经过了整整一年的围攻才攻占了这座要塞的一半。他们不得不满足于这些可怜的胜利，而最后，胜利者竟然向“战败的”俄国“恳求”，允许他们不受阻碍地把自己的军队撤回本国。

假波拿巴为什么不敢对沙皇展开生死斗争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帕麦斯顿为什么这样做却不大容易理解了；要知道，大陆上的各国政府都害怕他，把他看成是革命的“放火者”，而大陆上的自由派

却把他看成是宪政自由派大臣的典范。馬克思为了解答这个謎，曾細心地研究了本世紀前半叶的藍皮书²⁶⁵和議會报告，此外他还研究了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的許多外交报告。他以这些材料为依据证明，从彼得大帝的时期起到克里木战争时止，在倫敦的内閣和彼得堡的内閣之間一直暗中存在着行动上的一致，而帕麦斯顿是沙皇政策的一个被收买的工具。馬克思所得出的結論，特别是关于帕麦斯顿的結論，一直到今天还在爭論着。毫无疑问，馬克思远比大陆各国政府和自由派更能确切地理解帕麦斯顿的那种捐客式的寡廉鮮耻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性；然而从这一点却不能确定不移地得出結論說：帕麦斯顿曾被俄国所收买。不过远比馬克思在这件事上是否过甚其詞这一問題更加重要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从这时起他經常使用这样一个斗争方法：他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深入探索国际政策的秘密，并抵制各国政府的外交阴谋，而如果还不可能抵制的話，就揭露这些阴谋。

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对那个野蛮的强国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因为他看到，这个强国的头虽然在彼得堡，它的手却在欧洲一切国家的內閣里进行活动。他不仅认为沙皇政府是欧洲反动派的主要支柱，而且单单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經常的威胁和危险。他还把它看成是主要的敌人：这个敌人为了想弄到一些地盘来确保自己对欧洲的統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成为不可能，就用不干涉西欧事务的办法来阻挠和妨害西欧的任何正常发展。馬克思赋予这一观点的决定意义，从那时起对他的工人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之大远比在革命年代为甚。

馬克思的这一观点只不过是他在《新萊茵报》上已发表过的观点的继续。当时他曾对一些民族的解放斗争表示十分热烈的同情，

但是現在，無論在他还是在恩格斯看来，那些民族都已远远地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当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曾停止維護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从来不曾停止維護这些国家的权利，因为維護这一权利也是符合于德国和欧洲的利益。但是在1851年，恩格斯却相当冷淡地离开了他先前所喜爱的人們：“我要十分明确地告訴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所有現代的問題上，是用不着他們插嘴的。”^①几个月之后他对波兰人說，他們是个不中用的民族，在俄国自身还未被卷入革命的时候，他們只有做工具的資格。用他的話來說，波兰人在历史上除了瞎吵蛮干之外，沒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甚至和俄国比較起来，他們也沒有做过任何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而对东方來說，俄国倒是真正进步的。俄国的統治尽管非常卑鄙，尽管带有斯拉夫人的一切骯髒东西，但是它在黑海和里海，在中亚細亚，对巴什基里亚人和韃靼人來說，却是文明的代表者。波兰像贵族老爷一样生性懶惰，而俄国所吸取的启蒙因素，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因素則要比它多得多^②。当然，这些話为流亡者爭吵时的激情大大地渲染了。后来恩格斯在再度談到波兰人的时候，口气就比較温和了，而在晚年的时候，他承认波兰至少有两次拯救了欧洲的文明：1792—1793年的起义和1830—1831年的革命。

馬克思本人在著名的意大利革命英雄的紀念册里写道：“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貴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們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經常被弄得筋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談闊論来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64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238、239頁。

說，当然是卑下的了。但是毫無疑問，要向資產階級和貴族說明，使意大利獲得獨立的第一步就是使農民得到完全的解放，並把他們的對分租佃制變為自由的資產階級所有制，這是需要有很大勇氣的。”^①馬克思通過自己的朋友厄內斯特·瓊斯的一封信向在倫敦活動的、喜歡吹噓的科蘇特解釋說，歐洲的革命是勞動對資本的一次有力的進攻。不能把這些革命貶低到像馬扎爾人那樣一個愚昧和半野蠻民族的社会水平和精神水平，因為馬扎爾人雖然還生活在十六世紀的半文明狀態之下，却以為自己有權利給德國和法國的偉大啟蒙運動指點道路。他們只是騙取了輕信的英國人的尊敬。

但是在對德國的態度上面，馬克思離開了《新萊茵報》的傳統最遠。他不僅不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國上面，而且幾乎把它完全置於自己的政治視野之外。德國在當時的歐洲政治生活中確實只起着極其微弱的和不顯著的作用。它彷彿就是俄國的一個省。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馬克思何以對它抱有這樣的態度。然而對馬克思來說，在某種意義上是非常不利的一個事實却是：他也同恩格斯一樣，已經有好幾年同德國現實生活的發展失去了聯繫。作為出生在被兼併的萊茵省的人，他們兩個對於普魯士國家一向是抱著蔑視的態度的，而在曼托伊費爾—威斯特華倫當政時期，這種蔑視態度更加深到如此地步，以致同他們對現實形勢的洞察極不協調。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馬克思重視當時普魯士所發生的事件這一獨特的情況，是很值得注意的。這是1856年年底的事情，那時

^① 梅林在這裡弄錯了，馬克思是在1851年9月11日給魏德邁的信中講了這些話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頁。

普魯士同瑞士由于諾恩堡事件²⁶⁶而发生了冲突。从馬克思在1856年12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曾促使他去充实自己“在普魯士历史方面的极端贫乏的知識”^①。馬克思得出結論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卑鄙骯髒的历史。他在这封信里关于这件事情所說的以及几天之后在宪章派机关报《People's Paper》〔《人民报》〕上更詳尽地加以重述的事情,是远沒有达到他平日的历史观的高度的。恰恰相反,这倒很接近于迂腐地咒罵着的民主派的那种低的历史水平,而馬克思的功績正是在于克服了这种水平。

像普魯士国家这样的硬东西不消說是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难以下嚥的。然而单是嘲笑“霍亨索倫王朝的神权”,嘲笑三个不断輪流登場的“角色”,即虔誠主义者、士官和小丑,嘲笑普魯士的那个可以同奥地利历史的“魔鬼史詩”媲美的“骯髒的家譜”等等,也是不能把它咬碎的。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也只能說明最淺近的原因,但更深入的原因却仍旧完全沒有得到闡明。 267

(二) 大卫·烏尔卡尔特、哈尼和琼斯

与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文章的同时,馬克思还以同样的精神給烏尔卡尔特派和宪章派的出版物撰稿。

大卫·烏尔卡尔特是英国的外交家,他的巨大功績就在于他熟悉俄国統治世界的計劃,并且不断地为反对这些計劃而斗争。不过,他的这一功績却由于他对俄国人的切齿痛恨和对土耳其人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頁。

狂热贊揚而受到貶損。人們常常把馬克思說成是烏尔卡尔特的信徒，这是完全不公正的。无宁应当說，無論他还是恩格斯都曾更多地批判烏尔卡尔特的那种愚蠢的过火做法，而不大重視他的真正功績。1853年3月間恩格斯在第一次提到烏尔卡尔特时写道：“我家里現在就有烏尔卡尔特的书，这个发瘋的議員认为帕麦斯頓是被俄国收买的走狗。原因很簡單。这个人是个凯尔特系的苏格兰人，受过撒克逊苏格兰的教育。就气质而論，他是个浪漫主义者，就所受的教育而論，他是个自由貿易論者。他曾以希腊独立之友的身分到希腊去，而在同土耳其人打了三年仗之后又到土耳其去，成了这些土耳其人的崇拜者。他特别喜欢伊斯兰教，他的口号是：如果我不是加尔文教徒，那末我就只能是伊斯兰教徒了。”^①不消說，恩格斯认为烏尔卡尔特的书整个說来是十分可笑的。

馬克思和烏尔卡尔特之間的接触点是反对帕麦斯頓的斗争。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发表，然后在格拉斯哥的一家报纸上轉載的一篇反对帕麦斯頓的文章²⁶⁷曾引起烏尔卡尔特的注意。1854年2月，他就同馬克思見了面，并且恭維馬克思說，他的文章簡直像土耳其人写的一样。但是当馬克思回答說他是个“革命者”的时候，烏尔卡尔特感到十分失望，因为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即认为欧洲的革命者都是沙皇政府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工具，而沙皇政府就利用他們来給欧洲各国的政府制造麻煩。在这次談話之后，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里写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瘋子。”他还說，正像他也向烏尔卡尔特說过的，除去对帕麦斯頓的看法之外，他在任何一点上都是不同意他的²⁶⁸。但是馬克思強調指出，他不是因为受了烏尔卡尔特的影响才对帕麦斯頓有了这样的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15頁。

看法的。

但是，不应该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些私下的議論。尽管馬克思私下里对烏尔卡尔特有着批判性的保留意見，但他在公开的場合下却不止一次地承认烏尔卡尔特的功績，而且并不隱瞞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对帕麦斯顿的看法上，即使烏尔卡尔特沒有說服他，至少也对他有所启发。因此馬克思认为給烏尔卡尔特的杂志、倫敦的《Free Press》〔《自由新聞》〕写稿并沒有任何不光彩的地方，并且还允許他把自己在《紐約先驅論壇报》上发表的几篇論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加以傳布²⁶⁹。关于帕麦斯顿的这些小册子印行了一万五千到三万册，引起了人們的很大注意。但是在其他方面，馬克思同苏格兰人烏尔卡尔特之間，就像他同美国佬德納之間一样，是很少共同之处的。

馬克思和烏尔卡尔特之間的关系是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的，因为馬克思贊助宪章运动，而烏尔卡尔特作为自由貿易論者和反俄論者却双倍地憎恶宪章运动。在每次革命运动中他都好像听到卢布的声音。宪章运动已不再能从1848年4月10日遭到的慘敗中恢复过来^①。然而当它的殘余力量試图东山再起的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英勇地和热誠地支持了最后一批宪章派。他們不要報酬地在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在50年代出版的报纸上撰写文章。哈尼一个接着一个地接連出版了《Red Republican》〔《紅色共和主义者》〕、《Friend of the People》〔《人民之友》〕和《Democratic Review》〔《民主評論》〕，而琼斯則出版了《Notes to the People》〔《寄語人民》〕和《People's Paper》〔《人民报》〕。《人民

^① 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为了向議會递交要求普遍选举权的第三个請願书而在倫敦举行了示威，但这次示威被警察驅散了。

報》存在的時間比其他報紙都久，它一直到 1858 年才停刊。

哈尼和琼斯屬於憲章派的革命派，而且是所有的憲章主義者中最徹底地擺脫了一切島國狹隘性的人。在國際組織“民主派兄弟協會”中，他們被認為是領袖人物。哈尼是一個水手的兒子，他是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他通過自修的方式學習了法國的革命文獻，而他的理想人物就是馬拉。他比馬克思大一歲，當馬克思主編《萊茵報》的時候，就已經是憲章派的主要機關報《Northern Star》〔《北極星報》〕編輯部的成員。1843 年恩格斯到那裏訪問了他，這時恩格斯在他眼中是“一個身材頹長的青年人，看上去幾乎像個孩子，然而當時他的英語就已經講得極其流利了”²⁷⁰。1847 年哈尼結識了馬克思並且成了他的熱情的擁護者。

哈尼在他的《紅色共和主義者》上發表了《共產黨宣言》的譯文，並且加了按語，指出這是歷來世界上最革命的文件；而在《民主評論》中，他刊登了《新萊茵報》上有關法國革命的文章的譯文，認為這些文章是對於法國的事件的“真正的批評”。在流亡者間相互鬥爭時期，他又犯了他的“老毛病”，跟琼斯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不久，哈尼就移居到澤稷島去，後來又移居美國，而恩格斯在 1888 年還到那裏探望過他。在這之後哈尼又返回英國，活到很大的年紀才去世，成了偉大的時代的最后一個見證人。

厄內斯特·琼斯出身於一個古老的諾曼氏族²⁷¹，但是他出生和受教育的地點却是德國。他父親在德國是昆伯蘭公爵、即後來的漢諾威國王恩斯特·奧古斯特的侍從武官。英國報刊認為除去自殺之外什麼罪行都犯過的這個極端反動的放蕩傢伙，就是小厄內斯特的教父。但無論是這種教父的關係，還是琼斯一家同宮廷的

联系，对他本人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从儿时起就表现了对自由的不可遏制的渴望，而后来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抗拒了一切想用黄金锁链把他束缚住的企图。当琼斯一家返回英国时，他大约是二十岁；他开始在英国学习法律并且成了一名律师。他本人的非凡的才能和贵族家世本来可以使他有一个光辉的前程，但他却牺牲了这一切，把自己整个献给宪章运动的事业。琼斯是这样热情洋溢地为宪章运动的事业而奋斗，以致在1848年曾被判处两年的徒刑。作为背叛自己阶级的惩罚，他在狱中是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来对待的。1850年虽然获释，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从那时起，亦即从1850年夏天起，琼斯在大约二十年中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顺便提一下，就年龄而论，他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

当然，这种友谊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弗莱里格拉特（琼斯同他一样具有写诗的才能）以及拉萨尔之间的友谊一样是不可能没有一点争执的。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时，口气甚至要比谈到琼斯时尖锐得多，虽然精神相同。他在1865年谈到琼斯时写道：“尽管不能不承认琼斯有毅力，坚忍，有才干，然而由于他喜欢大吵大叫，不策略地追求各种鼓动的机会以及由于他那沉不住气的冒进倾向，他就把一切都毁了。”^①后来，当宪章运动一直在走下坡路而琼斯开始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接近的时候，他们之间有时也发生激烈的争吵。

然而，实质上他们始终是赤诚的、真正的朋友。琼斯在死前是曼彻斯特的律师，他是1869年正当年富力强的时斯突然死去的。恩格斯赶忙把这个消息用一封简短的信通知伦敦方面，这封信的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67年版，第2卷，第95页。

最后一句話是：“又一个老近卫軍！”馬克思復信說：“厄·琼斯去世的消息当然使我們全家深为震动，因为他是我們的少数老朋友中的一位啊。”^①后来恩格斯又在信中告訴他說，琼斯在許多送葬者的伴送之下，被安葬在他們的摯友之一威廉·沃尔弗安息的那个墓地里。恩格斯写道：“这个人的死真是可惜啊！要知道，他的資產階級的詞句只不过是一种伪装……在政治家当中，他实质上是完全站在我們一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②

(三) 家庭和朋友

在那些年里，馬克思不但远离一切政治上的联系，而且几乎是远离整个社会生活的。他完全埋头于研究工作，偶而放下书本也只是为了同家里人在一起聚聚。1856年1月他的女儿爱琳娜誕生，这样他家里的人口又增加了。

同恩格斯一样，馬克思也是非常爱孩子的。如果他把自己的孜孜不倦的工作中断个把钟头，那也只是为了同自己的孩子們玩一会儿。他們十分喜欢他，这可能正是因为他从不向他們摆父亲的架子的緣故。他們把他看成是同伴，叫他“摩尔”²⁷²，因为他的头发是黑的，面孔的顏色也是黝黑的。馬克思常說，“孩子們应当教育自己的双亲”。他的孩子首先就禁止他在星期日工作，因为他們认为在假日里，父亲只是屬於他們的。星期日的郊游，在簡陋的小酒館里的休息（他們常常到那里去喝生姜啤酒，吃夹干酪的面包），这就是从經常压在馬克思一家头上的密云中間射出的一点阳光。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74—175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177頁。

他們最喜欢的是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郊游——这个汉普斯泰特荒阜是倫敦北部的一个当时还一片荒凉的山阜，丛生着树木和 271 野生灌木。李卜克内西曾用非常动人的色彩描繪过这些次郊游²⁷³。汉普斯泰特荒阜目前已經不是六十年前的那个样子了。但是从馬克思常常凭桌而坐的那个古老的小酒店“杰克·斯特罗堡”还可以看到山谷的美妙景色，而每到星期日，当欢乐的人群蜂拥到那里去的时候，風景就更是生动如画。南面是巨大的城市，那里耸立着許多高大的建築物，而以圣保罗教堂的圓頂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尖塔为最高；在矚矚的远方，人們可以隱隱約約地看到瑟列伊山。北面是人烟稠密的、有着无数村落的肥沃的地带。在西面則是邻接的海格特山，也就是馬克思长眠的地方。

馬克思的本来不多的一点家庭幸福突然間由于一次极大的打击而变得黯淡了：在 1855 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五，他的唯一的儿子，九岁的埃德加尔（家里的人都叫他“穆希”）死了。这孩子已經显露了巨大的才能并且得到了全家的寵爱。弗莱里格拉特写信給家里說，“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損失，我的內心的悲伤是无法用言語形容的。”

从馬克思写給恩格斯的几封叙述自己儿子生病和死亡的信里，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极其悲痛的。在 3 月 30 日的信里他写道：“我的妻子由于精神上的空前震动而病倒快一个星期了。我自己也极为痛心，而且脑子里乱作一团，不过我是必須撑住的。孩子在整个生病期間一分钟也沒有失掉他所特有的那种溫和而又独立不倚的性格。”^①而在 4 月 6 日的信里他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經不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102 頁。

在人世了。他在今天五点到六点之間在我的怀抱里睡去了（确是如此）。我永远不会忘記，你的友誼怎样減輕了我們一家在这一可怕的时期的痛苦。孩子的死給了我多么大的痛苦，你是了解的。”^①繼而在4月12日他又写信說：“亲爱的孩子是使全家生趣盎然的灵魂。不消說，自他死后，家里变得一片凄凉冷落了。我无法形容我們是如何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孩子。我已經遭受过許多不幸，但只有現在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尽管在这些日子里我受到一切可怕痛苦，但是随时在支持着我的，是我对于你和你的友情的思念，以及我們两个人还可以在世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一种希望。”^②

过了很久，这一內心的創伤才开始愈合。为了回答拉薩尔写給他的慰問信，他在7月28日的回信中写道：“培根說，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有这样多的联系，有这样多的事物可以引起他們的兴趣，以致任何損失他們都会很容易經受得住。我并不是这样的杰出的人物。我的孩子的死使我的內心深处受到震动。他的死在我还像是当天的事情一样历历在目。我可怜的妻子也完全給悲痛压倒了。”^③而10月6日弗萊里格拉特也写信給馬克思說：“你不能忘却自己的損失，这使我感到十分忧虑。在这一点上我沒有任何办法帮助你，也沒有任何可以劝解的話。我理解并且尊重你的悲痛，但是請你努力克制这种悲痛，否則它是会把你压倒的。这种克制并不違背你对儿子的思念。”

在那些年里，馬克思一家人不断生病，小埃德加尔的死就是这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03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104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11頁。

一連串的不幸的頂点。春天，馬克思本人也病了，而从那时起他始終未能完全摆脱病魔的纏扰。肝病給他带来了特別多的痛苦，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这病是他从父亲那里傳来的。但馬克思一家人常常生病也是因为他们們住的那所住宅条件很差，又座落在一个不利于健康的市区。1854年夏天，那里霍乱病鬧得很凶，人們把这归因于开挖下水道，因为这些下水道通过了1665年黑死病牺牲者的埋葬地²⁷⁴。医生坚持要他們全家离开“索荷广场附近这个該死的地方”，那里的空气馬克思已接連不断地呼吸了好几年了。家中发生的又一件不幸的事情使他可能迁到另一个地方去。1856年夏天，馬克思夫人带着三个女儿回特利尔，再一次去探望自己年老的母亲。但是她到那里的时候，母亲正好在經過十一天的疾病之后閉上了她那双疲倦的眼睛。

母亲留下来的遗产是很有限的，然而分到馬克思夫人名下的仍然有几百塔勒，此外，她大概还从苏格兰的亲戚那里承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这使得馬克思一家能够在1856年秋天搬到离开他們所喜爱的汉普斯泰特荒阜不远的一所小房子（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頓巷9号）里去。这所小房子的租金是每年三十六英鎊。馬克思夫人写信給自己的一位女友說：“这里和我們先前往过的小破房子比起来，真像是公侯的府第，虽然房子里的一切陈設只花了四十英鎊多一点……但是最初一段时間我在我們舒适的客厅里总觉得自己真是一个贵人。所有窗帘台布之类的东西和先前剩下来点纏排場的那些东西都被我們从当鋪里贖了出来，而我又能滿意地使用那些还是苏格兰旧制的織花麻布餐巾了。但是好景不常，这些东西很快又得一件件地送进‘pop-house’（“当 273 鋪”）（孩子就是这样称呼那門前挂着三个球儿的神秘的房子

的²⁷⁵)；不过当时的舒适生活总还使我们快活了一阵子。”^①但这一喘息的时期是非常短促的。

死神也没有放过马克思的朋友们。1855年秋天丹尼尔斯死了，1856年1月维尔特死在海地，1858年年初康拉德·施拉姆死在澤稷島。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争取报刊为他们登载哪怕是短短的几行訃聞，但是沒有成功。他们两人常常叹息說，老近卫軍凋謝了，新生力量却还没有接上来。不管他们在开头时是怎样喜欢他们的“社会孤立”，不管这两个孤零零的人对胜利的信心是何等坚定（他们就怀着这样的信心参加了欧洲的政治生活，仿佛他们本身就是欧洲列强之一似的），他们的政治热情仍然使他们不能在长时期中間不感到需要一个政党，因为，正像马克思本人有一次說过的，他们的少数拥护者还不能說是一个政党。而且，在这些拥护者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成熟到同他们处于相同的思想水平，例外的只有一个人，可是他们对这个人又始終不能完全信任²⁷⁶。

当马克思住在倫敦第恩街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每天都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李卜克内西当时住在一間頂楼上，过着极其困苦的日子。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的老同志，如列斯納、細木工罗赫納、埃卡留斯和“懺悔的罪人”沙佩尔，也是这样。另一些人則散居在其他城市：德朗克先在利物浦，后来又在格拉斯哥經商；伊曼特在丹第教书；席利在巴黎做律师，在那里，詩人海涅晚年的秘书萊因哈特也是跟马克思关系密切的忠实友人之一。

然而，就是他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也漸漸地脫离了政治斗争。威廉·沃尔弗在曼彻斯特靠着私人授課維持着总算不錯的生活²⁷⁷，

① 參閱《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7頁。

但他依旧是过去的老样子，就像馬克思夫人有一次在談到他时所写的，这个人具有“最誠实、果敢的平民本色”。不过他的那种单身汉的怪脾气近年来也多了起来，而他的“主要斗争”就是为了茶、糖和煤同包伙食的房东太太争吵。在思想方面，他对于自己的那些流亡中的老朋友已經沒有很大帮助了。弗莱里格拉特却同先前一样，仍是一位忠实的朋友。1856年夏天，他担任瑞士一家銀行的駐倫敦代理人的职务，而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条件从財政上帮助馬克思。他用現金把《紐約每日論壇报》的稿酬預付給馬克思，原来这家报纸除了其他一切刻薄做法之外，稿费也是要拖到很晚才寄来的。弗莱里格拉特的革命信念依旧是毫不动摇的，然而他离开党派斗争却越来越远了。尽管他抱着真誠的 274 信念說，只有流亡之地才是革命者的最适宜的葬身之地，然而他毕竟还是位德国詩人，流亡生活对他來說是沉重的。他看到他的爱妻是如何地想念祖国，而他自己在給孩子們点起聖誕树上的蜡燭时因为身在異国而不胜感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詩的灵感的泉源日益枯竭了。他为此深感痛苦，因而当祖国开始重新記起自己的著名詩人的时候，他是十分振奋的。

除去这些已經死別的朋友之外，还有长长的一大串“虽生犹死的人”！馬克思在倫敦遇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研究哲学时的几个朋友：爱德华·梅因还是同先前一样尖酸刻薄；孚赫现在是科布頓的秘书，他硬說因为自己拥护自由貿易而在“創造着历史”；埃德加尔·鮑威尔相反地扮演了共产主义鼓动者的角色，然而馬克思始終把他叫做“小丑”。布魯諾·鮑威尔也来到倫敦看望自己的兄弟。他在那里呆了相当长的一个时候，而馬克思也几次会晤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是布魯諾·鮑威尔十分欣賞俄国的原始力

量，却把无产階級只看成是“群氓”。他說，要統治他們，就必須使用暴力和詭計，万不得已的时候，多給工人几文錢也总可以使他們感到滿足了。他既然抱着这样的观点，当然就根本談不上同馬克思有任何相互了解了。馬克思发现他特別显老（他已經有些謝頂并且学会了教授的一套寒酸作風）。不过馬克思还是写信給恩格斯，詳細报告了他同这位“有趣的老先生”的談話²⁷⁸。

但是，就是在馬克思不久前的同志当中，“虽生犹死的人”也是很多的，而且他們的数目还在逐年增加。萊茵时期的老朋友如格奥尔格·萊克、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海尔曼·貝克尔等人都脱离了政治生活。他們中間有一些人如貝克尔和純朴的米凱尔还想为自己脱离政治生活提出“科学的”論证。他們证明，首先应该让資產階級彻底打垮容克地主，然后才談得上无产階級的胜利。貝克尔教訓說：“先让卑鄙的物质利益这个蛀虫越来越深地蛀蝕容克地主的业已腐朽的根基吧；它是会化为灰烬的。当宇宙精神吹第一口气的时候，历史就要穿越它的全部外壳，极其简单地轉到日程上来。”多么漂亮的理論啊！这个理論就是在今天也对某些狡猾的家伙具有吸引力。但是当貝克尔成了科倫的市长，而米凱尔成了普魯士的財政大臣的时候，两个人就都醉心于“卑鄙的物质利益”，竟致十分頑固地反对“宇宙精神吹的第一口气”和它的“极其简单的日程”了。

一个杜塞尔多夫的商人古斯塔夫·列維成了貝克尔和米凱尔这类人物的相当可疑的代替者。1856年春天他到馬克思这里来，建議要把伊塞隆、佐林根等地的工厂起义作为一份礼物奉献給馬克思。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危險、无益而又愚蠢的想法。他通过列維轉告列維自称代表的那些工人，要他們过些时候再派一位代

表到倫敦來，而且不預先征得他的同意不要有所行動。

但是，馬克思對列維的另一個任務——據說也是受杜塞爾多夫工人委託的——却不曾採取這樣否定的態度。據列維說，工人提醒馬克思要提防拉薩爾，說拉薩爾是個不可靠的人，而自從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勝訴之後，他就可耻地聽憑她擺布，靠她養活，並且想同她一起到柏林去，給她羅致一批文人墨客。他好像拋棄一件不再使用的工具似地拋棄了工人，並且投靠了資產階級，等等。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懷疑萊茵地區的工人會把這樣的託托人告訴給馬克思，因為正是這些工人幾年之後在隆重的致詞和熱情的歡迎詞中證明，杜塞爾多夫地方的拉薩爾住宅在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曾是“可以從那里得到黨的最無畏和最堅決的幫助的可靠庇護所”。十分可能，上面的話都是列維自己捏造出來的，因為他曾向拉薩爾借兩千塔勒，而拉薩爾只同意借給他五百塔勒，故而他就特別痛恨拉薩爾。

如果馬克思知道這種情況，他對待列維的話和列維本人當然就會十分小心了。不過就是列維所傳達的話本身，也應該引起很大的懷疑。馬克思同拉薩爾的通信雖然不是頻繁的，然而總還是經常的。他把拉薩爾看成是一個在政治上以及在私人關係上都可靠的朋友和黨內同志。在共產主義者同盟時期，馬克思甚至親自出面反對當時萊茵地區的工人因為拉薩爾牽連到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案件中去而對他確實抱有的不信任態度。就在一年之前，馬克思在接到拉薩爾從巴黎寄來的信之後，還曾十分懇切地給他回信說：“當然，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你雖然離倫敦這樣近，却想不到這邊來幾天，看看大家。我希望你再好好考慮考慮，從巴黎到倫敦是何等近便，而且是用不了多少路費的。如果法國不是把大門

对我关得紧紧的，我是会出其不意地到巴黎去看你的。”^①

276 因此很难理解，馬克思在 1856 年 8 月 5 日写信把列維的廢話告訴恩格斯时，为什么又附带說：“这一切只是我記得的并簡短地提一提的細节。不过，这一切加在一起，对我和弗萊里格拉特都产生了一种非常确定的印象，尽管我跟拉薩尔的关系很好并且完全不相信工人們的流言蜚語。”^② 馬克思对恩格斯說，他曾告訴列維，不能单听一面之詞就作出任何决定，不过無論如何，抱着怀疑态度总是有益的。人們可以注意拉薩尔的行动，不过暂时應該絕對避免把事情声張出去。恩格斯同意这样做，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他这方面來說，这些看法没有什么值得惊異的，因为他不像馬克思那样深知拉薩尔。恩格斯在信里說，这样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真可惜。不过这些事情太可怕了。拉薩尔是一个永远必須严加提防的人物；作为一个从斯拉夫边界来的道地的犹太人，他总是准备以党的名义利用一切机会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务的²⁷⁹。

馬克思同这个人断絕了书信往来，而正是这个人在几年之后有充分的权利写信給他說：“我是你在德国的唯一的朋友。”

(四) 1857 年的危机²⁸⁰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0 年秋天退出了党的公开斗爭之后曾声明說：“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③ 从这个时候起，他們便一年比一年更加焦躁不安地注視着新的危机的征兆。李卜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5 卷，第 211 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143 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7 卷，第 514 頁。

克内西說，馬克思有时喜欢在这个題目上作些預言，可是后来当他的預言不曾实现的时候，朋友們就开他的玩笑。但是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馬克思就通过恩格斯告訴威廉·沃尔弗說，他要证明，按照正常的情况，这一危机是应当在早两年的时候就爆发的。

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馬克思已經敏銳地感觉到这一危机的前兆，《紐約每日論壇报》的稿酬降低了一半。这一打击所以特別沉重，是因为在馬克思的新居中又出現了过去的貧困，甚至是比先前更难以忍受的貧困。即使像在第恩街居住时的那种聊以糊口的日子，在新居也已經不可能了。看不到任何前途，而家庭用費又日益增加。1857年1月20日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說：“完全不知道应当怎么办，老实讲，我的境况比五年前还要沒有办法。”^①这个消息对恩格斯來說，簡直是一个“晴天霹靂”，于是他赶忙設法帮助自己的朋友，只是責怪馬克思沒有在两个星期前就把自己的困难告訴給他。他剛好用父亲作为圣誕节的礼物給他的一笔錢买了一匹馬。他写信告訴馬克思說：“我感到十分痛苦的是，你和你的一家在倫敦受穷，而我却在这里养着一匹馬。”^②因此，当几个月之后德納建議馬克思参加編写他所出版的一部百科辞典、特别是有关軍事問題方面的条目的时候，恩格斯感到十分高兴。他写信說，这件事来得“十分湊巧”并且“使他感到极大的喜悅”，因为这可以帮助馬克思摆脱永无止境的經濟困难。只要馬克思尽量多承担一些条目，然后他就可以慢慢地組織一个完整的办事处了²⁸¹。

然而这一切並沒有得到任何結果，首先是因为人手不足。而且，工作条件也不像恩格斯想像的那樣好。稿費最后每行还不到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94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197頁。

一便士。尽管許多条目所要求的不过是拼拼凑凑的东西，然而恩格斯的认真的性格却不允許他粗制濫造。在《通信集》中談到这一辞典工作的那些話，完全不能說明恩格斯后来对于部分由他执笔而部分由馬克思执笔的那些条目的那种輕蔑的論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完全是为了賺錢的生意經，只此而已；人們可以心安理得地忘掉它們”。这件大体上說来是附带性的工作漸漸地自消自灭了，而看来恩格斯和馬克思按部就班地为德納的百科辞典撰写条目的工作，並沒有超过第三个拉丁字母C字。

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情况大大地妨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这就是恩格斯在1851年夏天患了腺病，不得不到海濱去休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馬克思的健康状况也很坏。他的肝病突然复发，而且十分严重，只有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应付最必需的一些工作。7月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死嬰。这是在他们处境悲慘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它使馬克思深为震动，以致每当想起当时的情况便感到痛苦。惊慌的恩格斯回信說：“你既然这样写，那你想必是十分痛苦的。”^①但是馬克思說，他不能在信里談这样的事情，一切要等到見面时再來說明。

278 但是，当危机在秋天来到英国，继而又轉到大陆的时候，一切个人的不幸遭遇就都被忘記了。11月13日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說：“尽管目前我很貧困，然而从1849年以来，我还从来不曾像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高兴。”^②然而恩格斯所关心的却只是危机不要一下子发展得过分迅速。他写道：“但願在第二次决定性的主要打击到来之前，这种‘好轉’先轉化为慢性的危机。为了激起人民群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237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283頁。

众的热情，在一个时期中间，这种慢性的压力是必要的。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更加心中有数和更加协调一致地更好地进行战斗。这正和骑兵的进攻一样，在达到可以向敌人奔袭的距离之前，如果先跑五百步的小快步，就会更加容易成功。我不希望在危机席卷整个欧洲之前，过早地发生什么事情，否则斗争就会更加困难，更加令人厌烦并且更加起伏不定。5月和6月看来还是为时过早。由于长时期的繁荣，群众必然会变得极其萎靡不振……

我的情况也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破产之风开始以来，我在泽稷岛也不能安静下来，而在这全面崩溃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最近七年中间，我毕竟也沾上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泥污。现在这种泥污被冲洗掉了，而我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于我的身体来说，危机的益处就如同海水浴一样，就是现在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在1848年时说过，我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已经到来了；但这一次它才最后到来，现在事情已发展到生死关头的地步了。”^①

然而，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生死关头的地步。危机有它的革命后果，但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种革命后果。不过他们并未沉醉在那些毫无根据的空想的希望之中，而是每天极其用心地注视着危机的发展。马克思在12月18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目前我的工作极为繁忙，大都要工作到早上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

(1)制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事物的基础本身对于公众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而对我本人来说则是为了最后摆脱这个梦魔）。

(2)当前的危机。除去给《论坛报》写文章外，关于这个危机，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287—288页。

我只做記錄的工作，但這却費去我許多時間。我打算到春天我們
279 共同就這次危機寫一個小冊子，以便再一次提醒德國公眾不要忘掉我們，知道我們依然健在。”^①但是這個小冊子沒有任何下文，因為危機並沒有激起群眾的起義；而正是由於這一點，馬克思才有餘暇完成他的計劃中的理論部分。

在馬克思寫這封信前十天，他的妻子曾寫信給在澤稷島那里命在垂危的康拉德·施拉姆說：“我們感到了美國的危機對我們的收入的影响，因為目前卡爾每周只給《論壇》寫一篇通訊，而不是兩篇通訊了。《論壇》除了巴亞德·泰勒和卡爾之外，已經辭退了它的所有的歐洲通訊員。您可以想像得到，儘管這樣，卡爾仍然是心滿意足的。他已經完全恢復了他先前的工作能力，精神奮發而開朗，要知道，自從我們失去了愛子，——這事永遠使我感到傷心，——極大的痛苦就一直壓得他意志消沉。卡爾整天都在為我們一家人的麵包而工作，夜里則用來結束他的《經濟學》。目前既然他的這部著作是適應迫切需要的，我想總能給它找到一個倒楣的出版家吧。”由於拉薩爾的努力，出版家真地給找到了。

1857年4月拉薩爾用和先前一樣友好的口氣寫信給馬克思，對馬克思這樣久不寫信給他表示詫異，說他一點也猜不出原因在哪裡。恩格斯勸馬克思答复拉薩爾的信，但是馬克思沒有答复。同年12月，由於一件偶然的事情拉薩爾又寫信來：拉薩爾的表兄弟麥克斯·弗里德蘭德請他約馬克思為《Presse》〔《新聞報》〕撰稿。弗里德蘭德是這家報紙的編輯之一。馬克思回絕了弗里德蘭德向他約稿的事，他說儘管他的情緒是“反法的”，然而同樣也是“反英的”，而且他是最不願意為帕麥斯頓捧場的。拉薩爾抱怨說，儘管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305頁。

他从来不感情用事，然而他的4月的信得不到只字的回答，这仍然是使他感到难过的。对于这种抱怨，马克思在回信中只是“简短而冷淡地”写道，他不回信是由于一些不便在信中加以说明的原因。此外他一共只谈了几句关于自己的事情，其中说到他打算发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著作²⁸²。

1858年1月，拉萨尔的一册《赫拉克利特》^①寄到了伦敦。在12月写的一封信里作者就提到了寄书的事情，并且说柏林的学术界对《赫拉克利特》一书表示热烈的欢迎。然而单是为这个邮包就付了两个先令的邮费这一点，“就保证了这部书不会受欢迎”²⁸³。就是对于《赫拉克利特》一书的内容，马克思也是抱着相当否定的态度的。“炫耀”博学这一点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说，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并且能够从波恩大学图书馆把书借回家，旁征博引是轻而易举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拉萨尔在哲学上的这种炫耀博学的做法，就像生平第一次穿上漂亮衣服的小伙子的忸怩作态一样。对于拉萨尔的真正博学的这种评论是不公平的，然而完全是能够理解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书抱有反感的理由，正是在马克思看来这部书所以受到教授们欢迎的那同一个理由：使马克思感到讨厌的是，一个享有伟大革命家声誉的青年人竟然会这样老气横秋。大家知道，该书的大部分都是在它问世之前十年就写好了的。

拉萨尔从马克思对自己的抱怨所做的“简短而冷淡的”答复仍然猜不到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必须当面说明的话，他的理解是马克思想告诉他什么机密的事情。看来拉

^① 这里指拉萨尔的著作《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eln von Ephesos》（《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²⁸⁴，该书出版于1858年。

薩尔的这种理解完全是老实的，而不像馬克思所怀疑的那样是装糊涂的。他在1858年2月作了十分简短的回答，对于柏林资产阶级因普鲁士王储同英国公主联姻²⁸⁵而感到的那种得意忘形的陶醉作了辛辣的描述，此外他还建议为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找一个出版人。馬克思接受了他的建议，而在8月底拉萨尔已经替馬克思同他自己的出版人弗兰茨·敦克尔签订了一项合同，而且合同的条件比作者自己所期望的更加优厚。馬克思本人表示愿意把他的著作分册出版，并且准备放棄开头几个分册应得的任何稿酬。拉萨尔则从一开始就保证每一印张付给他三个金币的稿酬，而当时教授们一般每一印张只有两个金币的稿酬。出版人只声明有从第三分册起停止出版的权利，如果书的出版不敷成本开支的话。

但是，在九个月之后，馬克思才准备好了第一分册的付印手稿。肝病的复发和家务的操劳使馬克思无法完成工作。在馬克思的家里，1858年的圣诞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凄惨和没有希望”。1859年1月21日，“命运多乖的手稿”总算完成了，但是家里“没有一文钱”可以把它挂号寄给出版人。“恐怕没有什么人曾在这样缺钱的情况下写作关于‘金钱’的著作了！在这个问题上写作过的大部分作者，同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关系都是极好的。”^①这就是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送来邮寄手稿所必需的邮资时所说的话。

(五)《政治经济学批判》

馬克思想写一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

^① 参阅《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419页。

方式的底蘊的計劃，在他着手实际实现这一計劃前十五年便已产生了。早在三月革命前的日子里他就已考虑这个計劃，而反駁蕭魯东的小册子²⁸⁶就是馬克思的这一宿願的第一次实现。在参加了革命年代的斗争之后，馬克思立刻重新回到他所考虑过的工作上来。1851年4月2日他写信給恩格斯說，“我的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的进展，大約在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結束有关經濟学的整个烂摊子。在这之后，我将在家里探索經濟学，而到博物館去研究其他学科。这已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老实說，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时期以来，这門学問就沒有任何进步，尽管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个别的、往往是极其精細的研究的成果。”^①恩格斯得到馬克思的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我很高兴，你終于完成了經濟学的研究工作。这件事确实是拖得太久了……”。然而，作为一个有經驗的人，他又說：“只要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你还没有念，你就不会动笔的。”^②然而，恩格斯认为，尽管存在着其他一切障碍，但“主要的障碍”仍然是他的朋友的“那种过分慎重的态度”。

当然，这种过分慎重的态度并不是肤淺的，这一点恩格斯也是清楚的。究竟是什么使馬克思在1851年仍未完成自己的著作，而是再一次从头开始写作呢？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第一分册序言中列举了如下的一些拖延的理由，說这是“由于大英博物館收藏了政治經濟学史方面的大量資料，由于倫敦是便于研究资产階級社会的观测所，最后，由于资产階級社会仿佛已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③。他述

① 参阅《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209頁。

② 参阅同上书，第213頁。

③ 参阅《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42頁。

282 說，他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所做的將近八年的工作，使得他的科學研究工作變得極其零散。然而人們可以反駁說，給報紙撰寫通訊的工作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馬克思重新回到政治鬥爭上來，而政治鬥爭對於馬克思來說，永遠是頭等重要的事情。要知道，正是對革命工人運動復興的預見才促使馬克思坐下來從事自己的著述，以便把他這些年中間一直在思考的東西最後寫在紙上。

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就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在這些通信里，他們兩個人經常討論經濟問題，有時篇幅之大幾乎等於一篇“精細入微”的論文。我們從這些書信的某些地方還可以看到，在這兩個朋友之間是如何交換意見的。例如，恩格斯在一封信里就談到自己“在理論方面一貫的懶惰”^①。這種懶惰使他只滿足於他的更好的“自我”所提出的內心抗議，而沒有深入事物的本質。馬克思在另一個地方嘆息說：“如果人們知道我在這一切方面知道得多少就好了”，因為他說，一個工廠主曾用這樣一個有趣的推測恭維他，說他先前必定也是一個工廠主。

如果拋開這兩種情況下的談話的誇張說法（而且也應當這樣做），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一件事實，即恩格斯更熟悉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結構，而馬克思則能以非常敏銳有力的眼光洞察支配着它的運動的規律的本質。當他向他的朋友敘述第一分冊的寫作計劃的時候，恩格斯回答他說：“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提綱，可是要想敘述得簡單扼要，不這樣也是沒有別的法子的，我往往不得不十分吃力地去尋求辯證的轉變，因為對於任何抽象思維我都很不習慣了。”^②但是另一方面，馬克思對於恩格斯為他提供的知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156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368頁。

識，諸如工厂主和商人計算自己消費的那部分利潤的方法，关于机器的磨損，或关于預付流动資本的周轉的計算方法等等，則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不容易弄清楚。他抱怨說，在政治經濟学中，实践上重要的东西同理論上必要的东西常常是有很大距离的。

直到 1857—1858 年間，馬克思才着手对自己的著作进行最后的加工，这一点从写作过程中全书計劃的改变也可得到证明。还在 1858 年 4 月，他便打算在第一分册里論述“一般資本”；然而，尽管这一分册比原来預定的篇幅增加到两倍或三倍，但它仍然根本沒有提到資本，而只有談到商品和货币的两章。馬克思认为这样做有如下的一个优点，即在这样分配材料的情况下，批評者将不能只限于責罵作者具有傾向性。他只是沒有看到一点，这反而使批評者越发觉得有必要采取另一种办法，这就是使用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对这部著作保持沉默。

在序言中，馬克思概述了自己在学术方面的发展，因此我們不能不把那些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的名言在这里加以引用，“我的研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① 得出这样一个結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們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謂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紀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同他們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

^① 括弧里面的話，是梅林加的。

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賴以树立起来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現實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約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們向来在其中活动的現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語）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經濟基础的变更，全部龐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

284 变革时，必須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經濟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們借以意識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簡言之，意識形态的形式。我們判断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地，我們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識必須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間的現存冲突去解釋。無論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产力發揮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現的。所以人类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大体說来，亞細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經濟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資產階級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說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

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个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就在马克思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部著作里，马克思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超越了特别是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创立的那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就是用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认为价值的创造乃是通过单个人的具体劳动表现出来的人类劳动的自然特征，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陷入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相反地，马克思却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并不是永恒的自然的形式，而只是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的形式，在它之前还有其他许多的形式。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马克思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作了彻底的考察。他研究什么样的劳动、为什么并且以怎样的方式创造了价值，为什么价值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凝固的劳动。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而达到了一个“决定点”（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就是环绕着这个决定点进行的），即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二重性。个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无差别的社会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由于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所以它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固有的。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合理活动，劳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跟社会形态无关的、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劳动以自然物为前提，因而劳动就不是它的创造物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8—9页。

然物之間的比例不管怎樣不同，使用價值總是包含着自然基質的。

交換價值的情況就不同了。交換價值並不包含任何自然物；勞動是它的唯一的泉源，因而勞動是由交換價值所構成的財富的泉源。作為交換價值，只要比例適當，一個使用價值就可以和另一個使用價值同值。“一座宮殿的交換價值可以用一定數量的鞋油來表示。反過來，倫敦的鞋油廠主們曾用幾座宮殿來表示他們的大批鞋油的交換價值。”^① 在交換時，不管商品的物質存在的形式如何，不管它們製造出來所要滿足的需要怎樣，也不管它們的樣式何等形形色色，它們都是同一個統一物；它們是同樣的、無差別的勞動的結果，“對這種勞動來說，不論它出現在金、鐵、小麥或綢緞中都是沒有差別的，正如對氧氣來說，不論它存在於鐵銹、
286 大氣、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沒有差別一樣”^②。使用價值的差別是從生產這些使用價值的勞動的差別產生出來的；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同使用價值的物質特性無關，因此也同勞動本身的形式特點無關。這是相同的、無差別的、抽象一般的勞動，這種勞動不是按照種類，而只是按照數量，按照它物化在不同大小的交換價值中的不同的量而有所區別。衡量抽象一般的勞動的不同量的唯一尺度就是自然時間，如小時、日、周等等。勞動時間是勞動的活的存在，是不以勞動的形式、內容和個性為轉移的。作為交換價值，一切商品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物化在使用價值中的勞動時間同時又是把使用價值變為交換價值，因而也就是變為商品的實體；同樣地，它還決定商品的一定價值量。

勞動的二重性是商品生產所固有的社會勞動形式。在一切文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卷，第16—17頁。

② 同上書，第17頁。

明民族的历史以之为起点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下，个人劳动直接是社会机体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中，构成社会联系的是私人劳动，而不是一般劳动。在农村宗法式家庭中，当妇女纺纱男子织布是为了满足家庭本身的需要时，纱线和麻布是社会产品，而纺和织则是家庭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家庭联系以及它的自然分工给劳动产品打上了特殊的印记：纱线和麻布不是作为同一个一般劳动时间的具有同等意义和同等价值的表现而相互交换的。只有在商品生产中，只是由于私人劳动采取了自己的直接对立物的形式，即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形式，私人劳动才变成社会劳动。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的统一，而且它只有对其他商品来说才是商品。交换过程是商品相互间的真正关系的表现。在这一由各自独立的个别人参加的过程中，每一商品应该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既是用来满足私人需要的私人劳动，又是可以换成同样数量的、同样的一般劳动的一般劳动。商品的交换过程应该展开和解决这样一个矛盾：物化在某一个别商品中的个人劳动直接具有一般性这种性质。 287

作为交换价值，任何个别商品都成为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反过来，所有其他商品用来衡量自己的价值的任何个别商品则成为交换价值的化身。因此，交换价值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独特的商品，这种商品在把所有其他商品转化为自己本身时，也就直接物化了体现在货币中的一般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作为商品本身所包含的那个矛盾亦即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成为一般的等价物，从而成为每个人的使用价值、即一般使用价值这一矛盾，便在一种商品身上得到了解决。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作为特殊商品的那些商品的交换价值结晶在货币中。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不同种类的劳动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被等同起来，从而实际上转化为商品。货币结晶是通过历史途径而自发地产生的。直接的物物交换、交换过程的自然形式，与其说表现出商品转化为货币，无宁说表现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越是发展，使用价值越是变成商品，从而交换价值越是具有自由的形式并不再同使用价值直接联系在一起，事情也就越是要向产生货币的方向发展。起初，起货币作用的是一种或几种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如牲畜、谷物、奴隶。曾有各种各样的不大适宜的商品依次执行过货币的职能。如果说，这种职能最后转到贵金属身上，那末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贵金属具有一切商品的货币存在应该结晶在其中的那种特殊商品所必须具备的物理属性。就这些属性直接来自交换价值的本性而言，这些属性就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具有持久性，可以任意分割，这种商品的各部分是同质的并且每一件都是相同的。

288 在各种贵金属当中，黄金成为独特的货币商品。它成为价值的尺度和价格的标准，成为商品流通的手段。通过商品之转化(Salto mortale)为黄金，积累在商品之中的特殊劳动就成了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如果做不到这种转化，则劳动不仅不能作为商品而存在，而且不能作为产品而存在，因为它之所以是商品，只是由于它对于自己的所有者来说不是任何使用价值。

因此，马克思证明，商品和商品交换如何并且为什么由于商品所固有的价值特性而必然会产生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对立。他发现，货币看来虽是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实际上却表现着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现代经济学家所以不能清楚地阐明货币的本

性，是因为他们愚蠢地把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东西当成物。另一方面，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像同他们开玩笑似地在他们面前出现为物。

这一批判性的研究所发射出来的灿烂的光辉在开头时与其说使所有的人，甚至作者的朋友顿开茅塞，无宁说使他们感到迷惑了。李卜克内西说，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像这部著作那样使他感到失望。米凯尔则认为这部著作“很少真正新的东西”。拉萨尔对于论述方面的艺术性作了十分得体的称赞，他毫无嫉妒之意地认为马克思的论述从形式上说胜过自己的《赫拉克利特》。如果说这些“空话”曾使马克思怀疑拉萨尔不理解“很多经济方面的东西”，那末这一次他并没有弄错。拉萨尔不久就表明，他所不理解的正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面的劳动之间的区别这样一个“出发点”。

如果嫩枝的反应是这样的，那末从枯枝又能期待什么呢？尽管1885年时恩格斯便肯定说，马克思创造了第一个详尽的货币理论并且已经为一切人所承认，然而七年之后，在《社会科学辞典》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模范著作里，有关货币的那一条目，在它那五十栏莫名其妙的老生常谈里，对马克思甚至一字未提，却硬说什么货币的谜还没有解决。

对于把货币当做上帝来崇拜的世界来说，货币怎么能不是一件神秘莫测的东西呢？





第十章 王朝的兴替

(一)意大利战争²⁸⁷

289 1857年的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演变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一危机依然产生了革命的后果，不过这些后果只是表现为王朝的兴替而已。意大利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相继形成，法兰西帝国却从世界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些变革的发生是由于双重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战斗中从来未曾亲自出马作过战，另一个原因是自从1848年革命以来，即使有无产阶级的帮助，他们也没有兴趣再进行斗争了。在这一革命中，而且正是在巴黎的六月战斗中，工人拒绝像过去那样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给他们做炮灰，而是要求至少分享一部分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骸骨所争得的胜利果实。

因此，资产阶级还在革命的年代里，就已经狡猾地想不再依靠已经变得多疑而不可靠的无产阶级的帮助，而是想借助于另一种力量，来为自己火中取栗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两个地方，首先需要的还是建立民族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国的统治权交给某一个王公，而作为交换条件，这个王公应当保证给予资产阶级以自由活动的场所，以满足他们的剥削和掠夺的欲望。当

然,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抛掉自己的那些政治理想,而安于仅仅用赤裸裸的利润来满足自己,因为他们要想取得统治者的帮助,就得服从他们的统治。

因此还在革命的年代里,资产阶级就已经设法向一些最反动的小国讨好了。在意大利,萨丁王国²⁸⁸ 就是这样的国家;在这个²⁹⁰ “军事的耶稣会的”小国里,正像一位德意志诗人所诅咒的那样,“士兵和神甫们吸干了人民的骨髓”。在德意志,资产阶级则向处于易北河东岸容克地主的残暴压迫下的普鲁士王国讨好。在开头的时候,这些阴谋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德意志都没有达到目的。萨丁的国王查理-阿尔伯特尽管自称是“意大利之剑”,但他还是被奥地利的军队击溃并死在国外。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了德意志资产阶级献给他的那顶德意志帝国的皇冠²⁸⁹,把它看成是一个实际上毫无价值的泥做的发箍,而宁愿卑劣地掠夺革命的成果。但是他在奥里缪茨吃了很大的苦头,不过这与其说是由于奥地利的剑,无宁说是由于奥地利的鞭子^①。

正是使1848年革命丧失锐气的工业繁荣,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现在成了加强资产阶级势力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因而全国的统一对资产阶级来说也就日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当后来1857年的危机提醒人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幸福都是不可靠的时候,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动。最先开始的是意大利,但这并不是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比德国还要发达。恰恰相反,在意大利还根本没有大工业,因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上的对立还不曾强烈到

^① 这里指1850年11月29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奥里缪茨城缔结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普鲁士不得不放棄片面修改由于1814—15年維也納會議的決議而在德国确立的秩序的做法,从而也就承认了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内的领导地位。

双方互不信任的程度。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情况是，意大利的分裂状态是由于外国人的统治，而推翻这种外国的统治却是一切阶级的共同目的。奥地利直接统治着伦巴第和威尼斯省，还间接地统治着中意大利，那里的小君主们是受着维也纳宫廷的指挥的。反对这一外国统治的斗争早从20年代起便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并曾引起了极为残酷的镇压，而残酷的镇压又引起了被压迫者的无情报复。奥地利的棍子打过来，意大利的剑也就必然要刺过去。

但是所有这些谋杀、暴动和阴谋都不能制服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大力量，就是在革命的年代里，意大利所有的起义也都被它粉碎了。意大利将要以自己的力量争得独立 (*Italia fara da se*) 这样一个誓言看来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意大利需要外国的援助以便摆脱奥地利的压迫，因此它就把目光转向它的姊妹民族法国。不错，法国政策的传统原则正是要使意大利和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是那时窃据法国王位的冒险家^①却是一个好商量的人物。只要第二帝国还困守在其他国家在第一帝国倾覆后为法国划定的疆界之内，第二帝国就始终是一出笑剧。法国需要进行征服，不过假波拿巴却不能用真波拿巴的方法来实现这些征服。因此他就只能满足于从自己的名义上的伯父那里偷来所谓“民族的原则”，并且把自己装扮成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救主的模样，不过对于他的善心的服务，是要支付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作为代价的。

然而波拿巴的整个处境却使他不可能采取任何大规模的行动。他根本不能进行一场欧洲战争（更不用说革命战争）；他至多只能在欧洲各国主管当局同意下，向共同的替罪羊发动进攻而

^① 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

已；而在50年代初，这一替罪羊是俄国，在50年代末，则是奥地利。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可耻的统治已经蜕化成为欧洲的丑剧。哈布斯堡王朝同神圣同盟的旧盟友发生了严重的争²⁹⁰——为了奥里维亚同普鲁士争²⁹⁰，为了克里木战争又同俄国争²⁹⁰，而波拿巴在进攻奥地利的时候，他切实指望的正是俄国的帮助。

此外，法国的国内情况也促使波拿巴用外交手段来恢复自己的威信。1857年的商业危机使法国的工业陷于瘫痪，而政府为着不使危机急剧发展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使灾难有了曠日持久的性质，以致法国商业在許多年間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种情况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反抗情绪。而且就是政变的真正支柱农民也开始抱怨起来了。1857—1859年間谷物价格的暴跌使得农民抱怨說，由于谷物的价格这样低而租稅又这样重，人們在法国将无法务农了。

利用波拿巴的这样一种处境，薩丁的实际领导人，首相加富尔极力向他討好，加富尔继承了查理-阿尔伯特的傳統政策，但是在实行这些政策时却表现了远为巨大的灵活性。但是由于外交手段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他的进展是十分緩慢的，特别是波拿巴的那种拖延不决的性格也阻碍了任何迅速的解决。同加富尔相反，意大利的行动党²⁹²却得以十分迅速地使这个“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清醒过来。1858年1月14日，奥尔辛尼和他的同謀者在巴黎向着皇帝的馬車抛了几个手榴彈，手榴彈的七十六个碎片打穿了馬車，然而馬車里的人却没有受伤，不过这位十二月暴动的英雄由于害怕得要死而像这类人常見的情况那样建立了恐怖統治作为报复。但

① 馬志尼在1855年建立的“行动党”在爭取重新統一意大利的斗争时期团结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分子。該党在19世紀70年代解散。

是他的这种做法只不过表明，他的政权在七年的統治之后，基础依然是不穩固的，而奥尔辛尼从獄中写給他的信再度使他感到害怕。奥尔辛尼在信中說：“不要忘記，意大利一天不独立，欧洲的安定和你自己的安宁就只不过是幻想。”^① 奥尔辛尼的第二封信显然說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作为冒險家的生活經歷当中，波拿巴也曾一度同意大利的密謀者們共过事²⁹¹，所以他知道他們的报复不是开玩笑。

因此，在1858年夏天他就把加富尔邀請到普隆比埃尔避暑地来，同他一起商量对奥地利作战的問題。双方約定，薩丁取得倫巴第和威尼斯地区，这样就使它的領地連成一片，从而变成了北意大利王国，但为此它却要把薩瓦和尼斯让給法国。这是一次外交上的交易，实际上同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毫不相干。关于中部和南部意大利則沒有作出任何决定，尽管拿破侖和加富尔暗中都有自己的打算。波拿巴不能把法国的傳統政策改变到能促使建立起統一的意大利的程度。即使为了保存教皇的統治，他也希望意大利諸王朝的联盟，因为这些王朝相互削弱，就能保证法国影响的优势地位了。同时他还想为自己的堂兄弟吉洛姆建立一个中意大利王国。加富尔則把希望寄托在民族运动上：他指望在北意大利一旦变为一个比較强大的国家时，就利用民族运动来压制一切王朝的分立主义傾向。

1859年元旦，波拿巴把自己的計劃通知了駐巴黎的奥地利大使，而几天之后，撒丁的国王就宣布說，他不能对意大利的苦难呼声采取充耳不聞的态度。維也納懂得这一威胁的含义是什么，战争看来很快就会爆发，而奥地利政府竟愚蠢到成为首先发动进攻

^① 參閱《Le Moniteur Universel》〔《总匯通报》〕第58号，1858年2月27日，第225頁。

的一方。受到法国的进攻和俄国的威胁的、半破产的奥地利陷入 293
了十分困难的处境，而它的“朋友”——英国的托利党人的相当冷淡的行动并不能把它挽救出这一困境。因此奥地利的政府就想把德意志联邦拉到自己这一边来。根据条例²⁹²德意志联邦没有义务保卫各联邦国家在德意志之外的领地。但是人们却打算用这样一种说法来引诱它，这就是：在波河沿岸地带保卫莱茵河具有军事政治意义，换句话说，为了德意志的切身民族利益，必须维护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

由于1857年危机及其后果，在德国也开始了民族运动。但是这一运动不同于意大利的民族运动，而这种不同对它本身并没有好处。这一民族运动没有促使它反对外国统治的刺激物。此外，从1848年起，德国资产阶级极端害怕无产阶级，虽然那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来说还不是十分危险的。只有巴黎的六月战斗才给他们上了很好的一课。1848年以前，德国资产阶级的理想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而在1848年以后，它却选择了英国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似乎是和谐一致的。普鲁士王储同英国公主的联姻在德国资产阶级中间已经引起了一阵狂欢情绪，而1858年秋天，当精神失常的国王不得不让位给自己的兄弟，而后者又组织了一个十分温和的自由主义内阁（不过他这样做决不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动机）的时候，资产阶级便陷入了那种“用全牛大宴来庆祝加冕的狂喜”。对于这种狂喜，拉萨尔虽然辛辣地嘲笑过，但仍然嘲笑得很不够。这个可尊敬的阶级背弃了自己的1848年的英雄们，以避免激怒摄政^①。当新内阁实际上使一切都

^① 后来是普鲁士的国王和德意志的皇帝威廉一世。

原封不动的时候，他們不仅不试图前进，甚至害怕得宣布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勿操之过急”的口号，就仿佛新主人一怒之下就会消除掉只靠着他的恩典才存在的“新紀元”²⁹³，就像消除掉墙上的影子一样。

随着战争阴云的迫近，浪潮在德国就更加高涨了。德国资产阶级对加富尔所施行的统一意大利的策略十分欣赏，因为资产阶级早就为普鲁士规定了撒丁所担任的那个角色。然而宿敌法国对德意志联邦中的首要强国的进攻却引起了恐惧和回忆，从而使德国²⁹⁴资产阶级又畏怯起来了。难道这个假波拿巴要走真波拿巴的老路吗？是不是奥斯特利茨和耶拿的败绩又要重演，外国统治的锁链又要在德国响起来？奥地利的御用文人们始终不倦地在描绘这一梦魇，把某种未来的“中欧大国”描绘得如同天堂一样，这个大国在奥地利的领导下，将包括德意志联邦、匈牙利、斯拉夫—罗马尼亚民族的多瑙河沿岸地带、阿尔萨斯、洛林、荷兰以及还不知道的其他某些地方。为了对抗这一宣传，波拿巴当然也发动了自己的雇佣文人来应战。他们赌咒要人们相信，他们的善良的主人根本无意于夺取莱茵河一带的土地，而且他对奥地利作战，也只是为了最崇高的文明目的。

庸夫俗子是完全弄不清楚这一大堆混乱的意见的，然而他们毕竟逐渐开始更加倾向于哈布斯堡的引诱，而不是波拿巴的引诱。哈布斯堡的引诱符合于他们的庸俗爱国主义的要求，同时人们也很难相信十二月暴动的英雄的文明使命。然而，情况是如此混乱，以致真正的和革命的政治家尽管在一切原则性的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在德国对意大利战争应当采取怎样的实际政策这样一个问题上却不能取得一致。

(二) 同拉薩尔的爭論

在同馬克思商定之后，恩格斯在这个問題上先是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①。拉薩尔为这个小册子找到了弗兰茨·敦克尔这样一个出版者。这一著作的目的是全面駁斥哈布斯堡王朝所宣布的必須在波河沿岸保卫莱茵河这样一个口号。恩格斯指出，德国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来保卫自己，而如果从純軍事上的理由来考虑，那末法国对莱茵河的要求比德国对波河的要求理由远为充分有力。恩格斯接着指出，在軍事方面，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統治不会給德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从政治方面來說，这种統治对它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奥地利人的空前殘酷的暴行，对意大利爱国者的迫害，引起了全意大利对德国的仇恨和瘋狂的敌視。

然而，恩格斯說，占領倫巴第的問題是意大利与德国的相互关 295
系問題，而不是路易·拿破侖与奥地利的相互关系問題。对于像波拿巴这样一个只是为了自己那显然是反德的私利才想进行干涉的第三者來說，問題只能是简单地守住一个省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棄它，問題只能是简单地守住軍事障地，只是在不能再守的时候才放棄它。因此对于波拿巴的恫吓，哈布斯堡的口号完全是有道理的。如果說波河只是路易·拿破侖的一个借口，那末他的最終目的無論如何必定是莱茵河。而只有占領莱茵河的疆界才能在法国长时期地保持十二月暴动的主謀者的統治。总而言之，正如諺語所說，打袋子給驢子看。如果說意大利不得不扮演袋子的角色，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247—299頁。

那末德国这次却根本不想当驢子。如果問題归根到底是在于誰占有萊茵河左岸的話，那末德国無論如何也不能想像不通过武力的較量而让出波河，因为这是它的最强有力的障地之一，甚至是它的最强大的障地。在战争前夕，就同在战时一样，大家都力图占领每一个用来威胁和挫伤敌人的有利障地，而根本不去从道义上考虑这种做法是不是符合永恒的正义和民族的原则。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

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的这些論点。在讀了小册子的手稿之后，他写信給作者說：“写得极其出色；問題的政治方面也写得极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小册子一定会获得很大的成功。”^①相反地，拉薩尔却說，他自己完全不理解这样的观点。不久，他也在弗兰茨·敦克尔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个題为《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的小册子²⁹⁴。拉薩尔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因而得出了完全不同的一些結論。馬克思认为拉薩尔的小册子是一个“巨大的錯誤”^②。

拉薩尔认为在日益迫近战争的形势下发生的德国民族运动只是“絕對的反法和仇法（拿破侖只是一个借口；真正背后的原因是法国的革命发展）”^③。德法人民战争（欧洲大陆的两个偉大文明民族在这一战争中将要为了民族的幻影而相互厮杀），反法的人民战争（这一战争不是由任何切身的民族利益而引起的，而是靠着不正常地激发起来的民族情感、頑固的爱国精神和幼稚的仇法情緒来維持的）——这样的战争在拉薩尔的眼里看来，对于欧洲的文化，对于一切民族的和革命的利益都是极大的危險。按照他的看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436 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 462 頁。

③ 《拉薩尔致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1905 年俄文版，第 182 頁。

法，这会是1848年3月之后反动原则的最大的、后果难以估计的胜利。拉薩尔认为用全力反对这一战争是民主派的迫切任务。

他不厌其詳地說什么意大利战争对德国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并且論证說，德意志民族是极願意看到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取得胜利的。好事情不会因为坏人去做而变成坏事情。如果波拿巴想通过意大利战争赢得几文錢的声望，那末就必须不使他得到这种声望，这样他为着个人的目的而敢于做出的行动，对于这些目的來說就成为无用的了。然而不应当反对一直为人们所希望的东西。一方面是坏人和好事，另一方面是坏事和……“而人又怎样呢？”拉薩尔提到了勃魯姆的被杀，提到了奧里繆茨、霍尔施坦、布隆采耳²⁹⁵，提到了不是波拿巴专制政府，而是哈布斯堡专制政府对德国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德国人民一点也不愿使奥地利的力量不被削弱。恰恰相反，奥地利的彻底失败是德国统一的首要条件。只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成为独立国家的那一天，一千二百万奥地利的德国人才会重新回到德意志民族的怀抱；只有到那时，他們才感到自己是德国人，只有到那时，德国的统一才是可能的。

拉薩尔从波拿巴的整个历史情况出发得出这样的結論：这个庸碌的，而在整个欧洲却被如此过高估计的人，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到在意大利进行征服的問題，更不用說在德国了。然而，即使他真地以虛幻的侵略計劃自慰，德国人又有什么理由这样不体面地大惊小怪呢？拉薩尔嘲笑那些有勇无謀的爱国者，因为他們用耶拿的尺度来衡量国家的力量，而只是由于恐惧的緣故才变得不顾一切地大胆。他們极度害怕法国的莫須有的进攻，因此他們就促使德国去进攻法国。十分明显，如果德国必須抵抗法国的进攻以保卫自己，那末它就能够发挥并且定将发挥与进攻法国的战争完全

297 不同的一种力量，因为进攻法国会使法国人民团结在波拿巴的周围并且只会使他的王位巩固起来。

只有在波拿巴自己不想放弃他从奥地利人那里夺得的战利品，或是想使自己的堂兄弟成为中意大利王国的国王的时候，拉薩尔才要求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如果两种情况都不发生，而普魯士政府仍要驅使德国人民发动反法战争的话，民主派就必须反对这种做法。然而单是中立是不够的。普魯士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无宁是在于派自己的军队去进攻丹麦，并宣称：“拿破侖要在南方根据民族原则改变欧洲的地图。很好。我們也要在北方做同样的事情。拿破侖要解放意大利。很好。我們也要把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拿到手。”^①如果普魯士仍和先前一样迟迟不进，那末这就一再表明，德国的君主制度已不再能承担任何民族事业了。

由于这个纲领，拉薩尔几乎被颂为预言俾斯麦后来的政策的民族先知。然而俾斯麦在1864年由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问题而进行的那次王朝侵略战争，却同1859年拉薩尔所宣传的争取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人民革命战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战争同另一战争相比，无异于骆驼同马相比。拉薩尔知道得很清楚，摄政王并未完成他向摄政王提出的任务；因此他便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符合于民族利益的建议，即使这一建议立刻就变成了对政府的指责。他有充分的权利把心情激动的群众引离错误的道路，而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

然而除去在自己的小册子里陈述的理由之外，拉薩尔还有一

^① 参阅拉薩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载《拉薩尔》一书，瘦伊科主编，增订第2版，1880年俄文版，第248页。

些“暗中的理由”，而他在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里就谈过这些理由。他知道，摄政王在意大利战争中是准备站在奥地利一边的，拉萨尔甚至并不反对这一点。他指望战争将会失利，而在战争发生不可避免的激变时，则可能为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然而只有在民族运动从一开始便把摄政王的这一战争看成是王朝内鬨的战争，而根本不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可能出现。在拉萨尔看来，这一场不得人心的对法战争，对革命来说却是 298 “莫大的幸事”。而在王朝的领导下进行的受到欢迎的战争则会引起各种反革命的后果，他预见到了这些后果并且在自已的小册子里做了确凿的论述。

因此，拉萨尔对于恩格斯在自已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战略是不大能够理解的。恩格斯虽然十分辉煌地证明，德国并不需要波河来确保自己的军事地位，但他的结论却是大有争论余地的，这个结论就是：一旦战争爆发，首先应当保卫波河，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支援奥地利以反抗法国的进攻。十分明显，如果奥地利能顺利地击退波拿巴的进攻，这只会引起反革命的后果。如果奥地利依靠着它在北意大利的占领地并在德意志联邦的支持下取得胜利，那末任何人都都不能阻止它保有对北意大利的统治，而这正是恩格斯本人所痛斥的事情。这会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的霸权，并且会使联邦议会从苟延残喘中复活。甚至如果奥地利推翻了法国的篡位者，把旧的波旁王朝的统治恢复起来，那末无论对德国还是对法国、更不用说对革命都是不会有好处的。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应该考虑到，他们同拉萨尔一样，也有自己的“暗中的理由”，而且两个人都是出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所成的那同一个理由。“按照我们党的精神直接

在德国本国从事政治斗争和论战，这是根本不可能的。”^①但是伦敦的两位朋友的“暗中的理由”对我们来说却不像拉萨尔的理由那样清楚，因为保存下来的只有拉萨尔给他们的信，而没有他们给拉萨尔的信^②。可是综观他们当时的政论活动，我们仍能看出他们的基本观点。在恩格斯一年后发表的反对波拿巴吞并萨瓦和尼斯的题为《萨瓦、尼斯与莱茵》^③的第二个小册子里，他清楚地阐述了作为他的第一个小册子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这样的前提基本上是两个，或本质上是三个。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德国的民族运动是货真价实的。按照他们的意见，这一运动是“自然地、本能地、直接地”^④发生的，并且可以吸引那些反对政府的人们。他们认为德国的这一民族运动从一开始就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异国统治和意大利争取独立的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人民的本能要求为反对路易·波拿巴而斗争，为反对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传统而斗争，而且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俄联盟对德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第二帝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已达到危急的地步，而只有对外战争才能使波拿巴的政变在法国所确立的统治以及反革命在欧洲的统治苟延残喘。他担心意大利的解放只能给波拿巴以借口来继续压迫法国，使意大利受他自己的统治，把法国的“自然疆界”向德国方面推移，变奥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35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发表了马克思就这一问题写给拉萨尔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40—242、243—244、246—247、262—265、274—2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633—680页。

④ 同上书，第636页。

地利为俄国的工具，并且把一场为合法的或非法的反革命而进行的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正像在第二个小册子里所指出的，恩格斯把德意志联邦帮助奥地利的行动看成是一个决定性的关头，因为那时俄国将出现在战场上，以便使法国侵占莱茵河左岸，而自己也可以在土耳其放手行动。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德国各邦政府，特别是柏林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们”将会使奥地利任凭命运的摆布。因为他们欢迎那把莱茵河左岸让给了法国的巴塞尔和约^①的缔结，而当奥地利人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被打败的时候²⁹⁶，他们也暗中感到十分欢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族运动必定能推动德意志各邦的政府前进。为此恩格斯曾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拉萨尔在自己的回信里曾一字不漏地重述了这句话）：“如果法国人和俄国人同时进攻我们，如果我们面临着灭亡的危险，那末战争对我们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政党，从当前执政的政党到齐茨和勃鲁姆都将在这种绝望状态中垮掉，而人民为了拯救自己必将求助于最果敢有为的政党。”拉萨尔在回信中对这一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说，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说他在柏林曾用一切力量来证明，普鲁士政府如果参加战争，这将有利于革命——当然，这只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人民厌恶政府的这一战争，而把它看成是神圣同盟的反革命战争。无论如何，如果一切都像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那末无论德意志联邦还是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和法兰西帝国，都将同样遭到灭亡的命运，而只有在这样的

^① 指1795年4月5日法国和普鲁士在巴塞尔缔结的单独和约，普鲁士所以签订这一条约，特别是因为它想使自己能腾出手来参加对波兰的第三次瓜分并建立德意志各公国的新联盟以对抗奥地利帝国。

意义上，他所提出的战略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爭論双方并没有原則上的意見分歧，而正像馬克思在一年后所說的，有的只是“对于实际前提的对立的想法”。他們无論是在民族問題上，还是在革命問題上，都沒有任何分歧。對他們來說，最高的目的都是无产階級的解放，而建立一些大的民族国家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的前提。作为德国人，他們最关心的是德国的統一，而他們认为做到这一点的必不可缺的条件，是消除德国内部的許多王朝統治。因此，正是出于他們的民族意識，他們对于德意志各邦政府就只有憎恨，并且盼望它們失敗。他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想法，即一旦各邦政府之間爆发战争，工人階級应当放棄自己的全部政策并且不加思考地把自己的命运交到統治階級的手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意識是深厚而真誠的，因而决不可能受王朝口号的欺騙。

只是由于革命年代的遗产开始在王朝的兴替中受到清算，情况才变得困难起来。要在这一团混乱中划清革命目的和反动目的之間的界限，这不是原則問題而是事实問題。尽管两方面都沒有受到實踐的檢驗，但正是阻碍了这种檢驗的事态发展相当清楚地表明，拉薩尔实质上較之恩格斯和馬克思更正确地估計了“实际的前提”。由于恩格斯和馬克思在一定的程度上同德国的现状失去了接触，并且多少过高估計了沙皇政府的即使不是侵略的意图，至少是侵略的可能性，他們这一次是吃了亏的。拉薩尔把整个民族运动都归結为仇恨法国人这种老一套的說法，可能是过火的，然而这一运动最后的产儿却表明这一运动是最不革命的，这个产儿就是德意志民族联盟²⁹⁷ 这个怪物。

拉薩尔也可能低估了俄国的危險。他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只是

順便地提到這個問題。然而，当普魯士的攝政王——完全像拉薩尔所設想的那樣——动员普魯士军队并且向德意志联邦建議动员德意志中小各邦的军队的时候，看来这一危險还是遙远未来的事情。因为，单是这一軍事上的示威行动便足以使十二月的英雄和沙皇立刻傾向于締結和約了。在立刻来到法国大本营的一位俄国侍从武官长的极力慫恿之下，波拿巴甚至放棄了自己的正式綱領的一半，而向战敗的奥地利皇帝建議言和。他满足于占領倫巴第，而让威尼斯仍旧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之下^①。波拿巴不能独自承担进行欧洲战争的風險，而俄国則由于波兰的騷乱以及解放农奴所带来的困难而陷于癱瘓状态，并且远远沒有从克里木战争所受的創伤恢复过来。

維拉佛兰卡和約的簽訂結束了有关对意大利战争的革命策略的爭論，然而拉薩尔盾来还在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多次提起這個問題。他仍然断言，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但是由于我們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信^②，由于他們並沒有根据他們原定的計劃在有关这一問題的正式宣言中陳述自己的观点，因而我們不能对双方的論据作出判断。拉薩尔有权援引这样一些事实作为自己的論据：如意大利統一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意大利各王朝为它們的被压迫的“臣民”的起义所推翻，加里波里的志願軍占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以及这一切挫敗了波拿巴的打算等等，虽然，事情的結果是薩瓦王朝最后得到了好处²⁹⁸。

① 梅林这里指的是1869年7月11日法國和奧地利在維拉佛兰卡(在意大利)所簽訂的单独預备和約的条款。同年，維拉佛兰卡和約的条款又經双方在苏黎世簽訂的和約所批准。

② 參閱本书第348頁脚注2。

可惜，同拉薩尔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由于馬克思对他抱有难以克服的不信任态度而激烈起来。不能說馬克思不願意把他完全爭取过来。他曾把拉薩尔称为不可能同資產階級政党勾結的“剛毅果敢的人物”。他甚至认为，拉薩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尽管写得不好，却仍然比民主派所能夸耀的任何东西都高明^①。然而，尽管拉薩尔对他采取了开誠相見的态度，馬克思却仍然一直认为必須对拉薩尔使用外交手段和采取“明智领导”的办法以便使拉薩尔就范；而且任何偶然的事情都会重新引起馬克思对他的不信任。

弗里德兰德曾通过拉薩尔再一次向馬克思建議給《Presse》〔《新聞报》〕写稿，而且这一次沒有向他提出任何条件，但后来却把这件事情根本压下不提了，于是馬克思便疑心这是拉薩尔从中搗鬼。当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②的印行从2月初拖到5月底的时候，他认为这也是拉薩尔的“陰謀”，并且說他永远不会寬恕拉薩尔干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拖延是出版者自己造成的，而且出版者这样做也还是有他的理由的，那就是，他首先必須出版恩格斯和拉薩尔的論述当前問題的小册子。

(三)流亡者之間的新斗争

意大利战争的两面性质在流亡者中間引起了旧的矛盾和新的混乱。

正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流亡者反对意大利的解放运动同法国的波拿巴政变合流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德国流亡者却想重复他們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433、430頁。

② 指馬克思的《政治經济学批判》。

过去干过的蠢事²⁸⁹，而他們第一次干的这些蠢事曾使他們付出了十年放逐的代价。他們这时已离开拉薩尔的观点非常之远。相反地，他們却念念不忘靠援政王的恩典而开始的新紀元，指望他們自己也能分沾到这个新紀元的一点恩惠。正像弗莱里格拉特諷刺地指出的，他們被“大赦狂”弄得坐臥不宁，而只要“国王陛下”願意像金克尔在拉施塔特軍事法庭上所宣称的那样用武力統一德国，他們就准备做出任何爱国行动。

金克尔这一次再度成了这一派的代言人。他从1859年元旦开始出版一种題为《Hermann》〔《海尔曼》〕的周刊。单是从这一陈腐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誰是它的思想导师了³⁰⁰。用弗莱里格拉特的 303 話來說，在杂志里又“开始鼓吹思乡情緒”，而这种思乡情緒很快地就跟“自由主义的下級軍官的狂想”交融在一起了。但金克尔的周刊却因而更加迅速地暢銷起来。它立刻就挤垮了工人的小报《Die Neue Zeit》〔《新时报》〕，这是埃德加尔·鮑威尔受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出版的。《新时报》是靠向印刷厂賒賬来維持的。因此当金克尔向印刷厂建議承印《海尔曼》这笔更加有利和可靠的生意时，該报就注定要垮台了。但是这种做法就是在資產階級流亡者中間也沒有得到一致的同情。自由貿易論者孚赫甚至成立了一个財務委员会来維持《新时报》的出版。这件事實現了，报纸只是换了一个名称，改称《Das Volk》〔《人民报》〕。編輯部邀請了埃拉尔特·比斯康普这个庫尔黑森的流亡者来担任編輯。他先前也曾从外地給《新时报》写稿，現在則辞去了教师的职务而把全部力量放到重新办起来的报纸上。

不久比斯康普就同李卜克內西一起到馬克思那里去請他为报纸写稿。馬克思自从1850年同工人教育协会决裂之后就不再同

它保持任何联系。当李卜克内西个人恢复这一联系的时候，他甚至感到不满，虽然李卜克内西关于没有工人的工人政党是个矛盾的看法，但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正确的东西。然而，完全可以理解的是，马克思未能很快地摆脱一切不愉快的回忆，并且以如下的声明使协会派到他那里去的代表团“十分惊愕”，他说，他和恩格斯是自行负起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者的使命的，而他们的这种地位已为旧世界的一切政党对他们所抱的普遍而深刻的憎恨所证明。

开头时，马克思对于《人民报》约稿的建议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尽管他也认为不应当放任金克尔并且表示同意李卜克内西和比斯康普参加报纸的编辑部，但是他自己却既不愿意为一个小组写稿，也根本不愿意为任何不由他本人和恩格斯主编的党报写稿。但是，他却答应帮助推销报纸，答应这个小报利用他在《论坛报》^①上发表过的文章并且就各种问题提供口头的意见和指示。他还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认为《人民报》是一个流亡者的消闲小报（«Bummelblätchen»），就和过去巴黎的报纸«Vorwärts»〔《前进报》〕和«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一样。但是总有一天，在伦敦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对他们来说将成为十分重要的事。他还写道，由于比斯康普在报纸方面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所以更应当受到支持³⁰¹。

但是当这一消闲小报开始阻碍金克尔的阴谋的时候，马克思的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使他不能不出来维护这个报纸。他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来挽救报纸——这与其说是给报纸写稿（据马克思自己说，他不过写了一些篇幅不大的短评），无宁说是尽力给报纸

^① 即《纽约每日论坛报》。

保证一些物质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这个有四大版的机关报就至少能够一天天地勉强支持下去。在为数不多的党的同志中间，所有能够出一点钱的人，首先是恩格斯，都被吸收来参加这一事业。恩格斯还热心地为《人民报》写稿，他为它写了有关意大利战争的军事论文³⁰²，特别是在那里发表了有关他的朋友刚刚发表的科学著作的有价值的论文^①；不过论文的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却没有在那里发表。8月底，《人民报》停刊了，而马克思一番努力的实际结果就是，承印该报的印刷所的主人、一个叫做菲戴里奥·霍林格的人要马克思支付所欠的印刷费。这个要求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但是“由于金克尔一伙正在等待机会公开地寻衅，而同报纸有关的人员又不便在法庭上公开出面”^②，所以马克思就只好偿付了差不多五英镑的债款。

《人民报》留给马克思的另一笔遗产却使马克思遭到了远为巨大的牺牲和麻烦。1859年4月1日，卡尔·福格特从日内瓦把德国民主派在意大利战争中的行动纲领散发给伦敦的流亡者，其中包括弗莱里格拉特。他请他们根据这一纲领的精神给瑞士的一个新的周刊撰稿。福格特是曾在学生运动中起过显著作用的福伦兄弟的外甥。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里，他同罗伯特·勃鲁姆是左翼的领袖，而在垂死的议会的最后时日，他甚至被任命为帝国的五摄政之一。现在他以地质学教授的身分住在日内瓦，并且同日内瓦激进派的领袖法齐一道是瑞士等级会议的日内瓦代表。在德国，

① 在1859年8月6日和20日的《人民报》上登载了恩格斯的书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524—535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67年版，第2卷，第498页。

305 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曾熱心鼓吹一種狹隘的科學的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只要一涉及歷史領域，立刻就陷入了謬誤。而且盧格說得很妙，福格特就像“淘氣的孩童惡作劇似地”鼓吹這種唯物主義，並且喜歡用下流的詞句嘲笑那些庸夫俗子。可是當他講出諸如“思想和腦的關係就像胆汁和肝或尿和腎臟的關係一樣”之類的話的時候，甚至他的最親密的同志路德維希·畢希納都反對這種教化人民的方式了。

弗萊里格拉特曾請求馬克思談一談他對福格特的政治綱領的意見。他得到了一個簡短的回答：“廢話連篇”。但是馬克思在他給恩格斯的信里卻比較詳細地談到了福格特的綱領：“德國放棄自己的非德意志的領土。它不支持奧地利。法國的專制統治是暫時的，但奧地利的專制統治卻是長久的。兩個專制君主都要流血（這裡甚至可以看出他對波拿巴的某種偏愛）。德國武裝中立。福格特‘從最可靠的方面得悉’，在我們活着的時候，根本不要指望德國的革命運動。因此，只有在奧地利被波拿巴消滅的時候，在祖國才會自行開始一個在帝國攝政³⁰³領導下的溫和的自由主義的民族的發展，而福格特看來還將成為普魯士的宮廷小丑。”^①在馬克思的這些話里流露出來的那個懷疑，當福格特不是出版他所計劃的周刊而只是出版《歐洲現狀概述》的時候，就在馬克思那裡變成了一種確信。這部著作同波拿巴的口號的思想上的聯繫已經是不可置疑的了。

除去弗萊里格拉特之外，福格特還曾向巴登的流亡者卡爾·布林德約稿，這個人從革命的年代起就同馬克思友好，並且在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447—448頁。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不过他不是马克思的最亲密的同志之一。布林德无宁说是那种仍然把“巴登那”看做世界中心的“一本正经的”共和主义者之一。恩格斯特别喜欢拿这些“大政治家”开玩笑，说这些人的信念尽管看起来高深莫测，却照例不过是对自己的“自我”的无限崇拜。当时布林德曾到马克思那里去揭发福格特的叛国阴谋，并肯定说，他手里有证据。布林德说，福格特曾从波拿巴那里领取过进行鼓动工作的津贴；他想用三万盾来收买南德的一位作家，在伦敦他也想进行收买；早在 1858 年夏天，当罗姆·波拿巴亲王在日内瓦同法齐之流会见的时候，就讨论了有关意大利战争的问题，而俄国大公康斯坦丁甚至被内定为未来的匈牙利国王。

当比斯康普前来访问马克思，请他为《人民报》写稿的时候，马克思只是顺便提到这些事情；同时他又说，南德人讲话的特色就是喜欢夸大其词。比斯康普没有征求马克思的意见就利用布林德所提供的这些情况，给《人民报》写了一篇文章来挖苦帝国的摄政——帝国的叛徒。他把这一号的报纸寄给了福格特一份。福格特在«Bieler Handelseourier» [《比尔商业信使报》] 上发表了对工人的“警告”以为答复，说这个“流亡者集团”先前在瑞士的流亡者中间便以“刷子家”或“硫磺帮”^① 这些浑号而著名，而现在他们又在自己的首领马克思的领导下为了在德国工人中间制造阴谋而在伦敦集合起来。大陆上的秘密警察从一开始就知道的这些阴谋，给工人们带来了灾难。马克思并未因这篇“下流的文字”而感到不

^① 关于福格特用来侮辱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刷子家”或“硫磺帮”等词的起源问题，参阅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25 页。

安，他只是建議《人民報》對之進行反擊。

但是後來，當馬克思在6月初到曼徹斯特去在那裡的黨內同志中間為《人民報》募集款項的時候，李卜克內西在報紙的印刷所裡發現了反攻福格特的一篇匿名文章的校樣，文章裡就有布林德揭發的那些材料；排字工人費格勒說，文章是用布林德交來的親筆手稿排印的，而且清樣上所做的修改也是布林德的筆迹。幾天之後，李卜克內西從霍林格爾那裡收到了文章的清樣並且把它寄給了奧格斯堡《總匯報》，因為幾年來他一直是這家報紙的通訊員。他還說，文章是一位最可尊敬的德國流亡者寫的，並且文章中提到的各項事實都是確鑿有據的。

當這篇文章發表在《總匯報》上的時候，福格特控告該報對他進行了誹謗。編輯部為了給自己辯護，要求李卜克內西提供他答應提供的證據，於是李卜克內西又去找布林德。但是布林德卻拒絕參預同他不相干的報紙的事情，並且根本否認這是他本人的作品，儘管他不得不承認，他曾把文章的實際內容告訴給馬克思，甚至把它的一部分發表在《Free Press》〔《自由新聞》〕（烏爾卡爾特的報紙）上。馬克思自始就同這一切沒有任何關係，而李卜克內西也早就預料馬克思會在這個問題上同他劃清界限。但是馬克思卻盡一切力量來揭露福格特，因為福格特硬把他拖到這件事情裡面來。然而，就是他要使布林德承認的嘗試也由於布林德的堅決否認而遭到失敗，因此馬克思就只能滿足於排字工人費格勒的書面聲明，即文章的手稿是他所熟悉的布林德的手迹，而且文章是在霍林格爾的印刷所裡排印的。當然，這也絲毫不能證明福格特是有罪的。

然而還在奧格斯堡審理這一案件之前，在倫敦的流亡者中間又發生了新的爭吵，爭吵是由於1859年11月10日席勒誕生百年

紀念而引起的。大家知道，国内和国外的德国人都把这个日子，用拉薩尔的話來說，当作全体德国人民的“精神統一”的证明，当作“德国人民民族觉醒的可喜的保证”来加以庆祝。在倫敦，人們也在水晶宮³⁰⁴集会庆祝，还建議以收进的款項成立席勒学院，学院附設图书馆，每年举办报告会，这些报告会照例应当从席勒誕辰紀念日开始。可惜，庆祝会的全部筹备和組織工作为金克尔一派所把持，于是他們开始别有用心地、卑鄙地利用这一工作图謀私利。金克尔一派把普魯士大使館中的一个官員請来参加庆祝会（这个官員在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时期曾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力图借此吓跑流亡的无产阶级分子。一个用貝塔这个笔名写作的名叫貝特齐希的人，仿佛是金克尔的文笔方面的助手；这个人在《Gartenlaube》〔《凉亭》〕杂志上发表文章，极其无聊地給自己的上司和主子吹捧。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还同样无聊地嘲笑那些想参加紀念席勒活动的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因此，当弗萊里格拉特同意在金克尔发表紀念演說之后在水晶宮朗誦一首紀念詩时，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极不愉快。馬克思曾警告自己的老朋友根本不要参加“金克尔的示威”。弗萊里格拉特也承认，事情是可疑的，可能目的只是在于滿足某人的虛荣心；但是他认为，作为一个德国詩人，他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他认为，这一点甚至是无須证明的。他說，在举办席勒紀念会的时候，即使某一派有它自己的私下的打算，但是归根到底問題却不在于某一派的这种打算。在紀念会筹备期間，弗萊里格拉特有了一些“奇妙的體驗”，而尽管他为人醇厚，在估价人和事件时总是从最好的方面着眼，但这些體驗还是使他不得不承认，馬克思的警告是正确³⁰⁸的。不过弗萊里格拉特仍然认为，他出席和参加紀念会，較之他采

取旁觀態度，更能打亂某些圖謀。

但是馬克思不同意這種想法，恩格斯尤其如此。恩格斯憤怒地譴責弗萊里格拉特，說他有“詩人的虛榮，文人的多事和喜歡迎合世俗的習氣”^①。這確是過甚其詞了。當時的席勒紀念會並不像德國資產者為了紀念他們那些像仙鶴一樣飛翔在他們的睡帽之上的思想家和學者而舉辦的那種吵吵嚷嚷的慶典，這個紀念會就是在極左翼中間也得到了共鳴。

當馬克思向拉薩爾抱怨弗萊里格拉特時，拉薩爾回答說：“也許弗萊里格拉特不參加慶祝活動会更好一些。不過他寫了一篇頌詩，這總是一件好事情。這是為紀念會所寫的一切作品當中最好的。”^②在蘇黎世，海爾維格寫了一首紀念的歌曲，而在巴黎，席利發表了紀念演說。在倫敦，工人教育協會也參加了水晶宮的紀念會，而為了對得住自己的政治良心，工人教育協會在前一天舉辦了羅伯特·勃魯姆的紀念會，李卜克內西在紀念會上還發表了演說。在曼徹斯特主持紀念活動的是來自烏培河谷的一位年輕詩人季貝爾，但同他有遠親關係的恩格斯卻絲毫沒有因為這件事而怪罪他。誠然，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他自己與此事完全無關，但是季貝爾卻寫了一篇閉幕詞。“不用說，是平平常常的朗誦，然而形式却是得體的。此外，這個無所事事的人還組織了《華倫斯坦的陣營》³⁰⁵的演出；在排演時我去過兩次；只要這些傢伙們鼓起勇氣來干，成績是不會壞的。”^③後來恩格斯本人成了因紀念會的機會而在曼徹斯特成立的席勒學會³⁰⁶的主席，而威廉·沃尔弗還在自己的遺囑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503頁。

② 《拉薩爾致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1905年俄文版，第198頁。

③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505頁。

中为这个机构留下一大笔赠款。

就在那些日子里，也就是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闹得很紧张的时候，奥格斯堡的地方法院审理了福格特对《总汇报》的控告。这一控告结果未予受理，诉讼费用也要由福格特负担。不过法庭上的这一失败对他来说却成了道义上的胜利。被控的编辑们根本提不出任何足以证明福格特卖身投靠的证据，而用马克思的极其温和的说法来说，他们只是做了一件“从政治上说来是无聊的蠢事”；他们的这种行动不仅从政治的观点，而且从道义的观点来看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他们所以能够胜诉，是因为他们坚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政治对手的荣誉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问道，巴伐利亚的法官们难道会保护那个曾猛烈攻击过巴伐利亚政府并由于从事革命密谋而不得不亡命国外的人的权利吗？如果被控告的编辑们被判罪的话，那末十一年前曾以杀死拉图尔将军、加格恩将军和奥艾尔斯瓦尔德将军和利希诺斯基公爵来给自己最初的自由梦想祭旗的整个德国社会民主派，就会真正感到欢欣鼓舞。编辑们还说，如果福格特的企图最后得到成功，那就会面临这样一个令人欣慰的前景，即很快地克拉普卡、科苏特、普尔斯基、泰列基、马志尼也都会以原告的身分出现于奥格斯堡地方法院。

尽管玩弄了这个平常的花招，或者无宁说正是由于这个花招，这一辩护对法官们起了作用。他们的法律上的良心不容许他们替那些自己提不出任何证据的被告辩护；但是他们毕竟也没有足够的良心来承认那为巴伐利亚政府和巴伐利亚居民所极端憎恨的人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抓住了检察官暗示给他们的一个补救办法，根据形式上的理由把案件转到陪审法庭去；而在那里，福格特

更加不成問題会受到申斥,因为在这个法庭上,不容許提出任何真凭实据,而陪審員也沒有义务說明自己判决的理由。

如果說福格特沒有參加這場实力悬殊的战斗,那也无可責怪。相反地,他却有理由享受双重殉道者的荣光:人們不但无端地怀疑他,而且拒絕承认他的权利。某些次要的情况更加促成了他的胜利。当他的法庭上的对头提出了比斯康普的信的时候,人們得到了一个十分可厌的印象。因为在这封信里,第一个公开指控福格特的人自己也承认他沒有真凭实据,只是举出一些含糊的推測;最后,他还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即在他停止出版《人民报》之后,《总汇报》是否会聘請他为李卜克内西以外的第二个倫敦通訊員。但是《总汇报》的編輯們就是在訴訟結束之后还是像先前那样胡言乱語,他們說:福格特受到自己人,馬克思和弗萊里格拉特的譴責,而人們早就知道,馬克思是比福格特更有見識和更加彻底的思想家,弗萊里格拉特也在政治节操方面比福格特更为高超。

310 在編輯科尔布呈交法庭的那些辯护书里,弗萊里格拉特被称为《人民报》的撰稿人和福格特的控告者之一。这是因为科尔布誤解了李卜克内西有关这个問題的一个并不十分清楚的书面声明。当倫敦方面收到載有关于訴訟的报道的那一号《总汇报》的时候,弗萊里格拉特便把一篇簡短的宣传寄給該报,說他从来不曾做过《人民报》的撰稿人,而他的名字被列入福格特的控告者之內,也是他事先不知道并且从来沒有同意过的。由于福格特是法齐的密友,而弗萊里格拉特在瑞士銀行的地位又是借重于法齐的,因此人們就从这一声明得出了不愉快的結論。不过这些結論只有在弗萊里格拉特由于某种原因而必須反对福格特的时候才是公正的。然而这样的事情是根本談不到的。在这时以前,弗萊里格拉特对福

格特的案件根本不感兴趣，并且有充分的权利不希望科尔布在陷入困境难以自拔时用他的名字作掩护。当然，从弗莱里格拉特的简短而又枯燥的声明里，人们可以间接地看出对马克思的拒斥态度；马克思本人也感到，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丝毫不能消除他个人同马克思决裂并公开脱离党这样一种印象。声明的这一缺点可以用弗莱里格拉特的某种不满情绪来加以解释：马克思从党的利益出发而想不要他发表（弗莱里格拉特便是这样认为的）他为纪念席勒而写的无害诗篇，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却要求他立刻参加马克思所发动的一次论争，虽然并没有什么人迫使马克思进行这一论争。

还有一个情况使这个事件更显得是出于恶意中伤，那就是在这同时，布林德也在《总汇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虽然“无保留地指责”了福格特的政策，但断然否认那篇攻击福格特的文章是他写的。他在信里附了两份证明：在一份证明里，费戴里奥·霍林格尔把费格勒的这样一个说法，即福格特的文章是在他的印刷所印的并且是布林德写的，说成是“恶意的捏造”；在第二份证明里，排字工人维埃确认霍林格尔的声明是真实的。

此外，一件不幸的事件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更为加深了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不和。原来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凉亭》上发表了贝塔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金克尔雇用的这个文丐以夸张的手法大捧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才，而在文章结尾处则对马克思进行了卑鄙的辱骂。贝塔写道，这个惹祸招灾的、散播恶毒仇恨的能手剥夺了弗莱里格拉特歌唱的权利，剥夺了他的自由和个性。自从诗人接近马克思以来，诗人就停止了创作。

但是，在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了一番争 311

吵之后，看来，这场糾紛就随同动蕩的 1859 年一道消逝在忘却的海洋中了。但是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旧的爭論又表面化起来，因为好斗的福格特想证实一句老話：“自作孽，不可活”。

(四) 插曲

到新年的时候，福格特出版了一部书，題名为《我对〈总汇报〉的控告》。这部书里收入了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审理这一案件时的速記报告，一些声明，以及爭論时期发表的其他文件。书中的全部材料都是不加删节、逐字逐句地照引下来的。

然而，其中也比較詳細地叙述了福格特关于“硫磺帮”的老一套的胡說，这些胡說最初曾发表在《Bieler Handelscourier》〔《比尔商业信使报》〕上面。馬克思在这部书里特別被描写成一个詐騙集团的头目，这一集团就靠着敗坏“住在祖国的人們”的名誉为生，迫使人們出錢換取它的沉默。福格特的原話是这样的：“这些人寄往德国的不是一封、而是成百封的信……公然威胁說，如果在一定的期限内不把一定数目的款項寄到指定地点去，就要揭发他們曾經参加过某一革命行动”^①。这是福格特对馬克思所进行的最恶毒的，然而决非唯一的誣蔑。尽管这显然是在說謊，然而在叙述中却掺杂了流亡者的經歷中的一些半真半假的情节，以致只有确切地了解一切細節的人才不致在乍看时为这种奇談怪論所迷惑。可是德国的庸人，对于流亡者生活中的事件，却是最不可能有这样的了解的。

^① 參閱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4 頁。

福格特的书确实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特别是德国的自由主义报刊对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National-Zeitung》（《国民报》）为这部书写了两大篇社论，而当伦敦方面接到报纸时，这两篇社论使马克思全家十分气愤。马克思夫人受到了特别巨大的震动。由于在伦敦得不到福格特这本书，于是马克思就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问他是否曾从他的“朋友”福格特那里得到这样一本书。弗莱里格拉特十分恼火地回答说，福格特不是他的“朋友”，而他手头也没有这样一本书。

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回答福格特，尽管他向来不愿回答那甚至是最恶毒的咒骂。他认为报刊有权利侮辱作家、政治家、演员和其他社会活动家。在伦敦方面接到福格特的书之前，马克思就决定对《国民报》提起诉讼。这家报纸指控他有过一系列罪恶的和可耻的行为，而且又是在这样的公众面前指控他，这些人由于党派的成见而总是愿意相信这种彻头彻尾的胡说的。此外，这些人也没有掌握任何材料足以对马克思的为人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他离开德国已经十一年了。当时，马克思不单单是从政治上的考虑出发的：他认为为了妻子和孩子的缘故，他也有义务向《国民报》提起诉讼，因为它的指控损害了他的名誉。此外，他还准备写文章驳斥福格特。

马克思首先同布林德算账。他仍然认为布林德手里有不利于福格特的罪证，而只是由于私人情面的关系才不肯把它们拿出来，因为一个庸俗的民主派总是认为自己应该照顾另一个庸俗的民主派的。但是马克思在这方面显然是弄错了，而恩格斯则比较正确；恩格斯认为，布林德是出于幼稚而愚蠢的妄自尊大才任意编造了关于福格特想进行收买的各项细节的；当事情闹糟了的时候，他就

打了退堂鼓，可是已經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泥坑。2月4日馬克思給《Free Press》（《自由新聞》）的主編寫了一封英文的公開信^①。在這封信里他說布林德、維埃和霍林格爾關於那篇匿名文章不是霍林格爾的印刷所承印的聲明是一個卑鄙的謊言，因而卡爾·布林德是一個卑鄙的說謊者。馬克思說，如果布林德認為這一指控對自己是個侮辱，他可以向英國的法庭去控告他馬克思。可是布林德却明智地沒有到法庭去控告，而是試圖從這整個事件中擺脫出來。於是他就《總匯報》上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聲明，猛烈地攻擊福格特，並且用暗示的口吻提到福格特賣身投靠的事情，不過他依舊矢口否認文章是他寫的。

但馬克思對這一點却完全不能滿足。他還在調解法庭上對排字工人維埃提起了訴訟，並且使維埃在發誓後作了供述。維埃這一次承認，他在霍林格爾的印刷所曾親自為這篇文章排版以便在《人民報》上轉載，並且看到布林德在校樣上親手改正的許多誤植。隨後他又說，他先前所以作出相反的供述，是因為受到了霍林格爾和布林德的利誘：霍林格爾曾答應給他金錢報酬，而布林德則保證將來酬謝他。根據英國的法律，這一供述確定了布林德應當受審，而厄內斯特·瓊斯則表示準備根據維埃的這一供述而設法弄到一份逮捕布林德的命令。但是他又說，一旦提起訴訟，就無法再把它撤回，因為問題涉及的是刑事犯罪，而如果在提起訴訟之後又試圖將此案和平了結，那末作為律師，他本人是要負刑事責任的。

但是馬克思考慮到布林德的家庭而不願做得太過分。他把維埃的供詞送給了同布林德友好的路易·勃朗，並且寫信告訴他說，

^① 參閱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352頁。

如果事情到了必須对布林德提起刑事訴訟的地步，那末他会感到非常遺憾，但并不是为了罪有应得的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了布林德的一家^①。这封信起了它应起的作用：1860年2月15日，在也曾轉載过《国民报》上的謾罵的《Daily Telegraph》〔《每日電訊》〕上出現了一則声明，在这一声明里，經常同布林德一家来往的一个名叫沙伊勃勒的人自称是攻击福格特的文章的作者。尽管这显然是一种手法，馬克思却对这种手法感到滿意，因为这样一来，他对文章的内容便无须負任何責任了。

在开始攻击福格特本人之前，馬克思試圖同弗萊里格拉特取得和解。他把自己在《Free Press》〔《自由新聞》〕上发表的反駁布林德的声明和維埃的供詞寄給了弗萊里格拉特，但是沒有得到他的答复。于是他就最后一次写信給弗萊里格拉特，告訴他福格特的案件对于保护党的历史和党今后在德国的地位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他极力消除弗萊里格拉特对他可能抱有的不滿情緒：“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了你的地方，那末任何时候我都准备承认自己的錯誤。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②馬克思写道，他非常清楚，对处于当前情况下的弗萊里格拉特來說，这一事件只能引起他的反感，但是弗萊里格拉特应当懂得，他是不能完全袖手旁观的。“如果我們两个人都認識到，我們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放棄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純正的动机出发，在許多年中間打起‘最劳苦最貧困的階級’（Classe la plus laborieuse et la plus misérable）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們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誤会的小事情而分手，我认为我們就是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25頁。

② 同上书，第297頁。

历史犯下了不应犯下的罪过。”^① 馬克思在这封信的結尾处表示了真誠的友誼。

314 弗萊里格拉特握了伸向他的手，但是沒有“冷漠无情的”馬克思向他伸手时所表示的那种热情。他回答說，他根本不打算背叛他一向对之忠誠的“最劳苦最貧困的階級”，同时希望像同朋友和同志一样同馬克思保持个人的联系。不过他接着又說：“在这七年中間（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来），我远离了党。我沒有参加过它的會議，也一直沒有过問过它的決議和活动。因此，我同党的关系实际上早已断絕了。我們在这方面从来沒有互相欺騙过。这是我們之間的一种默契。我所能說的只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沒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我的本性以及对任何詩人的本性來說，必不可缺的是自由！党也是一只籠子，而且即使是为党歌唱，自由地歌唱也比在籠子里歌唱更好。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新萊茵报》編輯之前很久，我就是无产階級的和革命的詩人了。而今后，我只願站在自己的腿上，只屬于自己并自己支配自己。”^② 弗萊里格拉特的这一表白清楚地說明了他历来对政治鼓动的日常具体工作的反感。因此，他甚至好像看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東西：他所不曾参加的會議，他所根本不知道的決議和演說，实际上从来都不曾有過。

馬克思在回信中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再一次解釋了可能发生的其他一切誤会之后用弗萊里格拉特的一句口頭禪做开头写道：“‘不管一切的一切’³⁰⁷，我們一向喜欢的口号是‘反对庸人’(Philister über mir)，而不是‘跟着庸人跑！’(Unter dem Philister)³⁰⁸。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98頁。

② 弗萊里格拉特：《詩歌选和同馬克思的通信》，1924年俄文版，第46頁。

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說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①这些话起了和解的作用，因为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不管一切的一切”，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总是真正的同志。而这些话所以更增加了马克思的荣誉，是因为在受到福格特的卑鄙的攻击之后，马克思完全有权利期待弗莱里格拉特公开消除他同福格特的一切瓜李之嫌。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只限于同马克思恢复了友谊关系。在其余方面，他坚持站在一旁，而马克思则从那时起尽量避免把弗莱里格拉特的名字牵连到事件中去，以便使他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815

但是，由于福格特事件而在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发生的冲突，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在前一年的11月，马克思曾就他们在意大利战争问题上展开的辩论最后一次写信给拉萨尔，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信的笔调是“很粗鲁”的。因此，拉萨尔没有回答他的这封信，而马克思则认为这是由于对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在《国民报》攻击他之后，马克思当然希望在柏林有自己的人，并且请恩格斯设法同拉萨尔搞好关系，因为比起别人来，拉萨尔毕竟还是一匹“马力”。同这事相关联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即一名普鲁士的候补法官费舍尔以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的身分向马克思自我推荐，表示愿意为在德国报刊方面的任何委托效劳。当费舍尔代表马克思向拉萨尔致意时，拉萨尔甚至不愿意结识这个“无能而又无知的人物”。这个不久之后便因不幸事故而丧命的人，不管他在伦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325—326页。

行为如何，在德国他总是属于馮·科布尔格公爵的御用文人之列的，而这班文人的声名狼藉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恩格斯还未履行馬克思的委托之前，拉薩尔自己已經給馬克思写了一封信。他說自己所以长时期沉默是因为沒有時間，并且极力敦促馬克思要設法对付同福格特发生的“极其不幸的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已对社会发生强烈的影响。当然，福格特的胡說，在那些了解馬克思的人的眼里，并不能伤害馬克思。但是所有不了解馬克思的人却会相信这些話，因为整个事件相当巧妙地穿插着一些半真半假的傳說，眼光不够銳敏的人是会完全信以为真的。拉薩尔特別提出了两点。首先，馬克思本人也負有一部分責任：他竟把布林德这样一个卑鄙的撒謊者（至少后来证明是如此）的話信以为真，完全相信了他对福格特的最严厉的指責。如果馬克思手里沒有其他证据，那末他就应当在进行辯护之初首先撤回自己对福格特卖身投靠的指責。拉薩尔承认，必須有巨大的自制力才能完全公正地对待那样肆无忌惮地和不公正地进行攻击的人；但是如果馬克思不願意从一开始就使自己的辯护无效，他就应当提出证据說明自己的善意。接着，拉薩尔认为李卜克內西給《总汇报》这样反动的报纸写稿是应当受到譴責的，并預言这会引起群众的极大驚訝和对党的不滿。

316 当馬克思接到拉薩尔的信的时侯，他手里还没有福格特的书，因此还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估計。不过，对于首先应当承认福格特是誠实的这一建議，他当然是不高兴的，因为关于福格特同波拿巴相勾結的事情，除了布林德的胡說之外，他手里还有其他证据。馬克思也不能同意对李卜克內西在《总汇报》方面的活动加以严厉譴責。当然，他决不是这一报纸的友人，他在两个《萊茵报》的时期

曾对这一报纸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不过，尽管奥格斯堡的报纸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但是它却容许对外政策方面的各种不同倾向的代表都在它的篇幅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总汇报》在这方面很久以来就是德国报刊的一个例外。

马克思以十分不满的口气回答说，对他来说，《总汇报》同《人民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打算向《国民报》提起诉讼；而且他还要发表一部著作来反驳福格特，并且要在序言里声明，德国公众的意见对他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在心烦的时候顺口讲出的话，又被拉萨尔看得过分认真了。他抗议马克思竟然把庸俗民主派的《人民报》同德国“最无耻和声名狼藉的”报纸混为一谈。但他主要的是警告马克思至少在他驳斥福格特的著作发表以前，不要向《国民报》提起诉讼。在信结尾的地方他表示希望，马克思不要为他的信生气，应理解到他写这封信是出于“忠实而诚挚的友谊”。

但是拉萨尔想错了。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以最激烈的词句谈到这封信，甚至提出列维过去带到伦敦来的那些“正式的指控”来反对拉萨尔。诚然马克思曾尽力避免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并且证明说，这些“正式的指控”和关于拉萨尔的其他传闻都未能使他陷入迷误。不过传闻的性质使得拉萨尔不能承认马克思对传闻所持的保留态度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并且以相应的方式进行了报复，出色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自己在反动势力最狂狷的时期对莱茵工人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忠诚。

总之，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不同于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态度，但是拉萨尔却采取了不同于弗莱里格拉特的行动。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良心向马克思提出了忠告，而当他的忠告被拒绝的时候，他依然在行动上继续进行帮助。

(五)《福格特先生》

317 拉薩尔劝馬克思不要向普魯士法庭起訴这个警告很快就证明是正确的。馬克思通过費舍尔的斡旋而委托法律顧問官維貝尔向当地市法院提出了对《国民报》的控訴，不过他甚至沒有取得福格特在奧格斯堡地方法院所取得的成功，即使控訴得到受理。

市法院由于“罪证不足”而駁回了这一控訴，因为《国民报》本身并沒有发表侮辱性的詞句，而“只是轉述第三者的話”。誠然，上一級的法院批駁了这种无聊的蠢話，但只是表明它比前者更加愚蠢：它认为，把馬克思說成是敲詐分子和伪币制造者匪帮的“有控制力的和深謀远虑的”头目，这并不是对馬克思的侮辱。最高法院也沒有在这一荒謬的駁回理由中发现“法律上的錯誤”，这样，馬克思的控訴就在各級法院都被駁回了。

現在他只能从文字上来反駁福格特了，而他在这件工作上几乎費了整整一年時間。为了駁斥福格特对他的一切誹謗和各种无聊的捏造，他不得不同世界三大洲进行广泛的通信。直到1860年11月17日，馬克思才完成了这部題名为《福格特先生》的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唯一的一部迄今从未再版并且只有少数印本保存下来的著作。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不仅篇幅龐大——排得很密的十二印張（据馬克思自己說，按照普通的排法，这部书的篇幅还要扩大一倍），——而且現在还需要大量的注釋才能使讀者理解书里的暗示和它所涉及的一切关系。

但这样的著作是得不偿失的³⁰⁹。馬克思在进攻者的逼迫下不得不加以探討的流亡者中間的許多事件現在是理所当然地被人們

忘掉了。在讀到馬克思如何在那些甚至連他的鞋后跟的边都玷污不了的誹謗攻击面前进行辯解的时候，使人难免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部著作却可以給予喜好文学的讀者以极大的享受。在該书的第一頁上，馬克思便提出了他以莎士比亚的机智詳細加以發揮的一个主题，这就是关于卡尔·福格特的原型、不朽的約翰·福斯塔夫爵士^①的主题，馬克思說这个人“在他的动物学的再生中沒有丧失任何材料”^②。但是馬克思在發揮这一主题的时候，³¹⁸却能够使人絲毫沒有单調之感；他的博古通今的学識給了他一支又一支的利箭，而他就利用这些箭以致命的准确性射中了无耻的誹謗者。

“硫磺帮”其实不过是一些无忧无虑的大学生的一个小团体，这些大学生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在1849—50年之冬曾以他們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性格迷住了日内瓦的漂亮姑娘們，并以他們的放浪不羈的行为吓坏了瑞士的庸夫俗子。但是这个团体早在十年前就已从舞台上消失了。参加过这个团体的西吉茲蒙德·波克罕（从那时以来他成了倫敦城区的一个富商）曾頗有風趣地描述过大学生們天真无邪的生活；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的第一章里就叙述了波克罕的生动描繪。而且，他还結交了波克罕这样一个忠实的朋友。一般說来，馬克思感到滿意的是，不仅是在英国的許多流亡者，而且在法国和瑞士的許多流亡者，甚至那些同他关系很淺或者他所不認識的人，例如瑞士工人运动的久經鍛炼的老战士約翰·菲力浦·貝克尔，都幫助了他。

① 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是爱說謊、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雇佣强盜兵的典型。

② 參閱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頁。

然而在这里不可能詳細叙述馬克思如何彻底揭露福格特的一切阴谋詭計和造謠中伤的細节。更重要的是馬克思所施加的那种毁灭性的反击,因为他证明,福格特的宣傳,無論就其恶毒而論,还是就其无知而論,都是对假波拿巴的口号的鸚鵡学舌。确实,在第二帝国傾覆后由国防政府所公布的推勒里宮³¹⁰的文件里,人們发现了1859年8月福格特从这位十二月的强盜的机密費中收到四万法郎酬金的收条,即使采取对福格特來說是最溫和的解釋,这笔錢也多半是通过匈牙利革命者之手交过来的。福格特同克拉普卡特別要好,并且不懂得德国民主派对波拿巴的态度不同于匈牙利民主派对波拿巴的态度。在前者看来是可耻叛变的東西,对后者來說却是可以容許的。

但是不管福格特的阴谋的动机如何,并且即使他并没有从推勒里宮領取过現款,馬克思依然用最有說服力的和无可反駁的證據证明,福格特的宣傳完全是按照波拿巴的口号进行的。这些章特別透彻地說明了当时欧洲的情况,并且是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在今天,它們依然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当时对馬克思与其說是友好,无宁說是抱有敌意的洛塔尔·布赫尔,在这书出版时就把这
319 些章称为現代历史的提綱。而拉薩尔則以他所固有的正直和真誠承认,他現在认为馬克思断定福格特卖身投靠是完全有理由的,是十分自然的。拉薩尔欢迎这部书,认为是“在一切方面都十分出色的作品”。拉薩尔承认,馬克思以“大量的論据”发展了“內在的证明”。恩格斯认为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甚至比《雾月十八日》更为出色,說这部书文字簡炼得多而內容則同样精彩,并說这书一般說來是馬克思的一切論战著作中最好的一部著作。虽然如此,从历史上来看,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并未成为他的論战著作中最重要

的一部；当《雾月十八日》和他的反駁蒲魯东的論战著作的地位日益突出的时候，这部书却日益消失在阴影之中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它的内容，因为整个福格特事件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插曲；而部分地则在于馬克思本身，在于他的巨大的才能和微小的弱点。

尽管他的主要任务正是在于彻底粉碎庸夫俗子的偏見，然而他的賦性却使他不能把論战的水平降低到可以使庸夫俗子信服的程度。馬克思夫人在信里有些天真然而确切地說，他的书只是說服了“所有的重要人物”^①；換句話說，为这部书所說服的人，正是根本无需对之证明下述一点的人，即馬克思并不是福格特想把他描写成的强盜。而且这些人还有足够的趣味和智力来欣赏这部书的文学价值。馬克思夫人写道：“甚至卢格这个老对头也称它为‘有趣的作品’”^②。可是对于国内的俗物來說，馬克思的书却是很难理解的，而且这部书几乎不曾进入他們的圈子。甚至在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时期，像班貝尔格尔和特萊契克这样一些自命不凡的作家还把福格特所說的“硫磺帮”搬出来作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证据。

此外，馬克思还遇到了他在私人的一切实际事物中通常会遇到的挫折，不过至少在这一次他自己不是沒有过错的。恩格斯主張关于福格特的这部书在德国印刷和发行，这在当时的出版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拉薩尔也这样建議过。不过他的着眼点只是这样做可以节省一点錢，而恩格斯則提出了更有份量的理由：“出版流亡者的著作，我們已經有过成百次的經驗，永远是同样的毫无

① 參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頁。

② 同上。

320 結果：永遠是把金錢和勞動拋到污水坑里去，而且還要嘔氣……如果沒有人能看到這部書，那末答复福格特對我們又有什麼用呢？”^①但是馬克思却堅持把刊印該書的事情交給倫敦的一個年輕的德國出版家，條件是雙方同樣分享利潤和分擔損失，同時還要預付印刷費二十五英鎊。波克罕和拉薩爾參加了這件事；前者拿出了十二英鎊，後者拿出了八英鎊。但是這家新出版社是很不穩固的：它不僅沒有設法把書送到德國去，而且很快地就倒閉了。馬克思墊付的款項一文錢也沒有收回，而且由於一個出版人向他提起了訴訟，他還不得不付出一筆幾乎同他墊付的款項相等的錢。他沒有注意到要同出版家訂立一項書面合同，因此他就必須負擔這件事的全部開支了。

當着同福格特的爭論開始的時候，馬克思的一位朋友伊曼特寫信給他說：“我本來是不願意就這件事寫信給你的；如果你認為你可以插手到這樣一場麻煩里面去，我是會感到非常吃驚的。”俄國的和匈牙利的流亡者也對馬克思作了完全相同的勸告。現在看來，應當遺憾的倒是馬克思不曾聽從他們的勸告了。這樣一場十分討厭的爭吵使他得到了幾位新朋友，而主要的是重新加強了他同倫敦工人教育協會的友好聯繫，因為該協會在爭吵一開始時就十分果敢地站到他那一方面。然而整個事件對於他畢生的偉大事業來說，卻無寧是一個妨礙，而不是一種幫助；它使馬克思在時間和精力方面付出了重大的犧牲。這些犧牲不但沒有給他帶來切實的利益，反而給他帶來了家庭方面的嚴重憂慮。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593頁。

(六)家事和私事

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丈夫的馬克思夫人，由于福格特的“卑鄙攻击所造成的极大烦恼”，比馬克思本人更为痛苦。这些攻击使得她許多夜里不能成眠。她在很长一段时間里英勇地忍受了一切并且細心地誊写了付印的大量原稿，可是，工作刚一結束她就病倒了。請来的医生說她患了天花，孩子們必須立刻离开家里。

可怕的日子到来了。李卜克内西夫妇把孩子們帶到自己家里去，而馬克思和琳衛·德穆特則担負了照顾病人的任务。剧痛、失眠，对寸步不离病床的丈夫感到的万分担心，还有她那虽然神志始終清醒，但是失去了一切外部感觉的病情，这一切都使他痛苦难忍。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才多亏过去种过两次牛痘而有了轉机。当病人康复的时候，医生說这场可怕的病症还算是不幸中的幸事：馬克思夫人在好几个月中間所处的那种神經兴奋状态使得她很容易在店舖里，在公共馬車中或其他什么地方染上了病毒；可是，如果不得这场病，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就会使她得上危险的神经热或者諸如此类的其他病症。

在她刚刚复元的时候，馬克思自己就病倒了；他是由于过度的担惊害怕，由于焦虑和各种折磨而病倒的。他那慢性的肝病初次轉成急性病。医生也认为他得病的原因是精神上不断的激动。关于福格特的那部书虽然使馬克思付出了这样多的劳动，馬克思却一文錢也沒有拿到；就在这同时，《紐約每日論壇报》又把稿费降低了一半，結果債主們又把馬克思的家給包圍了。在健康恢复之后，正像馬克思夫人在給魏德迈夫人的信中所說的，馬克思决定“到他

的祖先的国土、盛产烟草和奶酪的荷兰去打劫一番”^①；他指望从自己的舅父那里多少弄到一点錢。

这封写于1861年3月11日的信充滿了明朗的幽默气氛，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燕妮·馬克思的精神力量并不比她的丈夫差。在美国的流亡生活中必然也要遭到不少困苦的魏德迈夫妇在长时期的沉默之后又写信来了。馬克思夫人立刻向这位“共历斗争、苦难和忧患的英勇而忠实的同志”^②倾吐了自己的衷腸。她写信告訴魏德迈夫人說，在一切痛苦和患难之中，“我們生活中最美好最愉快的一面”^③就是在孩子們身上感到的欢乐。十七岁的燕妮最像父亲，她“黑油油的濃发，明亮而溫柔的黑眼睛，黑黝黝的臉蛋像个克里奥洛，而又具有英国女性所特有的丰采……”^④十五岁的劳拉最像母亲：“棕色的蓬松的卷发非常美丽，永远閃爍着欢乐光芒的可爱的淡綠色的眼睛又很迷人……”^⑤。“姊妹俩都可以說是花容月貌，但是并不輕佻，我往往暗自惊奇，因为連她們的母亲当年还穿着輕盈的紗裙的时候，也沒有做到这一点。”^⑥

虽然两个大女儿給父母带来了許多欢乐，但小女儿爱琳娜（家里人叫她杜西）却仍然是他們“全家的小宝贝和寵儿”。“小孩子正是在我們可怜的亲爱的埃德加尔死去的时候生下来的。对小弟弟的疼爱，对他的温存現在都轉移給小妹妹了，大女孩們差不多是用母亲般的关怀来照顾她。天下簡直沒有比她更可爱、更像画一般

① 參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1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276頁。

③ 參閱同上書，第277頁。

④ 參閱同上書，第278頁。

⑤ 同上。

⑥ 同上。

美丽、更天真烂漫的孩子了。这个女孩子说话特别动听，也特别会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从她最好的朋友格林兄弟童话集那里学来的。我们全家朗读童话读得头昏脑胀，但是只要在《白雪公主》，《龙佩尔施蒂尔茨兴》或《蓝鬍子大王》中读漏一个字，我们就惹祸了。由于喜欢这些童话故事，小女孩除了听惯了的英语外，还学会了德语，而且说得非常清楚准确。小女孩简直是卡尔的宠儿，她的笑声和唠叨为卡尔驱散了许多忧愁。”^①接着马克思夫人又写到了家里的忠实的守护神琳衡·德穆特：“问问你的丈夫，他就会告诉你，她对我来说是多么珍贵啊。她和我们同甘共苦已经十六个年头了。”^②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在结尾处谈到了几位朋友，而作为一位真正的女性，只要这些人对她的卡尔不够忠诚，她就会比马克思本人更加严厉地谴责他们。她写道：“我不喜欢敷衍。”马克思夫人就是抱着这种态度同弗莱里格拉特一家的女眷断绝了一切关系的。

对荷兰的舅父菲力浦斯所进行的“打劫”是相当成功的。马克思从荷兰到柏林去，为的是实现拉萨尔过去多次谈起的一个计划——创办自己的党机关报。在1859年危机时期，人们特别强烈地感到必须办这样一个机关报，而由于1861年1月国王威廉即位时颁布的大赦令，出版这样的机关报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大赦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那里面有不少圈套和阴谋，然而它依然使得《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们能够返回德国。

拉萨尔在柏林“十分友好地”接待了马克思，但是这座“城市”在马克思“个人看来仍是讨厌的”。这里没有任何高明的政策，却有同警察的无聊争吵和军人同文官之间的倾轧。“柏林盛行一种傲

① 参阅《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9页。

② 同上。

慢无礼而輕浮的風气。議會受到蔑視。”^①甚至同1848年的協商派³¹¹(他們当然也并非巨人)相比,拥有西姆桑和芬克之流的普魯士下院在馬克思看来也不过是“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混合物”^②。在这班侏儒的骯髒小屋里,唯一比較出色的人物是一方面的瓦尔德克和另一方面的瓦盖納和唐·吉訶德式的馮·勃兰肯堡。然而馬克思依然觉得,他大体上感受到了自由思想的气氛,以及大多数公众对資產階級报刊的强烈不滿;各阶层的人都认为大难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认为,在秋天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先前的那些協商派,也就是被国王当作紅色共和主义者而加以畏惧的人,毫无疑问会当选,而在討論新的軍事撥款的时候,斗争将会爆发起来。因此,馬克思认为拉薩尔关于出版报纸的想法是可以考虑的。

然而对于实现这一計劃的办法,馬克思同拉薩尔的看法并不一致。拉薩尔想同馬克思一道担任主編并且同意恩格斯担任第三位主編,条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拥有比他更多的决定权,否則他就总是要处于少数地位了。这样一种把报纸从一开始就变成死嬰的、異想天开的計劃,恐怕只是拉薩尔在随便談談的时候提到的。但是这个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馬克思根本不打算让拉薩尔起主导作用。拉薩尔通过自己的那部《赫拉克利特》而在某些学者中赢得的尊敬,以及通过美酒佳肴而在寄生階級中赢得的尊敬,弄得他得意忘形,以致沒有意識到——馬克思是这样看的——他在广大群众中間的名声是不好的。“此外,还有他那一貫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辨概念’的世界中的留連(这家伙甚至梦想創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0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25頁。

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文体，以及争强好胜和轻率等等。

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作为一位编辑，拉萨尔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否则他只能使我们出丑。”^①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就是这样地提到他同拉萨尔的谈判的；他还说，为了不想使正在招待他的拉萨尔感到不快，他把他最后的回答推迟到他同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商量之后。恩格斯也同马克思一样感到有顾虑，因此拒绝了拉萨尔的建议。 324

总之，正像拉萨尔有一次若有所悟似地说的，整个计划是一个空中楼阁。普鲁士的大赦所布置下的圈套之一就是：在比较过得去的条件下允许革命年代的流亡者回国而不予追究，但是同时却根本不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因为根据普鲁士的法律，他们由于在国外居住了十年以上已经丧失了公民权。这样，今天返回祖国的流亡者，明天就可以由于某个警察头子的故意刁难而重新被放逐到国外去。对马克思来说，还有一种情况使事情复杂起来，这就是：他在革命之前几年——固然是因为受到普鲁士警察的压力，但终究是根据他自己的一项明确的声明——已经脱离了普鲁士的国籍。作为马克思的全权代表者，拉萨尔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取得普鲁士公民权。为了这个目的，拉萨尔曾去恳求柏林警察总监冯·采德里茨和“新纪元”的支柱之一内务大臣施韦林伯爵。然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采德里茨表示，马克思归化的唯一障碍，就是他的“共和主义的或至少是非王政主义的信念”，而施韦林则更加不通融。当拉萨尔劝施韦林不要继续“为政治信念而进行审讯和迫害”（施韦林曾十分尖锐地斥责自己的前任曼托伊费尔和威斯特华伦的这种做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1页。

法)的时候,施韦林冷淡地回答說:“目前至少不存在任何特殊的理由允許馬克思归化”。十分明显,普魯士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容忍馬克思这样的人立足的。从这方面來說,蒙昧主义的大臣們是正确的,施韦林伯爵如此,他的前任居韦特尔和曼托伊費尔也是如此。

馬克思离开柏林之后就到了萊茵省,在科倫訪問了自己的老朋友,在特利尔探望了高齡的母亲,她的晚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5月初,馬克思返回了倫敦。他希望他的一家能最后不再受穷,他能够完成自己的著作。在柏林,他在几經失敗之后,同《新聞报》的編輯部建立了关系。編輯部答应为他的每一篇社論付一英鎊的稿費,为他的每一篇通訊付半英鎊的稿費。看来,就是同《紐約每日論壇报》的联系也重新活跃起来。該报在发表他的文章的时候,常常指出文章的妙处。馬克思說:“这些美国佬有一种对自己的撰稿人評头論足的怪脾气。”^①《新聞报》“也对他的文章夸奖不已”。但是旧債却从来也沒有全部还清,而且由于在生病和旅行德国的时期沒有任何收入,因此“过去的糟糕情况又出現了”。馬克思在写信給恩格斯祝賀新年的时候,同时又詛咒了新年,說如果新年对他說来依然依旧,那末就让它見鬼吧。

但是1862年不仅同前一年一样,甚至比前一年更糟。《新聞报》尽管利用馬克思的文章給自己作广告,但另一方面它却比美国报纸更加吝嗇。馬克思在3月間写信給恩格斯說:“他們偏偏不刊登我的最好的文章,这对我說倒还没有什么(尽管我一直設法写得使他們能够刊登出来)。但是从財政的观点来看,使我受不了的是:他們在四五篇文章中間只刊登一篇,而且只付一篇的稿費。这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50頁。

使我甚至連文丐也不如。”^① 在这一年里，馬克思同《紐約每日論壇報》斷絕了一切关系。現在我們已无法确定这次决裂的一切細節，但毫無疑問，总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内战。

尽管这场战争因此給馬克思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但他依然以最大的热忱来欢迎它。几年之后，他在自己的主要学术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我們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騙自己。正像 18 世紀的美国独立战争为欧洲資產階級敲起了警钟一样，19 世紀的美国内战又为欧洲的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钟。”^② 我們从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可以看到，他非常关心这次战争的进程。在純軍事的細節方面，他总是願意向恩格斯請教，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軍事学方面是外行，而恩格斯在这一学科方面所发表的一切意見則直到今天不仅具有历史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例如，恩格斯曾用这样的话深刻闡明了军队和民兵的問題：“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原則建立起来并且受到共产主义教育的社会才能够充分地接近民兵制度，而且也只是逐漸地接近。”^③ 詩人所說的“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現自己。”³¹² 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虽然它原来并不是这个意思。

恩格斯在論述軍事問題时表現出来的那种出色的才能限制了他对事件的全面观察。在看到北方諸州战事进行得不順利的时候，他有时就认为它們将会遭到失敗。他在 1862 年 5 月間写道：“美国 326 佬虽然取得了种种成功，然而使我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軍事形势本身。因为軍事形势只是就它是北方所表現的那种萎靡不振和麻木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69 頁。

②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初版序，第 4 頁。

③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15 頁。

所造成的結果这一点而言，才是值得重視的。人民的革命毅力又在哪里？他們任人痛打，然后又以所受的鞭撻自豪。在整个北方何尝有絲毫征象，证明他們是在認真地做什么？在德国，甚至在最坏的时候，我也沒有見過这样的事情。恰恰相反，看来美国佬已經在為他們將使他們的國債債權人受騙上当而感到极其高兴呢。”^①因此，恩格斯在7月里认为，北方已經輸了這場战争，而在9月間則认为，“南方人，至少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爭取的是什么……”^②，所以比起萎靡不振的北方人来倒显得是英雄了。

反之，馬克思却始終堅信北方會取得勝利。他在9月的一封信里指出：“关于美国佬，我始終确信北方最后會取得勝利……”

北方人的作战方法正是一个长期以来欺騙成風的资产階級共和国所必然会采取的方法。南方是一种寡头政治，更适应于作战，特别是因为它的寡头政治是一种生产劳动全部由黑人担負，而四百万白种流氓以打劫为业的寡头政治。尽管如此，我还是願意用脑袋打賭，不管他們拥有怎樣的‘石壁’·杰克逊³¹³之类的人物，他們也是會被打敗的。”^③馬克思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預言，战争归根到底决定于交战双方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經濟条件。

这种惊人的真知灼見所以特別使我們感到驚訝，是因为就在同一封信里我們看到当时馬克思是处于何等貧困不堪的境地。我們从他給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到，他采取了一个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未能下决心采取的步驟：試图找一个文职的工作并且有希望在一家英国铁路公司謀得一个位置。但事情由于他的字迹难认而失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78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115頁。

③ 參閱同上书，第115、116頁。

敗——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烦恼。不过贫困却是日甚一日。马克思一直在生病；除去他的旧疾肝病不断复发之外，又开始加上了使他痛苦多年的痢和疖子；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新的危险：马克思夫人再度支持不住而病倒了。女儿们上学没有鞋子和衣服可穿，而当她们的女伴都为这一年的世界博览会而高兴的时候，她们却穷得唯恐有谁会到自己家里来作客。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女儿懂得双亲的处境并且感到很痛苦；她甚至背着他们打算去学演戏。

由于这样一些情况，马克思日益想实现他那考虑已久但为了女儿们的教育又不断放弃的一个想法：把自己的全部家具拿来偿付已经到法院控告他的房东，向所有其余的债主宣告破产，嘱托一家英国朋友给两个大女儿找家庭教师的工作，把琳蕙·德穆特安置到别的地方去，而他自己则同妻子和小女儿搬到专为贫民建造的简陋的小房子里去住。

恩格斯在他走这步绝路之前解救了他。1860年春天恩格斯的父亲死了，这样他就在“欧门—恩格斯”公司里担任了更高级的职务，负起重大的责任，并且有权在以后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但是美国的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公司的业务，大大地削减了他的收入。1863年1月初，他遭到了不幸的事件：玛丽·白恩士，那位和他同居了十年的爱尔兰的农家女子去世了。她的死使恩格斯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描述我现在的心情。这可怜的女孩子是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①但是马克思的信却没有表现出恩格斯所期待的那样的同情。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马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2页。

克思在生活上受到了何等殘酷的折磨。他對恩格斯女伴的死只說了几句頗為冷淡的話，接着就轉而詳細地敘述他的絕望的景況：如果他得不到一大筆錢，那末他的家業就連兩星期也維持不住了。誠然，他自己也承認，在這樣的時刻向朋友談論這一切情況真是“非常自私的”。“然而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在整個倫敦我就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衷腸，而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又得扮演一個沉默的斯多葛派的角色³¹⁴，以便同另一方面來的猛烈爆發保持均衡。”^①馬克思對恩格斯的不幸事件的“冷淡態度”使恩格斯感到不快，而恩格斯在延遲幾天之後才寫的回信里也並沒有掩蓋這一點。他手頭雖然沒有什麼大筆款項，但他依然想了一些辦法使馬克思擺脫困難。

馬克思也沒有立刻回信，但這只是為了使激動的情緒平靜下來，而不是因為堅持自己的錯誤。恰恰相反，他老老實實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只是否認對他的“冷漠無情”的指責；在這封信以及以後的一封信里，他坦率地以一種委婉的和解方式說明，為什麼他的頭腦發昏起來。馬克思夫人對於恩格斯的女伴的死也沒有講一句同情的話，而馬克思懂得，這必然會使恩格斯深為傷心。馬克思寫道：“婦女是一種奇妙的創造物，甚至那些非常聰明的婦女也是這樣。那天早上我的妻子為瑪麗和你的損失哭得這樣厲害，以致完全忘記了她自己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正是在那一天達到了頂點；到了晚上她又覺得，除去我們之外，凡是家里沒有法警和孩子的人，都是不會感到痛苦的。”^②但是，一句後悔的話便使恩格斯的心境平定了下來，他說：“和一個女人同居這樣久，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為悲慟。我感到，我僅余的一點青春已經同她一起埋葬掉了。當我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3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139頁。

接到你的信时，她还沒有下葬。应当告訴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始終盘旋于我的脑际……然而，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經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沒有随着瑪丽一道而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①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小小爭执。

恩格斯以一种“特別大胆的办法”弄到了一百英鎊，而馬克思就靠着这笔錢至少可以不搬到貧民窟去了。他就这样勉勉强强地熬过了1863年，而他的母亲就是在1863年的年底去世的。馬克思从母亲那里得到的遗产大概是不多的。只有威廉·沃尔弗把他作为主要继承人而在遺囑中給他的八、九百英鎊才使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沃尔弗在1864年5月去世，他的死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深感悲痛。他这时还不到五十五岁；他在顛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中从不爱惜自己，而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对自己的教师的天职的始終不渝的忠誠，加速了他的死亡。由于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人中間享有声望，沃尔弗在度过了流亡初期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之后，在那里的景况已經相当不錯了。而且，在去世前不久，他似乎从父亲那里承受了一笔遗产。稍后，馬克思就把自己不朽的天才著作的第一卷呈献給“我的不能忘記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勇敢的忠实的高贵的先进战士……”^②；沃尔弗对馬克思的最后一次友好的关怀大大地減輕了馬克思的困苦处境，使他得以順利地撰写自己的主要著作。

当然，馬克思并沒有永远摆脱忧虑，但是貧困却再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使人心碎了。因为恩格斯在1864年9月同欧門簽訂了一項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37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扉頁后插頁。

为期五年的合同(根据这项合同,他成了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有可能像先前那样始终一贯地,而且更加慷慨地在馬克思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了。

(七)拉薩尔的鼓动

1862年7月,也就是在馬克思最困苦的时候,拉薩尔到倫敦来回訪他。

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說:“……为了对这个人保持一定的礼节,我的妻子不得不把所有能够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去送进了当鋪”^①。拉薩尔完全不知道馬克思的經濟情况困难到这种地步;他把馬克思和他的妻子招待他的那种表面排場信以为真。忠誠的管家海倫·德穆特忘不掉这位客人的好胃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极为尷尬的局面”,如果說随着一向不是过分謙虛的拉薩尔的出現,馬克思产生了席勒有一次談到歌德时的那种感情——这个人多么輕易地取得了一切,而我又得多么費力地为取得这一切而战斗!——的話,这是不能怪馬克思的。

直到在倫敦住了几个星期之后告别的时候,拉薩尔才似乎弄清楚了情况。他表示可以帮忙,并且願意在新年之前寄来十五英鎊。此外,他还答应馬克思可以开一張期票給他向他借任何数目的款項,只要恩格斯或别的什么人能够担保。在波克罕的帮助下,馬克思試圖通过这样的办法借四百塔勒,但是拉薩尔又在回信里提出了借款的条件:“为了防止一切不能預見的情况,不論当事人

^①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94頁。

活着或者死亡”，恩格斯要提出书面凭证，保证在期票到期之前八天把应该兑付期票的款项交给拉薩尔。当然，馬克思对于拉薩尔不信任他本人的诺言感到不愉快，但是恩格斯却劝他不要为“这种小事情”激动，并立刻提供了对方要求的保证。

这件金錢方面的事情后来情况如何就不完全清楚了。10月29日馬克思写信給恩格斯說，拉薩尔对他“十分恼怒”，并要求把 330 应该兑付期票的錢直接送給他本人，因为他沒有同他往来的銀行。11月4日馬克思写道，弗萊里格拉特表示願意付給拉薩尔那四百塔勒。第二天恩格斯回信說，“明天”他要寄給弗萊里格拉特六十英鎊。但同时两个人又都談到了期票的“續期”問題，而看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至少在1864年4月24日，拉薩尔曾向第三者說，他大約有两年光景沒有同馬克思通过信，因为他們之間由于“錢財的事”鬧得很僵。1862年年底，拉薩尔确实最后一次写信給馬克思，把自己的一部題名为《現在怎么办？》的小册子寄給他。这封信沒有保存下来，但是馬克思在1863年1月2日給恩格斯的信里提到了这封信，說这封信曾要求送还一本书。而且6月12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里尖銳地批評了拉薩尔的宣傳活动：“从今年年初以来我无論如何也不能下定决心給这个人写信。”^①可見，馬克思同拉薩尔断絕书信往来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

拉薩尔和馬克思二人的主張实质上仍然可能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两种主張也許是相得益彰的。他們最后一次会面时所處的那种极不愉快的境况，很可能大大地促进他們的政治分歧尖銳化。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65頁。

而這些分歧在馬克思訪問柏林之後至少也沒有緩和。

1861年秋天，拉薩爾曾旅行瑞士和意大利，在蘇黎世認識了呂斯托，在喀普里島認識了加里波第；在倫敦他又訪問了馬志尼。看來，他對於意大利行動黨的有些異想天開的、因而從來不曾實現的計劃是感到興趣的。根據這一計劃，加里波第將率領自己的義勇軍在達爾瑪齊亞登陸並從那里發動匈牙利的起義。拉薩爾本人關於這事沒有留下任何書面材料；可能這一切都只是一時的想。無論如何，這時拉薩爾的腦子里正在考慮着另一些計劃，而且還在他到達倫敦之前便已開始將這些計劃付諸實行；為了這一目的作了兩次報告。

對他來說，遠比一切意大利事件更加重要的是使馬克思也能協助促成他的這些計劃。但是馬克思比一年前却變得更加不容易接近了。在報酬優厚的條件下，他願意擔任拉薩爾仍打算辦的
331 報紙的駐英通訊員，但是卻不願意負任何責任或是從政治上參加拉薩爾的事業，因為除了某些遙遠的終極的目的之外，馬克思在任何一點上都不同意他的看法。馬克思對於拉薩爾向他提出的、在工人中間進行鼓動的計劃也同樣抱着否定態度。他發現拉薩爾過於順应当前條件的影響，並且想把他反對舒爾采-德里奇之流的小人物的鬥爭變為自己的鼓動中心，也就是說，提出“國家的幫助”來反對“自助”³¹⁵。在馬克思看來，拉薩爾用這種做法恢復了天主教社會主義者畢舍在40年代反對法國的真正工人運動時曾經利用過的一個口號。拉薩爾重新提出了憲章派的普遍選舉權的口號，卻沒有看到德國的條件和英國的條件有所不同，也沒有看到第二帝國在這種選舉權方面的教訓。拉薩爾否認同德國先前的運動有任何自然聯繫，這樣就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蒲魯東的錯誤；他

不在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求现实的基础，而是按照某个教条主义的药方硬给这个运动规定了某种发展道路。

但是，这一切批评并没有吓倒拉萨尔，他从1863年春天起确实是把自己的鼓动作为纯粹的工人的鼓动继续进行下去的。他甚至没有放弃终于说服马克思，使他认识到这一事业的正当性的希望，因为就是在他同马克思中断书信往来之后，他还是按时把自己的鼓动著作寄给马克思。不过马克思对这些著作的态度却是拉萨尔所料想不到的。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马克思十分尖锐地批评了这些著作，有时甚至达到极端苛刻不公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不想详述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因为读者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中看到它们。只说一点就够了：马克思把拉萨尔的这些给几十万德国工人指出了走向新生活的道路的著作斥为预备班学生的剽窃。对于他读过的拉萨尔的那些著作，他的评价就是这样，而对于他没有读过的那些著作，他就称之为学生的作业，即使为了消遣也是值不得一读的。

只有浅薄无聊的伪善者才会在这件事情上愚蠢地推托说，作为拉萨尔的老师马克思有权利这样谈论他。马克思不是超人，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人所固有的他无不具有。不加思考地人云亦云，这正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在他看来，纠正他对别人的不公正和纠正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同样是对他的一种尊敬。对于他对待拉萨尔的态度所作的有根有据的和公正不倚的批评，较之那些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经典，并且，用莱辛的比喻说 332 法，在他所开拓的道路上捧着他的拖鞋毕恭毕敬地跟着走的人们的模仿，可以使马克思获得更大的好处。

马克思既是拉萨尔的老师，又不是拉萨尔的老师。从某种观

点来看,关于拉薩尔,馬克思可以用傳說黑格尔在臨終前談到自己的学生时用过的話來說:“我的学生当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可惜的是,就連这个人也理解得不正确。”³¹⁶毫無疑問,拉薩尔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追隨者当中是最有天才的一个,然而他却从来不曾充分地掌握他們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他从来不曾擺脫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概念”,而且尽管他理解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总是用資产階級时代所特有的唯心主义的思維形式,用哲学和法学的思維形式来理解这一斗争。

因此,作为一个經濟学家,拉薩尔根本不能同馬克思相比,他并不曾充分掌握馬克思的經濟观点,甚至完全錯誤地理解了馬克思的經濟观点。馬克思本人就責备他这一点,責备的口吻有时是过分溫和的,但在更多的場合下又是过分尖銳的。在拉薩尔闡述馬克思的价值学說的著作中,馬克思发现的只是“很大的誤解”,其实,如果說拉薩尔完全不理解这一学說那倒是更接近真实情况的。他只从这一学說中吸收了符合于他的哲学—法学世界观的东西,即这样一个证明:形成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時間使得社会生产成为必要的,以便保证工人得到自己的劳动的全部收入。但是在馬克思看来,他自己所闡明的价值学說是解答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难解之謎的謎底。它是一条綫索,人們可以根据这条綫索探究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形成这一必然会使資本主义社会轉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过程。拉薩尔沒有看到創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創造交換价值的劳动之間的差別。他沒有看到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而这种二重性在馬克思看来乃是理解全部政治經濟学的基石。在这决定性的一点上,也表現出了拉薩尔和馬克思之間存在着的最深刻的分歧,也就是对于社会現象的哲学—法学

的观点和經濟唯物主义的观点之間的分歧。

在其他經濟問題上，馬克思对拉薩尔的弱点也进行了过分尖銳的批評。例如，他特別尖銳地批評了拉薩尔的鼓动的基本經濟論点，即他所說的工資“铁”律³¹⁷和由国家貸款的生产合作社。馬克思³³³认为，拉薩尔的工資“铁”律是从英国經濟学家馬尔薩斯和李嘉图那里抄来的，而生产合作社則是从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毕舍那里抄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二者都是拉薩尔从《共产党宣言》中得来的。

馬尔薩斯硬說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要超过食物增长的速度，而李嘉图便从他的这种人口理論引伸出一条規律，根据这一規律，平均工資要被限制在习惯上为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所必不可缺的最低限度生活資料的水平上。拉薩尔从来不用所謂自然規律来这样地論证工資規律。他同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也是坚决反对馬尔薩斯的人口理論的。只是对資本主义社会來說，只有“在当前的条件下，在劳动的供求占統治地位的情况下”^①，他才着重指出工資規律的“铁的”性质。在这一点上，拉薩尔是跟着《共产党宣言》走的。

直到拉薩尔去世三年以后，馬克思才用工資規律在資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形成时的方式证明了工資規律的彈性。他指出說，資本对增殖价值的需要是这一規律的作用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在不致慢慢餓死的条件下所能忍受的貧困程度則是其作用的最低限度。在这两个限度中間，决定工資高低的不是人口的自然变动，而是工人对資本家經常想从他們的劳动力中榨取尽可能多无偿劳动的傾向所进行的抵抗。因此工人階級的工会組織对无

^① 《現代史文件与資料》，1934年俄文第2版，第2分册，第92頁。

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就有了和拉萨尔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在这一点上，拉萨尔在经济理论的理解方面只不过是落后于马克思，那末就他的生产合作社而论，他就陷入了完全的误解。他并不是从毕舍那里抄来这种东西，也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万应的灵药，而是把它们看成是生产社会化的一个开始。《共产党宣言》曾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谈到过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和设置国营工厂的问题。但是《共产党宣言》只是在其他许多措施中间提到这两个措施。这一切措施被认为“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①。拉萨尔则认为自己的生产合作社是“有机的芥种，这个种子不可遏制地要求向前发展并且从本身向外扩展”。拉萨尔的这些话毫无疑问地表明他是受到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感染”，因为他认为有可能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排除商品生产的规律。

拉萨尔的经济观点的薄弱的方面，——我们只指出了主要的几点，——当然会使马克思感到遗憾。他早已说清楚了的东西再一次被搞得含混不清了。这一点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某些尖锐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马克思完全有理由感到遗憾，他却没有看到，拉萨尔虽然在理论上有各种失误，但实质上却是在执行着他的政策。马克思本人一向劝告别人参加当时运动的最左翼，以便推动运动前进，而且在1848年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拉萨尔所受的“当前条件”的影响并不比在革命年代中的马克思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90页。

人所受到的更大。而当馬克思断言，作为宗派的創始者的拉薩尔否定了同先前的运动的任何自然联系的时候，这只有从这一方面來說才是正确的，即拉薩尔在自己的鼓动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然而就是在几百期的《新莱茵报》上，要想寻找提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的地方，也同样是徒劳的。

在馬克思和拉薩尔去世之后，恩格斯誠然只是間接地，然而却是更加坚决地为拉薩尔的策略进行了辯解。1886和1887年間，当一个有着非常混乱的綱領的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³¹⁸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时候，恩格斯写信給自己的老朋友左尔格說：“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驟，始終是把工人組織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組織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①如果这个政党所提出的第一个綱領在开头时是混乱的并且是有很多缺点的，这乃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暫时的缺点。他还以同样的意思写信給在美国的其他党内同志。他对他們說，馬克思主义的学說不是独一无二的济世救人的教条，而是对历史的必然发展过程的說明。不应当把人們目前还不能理解，但不久就 335 能学会的那些事物强加到他們头上，从而使最初的行动变得更加混乱。

同时恩格斯还引证了他和馬克思在革命年代中所提供的一个范例。“当我們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們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使工人阶级听到我們的声音的一种手段。我們是該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②而正像《新莱茵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頁。

② 同上书，第443頁。

報》曾对《共产党宣言》保持緘默一样，恩格斯也警告人們不要在美国的运动中把它提出来。恩格斯說，这个《宣言》同馬克思和他所写的几乎所有的小著作一样，对于美国还是过分难于理解的。美国工人刚刚参加运动，他們的鍛炼还很差，而在理論方面特別落后：“必須直接依靠实践，为此就需要有一套完全新的著作……一旦那里的人們多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宣言》立刻就会发生自己的作用。目前它只能对少数人发生影响。”^①左尔格反駁說，《宣言》发表时他还是个孩子，但是也受到深刻的影响。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要知道，四十年前你們就已經是有着德国理論头脑的德国人了，因此那时《宣言》对你們发生了影响，可是，它虽曾被譯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②1863年，經過多年的沉重压迫之后，这种理論修养在德国工人階級中間已經所余无几了，他們也需要长期教育才能重新理解《宣言》。

拉薩尔的鼓动之所以是无可非議的，正是因为恩格斯經常地并完全正确地引用馬克思的話，来断定鼓动是工人运动开始阶段的“主要的事情”。如果說拉薩尔作为經濟学家远远不如馬克思，那末作为革命者，他却同馬克思并列而无愧，除非我們以下述一点来指責拉薩尔，說在他身上，革命精力的猛烈冲动压倒了在科学研究方面坚持不懈的耐性。除去《赫拉克利特》一书这个例外，他的所有著作都是以直接的实际效果为目的的。

这样看来，拉薩尔是把自己的鼓动建立在階級斗争的广泛而又巩固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他的始終不渝的目的是使工人階級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626頁。

② 同上书，第637頁。

取到政权。他决不是像馬克思所指責的那樣，为这一运动开了一些一成不变的药方，而是把这一运动同那些本身已經在德國工人中間引起了某种运动的“现实要素”即普遍选举权和合作社問題联系起来。拉薩尔把普遍选举权看成是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杠杆，他的这种看法較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要正确得多，至少在当时是如此。至于他那由国家貸款的生产合作社，不管它們引起了怎样的責难，它們的基础却是这样一种正确的思想——用几年之后馬克思的原話來說——：“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須在全国范圍内发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国家財力。”^①拉薩尔的信徒对他的过分崇拜使他成了一个“宗派的創始者”（这只是表面上如此），但这种情况無論如何不能首先直接归咎于他本人。拉薩尔曾非常努力地要使“那些蠢材不把整个运动看成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不仅想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爭取过来参加他的鼓动，而且还想把布赫尔、洛貝尔图斯和另外几个人爭取过来。而由于他未能把在才力上和他相当的同伴拉进来参加他的事业，因此十分自然，工人們的感激心情有时就有了个人迷信这种无聊的形式。不过，拉薩尔当然也不是一个不好表現的人物。对馬克思來說，一切个人的东西在事业面前都退居次要的地位，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拉薩尔那里是沒有的。

我們还应当注意到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即自由資产階級同普魯士政府之間的表面上頗为激烈的斗争。从历史上来看，这一斗争正是拉薩尔的鼓动的出发点。从1859年起，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密切注視德國的事态，但是，从他們的通信可以看到，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61頁。

在 1866 年之前，他們并未同德国事物发生实际的接触。尽管在革命年代里他們已經取得了經驗，但是他們依然认为資產階級革命，甚至軍事革命，是可能的。他們过高估計了德国資產階級，同样地，他們对大普魯士政策却估計不足。他們不能忘却自己青年时代的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們的萊茵故乡自豪地意識到自己的先进文化，从而瞧不起旧普魯士的世襲領地的地区。后来，他們的主要注意力越是轉向沙皇建立世界霸权的計劃，他們就越是把普魯士看成至多是俄罗斯的一个省份。他們傾向于把俾斯麦看成只是“俄国的一个工具（即“推勒里宮中的那个神秘人物”）的工具”，关于这个神秘人物，他們在 1859 年就說，他只不过是在按照俄国外交的笛子跳舞而已。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大普魯士政策尽管有它的其他一切缺点，却可以引起对巴黎以及对彼得堡來說都同样会是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但是既然他們认为，德国还可能发生資產階級革命，那末拉薩尔的策略在他們看来自然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了。而如果他們判断得正确的話，那末任何人都不会比拉薩尔更乐于同意他們的看法了。

拉薩尔更接近德国的现实情况，因而也就能对它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他的出发点正是这样一点（而就这一点來說他是正确的）：“即使等上多少世紀，甚至等上地质学上的多少紀”，进步資產階級的庸俗运动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但是，如果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可能，則按照拉薩尔的預見，德国全国的統一这时一般說来既然还是可能的，那末这种統一就要通过王朝变革来实现了；而按照他的意見，新的工人政党应当在这一变革中起开路先鋒的作用。当然，当他在同俾斯麦的談判中想把大普魯士政策引上危險的道路的时候，他的这种做法虽然的确还不曾違反原則的要求，但是已經

違反政治策略的要求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點上可以正當地對他進行指責，並且事實上也指責了他。

在1863年和1864年，他們同拉薩爾分裂的實際原因，在本質上也同在1859年一樣，那就是“對於實際的前提的相反的判斷”。這就消除了這樣一種表面的看法，彷彿決裂的原因在於這些年里馬克思對拉薩爾的尖銳批評所造成的私人仇怨。拉薩爾的名字雖然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上將永遠同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字樣並列，但馬克思仍然始終未能完全克服自己對拉薩爾的偏見。甚至死亡的和解力量都不曾長期緩和馬克思對拉薩爾的態度。

馬克思從弗萊里格拉特那里得悉了拉薩爾逝世的消息，並在9月3日把這個消息用電報通知了恩格斯。恩格斯在第二天的回信里說：“你可以想像這個消息使我震動到什麼程度。且不論拉薩爾作為一個人、作為作家、作為學者究竟怎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無疑是德國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對於我們來說，目前他是一個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將來是一個相當肯定的敵人，然而當你看到德國如何把激進政黨的所有比較有才干的人都毀掉的時候，仍然是會感到非常痛心的。目前工廠主和進步黨的那些狗才將會多么³³⁸高興，要知道，在德國本國，拉薩爾是他們所害怕的唯一人物。”^①

馬克思沒有立刻回答他的信，到了9月7日他才寫信說：“拉薩爾的不幸遭遇使我在這些日子裡一直感到痛苦。他畢竟是老一輩近衛軍中的一個，並且是我們敵人的敵人……儘管如此，使我感到痛苦的是，近年來我們的關係不好——當然，責任是在他的一面。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十分安慰的是，我不會受到來自各个方面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3卷，第215頁。

的挑撥的影响,在他的‘得意年代’一次也沒有攻击过他。

最糟糕的是,我們这一伙人数变得越来越少了,可是又沒有新人增加进来。”^①馬克思給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写了一封慰問信:“他年紀輕輕的就像阿齐里斯³¹⁹一样在战斗中輝煌地倒下去了。”^②不久以后,当空談家布林德想用打击拉薩尔的办法来抬高自己身价的时候,馬克思就毫不留情地痛斥了他:“我决不想把像拉薩尔这样一个人物的意义和他的鼓动的真正用意解釋給这个除去自己的影子之外一无所有的怪誕小丑。相反地,我深信,卡尔·布林德踢这头死獅子只不过是按照他的本性和伊索所賦予他的使命³²⁰行事而已。”^③又过了几年,馬克思在写給施韦澤的一封信里肯定了“拉薩尔的不朽功績”,說拉薩尔尽管在进行鼓动时犯了“严重錯誤”,却把德国的工人运动从十五年的沉睡中重新喚醒。


但是后来又到来了这样一个时候,这时馬克思对死后的拉薩尔比对生前的拉薩尔批評得更加严厉,也更加不公平了。这就給人留下了一种不快之感,而且只有在具有这样一种崇高思想——甚至最有才智的人物都无法彻底处理浩大复杂的現代工人运动——时,这种不快之感才能消除。



①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217—218 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5 卷,第 419 頁。

③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27 頁。



第十一章 国际的創始

(一) 成立

1864年9月28日，拉薩尔死后几个星期，在倫敦圣馬丁大厅³³⁹的一次大会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它不是一个人的創造物，不是“头大身小”的空头組織，不是亡命的密謀者的帮伙；它既不是虛无縹緲的幽灵，也不是一个怪物，像資本家的御用文人所一再昧着良心臆造的那樣。它无宁是无产階級解放斗争的过渡形式，而按照历史的本质來說，这个形式正如它是暫時的一样，也是必然的。

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自身內部的矛盾，在創造現代国家的同时又在破坏着它。这种生产方式把民族矛盾推到极限，同时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着一切民族。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民族矛盾是不能解决的，而要建立資產階級革命所大肆宣揚和吹噓的那种民族和睦的一切尝试，都在碰到这个矛盾时……破产了。大工业虽然侈談民族間的自由与和平，但正是它把全世界变成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过的火药营。

但是随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失，它的内部矛盾也将消失。当然，无产階級的解放斗争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而由于資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在民族范围内实现的，所以各国无产階級首先

要同本国的資產階級发生冲突。但是，无产階級并没有陷入那种将使資產階級关于国际自由和平的一切梦想迅速彻底幻灭的无情竞争。工人一旦認識到，——工人的階級意識一旦觉醒也就会立即
840 認識到，——他們必須消除自己队伍内部的竞争，以便能够胜利地抵抗資本的优势力量，那末再进一步他們就可以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認識：必須把各国工人階級之間的竞争也同时消除，必須同心协力来摧毁資產階級的国际統治。

因此，国际主义傾向很早就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在利令智昏的資產階級看来是所謂不爱国、沒有教养和缺乏理解力的那种东西，恰恰是无产階級解放斗争的必要条件。虽然这个斗争应该并且能够解决民族傾向和国际傾向（資產階級是要永远在这两种傾向之間疲于奔命的）之間的冲突，但是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毕竟沒有也不可能有一支魔棍，能够把艰难險阻的棧道轉眼間化为坦途。现代工人階級必須在历史发展为他們准备好的条件下进行斗争；这些条件不是单靠猛烈的冲击就能突破的，而只有按照黑格尔所說的“理解便是克服”这句话的精神去理解了它們，然后才能克服它們。

但是，这样的理解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极其困难。这就是，立刻就显示出国际傾向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开始，往往是和大民族国家的建立恰恰同时发生并且互相交錯着的，而这种情况正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結果。在《共产党宣言》宣告一切文明国家无产階級的联合是无产階級解放的必要条件之后几个星期，便爆发了 1848 年革命。这个革命在英国和法国使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作为敌对的力量直接对垒起来，但在德国和意大利則只是引起了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当然，无产階級当时已經积极地表

現出自己的力量，因而它完全正確地認識到，雖然爭取獨立的鬥爭根本不是它的終極目的，却畢竟是達到這個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正是無產階級為德國和意大利的民族運動提供了最英勇的戰士，而且這個運動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得到過像《共產黨宣言》作者出版的《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萊茵報》〕所給予它的那種有力支持。但是，民族鬥爭自然要把國際主義思想推到後面，特別是在德國和意大利的資產階級開始求助於反動的刺刀之後。在意大利，工人互助團體開始在馬志尼的旗幟下組織起來；這個旗幟決不是社會主義的，但至少是共和主義的³²¹。而在較為發達的德國，從魏特林時代起工人們就已認識到自己事業的國際共同性，但正是由於民族問題，產生了將近十年的閹割之爭³²²。

法國和英國的情況則不同，因為這兩個國家在工人運動興起時，國家的統一早就確立了。早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時期，國際主義思想便已盛行於這兩個國家；巴黎被認為是歐洲革命的首都，而倫敦則是世界市場的中心。但就是在這兩個地方，在無產階級失敗以後，國際主義思潮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挫折。

六月戰鬥的可怕的流血耗去了法國工人階級的力量，而波拿巴專制的鐵腕則扼制了工人階級工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發展。三月革命前的宗派主義舊態復萌；在這種宗派主義的一團混亂中判然地劃分出了兩個派別，而革命的因素和社會主義的因素就在某種程度上通過這兩個派別分道揚鑣了。前一個派別匯集於布朗基周圍；布朗基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而想通過少數堅決分子的大膽奇襲奪取政權。強大得不可比擬的後一個派別處於蒲魯東的思想影響之下；蒲魯東以他的發放無息貸款的交換銀行和其他教條式的實驗，只是使無產階級脫離了政治運動。馬克思在他的

《霧月十八日》一书中談到这个派別時說，它放棄利用旧世界本身內的一切强大手段來變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圖躲在社会背後，用私人的辦法，在自身的有限生存條件的範圍內實現自身的解放。

憲章運動失敗後，在某些方面與此類似的運動也曾在英國工人階級中發生過³²³。已達垂暮之年的偉大空想主義者歐文雖然健在，但是他的學派已經退化為一種宗教的自由思想。此外還產生了金斯萊和莫利斯的基督教社會主義³²⁴。雖然這種社會主義和它的大陸上的模擬品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它也站在一切政治鬥爭之外，只限於做做教育和合作事業的普及工作。甚至先於法國而在英國產生的工聯所屬的工會，也對政治漠不關心，而只限於滿足工人的眼前的要求；50年代的狂熱的工業活動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優越地位更加促進了這一點。

342 雖然如此，英國國土上的國際工人運動是極其緩慢地逐漸沉寂下去的。直到50年代末期還可以看到它的餘輝。“民主派兄弟協會”繼續存在到克里木戰爭；甚至當這個組織最後消失的時候，又產生了國際委員會，以及後來主要由於厄內斯特·瓊斯的努力而創建的國際協會。這些組織當然沒有多大的重要性，但是畢竟表明國際主義思想並沒有完全熄滅，而還在迸發着微弱的火花，只要有陣陣烈風吹來，就很容易燃成燎原之火。

1857年的連續的商業危機，1859年的戰爭，特別是1860年後北美合眾國南北各州之間爆發的內戰，就是這樣的陣陣的烈風。1857年的商業危機使波拿巴在法國的威信第一次受到嚴重的打擊，而企圖用對外政策方面的冒險來轉移這次打擊的嘗試也遭到失敗。十二月的英雄³²⁵所招來的魂靈早就不由他來控制了。意大利的統一運動超出了他所希望的範圍，而法國的資產階級也不滿

意馬振塔和索尔費里諾之役³²⁶所取得的有名无实的胜利。于是他想到要給工人階級的活动以較大的自由，借以压制資產階級日益增长的气焰。因为第二帝国能否繼續存在，老实說就取决于他能否使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处于相互威胁之下。

当然，波拿巴考虑的不是政治方面的让步，而是工会方面的让步。在法国工人中享有較大威信的蒲魯东既是第二帝国的反对者（虽然他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奇談怪論可以使人得出相反的結論），同时又是罢工的反对者。然而正是这一点触犯了法国工人的切身利益。尽管有蒲魯东的告誡和取締結社的严厉禁令，在1853到1866年这一期間却有三千九百零九名工人因参加七百四十九个团体而受到刑事法庭的处分。模仿凱撒的波拿巴先是赦免了这些被判罪者，然后又支持把法国工人派到倫敦去参观1862年世界博覽会一举。他的作法无疑地要比德意志民族联盟同时实行的同样的“妙策”更为实际。代表是由同业工人选出的。在巴黎为一百五十种行业的工人設立了五十个选举站，总共向倫敦选送了二百名代表。費用的一部分是自願捐助的，而主要部分則是由国庫和市庫津貼，它們各自撥出二万法郎。代表們回来之后获准发表詳細的报告，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純业务的范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可算是一件国家大事，它甚至引起那个惴惴不安的巴黎警察局长的慨叹。他說，皇帝与其开这样的玩笑，不如立刻廢除結社的禁令。 343

实际上，工人并没有对他們的这位自私自利的保护人表现出他所希望的那种謝意。他們只是給了他理应得到的酬报。在巴黎的1863年选举中，政府提出的候选人只得到八万二千张选票，而反对派的候选人則得到十五万三千張选票。然而在1857年的选

舉中，政府曾得到十一萬一千張選票，而反對派只得到九萬六千張選票。一般認為，這樣的變化只有一小部分是由於資產階級的離心離德，而主要地是由於工人階級態度的改變，因為工人階級正是在假波拿巴開始向他們獻媚討好的時候，已經表現出自己的獨立性，儘管開始時還只是在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的旗幟下。這種看法為1864年巴黎補選中的這樣一個事實所證明，即有六十個工人提出了一個名叫托倫的雕版師做候選人，並且發表了預言社會主義復興的宣言。宣言中說，社會主義者當然已從過去的經驗學得了許多東西。1848年時，工人還沒有制定明確的綱領，他們信奉某一社會理論與其說基於自覺，無寧說基於本能。現在他們已經拋棄了浮夸的空想而要求社會改革。作為這樣的改革，托倫要求出版和集會自由，廢除取締結社的禁令，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並且取消宗教預算。

但是，托倫總共只得到幾百張選票。蒲魯東完全贊同宣言的思想，但是反對參加選舉，因為在他看來，投空白票是對帝國的一種更強烈的抗議。布朗基主義者認為宣言過於溫和，而具有自由色彩和激進色彩的資產階級則除了少數例外，大都嘲笑和奚落工人的獨立行動，雖然托倫的競選綱領還沒有使資產階級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這一切都和在德國同時發生的情況極為類似。受到這種情況鼓勵的波拿巴決定再進一步，1864年5月頒布的一項法律雖然還沒有廢除組織工會的禁令（禁令直到四年以後才廢除），却廢除了 Code pénal [刑法] 中禁止工人為改善勞動條件而聯合的條款。

在英國，禁止結社的法令雖然早在1825年就廢除了，但工會的存在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還毫無保障；廣大的工會會員在

政治上沒有选举权，而这种权利本来是会有助于廢除那些阻撓他們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的法律的。夺去了无数人的生計的大陆資本主义的兴起，使他們面临着危险的骯髒的競争；每当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时，資本家就威胁着要从法国、比利时、德国或其他国家輸入工人。特別使工人不安的是美国的內战。这个战争所引起的棉花恐慌，使英国紡織工业的工人遭到极深重的灾难。

于是，工会从消极的状态觉醒了。新工联主义产生了³²⁷。它的代表人物是一些最大的工会的几个有經驗的領袖。这些領袖就是：机器制造工人阿兰，木工阿普尔加斯，細木工魯克拉夫特，石工克里梅尔，鞋匠奥哲尔，等等。他們承认政治斗争对工会也是必要的，并且集中注意力于选举改革。他們是由激进派政治家布莱特担任主席的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声势浩大的集会的推动力。大会对帕麦斯顿企图偏袒南方奴隶制各州而干預美国內战的計劃掀起了猛烈的抗議。后来这些工会領袖又在1864年春加里波第訪問倫敦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

英法两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促使国际主义思想重新抬头。早在1862年世界博覽会期間，法国工人代表团和英国工人之間就曾举行过“联欢会”。两国工人的联系由于1863年的波兰起义³²⁸而更加紧密。波兰問題早就在西欧文明民族的革命分子中深受同情。对波兰的瓜分³²⁹和压迫，使得东欧三强变成一个统一的反动力量。波兰的复兴将是对俄国在欧洲的霸权的一个致命的打击。“民主派兄弟协会”便經常为1830年波兰革命紀念日举行盛大的庆祝，借以向波兰人民表示热誠的敬意，同时总是带有这样一种含³⁴⁵义，即自由民主波兰的复兴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前提。1863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倫敦的一次有法国工人代表参加的紀念波兰

的集會上，強烈地鳴響着社會的音調。這個音調也是由奧哲爾擔任主席的英國工人委員會為感謝法國工人參加紀念波蘭的集會所致賀詞的基調。賀詞指出，英國資本家用輸入外國工人的辦法強加給英國無產階級的骯髒競爭，只是因為世界各國工人階級之間缺乏有組織的聯繫才成為可能的。

這篇賀詞由比斯利教授譯成了法文。他在倫敦大學教歷史，曾為工人階級建立了許多功績。賀詞在巴黎的工廠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以致決定向倫敦派送一個代表團表示答謝。1864年9月28日，倫敦委員會在聖馬丁大廳召開了歡迎這個代表團的大會。會議是由比斯利教授主持的，大廳里擠得水泄不通。托倫宣讀的法國工人的答詞是以響應波蘭起義開頭的：“波蘭又為血迹斑斑的尸衣所覆蓋，而我們仍然是無力的旁觀者。”^①它接着要求在一切重要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上傾聽人民的聲音。必須摧毀資本的專制統治。分工把人變成機器般的工具，而如果没有工人的團結，自由貿易勢將造成一種工業上的農奴制，它要比法國大革命所推翻的農奴制更加殘酷無情。全世界的工人必須聯合起來，給這種罪惡的制度設下一道道不可克服的障礙。

埃卡留斯代表德國工人在討論中發言。經過熱烈的討論，大會根據英國工會活動家惠勒的提議決定選出一個有权自行加聘委員的委員會，並且委托它起草一個國際聯合組織的章程。這個章程的有效期截至第二年在比利時召開國際代表大會時為止，屆時代表大會將對它做出最後的決定。委員會選舉出來了；它是由許多英國工會活動家和外國工人事業的代表者組成的；其中也有德

^① 參閱阿多拉茨基等人主編的《第一國際文件集》，1934年俄文版，第12頁。

國工人的代表，他在報紙的報道中列在最後，他的名字就是卡爾·馬克思。

(二) 國際的成立宣言和章程

在這以前馬克思已經不積極參加這種活動了。法國人勒留貝³⁴⁶邀請他做德國工人的代表，並建議他從德國工人中推薦一個發言人。馬克思推薦了埃卡留斯，而自己則在出席大會時默默無言地坐在演說台上。

馬克思對自己的科學工作的意義是有足夠的估計的，他認為這種工作要比那些一開始就毫無希望的結社遊戲更為重要；但是只要什麼事情是對無產階級有益的，他就隨時準備放下自己的工作。這一次他看到了“真正的力量”的出現。他以同樣的口气寫信給魏德邁和其他朋友說：“剛剛成立的國際工人委員會……不是不重要的。它的英國委員大都是此地的工會領袖，即倫敦的真正的勞工大王；他們就是為加里波第舉行盛大歡迎會，並在聖詹姆斯大廳召開大會（布萊特擔任主席）阻止帕麥斯頓所準備的對美宣戰的那些人。委員會中的法國委員是一些不大出名的人物，但是他們都是巴黎居領導地位的‘工人’的直接代表。

委員會同最近在那不勒斯召開代表大會的意大利各團體也建立了聯繫。雖然我許多年來一直拒絕參加任何‘組織’，但是這一次却接受了建議；因為在這樣的組織里是大有可為的。”^①馬克思看到，“工人階級顯然正在復活”，並且認為自己的最高義務就是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426頁。

工人階級开拓新的道路。

万幸的是，由于种种外部的情况，思想领导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³³⁰。选出的委员会吸收一些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的机构，使得委员人数增加到将近五十人；其中一半是英国工人。代表人数次于英国的是德国，有十名委员，其中的马克思、埃卡留斯、列斯纳、罗赫纳和普芬德过去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法国⁸⁴⁷有九名代表，意大利有六名，波兰和瑞士各二名。委员会成立以后就选出了负责起草纲领和章程草案的小组委员会。

马克思也被选入这个小组委员会，但是由于生病，或者由于没有及时接到通知，他几次未能出席会议。在这中间，小组委员会的委员、马志尼的私人秘书沃尔弗少校、英国人威斯顿、法国人勒留贝虽然用了许多力量来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但是无所成就。马志尼虽然在英国工人中有很高的声望，但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工人运动太不熟悉，所以他的草案不能使有经验的英国工会活动家感到满意。他不理解并因而厌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的纲领至多只是唱一唱早就为60年代初的无产阶级所超越了的社会主义高调。他的章程草案也是过了时的精神的产物。它是按照高度集中化的政治密谋团体的传统写成的，因此它既违反英国工联的生存条件，也违反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生存条件。国际工人协会与其说应该掀起新的运动，无宁说应该把各国已经产生、但仍然处于分散状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联合起来。勒留贝和威斯顿提出的草案也同样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

因此，当马克思接手这件工作时，整个工作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他决定尽可能不留下“原案中的一行字”^①，并且为了完全不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4页。

受它們的約束，起草了一個致工人階級的宣言草案。這一點是聖馬丁大廳的集會事先完全沒有考慮的。在這個草案里，他先是回顧了1848年以來工人階級的命运，然後比較簡潔明了地敘述了章程本身。小組委員會立刻接受了他的提案，只是在序言中加進了一些有關“權利、義務、真理、道德和正義”的詞句^①。但是正如他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他成功地使加進去的這些詞句不致造成任何危害。後來，總委員會也一致熱烈地通過了宣言草案和章程。

比斯利後來有一次在談到這個成立宣言時說，它可算是对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事業的最有力、最令人信服的敘述，但是它的篇幅却只有短短的十二頁。宣言一開頭就指出了這樣一個无可爭辯 348 的事實，即工人階級的貧困程度在1848年到1864年這一期間並未減輕，雖然這一時期按工業發展和貿易增長的程度來說是史無前例的。為了證明這一點，馬克思令人信服地用英國關於無產階級貧困狀況的藍皮書上的可怕的統計材料，同財務大臣格萊斯頓炫耀英國這一時期實力和財富“令人陶醉的”增長的預算演說中的數字進行了對比。然而這種增長僅僅反映在有產階級的生活上面。宣言以英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情況為例揭露了這種驚人的矛盾，因為英國是歐洲工商業最發達的國家；但是同時它也指出，在大工業有所發展的歐洲大陸一切國家，這種矛盾儘管帶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色彩並且規模較小，但是同樣都存在着。

實力和財富的這種“令人陶醉的”增長，到處都只限于有產階級。只有少數工人，例如在英國，得到稍高的工資，而且就是這一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5頁。

点也为物价的普遍上漲抵銷了。“工人階級的广大群众总是每下愈况，这种情况至少和騎在他們头上的那些階級沿着社会阶梯的步步上升恰成反比。無論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善，新殖民地的开拓，向外的移民，市場的扩大，自由的貿易，或是这一切的总和，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貧困；在現存的这种弊竇百出的基础上，劳动所产生的任何新的发展都必然要加深社会的对立并加剧社会的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現在对每一个沒有偏見的人都已成为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用虛幻的希望来迷惑別人的人才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經濟进步时代，餓死人的現象在大英帝国首都几乎已成为社会通例。这个时代在世界編年史上的特色，就是被称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頻繁地重复发生，其規模日益扩大，其后果日益帶有致命性。”^①

349 宣言接着評述了 60 年代工人运动的失敗，指出这个时代也有它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特征。它特別強調了两件重大的事实。首先是法定的十小时工作日以及它給英国无产階級带来的有益結果。通过立法限制工时的斗争直接牵涉到一个重大的斗争，即构成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实质的供求規律的盲目統治和工人階級所主張的通过社会监督調节生产之間的斗争。“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則上的胜利；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第一次在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学面前公开投降了。”^②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 卷，第 358 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 360 頁。

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靠了合作運動，靠了少數勇敢的、沒有得到任何外力支持的人所創辦起來的合作工廠，贏得了一個更大的勝利。這些偉大的社會實驗價值，是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的。“工人們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證明：大規模的生產，並且是按照現代科學要求進行的生產，在沒有那利用僱傭工人階級勞動的僱主階級參加的條件下，也是可能實現的；他們證明，為了順利進行生產，勞動工具決不應當被壟斷起來作為統治和掠奪工人的工具；僱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應該讓位給帶着興奮愉快心情自願進行的聯合勞動。”^①但是，只限于偶然的嘗試的合作勞動還不能摧毀資本主義的壟斷。“也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那些自命清高的貴族，那些資產階級的空談慈善家，甚至那些迂腐的經濟學者，先前在合作勞動制處於萌芽狀態時，曾經費心機地想要把它鏟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罵它是社會主義者的邪說，現在却異口同聲令人作嘔地對它大肆吹捧了。”^②只有當合作勞動發展到全國的規模時，它才能拯救群眾。與此相反，土地巨頭和資本巨頭當然要 350 至死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來維護他們的經濟壟斷，使之永世長存。所以，奪取政權已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義務。

工人似乎已經理解了这个義務，因為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工人都同時覺醒，並且同時力求從政治上改組工人政黨。“工人已經具備了成功的因素之一——人數；但人數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並為知識所指導時，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③過去的經驗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360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361頁。

③ 同上。

告訴我們，忽視各國工人間应当存在的兄弟團結，忽視鼓舞他們在一切解放鬥爭中堅定地并肩作戰的兄弟團結，就會使他們的分散的努力全都遭到失敗。這種認識促使在聖馬丁大廳召開的大會創立了國際工人協會。

還有一個信念鼓舞着這次大會。工人階級的解放既然要求兄弟般的合作，那末當政府的對外政策為追求罪惡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見並在掠奪戰爭中洒流人民鮮血和浪費人民財富時，他們又怎麼能夠達到這個偉大目的？使西歐免于在大西洋彼岸進行一次可恥的十字軍征討以永遠保持和推廣奴隸制的，不是統治階級的明智，而是無產階級對他們那種罪惡的狂妄行徑所進行的英勇反抗³³¹。上層階級以無恥的贊許、假裝的同情和白痴般的冷漠態度觀望俄羅斯怎樣侵占高加索的山地要塞³³²和宰割英勇的波蘭；這就給工人階級指出一個任務：他們必須洞悉國際政治的秘密，密切注視本國政府的外交活動，以便在可能時用一切辦法來反抗它。如果不可能防止這些勾當，就應當團結起來同時舉行示威，使私人關係所應遵循的那些道德和正義的簡單準則成為約束國際關係的最高準則。為這樣一種對外政策而進行的鬥爭，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總鬥爭的一部分。和《共產黨宣言》一樣，這個宣言也是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結束的。

章程^①一開頭就列舉了一系列的理由，這些理由可以歸結為如下各點：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新的階級特權，而是要爭取消滅一切階級統治。工人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所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63—366頁。

如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此，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乃是作為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追求的偉大目的。先前為達到這一目的所做的一切努力，由於每個國家的各個工人集團之間和各個國家的工人階級之間團結不夠而總是沒有收到效果。工人的解放不是一個地方和一個民族的課題，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現代社會的國家的社會課題；它只有靠這些國家的有計劃的合作才能解決。在這些清楚明快的論述之後，緊接著的是馬克思不得已加進正文裏面的關於正義和真理、權利和義務的“說教式的”籠統詞句。

協會領導機關是由參加協會各國的工人組成的總委員會。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前，由在聖馬丁大廳選出的委員會執行總委員會的職權。它的職權就是：負責各國工人組織之間的國際聯繫，使每一國家的工人能經常知悉其他國家工人階級運動的情況，收集有關工人階級狀況的統計材料，把具有共同意義的問題提供一切工人團體討論，在發生國際衝突時組織參加協會的各團體同時和一致行動，定期公布報告，等等。總委員會由每年召開一次的代表大會選出。代表大會決定總委員會的所在地及召開下屆代表大會的時間和地點。總委員會有權增添新的委員，有權在必要時改變代表大會開會的地点，但無權延遲召開大會的時間。參加國 352
際的各國工人團體仍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組織。任何獨立的地方性團體都可不受限制地同總委員會發生直接的聯繫，但是同時也指出了總委員會順利進行工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即各國的分散的工人團體應儘可能統一為由一個中央機關來代表的全國性組織。

說總委員會是一個“偉大的頭腦”的發明是不正確的，但在它

产生的时候的确有一个偉大的头脑立即給它指出正确的道路，使它免于长期地徬徨歧途，——这对国际說来是一个幸运。馬克思所做的不过如此，而且他也不願做得更多。他所起草的宣言和章程的无比卓越之处，就在于它們完全是从当时的现实情况出发的，同时正如李卜克内西曾經中肯地指出的，它們和《共产党宣言》一样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最后結論。

但是，成立宣言和章程不同于《共产党宣言》的不仅仅是形式。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使重新兴起的运动能够再一次发出旧时的豪言壮語，还需要一些时日。目前需要的是‘内容强硬而形式温和’。”^① 宣言的任务实际上是不同的：它的目的是要把欧洲和美洲的彼此分歧很大的一切工人組織联合成为一支大軍，并且，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提出一个对英国的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魯东主义者和德国的拉薩尔派都不关門的綱領。正如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論述的，他把科学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作为工人联合行动必然結果的、工人階級的思想发展上面。

但是馬克思的希望很快就受到了严酷的考驗：他剛剛开始为国际集合力量的工作，他就不得不同最能理解国际的原則的欧洲的一个工人階級发生一場严重的冲突。

（三）同施韦澤的决裂

353 有一种由来已久但并不美妙也不真实的傳說，說德国的拉薩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227 頁。

爾派會拒絕參加國際，並一直對它抱着敵對的態度。

首先，很難理解有什麼理由會促使他們這樣做。他們的嚴格組織（自然，他們很重視這種組織）絲毫沒有受到國際的章程的損害；他們對於成立宣言也能根據自己的信念從頭到尾加以同意，特別是談到合作勞動的那一部分：只有當合作勞動發展到全國規模並得到國家資金的支持時，合作勞動才能拯救群眾。

實際上，德國的拉薩爾派从一开始就對國際完全抱着同情的態度，雖然國際成立時他們正忙於自己的內部事務。拉薩爾死後，遵照他的遺囑的推薦，伯恩哈特·貝克爾當選為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主席。但是他的無能，把事情弄得一團糟。這個聯合會於是全靠黨的機關報《Social-Demokrat》〔《社會民主黨人報》〕來維持局面，而這個報是從1864年年底起在約·巴·馮·施韋澤的思想指導下出版的。施韋澤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他極其熱心地爭取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報紙撰稿，聘請李卜克內西為編輯（雖然沒有任何強迫他這樣做），並且在他主持的報紙的第二和第三號上就刊載了成立宣言。

固然，從巴黎給《社會民主黨人報》寄送通訊的莫澤斯·赫斯，曾懷疑托倫的獨立性，說他是冒充紅色煽動家的日羅姆·波拿巴所住的巴黎皇宮中的座上賓³³³。但是施韋澤只是在得到李卜克內西的明確同意以後才發表了這封信的。當馬克思對此表示不滿時，施韋澤索性更進一步，規定今後一切有關國際的稿件都由李卜克內西親自編輯。1865年2月15日，他寫信給馬克思說，他將提出一個決議案，聲明全德工人聯合會完全同意國際的原則，並且保證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國際代表大會。聯合會所以不能在形式上加入國際，只是因為德意志聯邦的法律禁止不同團體的聯合。施韋澤

354 的这个提議沒有得到答复；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开的声明^①中拒絕給《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

从这种情况已經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同施韦澤的决裂，与有关国际的意見分歧毫不相干。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在声明中坦率地說明了造成决裂的原因。用他們的話來說，他們一刻也沒有忽略过《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也从来沒有提出过在柏林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的任何要求。但是他們几次要求該报至少要用对待进步党所用的那种同样勇敢的言詞，来对待政府和封建专制的党派。他們声明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策略，使他們不能繼續为該报撰稿。他們提醒說，他們曾在《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魯塞尔报》〕上为回答《Rheinischer Beobachter》〔《萊茵观察家》〕而談到过普魯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人政党对这种騙局的态度，因为《萊茵观察家》建議无产階級同“政府”結成“联盟”来反对“自由資产階級”³³⁴。他們甚至現在也认为这里所說的一字一句都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策略是同这种“联盟”或“普魯士政府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拉薩尔曾想用登高一呼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德国工人階級发动起来。当他的这个希望落空以后，拥有数千會員的圣德工人联合会就受到两个敌人的夹击，而其中的任一敌人都是强大得足以把它粉碎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年輕的工人政党从資产階級那里除了頑固的憎恶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从而狡猾的外交家俾斯麦那里，只要他想推行他的大普魯士政策，那末至少可以指望他对人民群众做出某些让步。施韦澤对这种让步的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88、95—98 頁，

价值和目的都未存任何幻想。但是当德国工人阶级組織几乎完全被剥夺了合法存在条件的时候，当它没有真正的选举权而出版、結社、集会的自由又听任官僚的专断的时候，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样猛烈地攻击两个敌人，那末运动就不可能向前发展。只有挑撥一个敌人去反对另一个敌人的策略才是比較正确的。只有从各方面来维护年輕的工人政党的独立性并經常使工人群众意識到这种独立性，才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必不可缺的条件。

施韦澤就极力推行这种政策，并且获得了不小的成就。要从 355 《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哪怕找到片言只字带有同政府“联盟”反对进步政党的味道，也是徒劳的。如果联系着整个的政治发展来考察一下施韦澤当时的公开活动，那是可以发现一些錯誤的（施韦澤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它的政策基本上是明智的、前后一貫的：这个政策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决不能設想这个政策是听命于俾斯麦或其他任何反动派的。

施韦澤毕竟有一点胜过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是他确切地了解普魯士的現实。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透过有色眼鏡来看这个現实，而李卜克內西又不能胜任他理应担任起来的报道者和传达者的角色。李卜克內西是应紅色共和主义者勃拉斯的邀請于1862年返回德国的；勃拉斯也是从流亡中归国，并創辦了《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北德总汇报》]。但是，李卜克內西刚一进入編輯部，就发现勃拉斯已把报纸出賣給俾斯麦的政府。李卜克內西立刻退出了該报。在德国土地上的这第一个遭遇，甚至从生活方面來說对他也是极其慘痛的，因为他又像在长年的亡命生活中一样流落街头了。但是这絲毫也沒有使他灰心丧气，因为革命事业对他說来总是高于个人利益的。然而，同勃拉斯的这段遭遇，

却妨碍了他对德国的新形势毫无成見地做出判断。

李卜克内西回到德国的时候，仍然是一个1848年式的老牌革命家，是《新莱茵报》所理解的那样的革命家，因为在該报看来，社会主义理論，甚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都仍然占次要地位，而主要的問題是人民反对腐朽阶级統治的革命斗争。李卜克内西虽然完全理解社会主义理論的基本思想，但是对于这一理論的全部学术內容却从来并不熟悉。他在长年的亡命生活中从馬克思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到处探寻革命运动的萌芽，用来判明国际政治的大局。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鄙棄易北河东岸一切事物的萊茵省人，对于普魯士国家是极其輕視的；南德人李卜克内西对普魯士的态度尤其如此，因为它在革命年代只在巴登和瑞士境內工作过，而这两个地方正是外省政治的策源地。在他的眼里，普魯士仍然是三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的附庸，它全靠卑劣的收买手段来抵抗历史的进步。他认为，只有先清除了普魯士，在德国才能談得到阶级斗争。李卜克内西沒有認識到，50年代的经济发展也改变了普魯士国家；它已具备种种条件，足以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一事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因此，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澤之間不可能长期保持意見的一致。在李卜克内西的眼里，施韦澤发表五篇关于俾斯麦內閣的文章是做得太过火了；这些文章虽然老练地把德国統一問題上的大普魯士政策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相提并論，但是却包含着一个“錯誤”，就是把莽撞的大普魯士政策描写得过分生动，以致使人觉得几乎是在頌揚这个政策。馬克思也犯了一个“錯誤”。他在2月13日給施韦澤的信^①中說，虽然甚至可以指望普魯士政府最无耻地玩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3頁。

弄生产合作社的把戏,但是决不能指望它会廢除取締結社的禁令,因为这会給官僚政治和警察統治打开一个缺口。馬克思在这里只是忘記了一点,即正如他在反駁蒲魯东时所令人信服地闡明过的,不是政府支配着經濟关系,相反地,是經濟关系支配着政府。几年以后,俾斯麦的内閣就被迫廢除了取締結社的禁令。施韦澤在2月15日的回信里——在这封信里施韦澤保证促使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并且再一次強調有关国际的一切稿件今后均由李卜克內西独立編輯,——着重指出,对馬克思可能給予他的一切理論上的教示他均乐于听从,但是要正确解决日常策略的各种实际問題,就必须站在运动的中心并熟悉全盘情况。接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跟他决裂了。

但是,这一切分歧和齟齬只有用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不幸的阴谋才能充分加以解釋。拉薩尔的这位老友当时为了紀念曾經从无穷的耻辱中拯救了她的生命的人而犯了一个重大的过錯。她想把拉薩尔創立的組織变成一种把导师的每一言詞都奉为神圣的盲从的宗派,而且甚至不是导师所实际說过的言詞,而是哈茨費尔 357
特伯爵夫人对这些言詞的解釋。从3月10日恩格斯給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她的这种胡作妄为达到了何等程度。这封信在略微談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創立之后說道:“但是,首先,这个报已經开始宣揚对拉薩尔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迷信,而我們当时便已确实知道,拉薩尔跟俾斯麦的关系要比我們所意料的远为密切 (哈茨費尔特老妇人曾經向李卜克內西談到这一点,并且要求他按照这个精神行事)。他們之間有着一种真正的联盟,这种联盟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拉薩尔不得不到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去,在那里表示贊成把这两个公国并入普魯士;而俾斯麦則含糊地約定要实行某种

普遍选举制，并且比較明确地許諾了結社权、社会性质的让步和国家支持工人合作社，等等。愚蠢的拉薩尔沒有得到俾斯麦遵守諾言的任何保证，——相反地，当他一旦变得碍事，俾斯麦就会毫不客气地把他投入監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諸公虽然明明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们却仍然越来越热心地宣揚对拉薩尔的迷信。而且，这班人还屈服于《Kreuzzeitung》〔《十字报》〕的瓦盖納的威胁，在俾斯麦面前討好献媚，等等，等等……我們已經发表了随函附寄的声明并且退出了該报，李卜克内西也跟我們一起退出了。”^①很难理解，熟識拉薩尔并常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怎么会相信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无稽之談。但是，既然他們相信了这种无稽之談，那末他們离开拉薩尔所創始的运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然而，他們的离开並沒有对这个运动发生实际的影响。甚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老盟員，例如，曾經在科倫陪審法庭上以那样的辯才維護过《共产党宣言》的原理的勒澤尔，也表示贊同施韦澤的策略。

(四) 倫敦第一次代表會議

这样，拉薩尔派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新的协会。另一方面，协会在英国工会和法国蒲魯东主义者当中征求新會員的工作，开始时也进展得极为緩慢。

只有工会的少数领导人理解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且，就是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446--447頁。

这些人似乎也只是把国际看做达到工会目的的手段。但是，这些人至少在各种組織問題方面有着許多实际經驗；法国的蒲魯东主义者則既沒有这种經驗，又对工人运动的历史本质缺乏明确的理解。新的协会面临的任務是极其巨大的，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務，必須有巨大的耐心和頑强的努力。

馬克思当时虽然常为病魔纏扰，并渴望使自己的主要学术著作尽速告一段落，但是仍然表现了高度的耐心和毅力。有一次他叹息說：“搞这种鼓动工作，最糟的就是一参加它就得占去很多時間。”^①他还說，国际以及与国际有关的一切事務，像“恶梦”^②一样压在他的身上，而如能摆脱这个重担，他就会感到輕松愉快。

但是这一点已經办不到了，因为常言說得好：有善始必有善終。实际上，如果負起这个重担不能比摆脱这个重担使他得到更大的滿足和愉快，那他也就不成其为馬克思了。

事情不久就清楚了：馬克思是整个运动的真正的“首腦”。这决不是他自抬身价。他极度輕視任何廉价的声望。和那些尽量在人前装腔做势而实际上什么也不干的民主主义者的作風不同，他宁願在幕后工作，也不願出头露面。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协会的工作人员当中，沒有一个人哪怕仅仅具备一点点为展开协会的如此广泛的宣傳工作而必須具备的那些稀有的品质：对历史发展規律的清楚透彻的認識，追求必要的东西的毅力，滿足于可能的东西的足够的忍耐，对誤入歧途的人的錯誤的寬容和对积重难返的无知的铁面无情。在这里，馬克思能够在比革命时期的科倫更加广泛得多的領域內發揮他通过教育和領導工作来贏得人們敬仰的无比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3卷，第222頁。

② 同上书，第315頁。

才能。

这样的运动在創始时所必不可免的种种私人的爭吵和糾紛費去了他的“极多的時間”。意大利的、特别是法国的會員制造了許多无謂的麻煩。在巴黎，“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代表者之間从革命年代起就形成了深刻的分歧；无产者不能忘怀文人的屢屢的
359 背叛，而文人則把一切根本不理睬他們的工人运动看成是異端。而且，在波拿巴的軍事專制的压迫下，由于工人階級为波拿巴的密探所四面包圍，特别是由于工人階級沒有通过自己的报刊或組織来互相联系的任何机会，因而在工人階級內部猜疑之風也大為盛行。为了这只“法国鍋子”的喧騰，国际总委员会花去了不少宝贵的夜晚并做出了許多冗长的決議。

对馬克思說来，他同国际的英国支部打交道的工作是比較愉快和有成果的。英国工人曾为反对英国政府袒护北美合众国南方叛乱各州的干涉行动进行了斗争，并且在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总统时向他致函祝賀³³⁵。馬克思起草了这封致“工人階級的忠誠的儿子”的賀信，說他“通过解放被奴役种族的崇高无比的战斗，肩負起領導这个国家的使命”^①。他說，只要美国的白人工人不理解奴隶制玷辱了他們的共和国，只要他們在未經本人同意便被出賣的黑人面前夸耀有权出賣自己和選擇自己主人是白人工人的无上特权，他們就不能为自己爭得真正的自由并帮助欧洲弟兄的解放斗争。然而，内战时期的鮮紅的血海已經冲垮了这些障碍。賀信是怀着对事业的明显的同情和爱写成的。当然，像萊辛一样在談到自己的作品时总喜欢带着輕蔑口吻的馬克思，在給恩格斯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頁。

的信中說，他不得不親自起草賀信（這比寫有內容的著作遠為困難），為的是使這類作品所慣用的詞句至少有別于庸俗的民主濫調^①。林肯完全看到了這種差別；他用極其友善而親切的語調寫來了回信，這使倫敦的報刊大為驚異，因為“老人”照例只是用幾句客套來答复資產階級民主派方面的賀信的。

“就內容來說”，關於《工資、價格和利潤》^②的報告當然要比賀信重要得多。這個報告是1865年6月26日^③馬克思在總委員會會議上為了駁斥某些委員所主張的一種見解而做的³³⁶。按照這種見解，工資的普遍提高不能給工人帶來任何益處，因而工會是有害³⁶⁰的。這種見解來源於一種錯誤的論斷，即認為工人的工資決定商品的價值，如果資本家今天開始支付五先令的工資而不是四先令，那末明天他們就會由於需求的增长而把原來價值四先令的商品按五先令出售。儘管這種見解極其庸俗而膚淺，然而馬克思卻認為，要把與此有關的一切經濟問題都給外行人解釋清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把政治經濟學的全部課程在一小時內講完是不可能的。但是，馬克思卻極其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給工會幫了很大的忙。

國際的最初的重大成就首先應歸功於為爭取英國選舉改革而展開的運動。馬克思早在1865年5月1日就寫信給恩格斯說，“改革同盟已經為我們所掌握。在十二個人（資產者六人、工人六人）組成的小小委員會中，所有的工人都是我們總委員會的委員（其中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1—252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75—426頁。

③ 馬克思是在6月20日和27日做的報告。

有埃卡留斯)。我們已經擊敗了資產者想把工人階級引入歧途的一切妥協企圖……如果我們能通過這個途徑使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重新活躍起來，那末我們的協會不動聲色地為歐洲工人階級做出來的事情，就將比通過其他任何方式所能做出來的更多。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指望成功。”^① 5月3日恩格斯回信說：“國際協會在短時期內的确不動聲色地征服了巨大的領域。但是，現在它能埋頭于英國的工作，而不去糾纏于法國人的無謂爭吵，這是好的。你終究會從失去的時間得到酬報。”^② 然而，不久就發現，這成功也有它壞的一面。

馬克思大體上認為，預定1865年在布魯塞爾召開公開代表大會的條件還不夠成熟。他不無理由地擔心，在大會上會發生口舌之爭。費了很大的力氣（這特別是由于法國人的反對），他才征得大家的同意，暫不召開公開的代表大會，而在倫敦召開一次非公開的預備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只召集各主要委員會的代表來籌備未來的大會。作為必須事先達成這樣的協議的理由，馬克思舉出了英國的爭取選舉改革的運動，法國已經爆發的罷工，以及由于比利時剛剛通過的關於外國人的法令而不可能在布魯塞爾召開代表大會的情況。

361 倫敦代表會議從1865年9月25日開到9月29日。總委員會出席會議的代表除了主席奧哲爾、總書記克里梅爾和幾名英國會員以外，還有馬克思和他在國際方面的兩名主要工作助手——埃卡留斯和萊克。萊克是瑞士的鐘表匠，定居英國，同樣精通德、英、法三種語言。法國的代表有托倫、弗里布爾和利穆贊（他們后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4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3卷，第304頁。

來都脫離了國際)，以及馬克思從 1848 年起的老友席利和後來成為巴黎公社的英雄和烈士的瓦爾蘭。來自瑞士的是代表法、意工人的訂書匠杜普勒和代表德國工人的約翰·菲力浦·貝克爾（他過去是制刷工，現在是不倦的革命鼓動家）。比利時的代表是塞札爾·德·巴普，他過去是排字學徒工，後來學醫並成為醫生。

會議首先研究了協會的財務狀況。原來，第一年度總共收入不過三十三英鎊。關於固定的會費問題還沒有達成協議，只是決定為宣傳工作和代表大會經費籌集一百五十英鎊；在英國籌集八十英鎊，法國四十英鎊，德國、比利時和瑞士各十英鎊。這個預算當然也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因為“阿堵物”從來不是國際的動力。多年以後，馬克思用沉痛的幽默口吻說，總委員會的財務是不斷增長的負數，而幾十年以後恩格斯寫道，總委員會所擁有的大都只是債務，而不是轟動一時的所謂“國際的幾百萬”；大概，從來也沒有過一個組織用這樣少的錢做了那樣多的事。

總書記克里梅爾做了關於英國情況的報告。他說，大陸上的人們以為，英國的工會都很富裕，並且能夠幫助對它們自己也有好處的事業。但是，它們受到自己的煩瑣的規章的限制，不能超出給它們設下的狹隘界限。除了少數個人以外，它們都完全站在政治之外，要它們關心政治是很困難的。但某種程度的進步還是可以看到。幾年以前它們還甚至聽不進國際代表的話；現在則友善地接待他們，听取並贊同他們的原則。英國的工會第一次接受了同政治有着某種關係的組織。

弗里布爾和托倫報告了法國的情況，說那裏對國際抱着同情的態度。除了巴黎以外，協會還在盧昂、南特、埃爾伯夫、凱恩和其他地方征集了會員；賣出了大量的會員證，年會費為一點二五法 362

郎，但收入都花費在設置巴黎中央常務局和代表的旅費上面了。法國代表們安慰總委員會說，還有希望賣掉剩余的四百張會員證。他們抱怨大會的延期，認為這對事業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同時也訴說了工人對波拿巴的警察制度的恐懼。他們說，到處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先給我們看看你們能夠做些什麼，然後我們再加入。

貝克爾和杜普勒關於瑞士的情況報告說，雖然那里在代表會議前六個月才開始宣傳工作，但是情況極其順利。在日內瓦有會員四百人，洛桑有一百五十人，維維也有同樣數目。會員每月會費為五十辨士，但是這兩位代表說，會員都加倍繳納，因為他們都充分意識到必須用會費來幫助總委員會。當然，瑞士代表並沒有帶來什麼錢，他們只是安慰說，如果不是花在旅費上面，他們就會有相當大的一筆款項。

比利時剛剛進行了一個月的宣傳工作。但是，巴普報告說，那里已經吸收了六十名會員，他們每年至少必須繳納三法郎會費，其中三分之一將扣除作為總委員會的經費。

至於說到代表大會，馬克思代表總委員會提議於1866年9月或10月在日內瓦召開。大會地點得到一致通過，但召開日期由於法國人的堅持而提前到5月的最後一周。法國人還要求，凡是持有會員證的人都有權出席大會並參加投票。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因為他們對普遍選舉權就正是這樣理解的。經過一場熱烈的爭論之後，才通過了特別為克里梅爾和埃卡留斯所主張的、只有代表才有權出席大會的制度。

總委員會所擬定的大會日程是極其廣泛的：合作社問題；縮短工時問題；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問題；工會的過去和將來；常備軍

对工人階級的利益的影響，等等。這一切都一致通過了；只有兩項議程引起了意見的分歧。

其中的一項不是總委員會提出的，而是法國人提出的。他們要求把“宗教觀念及其對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運動的影響”作為一個特別的議題列入日程。他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以及馬克思怎樣對待這個問題，可以極其清楚地從馬克思紀念蒲魯東³⁶³的一篇文章的幾句話中看出來。這篇文章是幾個月前在施韋澤的《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的。這也是馬克思在施韋澤的機關報上刊載的唯一的一篇文章。馬克思寫道：“但是，在法國的條件下，當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必須把信教看做是自己優越於18世紀資產階級伏爾泰主義³³⁷和19世紀德國無神論的標志時，蒲魯東對宗教、教會等等的攻擊，曾是一個很大的功績。如果說彼得大帝以野蠻戰勝了俄國的野蠻³³⁸，那末蒲魯東則盡其所能地以詞藻戰勝了法國人的空談。”^①英國代表也警告要提防這“不和的蘋果”³³⁹，但法國人終於以十八票對十三票通過了自己的提案。

另一項引起爭論的議題是總委員會提出的。它涉及了馬克思所特別重視的歐洲政治問題——“必須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在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恢復波蘭的獨立，借以阻止俄國對歐洲日益增長的影響”。但是法國人特別不同意這個議題。他們說，為什麼要把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混在一起呢？為什麼要在災難臨到自家門前的時候，去為遙遠地方的事勞神呢？為什麼要在普魯士、奧地利、法國和英國政府同樣發生不良影響的時候，偏偏制止俄國政府的影響呢？比利時代表塞札爾·德·巴普特別堅持這種意見。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373頁。

他认为，波兰的复兴只对三个阶级有利：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和僧侣。

这里极其清楚地反映出蒲鲁东的影响。蒲鲁东曾几次反对波兰的复兴，——最后一次还是在1863年波兰起义的时候，正如马克思在他的悼文中所说的，那时蒲鲁东对沙皇表现了愚蠢而无耻的颂扬态度。相反地，这次起义却重新激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年代³⁴⁰便对波兰抱有的同情。他们本想借起义机会发表一个共同宣言，但是这个意愿终于未曾实现。

他们对波兰人的同情决不是无批判的。1863年4月21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必须说，只有水牛才会对1772年的波兰人抱有好感。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贵族都已人格扫地，有的甚至失去了智慧，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条，认为唯物主义就是饮食男女，就是在赌博场中赢钱或是靠下流无耻的行径取得奖赏。但是还没有一国的贵族愚蠢到像波兰的小贵族那样，把卖身投靠于俄国当做自己的拿手戏。”^①但是，当俄国国内还谈不到革命的时候，唯有波兰的复兴才能削弱沙皇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认为对波兰起义的残酷镇压，以及沙皇专制制度在高加索的进展，是1815年后欧洲历史的最重大事件。他在国际成立宣言叙述对外政策的那一部分中特别强调了这两个事件，并且很久以后还痛心地谈到托伦和弗里布尔对这项议案的反对。但是，在英国代表的帮助下，他到底打破了这种反对，波兰问题仍然列入了议事日程。

代表会议上午在荣克主持下举行非公开的会议，下午在奥哲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3卷，第157页。

尔主持下举行半公开的會議。在非公开的會議上已經弄清楚了的問題，在公开的會議上由更广泛的工人群众來討論。巴黎的代表們发表了关于代表會議的报告和代表大會的議程，这个議程在巴黎报刊上得到了热烈的反响。馬克思曾以显然是滿意的口吻談到这一点：“使我們的巴黎人感到尷尬的是，恰恰是他們所不願意要的那一节关于俄国和波兰的文字，引起了最大的轰动。”^①十二年后馬克思仍以滿意的心情談到法国著名历史家昂利·馬丁关于代表大會的整个議程、特别是关于这一节所做的“热烈的評述”³⁴¹。

(五) 德国战争³⁴²

馬克思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給了国际的事业。这給他个人造成了不愉快的結果；他由于无暇謀生，因而生活重新陷入窘境。

7月31日他就不得不写信告訴恩格斯說，他一家人两个月來全靠典当維持生活。“老实說，我宁肯切掉我的大拇指，也不願給你写这封信。每一想到半生过着依賴別人的生活，簡直感到心灰意冷。在这种时候，能够使我振作起来的唯一思想，就是我們俩人是分工合作的，而我的任务是把時間用在事业的理論方面和党务方面。的确，以我的情形而論，我目前的住房是太貴了，而且这一年我們的生活也比过去任何时候过得都好。但是，这也是使我的孩子們能够保持种种的交誼和关系，从而使他們的前途有所保障的唯一方法，至于应当使他們在飽經忧患之后哪怕得到短期的补偿，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38頁。

那就更不用說了。甚至从純商人的眼光看来，过一种純无产者的生活在現在說来也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是我們夫妻两人，或者女儿都是男孩，那倒也无所謂。我想你也定会同意这种看法。”^①恩格斯立即給了他所需的帮助，但是几年之內馬克思还是重新陷入了穷困和瑣碎的生活操劳的夹攻之下。

几个月以后，由于洛塔尔·布赫尔在1865年10月5日的来信中提出的一个既奇妙又出乎意料的建議，馬克思有了一个新的謀生的門路。在布赫尔流亡倫敦的年代，馬克思沒有同他发生任何关系，更不用說友誼关系。当布赫尔在流亡者的小圈子中占有了一个独立的地位并且加入烏尔卡尔特派成为他的一个热烈拥护者以后，馬克思仍然对他保持着极端批判的态度。相反地，布赫尔則在波克罕面前极力贊揚馬克思論福格特的书，并且想在《Allgemeine Zeitung》〔《总汇报》〕上写一篇評論此书的文章；但是，这件事一直沒有实现：这也許是由于布赫尔根本沒有写，也許是由于奥格斯堡的报纸不肯发表。普魯士大赦以后，布赫尔返回祖国并在柏林和拉薩尔作了朋友。1862年他同拉薩尔一起来倫敦参观世界博覽会，并且通过拉薩尔的介绍結識了馬克思。馬克思觉得他是一个“文雅的，虽然有点顛三倒四的人……”^②。馬克思不相信布赫尔同意拉薩尔的“对外政策”。拉薩尔死后，布赫尔供职于普魯士政府，因此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痛斥他和洛貝尔图斯說：“这帮柏林、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出身的无賴有多么下流！”^③

①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18—319頁。

② 参閱同上书，第98頁。

③ 参閱同上书，第244頁。

現在布赫爾給馬克思來信說：“先談談業務！《Staatsanzeiger》〔《國家通報》〕希望每月有一份論述金融市場（當然也包括商品市場，因為二者是不可分的）動向的報告，問我能不能推薦什麼人來做這件事。我答复說，沒有人能比您更勝任這個工作。因此，他們要我向您洽談這件事。文章的篇幅完全由您自由決定，總之是越透徹越詳盡越好。至於內容，不消說只能完全遵循您的科學信念；但是，考慮到讀者圈（haute finance）^①，而不是考慮到編輯部，最好讓事情的實質僅為專家所理解，以避免引起爭論。”接着又談了幾點業務上的問題，並回憶了他同拉薩爾一起的郊遊。用布赫爾的話來說，拉薩爾之死對他始終是個“心理學的謎”，並說，如馬克思所知道的，他又在重溫他的初戀——文牘生涯。“我從來不同意拉薩爾的意見，他總是把發展的進程想像得過於迅速。自由主義政黨在它消亡以前還要換過幾次皮；因此，凡是還有志在一生中為國家效命的人，都應該歸附政府。”信在問候了馬克思夫人和各位小姐、特別是最小的一位以後，以如下的套語做了結束：“以最高的尊敬和忠誠向您致意”。

馬克思在回信中拒絕了他的請求，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材料足以更確切地知道，他在信里寫了什麼，以及他對布赫爾的來信做何想法。他在接到這封信以後立刻就到曼徹斯特去，無疑地在在那裡跟恩格斯商談了這件事。在他們兩人的通信中從來沒有談到過這件事，在馬克思給其他友人的信中也只順便提過一次這個建議。但是十四年後，當赫德爾和諾比林的謀殺事件^②引起對社會主義

① 金融貴族。

② 指對皇帝威靈一世的兩次謀殺事件：一次是赫德爾於1878年5月11日，一次是諾比林於1878年6月2日。

者的瘋狂迫害的時候，他把這封信投到迫害者的陣營去，造成了炸彈爆發一樣的效果。當時布赫爾是柏林會議^①的秘書，並且據他的官方傳記作者的說法，第一個反社會主義者的法案³⁴³就是他起草的。這個法案在赫德爾和諾比林暗殺事件發生後提交帝國議會，但為議會所否決。

從那時起，報刊上就常常討論這樣一個問題：俾斯麥是不是想通過布赫爾的信來收買馬克思。1865年秋天，當迫近肩膊的普魯士同奧地利決裂的危險為加斯坦條約^②所暫時緩和時，俾斯麥的確如他自己所用的狩獵的比喻，想把“一切能吠叫的狗都放出去”。當然，他是一個十分頑固的易北河東岸的容克，不能像迪斯累利甚或波拿巴那樣向工人運動討好獻媚。大家知道，他雖然同拉薩爾親自交談過幾次，卻對拉薩爾抱著十分可笑的想法。但是在他手下有兩個比他更善於處理這種微妙問題的人，——這就是洛塔爾·布赫爾和海尔曼·瓦蓋納。瓦蓋納當時極力想把德國工人運動拉入自己的圈套，但只是在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身上收到了一點效果。然而，作為容克黨的思想領導者和俾斯麥的老友，瓦蓋納早在三月革命以前就比布赫爾占有一個更獨立的地位。布赫爾則全靠俾斯麥的好意關照，因為官僚們都把他當做不招自來的無賴加以白眼，而國王也因為1848年的事情對他根本不予理睬³⁴⁴。此外，布赫爾還是一個性格極其軟弱的人，用他的朋友洛貝爾圖斯的說法，是“一條沒有骨頭的魚”。

因此，如果布赫爾的信有收買馬克思的意思，那末這也當然不

① 指重新審查1878年俄土之間的聖斯特法諾和約條件的外交會議。

② 指1865年8月14日普奧之間關於瓜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所謂加斯坦協定。

是在俾斯麥事前不知道的情況下做的。問題只是在於是否真正有過收買的企圖。馬克思利用布赫爾的信來反對 1878 年對社會主義者的迫害，這種作法是完全無可指責的巧妙的一着。但是這也並不能證明馬克思從一開始就把布赫爾的信看做是收買的企圖，更不能證明它的确是這樣一個企圖。布赫爾十分清楚地知道，馬克思自從跟施韋澤決裂以來，一時在拉薩爾派那里是極不受欢迎的。此外，在一份最枯燥無味的報紙上每月刊登一篇關於國際金融和商品市場的報告，顯然也未必是緩和對俾斯麥政策的普遍不滿、尤其是使工人擁護這種政策的適當方法。因此，布赫爾保證說，他把自己的流亡時期的老友介紹給《國家通報》的負責人並沒有任何政治上的用意，這是完全可信的。當然，這裡有一點保留，即如果是進步的自由貿易論者，那末負責人一定會加以拒絕。布赫爾在遭到馬克思拒絕以後，又去請求杜林；杜林最初接受了，但很快也拒絕了，因為該報負責人根本沒有表現出布赫爾所如此為之吹噓的那種對“科學信念”的尊重。 368

馬克思為國際和他自己的科學著作所做的繁重工作，使他在生活上備嘗艱辛，而比這更壞的是他的健康的日益惡化。1866 年 2 月 10 日恩格斯寫信給他說：“為了擺脫這個可惡的痛，你確實應該稍微合理地安排一下……暫時放棄夜間工作並且過一種比較規律的生活吧。”^①馬克思在 2 月 13 日回信說：“昨天我又躺下了，因為左腰上又生出一個惡性的痛。倘若我多少有點錢，也就是說 > - 0，來供養我的家屬，倘若我的書已經完成，那末即使我今天或明天被拋到剝皮場去，換句話說，一命嗚呼，我也會毫不在乎的。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350 頁。

但是在上述情況下我還做不到這一點。”^①一星期後^②恩格斯接到一個可怕的通知：“這一次可真有生命的危險。我的家人還不知道我的病情的嚴重。倘若再照這樣發作三四次，我就要完了。我非常消瘦，並且衰弱得很厲害，但不是在頭部，而是在腰部和腿部。醫生說得完全對，過度的夜間工作是此病復發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不能告訴這些先生們——告訴他們也是無濟於事的——迫使我養成這種惡習的原因。”^③但是恩格斯還是堅持要馬克思到馬爾蓋特海濱去休養了幾個星期。

馬克思在馬爾蓋特很快就恢復了飽滿的情緒。他在給女兒勞拉的一封充滿快樂心情的信中寫道：“我很高興，我沒有住在公寓或旅館里，而是住在私人家里。因為住在旅館里總免不了要有當地的政務、家庭的丑事和鄰里的糾紛來膩煩你。但是我還是不能像第河上的磨坊主那樣唱道：‘我不管別人的事，別人也不管我的事’，因為這裡究竟還有我的聾得像木頭一樣的房東太太和她的患慢性瘖啞症的女兒。但是她們都是極好的人，殷勤而不惹人厭煩。”³⁶⁹

我自己已經變成一根逍遙杖。……白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出去遊逛，呼吸新鮮空氣，十點鐘就睡覺，什麼都不讀，更不寫，進入了佛家視為人間極乐的涅槃之境。”^④馬克思在信的末尾跟他的女兒開了一個玩笑，暗示了他家中的一件已經醞釀成熟的大事：“拉法格這個該死的小鬼還在用他的蒲魯東主義折磨我。除非我敲碎他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3卷，第351頁。

② 梅林這裡弄錯了。這裡所引用的馬克思的信是1868年2月10日寫的。

③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3卷，第343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467頁。

的克里奧洛人的腦壳，他大概是不会安靜下来的。”^①

正当馬克思在馬尔盖特休养的时候，籠罩着德国上空的战争阴云发出了第一道閃光。4月8日俾斯麦同意大利締結了对付奥地利的攻守同盟，并在第二天向联邦議會提出了在普遍选举权的基础上召开德意志議會，以便由德意志各邦政府共聚一堂討論全联邦改革的提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表明，他們对德国的现实情况非常隔膜。他們的判断游移不定。4月10日恩格斯在談到俾斯麦召集德意志議会的提案时写道：“只有像他这样的蠢材，才会相信这对他会有絲毫的帮助……”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鬪斗的地步，那末事件的发展将破天荒第一次取决于柏林的态度。柏林人倘若及时行动，那末形势可能好轉——但誰能信賴他們呢？”^②

三天以后，他重新对事件的发展做了极其清楚的預測：“看来，德国的市民在稍加反抗之后是会同意这点的（即接受普遍选举权）^③，因为波拿巴主义終究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越来越看得清楚，资产阶级沒有亲自直接进行統治的能力，因此，凡是寡头政治不能像在英国这里这样为了得到优厚酬报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一种波拿巴式的半专政便成为正常的形式；这种半专政甚至違反资产阶级本身的意志去謀求资产阶级的重大物质利益，但根本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統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違反自己的意志去捍卫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例如，俾斯麦先生现在就接受了民族联盟的綱領。当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489頁。

②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70頁。

③ 括号里的話是梅林加的。

是否实行这个綱領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俾斯麦未必会由于德国市民的反抗而倒台。”^①然而，按照恩格斯的意見，俾斯麦实际上将在什么問題上栽跟头呢，——这就是奥地利的兵力。本涅迪克無論如何是比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更优秀的一位將軍；奥地利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迫使普魯士求和，而普魯士則不能迫使奥地利如此；普魯士的每一个胜利均将招致波拿巴的干涉。

馬克思在給他的一位新交——汉諾威的庫格曼医生的信^②中，几乎用同样的話描述了当时的形勢；庫格曼早在1848年还是一位青年的时候，就非常景仰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留心收集他們的一切著作。但是直到1862年，他才通过弗莱里格拉特的介紹結識了馬克思并且很快就成为知己。馬克思在一切軍事問題上都絲毫不加批判地完全听信恩格斯的判断，这在他說来無論如何是絕无仅有的事。

比对奥地利的实力估計过高更使人惊異的，是恩格斯对于普魯士軍的内部情况的看法。这种看法之所以更加使人惊異，是因为他曾在自己的一部卓越著作^③中，以資產階級民主空談家望尘莫及的洞察力論述了造成普魯士宪法紛爭的軍事改革³⁴⁵。他在5月25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要是奥地利人有足够的聪明不采取攻势，那末普魯士軍隊内部一定会发生变乱。普魯士士兵还从来没有像在这次动員中那样情緒不穩。可惜我們仅仅知道一小部分实情，但是已經足以确信这样的軍隊不能进行攻击战。”^④6月11日他又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71—372頁。

② 參閱馬克思：《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頁。

③ 这里指的是恩格斯的《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1—87頁。

④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81頁。

写道：“在这次战争中，对普鲁士人来说，后备军³⁴⁶是和1806年时的波兰人一样危险。同样占全军三分之一以上的波兰人还在交战以前就把整个事情弄得一团糟。不同之处在于，后备军将不是在战败之后开小差，而是发动叛乱。”^①这是在科尼格列茨会战前三星期时写的。

科尼格列茨会战^②驱散了这一切云雾，在会战的第二天恩格斯就在信中写道：“你对普鲁士人怎样看法？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利用了初战的胜利……在八小时内打完这样的决战还是史无前例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要打到两天的。但是针发枪是一种厉害的武器，而且这班小伙子的确打得很猛，这是我在这样的平时军队中从未见过的。”^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会犯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但是当事实本身迫使他们必须承认什么的时候，他们从来不闭眼不看事实而坚持己见。普鲁士的胜利使得他们瞠目结舌，但是他们很快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起指导作用的恩格斯，在7月25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综述：“我觉得目前德国的情况十分简单。自从俾斯麦借助于普鲁士军队极其成功地推行资产阶级的小德意志计划以来，德国已在确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承认这个既成的事实……”

这件事情的好的一面，就是情况变得简单了，而由于消除了各小邦首都的争吵，同时至少加速了发展，因而革命就更容易发生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87页。

② 指的是1866年7月3日科尼格列茨城附近的战役，结果奥军大败。这次战役也以萨多瓦之战著称。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389页。

了。德意志議會畢竟完全不同於普魯士議會。所有的小邦都將被卷入運動，地方割據這種最惡劣的影響將不再存在，各個黨派也終將成為真正全國性的黨派，而不再僅僅是地方性的黨派。”^①兩天以後馬克思對此冷靜地回答說：“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壞事情也應當按照它本來的樣子加以接受。但是，在這初戀的日子里，離開得這些畢竟是愉快的。”^②

同時，恩格斯以絕非贊許的口吻寫道：“李卜克內西老兄成了狂熱的奧地利擁護者……”^③；毫無疑問，正是李卜克內西從萊比錫給《Frankfurter Zeitung》（《法蘭克福報》）寄去了一些“激昂的通訊”。這個致王公于死命的報紙已經走得這樣遠，竟致指責普魯士人無禮對待“可敬的黑森選帝侯”，並且敬仰可憐的瞎子維爾夫^④。柏林的施韋澤基於同樣的原因並且使用同樣的詞句，表述了跟倫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相同的見解。可憐的施韋澤由於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直到今天還引起那些雖然不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卻對他們尊崇備至的自命不凡的政治家們的義憤。

（六）日內瓦代表大會

372 國際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沒有能夠按照計劃在決定德國命運的科尼格列茨會戰時期召開。雖然這個新協會成立的第二年比第一年有了迅速得多的發展，但它還是不得不把會期再一次推遲到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頁。

② 參閱同上書，第193頁。

③ 同上。

④ 瞎子維爾夫就是漢諾威的最後一位國王格奧爾格五世，他在1866年普魯士軍隊占領漢諾威以後失去王位。

9月。

日內瓦開始成為協會在大陸上的最重要的中心。那里成立了羅曼語系³⁴⁷支部和德語區支部，並且都創辦了自己的黨機關刊物。德語系支部的機關刊物是《Vorbote》〔《先驅》〕——是由老貝克爾創辦和主編的月刊。它的六卷的年刊本直到現在仍然是國際史的最重要資料。《先驅》自1866年1月開始出版，自稱為“德語系支部的中央機關刊物”，因為德國的結社法阻礙在德國本國成立支部，這就使得國際的所有德國盟員都把日內瓦看做他們的中心。由於同樣的理由，日內瓦的羅曼語系支部也對法國國內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比利時的工人運動也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Tribune du Peuple》〔《人民論壇報》〕；馬克思承認這家報紙也和瑞士的兩家報紙一樣是國際的正式機關報。但是，他不承認巴黎出版的一家或幾家自命為維護工人利益的小報是黨的機關報。固然，國際的事業在巴黎也逐漸得到順利的開展，不過在那里與其說已燃起熊熊之焰，無寧說剛爆發出星星之火。由於完全沒有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很難建立起運動的真正中心，而波拿巴警察的曖昧的寬容態度，對於工人的鬥志與其說起着鼓舞的作用，無寧說起着麻痺的作用。另一方面，勢力強大的蒲魯東主義是不適於鞏固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的。

蒲魯東主義在時而出現於布魯塞爾、時而出現於倫敦的“青年法蘭西”這一組織中間得特別厲害。1866年2月在倫敦成立的國際法國支部，激烈地反對總委員會把波蘭問題列入日內瓦代表大會的議程。他們用蒲魯東的口氣提出了這樣的質問：俄國解放了自己的農奴，而波蘭的貴族和僧侶一直拒絕給自己的農奴以自

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想到用复兴波兰的办法来削弱俄国的影响呢? 在德国战争爆发时,国际的法国会员,甚至总委员会的法国委员,正如马克思有一次说过的,也用“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引起了多次无益的争吵。他们认为一切民族都已衰老,并且应当分解成小的“集团”,然后这些小的“集团”再组成“联盟”,但不是国家。“在人类的这种‘个体化’以及相应的 mutualisme (相互扶助)向前发展的时候,其他一切国家的历史都应当停顿下来,全世界都应当等候法国人成熟起来实行社会革命。那时他们将要将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①这一段嘲讽之词是马克思首先针对着他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说的,这两人虽然后来都成了他的东床佳婿,但是初时他们作为“正统的蒲鲁东主义者”曾经使马克思颇感不快。

英国的工联始终是国际的主力。马克思也抱着这样的看法;他在1866年1月15日给库格曼的信^②中,对于能把这个唯一真正庞大的工人组织吸引到运动中来深感满意。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几个星期以前在国际的思想指导下在圣马丁大厅为选举改革而召开了一次大会。1866年3月,格莱斯顿的辉格党内阁提出了一个选举改革法案³⁴⁸。但是,甚至格莱斯顿自己党内的一部分党员也觉得这个法案过于激进,于是内阁因这些党员的退出而垮台。迪斯累利代之而组成了托利党的内阁,这个内阁企图把选举改革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于是选举改革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马克思在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② 参阅同上书,第186页。

1849年以來在英國看到的比起來，規模是非常巨大的，這完全是由‘國際’一手組織的³⁴⁹。譬如特拉法加廣場上的主要人物魯克拉夫特先生就是我們委員會的委員。”^①在有兩萬人聚會的特拉法加廣場上，魯克拉夫特號召大家去到“我們曾經斬掉一個國王的頭顱”^②的白廳公園去開大會；之後，在海德公園的一次有六萬人聚會的群眾大會上，幾乎釀成一次公開的起義。

英國的工聯完全承認國際在這次幾乎席卷全國的運動中的功績。在設菲爾德召開的工聯代表會議做出了如下的決議：“代表會議對國際工人協會以兄弟情誼聯合世界各國工人的功績深表謝忱，並最懇切地建議有代表出席會議的所有工會都參加這個組織，因為代表會議確信這對整個工人階級的進步和利益極為重要。”^③不久便有許多工會參加了國際；但是這種精神上、政治上的勝利並沒有在同樣程度上成為物質上的勝利。參加國際的各工會自行決定繳納會費的多少，甚至完全不繳會費。而且即使繳納會費也為數甚微。例如，擁有五千會員的鞋匠工會每年只繳五鎊會費，擁有九千會員的木匠工會每年只繳兩鎊，而擁有三、四千會員的泥水匠工會每年總共只繳一鎊。

馬克思不久就不得不承認，在“爭取選舉權的運動”中又暴露出“英國的一切運動所固有的那種可詛咒的傳統性質”。還在國際成立以前，工聯就為了選舉改革而同資產階級激進派發生了關係。當運動開始顯示出有獲得巨大成果的希望時，這種關係就變得更加緊密了。過去憤然加以拒絕的那些“讓步”，現在也被看成是對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0頁。

② 指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對英王查理一世的處死。

③ 參閱古·耶克：《國際》，1926年俄文版，第17頁。

斗争的公道的酬报。但是，馬克思认为，这个运动缺少旧时宪章运动的那种火热的精神。他責备英国人沒有能力同时做两样事情；选举改革运动越是蓬勃发展，倫敦的領袖們对于“我們内部的运动”就越是冷淡。“我們在英国发动起来的选举改革运动，几乎阉杀了我們自己。”³⁵⁰ 馬克思由于去馬尔盖特养病，未能亲自参預这个运动，这也使得运动的这种发展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阻碍。

875 *«Workman's Advocate»* [《工人辯护士报》] 周刊給他增加了許多工作和麻煩。这个期刊在 1865 年的代表會議上被改为国际的正式机关刊物，并且从 1866 年 2 月起改名为 *«Commonwealth»* [《共和国》]。馬克思参加了該报的管理委员会；这个报纸經常在财政上遭到困难，因而不得不依靠拥护选举法改革的资产阶级的支持。馬克思始終极力抵制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也反对圍繞編輯部领导权的竞争。埃卡留斯一度任該报編輯，在《共和国》上发表了 he 的一篇反对斯图亚特·穆勒的有名論战文章³⁵¹。馬克思在他写作这篇文章时給了他許多帮助。尽管馬克思做了种种努力，正如他在給庫格曼的信中所說的，《共和国》終于部分地由于經濟的原因，部分地由于政治的原因，暫時变成了改革运动的机关报。

由于这一切情况，馬克思对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分担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担心这次代表大会“会在全欧洲面前出丑”。由于法国会员坚持代表大会應該按照倫敦代表會議的決議在 5 月底召开，所以馬克思想亲自去巴黎說服他們，要他們相信这个日期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則认为，这件事完全不值得馬克思去冒落入波拿巴警察罗网的危險，因为馬克思在那里是会孤立无援的。只要能够避免出丑（而这終究是完全可能的），那末是否能够通过什么有益的決議，那倒是次要的問題。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对

他們(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來說,任何這樣的示威都將是丟臉,但這並不等于說,這種示威在歐洲人看來也是如此³⁵²。

難題終於解決了,這是因為日內瓦方面沒有做好籌備工作,因而決定把大會延期到9月。除了巴黎以外,其他各地都同意了。馬克思本人不打算親自出席大會,因為他的科學著作不許可他再中斷下來。他認為,完成這部著作要比他親自參加任何這樣的代表大會對工人階級說來都更為重要。但是他仍然花了許多時間來設法使代表大會能夠順利進行;他為倫敦的代表擬定了一份備忘錄³⁵³,並且故意把它局限於這樣幾點,“這幾點可以由工人直接進行協商和採取共同行動,並可以為階級鬥爭的需要和把工人組織成為階級的需要,提供直接的養料和動力”^①。比斯利贊揚成立宣言的那段話,對這個備忘錄也是適用的,即:在短短幾頁之中就把國際無產階級當前最主要的要求無比透徹明白地表達出來。主席奧哲爾、總書記克里梅爾,以及埃卡留斯和榮克作為總委員會的代表到日內瓦去,而後兩人的審慎是馬克思首先可以信賴的。 378

大會由榮克主持,在六十名代表參加下從9月3日開到9月8日。馬克思覺得代表大會“整個說來比預料的來得好”。只是對“巴黎的先生們”做了辛辣的評論。“巴黎的先生們滿腦袋都是蒲魯東的空洞詞句。他們高談科學,但什麼也不懂。他們輕視一切革命的、即產生於階級鬥爭本身的行動,輕視一切集中的、社會的、從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通过法律縮短工作日)來實現的運動;在自由和反政府主義或反權威的個人主義的幌子下——這些先生們十六年來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着並且現在還在忍受着最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5頁。

可耻的专制制度！——他們实际上是在宣揚庸俗的資產階級的生意經，只是把它按照蒲魯东的精神加以理想化罢了！”^①此外，他还以同样的精神，用更加尖銳的字眼，談到其他一些事情。

馬克思的評判的确是十分严厉的，但是几年以后，曾經亲自积极参加大会的約翰·菲利浦·貝克尔关于当时籠罩着大会的那种混乱状态发表了也許是更为尖銳的意見。差别只是在于，貝克尔沒有因为法国人而忘掉德国人，也沒有因为蒲魯东主义者而忘掉舒尔采-德里奇主义者。“为了从这些善良的人的热烈祝賀中脫身出来，要对他們浪費多少殷勤的礼节啊。”《先驅》上面关于大会的报道当然完全是用另一种笔調写的；但是这些报道是应当用某种批判的眼光来讀的。

法国人的代表人数較多，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委托书；他們虽然能言善辯，但是並沒有取得多大成就。他們关于国际只接受体力劳动者而不接受腦力劳动者为會員的提案，也和关于把宗教問題列入协会綱領的提案一样被否决了。这样一来，这个荒唐的想法就永远被消除了。他們提出的一个沒有多大害处的提案被通过了，这就是关于研究国际信貨以便将来在国际直屬下按照蒲魯东的主張設立中央銀行的提案。糟糕的是通过了托倫和弗里布尔的一項提案：廢除妇女劳动，因为它是“敗德之道”，妇女的园地应当是在家庭之內。但是，甚至瓦尔兰和其他法国人也反对這項提案，結果它只是同总委员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各种提案一起通过，
377 而后者实际上使前者化为烏有。此外，法国人还在決議的某些地方偷运了蒲魯东主义的一些零碎的私貨。馬克思对于歪曲了他所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5頁。

苦心擬定的大會綱領的這些荒謬篡改感到十分痛心。但是不難看出，他對大會的整個進程還是感到滿意的。

馬克思只是在一個問題上遇到了特別使他感到難過的挫折，這就是波蘭問題。有了倫敦代表會議的經驗以後，這個問題在給英國代表擬定的那個備忘錄中是小心翼翼地加以說明的。備忘錄中說，歐洲工人所以應當提出這個問題，這特別是因為統治階級不管怎樣偽裝關心各個民族，實際上却在壓迫它們，而貴族和資產階級又總是把背後的那個黑暗的亞洲強國看做是對付工人階級進攻的最後靠山。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復興波蘭，才能使這個強國不致為害。德國是仍然作為神聖同盟的前哨，還是成為共和主義的法國的盟友，都將取決於這一點。只要這個歐洲的大問題得不到解決，工人運動就總要因為受到阻撓而中斷和停步不前。英國人極力支持馬克思的提案，而法國人和一部分羅曼語系的瑞士人則同樣極力反對這個提案。最後，大家一致同意了貝克爾的提案；貝克爾本人雖然贊同馬克思的提案，但是他希望避免因這個問題而公開分裂。通過的一項模稜兩可的決議說：國際反對一切暴力統治，因此它力求消除俄國的帝國主義勢力，並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上復興波蘭。

除此而外，英國代表的提案取得了全綫上的勝利。臨時章程只做了不大的修改就通過了；成立宣言沒有經過討論，但是從此以後國際的所有決議和聲明都把它當作正式文件加以引用。總委員會改選了，會址確定在倫敦。總委員會負責收集有關國際工人階級狀況的詳細統計資料，並且在財力許可的條件下編制有關國際工人協會所關心的一切問題的報告。為了籌集總委員會的經費，決定每一會員在下一年度要額外繳納三十生丁的特別會費；大會還

378 建議在會員証費以外每年向總委員會會計處繳納一便士或半便士的固定年會費。

在大會的一些綱領性的聲明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勞動保護法和工會的決議。大會提出了一個原則，就是工人階級必須爭取到保護勞動的法律。“工人階級要求這種法律，這決不會加強政府的權力。相反地，工人階級可以把現在用來對付他們的政權變為自己的工具。”^①工人階級可以借助於一般的法律，爭取到依靠個人的孤軍奮鬥所爭取不到的東西。代表大會認為，限制工作時間是一個必備的條件，沒有它，則無產階級的一切求解放的努力都將遭到失敗。為了恢復工人階級的體力和健康，為了使工人階級能够在智力上得到發展，能够過社會生活並從事社會政治活動，限制工作時間是必要的。代表大會建議把八小時當做工作日的法定限度，這八小時必須規定在白天的固定時間以內，使這段固定的時間能够包括八小時的工作和飯前飯後的休息。八小時工作日應當適用於所有成年的男女工人，而年滿十八歲就應算是成年。為了保護健康，不得實行夜班工作；必不可免的例外情況須由法律加以明文規定。婦女必須特別嚴格地免除夜班工作。此外，應該根本不許婦女從事一切危害她們健康或有損她們品德的勞動。

代表大會確認現代工業吸收男女兒童和少年參加社會生產的傾向是一種有益的和進步的現象，儘管在資本的統治下這種進步所採取的形式是丑惡的。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下，所有的兒童應該從九歲起就成為生產勞動者，正像每一個成年人都必須毫無例外地遵從下面這條普遍的自然規律一樣，即：他要吃飯就必須工作，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3卷，上卷，第199頁。

并且不仅用脑工作，而且也用手工作。大会建議在目前的社会中把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級，即从九岁到十二岁的儿童，从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和从十六岁到十七岁的少年，并且对他們加以分別对待。在工場或家庭劳动中，第一类的工作時間限定为每天两小时，第二 379 类四小时，第三类六小时，而且至少應該給最后一类以一小时的吃飯和休息時間。但是，儿童和少年的生产劳动必須和教育結合起来，而教育則應該理解为如下三个部門：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技术教育應該教授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科学原理，同时使正在成长的一代学会最基本的劳动工具的实际应用。

关于工会，代表大会的決議說，它們的活动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会是无产階級用它所拥有的唯一社会力量即人数来对抗資本的集中的社会权力的手段。只要存在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会就是必要的。而且，工会必然要力求通过国际的联系来扩大和推广自己的活动。工会在对抗資本的不断侵害当中，不知不觉地成为整个工人階級的組織的重心，正像中世紀的地方自治团体成为資產階級的这样的重心一样。工会在劳动和資本間的日常斗争中不断进行小規模的战争，从而作为消灭雇佣劳动的有組織的手段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迄今为止工会的活动过分局限于反对資本的直接斗争；今后它不应脱离本階級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只有当无产階級广大群众确信，他們的目的不是狹隘的和自私的，而相反地是爭取千百万被压迫者的普遍解放的，那时候工会才能得到最大規模的发展。

日内瓦代表大会結束之后不久，馬克思根据这个決議的精神，打算再做一次他对之寄托很大希望的嘗試。1866年10月13日他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写道：“英国工联倫敦委员会（它的書記奥哲尔

是我們的主席) 此刻正在討論是否要把它的名称定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要是它这样做,那末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将转到我们这边,而我们也就能把运动大大推向前进。”^①

380 但是工联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它虽然对国际抱着充分友好的态度,但是仍然决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工联史家的记载是翔实的,那末工联委员会还曾拒绝国际的代表参加自己的会议。国际为了把大陆上的一切罢工的情况迅速通知给工联,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还在最初几年,国际就已经知道它将来会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知道这些成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它毕竟有理由暂时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马克思在他那部恰恰在当时完成的巨著中心满意足地指出,和日内瓦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巴尔的摩全美工人代表大会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作为工人摆脱资本主义桎梏所必须实现的第一个要求。

马克思认为,凡是黑种工人还带着奴隶烙印的地方,白种工人就不能获得解放。但是,消灭了奴隶制的美国内战的第一个果实,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这个运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扩展到加利福尼亚以至整个美洲^②。



① 参阅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页。

②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53页。



第十二章 《資本論》

(一) 陣痛

馬克思沒有參加日內瓦代表大會，因為在他看來，完成他的主 381
要著作（他認為他過去所寫的都不過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要
比參加任何代表大會對工人說來都更為重要。他這裡考慮的是從
1866年1月1日開始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修辭和釐清工作。開始
時工作進行得極為迅速，因為他“在長期的陣痛之後，當然願意享
受一下舐犢之樂”³⁵⁴。

這種陣痛所延續的年份幾乎比生理上孕育一個嬰兒所需要的
月份多了一倍。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說：或許從來沒有一部這樣
的著作是在比這更困難的條件下寫成的。他曾一再為他的著作定
下完成的期限：在1851年是“五個星期”，在1859年是“六個星
期”。但是這些計劃都被打破了，因為他的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和
无比的認真態度，不斷地驅策他去做新的探索。甚至他的最忠實
的朋友的執意規勸也未能使他在這方面有所動搖。

1865年年底這部著作便已寫成，但完成的只是一大堆草稿，
除了馬克思自己以外，這是任何人——甚至恩格斯——也不能為
之加工付印的。從1866年1月到1867年3月這一期間，馬克思
從這批浩瀚的草稿中去粗取精，把《資本論》第一卷加工成為一件

精美的“完整的艺术品”。这是他的卓越的工作才能的輝煌证明，因为在这一年又三个月期間內他經常鬧病，有时（例如，1866年2月）甚至是致命的險症；累累的債務压得他“头昏”；最后，筹备“国际”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也占去了他很多時間。

382 1866年11月，第一批原稿寄給了汉堡的民主著作出版家奥托·迈斯納，这人曾經出版过恩格斯論普魯士軍事問題的小册子³⁵⁵。1867年4月中旬，馬克思亲自把其余的原稿帶到汉堡。迈斯納是一个“很不錯的人”，稍事談判之后就把一切問題都談妥了。在等待初校样期間——书是在萊比錫刊印的——馬克思到汉諾威去訪問他的朋友庫格曼，在那里受到好客的庫格曼一家的极其殷勤的款待。馬克思在庫格曼家里度过了几个幸福的星期，他自己认为这是“在生活的荒漠中所遇到的最美丽和最使人流連的綠洲”³⁵⁶。他所以有这种好兴致，一部分也是由于汉堡社会的有教养的人士对他表示了尊敬和同情，而这在他原是极少遇到的。4月24日他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与我們所想像的大不相同……”^①，尤其是在“有教养的”官場中。恩格斯在4月27日的回信中写道：“我总觉得你为之絞了那样長時間腦汁的这部可詛咒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只要你不丢开它，你就永远不会、也不能摆脱困境。这个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拖垮了你的身体、精神和财力，所以我很理解，当你現在摆脫了这个梦魇，你一定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尤其是当你发觉你所剛剛重新进入的这个世界已不像先前那样阴暗的时候。”^② 写到这里，恩格斯表示了要迅速摆脱“倒楣的商务”的願望。他写道，只要忙于商务，便不能做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436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438頁。

任何其他事情。而自从他担任公司的首脑并担负更大的责任以来，他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馬克思在5月7日的信中关于这一点回答说：“我希望并且深信，一年之后我能赢得一个像样的生活，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没有你，我永远不会完成这部著作。要知道，每当我想到你主要为了我而把你那卓绝的才能浪费在商务上面，使它埋没，此外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烦恼，我的良心就总是感到噩梦一般的重压。”^①当然，一年之后或者任何其他时候，馬克思从来没有“赢得一个像样的生活”，而恩格斯也不得不再搞几年“倒楣的商务”；但地平线上毕竟开始比以前明朗一些了。383

在汉诺威的时候，馬克思给他的一位拥护者、矿业工程师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写了一封久拖未复的回信；这位迈耶尔原住柏林，不久前移居美国。这封回信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馬克思的“冷漠无情”。他写道：“您一定很不满意我，如果您知道您的那些来信不仅使我感到很大愉快，而且是我在那极端痛苦的时期的真正慰藉，您一定会更加不满意我。每一想到我把一位有高度原则性的人材争取到我们党的方面来，我就感到这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补偿。而且，您的那些来信充满了对我个人的最亲密的友情，而您会了解，我这同整个世界（官方世界）进行残酷斗争的人，对这一点是决不会估计不足的。

那末，我为什么没有给您回信呢？这是因为我一直徘徊在坟墓的边缘。因此，我必须把我能够工作的每一分钟用来完成我为之牺牲了健康、人生幸福和家庭的著作。但愿这个说明已经足够

^① 参阅《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441页。

使您諒解。我嘲笑那班所謂‘讲求实际的’人和他們的聰明。只有禽兽才会漠視人类的苦难，而只关心自己。但是，如果我沒有完成我的著作(哪怕是仅仅完成初稿)就死去，我就会认为我是真正不实际的。”^①

在这种兴致勃勃的情况下，馬克思接到一位他所不認識的律師瓦尔涅波尔德轉达給他的一个消息，說俾斯麦想利用他和他的卓越才能来为德国人民效力。馬克思很重視这个消息，但是他自然沒有为这种誘惑所陶醉；他的想法是和恩格斯一样的：“这个家伙的思想方式和眼光的特点是：用自己的尺子来衡量一切人。”^②但是，以馬克思素常的冷靜而論，他是不会相信瓦尔涅波尔德的話的。当北德意志联邦³⁵⁷还没有最后建立起来，而卢森堡事件³⁵⁸所
884 引起的对法战争的危險又只是剛剛过去的时候，俾斯麦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起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来結怨于剛剛轉到自己陣营来的資產階級的，因为資產階級甚至对于他的助手布赫尔和瓦盖納已經是抱着极端猜忌的态度了。

在返回倫敦途中，馬克思不是同俾斯麦本人，而是同他的一个親屬发生过一段小小的奇遇。他曾經以不无喜悅的心情把这段奇遇告訴給庫格曼。在輪船上，有一位以軍人氣派引起他注目的德国小姐，向他詢問倫敦車站的一些情况。她要等待几个小时才能坐上她要搭乘的列車，于是馬克思就以騎士的風度向她建議，同她一起游覽海德公园来消磨这段時間。“結果知道她名叫伊丽沙白·馮·普特卡默，是俾斯麦的内侄女，剛剛在柏林他家里住过几个星期。她認識很多軍人，因为在我們的‘勇敢的軍隊’中有不少出身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7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439頁。

于这个家族的‘英武的近卫軍人’。她是一个愉快而有教养的姑娘，但是骨子里浸透了贵族气味和普魯士精神。当她知道她已落到‘紅色人物’手中的时候，她是吃惊不小的。”^①但是，这位小姐并未因此而失去她的兴致。她給馬克思写了一封亲切的短信，以“孩子般的尊敬”向她的騎士表示了“由衷的感謝”，因为他对“一个未經世故的女孩子”做了种种的照顾；而她的双亲也为她还能在旅途中遇到好人表示高兴。

馬克思在倫敦完成了自己的著作的校对工作。甚至这一次也不免要对印刷的緩慢有所抱怨，但是到了1867年8月16日夜二时，馬克思終于向恩格斯报告說，最后一个印張(第49印張)的校样已經校对完毕。“这样，这一卷算是完成了。只是靠了你，这才成为可能的！沒有你为我所做的自我牺牲，我是决不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地拥抱你！……

問候你，我亲爱的、忠实的朋友！”^②

(二)第一卷

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章中重新綜述了他在1859年发表的一本书^③中关于商品和貨幣所做的闡述。这样做不仅是为求完备，而且也是因为，甚至最聪明的人也不能完全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而这也就是說，在叙述中，特别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是存在着缺点的。

① 參閱馬克思：《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4頁。

③ 指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

当然，那些咒罵《資本論》第一章的“含混的神秘主义”的德国学者們，是不屬於这种最聪明的人之列的。“初看起来，商品似乎是一种极平常的、毫不新奇的东西。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知道，它是一种充滿了形而上学的微妙性和神学的詭秘性的极古怪的东西。作为使用价值……它毫无神秘之处……例如，用木头做成一个桌子时，木头的形式就改变了。不过，桌子仍然是木头，仍然是一种普通的可感觉的东西。但是，这个桌子一旦成为商品，它就变成既是感性的又是超感性的东西了。它不仅用四只脚站在地上，而且在所有其他商品面前用头倒立着，并且在它的木头头脑里产生出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离奇得多的幻想。”^①这种写法使所有的“木头头脑”大为不满；这班人虽然能够大量发明超感性的奇想和神学的詭計，却从来不能創造一件像可触摸的普通木桌这样的感性实物。

单就文笔而論，这第一章实际上是馬克思作品中的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他接着就探討了貨币如何轉化为資本。假如在商品流通中是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末貨币所有者怎么能在按照商品价值买卖商品时从流通中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呢？他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現存的社会关系下面，貨币所有者在商品市場上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商品，而这种商品的消費乃是一种新价值的泉源。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是作为活的工人而存在的；工人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同时也为了維持自己一家的生活以保证在自己死后劳动力的延續，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生产这种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劳动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52頁。

時間，就是勞動力的價值。但是，以工資形式支付的這個價值，大大小於勞動力的購買者能夠從勞動力榨取的那個價值。工人的剩餘勞動，亦即工人超過為補償他的工資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而耗費的勞動時間，是剩餘價值和不斷增長的資本積累的泉源。工人的無償勞動養活着一切不勞動的社會成員；而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制度便是建立在這上面的。 386

但是無償勞動本身並不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獨有的特點。自從存在有產階級和一無所有的階級以來，一無所有的階級總是必須提供無償勞動。只要社會的一部分人獨占着生產資料，工人——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就必須在維持他們的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之外提供超額的勞動時間，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僱傭勞動是自從社會劃分為階級以來就存在的那種無償勞動制度的一個特殊的、歷史的形式。為了正確地理解這個歷史的形式，必須按照它的本來面目來研究它。

貨幣所有者只有在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才能把自己的貨幣變為資本。所謂“自由的”有兩種含義：一是他必須作為自由的人，可以像支配自己的商品一樣來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二是他必須沒有可以出賣的任何其他商品，沒有實際應用他的勞動力所必需的一切東西，也就是說，一貧如洗。自然界既不產生貨幣和商品的所有者，也不產生除了勞動力而外一無所有的人。這種關係既不是自然界本身所創造的，也不是一切歷史時代所共有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是以往的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更古老的社會生產形態死亡的產物。

商品生產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據以產生的歷史前提。現代資本的歷史開始於

16世紀時現代世界貿易和現代世界市場的產生。庸俗經濟學家³⁵⁹幻想，從前某個時候有過一批勤勞的優秀人物積累了財富，而大批沒有出息的懶漢則終於除了自己的身體以外別無他物可賣。這種想法是荒謬的，正像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憑借一知半解把封建生產方式的解体說成是工人的解放，而不說成是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一樣。工人雖然不再像奴隸和農奴那樣本身就是生產資料，但是同時他們也不再像獨立經營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那樣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正如馬克思在論資本原始積累一章中以英國歷史為例所詳細描述的那樣，廣大人民羣眾被人家用各種強暴的殘酷的方法剝奪了土地、生活資料和勞動工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自由的工人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資本出現在這個世界上時，它從頭到腳都沾滿着從它的每個毛孔里滲出的血和糞物。而當它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但把工人從運用他的勞動力所必需的資料分离開來，而且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種分离。

僱傭勞動跟以往各種無償勞動方式不同之處，就在於資本的運動是無限的，而資本對剩餘勞動的貪欲是無止境的。在那些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經濟形態中，這種剩餘勞動是為或大或小的需求範圍所限制的，而且在這些社会形態中不會從生產方式本身產生出對剩餘勞動的無限需求。在產品的交換價值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形態中情況就不同了。資本作為依靠別人勞動的生產者、剩餘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在強大有力、貪得無厭和卓有成效方面超過了以往一切建立在直接強制勞動之上的生產過程。對資本說來，重要的不是勞動過程本身，不是使用價值的生產，而是價值增殖過程，即交

換价值的生产，因为資本可以从交換价值中取得大于它所投入的价值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貪欲是永远不会滿足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以需要的滿足为限度，而交換价值的生产則沒有这种限度。

正像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統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也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統一。价值形成过程一直延續到資本以工資形式付出的劳动力价值为另一个与它相等的价值所补偿的时候。超过了生产的这个阶段，价值形成过程就变为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統一，商品生产过程就变为資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商品生产的資本主义形式。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資料是結合着的。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資本的这两个組成部分表现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不变資本轉化为生产資料、原料、輔助材料和劳动工具，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可变資本轉化为劳动力，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出自己本身的价值，此外还再生产出一定的多余部分，即本身可以变化、数量可多可少的剩余价值。馬克思就这样为自己开辟了研究剩余价值的明确道路。他揭示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絕對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形式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上各自起了不同的、然而而是决定的作用。

絕對剩余价值是由于資本家在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時間以外延长劳动時間所生产出来的。只要可能，資本家会把每一工作日延长到二十四小时，因为工作日越长，創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相反地，工人却清楚地感觉到，他在为抵偿工資所必要的時間之外所做的每一小时的劳动，都被人家不公平地剥夺了。他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来体驗，过長時間的劳动意味着什么。圍繞着工

作日长度所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刚一登上历史舞台时起就开始了，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而且不管他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竞争总是迫使他把工作日延长到人类劳动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除了工作、吃饭、睡觉以外还能像人一样地生活。马克思对英国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做了极其动人的描述。这个内战是从大工业诞生时起开始，而以十小时工作日的颁布告终的；而大工业曾促使资本家去打破自然和風习、年龄和性别、白昼和黑夜为剥削无产阶级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所赢得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作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社会阻碍，阻止了工人通过跟资本家间的自由契约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出卖给资本家，从而使他们陷于死亡和奴隶之境。

389 相对剩余价值是为了增加剩余劳动，通过缩短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创造出来的。在那些产品决定着劳动力价值的工业部门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为此必须不断地变革生产方法，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在论述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各章中所做的历史的、经济的、技术的和社会心理的综述，连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是最丰富的知识宝库。

马克思不仅指出机器和大工业为工人造成了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下也不曾有过的贫穷状况，而且指出机器和大工业在不断地使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时，也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做着准备。工厂法是社会对自己的生产过程的反自然形式的第一个自觉而又有计划的反作用。这种立法在调节工厂和作坊中的劳动时，原来不

过表现为对资本剥削工人的权利的干涉。

但是，事实的力量很快地迫使立法进而调节家庭劳动并且侵入亲权领域；从而立法被迫承认，大工业在破坏旧家族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经济基础时，同时也在破坏旧的家族关系本身。“旧家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瓦解不管如何可怕和可厌，但因大工业在家庭的范围之外，在社会的有组织的生产过程中给妇女和少年儿童以极重要的地位，故而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一个更高的形态，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式看成是绝对的，和把古罗马的家庭形式、或者古希腊的家庭形式、或者东方的家庭形式看成是绝对的，是同样荒谬的。但这种种家庭形式依次继起，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系列。同样显然，由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个人组成的工人总体，虽然在它的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是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而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下，是毁灭和奴役的祸源，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为人类发展的泉源。”^① 机器在 390 把工人贬低为自己的附属品的同时，也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可能性，从而使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有机会得到无愧于人的发展，而这一点是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根本做不到的。

在阐明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合理的工资理论。商品的价格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出现在商品市场上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而劳动则是通过劳动力这个商品的消费而产生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不可分离

^①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599页。

的尺度，但它本身並沒有價值。然而表面看來，勞動却似乎由工資償付了，因為工人總是在完工以後才得到自己的工資的。工資這個形式抹去了工作日分為有償勞動和無償勞動的一切痕迹。這就發生了與奴隸制下相反的情況。在奴隸勞動的情況下，甚至奴隸只是用來補償自己生活資料價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亦即實際上只是為自己而勞動的那一部分工作日，看來也似乎為主人的勞動。表面看來，他的全部勞動都是無償的。相反地，在僱傭勞動制度下，甚至剩餘勞動亦即無償勞動，也表現為有償的。前者是財產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後者是貨幣關係掩蓋了僱傭工人的白白的勞動。由此可見，——馬克思說道，——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轉化為工資的形式，亦即轉化為勞動本身的價值和價格的形式，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這種表現形式掩蓋了真實的關係，造成了截然相反的關係的假象，然而不論是工人或資本家的一切法律觀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騙局以及它所造成的一切關於自由的錯覺，庸俗經濟學的一切詭辯，却都是建立在這種表現形式上的。

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是工資的兩種基本的形式。馬克思根據計時工資的規律，證明了所謂工作日的縮短必然招致工資降低這種別有私圖的論調的空虛。事實恰恰相反：工作日的暫時的縮短會降低工資，而長期的縮短則提高工資；工作日越長，工資也就越低。

391 計件工資不過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是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資形式。它在工場手工業全盛時代廣泛流行，而在英國大工業的“狂飆”時期曾是延長工時和縮減工資的杠桿。計件工資對資本家極其有利，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勞動的監督成為多餘的，而且為克扣工資和玩弄種種欺騙創造了許多機會。相反

地，它却使工人受到很大損害，如：似乎能提高工資，實際却趨向於降低工資的過度勞動所造成的折磨；工人之間競爭的加強和團結的削弱；特殊一類的寄生者即中間人介入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從支付的工資中為自己撈取相當大的一部分，等等。

剩餘價值和工資間的關係，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不斷地為資本家再生產着資本，而且不斷地再生產着工人的貧困，一方面是占有一切生活資料、一切原料和一切勞動工具的資本家，另一方面是為了賺取一定量的生活資料而被迫向這些資本家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工人大眾，這一定量的生活資料至多剛夠維持他們的勞動能力和養活有勞動能力的無產者的新的一代。但是，資本不只是簡單地再生產它自身，它還不斷地擴大和增殖；馬克思在第一卷的最後一篇中便探討了這個“資本積累過程”。

不僅是剩餘價值產生自資本，而且資本也產生自剩餘價值。每年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在有產階級之間進行分配，被他們作為收入耗費掉，而另一部分則作為資本積累起來。從工人階級榨取來的無償勞動，現在又被用來作為進一步榨取更大量無償勞動的手段。在生產之流中，原來預付的一切資本，同直接積累起來的資本，亦即同已經轉化為資本的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不管它仍然掌握在積累資本的人手中或是別人手中——比較起來，總是一個趨於消失的量。建立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之上的私有財產的規律，通過自己的內在的、必然的辯證法轉化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商品生產的規律似乎使所有權建立在自己的勞動之上。392
平權的商品所有者的關係曾經是對等的。取得別人商品的唯一方法是出讓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是只有靠自己的勞動才能生產出來的。現在，所有權在資本家方面表現為占有別人無償勞動

或其产品的权利，而在工人方面則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本身的产品。

当現代无产階級开始看破事情的底細，当里昂的城市无产階級开始敲起警钟，而英国的乡村无产階級开始纵火的时候³⁶⁰，庸俗經濟学家发明了一种“节欲說”³⁶¹。按照这种学說，資本似乎是由于資本家的“自願节欲”而产生的。馬克思像拉薩尔在他以前所做的那樣，痛斥了这种学說。实际上，資本的积累全靠工人的被迫的“节欲”，全靠把工資强制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为資本积累基金。这就是对工人的“奢侈”生活所发的慨叹，为石工們在某天早餐时喝了一瓶香檳酒所作的无穷抱怨，以及基督教社会改良家为工人拟定的廉价食譜和資本家的諸如此类的非难攻击的真正来源。

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規律是：資本的增大包含着它的可变部分即轉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大。如果資本构成保持不变，如果一定量的生产資料經常需要有同量劳动力使之运转，那末显然，劳动力的需求和工人的生活資料基金就会随着資本的增加而增加，而且資本的增加越迅速，它的增加也就越迅速。正像簡單的再生产不断再生产着資本主义关系本身一样，資本积累也以更大的規模再生产着資本主义关系。这就是說，在一个极端上再生产着更多的資本家或更大的資本家，在另一极端上就再生产着更多的雇佣工人。因此，資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階級的扩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扩大是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在工人自己的日益增大的并以日益增长的規模轉化为追加資本的剩余产品中，絕大部分都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他們自己手中，使他們得以

393 扩大自己的消費的範圍，并更充裕地筹措衣服、家具等的消費基

金。可是，这一切絲毫不会改变工人所处的从屬地位，正像丰衣足食的奴隶仍然是奴隶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工人必須提供一定量的无偿劳动；即使无偿劳动的数量可能减少，但决不能减少到威胁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程度。如果工资提高得超过这种程度，那末获取利潤的刺激便会减弱，資本的积累便会弛緩，直到工资重新降低到与資本增殖的要求相符合的水准为止。

然而，在資本积累的情况下，只有当資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不变的时候，雇佣工人為自己制造的黄金鎖鏈才会松弛和減輕。实际上，随着資本的积累，在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有机构成中同时也发生一个偉大的革命。不变資本靠减少可变資本而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生产資料的量比并入它里面的劳动力的量增长得更快；对劳动的需求不是与資本的积累成正比例地增加，而是相对地减少。資本的积聚也以另一种形式产生这样的作用；这种积聚与資本的积累无关，而是資本主义竞争的規律导致大資本吞并小資本的結果。一方面，在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所吸引的工人，与追加資本的量相对而言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周期地以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資本，却越来越多地把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一脚踢开。这样就形成了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即超过資本价值增殖需要的劳动人口——产业后备軍。在不景气时期和平常时期，产业后备軍所得的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它沒有固定的工作或者依靠社会救济过活。但是無論在何种情况下，它总是削弱在业工人的抵抗力，使他們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

产业后备軍是积累的必然产物，亦即財富在資本主义基础上的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反过来它又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力。随着积累以及伴随它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資本的突然膨胀力也

394 增大了；这种膨胀力需要大量的人，以便在不縮減其他部門的生产規模的条件下把他們一下子投到其他市場或新的生产部門去。現代工业的特異的生活过程，即复苏、生产高漲、危机和停滯这样一种間有小的波动的十年周期的形式，就是以产业后备軍的不断形成、多少被吸收和重新形成作为基础的。社会财富、运用中的資本以及資本增殖的規模和力量越大，从而，劳动人口的絕對量和它的劳动生产力越大，相对的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軍也就越多。产业后备軍的相对量是随着财富力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产业后备軍比現役劳动軍越大，那些貧困跟劳动的痛苦成反比的工人階級的人数也就越多。最后，工人階級中的乞丐层和产业后备軍越多，官方公认的赤貧者也就越多。这是資本主义积累的絕對的、普遍的規律。

这个規律也决定了資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向。随着資本的积累和积聚的发展，規模日益广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科学在技术上的有意識的应用，土地的有計劃的共同开发，劳动資料向只能集体使用的劳动資料的轉化，一切生产資料因作为联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資料使用而实现的節約，也跟着发展起来。掠夺并壟断这一轉变过程一切利益的大資本家的人数在不断減少，同时，貧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却在日益增加，而且，人数不断扩大的、为資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构所訓練、联合和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憤懣也日益增长。資本的壟断变成了同它一起并在它之下发展起来的那个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資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們的資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了，剝夺者将被剝夺。

那时，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将重新恢复起来，但却

是在資本主义时代所已經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恢复起来，这个基础就是：自由工人的协作，他們对土地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創造的生产資料的共有制。当然，实际上已經建立在社会生产之上的資本主义所有制轉化为公有制，远不像建立在单个人的本人劳动之上的分散的所有制轉化为資本主义所有制那样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和痛苦的过程。在后一种情况下，問題是少数掠夺者剝夺人民群众，而在这里，是人民群众将剝夺少数掠夺者。 395

(三) 第二卷和第三卷³⁶²

《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遭到了和第一卷同样的命运。馬克思曾經希望这两卷能在第一卷之后很快出版，但是过了許多年他也沒有把它們完成付印。

新的日益深入的研究、纏綿的疾病以至死亡，使他未能把整个著作彻底完成，而只得由恩格斯从他的朋友的未完成的遺稿中編成后两卷。这些手稿是一些筆記、梗概、札記；既有理路連貫的篇章，也有只供研究者本人利用的簡短草稿。总之，这是从1861年到1878年这一长时期（尽管其間有过一些久暫不一的中断）中所进行的巨大腦力劳动的成果。

这些情况說明，我們不应到《資本論》后两卷中去寻求政治經济学上一切最重要問題的完滿的現成的答案，而只应去寻求一部分这样的問題的提法，以及有关應該按照什么方向去探求这些問題的答案的指示。正像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一样，他的这部主要著作也不是包含着一成不变的最后真理的聖經；但它却是启发进一步的思考、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和为真理而斗争的不竭的泉源。

这些情况也說明，为什么第二卷和第三卷在外观上、在文采上，不像第一卷那样完美、那样閃爍着智慧的火花。虽然如此，由于撇开了叙述形式方面的一切考虑而直接論述思想，它們却比第一卷給予許多讀者以更大的享受。从內容來說，这两卷是对第一卷396 的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是理解整个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遺憾的是，直到現在它們还没有改写成通俗的形式，以致广大受过教育的工人仍然不知道它們。

在第一卷中馬克思研究了政治經濟学的一个基本問題：財富是从哪里产生的？利潤的泉源是什么？在馬克思以前，这个問題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解答的。

认为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的“科学的”卫道者，那些甚至在一部分工人中也受到尊敬和信任的人，如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用一整套多少“似乎正确的”辯护理由和狡猾騙术来解釋資本主义的財富，說它是为了“酬报”企业主“慷慨”提供的生产資本而不断提高商品价格的结果，是对企业主所冒的“風險”的补偿，是对企业主“精神领导”的报酬，等等。这一切解釋都不外想把一些人的富有和另一些的貧穷說成是“公道的”，从而也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相反，资产階級社会的批判者，特别是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別，往往把資本家的致富說成是純粹的欺騙，甚至是借助于货币或生产过程的无組織而对工人进行的盜窃。由此出发，这些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空想的計劃，設法通过廢除货币和“組織劳动”等等来消灭剝削現象。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揭示了資本家致富的真正根源。他既未打算替資本家的財富辯护，也未譴責他們的非正义，而是第

一个指出利潤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落入資本家的錢袋的。他用两个决定性的經濟事实說明了这一点:第一,工人群众都是被迫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无产者;第二,劳动力这个商品現在具有这样高的生产率,以致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内生产出远远多于在这時間内維持劳动力本身的存在所必要的那个数量的产品。由于客观历史发展所造成的这两个純經濟的事实,无产者的劳动所創造的果实就自然而然地落入資本家手中,并且随着雇佣劳动制度的保存,必然地积累成巨額的、不断增大的資本。

因此,馬克思不是把資本家的致富解釋成对資本家的想像中 397 的牺牲和善行的某种酬报,也不是解釋成通常意义下的欺騙和盜窃,而是解釋成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从刑法观点看来完全合法的交易,这种交易也遵守着其他一切商品买卖所遵守的那些法律。为了充分揭明这种給資本家带来黄金果实的“无可非难的”交易,馬克思彻底发展了偉大的英国古典經濟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所发现的价值規律,換言之,就是說明了商品交換的內在規律,并把它应用于劳动力这种商品。价值規律以及馬克思从这一規律推演出来的工資和剩余价值的規律,換言之,即对雇佣劳动的产品如何在沒有暴力和欺騙的情况下自然地分为工人的微薄的生活費和資本家的不劳而获的財富这一事实所做的說明,——这就是《資本論》第一卷的主要內容。这一卷的偉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闡明了只有消灭劳动力的出卖即雇佣劳动制度,才能消灭剝削。

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面,我們始終置身于劳动的場所,即个别工厂、矿山或現代农业企业中。馬克思在这里所得出的結論对于每一个資本主义企业都是适用的。虽然他所談到的仅仅是作为整

个生产方式的典型的个别資本,但是当我们讀完这一卷时,我們就可以弄清楚每天产生利潤的情况,透彻地識破剝削的底蘊。在我們面前是堆积如山的、还浸透着工人汗水的剛剛出厂的各种商品,我們可以从它們身上清楚地分辨出为无产者的无偿劳动所創造,而又像整个商品一样合法地轉化为資本家财产的那一部分价值。我們在这里亲手触到了剝削的根。

但是,資本家的收获这时还没有运到仓库里去。剝削的果实就摆在那里,但还是采取着对企业主說来不适用的形式。只要資本家仅仅以商品堆积的形式占有这些果实,他就不会对自己的剝削感到高兴。他不是古希腊羅馬世界的奴隶主和中世紀的封建統治者,掠夺劳动者仅仅是为了維持他本人的奢华生活和供养自己的宫廷。对資本家說来,为了除开維持“符合自己身分的体面生活”以外还能不断增加自己的資本,必須把他的财产变为叮当作响的錢币。为此,必須把雇佣工人所創造的商品,連同包含在其中的剩余价值一起卖掉。商品必須从工厂仓库和农业仓库运銷市場;資本家跟随着商品从办公处走向交易所,走向店鋪,而我們也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随着他走向这些地方。

在演出資本家生活的第二幕的商品交換領域里,資本家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堡垒里,他是一个主人。那里有极其严格的組織、紀律和計劃性。相反地,在商品市場上却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亦即所謂自由竞争在支配着一切,在这里,誰也不关心別人,誰也不关心整体。然而,資本家正是通过这种无政府状态感觉到自己在一切方面对其他人、对社会的依賴。

他必須同自己的一切竞争者步調一致。如果他超过絕對必要的時間才卖掉自己的商品,如果他沒有儲备下足够的貨币来及时

地購買原料和一切必需物品以免企業在這段時間里停頓下來，如果他不設法使出售商品後重新回到自己手中的貨幣不被閒置起來，而投到有利可圖的方面去，那他就必然要大倒其楣。跑得最慢的挨狗咬；如果他不設法使他在作坊和商品市場之間的經常往來中的業務也像在作坊本身中一樣順暢地進行，那末不管他怎樣“認真地”剝削工人，他也得不到通常的利潤。他“理應獲得的”利潤的一部分將丟失到什麼地方去，只是不在他的錢袋中。

然而，單是這些還不夠。資本家要想發財致富還必須生產商品即有用物品。但是他必須按照社會所需要的那個數量來生產社會所需要的那些種類の商品。否則商品就會賣不出去，而隱藏在商品裏面的剩餘價值也將落空。但是個別資本家怎麼會知道這一切呢？誰也不會告訴他，在一定的時候社會究竟需要多少商品和什麼樣的商品，因為誰也不知道這一點。要知道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無計劃、無政府的社會裏面！每個個別企業主也處於同樣的狀態。但是從這種混沌、錯雜中仍然必須形成一個整體，它既能保證資本家的個別業務和他們的致富，又能保證整個社會的需要的滿足和它的延續。

更確切地說，從市場的一團混亂中，從它的無計劃的自發性 399 中，必須產生出：第一，個別資本的不斷循環，即生產、銷售、購買和重新生產的可能性，而且，資本要不斷改變自己的面目，從貨幣形態轉化為商品形態，反過來又從商品形態轉化為貨幣形態。這些階段必須互相呼應；必須有貨幣的儲備，以便隨時利用市場行情進行購買和彌補企業的日常開支。另一方面，隨着商品的出售而逐漸收回的貨幣必須立即重新加以運用。個別資本家初看起來似乎是彼此完全無關的，在這裏却實際上結成了偉大的兄弟關係，因

為他們彼此經常地通過信用、銀行制度貸放所需要的款項，同時借用儲存的貨幣，從而使個人和社會都能不間斷地進行商品的生产 and 銷售。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只能把信用說成是“便利商品交換”的巧妙制度，而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第二卷中則附帶地說明：信用不過是資本的存在形式，資本的兩個生活階段——生產階段和商品市場階段——之間的紐帶，同時也是各個資本的貌似獨立的運動之間的紐帶。

第二，必須在個別資本的錯綜混亂中，保持整個社會的生产和消費的不斷循環，同時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條件——生產資料和工人階級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本家階級的財富的日益增殖，即社會總資本的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運動——始終得到保障。自亞當·斯密時起一百年來，馬克思第一個在他的著作的第二卷中把與此有關的一系列問題放在規律性的牢固基礎之上，雖然並沒有徹底給以解決。他指出了，怎樣從個別資本的無數錯綜混亂的運動中形成某種整體；這個整體的運動怎樣不斷地搖擺於高度的景氣和危機時的崩潰之間，以及怎樣在重新恢復正常的關係以後不久又破壞這種關係。在这一切情況下，社會本身生活的維持和經濟的進步對現代社會說來不過是一種手段；它的真正目的是資本以日益巨大的規模實現遞進的積累。

但是，資本家的“荊棘叢生的道路”並不到此為止。現在，在越
400 來越多的利潤轉化為貨幣以後和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大問題——如何分配鹵獲物。有各種各樣的集團對此提出了要求，如
在企業主之外有商人、銀行家和土地所有者。他們都會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內幫助了對僱傭工人的剝削或工人所製造的商品的販賣，因此都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利潤。但是，利潤的分配是一個比

初看起来远为微妙复杂的课题。因为，当利润刚刚从工厂产生出来时，各个企业主之间，依企业种类的不同，在所获得的利润方面确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

在某个生产部门中，商品的生产 and 销售进行得极为迅速，因而资本在最短期间内便连同增殖额一起收回了。它迅速地重新发挥机能并提供新的利润。在另一个部门中，资本在生产中占用许多年，要在长时期以后才带来利润。在某些生产部门中，企业主不得不把自己资本的大部分投入死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昂贵的机器等等，这些东西不管对榨取利润如何必要，它们本身并不带来任何东西，并不产生利润。在另一些部门中，企业主可以花极少的费用把自己的资本主要用于雇用工人，而每个工人都是给企业主生产金蛋的勤劳的母鸡。

这样，在利润的生产本身中，在各个资本家之间就产生很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在资产阶级社会眼中，比起收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独特的“分配”来，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公道”。那末怎样在这里确立卤获物的一种平衡、一种“公道的”分配，使每个资本家都能得到“自己的一份”呢？这一切问题是不能通过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分配来解决的。和生产一样，分配在现代社会中也带有无政府的性质。在这里，根本谈不到可以称之为社会措施的任何真正的“分配”；有的只是交换、只是商品流通、只是买卖。但是，每一类剥削者和每一个剥削者之间，怎样仅仅通过他们之间的盲目的商品交换，来取得从资本统治的观点看来是“公道的”、为无产阶级劳动力所创造的那一部分财富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回答了这些问题。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分析了资本的生产 and 利润的生产的秘密，在第二卷中叙述了 401

資本在工厂和商品市場之間、社会的生产和消費之間的运动，而在第三卷中則研究了利潤的分配。他在进行这种研究时仍然遵守了同样的三个基本条件：（1）資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遵循着确定的、經常起作用的、虽然是沒有为当事者所意識到的規律；（2）經濟关系不是建立在掠夺和盜窃这种暴力方法之上的；（3）某种社会理性对于整体的有計劃的作用是不存在的。馬克思以透徹的邏輯性和明晰性仅仅从交換的結構，換言之，从价值規律和由此而推演出来的剩余价值規律，引伸出了資本主义經濟的一切現象和关系。

通观馬克思的这一著作的整体，可以說，包含着关于价值規律、工資和剩余价值学說的第一卷揭示了現代社会的基础；而第二、三卷則展示了这一基础之上的各层建筑。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比喻來說，第一卷揭露了社会机体的制造生命汁液的心臟，而第二、三卷則說明了整个机体直到表皮的血液循环和营养。

在后两卷中，我們随着內容来到了与第一卷完全不同的境界。在第一卷中我們是在作坊中，在劳动这个社会的深层矿井中探索了資本家致富的泉源。在第二、三卷中我們是在地面上，在社会的正式舞台上走动。在这里，出現在前台上的是貨棧、銀行、交易所、銀錢业、“穷困的地主”及其忧虑。在这一切当中根本沒有工人出場。实际上，工人在他自己飽受剝削以后，对于在他背后演出的这一切是漠不关心的。我們只是在晨光熹微中工人成群結队地奔赴工厂和暮色黄昏中工厂吐出他們的长长行列时，才在生活中，在吵嚷忙碌的大群生意人当中看到他們。

初看起来也許会觉得不可理解，資本家在获取利潤方面的私人忧虑和在瓜分赃物方面的相互爭吵对于工人又有什么关系。但

是，《資本論》的第二、三卷在透徹理解現代經濟結構方面，实际上是和第一卷同样必要的。当然，这两卷对于現代的工人运动來說不像第一卷那样具有决定的根本的历史意义。但是，它們包含着对于无产階級在实际斗争中的精神武装來說来具有无可估量价值的丰富真知灼見。我們現在仅仅举两个例子。

在第二卷中，馬克思在考察社会如何能够从許多資本的錯綜 402 混乱的运动中获得正常营养的时候，自然地涉及了危机的問題。我們不能指望这里会有关于危机的有系統的、教科书式的論述；这里只有一些附带的提示。但是熟悉这些提示对于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說来是会有很大益处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家、特别是工会的鼓动家总是断言，危机的产生首先是由于資本家的短見，因为資本家根本不願意理解，工人群众是他們的最好的主顾，而只要提高工人的工資，就足以获得有购买力的主顾并消除爆发危机的危險。这已經成了它們的宣傳鼓动的口头禪。

不管这种見解如何流行，它毕竟是完全不正确的。馬克思曾用下面的話駁斥了这个見解：“說危机起因于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这完全是一种同語反复。除了乞丐或‘騙子’的消費，資本主义制度只承认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承认有其他种类的消費。商品不能卖出，这不外就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购买者即消費者……如果有人想給这种同語反复以更深刻的論据，說什么工人階級在他自己的生产物中所得的部分过小，因而只要他們能够得到生产物中較大的一份，也就是說，他們的工資能够提高，他們就可以摆脱不幸，那末我們只要指出一点来回答就够了，即每次危机来临之前都有这样一个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工資总是普遍提高，而工人階級实际上获得了年生产物中用于消費

的那个部分中的較大一份。照这些有着簡單的(!)健全的人类理智的騎士看来,这样的时期應該是反而把危机推得更远了。可見,資本主义生产包含着一些不以人的善意或恶意为轉移的条件,这些条件只能使工人階級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幸福,而且这幸福不过是預报危机的海燕罢了。”^①

实际上,第二卷和第三卷使我們能够极深刻地洞察危机的本质。危机不过是資本的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在追求积累、追求增殖的发狂般的、貪而无厌的冲动的驅使下,通常总是很快地突破消費的一切界限,不管消費怎样由于某一个別社会阶层购买力的提高或由于获得了完全新的銷售市場而急速地扩大。因此,應該拋棄那种隱藏在通行的工会宣傳背后的思想,即认为資本和劳动之間存在着利益的協調,而只是由于企业主的短見才看不到它。同时也應該放棄医治資本主义的疾病——它的經濟无政府状态——的任何希望。雇佣工人爭取提高物质生活的斗争,在自己的思想武庫中有着千百种真正精銳的武器,而无須乎借助于理論上不通和实践上曖昧的論据。

另一个例子。馬克思在第三卷中第一次科学地說明了政治經濟学始終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个現象。这个現象就是:不管資本在怎样千差万别的条件下投入各个生产部門,它照例总是带来所謂“通常的”利潤。初看起来,这个現象似乎同馬克思自己所做的那个說明,即資本主义財富来自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是相矛盾的。确实,那个把較大一部分資本投入死的生产資料的資本家,怎样会和他那投入这方面的資金很少、因而能够役使較大量活劳动的伙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卷,第507—508頁。

伴获得同样多的利潤呢？

馬克思极其简单地解答了这个謎。他指出，利潤的差別怎样由于某些商品按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另些商品按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而拉平，并形成一切生产部門所共同的“平均利潤”。資本家自己根本沒有想到这一点，他們之間也沒有任何自觉的協議，但是他們通过自己的商品的交換，似乎把从工人那里剝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汇总在一起，然后和睦地分配剝削的总收获，使每个資本家都按照他的資本量得到相应的一部分。因此，个别的資本家所获得的完全不是他直接剝削所得的利潤，而只是他的全体伙伴所得利潤中他應該分得的那一份。“以利潤而論，各个資本家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而相互发生关系的。在这个公司里面，每个股东所应得的那份利潤，是按照資本的百分率平均分配的；因此，不同的資本家的利潤，只是依他們投入这个共有企业的資本量，依他們参与这个共有企业的股数……而有所区别。”^① 404

看来似乎干燥无味的“平均利潤率”規律，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真知灼見啊！他多么清楚地揭明了資本家的階級團結的坚固物质基础：資本家們在日常斗争中是彼此敌对的兄弟，而对工人階級則形成一种共济会³⁶³式的团体，这个团体在对工人的总的剝削上是有着最深切和最自私的利害关系的。資本家当然絲毫沒有意識到这些經濟規律的作用，但是根据統治階級的万无一失的本能，他們却理解到自己的階級利益以及这些利益跟无产階級利益的对立。令人遺憾的是，这种自发的理解在历史上的历次暴風雨中始終比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科学地闡明和論证了的、工人的階級自

^①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卷，第178頁。

觉,要更加坚固和可靠。

这两个信手拈来的简短例子表明,《資本論》的后两卷包含着多少足以启发有文化的工人去思考和加深認識的丰富宝藏,有待人們去加以普及。这两卷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却比任何現成的真理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它們启发思考,促进批判和自我批判,而自我批判正是馬克思遺留給后世的学說的最基本的要素。

(四)《資本論》的遭遇

在第一卷完成之后,恩格斯曾希望馬克思在“摆脱了这个梦魇”之后能够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希望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馬克思的健康状况沒有改善多久,而他的生活也依然处在風雨飄搖之中。他认真地考虑过要迁居到生活費用远为低廉的日内瓦去,但是命运却使他不得不仍然留在倫敦,留在大英博物館的宝藏旁边。他想为自己著作的英譯本找一个出版人,同时在第一国际的运动走上健全的軌道以前,他不能也不願意放棄对它的精神领导。

他的二女儿劳拉和“学医的克里奥洛人”保尔·拉法格的結婚
405 是他家的一件喜事。他們二人在1866年8月就已經訂婚了,但是双方商定要在未婚夫完成医学教育以后再考虑結婚。拉法格因参加列日的学生代表大会而被巴黎大学在毕业前两年开除;他因国际的事情来到倫敦。作为蒲魯东的拥护者,他本来跟馬克思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只是由于礼貌的关系才拿着托倫的介紹信去馬克思家里。但是发生了常常发生的事。馬克思在二人訂婚以后写信給恩格斯道:“这位青年起初总是糾纏我,但不久就把这种眷恋

从老子移到女儿身上。他的經濟状况还不错，因为他是从前的一个殖民地种植場主的独生子。”^① 馬克思告訴他的朋友說，拉法格是个漂亮的、有教养的、性格剛毅的、体格健壯的青年，是一个很不錯的人，只是过于嬌生慣养，并且过于“天真”。

拉法格生于古巴島的圣地亚哥，但九岁时便来到法国。他从他的黑白混血的祖母身上继承了黑人的血液。他自己很喜欢談到这一点，而他的暗淡的肤色和端正面孔上的一对触目的大眼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混血也許就是拉法格的某种固执性格的来由；馬克思有时为他的这种固执而半帶恼怒地嘲笑他的“黑人脑袋”。但是他們之間的这种善意的嘲弄的語調，只是表明他們彼此相知之深罢了。对馬克思來說，拉法格不但是一个給他的女儿創造生活幸福的佳婿，而且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得力助手，是自己的精神遺產的忠实保护者。

馬克思当时主要关心的是他的书能否成功。1867年11月2日他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我的书的緘默使我焦躁不安。我沒有听到什么，也沒有看到什么。德国人是好样的。作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意大利人的僕从，他們在这方面的功績的确使他們有权不理睬我的著作。我們在德国的朋友不懂得宣傳。但是，我們必須像俄国人那样——等待。忍耐是俄国的外交和成功的秘訣。但是，像我們这些只能活一次的人，也許会等不及就死去的。”^②

这段話里所流露出来的焦急情緒虽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毕竟并不完全正确。

当馬克思給恩格斯写这封信的时候，书还剛剛出版不过两个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403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501—502頁。

406 月，而在这样短的期間里是不能写出什么内容充实的評論的。如果問題不是在于評論的内容充实，而只是在于“轰动一下”，——馬克思认为这在开头时对于影响英国是最为必要的，——那末恩格斯和庫格曼在这方面已經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也不能責备他們做得过于死板。他們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他們爭取到在許多資產階級報紙上刊登書籍出版的簡訊或者轉載序言。他們甚至迎合時尚，准备了一个聳人听闻的广告：預告要在《Gartenlaube》〔《涼亭》〕杂志上刊登关于馬克思的傳記性文章和馬克思的肖像。但是馬克思本人請求他們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我认为这种作法有弊而无利，并且有損科学工作者的尊严。迈耶尔的百科辞典編輯部許久以前来信要我寄給他們一份傳記。我不但沒有寄給他們，甚至連信也沒有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³⁶⁴恩格斯为《涼亭》写的文章——作者自己說它是一篇“急就的和非常粗糙的东西”——后来刊登在約翰·雅科比的机关刊物《Zukunft》〔《未来报》〕上（这个报自1867年起由格維多·魏斯在柏林出版）。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一段奇特的遭遇³⁶⁵。李卜克內西曾把它删节后轉載在《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民主周刊》〕上，这引起了恩格斯的不客气的指責：“小威廉現在竟墮落到不敢說拉薩尔抄襲了你，而且抄錯了。这就閹割了整个傳記。为什么还要把它刊登出来，——这就只有他自己明白。”^①大家知道，李卜克內西是完全贊同傳記中被刪去的那段話的，但是他不願得罪剛剛脫離施韦澤并且正在帮助建立爱森納赫派的拉薩尔派集团。可見，不仅是书，甚至文章也有它自己的命运。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262頁。

但是，如果不是在最初几个月；那末总是在不久之后，馬克思終于盼到了几篇关于他的书的好評。例如恩格斯在《民主周刊》上³⁶⁶，施韦澤在《Soc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約瑟夫·狄慈根在《民主周刊》上发表的評論。恩格斯是不消說的；馬克思也承认施韦澤虽然有个別錯誤，但确是钻研了这部书，并且能够理解它的中心思想；至于狄慈根，馬克思只是在自己的书出版后才第一次听到他；馬克思称贊他有哲学头脑，虽然没有对他做过高的评价。

1867年第一次出現了“专家”的評論。这就是杜林。他写了一篇⁴⁰⁷評論馬克思著作的书評，刊載在迈耶尔辞典的《附录》里，但是，按照馬克思的意見，这篇书評并没有抓住《資本論》中的新的基本因素。不过大体上馬克思并没有对这篇評論感到不滿。他甚至說它是“很有礼貌的”，虽然他也推測到，杜林写这篇文章与其說是出于对书的兴趣和同情，无宁說是出于对罗雪尔和其他大学权威的恶意。恩格斯則从一开始就对杜林的文章不大滿意，而这一点表现出他比馬克思更有远見。事实很快地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杜林不久就改变态度，不遗余力地来攻击馬克思的书了。

馬克思在其他“专家”那里的遭遇也并不是愉快的。甚至八年以后，在这班老爷們里面，还有一个人謹慎地隱匿了姓名，煞有介事地宣布說，馬克思作为一个“自学者”，在科学方面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既然有諸如此类的評論，那末也就可以理解馬克思在談到这班人时通常所用的那种辛辣語調了。不过，他也許过多責怪了他們的恶意，而較少責怪了他們的无知。他的辯证方法的确是他們所不理解的。下面的事实就說明了这一点。这就是，甚至那些不乏善意和經濟知識的人，对馬克思的书也感到难于理解，而相反

地，那些在經濟學方面修養很差並且多少敵視共產主義的人，只要曾經很好地掌握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便都極其熱情地談論這部書。

例如，馬克思曾經以不公正的嚴厲口氣談到弗·阿·朗格的一本關於工人問題的書³⁶⁷，因為在這本書的第二版中作者曾詳論了《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寫道：“朗格先生對我大加贊揚，目的只是為了顯出他自己的重要。”朗格的目的絕對不在這裡，他對工人問題的誠摯的關心是毫無懷疑的余地的。但是馬克思的下面這個說法卻是完全正確的，即：第一，朗格對黑格爾的方法一竅不通；第二，他尤其不理解馬克思應用這個方法的批判方法。朗格的確把問題頭足倒置了。他說，拉薩爾對待黑格爾的思辨方法要比馬克思更為自由和獨立，而馬克思的思辨形式是同他的哲學典範的手法極為接近的。他認為，在該書的許多部分中，例如在朗格所不大重視的價值理論方面，這種形式是勉強地套到所論述的主題上去的。

弗萊里格拉特（馬克思曾把第一卷贈送給他）關於第一卷的評論尤其奇特。1859年以後二人間的友誼仍然保持着，雖然中間由
408 於一些第三者的緣故也曾發生過隔閡。這時年近六十的弗萊里格拉特已由於他所經管的銀行分行的倒閉而賦閒，於是打算回德國去，因為他在那裡有一筆大家都知道的社會贈款³⁶⁸足以使他安度晚年。他給老友寫的最後一封信——此後二人即未再通信——對年輕的拉法格夫婦的婚事表示了誠懇的祝賀，對贈給他的《資本論》第一卷也表示了同樣誠懇的感謝。弗萊里格拉特寫道，讀過這本書使他深受教益並且得到最大的樂趣。他認為，書也許不會馬上獲得極大的成功，但正因為這個緣故，它的影響將更為深遠和持久。“我知道，萊茵河畔的許多商人和廠主都對《資本論》極為贊賞。書將在這些人當中達到自己的目的，此外它還將成為學者必備的

参考书。”的确，弗萊里格拉特曾說自己仅仅是一个“灵感式的經濟学家”，而且不管是对于“黑格尔还是黑赫尔”，他是終生都抱有反感的。但是他毕竟在倫敦这个世界貿易的中心住了大約二十年，因此他只是把《資本論》第一卷看成是青年商人的指南，至多也只是把它看成是有用的参考书，这确是一件十分可惊異的事。

卢格的評論却完全不同。虽然他极端仇視共产主义，并且沒有任何經濟知識，但他曾經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写道：“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給各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和衰亡、陣痛和可怕的苦难岁月投射了灿烂的、有时是令人目眩的光輝。关于无偿劳动所創造的剩余价值，关于对曾經为自己工作的工人的剝夺，以及关于未来对剝夺者的剝夺的研究，都是經典式的。馬克思学識淵博，有着卓越的辯证法的才能。这部著作超出了許多人上和报刊作家的水平，但毫无疑问地它将深入人心，并且尽管它的构思宏大，甚至正是由于构思宏大，它定将发生强烈的影响。”路德維希·費尔巴哈也做了类似的評論；但是由于他自己的思想发展情况，他不大重視作者的辯证法，而无宁重視“书中有着大量极其有趣的，无可爭辯的，虽然是使人战栗的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他的道德哲学：沒有生活上最必要的东西，也就沒有道德的必要性³⁶⁹。

第一卷的譯本最早出現在俄国。早在1868年10月12日馬克思就在信中告訴庫格曼^①，一个彼得堡的出版家給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他的书的譯本已在印行中，并且請他寄去一張自己的照片^②作为里封而的裝飾。馬克思不願意在这件小事上拒絕自己的“好朋友們”即俄国人。他觉得这是一种命运的諷刺，因为他用

① 參閱馬克思：《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頁。

② 簽字的照片。

三種文字——德文、法文和英文——對俄國人不倦地連續鬥爭了二十五年，而他們却總是表現出是他的“同情者”。他反對蒲魯東的著作，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俄國那樣得到暢銷。但是他並沒有十分重視這件事，他說這純粹是一種追求西歐最極端事物的“貪食症”。

但這個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雖然譯本直到 1872 年才出版，但它是一件嚴肅的科學工作，馬克思本人在譯本完成後也承認它“譯得很出色”。譯者是以筆名“尼古拉·遜”聞名的丹尼爾遜；最重要的几章是勇敢的青年革命家洛帕廷翻譯的。1870 年夏天洛帕廷拜訪馬克思以後，馬克思曾這樣描寫他說：“他有靈活的、批判的頭腦，愉快的性格，像俄國農民一樣地刻苦，他對什麼都感到滿足。”^①俄國的书報檢查機關是根據如下的理由許可譯本的出版的：“雖然就信仰來說作者是一個十足的社會主義者，而且整本書都表現出十分肯定的社會主義性質，但是考慮到該書的敘述並非任何人都能理解，另一方面，這種敘述又具有科學的、數理的論證形式，因此本委員會認為該書可免于法律追究。”譯本在 1872 年 3 月 27 日問世，到 5 月 25 日就銷行了一千部——全部印數的三分之一。


同時法譯本也開始出版，它和大體同時出版的德文第二版一樣，都是分冊出版的。法譯本是約·盧阿在馬克思本人的大力幫助下翻譯出來的。這對馬克思說來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抱怨說，還不如他自己親自翻譯來得輕鬆。但是也正因为這個緣故，他認為法譯本有着甚至可以與原書媲美的獨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383 頁。

立的科学价值³⁷⁰。

《資本論》第一卷在英国不像在德国、俄国和法国那样成功。关于它，只在《Saturday Review》〔《星期六評論》〕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評，贊美它的行文，說干燥无味的政治經济学問題在馬克思⁴¹⁰笔下获得了独特的魅力。恩格斯为《Fortnightly Review》〔《双周評論》〕写的一篇长文，尽管与該刊編輯部有密切关系的比斯利曾为爭取它的发表而大力奔走，但終于被編輯部以“过于枯燥”为理由退稿了。馬克思对英譯本寄予很大的希望，但英譯本在他生时終未出現。





第十三章 国际的全盛时代

(一)英国、法国、比利时

411 《資本論》第一卷問世前不久，即从1867年9月2日到8日，国际在洛桑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是这次大会不像日内瓦大会那样盛大。

总委员会在7月发出了一个通告³⁷¹，号召多派代表参加大会。这个通告极其枯燥无味地概述了国际成立第三年的活动。只有瑞士方面报告了运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不过，比利时的运动也在不断发展，那里对馬尔舍恩罢工工人的血腥镇压³⁷²，引起了无产阶级的愤慨和激怒。

此外，通告还历述了妨碍在各国进行宣传的种种情况。其中谈到，1848年前对研究社会问题表现出那样深切的关心的德国，现在已经完全埋头于统一运动。在法国，由于工人阶级只享有有限的自由，以致尽管国际曾经积极支持那里发生的罢工，却没有在那里获得可以预期的扩展。通告这里指的是1867年春巴黎铜匠的大规模罢工，这次罢工后来发展成为争取罢工自由的原则性斗争，并以工人的胜利结束³⁷³。

通告对英国也做了温和的责备，指出它只顾埋头于选举改革，而暂时忽略了经济运动。但是选举改革已经完成了。迪斯累利在

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了比格莱斯顿的原案稍为广泛的选举改革，也就是说：被迫给予城市的所有房客以选举权，而不管他们所付的房租多少。因此，总委员会表示希望，英国工人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认清国际的有益作用的时候了。

最后，总委员会谈到了北美的协会，说那里的工人已在一些州⁴¹²里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接着通告强调指出，每个支部无论大小都有权选派一名代表出席大会；会员超过五百人的支部，每五百人可以选派一名代表。大会议程中列入了下列问题：（1）工人阶级的国际采取哪些实际手段才能为工人的解放斗争创立一个共同的中心？³⁷⁴（2）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利用他们给予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贷款来促进自身的解放？

可见，议程大致涉及到了共同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附带任何备忘录来说明议程的各个细节。埃卡留斯和乐器工人杜邦作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到了洛桑。杜邦是负责法国方面的通信书记，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工人。他由于荣克未出席而担任了会议的主席。出席代表共七十一人。德国代表中有库格曼、弗·阿·朗格、路德维希·毕希纳（《物质和力量》一书的作者）和拉登道夫——勇敢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的猛烈反对者。罗曼语系国家的代表占了绝大多数；除了少数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以外，出席的都是法国人和讲法语的瑞士人。

蒲鲁东派这次在总委员会以前很久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三个月以前他们就拟定了大会的议程，其中规定要讨论下列问题：作为社会相互关系的基础的互助，相互服务中的平等，信用和人民银行，相互保险设施，男女的社会地位，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作为法的监视者和维护者的国家，刑法，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十个问题。

結果造成了極大的混亂；我們沒有必要對此詳加敘述，因為這一切既和馬克思毫無關係，而通過的那個有些自相矛盾的決議也始終不過是一紙空文。

大會在實踐性質的問題方面比在理論問題方面獲得了更大的成功。它批准了總委員會設在倫敦的總委員會，確定會員每年的會費為十生丁或一格羅申，並且規定如期交納會費是選派代表出席每年的代表大會的條件。其次，代表大會還通過決議說，爭取工人階級社會解放的鬥爭同工人階級的政治積極性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而爭取政治自由是第一件絕對必要的事情。代表大會非常
413 重視這項決議，甚至決定要每年重申這項決議。最後，它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自由同盟”³⁷⁵也採取了正確的態度。這個同盟是不久前從激進資產階級當中產生的，並且在國際剛剛召開過第一次大會之後就在日內瓦召開了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對於該同盟想騙取信任的種種嘗試，國際大會用一個簡單的綱領性聲明答復說：只要對我們自己的目的有利，我們將樂於支持你們。

奇怪然而也許完全自然的是，這次開得不大成功的大會比前一次大會在資產階級世界中引起了遠為巨大的重視，雖然前一次大會是在德國戰爭余波未息的時候召開的。例如，英國報刊，首先是埃卡留斯為之寫通訊的《Times》（《泰晤士報》），密切注視了洛桑大會，雖然它們對第一次大會根本未加理會。當然，資產階級報刊少不了要嘲笑一番，但是總的說來對國際的態度卻變得越來越嚴肅了。馬克思夫人在《Vorboten》（《先驅》）上寫道：“當人們拿這次大會同它的異母弟和平大會比較的時候，這種比較總是有利於長兄的；人們把國際看做動人心魄的命運悲劇，而把和平大會只是看做一出滑稽戲。”³⁷⁶馬克思也為此感到欣慰，雖然洛桑的爭論不

能使他滿意。“事情在向前发展着……而且我們沒有經費！在巴黎有蒲魯东的陰謀，在意大利有馬志尼的陰謀，在倫敦有心怀嫉妒的奧哲尔、克里梅尔和波特尔，在德国有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薩尔分子！我們可以十分滿意了！”^①但恩格斯則认为，洛桑通过的一切決議都是一文不值的，而只有总委员会留在倫敦一事是重要的。的确，問題的本质正在这里，因为从国际成立第三年起，它的平靜发展的时期就結束了，而接着到来的是火热斗争的时期。

洛桑大会结束后不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导致极重大后果的冲突。1867年9月18日，在曼彻斯特发生了芬尼亚社社員³⁷⁷白昼武装襲击运载两名被捕的該社社員的警察囚車的事件：他們用武力打开了囚車，釋放了兩名被捕者，并开枪打死了押送的警官。沒有发现真正的肇事者，但是从大批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員中挑选出几个人来加上了杀人的罪名，并且把其中的三个人絞死了，虽然在极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中並沒有举出任何不利于被告的确凿罪证。这⁴¹⁴个事件在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且发展到“芬尼亚社騷动”的地步。12月間芬尼亚社社員在克勒肯維尔区（倫敦的一个几乎居民全是小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区）監獄墙边进行了一次爆炸，炸死了十二个人，伤百余人。

国际本身跟芬尼亚社社員的密謀毫无干系。至于克勒肯維尔区的爆炸事件，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它加以譴責，說它是一件使芬尼亚社社員本身受到最大損害的大蠢事，因为它减弱甚至完全打消了英国工人对爱尔兰事业的同情。但是英国政府鎮压奋起反抗对爱尔兰祖国的长期无耻压迫的芬尼亚社社員的方式本身，即把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6—207頁。

他們当做刑事罪犯来对待这件事，不能不激起一切有革命思想的人的愤怒。还在1867年6月，馬克思就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帮卑鄙无耻的家伙竟把对待政治犯不比对待謀杀者、拦路强盜、伪币制造者和男色者更坏这一点，当做英国的人道主义来宣揚哩！”^①恩格斯則更加激动，因为莉希·白恩士（恩格斯在她的姐姐瑪丽死后已經把爱情轉移到她身上）是一位热烈的爱尔兰爱国者。

但是，馬克思所以对爱尔兰問題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还有着比同情被压迫民族更为深刻的根源。他的研究使他得出一个信念，即爱尔兰人的解放是英国工人阶级解放的必要前提，而英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又是欧洲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只要英国地主寡头仍然保持着爱尔兰这个巩固的前哨，要推翻它就是不可能的。一旦爱尔兰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一旦他們成为自己本身的立法者和統治者，亦即获得自治，那末消灭土地貴族（其中大部分是英国大地主）的事业就远比在英国容易，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經濟問題，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問題；爱尔兰的大地主不像在英国那样是民族的傳統官方代表，相反地，他們是人民的不共戴天的压迫者。只要英国军队和英国警察一离开爱尔兰，那里立即就会爆发土地革命。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馬克思认为它在把爱尔兰完全变为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向英国市場供应肉类和羊毛的牧场方面，是和英国貴族有着共同的利益的。但是，资产阶级对爱尔兰目前的經濟制度感兴趣，还有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理由。由于租地的日益集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457頁。

中,爱尔兰不断把过剩人口投向英国劳工市场,从而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工资的降低以及物质和文化状况的恶化。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都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英国无产阶级和爱尔兰无产阶级。普通英国工人都把爱尔兰工人当做自己的竞争者加以仇视,对他们摆出统治民族一员的身分。这样,他们就成为贵族和资本家反对爱尔兰的工具,并且加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自己的统治。英国无产者对爱尔兰工人抱着宗教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往时美国奴隶制诸州的白种工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爱尔兰人也连本带利地加以回敬。爱尔兰人把英国工人看成是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同谋者和愚蠢的工具。这种敌对关系又受到报刊、僧侣、滑稽杂志,总之,受到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的蓄意煽动,使得具有组织性的英国工人阶级陷于软弱无力。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祸害也横越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妨碍了英美无产阶级的任何诚恳而真挚的合作。如果说国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加速英国这个资本的世界首都的社会革命,那末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国际必须在任何地方都公开站在爱尔兰一边,而总委员会的任务则是要唤起英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说来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和人道的问题,而是他们自身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在往后的几年中也为完成这个任务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正像他把波兰问题(这个问题自日内瓦大会以来就从国际的日程上消失了)的解决看做推翻俄国霸权的杠杆一样,他把爱尔兰问题也看做推翻英国世界霸权的杠杆。甚至当工人中的那些想在 416

下屆選舉中當選為議員的“陰謀家”（馬克思甚至把總委員會前任主席奧哲爾也歸入“陰謀家”之列）利用愛爾蘭問題作為聯合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借口時，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也沒有動搖。格萊斯頓想利用當時轟動一時的愛爾蘭問題作為競選口號來重新掌握政權。總委員會向英國政府提出了請願書，——當然是毫無結果，——抗議在曼徹斯特對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亞社社員處以死刑，指責這是一種法庭謀殺行為，並在倫敦組織了維護愛爾蘭權利的一系列公眾集會。

總委員會的這些活動引起了英國政府的不滿，同時也招來了法國政府對國際的打擊。波拿巴一連三年袖手觀望國際的發展，為的是用它來恫吓不服管束的資產階級。當國際的法國會員在巴黎成立理事會時，他們曾就此事向巴黎警察局長和內務大臣遞了呈文，但是沒有得到二者的答復。同時，波拿巴也不惜玩弄卑鄙的詭計和欺騙。例如，當日內瓦大會的文件由於害怕波拿巴郵政機關的暗檢室³⁷⁸而委託一位歸化英國的瑞士人携交總委員會時，法國邊境警察從信使那里竊走了這些文件，而法國政府則對總委員會的申訴置之不理。但是倫敦外交部迫使法國政府受理了申訴，於是法國警察不得不退還贓物。此外，“副皇帝”魯埃爾也碰了一個釘子：他表示，只要法國會員在日內瓦大會上宣讀的宣言“加上几句對如此關懷工人的皇帝的感謝之詞”，他就同意宣言在報刊上發表。但是這一點遭到了拒絕，雖然法國會員一直非常謹慎地避免刺激這個伺機而動的野獸，甚至因此引起了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懷疑，以為他們是隱蔽的波拿巴分子。

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因此而亂了章法，竟至像某些法國作家所說的那樣參加了資產階級激進派反對帝國的一些無關痛癢

的示威。不管怎样，波拿巴同工人阶级的决裂是有它的更为深远的原因的。1866年的毁灭性危机所引起的罢工运动，其规模之大使波拿巴感到不安。其次，当1867年春天法国和北德联邦之间由⁴¹⁷于卢森堡交易³⁷⁹而有爆发战争危险的时候，巴黎工人在国际的影响下同柏林工人交换了和平宣言。最后，法国资产阶级要求“为萨多瓦复仇”的喧腾叫嚷使推勒里宫产生了用“自由主义的”让步来封住资产阶级嘴巴的恶毒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认为借口发现国际巴黎理事会是芬尼亚社阴谋的中心而给以致命的打击，可以做到一箭双雕³⁸⁰。理事会成员突然遭到夜间搜查，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密谋的迹象。为了使这次捕风捉影的打击不致过于出丑，只好对巴黎理事会加以法律追究，罪名是它作为拥有二十名以上会员的团体，没有经过必要的批准手续就进行活动。3月6日和20日对国际的十五名会员提起了公诉；法庭判处他们每人一百法郎罚金，并决定查封巴黎理事会。上级法院批准了这个判决。

但是在这以前又发生了新的事件。检察官和法官本来对待被告极为温和，托伦也代表全体被告做了口气十分和缓的辩护。但是初审过后两天，即3月8日，新的理事会成立了，这个公然的嘲弄打破了波拿巴的最后的幻想。5月22日，新理事会的九名理事被法院传讯；他们在领袖瓦尔兰进行了出色而又措词尖锐的辩护之后各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这样一来，帝国就同国际公开对立起来，而法国支部则从这次跟“十二月的屠夫”的最后的公然决裂汲取了新的力量。

国际同比利时政府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沙勒罗瓦矿区的煤矿主对工资微薄的工人的不断虐待激起了工人的暴动³⁸¹，然后矿

主又动用武力来镇压赤手空拳的群众。在一片惊心动魄的恐怖之中，国际比利时支部挺身而出维护惨遭迫害的工人，在报刊和公众集会上揭露对工人的惨重剥削，救援死伤工人的家属，并替被捕工人进行法律辩护，使他們得以被陪审員宣判无罪。

比利时司法大臣德·巴拉对此进行了报复。他在比利时議會會議上瘋狂辱罵国际，威胁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国际，特别是禁止国际不久将在布魯塞尔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国际的會員沒有为这种威吓吓倒，他們在一封信里答复說，他們不会屈从一个人的命令，并且不管司法大臣对大会采取什么态度，下一次大会将在布魯塞尔召开。

(二)瑞士和德国

几年来促进国际蓬勃发展的一个最有力的杠杆，是1866年危机在一切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引起的普遍的罢工运动。

总委员会从来沒有在任何地方号召过罢工运动；但是只要什么地方发生了这种运动，总委员会总是通过建議和行动促进工人的胜利，发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精神。它解除了资本家手中的一个得力武器，使资本家不能靠从外国輸入劳动力来打击罢工工人。不仅如此，它还使敌人的不自觉的援軍变成自己的勇于自我牺牲的盟友；它善于向它影响所及的每个国家的工人說明，支援外国的阶级兄弟争取提高工資的斗争，也符合于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

国际的这项活动非常有益，使它在全欧洲获得的声誉甚至超过了它实际拥有的实力。由于资产阶级世界不願意理解甚至确实不能理解罢工扩展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因而他們把

罢工看成是国际秘密策动的结果。资产阶级把国际看成是毒蛇猛兽，每当发生罢工便想置国际于死地。每一次大罢工都变成了维护国际生存的斗争，而在每一次这样的斗争之后国际的力量总是得到新的锻炼。

1868年春天在日内瓦爆发的建筑工人罢工，以及从同年秋天一直延续到次年春天的巴塞尔染丝绸工人和丝带工人的罢工，就是这类罢工的典型例子。日内瓦的建筑工人为了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开始了斗争；厂主要求工人退出国际，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罢工工人立刻拒绝了那个蛮横无礼的要求，并且依靠总委员会从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所给予的援助，终于贯彻了原来的要求。巴塞尔的趾高气扬的资本家做得更加愚蠢：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一个丝带厂的工人在秋季集市最后一天按照惯例休假几小时。他们对工人说：“不听话的就滚蛋。”有一部分工人没有服从，于是第二天厂主便不顾解雇要在两周前预先通知的规章，借着警察的帮助把他们逐出了工厂的大门。这种粗暴的挑战激怒了巴塞尔的工人，于是一场持续数月的斗争爆发了，最后竟发展到瑞士州政府想用军队和某种类似戒严状态的措施来威吓工人的地步。

对巴塞尔工人的这种粗暴的迫害，很快就证明其目的也在于摧毁国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们不惜采取残酷的手段：不把住房租给失业工人，面包商、肉商和杂货商不向他们赊卖物品。他们甚至做出这样可笑的蠢事来，如派人到伦敦去调查总委员会的经费状况。“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他们定会首先去调查使徒保罗在罗马的银行存款了。”³⁸²这是马克思在嘲笑《泰晤士报》把国际的分会比做早期基督教教团时说的话。但是巴塞尔工人始终坚定地忠于国际，并且在资本家终于屈

服时在市場廣場举行盛大游行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巴塞尔工人也从其他国家的工人組織得到了慷慨的支援。这次罢工掀起的浪潮波及到国际刚刚在那里站稳脚跟的美国；1848年亡命美国任音乐教师的弗·阿·左尔格已在紐約占据着貝克尔在日内瓦占据的那种地位。

国际所领导的罢工运动，首先为自己在德国开拓了道路。在此以前，在德国只有一些分散的支部。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經過长期的斗争和紛乱之后，已經成长为一个卓越的組織并且仍在繼續順利地发展，特别是在它的會員选举施韦澤做自己的領袖之后。施韦澤还是北德联邦議會爱北斐特—巴門选区的議員，他的老对头李卜克内西是薩克森的施托尔堡—施温堡选区选出的联邦議會議員。不久他們二人就由于民族問題上的对立立場而发生了尖銳的冲突。施韦澤追随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科尼格列茨战役所造成的基础之上³⁸³；李卜克内西则反对北德联邦，认为它是非法和暴行的产物，必須首先加以摧毁，为此甚至可以把社会問題暂时放到次要地位。

420 1866年秋，李卜克内西促成了薩克森人民党（它提出了一个激进民主的綱領，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綱領）的建立，并且从1868年年初开始在萊比錫出版它的机关刊物《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民主周刊》）。薩克森人民党的成員主要是薩克森工人階級的代表。这一点有利于把它同德意志人民党³⁸⁴区别开来，因为在后者中，除了少数几个像約翰·雅科比那样的正直的思想家以外，还有法兰克福的交易所民主主义者、士瓦本的主張分立的共和主义者，以及认为俾斯麦驅逐几个中小諸侯是对权利的罪恶蹂躪并因而感到义憤填膺的战士们。薩克森人民党跟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

保持着远为良好的睦邻关系；工人协会联合会是进步资产阶级在拉萨尔刚一出头露面的时候为了对抗他的鼓动而成立的。但正是在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奥古斯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把他看做自己的忠实战友）当选为这个联合会的主席之后，这个联合会向左转了。

《民主周刊》第一期就指出施韦泽是争取社会民主事业的一切先进战士所鄙弃的人。这在当时说来已是一种陈词滥调，因为自从三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同施韦泽合作以来，施韦泽在力图按照拉萨尔的精神来领导德国工人运动方面片刻也没有动摇过，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领导也就没有那种墨守拉萨尔的一言一句的宗派主义。例如，他在李卜克内西之先并且比他更为切实地向工人宣传《资本论》第一卷；1868年4月，他亲自向马克思请教有关普鲁士计划降低铁类关税一事的意见。

就是作为总委员会负责德国方面的通信书记，马克思也不能拒绝回答大工业区选出的工人议员向他提出的问题。而且，马克思对施韦泽的活动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虽然只是在遥远的地方观察着施韦泽，但是他也看出施韦泽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有着何等“无可誉议的智慧和毅力”；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一些会议上把他說成是自己党内的人，而根本没有提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之点。

这样的分歧之点依然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没有消除他们对施韦泽的不信任。他们虽然已不再怀疑他同俾斯麦暗中勾搭，但是认为他同马克思接近意在排挤李卜克内西。他们未能打消这样一个想法，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宗派”，而施韦泽首先想有一个“自己的工人运动”。但是他们始终承认，施韦泽的政策 421

要比李卜克內西的政策更有遠見得多。

馬克思認為施韋澤無疑是當時德國工人階級領袖中最有頭腦和最有魄力的一個人，並且認為只是由於他，李卜克內西才注意到不依賴於小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獨立工人運動的存在。恩格斯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說，“這個傢伙”遠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理解一般政治形勢和對其他黨的態度，並且更善於闡明自己的思想。“他把‘比我們老的一切黨派都一律稱做反動的一幫，說它們之間的差別對我們說來是無關緊要的’。雖然他也承認 1866 年戰爭及其後果摧毀了一些小王國，打破了王朝正統性的原則，動搖了反動勢力，並且動員了人民，然而他現在仍然攻擊其他後果，如捐稅的重壓等等，並且在對待俾斯麥的態度上，正如柏林人所說的，要比例如李卜克內西對待前王公的態度遠為‘得體’。”^①在另外一個場合，恩格斯曾談到李卜克內西的策略，說他十分討厭李卜克內西每周都要重復的這樣一個訓誡：“只要聯邦議會、瞎子韋耳夫和寬厚的黑森選帝侯不恢復原位，只要離經叛道的俾斯麥不受到符合王朝正統性原則的嚴厲懲罰，我們就不能進行革命。”當然，恩格斯在激動之中是有些夸大的，但是這番話也道出了許多真理。

馬克思後來曾說，人們過去相信，基督教神話所以能在羅馬帝國時代產生，只是因為當時沒有發明印刷術。實際上恰恰相反。能在轉瞬間就把自己的捏造傳遍全世界的報刊和電訊，它們在一天之內所製造出來的神話（資產階級蠢材們都相信這些神話並加以傳播）要比過去一百年間製造出來的還多得多。幾十年來人們——而且不僅是“資產階級蠢材”——相信的一個神話就特別令人信服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傳集》，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134 頁。

地說明了这段話的正确，这就是据說施韦澤想把工人运动出卖給俾斯麦，而直到后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才使工人运动重新走上了正路。

事实恰恰相反。施韦澤曾坚持原則性的社会主义的立場，而《民主周刊》則向那些拥护“有权势的前王公”的分立主义者和維也納的自由主义勒索者頻送秋波。这种策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完全不能容許的。倍倍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①中說，由于革命在内部較弱的奥地利要比在内部較强的普魯士更容易获得成功，所以当时希望奥地利能够战胜普魯士。但是这种解釋是事后編造的，而且不管对这种解釋做何评价，在当时的文献中是看不到这种解釋的任何痕迹的。

尽管馬克思跟李卜克内西有私人的友誼而对施韦澤有私人的不信任，他却絲毫沒有忽路事情的真实情况。他在回答施韦澤所提出的降低铁类关稅問題时虽然形式上极为含蓄，但在实质上却是詳尽透彻的。于是施韦澤实行了他三年前就已考虑成熟的一个計划，在1868年8月末在汉堡召开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³⁸⁵上提議参加国际。由于当时存在着关于結社的联邦法律，这种参加只能限于发表一个关于团結和同情的声明，而不能正式地参加。馬克思曾被邀請作为来宾出席大会，以便向他表达德国工人对他的科学劳績的感謝。馬克思虽然对施韦澤的事先的函詢表示承諾，但是終于沒有到汉堡去，尽管施韦澤曾就此事向他再三催請。

馬克思在感謝“盛情的邀請”的信中說他由于总委员会筹备布魯塞尔大会的工作而未能成行，但是他“滿意地”指出，代表大会的

^① 《倍倍尔自传》，1925年俄文版。

議程包含了構成任何嚴肅的工人運動的真正出發點的那些問題，爭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動，爭取法定的工作日長度和爭取工人階級的有計劃的國際合作³⁸⁶。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他在这封信中曾祝賀拉薩爾派放棄了拉薩爾的綱領³⁸⁷。但是，實際上很難想像拉薩爾會反對議程中的這三個項目。

施韋澤本人在漢堡大會上的行動表明了他同拉薩爾的傳統的事實上的決裂；儘管他遭到強烈的反對，但由於他提出了信任的問題而終於迫使大會批准了他和他在議會中的同事弗利切於9月末⁴²³在柏林召開全德工人代表大會³⁸⁸，以便建立工人階級的以罷工為目的的廣泛組織。施韋澤從歐洲的罷工運動吸取了很好的教訓。他沒有對它做過高的估計，而是清楚地認識到，願意完成自己使命的工人政黨不應聽任自發的罷工無秩序地進行。因此他主張建立工會，但是在有關這些工會的存在條件方面犯了錯誤；他想在這些工會中建立一種存在於全德工人聯合會中的嚴格紀律，為的是讓工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從屬於工人聯合會的輔助軍。

馬克思曾經警告他要避免犯這種重大錯誤，但是沒有收到效果。在二人之間的往來信件中，施韋澤的信全都保存了下來；馬克思的信則只保存下1868年10月13日的一封信，但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封信^①。馬克思的這封信雖然從形式上看來，從對待施韋澤的態度的誠懇上看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對施韋澤成立工會的計劃卻極力加以反對。但是馬克思的批評所造成的印象，由於馬克思稱拉薩爾所創立的聯合會為“宗派”並認為它必須決心溶合於階級運動而有所減弱。施韋澤在他寫給馬克思的最后一封回信中公道地指出，

① 《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7—231頁。

他一直力求同欧洲的工人运动采取一致的步调。

在汉堡大会几天以后，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在纽伦堡召开了大会³⁸⁹。这个大会也对时代的特征有了理解。它由多数票通过了国际的章程的基本条款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采用《民主周刊》作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从此少数派永远消失了。其次，多数派否决了创立国家监督下的工人老年保险储金会的提案，主张成立工会合作社，因为经验证明这种合作社最便于通过自己的储金会帮助年老、患病和流浪的工人。设立这种合作社，不像诉之于罢工中展开的劳资斗争那样有力。汉堡大会认为参加国际的理由在于一切工人党派的利益的共同性，而纽伦堡大会则对这个问题提得不那样明确。几周以后，《民主周刊》用黑体字报道说，德意志人民党在斯图加特代表会议上通过了赞成纽伦堡纲领的决议。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之间也接近起来，而⁴²⁴马克思为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极力在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之间进行公正的斡旋，但是没有成功。纽伦堡的联合会以各种不成理由的借口拒绝派代表出席施韦泽和弗利切在柏林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虽然如此，出席大会的人数却很多，并且成立了许多“工人组织”，这些组织联合成为实际上由施韦泽领导的“工人组织联合会”。

纽伦堡联合会也根据倍倍尔所拟定并且比施韦泽的章程更为符合工会运动生存条件的章程，创立了一个名字过于堂皇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此后他们一再提议同施韦泽的联合会联合甚至合并，但是每次都遭到严词拒绝。对方驳斥他们说，你们首先破坏了统一，因此你们不必再用关于协调一致的建建议来企图恢复已被你们破坏的这种统一；如果你们确实希望统一，你们可以参加现存的

“工人組織联合会”，并在这个組織內部爭取你們认为需要的那些改革。

馬克思虽然未能阻止德国工人运动內部的分裂，但是他毕竟确认了它的两个派别都参加国际。他产生了要在当前条件下把总委员会会址在次年一年内暫設日內瓦的想法，因为工人組織虽然人数不多，但各处都已初步划定了自己的主要活动范围。对倫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气恼也促成了他的这个想法。法国人支部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吵嚷得很厉害，并且由于为小丑皮亚宣傳暗杀波拿巴一事喝采而給国际造成了許多麻煩³⁹⁰。由于总委员会极力制止它的胡鬧，它也同样大吵大叫，不滿总委员会的“独裁”，并且决意要向布魯塞尔大会控告总委员会。

幸亏恩格斯坚决劝阻了馬克思，沒有让他采取这个冒險的步驟。恩格斯說，不應該由于少数几个蠢人的緣故，就把事业交給一些虽有善良的意願和可靠的嗅觉，但沒有領導运动的才能的人。运动的影响越是巨大并日益波及德国，馬克思便越是應該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确，不久后正是在日內瓦发现，单靠善良的意願和嗅觉是不够的³⁹¹。

(三) 巴枯宁的鼓动³⁹²

425 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6日到13日在布魯塞尔召开。

这次大会虽然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人数都多，但仍然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比利时人占了出席人数的一半以上，法国人占了五分之一左右。在十一名英国代表中有六名是总委員

会的代表；除了埃卡留斯、荣克和列斯納以外，还有英国工联代表魯克拉夫特。瑞士只有八名代表，德国总共三名，其中还有代表科倫支部的莫澤斯·赫斯。得到出席大会的正式邀請的施韦澤因正值有几宗审判案件待处理而未能成行，但是他通过书面声明說，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拥护国际的宗旨。据施韦澤說，只是由于德国的結社法令，联合会才未能正式参加国际。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各派了一名代表。

从大会的會議上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国际在它創立以来的第四年中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壮大。蒲魯东派在日内瓦和洛桑对工会和罢工所抱的反对态度，現在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轉变。但是他們仍然通过了一项关于“交換銀行”和“无償貸款”的純学院式的決議，虽然埃卡留斯引证英国的經驗，指出蒲魯东主义的这些药方在实践上是不可能實現的，而赫斯則援引馬克思在二十年前所写的駁斥蒲魯东的著作，指出它們在理論上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蒲魯东派在“关于财产的問題”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根据德·巴普的提議，通过了一项附有詳細論证的冗长決議，这个決議指出，在一个具有良好組織的社会中，采石場、煤矿和其他矿場以及铁路都應該屬於整个社会，亦即屬於未来的按正义原則組成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到来以前，矿場、铁路的經營应轉交給工人协社，但必須保证遵守公共的利益。土地和森林也應該在遵守同样的保证的条件下归整个国家所有，并交給农民协会去經營。最后，运河、公路、电訊——总之一切交通工具均应繼續保持社会公有。426 虽然法国人强烈反对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大会只是决定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再度討論這個問題；大会召开地点选定了巴塞尔。

据馬克思自己說，他根本沒有参加起草布魯塞尔大会所通过

的各項決議案。但是他对大会的进程并未感到不滿——这不仅因为像在汉堡和紐倫堡两地一样，工人階級在这里也对他的科学勞績表示了感謝，以致無論从个人來說还是从事业的利益來說都給了他很大的滿足；而且也因为倫敦的法国人支部对总委員會的一切控告都被大会駁回了。但是他把大会的一項有关日内瓦大会时便已提出的問題的決議称为“胡說八道”；这个決議說，應該用普遍停止工作、即各国人民罢工的办法来阻止战争的威胁。他最沒有理由反对的一項大会決議是同不久后在伯尔尼召开自己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自由同盟的彻底决裂。这个同盟曾向国际建議联合，但是从布魯塞尔得到一个冷淡的回答：它沒有合理的存在理由；它應該劝告自己的盟員参加国际的各支部。

曾經出席和平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布魯塞尔大会前几个月参加国际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特別坚决地主張这种联合。在联合的建議遭到拒絕以后，巴枯宁企图慫恿和平自由同盟通过一个旨在摧毁一切国家并在它們的廢墟上建立各国的自由生产团体的联盟的綱領。但是他依然是少数派，在这个少数派中也有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巴枯宁依靠这个少数派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³⁹³；这个同盟虽然提出了整个加入国际的任务，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在一切人的普遍平等和道义共同性的偉大原則基础上研究各种政治問題和哲学問題。

还在《先驅》9月号上，貝克尔就报道了这个同盟，說它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它影响所及的其他一切地方建立国际的支部。但直到四年以后，即1868年12月15日，貝克尔才請求总委員會接受該同盟参加国际。这是在同样的請求遭到比利时和法
427 国的联合委員會拒絕之后提出的。一周之后，即12月22日，巴枯宁从

日内瓦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的老友！……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关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而嘲笑我们当中那些在民族的或纯政治的事业的羊肠小道上迷失了方向的人。我现在做的，正是你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着手的事情。自从我在伯尔尼大会上同资产者郑重而公开地诀别以来，我就除了工人的世界以外再不知道有其他社会、其他环境。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这就是我认为必须说的一切……”^①。对于这一段话的真诚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的。

几年以后巴枯宁在同马克思进行激烈斗争时对马克思和蒲鲁东所做的比较，最足以深刻地说明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关系。他说：“马克思是一位极其严肃、极其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他比蒲鲁东有着巨大的优点，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蒲鲁东虽然极力想摆脱古典唯心主义的傳統，但他终其生是个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而正如我在他死前两个月向他说的，他有时为圣经所左右，有时为罗马法所左右，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他的最大的不幸，就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自然科学，从来没有掌握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有着一种常常给他指出正确道路的天才本能，但是他的思想的坏习惯，亦即唯心主义的坏习惯，却不断地使他陷入旧的迷误。结果他陷入了一种常见的矛盾——一个经常同唯心主义的幽灵搏斗的强有力的天才、革命的思想家，却一直没有力量战胜这个幽灵。”^② 巴枯宁关于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材料》，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137—138页。

^② 同上书，第366页。

紧接着巴枯宁描述了他眼里的馬克思的性格。“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的。他提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即历史上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都不是原因，而是經濟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偉大而富于创造性的思想，但发现这一思想的荣誉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另外有许多人在他以前就意識到了这一思想，甚至曾經部分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但是只有馬克思才給了它以科学的論证，使它成为自己的整个經濟学說的基础。另一方面，蒲魯东对自由有着远为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当蒲魯东还未醉心于教条和形而上学时，他有着革命家的真正本能，他崇拜撒旦并宣布了无政府。馬克思在理論上很可能創立一种更为合理的自由学說，但是他却缺乏蒲魯东的那种本能。作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权威論者 (Autoritär)。”^① 巴枯宁对馬克思的評論就是如此。

談到他自己，巴枯宁从这种比較得出結論說，正是他实现了这两个学說的最高度的統一，发展了蒲魯东的无政府主义学說，使它摆脱了一切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渣滓，并以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历史中的政治經濟学作为它的基础。但这不过是巴枯宁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騙罢了。他远远地走在蒲魯东前面。他优于蒲魯东的地方，是他有着更高的欧洲文化的教养，而且远比蒲魯东更能理解馬克思。但是他不像馬克思那样精通德国哲学，也不像馬克思那样仔細研究过西欧各国人民的階級斗争。而且，对他說来，缺乏政治經濟学的知識，要比蒲魯东不熟悉自然科学更加是致命的。巴枯宁的理論修养上的这个缺点面然是由于他在薩

^① 波薩斯基編：《巴枯宁傳記材料》，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366—367頁。

克森、奥地利和俄国的监狱以及西伯利亚的雪原中度过许多大好年华而造成的（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光荣），但这个缺点也并不因此而缩小。

“撒旦的化身”——这既是他的力量的表现，也是他的弱点的表现。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有一段出色而中肯的话给我们揭示了巴枯宁的这个爱用的字眼的含义：“米哈伊尔犯过许多过错和罪恶，但是他身上有着一种胜过他的一切缺点的东西，——这就是他精神深处的那种永远起作用的原则。”巴枯宁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他像马克思和拉萨尔一样具有使人倾听自己意见的天才。对于一个除了自己的智慧和意志以外一无所有的贫穷流亡者来说，能够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国——奠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初步基础，这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功绩。但是只要看一看这些国家的名字，就立刻可以看出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的深刻区别。他们两个人都预见到革命的迅速来临。但是研究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的马克思把大工业无产阶级看做是革命军队的核心，而巴枯宁则把希望寄托在大批脱离了阶级队伍的青年⁴²⁹身上，寄托在农民群众甚至流氓无产阶级身上。虽然他一直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作为一位科学思想家比他站得更高，但是他却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犯“老一辈革命家”所特有的那种错误。不过他能安于自己的命运，认为科学尽管是生活的指针，但毕竟还不是生活本身，而只有生活才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

仅仅根据二人最后的决裂来判断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无论对巴枯宁来说还是对马克思来说都同样是荒谬的，甚至是不公平的。追溯一下他们二人在三十年中间不断的聚散离合，这从政治上、特别是从心理学上来说要远为引人入胜。两人都是从青年

黑格尔派出发的，巴枯宁是《德法年鉴》的教父之一。他以前的庇护者卢格同馬克思决裂的时候，他曾站在馬克思一边。但是当他后来在布魯塞尔了解到馬克思对共产主义宣傳的看法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并且在几个月后开始热心地投入海尔維格的义勇军向德国的冒險进军。不过他后来認識到这种热狂的愚蠢，并且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

此后不久，即1848年夏天，《新莱茵报》指控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細。这个錯誤是由于該报收到两个不同来源的消息而引起的。《新莱茵报》以使巴枯宁完全感到滿意的坦率，公开地承认了这个錯誤。馬克思和巴枯宁在柏林会晤时重新恢复了他們旧日的友誼，《新莱茵报》也在巴枯宁从普魯士被驅逐时极力替巴枯宁讲话。后来，該报又严厉地批判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宣傳，但是在前言里說明“巴枯宁是我們的朋友”，并且明确地承认他是从民主的动机出发进行活动的，他在斯拉夫問題上的迷誤也是完全可以原諒的。此外，这篇文章^①的作者恩格斯在反駁巴枯宁时，在主要論点上也犯了錯誤，因为尽管奧地利的各斯拉夫民族仍然有它們的历史前途，恩格斯却否认它們有这种前途。馬克思和恩格斯比任何人都更早并且更热烈地贊揚了巴枯宁参加德勒斯頓五月起义的革命行动³⁹⁴。

巴枯宁在从德勒斯頓退却时被捕，并被薩克森和奧地利的軍事法庭先后判处死刑；后来两处的死刑都被“从寬”改处为終身苦役；最后，他被引渡給俄国，在那里的彼得保罗要塞度过了許多可怕的苦难岁月。这期间，有一个瘋狂的烏尔卡尔特分子又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22—342頁。

«Morning Advertiser»〔《晨报》〕上指控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³⁹⁵，并且硬说他根本没有押在监狱里。除了赫尔岑、马志尼和卢格以外，马克思也在这家报纸上对此提出抗议。由于不幸的巧合，这位巴枯宁的诽谤者也姓马克思。有少数人知道这一点，虽然这位绅士在有人要求他在报刊上公开自己的姓名时顽强地拒绝这样做。这种姓名的巧合后来为假革命家赫尔岑^①利用来进行卑鄙的阴谋。1857年，巴枯宁从彼得保罗要塞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逃跑，然后经日本和美洲到了伦敦。这时赫尔岑欺骗他说，马克思曾在英国报刊上揭发巴枯宁是俄国奸细。这是造成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后来的多次反目的那些挑拨离间中的第一次。

巴枯宁脱离欧洲生活已有十多年，因此他在伦敦首先接近跟他毫无共同之处的赫尔岑之流的俄国流亡者，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他的泛斯拉夫主义（如果一般地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方面，巴枯宁也始终是个革命者，而赫尔岑则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下用对“腐朽的西方”的咒骂和对俄国农民村社³⁹⁶的神秘崇拜，在事实上替沙皇制度效劳。想到赫尔岑在巴枯宁饱受苦难的青年时代曾经怎样帮助过他，那末巴枯宁在赫尔岑死去以前始终同他保持私人的友谊关系这一点也就无可非议了。巴枯宁早在1866年就在写给赫尔岑的一封信中指責说，赫尔岑想不通过政治变革就达到社会变革，并且只要国家不去触动大俄罗斯的村社，就准备原谅国家所做的一切，甚至认为俄国的村社不仅是俄国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救星，而且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救星。巴枯宁给了这种幻想以非常有力的批判。

^① 关于赫尔岑的革命的社會政治活動的評價，參閱列寧的《紀念赫爾岑》一文（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卷，第9—16頁）。

但是，巴枯宁在逃出西伯利亚之后，开始是住在赫尔岑家里，因此和馬克思沒有来往。尽管如此，他却把《共产党宣言》譯成俄文发表在赫尔岑的《钟声》上。这就尤其可以看出他的性格的特点。

在巴枯宁第二次流寓倫敦的时期，亦即在国际創立的时候，馬
431 克思曾經首先打破僵局去訪問巴枯宁。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使巴枯宁相信，他不仅不會毀謗他，而且會极力反对这种毀謗。二人分手时已經和好如初。巴枯宁非常贊賞国际的計劃。馬克思在11月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巴枯宁向你問好。他今天已經去意大利，他現在就住在那里（佛罗倫薩）……我必須說，我十分喜欢他，比过去更喜欢他……”

我认为，大体上他是十六年来不仅沒有后退、反而更加前进的少数人中的一个。”^①

但是，巴枯宁欢迎国际的那种热忱並沒有保持多久。旅居意大利期間，“老一輩革命家”的精神又在他身上觉醒。他所以选中这个国家，不仅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和生活費用低廉，——更不消說德法两国当时已經拒絕他入境，——而且也由于政治上的理由。他认为意大利人是斯拉夫人反对奥地利警察国家的天然同盟者，而加里波第的英雄业绩則早在西伯利亚时期就曾激发起他的幻想。在他看来，这些业绩是革命浪潮高漲的第一个证明。当他去意大利的时候，那里有着大批的秘密政治团体。他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些随时准备参加任何密謀的墮落的知識分子，經常处于饿死邊緣的农民群众，以及永远飄流不定的流氓无产阶级，特别是那不勒斯的流浪汉。他是在佛罗倫薩住了不久就到那不勒斯去的，并且在那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227—228 頁。

里住了好几年。在他眼里,这些阶级是革命的真正动力。他把意大利看成是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早爆发社会革命的国家。但是他很快就不得不承认这种看法的错误。那时马志尼的宣傳还盛行于意大利,而马志尼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的暖昧的宗教口号和严格的集中倾向,只是为了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寓居意大利这段期间,巴枯宁的革命鼓动采取了更加明确的形式。由于理论修养的不足以及过分灵敏的头脑和泼辣的活动力,巴枯宁总是为周围环境的影响所左右。马志尼的宗教的、政治的教条主义,更加助长了他的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引起了他对一切国家政权的否定态度。同时,他认为是在争取普遍变革的先进战士的那些阶级的革命传统,也对他的喜爱密谋和地方暴动的倾向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巴枯宁所创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秘密团体最初只有意大利人参加,主要是为了反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令人厌恶的资产阶级空谈”。但是不久这个团体就扩大成为国际性的组织。

为了这个秘密团体,巴枯宁于1867年秋迁居日内瓦,企图首先影响和平自由同盟。当这一步失败以后,他开始寻求参加国际的道路,虽然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对国际根本不感兴趣。

(四)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虽然如此,马克思却仍然对这位老革命家保持着友好的感情,并且反对自己周围的人对巴枯宁已经发动或准备发动的各种攻击。

这些攻击来自西吉兹蒙德·波克罕。他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

义者，曾在馬克思同福格特的斗争中以及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对馬克思有过許多帮助。但是，波克罕有两个弱点：他自认为是一个有才气的作家，虽然他实际上并非如此；对俄国人怀着莫名其妙的憎恨，其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赫尔岑对德国人的同样莫名其妙的憎恨。

波克罕首先攻击了赫尔岑，在1868年初的《民主周刊》最初几期上写了許多文章把赫尔岑罵得狗血噴头。当时巴枯宁虽然早已和赫尔岑决裂，波克罕却仍然攻击他是赫尔岑的“哥薩克兵”³⁹⁷，說他是“否定的化身”，把他和赫尔岑一起釘在十字架上。事情的經過是这样：波克罕从赫尔岑的著作中知道，巴枯宁在許多年前曾經发表过一个“卓越的論点”，說“积极的否定是一种創造力”；于是波克罕义憤填膺地問道：在俄国国境的欧洲这一边是否有什么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呢，这是否会引起成千上万的德国小学生的轰笑呢。善良的波克罕由于幼稚而根本没有想到，巴枯宁的那句当时頗为流行的名言“破坏的欢乐就是創造的欢乐”，最初是出現在《德意志年鉴》的一篇文章³⁹⁸中的，那时巴枯宁还生活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里，并且正同馬克思和卢格一起創辦《德法年鉴》。

无怪乎馬克思对这一类調調儿內心深感厌恶，并且极力反对

433 波克罕企图利用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反駁巴枯宁的一些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极其符合于波克罕的意图的”）来論证自己的胡說³⁹⁹。馬克思要求波克罕不要利用这些文章来侮辱巴枯宁，因为恩格斯是巴枯宁的老友。恩格斯也提出了抗議，因而波克罕的計劃未能实现。約翰·菲力浦·貝克尔也請求波克罕不要攻击巴枯宁，但他得到了一封“严厉的回信”：波克罕，正如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以“他所特有的委婉語調”声明，他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同

貝克尔保持友誼，并将繼續給他金錢上的帮助(不过为数极少)，但二人的通信必須从此絕口不談政治。馬克思虽然和波克罕十分要好，但是认为他的“嫌俄病”已經到了危險的程度^①。

甚至当巴枯宁已經参加过和平自由同盟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馬克思本人也一直和巴枯宁保持着友誼的关系。和平自由同盟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馬克思給巴枯宁寄去一本亲笔签名的《資本論》；由于沒有接到一个字的答謝，馬克思在由于其他事情而写給日内瓦的一位俄国流亡者^②的信中，还探詢过“老友巴枯宁”，虽然对于巴枯宁究竟是否还是他的朋友也表現了几分怀疑。巴枯宁在12月22日的一封信里回答了這個間接的問詢；他在这封信中保证，他要走馬克思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那条战斗的道路。

但是就在巴枯宁給馬克思写信的那一天，总委员会已經决定拒絕貝克尔关于接受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国际的提議。馬克思是这一决定的倡議人。他已經从《先驅》上知道了同盟的成立，但是他一直认为它不过是日内瓦的地方产物，是个死胎，是根本无足輕重的。他了解老貝克尔，知道他虽然喜欢搞小圈子，但是个完全可靠的人。現在貝克尔寄来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綱領和章程，同时写道，同盟的目的是补足国际所缺少的“理想主义”。这种大言不慚的态度，正如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在总委员会中，“特别是在法国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憤怒”，因而总委员会立即决定拒絕这个請求。馬克思受托起草这个決議。馬克思在12月18日“后半夜”写給恩格斯的一封信⁴⁰⁰，证明了他本人当 434

①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140—141頁。

② 指阿·阿·塞尔諾-索洛維耶維契。

时也是有点气憤的。他还說：“这一次波克罕是正确的”。使他气憤的与其說是同盟的綱領，无宁說是它的章程。綱領宣布，同盟是信奉无神論的；它要求消灭一切宗教迷信，用科学知識代替信仰，用人的公道代替神的公道。接着，綱領要求各个階級和两性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会上的平等，而且建議从廢除继承权开始。它还要求两性儿童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发展才能的同等手段，即享受扶育和教養以及在科学、工业和艺术的一切領域受教育的平等。最后，綱領反对不以工人战胜資本为直接和間接任务的任何政治活动。

馬克思对这个綱領的評價是很坏的。不久之后他把它称为“陈詞濫調的杂燴”，“无聊的廢話，故弄玄虛的和只求暫時效果的荒謬臆想的集大成”。但是在理論問題上，国际有必要在开始时表現較大的寬容，因为它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于通过自己的实际活动制定出一个国际无产階級的共同綱領。

正是因为这个緣故，国际的組織，作为一切实际活动取得成功的前提，对国际說来尤为重要。而巴枯宁的同盟的章程則企图以貽患无穷的方式进入这个組織。該同盟虽然宣布自己是国际的一个分支，并完全承认国际的章程，但是却想建立自己的特殊組織。它的創立者們在日內瓦成立了临时的中央委員會。按照同盟的計劃，应当在各国設立全国执行局，以便由它筹建地方組織，并設法使这些組織参加国际。在国际的年度大会上，作为国际分支的同盟的代表想要在另外的会场单独召开自己的公开會議。

恩格斯立即坚决反对这种提議，因为这样会形成两个总委员会和两个代表大会。而一遇机会，設在倫敦的实际的总委员会就会同設在日內瓦的“理想主义的”总委员会发生冲突。在其他問題上，恩格斯建議要冷靜行事，急躁的行动会不必要地刺激工人（特别是

瑞士工人)中的許多庸俗分子,并将给国际造成損害。應該冷靜而又堅決地拒絕這些人,告訴他們,他們既然選定了一個特殊的領域,那就應該等一等,看看他們在這個領域能夠搞出什麼名堂來。⁴³⁵而暫時是沒有任何東西阻礙一個團體的成員成為另一個團體的成員的。關於同盟的理論綱領,恩格斯也覺得他從來沒有看過比這更糟的東西。他說,巴枯寧看來已成了“一頭不折不扣的蠢牛”。不過這種字眼並不表明他對巴枯寧懷有什麼特別的敵意:例如,馬克思就曾在信中罵他的忠實友人貝克爾為“老糊塗”。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非常喜歡在他們的親密無間的通信中使用這類榮譽頭銜的。

這時馬克思已經平靜下來,並且提出了總委員會拒絕同盟參加國際的決議草案⁴⁰¹。不論就形式或內容來說,這個答复都是無懈可擊的。這個答复指出,問題是由同盟的幾個創立者預先決定了的,因為他們作為國際的會員曾經在布魯塞爾大會上共同決定拒絕國際同和平自由同盟的合併。貝克爾只是在這一點上間接地受到輕微的指責。實際上,拒絕的理由不外是,在國際內外進行活動的第二個國際組織的存在,必定會成為破壞國際本身的組織的手段。

有人說貝克爾會因這個決議而激怒,這是完全不真實的。比較可信的是巴枯寧的這樣一個說法:貝克爾从一开始就反對建立同盟,但是他的意見為他所屬的秘密團體以多數票否決了;他雖然想保持這個秘密團體,要它的成員在國際內部按照這個秘密團體的精神進行活動,但是為了避免糾紛,他要求他們無條件地加入國際。不管怎樣,設在日內瓦的同盟中央委員會用一個新的建議來回答了總委員會拒絕它加入的決議,即只要總委員會承認同盟的理論綱領,就可以把同盟的支部改為國際的支部。

在这中間，馬克思接到巴枯宁在12月22日写来的一封好意的来信；但是他的疑虑使得他没有重視这种“溫情的态度”。同盟的新建議也同样引起了他的怀疑，但是他没有为这种怀疑所左右，而只是以就事論事的態度做了回答。根据馬克思的提議，总委员会于1869年3月9日决定不把討論它所屬的各个工人政党的理論綱領列为自己的任务。由于各国工人階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
436 它們的实际运动也以极不相同的各种理論形式表現出来。国际所推动的行动的一致，各国支部的各种机关刊物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以及全体大会上所进行的討論，可以逐漸地为整个工人运动制定出一个共同的理論綱領。而目前，总委员会的任务只應該是注意各个工人政党綱領的一般領向是否符合国际的总方針，亦即是否符合工人階級彻底解放的任务。

在这方面，同盟的綱領包含着足以引起危險的誤解的詞句。所謂各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会上的平等，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会归結为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所宣揚的那种劳資協調。无产階級运动的真正秘密和国际的偉大目的，就是要消灭階級。但是由于从上下文意看来，“各階級平等”字样出現在同盟綱領中只是出于笔誤，所以总委员会相信同盟一定会放棄这种曖昧的詞句；那时同盟支部改为国际支部也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如果这种改变能够实现，那末按照国际的章程，各新支部的所在地和會員人数應該上报給总委员会。

据此，同盟按照总委员会的希望改正了引起異議的詞句。6月22日同盟通知总委员会，說它的組織已經解散，并已建議自己的各支部改为国际的支部。总委员会以一致通过的決議接受巴枯宁領導的日內瓦支部加入国际。巴枯宁的秘密团体虽然表面上解

散了，实际上却仍然存在着，不过在組織形式上已不大严格罢了。巴枯宁本人也仍然按照同盟的綱領进行活动。从1867年秋天到1869年秋天，巴枯宁住在日内瓦湖畔，有时住在日内瓦，有时住在維維和克拉萊恩，并且在瑞士的罗曼語系工人中有巨大的影响。

这些工人所处的特殊生活条件在这一方面帮助了巴枯宁。为了正确判断当时的形势，不应忘記国际当时还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的理論綱領的党；正如总委员会致同盟书⁴⁰²中所承认的，国际还容許各种各样的傾向在自己队伍中存在。甚至今天也可以从《先驱》上看出，就連这个偉大組織的热心而卓著功績的战士貝克尔，也从来不大关心理論問題。因此，在国际的日内瓦支部里也有两个极不相謀的派別。一派是所謂“fabrique”〔厂工〕，按日内瓦方言的意思是指珠宝工业和钟表工业中工資优厚的熟练工人，他們几乎全是当地人；另一派是所謂“gros métiers”〔粗工〕，主要是建筑工人，他們几乎全是外国人，特别是德国人，这些人只是靠不断的罢工才爭到了勉强可以忍受的劳动条件。前者拥有选举权，后者則沒有这种权利。但是“厂工”由于人数不多，不能在选举中独力取胜，因此在选举上非常傾向于同資产階級激进派妥协；对“粗工”說来則不存在这种誘惑，他們无宁說更欢迎巴枯宁所宣揚的那种直接的革命行动。

巴枯宁在犹拉的钟表工人中找到了更为广闊的宣傳园地。他們不是制造奢侈品的熟练工人，大部分在家中工作，而美国机器的竞争經常在威胁着他們的原已悲慘的生活。他們零零落落地散居山中，不适合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即使他們适合于这种运动，过去的慘痛經驗也迫使他們对秋治畏縮不前。最初有个医生庫勒里在他們当中替国际进行宣傳；他是一个具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对

政治問題缺乏研究。他不仅要工人同激进派，甚至要工人同紐沙特尔的怀有君主制思想的自由派在选举上实行联合，而且工人总是因这种联合而上当。庫勒里的政策彻底失败以后，犹拉的工人找到洛克尔的工业学校的一位青年教师詹姆斯·吉約姆作为自己的新领导者。他在思想上完全同工人打成一片，并出版了地方小报《Progrès》（《进步报》），通过它来宣揚关于人人自由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理想。当巴枯宁第一次来到犹拉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土壤已为他的播种完全做好了准备。但是当地的穷人对他，恐怕較之他对他們发生了更加强烈的影响，因为从这时起巴枯宁对一切政治活动的譴責比过去厉害得多了。

但是瑞士的罗曼語系各支部之間暂时还是和平相处的。1869年1月，主要在巴枯宁的坚持下，它們組成了联合委员会，并开始出版大型周刊《Égalité》（《平等》）。巴枯宁、貝克尔、埃卡留斯、瓦尔兰和国际的其他著名成員都参加了該刊的工作。罗曼語系的联合委员会向倫敦的总委员会建議把继承权問題列入巴塞爾大会的議程，这也是由巴枯宁发起的。巴枯宁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討論这类問題是国际的大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总委员会採納了这个建議。

当然，馬克思把这看成是巴枯宁的挑战，但是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五）巴塞爾大会

在1869年9月5日和6日于巴塞爾召开的年度大会上，国际对自己成立以来的第五年的活动进行了檢閱⁴⁰³。

这一年是成立以来的几年中最生气蓬勃的一年，是“资本和劳动间的游击战”即罢工频繁爆发的一年。欧洲的有产阶级在越来越多地谈论这些罢工，说它们不是由无产阶级的贫困和资本的横暴引起的，而是由国际的阴谋引起的。

于是，以武力扼杀运动的毒辣阴谋便日益抬头。在英国，事情甚至发展到罢工的煤矿工人同军队发生流血冲突的地步。在法国卢瓦尔煤矿区的里卡马利附近，醉酒的士兵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有二十名工人——其中有两名妇女和一名儿童——被枪杀，大批工人受伤。但是，最可恶的事情发生在比利时，即马克思起草的义正词严的总委员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模范的大陆立宪国家，地主、资本家和教士的别有天地的小小乐园”^①。宣言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支援那些在塞兰和波利纳日两地的屠杀中成为贪得无厌的利润欲的牺牲者的人。宣言说：“比利时政府以不减于地球环绕太阳旋转那样的准确性每年屠杀工人。”^②

血的种子为国际准备了丰盛的收获。1868年秋天，英国第一次根据新选举法进行选举。这次选举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对改革同盟的片面政策的警告。没有一个工人代表当选。“大财主们”胜利了，格莱斯頓又掌握了政权。但是他并不想认真改变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方针或迎合工联的正义要求。这给新工联主义注入了新的力量。在1869年于北明翰召开的工联年会上，工联代表极力劝导王国的有组织的工人参加国际。这不仅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一致的，而且因为国际的原则能够保证地球上一切民族之间的和平。1869年夏天，英国和北美联邦之间有爆发战争的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395页。

② 同上。

危險。于是总委员会給美国全国工人联合会寄去了一封由馬克思起草的号召书，里面說道：“現在輪到你們來阻止这次无疑会把大洋两岸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拖后一段时期的战争了。”^① 号召书得到了大洋彼岸的热烈响应。

法国的工人运动也順利地向前发展着。对国际的警察迫害照例总是促使它的拥护者更为增加。在許多次罢工当中，由于有总委员会的参預和幫助而成立了工会。不管国际的精神在这些工会中是如何强烈，要禁止它們是不可能的。在1869年的选举中，工人虽然还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是他們支持了提出极端激进的竞选綱領的資产階級极左政党的候选人。他們这样做至少間接地造成了波拿巴在大城市中的慘敗，虽然这种努力的成果暂时再次落到資产階級民主派手中。此外，第二帝国已开始搖搖欲墜：它从外部受到1868年秋天从国内赶走了女王伊薩貝拉的西班牙革命的沉重打击⁴⁰⁴。

德国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在那里，波拿巴主义不仅沒有衰落，反而正在加强。民族問題引起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成了刚刚开始发展的工会运动的严重障碍。施韦澤由于他为工会鼓动选择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而陷入困境，因而不能再恢复他从前的威信了。对他的誠实所加的毫无根据的頻繁攻击，使他的一些拥护者也终于不再信任他，而他自己要搞一次小小政变的粗忽失策，則使他本来还不大动搖的声望遭到了严重的危險。

結果，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少数派分裂出去，同紐倫堡联合会一起組成了新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黨員按照建党地的地名自称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01頁。

为“爱森纳赫派”⁴⁰⁵。两个派别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二者对国际采取了大体相同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形式，因为它们都不得不考虑德国的结社法令。当李卜克内西抬出国际总委员会来反对施韦澤（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非常不满。他们虽然也欢迎“拉萨尔教会的解体过程”，但是当另一个派别还完全没有同德意志人民党分手，至少还同它在个别问题上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卡特尔关系⁴⁰⁶的时候，他们对这个派别也感到莫知所措。他们仍然认为施韦澤作为一个论客要超过他的一切对手。

只是在1866年奥地利战败之后才产生的奥匈工人运动更加团结一致地发展起来。拉萨尔派在那里完全没有有什么影响，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总委员会在向巴塞尔大会所做的年度报告中说的，广大群众都团结在国际的旗帜周围。

因此，大会是在极共有利的前景下召开的。虽然大会只有七十八名会员参加，但是比以往历次大会都更具有“国际的”气派。大会总共有九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代表总委员会出席大会的照例是埃卡留斯和荣克，此外还有两个最有名望的英国工联代表——阿普尔加斯和鲁克拉夫特。法国派出代表二十六人，比利时五人，德国十二人，奥地利二人，瑞士二十三人，意大利三人，西班牙四人，北美一人。李卜克内西代表新的派别爱森纳赫派，莫泽斯·赫斯代表柏林支部。巴枯宁除了法国的代表委托书以外还有一份意大利的代表委托书，吉约姆则代表洛克尔。大会仍然由荣克主持。⁴⁴¹

大会会议首先讨论组织问题。根据总委员会的提案，大会一致决议劝告所有支部和参加国际的团体，要像总委员会几年以前就做过的那样，废除主席的职位，因为工人组织不应当保持君主制

的、權威的原則；甚至在主席一職純屬名譽職位的地方，這種職位也包含着違反民主原則的因素。另一方面，總委員會建議擴大它自身的權限；它主張總委員會應該有權在下屆代表大會做出決議以前開除任何違反國際的精神的支部。這個提案通過了，但是加了一條限制，即凡是設有聯合委員會的地方，在開除支部以前應該徵求聯合委員會的意見。巴枯寧和李卜克內西都熱烈擁護這個提案。這在李卜克內西說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巴枯寧說來則不然；不管他有什么機會主義的考慮，他這樣做是違反他的無政府主義原則的。十分可能，他是想借助於魔王來戰勝小鬼，指望總委員會支持他反對一切在他看來純屬機會主義的議會政治活動。只有李卜克內西的一篇攻擊施韋澤和倍倍爾參加北德聯邦議會的著名演說，可能是對巴枯寧的這種觀點的支持。但是馬克思不贊同李卜克內西的演說，因而巴枯寧的打算落空了；他很快就認識到，違反原則總是要自食其果的⁴⁰⁷。

在代表大會應該討論的理論問題中，土地公有問題和繼承權問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頭一個問題實際上在布魯塞爾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比前一年解決得更加順利：大會以五十四票的多數決定社會有權把土地轉為公有，然後又以五十三票的多數承認這種轉化必須符合社會的利益。少數派大都在投票時棄權。反對第二個決議的總共有八票，而反對第一個決議的只有四票。關於如何實現這個決議，代表們發表了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結果決定將這個問題延至下次在巴黎召開的代表大會上徹底討論。

412 關於繼承權問題，總委員會擬定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以馬克思所特有的才能把國際的基本觀點歸納為幾條原理⁴⁰⁸。和資產階級的其他一切法律一樣，繼承法不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之上

的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它的表现和法律上的结果。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的原因，相反地，奴隶制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当生产资料变为公有的时候，继承权，就其具有社会意义的部分而论，将自然地消失，因为一个人只能把他生前所占有的东西留给他后人。因此，废除那种使少数人终生有权攫取其他多数人劳动成果的制度，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目的。宣布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正像希望在保持目前的商品交换的状态下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规一样，是荒谬的。这在理论上将是不正确的，而在实践上将反动的。继承权只有到了过渡时期才能加以改变，因为那时候，一方面社会的现时经济基础还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却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为彻底改造社会实行准备措施。作为这样的过渡措施，总委员会建议扩大遗产税和限制根据遗嘱的继承权。这种继承权比家族继承权更是一种迷信，因为它更能加强私有制的基础。

与这种观点相反，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提議把废除继承权列为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但它只是用了一些抽象的陈词滥调来论证自己的提案，诸如“特权”、“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公平”、“社会秩序”等等。在相当短的讨论过程中，除了埃卡留斯以外，比利时人德·巴普和法国人瓦尔兰也都发言赞同总委员会的报告，而巴枯宁则替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辩护，因为他就是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精神上的父亲。他支持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似乎是基于实际的理由，而其实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由。他硬说不废除继承权就不能实现公有制，说倘若剥夺劳动者的土地，他们是会反抗的，而如果废除继承权，他们会感觉不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直接触犯，因而土地私有制会逐渐地消亡。在对小组委员会的提案进行 443

記名投票時，有三十二票贊成，二十三票反對，十三票棄權，七人缺席；在對總委員會的提案進行投票時，有十九票贊成，三十七票反對，六票棄權，十三人缺席。可見，二者都沒有得到絕對的多數，因而問題的討論也沒有得到顯著的結果。

巴塞爾大會無論在資產階級世界还是在無產階級世界都比以往的大會喚起了更熱烈的反應。資產階級學者帶着恐懼和幸災樂禍的心情判明了國際終於表現出來的共產主義性質；大會關於土地公有的決議在無產階級當中博得了一片歡聲。日內瓦的德語系支部發表了一篇告農民的宣言。這篇宣言馬上被譯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波蘭文和俄文，並且迅速得到廣泛的傳播。在巴塞羅那和那不勒斯成立了第一批農業工人的支部。在倫敦的一次大規模的集會上成立了土地和勞動同盟⁴⁰⁹；總委員會有十名委員參加了這個同盟的委員會，同盟的口號是“土地歸於人民！”。

在德國，德意志人民黨的“高尚的騎士們”瘋狂地反對巴塞爾大會的決議。這種情況開始時使李卜克內西感到驚慌，迫使他聲明愛森納赫派不受大會決議的約束。幸亏人民黨的怒不可遏的騎士不以此為滿足，而要求愛森納赫派干脆拒絕大會決議，於是李卜克內西終於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希望的那樣跟這個黨決裂了。但是他最初的猶豫動搖對施韋澤是有利的。施韋澤多年來就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中“宣揚”土地公有制。但是馬克思以為他只是現在才進行這種宣傳，並且只是為了嘲弄自己的敵手，因而說他的行為是“無恥”的。恩格斯則抑制着自己對這個“惡棍”的憤怒，這至少因為他承認，施韋澤總是在理論上“極其機警地”保持着十分得體的態度；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一當問題涉及到理論觀點，施韋澤的對手就會被打得體無完膚。

同时，拉薩尔派不仅在組織方面是团結得最紧密的德国工人政党，而且在原則方面也是最先进的。

(六) 日內瓦的紛爭

巴塞尔大会关于继承权的爭論是巴枯宁和馬克思之間的一种 444 精神上的决斗。从这个意义上說来，这次爭論固然沒有得到确定的解决，但它所采取的方向与其說对馬克思有利，无宁說对馬克思不利。但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被深深刺痛了，并且准备以有力的打击来摧毀巴枯宁，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馬克思对巴塞尔大会的經過是完全滿意的。当时馬克思正同女儿燕妮在德国休养，并于9月25日从汉諾威写信給女儿劳拉說：“我为巴塞尔大会的結束和进行得比較順利这一点感到高兴。每当党‘带着它的一切創病’公开登台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担心。沒有一个演員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上层階級的愚蠢弥补了工人階級的錯誤。不管我們經過多么小的德国城市，到处都有地方的小报滿載这次‘可怕的大会’的消息。”①

巴枯宁也和馬克思一样大体上对巴塞尔大会的經過感到滿意。有人說他曾想用关于继承权問題的提案打倒馬克思，并通过这个理論上的胜利爭取把总委員會的会址从倫敦迁往日內瓦；而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他便在《平等》周刊上更加猛烈地攻击总委員會。这种武断的說法一再被人重复着，以致变成了真正的神話。共实，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在巴塞尔大会以后，巴枯宁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81頁。

本沒有在《平等》上写过一行字；在巴塞尔大会以前，亦即在1869年7—8月間，他誠然是这个刊物的主編，但是要在他的大量文章中找到敌視总委员会或馬克思的任何痕迹都是徒然的。例如，論述“国际的原則”的四篇文章是完全符合这个偉大的組織所立脚的根本精神的。如果說巴枯宁在这些文章中对于馬克思所說的“議會迷”对无产階級議員的致命影响表示了某种担心，那末第一，这种担心自那时以来已得到充分的证实，第二，这种担心比起李卜克內西在同一时期对工人階級参加資产階級議會所做的猛烈攻击来要溫和得多。

445 其次，即使巴枯宁对继承权的見解是想入非非的，但他毕竟有权要求对它加以討論，因为国际的历次大会上都討論过比这更为离奇的提案，但是沒有一个人认为这些提案的提出者有什么阴谋詭計。至于說他想把总委员会从倫敦迁往日內瓦这种責难，也为他的下面这段簡單明了的話粉碎了：“誰也沒有向他說过这种話，誰也不能向他說这种話，因为只要有人提出这种办法，我首先就会尽全力反对这种办法，因为我认为这种办法对国际的未来是致命的。誠然，日內瓦各支部在极短的时期內就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籠罩着日內瓦的还是一种过于狹隘、过于特殊的日內瓦精神，这是不适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迁移到那里去的。而且，只要欧洲現有的政治結構繼續存在，倫敦就显然仍旧是总委员会唯一适当的所在地，只有瘋子和国际的真正敌人才会企图把总委员会迁往其他城市。”^①

但是有人认为巴枯宁从来就是个撒謊家，他們會說巴枯宁的

^① 波曉斯基編：《巴枯宁傳記材料》，1928年俄文版，第3卷，第184頁。

这段表白不过是事后編造的遁詞。但是这种可能的反駁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巴塞尔大会之前巴枯宁就已决定在大会之后从日内瓦迁居洛迦諾。他决定这样做是由于某些追不得已的情况。他的經濟状况极为困难；他的妻子正在临产，因此他决定搬到洛迦諾去等候她的分娩。他打算在那里把《資本論》第一卷譯成俄文。他的一个名叫柳巴文的年輕崇拜者为他找到了一个俄国出版人^①，这个出版人答应为他的翻譯付一千二百卢布的稿費，并且預付給他三百卢布。

由此可見，所謂巴枯宁在巴塞尔大会前后曾經采取的各种阴谋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这次大会毕竟給他留下了痛苦的回味。在波克罕的唆使下，李卜克內西当着一些第三者的面宣布，他有证据证明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細。巴枯宁在巴塞尔召开了公意审判会，要李卜克內西在审判会上提出他的指責的根据。李卜克內西根本提不出这种根据，于是审判会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責。虽然 446 如此，經過科倫共产党人案件和流亡生活之后过于喜欢猜疑到处有奸細的李卜克內西，还是誠恳地向巴枯宁伸出了和解的手，巴枯宁也誠恳地握了他的手。

使巴枯宁尤其难堪的是，几个星期之后，即10月2日，莫澤斯·赫斯在巴黎的一家报纸《Reveil》（《觉醒报》）上又提出了老一套的毀謗。作为出席巴塞尔大会的德国代表的赫斯，曾經答应要著文叙述大会的内幕，并因此談到巴枯宁的“阴谋”，說他曾經打算推翻国际的原則基础，并把总委员会从倫敦拉往日内瓦。他說，这些阴谋已在巴塞尔被粉碎了。赫斯在結尾的地方表示了卑鄙的怀

^① 即波利亚科夫(Н. П. Поляков)。

疑，說他雖然不懷疑巴枯寧的革命觀點，但這個俄國人是施韋澤的思想上的近親，而施韋澤正是在巴塞爾被德國代表們指責為德國政府的被揭露了的奸細的。在巴枯寧的思想和施韋澤的思想之間根本看不出任何“近親”關係，因此這種攻擊的惡意就更加顯而易見。而且就為人來說這兩個人也沒有任何共同之點。

當然，巴枯寧如果不去理睬這篇荒唐透頂的文章，那就再聰明不過了。但是，對他的政治上的誠實的不斷懷疑使他激怒，特別是對他的越來越陰險的暗中攻擊使他尤其不能自持。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因此他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但是由於激憤而寫得過長，以致連他自己也知道不會為《覺醒報》所接受。他非常猛烈地攻擊了“德國的猶太人”，不過把拉薩爾和馬克思這樣的“巨人”從波克罕和赫斯之流的小人中區別了出來。巴枯寧決定把這篇長篇論戰文章當做闡述自己革命信仰的一部巨著的序言，並把它寄給巴黎的赫爾岑，要他代為物色一個出版人。他還為《覺醒報》寫了一個較為簡短的說明，附在這篇文章裡面。但是赫爾岑擔心這個說明也不會為報紙所接受，因此親自寫了一篇替巴枯寧辯護的文章來反駁赫斯。於是《覺醒報》不僅刊登了這篇文章，而且附上了一段使巴枯寧感到十分滿意的編者按語。

但是，赫爾岑對巴枯寧的長文是非常不滿意的。他反對攻擊“德國的猶太人”，並且對於巴枯寧不攻擊馬克思而攻擊沒有多大名氣的波克罕和赫斯特別感到驚異。關於這一點，巴枯寧在10月28日回信說，雖然他也認為馬克思是整個論爭的禍首，但是由於

447 兩個原因而原諒他，甚至稱他為“巨人”。第一個原因是正義。“拋開他反對我們的一切卑污行為不談，我們，至少是我，不能不承認他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巨大功績，因為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誠實

地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将近二十五年，而在这方面他无疑地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他是国际的最初的创立者之一，而且可以说是主要的创立者。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绩；不管他怎样反对我们，我今后也将永远承认这个功绩。”^①

接着，巴枯宁说他对马克思的态度也基于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他不会容忍我，而依我看来，除了他自己和他的亲近的人以外，他也不爱任何人……马克思在国际中无疑是个有用的人。他至今在国际中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坚定、最聪明、最有影响的支柱，——是抵制任何资产阶级思潮和意向对国际的侵袭的一道最坚固的防壁。如果我为了报复私怨而打击甚至削弱他的无疑有益的影响，那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可能而且肯定会发生的是，不久我就不免要同他进行斗争，但不是为了私怨，而是为了原则问题，为了他和他领导的英国和德国的党所热烈捍卫的国家共产主义。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万事都有它的时机，而现在时机尚未到来。”^②

最后，巴枯宁举了一个策略上的理由，说这个理由阻止了他，使他没有攻击马克思。如果他公开反对马克思，那末就会有四分之三的国际会员成为他的敌人。反之，如果他反对马克思周围的那一伙穷极无聊之徒，就会有大多数人站在他一边，而马克思本人也会感到高兴，或者如巴枯宁在他的法文信中用德文所说的，也会“幸灾乐祸”。

写过这封信后不久，巴枯宁就迁到洛迦诺去了。由于忙于个人事务，他在巴塞尔大会之后滞留日内瓦的几个星期当中，几乎没

① 《巴枯宁给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信》，1906年俄文版，第338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有参加当地的工人运动，甚至也没有为《平等》周刊写过一行文章。接替他的编辑职务的是罗班和裴隆；罗班是一年前迁居日内瓦的比利时教师，裴隆则是一个在巴枯宁之前就担任过该刊编辑的珐琅画工。他们两个人都是巴枯宁的同道，但是无论文章和作风都跟巴枯宁截然不同。巴枯宁极力要启发和唤起“粗工”从事独立行动，认为“粗工”远比“厂工”更富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们对他们的做法甚至跟他们自己的委员会也是背道而驰的，更不用说跟“厂工”相矛盾了；“厂工”虽然在“粗工”罢工的时候也支持他们，但是却从自己的这种无可争辩的功绩做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认为“粗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跟着他们走。巴枯宁反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分等政策”这种客观危险时所说的话，甚至直到如今也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巴枯宁所以同这种危险做斗争，特别是因为“厂工”有着跟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行妥协的根深蒂固的倾向。反之，罗班和裴隆则认为能够调和并掩盖“厂工”和“粗工”之间的这种不是巴枯宁所制造、而是来源于社会对立的矛盾。这使他们二人经常处于动摇状态，因而既不能满足“厂工”也不能满足“粗工”，而只会为各种各样的阴谋大开方便之门。

当时住在日内瓦的一个俄国流亡者尼古拉·吴亭就是玩弄这种阴谋的能手。他在60年代初曾参加过俄国大学生的风潮，当情况变得危险时，他逃亡国外，靠着他那做烧酒专卖承包人的父亲给他的一笔可观的年金——据说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法郎——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个无聊的空谈家靠了这笔钱取得了一个单靠他的才智所永远得不到的地位。但是，他也只是在是非场中取得了这种成就，而在这种场所，正如恩格斯有一次所说的，“有正业的人是永远比不过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的”。吴亭最初投奔巴枯

宁門下，曾經受到巴枯宁的坚决攆斥。巴枯宁离开日内瓦给了他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使他能够用造謠中伤的办法来打击他所憎恨的这个人。他为这个高尚的目的所花的力气并没有白费。随后他就拜倒在沙皇的脚下，哀求恩赦。沙皇也表现出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1877年俄土战争⁴¹⁰时，吳亭成了沙皇的軍需品供应人，靠了这，他比他老子的燒酒生意賺了一笔更大的錢，虽然这笔錢肯定并不比他老子給他賺的錢更干淨。

罗班和裴隆虽然为人誠实，但是难以置信地庸碌无能，这就使吳亭更容易达到愚弄他們的目的。最糟的是，他們正是在那些讲法語的瑞士工人关心得最少的问题上对国际总委员会发动了攻击⁴⁴⁹。《平等》周刊抱怨总委员会过多地关心爱尔兰问题，没有为英国建立联合委员会，并且没有解决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澤之間的爭論，等等。这一切都是跟巴枯宁毫不相干的。如果说这种攻击看来似乎为巴枯宁所贊同并且是由他授意的，那只是因为罗班和裴隆是他的信徒，而詹姆斯·吉約姆的小报也持同样的論調。

在1870年1月1日除了日内瓦以外只发給罗曼語系各联合委员会的内部通告⁴¹¹中，总委员会反駁了罗班的各种攻击。这份措詞尖銳的通告紧紧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总委员会拒絕在英国另外建立联合委员会所依据的那些論据，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重視的。总委员会指出，虽然革命运动可能首先从法国开始，但是只有英国才能成为重大經濟革命的杠杆。英国是已經沒有农民并且土地全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唯一国家；是資本主义生产形式几乎支配着国内全部生产，而广大居民群众都是雇佣工人的唯一国家；是阶级斗争和通过工联的工人阶级組織达到相当的普遍和成熟程度的唯一国家。最后，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場上的支配地位，英国在

經濟方面的任何革命都将直接影响到全世界。

因此，英国具备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它却缺乏概括的能力和革命的热情。总委员会的任务就在于给它贯注这种精神和热情，而总委员会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从最有势力的伦敦资产阶级报纸的抱怨也可看出。这些报纸抱怨说，总委员会毒害英国工人阶级的民族精神，把他们推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如果在英国建立联合委员会，由于它介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总委员会之间的地位，它不会享有任何威信。另一方面，总委员会也将失去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杠杆的影响。把这个杠杆完全交到英国人手里，并且用空洞的喧嚣来代替踏实的、不声不响的工作，这将是愚蠢的。

450 但是这份通告还没有送到目的地，日内瓦方面就发生了变故。《平等》周刊编辑委员会里原有七名委员是巴枯宁的拥护者，只有两名是他的反对者。由于一件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多数派提出了信任问题，于是发现采取骑墙政策的罗班和裴隆是摇摆于二者之间的。少数派得到了联合委员会的支持，多数派的七名委员退出了编辑部，其中也有老贝克尔。在巴枯宁居住日内瓦期间，贝克尔曾同他保持着友谊关系，但是根本不赞成罗班和裴隆的做法。此后《平等》周刊的领导工作就转到吴亭手中了。

(七)《机密通知》

当时，波克罕仍在进行他的反对巴枯宁的活动。

2月18日，他向马克思诉苦说，约翰·雅科比出版的《Zukunft》〔《未来报》〕拒绝刊登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如马克思给恩格

斯的信中所說的，是一封“关于俄国事务的大而无当的信，是由杂七杂八的东西凑合起来的莫名其妙的大杂烩”^①。同时，波克罕引证卡特科夫的話，怀疑“巴枯宁过去在金錢上有些不清白”；而卡特科夫虽然在青年时代曾是巴枯宁的同道，但是后来投入了反动陣营。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怀疑都沒有加以重視；恩格斯以哲人的冷靜态度說道：“借錢在俄国人是一种司空見慣的謀取生活資料的手段，一个俄国人不会因为这种事去責备另一个俄国人”^②。馬克思在把波克罕的陰謀通知給恩格斯之后接着写道，总委员会必須决定是否應該把里昂的一个叫里沙尔的人（此人后来确实被發現是叛徒）开除出国际。他还說，里沙尔除了盲从巴枯宁并因而过分卖弄聰明以外，是无可指責的。“我們上次的通告似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瑞士和法国都开始有驅逐巴枯宁派的事情发生。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分寸，我要留心不让做出不公道的事来。”^③

同这种良好願望截然相反的是，馬克思在几个星期以后，即 8 451 月 28 日，通过庫格曼給爱森納赫派不倫瑞克委员会发去了一份《机密通知》^④。这份通知的主要内容就是总委员会于 1 月 1 日仅仅发給日内瓦和瑞士法語系各联合委员会的那个通告；通告已經达到了它的实际目的，甚至引起了馬克思所譴責的“驅逐”巴枯宁派的行动。很难理解馬克思为什么要不顾这种不良后果而把这个通告发到德国去，何况德国根本就沒有有什么巴枯宁的拥护者。

更难理解的是，馬克思在他的《机密通知》中給通告增添了序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327 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 330 頁。

③ 參閱同上书，第 328 頁。

④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465—479 頁。

言和結語，而這些東西遠比通告本身更能引起“驅逐”巴枯寧的行動。序言一開頭就痛斥巴枯寧，說他最初企圖鑽入和平自由同盟，但是他在該同盟的執行委員會里一直被人當作“可疑的俄國人”而受到嚴密的監視。他的荒唐的綱領在這個同盟中遭到破產以後，他參加了國際，想把國際變成他的個人目的的工具。為此，他創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同盟，而當總委員會拒絕承認這個同盟時，他宣布這個同盟已經解散；但實際上同盟依然在巴枯寧的領導下存在着。他極力想用其他辦法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力爭把繼承權問題列入巴塞爾大會的議程，想借此在理論上戰勝總委員會，從而為總委員會遷往日內瓦打下基礎。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巴枯寧組織了一個“處心積慮的陰謀”，想保證自己在巴塞爾大會上獲得多數，但是他既沒有能夠通過自己的提案，總委員會也仍然留在倫敦。“巴枯寧可能把他的種種的個人的投機都寄托在這件事情的成功上面，因此對這次失敗深感懊惱”，這種懊惱就表現為《平等》周刊對總委員會的攻擊，而總委員會在1月1日的通告已經對此做了回答。

接着，馬克思在《機密通知》中逐字逐句地重述了通告，並且指出：還在日內瓦接到通告以前日內瓦方面就發生了危機；羅曼語系的聯合委員會不贊同《平等》周刊對總委員會的攻擊並擬將該刊置於嚴格監督之下；此後巴枯寧就離開日內瓦去提辛。“不久赫爾岑就故去了。自從妄想成為歐洲工人運動領袖時起便同自己的老友和庇護人赫爾岑脫離關係的巴枯寧，在赫爾岑死後忽然對他大加頌揚起來。這是為什麼呢？赫爾岑本人雖然頗為富有，却每年從俄國國內同情他的假社會主義的泛斯拉夫主義政黨得到兩萬五千法郎的宣傳費。靠了自己的贊美歌，巴枯寧把這筆錢據為已有，因而也就繼承了‘赫爾岑的遺產’，——儘管他對繼承制度是深惡痛

絕的……。”^①同时，在日内瓦已經形成了一个年輕的俄国流亡者的团体⁴¹²，他們都是一些忠于自己的信念的学生。同泛斯拉夫主义做斗争，是他們的綱領的主要点。据馬克思說，他們想作为一个支部参加国际，并且暂时委托馬克思做他們的出席总委员会的代表；这两个建議都被接受了。同时他們宣布，他們將在最近的将来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把戏——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将很快被揭穿。《机密通知》就到这里結束了。

这个通知中所包含的有关巴枯宁的許多不确实的材料是无須一一列举的。馬克思对巴枯宁的譴責越是严重，这种譴責也就越是缺乏根据。这首先是指关于巴枯宁貪图赫尔岑遗产的怀疑。在俄国从来就沒有过一个假社会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党每年給赫尔岑两万五千法郎的宣傳費。这个无稽之談的一点微小事实的根据是，有个年輕的社会主义者巴赫美齐也夫在50年代設置了一笔两万法郎的革命基金^②，由赫尔岑来管理。但是沒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巴枯宁有意将这笔基金装进自己的腰包。尤其不能根据巴枯宁在罗什弗尔的《Marseillaise》〔《馬賽曲报》〕上为紀念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后来政治上的敌手所写的誠懇的文章而断言这一点。根据这篇文章，至多只能責备他的多情善感，而这种多情善感，也跟巴枯宁的其他一切缺点和弱点一样，正是和一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所一般固有的那些特性冰炭难容的。

从《机密通知》的結語就可以看出，是什么东西使馬克思陷入

① 参閱馬克思：《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4頁。

② 关于巴赫美齐也夫的基金，参閱《赫尔岑著作和书信全集》，1920年俄文版，第14卷，第414—419頁。

了迷誤。一切虛假的消息都是日內瓦的俄國流亡者委員會，換言之，吳亭或者假手吳亭的貝克尔報告給他的。至少從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可以推斷，對巴枯寧的最惡劣的猜疑，即譴責他霸占赫爾岑的遺產一節，是貝克尔提供給馬克思的消息所引起的。但是這一點無論如何都跟下述情況對不攏來，這就是貝克尔雖然在一封保存下來的給萊克的信中抱怨日內瓦的混亂狀態，“廠工”和“粗工”之間的糾紛，以及“羅班之流的神經質的虛假熱情和巴枯寧之流的頑固頭腦”，但是最後卻贊揚了巴枯寧，說他“變得好些並且有用些了”。貝克尔和俄國流亡者們給馬克思的信沒有保存下來。馬克思在給國際的這個新支部的具有公私兩種性質的回信⁴¹³中，認為最好絕口不提巴枯寧。他說，俄國支部的主要任務就是協助波蘭人，換句話說，就是勸告俄國人幫助歐洲從它的鄰人手中解放出來。他幽默地答應做青年俄羅斯的代表，並且說，一個人永遠不能料到會搭上怎樣奇妙的伙伴^①。

儘管用了這種開玩笑的口吻，但是顯然馬克思對於國際開始吸引俄國革命家這件事深感滿意。否則就難以理解，他怎麼會聽信素昧生平的吳亭對巴枯寧的這種猜疑；因為在這以前，當他的老友波克罕向他談到這點時他是不相信的。由於一種奇妙的偶合，就在那時巴枯寧受了一個俄國流亡者的欺騙。他把這個流亡者看成了預報即將來臨的俄國革命的海燕，甚至讓自己牽連到一場冒險中去，這場冒險比他的動蕩的一生中的其他一切風險都更加使他的聲名瀕於危殆。

寫過《機密通知》之後幾天即4月4日，在拉紹德封召開了羅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4卷，第343頁。

曼語系联合委员会的第二次年会。在这次年会上事情鬧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前由总委员会批准参加国际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要求参加罗曼語系联合委员会，并請求准許它的两名代表参加大会的工作。吳亭反对这个請求，并且猛烈攻击巴枯宁。他說同盟的日内瓦支部是巴枯宁的阴谋的工具；但是他受到吉約姆的极其坚决的反对。吉約姆是个胸襟狹隘的狂热分子，他后来对馬克思所犯的罪，并不下于这时吳亭对巴枯宁所犯的罪；但是就教养和才能來說他毕竟跟他的可怜的对手有天淵之別。他以二十一 454 票对十八票的多数获得了胜利。但是少数派拒絕服从多数派的意志，于是大会分裂为两部分。因此，两个大会同时召开；多数派的大会决定把联合委员会的会址从日内瓦迁至拉紹德封，并把«Solidarité»〔《团结报》〕改成联合委员会的机关报。这个报預定由吉約姆在諾恩堡出版。

少数派为自己的捣乱行为进行辯解，說什么多数派实际上純粹是偶然产生的，因为出席拉紹德封大会的只有十五个支部，而仅仅日内瓦一地就有三十个支部，并且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这些支部都不願意同盟支部参加罗曼語系的联合委员会。反之，多数派則坚决主張联合委员会不能拒絕接納总委员会所已經接納的支部。老貝克尔在他的《先驅》上說，这一切爭吵实际上都是荒謬的并且是由于双方缺乏兄弟感情而引起的。主要以理論宣傳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不需要参加一国的联合会，何况人們认为这个支部是早为日内瓦人所厌棄的巴枯宁的阴谋的工具。尽管如此，只要它希望参加联合委员会，那末对此加以拒絕或者把是否接納它的問題变成分裂的导因，就是一种气量狹小的幼稚的表现。

但是事情并不像貝克尔所想的那样简单。虽然分裂后的两个大会所通过的決議也有許多共同点，但正是在曾經引起日內瓦的紛爭的那个基本問題上却是分歧的。多数派的大会捍卫“粗工”的观点。它拒絕一切只通过国家来实行社会改造的政策，因为所有在政治上組織起来的国家都不过是根据資產階級法律进行資本主义剝削的工具。因此，无产階級無論以何种形式参与資產階級的政治，都只能加强現存制度，并麻痹无产階級的革命行动。与此相反，少数派的大会則捍卫“厂工”的观点；它反对不参与政治，认为这有害于工人运动，并且主張参加选举，說这并不是因为参加选举可以解放工人階級，而是因为工人代表参加議會是进行宣傳的良好手段，从策略上考虑不应加以輕視。

455 拉紹德封的新联合委员会要求总委员会承认它为罗曼語系联合委员会的領導者。但是，总委员会沒有答应这个要求，并且在6月28日决定，得到日內瓦大多数支部支持的日內瓦联合委员会仍然保持它原来的职能；建議新联合委员会采用某种地方性的名称。这个决定是相当公平的并且是由新联合委员会自己引起的。但是它却拒不服从，并且大肆攻击总委员会的专断和“权威主义”。結果，除了不参与政治的口号以外，又加上了关于国际内部的反对派的第二个口号。

总委员会于是就同拉紹德封的联合委员会一刀两断了。

(八)爱尔兰大赦和法国全民投票

1869年年末到1870年年初的那个冬天又是馬克思为各种疾病折磨的时期，但是他至少已經摆脱了长期以来为金錢焦虑的困境。

1869年6月30日，恩格斯摆脱了“倒楣的商务”^①。他在半年以前就曾问马克思，一年三百五十英镑是否足够生活开支之用。恩格斯想同公司的合伙人商定，在五六年內每年支给马克思这个数目。两个朋友之间的通信没有透露，他们最后究竟是怎样商定的。不管怎样，恩格斯已经完全保障了马克思的生活，并且不仅是在五六年內，而是直到马克思逝世。

在政治方面，两个朋友当时在爱尔兰问题上下了许多功夫。恩格斯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历史，但是可惜他的工作成果没有出版⁴¹⁴。马克思则极力敦促总委员会支持爱尔兰人要求对那些被违法判刑并在狱中备受虐待的芬尼亚社社员实行大赦的运动⁴¹⁵。总委员会对爱尔兰人民在这个运动中的坚定精神和豪迈气概表示敬意，谴责了格莱斯頓的政策，因为格莱斯頓不顾他在选举中许下的诺言而拒绝实行大赦，或者提出一些对腐朽政府的牺牲者和爱尔兰人民说来是侮辱性的条件。总委员会猛烈抨击这位首相，斥责⁴⁵⁶他虽然身居要职，却公然对美国奴隶主的叛乱高声喝采，而现在又向英国人民宣扬服从的必要性；其次，他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的一切行为都是他在迫使他的敌手保守党人下台时会对其大加责难的那种“侵略政策”的真正产物。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的话说，总委员会像以前攻击帕麦斯頓一样坚决地攻击了格莱斯頓。马克思写道：“流亡在这里的煽动家们喜欢从远方安全无事地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但只有当着暴君的面这样做时，对我说来才有魅力。”^②

马克思的长女在爱尔兰运动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使他特别感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231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5页。

到高兴。由于英国报刊对獄中的芬尼亚社社員所受的虐待頑固地保持沉默，于是燕妮·馬克思用她父亲在 50 年代用过的笔名威廉斯向罗什弗尔的《馬賽曲报》投寄了几篇文章⁴¹⁶；她在这些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自由英国对待政治犯的情况。这些发表在当时大陆上可能是銷行最广的报纸上的揭露性的文章使格萊斯顿极为狼狽，几个星期后大多数在押的芬尼亚社社員就都被釋放并到美国去了。

《馬賽曲报》因极其大胆地打击搖搖欲墜的帝国而蜚声欧洲。1870 年年初，波拿巴把自由派空談家奧利維耶提升为首相，想借这种对資產階級的让步来破釜沉舟地拯救一下自己的沾滿血污的統治。奧利維耶实行了所謂“改革”，但是临死的猫也要捉老鼠，波拿巴要求用全民投票⁴¹⁷来为这些“改革”举行一次真正波拿巴式的洗礼。奧利維耶有一种唯唯諾諾的弱點，他甚至囑咐省长們要为全民投票的成功展开“猛烈的”活动。但是波拿巴的警察比这位头脑简单的空談家更懂得怎样使全民投票获得成功。投票前夕，警察⁴⁵⁷发现了一件据說是国际的會員謀杀波拿巴的莫須有的爆炸阴谋。奧利維耶特別因为事情牵涉到工人而怯懦地躲到警察背后。法国全国都对国际的知名的“領導者”进行了搜查和逮捕。

5 月 3 日，总委员会匆匆地对这种卑劣行为提出了抗議，并且声明說：“我們的章程規定本协会的所有支部必須进行公开的活动。即使章程中对这一点沒有明文規定，至少无产階級协会的本质本身是与任何形式的秘密結社不相容的。倘若构成每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并且創造一切財富的工人階級，亦即所有的政府、甚至篡夺者的政府都自称为其代表的那个階級要进行反政府的活动，那末它就会像阳光之对黑暗一样地公开进行这种活动，因为它充

分地自觉到，除了它以外再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力……


我們的法国各支部所受到的迫害，显然不过是与全民投票政策有关的詭計。”^①事实也正是这样，但是这种卑鄙的手法再一次达到了卑鄙的目的：“自由的帝国”以七百万票对一百五十万票的多数得到了确认。

但是在这之后，有关爆炸阴谋的臆造便烟消云散了。虽然警察揚言曾經在国际会员那里发现了密碼簿，但是在这个密碼簿中除了个别人名如拿破侖和个别化学名詞如硝化甘油之外根本沒有查出任何东西，而这些东西甚至向波拿巴的法庭提出都显然是过于荒唐的。因此国际的法国会员只被加了一个参加秘密的亦即未經官准的团体的罪名，并且因为是重犯而受到法律处分。

銅匠沙倫——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社員——在这次做了出色的辯护。辯护之后，于7月9日对一些人做了判决，其中最高的刑罰是监禁并褫夺公权一年。但是与此同时，法兰西爆发了一场从地面上扫除第二帝国的暴風雨⁴¹⁸。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3卷，上卷，第378—379頁。



第十四章 国际的衰微

(一) 色当以前⁴¹⁹

458 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的态度问题，人们已经谈过很多，虽然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谈的东西极少。他们不像莫尔特凯那样把战争看做上帝的常道，而是看做魔鬼的常道，看做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影不离的伴侣。

作为最卓越的历史家，他们当然不会从完全非历史的观点出发，认为战争就是战争，对任何战争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每一战争都有它特定的前提和后果，而工人阶级对这一战争的态度就是以这种前提和后果为转移的。拉萨尔的观点也是如此。1859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他就当时的战争的实际条件问题进行过争论。但是，对他们三个人说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个战争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

这种观点也决定了他们对1866年的战争的态度。1848年的德国革命未能建立起国家的统一。此后，普鲁士政府就力图利用由于德国的经济发展而重新抬头的德国统一运动。正如老威廉皇帝所说的，它要建立的不是统一的德国，而是一个扩大的普鲁士。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施韦澤、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致认为，作为德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预备阶段而为德国无产阶级所需要

的德国统一，只有通过民族革命才能实现。因此，他们极其坚决地反对大普鲁士政策的一切王朝分立的倾向。但是在科尼格列茨之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他们各依其对“现实形势”理解的不同⁴⁵⁹而先后嚐到了这个酸苹果的滋味。这时他们才明白，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和无产阶级的幼弱，民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靠“铁和血”⁴²⁰结合起来的大普鲁士要比恢复捉襟见肘的德意志联邦议会（更不用说这种恢复是根本不可能的）更能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拉萨尔的后继者施韦澤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把北德联邦这个残废无力的组织当作一个事实来看待；尽管这个事实是并非所愿的，尤其是不令人高兴的，但它毕竟比可恶的联邦议会更能为德国的工人阶级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反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仍然坚持大德意志的革命观点，并且在1866年以后不断地致力于摧毁北德联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6年作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1870年战争的态度。关于引起这次战争的直接导因，关于俾斯麦针对着波拿巴而提出霍亨索伦亲王作为西班牙王位继承的候选人，关于波拿巴为对付俾斯麦而筹划的法意奥军事同盟，他们都从来没有直接发表过意见。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是无法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的。但是，由于波拿巴的军事政策是针对着德国的国家统一的，所以他们认为德国是处于防御地位的。

马克思在由他起草而为国际总委员会于7月23日发表的宣言中，详细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他在宣言中把1870年的军事阴谋称为“1851年12月政变的修正版”^①。但是他说，这次战争是第二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66页。

帝国的丧钟；第二帝国的結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丑剧。他写道，但是不应忘記，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統治階級使波拿巴能够表演复辟帝国的殘酷笑剧达十八年之久。从德国方面說来，这次战争是防禦性的。但究竟是誰迫使德国处于防禦地位呢？究竟是誰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发动战争呢？普魯士！在科尼格列茨战役之前，俾斯麦曾和这个波拿巴暗中勾結，而在这一
460 战役之后，他不仅沒有建立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反而在自己的旧制度所固有的妙处之外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狡猾伎俩；結果，波拿巴制度就在萊茵河两岸盛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战争，又能指望什么呢？“如果德国工人階級容許这场战争失去純粹防禦性质而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無論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所謂的解放战争結束以后所遭到的一切不幸，又将更殘酷地压到它头上。”^① 宣言指出，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反对战争的示威，使我們不必顾虑发生这种悲惨結局的危險。宣言还強調指出，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可以看出俄国的一副凶相。虽然德国人在反抗波拿巴进攻的防禦战争中理应得到一切同情，但是只要他們容許普魯士政府請求哥薩克援助或者接受他們的援助，他們便会立刻失去这种同情。

这篇宣言发出前两天，即7月21日，北德議會通过了一亿二千万塔勒的軍事預算。拉薩尔派的議員根据他們在1866年所采取的政策对預算投了贊成票。相反地，爱森納赫派的議員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則棄权。他們如果投贊成票，那就等于对于以1866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68頁。

年的行动准备了现在这次战争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另一方面，如果投反对票，又会被解释为赞同波拿巴的卑鄙罪恶的政策。这就是他们采取上述做法的理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主要是从道义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的，这和后来李卜克内西在他关于埃姆斯急电^①的文章中，以及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表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做法，他们同自己的一派、特别是它的领导机关不伦瑞克委员会⁴²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实际上，放棄投票权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方面说来并不是一种实际的政策，而是一种道义性质的表白；不管这种表白本身如何正当，它却不符合⁴⁶¹当时形势的政治要求。对争论的双方说，你们都不正确，但我不干预你们的争论，——这在私生活中是完全可能的，有时甚至是足够的。但是在国家生活上这却是行不通的，因为人民要为国王间的争端付出代价。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莱比锡的《Volkstaat》（《人民国家报》）在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星期所采取的决非明确和彻底的立场，就表明了保持中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编辑部即李卜克内西和不伦瑞克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后者曾经向马克思请求帮助和征求意见。

在战争爆发之初，即在7月20日，因而也是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放棄投票权以前，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曾激烈地批判了法国的“共和沙文主义者”，并且写道：“法国人需要鞭撻。如

^① 梅林指的是李卜克内西的《埃姆斯急电或如何制造战争》一文。李卜克内西在这篇文章中怀疑俾斯麦所传出的威廉一世关于他同法国大使谈判结果的发自埃姆斯的电报内容是否确实。实际上，俾斯麦所伪造的电报（“埃姆斯急电”）成为爆发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导因。

果普魯士人取得勝利，那末國家權力的集中對於德國工人階級的集中是有用的。其次，德國人的優勢將使西歐工人運動的重心從法國移向德國。人們只要把兩國從1866年起到今天的運動比較一下，就足以看出德國工人階級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組織方面都優於法國工人階級。德國工人階級在世界舞台上對法國工人階級的優勢，同時也將是我們的理論對蒲魯東等等的理論的優勢。”^①當馬克思接到不倫瑞克委員會征求意见的信時，他和往常遇見重要問題時一樣，寫信給恩格斯同他商量。恩格斯也和1866年時一樣詳細擬定了他們共同的策略。

恩格斯在8月15日的回信里寫道：

“我看情況是這樣，德國已被巴登格^②卷入爭取民族生存的戰爭。倘若它被巴登格打敗，那末，波拿巴主義就會有若干年的鞏固，而德國會有若干年、也許是若干世代的破產。到那時就再也談不上什麼獨立的德國工人運動了，到那時恢復民族生存的鬥爭就將占去一切力量，德國工人充其量也只能跟在法國工人後面跑。如果德國勝利了，那末，法國的波拿巴主義就無論如何都要壽終正寢，為建立德國統一而發生的無窮無盡的爭論就將最終平息，德國工人就能在遠非昔比的全國規模上組織起來，法國也無疑地會比在波拿巴統治下獲得較為自由的活動場所，而不管在那裡將出現什麼樣的政府。包括各個階級在內的德國全體人民群眾都已經懂得，問題首先正是在於爭取民族生存，因此，他們馬上就投入了這一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德國政黨要像威廉那樣宣傳全面的阻撓，並用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慮來代替主要的考慮，我認為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4卷，第391—392頁。

② 拿破侖第三的綽號。

都是不可能的。”^①

和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猛烈地譴責了深入法国社会一切阶层、直至共和主义分子当中的法国沙文主义。“如果没有法国人民群众的沙文主义，即資产者、小資产者、农民以及由波拿巴在大城市中所創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欧斯曼式的^②、出身于农民的建筑业无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巴登格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沙文主义不遭到打击，而且是彻底的打击，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就不可能。人们本来可以指望这一工作由无产阶级革命担负起来；但是战争既已开始，那末德国人就只好自己来做这一工作，并且立即做这一工作。”^③

恩格斯还谈到“次要的考虑”，这就是：这场战争是在俾斯麦一伙人指挥下进行的，而成功的结局将使俾斯麦赢得暂时的荣誉。这种情况要归咎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当然是非常讨厌的，然而是一无办法的。“但是，因此就把反俾斯麦主义提高为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首先，现在同1866年一样，俾斯麦总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在做我们的一件工作，虽然他并不愿意做，然而还是在做着。他在给我们创造比过去更广阔的活动场地。这样，我们就不再像1815年那样了。现在，南德意志人必然要参加帝国议会，从而就将产生一种普鲁士主义的对立物……总之，像李卜克内西那样，由于他不喜欢1866年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想取消这段历史，那是愚蠢的。但是我们确实了解我们的典型的南德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3页。

② 来自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塞纳省的行政长官欧斯曼的名字，他曾为了便于对付工人起义而改建过巴黎。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3—264页。

意志人。”^①

468 恩格斯在他的信中再一次談到李卜克內西的政策。“威廉的下面这个說法是很有趣的：因为俾斯麦过去是巴登格的同謀者，所以正确的立場是保持中立。如果这是德国人的普遍意見，那末馬上又会出现萊茵同盟⁴²²，而高貴的威廉有一天会看到，他在这个同盟中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工人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老是受到拳打脚踢的人民，的确是負有实现社会革命的使命、而且是在李卜克內西所心爱的无数小邦中实现这个革命的真正人民^②……威廉显然希望波拿巴获得胜利，只要这样能使俾斯麦倒台。你記得他曾怎样經常用法国人来恐吓俾斯麦。你自然也站在威廉一方面^③”当然，最后这句话是带有諷刺意味的：因为馬克思曾經同意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在軍事預算問題上放棄投票权的做法，而李卜克內西也正是以这一点为依据的。

馬克思承认他同意李卜克內西的“声明”。因为那正是死扣原則就是一种英勇行为的“时刻”。不过，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这种策略直到現在仍然是现实的，更不能得出結論說，德国无产阶级对这场已經变成民族战争的战争的态度，应该取决于李卜克內西对普魯士的反感。馬克思以充分的論据談到“声明”，而沒有談到棄权本身。拉薩尔派根本沒有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場，就随声附和地跟着资产阶级多数派投票贊成軍事預算，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則“說明”了他們棄权的“理由”。他們不但說明了他們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作为反对一切民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64 頁。

② 同上书，第 266 頁。

③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423—424 頁。

族的一切壓迫者并力求使一切被壓迫者結成兄弟同盟的國際的會員”，还对这次战争以及一切王朝战争提出了原則性的抗議。他們希望，从目前的災難性事变中取得了教訓的歐洲各國人民，要大力爭取自決權并消滅一切國家的和社會的災難的根源——當前的倚恃暴力的階級統治。這篇“聲明”第一次在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問題上，在歐洲的一個國家的議會中，堂堂正正地高舉起國際的旗幟。這當然使馬克思深感滿意。 464

从馬克思所用的字眼也可以看出，他的“同意”恰恰具有這樣的涵義。棄權不是一種“死扣原則”的行動，而无寧是一種妥協。最初李卜克內西本想徑直投票反對預算，只是后来由于听从了倍倍爾的勸告才放棄了投票。其次，正如《人民國家報》的每一期所實際表明的，二人的棄權不是出于一種“權宜”之計。最后，這種棄權也并不是一種“英勇行為”（就這一字眼本身所包含的褒美之意而言）。倘若馬克思所指的就是這種意義的英勇，那末他應該更加贊美那個不顧帝國衛士的痛罵而在法國議會中激烈反對戰爭的勇敢的梯也爾，或者贊美法夫爾和格列維之流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並沒有在表決軍事預算時棄權，而是干脆投了反對票，尽管巴黎的爱国主义喧囂至少跟柏林同樣危險。

恩格斯根据他对形势的看法而为德国工人的政策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參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一运动仅仅是保卫德国的（但这并不排斥在締結和約以前基于情况所做的必要的进攻）；同时，应当強調德國民族利益和普魯士王朝利益之間的區別；应当反對并吞亞爾薩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圖；一旦巴黎建立起一個共和主義的而不是沙文主義的政府，就力爭締結光榮的和平；应当不斷強調德國工人和法國工人的利益的一致，因為不是他們進行这次战争，反

之，他們都譴責這次戰爭。

馬克思完全同意這些意見，並且把按照這個意思擬定的結論寄給了不倫瑞克委員會⁴²³。

(二)色當以後

但是還在委員會按照來自倫敦的指示行動以前，情況就已經完全改變了。色當戰役已經打響，波拿巴被俘，帝國崩潰，在巴黎⁴⁶⁵成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領導這個共和國的是法國首都的一些舊議員，他們自封為“國防政府”。

從德國人方面說，防禦戰爭已經結束。普魯士國王作為北德聯邦的最高領導者曾一再莊嚴宣布，他不是同法國人民作戰，而是同法國皇帝的政府作戰。另一方面，巴黎的新當權者們也宣布，他們準備盡其所能賠償戰爭所造成的損失。但是俾斯麥卻要求割讓領土。他為奪取亞爾薩斯和洛林而繼續進行戰爭，從而把德國的防禦戰爭變成了嘲弄。

他在这方面也學着波拿巴的榜樣，布置了一種全民投票來解除普魯士國王的莊嚴諾言。還在色當戰役的前夕，各色各樣的“名流”就已向國王呈遞“群眾請願書”，要求一種“有保障的疆界”。“德國人民的一致願望”對柏林的老國王發生了影響，以致他在9月6日寫信回國說：“當軸的王公們如果違逆這種民情，就會使自己的寶座陷於危險。”9月14日，半官方的報紙《Provinzial-Correspondenz》〔《外省通訊》〕承認，如果以為北德聯邦的元首會為自己公開而自願地許下的諾言所約束，那是“愚蠢的”。

為了使“德國人民的一致願望”能夠十足地表現出來，一

切反對意見都受到了暴力的壓制。9月5日，不倫瑞克委員會發表宣言，號召工人階級公開行動起來，要求同法蘭西共和國締結光榮的和約，反對併吞亞爾薩斯和洛林。這篇宣言逐字逐句地照錄了馬克思給委員會的信的一些片斷。9月9日，在宣言上簽了名的人被軍事當局逮捕，並帶着鐐銬被解往列特岑要塞。約翰·雅科比也作為國事犯被押解到那里，罪名是他曾在科尼斯堡的集會上反對併吞法國領土，並曾發表大逆不道的言論。他說：“几天以前，我們還在進行防禦戰爭，為我們親愛的祖國進行神聖的鬥爭；而今天我們卻在進行侵略戰爭，為日耳曼族在歐洲的霸權而鬥爭。”大規模的沒收、禁止、搜查和逮捕補充了軍事恐怖統治，而後者的目的則是要防止對“德國人民的一致的願望”的任何懷疑。

就在不倫瑞克委員會的委員們被捕的那一天，國際總委員會 466 發表了也是由馬克思在恩格斯部分參加下起草的第二篇宣言，目的是闡明新的形勢。總委員會理直氣壯地指出，它關於當前的戰爭將成為第二帝國的喪鐘的預言已經迅速地實現了。同時，它對於戰爭從德國方面說來是否能始終保持防禦性質的懷疑也很快地證實了。普魯士的軍人奸黨已經決心進行掠奪。但是他們如何才能使普魯士國王解除他所做的進行防禦戰爭的保證呢？“導演這出滑稽劇的人不得不把事情弄成這樣，仿佛威廉是無可奈何地順從了德國人民不可抗拒的要求的，為此他們立刻給德國自由資產階級以及它那班教授和資本家、議員和新聞記者們提示了台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在1846—1870年間爭取公民自由的鬥爭中表現過空前的猶豫、軟弱和怯懦，現在它看到自己要在歐洲舞台上扮演德國愛國主義猛獅的角色，當然是歡欣若狂的。它重新戴上了公民

独立自主的假面具，装出仿佛它在逼使普魯士政府执行——执行什么？——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懺悔自己不該那样长期地和近乎虔誠地相信路易·波拿巴的不犯錯誤，因此大吵大嚷地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分成碎块。”^①

宣言接着分析了“这些爱国主义騎士們”为了吞并亚尔薩斯和洛林所使用的那些“漂亮的論据”。他們当然不敢武断地說，亚尔薩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的怀抱。但是他們硬說，这两个省的領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經属于早已寿終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如果根据历史上曾經有过的权利来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决不应忘記，先前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曾以普魯士領主的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⁴²⁴。”^②

但是最能迷惑“許多愚人”的，是那些“有心机的爱国分子”要求把亚尔薩斯和洛林当作防止法国进攻的“物质保证”。宣言用恩格斯所撰写的軍事科学評論来证明，德国根本不需要加强它跟法
467 国的边界。这次战争的經驗就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最近这次战役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要更为容易。”^③但是，把軍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是荒唐透頂和悖逆时代精神嗎？“如果按照这条規則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带；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带，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可能性，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可能性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軍事利益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71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471頁。

③ 參閱同上书，第472頁。

決定，那末要求就會沒有止境，因為任何一條戰綫都必然有其缺點，都可以用兼併鄰近新地區的办法來加以改進，並且這種國界永遠也無法公允地最終劃定，因為每一次總是戰勝者強迫戰敗者接受自己的條件，從而為新戰爭播下火種。”^①

宣言提起了拿破侖根據提爾西特和約⁴²⁵所取得的那些“物質保證”。然而，幾年之後，他那赫赫聲威就在德國人民面前一落千丈了。“但是，普魯士現在野心勃勃地妄圖向法國索取的‘物質保證’，難道能夠和拿破侖第一當日向德國本身索取過的相比嗎？這一次，結果也會是同樣不可收拾。”^②

但是德意志愛國主義的衛士們說，不應該把德國人同法國人混為一談，德國人要的不是榮譽，而是安全；德國人實質上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並不是德國在1792年為了用刺刀摧毀18世紀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國呀！也不是德國在奴役意大利、鎮壓匈牙利以及瓜分波蘭的時候染污了雙手呀！在德國現行的軍役制度下，一切身強力壯的男子都分成現役常備軍和候補常備軍兩部分，並且這兩部分都是必須絕對服從自己的天賜尊長的，——這個制度當然是維護和平的‘物質保證’，並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呀！在德國，也如在任何別處一樣，當權者的走卒總是用虛偽的自我吹噓⁴⁶⁸來毒化社會輿論。

這班德國愛國志士看到法國的麥茨和斯特拉斯堡這兩個堡壘就裝出氣憤的樣子⁴²⁶，但是他們目睹俄國在華沙、莫得林、伊萬城等處布設的龐大工事網却不認為有什麼不好。他們在波拿巴的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73頁。

② 同上。

进攻面前吓得周身发抖，而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罔闻。”^①

因此，宣言论证說，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会把法兰西共和国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难道条頓爱国志士真正以为这样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嗎？“如果軍事上的侥幸，好大喜功的心理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掠夺法国省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将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得不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經過短暫的喘息就不得不开始准备另一次‘防御’战争，但那时不是进行一場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語系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②

德国工人阶级既然无法阻止这场战争，他们就坚决支持了这场战争，把它当作一場争取德国的独立、争取欧洲从第二帝国的羈絆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德国工业工人和农村工人一起构成了英勇军队的骨干，虽然他们家里还留有半饥不饱的亲人。”^③除了国外战场上的伤亡以外，他们还要在国内受到貧困的更大摧殘。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保证，使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不致虚擲，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在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敗。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种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和“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宣言提到了不倫瑞克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并說，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指望德国工人馬上获得成功。但是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74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474—475頁。

③ 參閱同上书，第475頁。

那样的軟骨头。他們定会完尽自己的天职。

接着,宣言分析了法国的新形势。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皇帝,而只是占据了皇帝留下的空位。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成果,而是作为 469 一种国防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是臭名昭著的奥尔良党人^①,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有一部分人又是在 1848 年六月起义时期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的。这个政府的成员的职务分配,预示了不祥的前景。奥尔良党人盘踞了最有权势的位置——军队和警察,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弄到了一些专事空谈的职位。从这个政府的最初几桩举动中已经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它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片瓦砾场,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当敌人几乎已经向巴黎叩关欲进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不应当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传统所欺瞒那样,为 1792 年的民族传统所迷惑。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未来。但愿他们镇静地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更切实地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赫叩利斯⁴²⁷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就取决于他们的力量和智慧。”^②

这篇宣言得到了法国工人的热烈响应。他们放棄了反对临时

① 奥尔良党人——主張在法国恢复波旁王室辈份較晚的一个分支奥尔良家族的王权的人。

②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 卷,第 476 頁。

政府的斗争，履行了自己的公民职责。巴黎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如此。他们建立了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极其积极地参加了法国首都的英勇保卫工作，同时没有沉湎于 1792 年的民族回忆⁴²⁸，而是加紧致力于本阶级的组织工作。德国工人也同样未辱所命。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都不顾一切威吓和迫害，要求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平。当北德联邦议会在 12 月再度开会表决新的军事预算时，两派的议员都断然投了反对票。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烈火般的热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气进行了这一斗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是像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们 7 月放弃了投票权，这些日子的荣誉才首先同他们的名字联在一起。议会闭会以后，他们以叛国的罪名被捕。

马克思在这个冬天又被过度的工作累垮了。8 月，医生劝他去洗海水浴，但在那里他又被重感冒弄得“焦头烂额”。直到 8 月底他才回到伦敦，而身体仍未完全复原。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把总委员会的全部国际通讯工作担当起来，因为总委员会的大部分国外通讯员都到巴黎去了。9 月 14 日，他向友人库格曼诉苦说，他一直没有在夜里三时前入寝过。但是他希望工作能够有所减轻，至少是在将来，因为正在那时恩格斯长期迁居到伦敦来了。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希望法兰西共和国在抵抗普鲁士侵略战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德国当时的情况使马克思深感痛心。这种情况甚至使汉诺威的教皇党领袖文德霍尔斯特极其辛辣地挖苦说，如果俾斯麦一定要吞并，那末最好去侵占开云^①；这是最适合于发挥他的治国经纶的地方。12 月 13 日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说：

① 开云——法国在南非的殖民地法属圭亚那的行政中心。那里有法国拘押流刑犯人的监狱。

“看来，德国不但已经俘掳了波拿巴以及他的将军和军队，而且已经使他和百孔千疮的整个帝国主义也为橡树和菩提树之国的风土所驯化。”^①他在这封信中显然十分满意地指出，在战争刚一爆发时，英国的舆论是非常同情普鲁士的，现在却完全不同了。除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公开同情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发制度，焚烧村庄，杀害游击队员，扣留人质，以及令人想起三十年战争⁴²⁰的种种暴行——也激起了人们的公愤。当然，英国人在印度、牙买加等地也这样干过，可是法国人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更不是黑人，而普鲁士人也不是‘天之驕子的英国人’！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他们的常备军被彻底消灭，那末如果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就是犯罪，这简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霍亨索伦王朝的观念。”^②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反对拿破仑第 471 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中，就曾抱有这种观念。

马克思把俾斯麦炮轰巴黎的威吓称为“赤裸裸的阴谋诡计”。“根据或然性理论的种种规则来判断，炮轰是根本不可能对巴黎这个城市本身发生严重影响的。即使毁坏了几处外围防御工事，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在被围的人数超过了包围的人数的情况下，那又有什么用处呢？……

使巴黎挨饿倒是唯一的上策。”^③这里顺便描出了怎样一幅图画啊！马克思这个“没有祖国的人”本来否认自己有独立做出任何军事科学判断的权利，可是他在把俾斯麦炮轰巴黎的威吓称为“无聊的把戏”时所持的那些论据，却同德军的所有著名将领所持的论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5页。

② 参阅同上书，第275—276页。

③ 参阅同上书，第276页。

据不謀而合；这些将領——只有罗恩一人除外——在德軍大本营幕后进行的数星期激烈爭論中譴責了这种“只有初出茅庐的軍官才会干出的傻事”。而爱国的教授和俾斯麦的半官方刊物的撰稿人則对普魯士王后和普魯士女王儲义憤填膺，大肆攻击她們出于悲天憫人的甚至是背叛国家的考虑而劝阻了她們的丈夫——这些英勇的“飯桶”們炮轰巴黎。

当俾斯麦进而夸夸其談地譴責法国政府使人們不能通过报刊和議員自由发表意見时，馬克思在1871年1月16日的《Daily News》〔《每日新聞》〕上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德国警探的猖獗，以此嘲弄这种“柏林式的玩笑”。他在做了这番描写之后写道：“法国……目前不仅是为它自身的民族独立而战，而且也是为德国和欧洲的自由而战”^①，而它的事业幸而决不是沒有希望的。这段話完全概括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色当以后法德之間的战争的态度。

(三) 法兰西內战

1月28日巴黎投降了。在俾斯麦和茹尔·法夫尔所締結的投降条約里，曾明文規定巴黎的国民自卫軍可以保留自己的武器。

472 国民議會选举的結果，各种反动的保皇派取得了多数，他們选老奸巨猾的阴謀家梯也尔为共和国的总統。在国民議會接受了和約的先决条件——割让亚尔薩斯—洛林和賠款五十亿法郎——之后，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除巴黎的武装。因为对于这位貨真价实的資产者和国民議会的容克地主們說来，武装的巴黎不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9頁。

是別的，正是革命。

3月18日，梯也爾想首先奪取巴黎國民自衛軍的大炮，厚顏無恥地撒謊說這些大炮是國家的財產。實際上這些大炮是國民自衛軍在圍城時期自己籌款置備的，甚至1月28日的投降條約中也承認這些大炮是國民自衛軍的財產。國民自衛軍進行了抵抗，而派去搶奪大炮的軍隊也轉到國民自衛軍方面。內戰就這樣爆發了。3月26日，巴黎選出了自己的公社。公社的歷史滿載着巴黎工人英勇鬥爭和備遭苦難的事跡，同樣也充斥着凡爾賽秩序黨⁴³⁰的卑劣殘暴行為和陰謀詭計。

無庸贅言，馬克思以何等熱烈的同情注視了這些事變的發展。4月12日，他寫信給庫格曼說：“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在忍受了六個月與其說是外部敵人不如說是內部叛變所造成的飢餓和破壞之後，他們在普魯士的刺刀下起義了，好像法國和德國之間不會發生過戰爭似的，好像敵人並沒有站在巴黎的大門前似的！歷史上還沒有過這種英勇奮鬥的范例！”^①如果巴黎人遭到失敗，那只能歸咎於他們的“寬大”。在軍隊和國民自衛軍中的反動派退出戰場以後，他們本來應該立刻進軍凡爾賽。但是巴黎人由於心地過分善良而不願意開始內戰，仿佛凶狠的怪物梯也爾在企圖解除國民自衛軍武裝時還沒有開始內戰似的。但是，即使巴黎的這次起義失敗了，它仍然是我們黨從巴黎六月起義以來最光榮的業績。“就讓人們把這些氣勢沖天的巴黎人同帶着兵營、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的氣味、特別是市儈氣味去舉行陳腐化妝舞會的那些德意志—普魯士神聖羅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7頁。

馬帝国的天国奴隶們比較一下吧。”^①

473 当馬克思把巴黎的起义說成是“我們党”的事业的时候，这从两种意义上說来都是正确的：从一般意义上說来是因为巴黎工人階級是运动的骨干，而从特殊意义上說来是因为国际的巴黎会員虽然在公社委员会中只占少数，却都是公社的最自觉和最英勇的战士。但是，国际已被认为是到处滋事的怪物，成了統治階級所不喜欢的一切事件的替罪羊，以致巴黎的起义也被說成是国际的邪恶煽动所引起的。一家巴黎警察的机关报竟然莫名其妙地出来替国际的“偉大領袖”开脫参加起义的罪名：这家报纸在3月19日发表了一封伪造的信件，似乎馬克思曾在这封信中斥責了巴黎各支部，說它們过多地关心政治問題而对社会問題重視不够。馬克思立即在《Times》〔《泰晤士报》〕上揭露这封信是“无耻的伪造”⁴³¹。

沒有人比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巴黎公社不是国际“一手制造的”。但是他始終认为，公社跟国际有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当然，这只是就国际的綱領和章程的精神而言，因为按照綱領和章程的規定，一切爭取无产階級解放的工人运动都是国际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在公社委员会中占多数的布朗基派，还是虽然屬於国际却主要受蒲魯东思想影响的少数派⁴³²，馬克思都不能把他們算做自己的思想上的亲密同道。虽然如此，馬克思在公社时期还是在当时条件所能容許的範圍內同这个少数派的人保持着密切的思想接触。但可惜有关他們之間的往来的文献保存下来的极少。

例如，社会工作部代表列奧·弗兰克尔在4月25日回复馬克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8頁。

思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时写道：“如果您答应帮我出些主意，那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现在可以说是单枪匹马地负责进行我想在社会工作部中实行的一切改革。从您这次来信的短短几行中已经可以看出，您将竭尽所能地向全体人民、全体工人、特别是德国工人说明，巴黎公社根本不同于旧日的德国公社。无论如何，您这样做会是对我们的事业的重大贡献。”^① 马克思对这封信的答复，或者更正确地讲，他可能提供的意见，没有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弗兰克尔和瓦尔兰写给马克思的信也散失了，而马克思于5月13日写的回信则保存下来。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写道：“我已经同送信人见过面。 474

是不是应该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文件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类预防措施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有人从波尔多写信告诉我，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有四个‘国际’会员当选。各省都已经开始骚动。可惜它们的行动是地方性的和‘和平的’。

我已经为你们给世界上有我们的支部的各个地方写了几百封信。其实，工人阶级从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公社的。

甚至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对公社的那种凶狠的态度。有时，我还能用走私的办法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袒护你们的文章。

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似乎太多了。显然，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补救已经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

^①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文件和材料），1942年俄文版，第196页。

害。”^①

馬克思在結尾的地方指示他們要趕快行动起来，因为三天以前法德之間已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簽訂了最后的和約，而俾斯麥現在也和梯也尔一样一心要想推翻公社，这尤其是因为五十亿法郎的賠款要从那时起才开始支付。

从馬克思在这封信中所提的意見可以看出某种审慎持重的态度，而且他給公社社員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无疑地带有这种性质。馬克思决不是害怕对公社的事业承担全郎責任，——因为他在公社失敗以后立即公开而认真地担起了自己的責任，——但是他深恶痛絕一切专橫独断，并且认为对于那种在当地、在事变进行中更容易看到和考虑到的东西，不應該从远处发号施令。

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也倒下了，而两天以后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法兰西內战”的宣言。^②这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最輝煌的文件之一，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历来論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献中最卓越的作品。馬克思又一次在这种极端困难而又复杂的問題上，显示出了他善于透过表面上千头万緒的使人扑朔迷离的外壳，透过千百种一团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傳聞，来眉目清楚地理出历史內核的惊人才能。在事实方面——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都是叙述事变的事实发展的——宣言也是完全忠实的，并且自那时以来还一直沒有一个論断被駁倒过。

誠然，宣言沒有提供关于公社的批判的历史，但这也不是宣言的任务。馬克思的目的就是要反駁公社敌人的誹謗和誣蔑，使公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0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78—525頁。

社的榮譽和正義發揚光大。宣言是一部論戰性的著作，而不是歷史的敘述。公社的一切謬誤和過錯自那時以來就經常受到社會主義者的激烈的甚至是過於激烈的批判。而馬克思則只限於指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總還出現另外一種人。這種人當中有些是以前歷次革命的遺老和篤信者，他們不了解當前運動的意義，但他們由於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誠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於傳統的關係，還保留有對人民的影響；另外有些人則不過是些空喊家，他們年年重複自己反對現存政府的刻板的告白，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聲譽。在3月18日以後也出現了一些這樣的人，他們有時也扮演過顯要的角色。他們極力阻止工人階級的真正運動，正像過去這種人阻礙以前歷次革命的充分發展一樣。”^①他們是一種必不可免的禍害；要擺脫他們是需要一段時間的，而公社恰恰不曾有過這樣一段時間。

宣言闡明巴黎公社的歷史本質的第三部分具有特別的意義。這一部分把巴黎公社的本質同表面上與它類似的過去歷史上的各種組織——從中世紀的公社直到普魯士的城市制度——的本質天才地區分開來。

“只有像俾斯麥那樣把玩弄鐵血陰謀以外的全部時間都用來從事給《喧聲》雜誌（柏林的《笨拙》雜誌）^② 撰稿這一最適於他的智力的舊業的人，才會異想天開地以為巴黎公社實際上是要仿效普魯士城市制度（對1791年法國城市制度的笨拙可笑的模仿品），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507—508頁。

② 《喧聲》（《Kladderadatsch》）是德國的諷刺雜誌，從1848年在柏林出版；《笨拙》（《Punch》）是英國的幽默雜誌，從1841年在倫敦出版。梅林漏掉了馬克思在正文中的說明：“（柏林的《笨拙》雜誌）”。

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貶为普魯士国家警察机器的附屬車輪的城市制度。”^① 宣言认为，人們对公社的各种不同解釋以及公社所代表的各种不同利益表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体在本质上都是带有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产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争的結果，是終于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

宣言沒有能够用公社的明确的施政綱領来证明这个論点。这是由于公社沒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綱領，因为它自始至終都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宣言援引公社所推行的实际政策来进行证明，认为这种政策的最深刻的本质就是消灭国家，而国家的最淫賤的形式如第二帝国，不过是社会躯体上消耗着它的精力和阻碍着它的自由发展的“寄生贅瘤”。公社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廢除常备軍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剝夺了一向作为政府工具的警察的一切政治职能，把它变为公社的負責机关。公社在廢除了常备軍和警察这些旧政府的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还摧毁了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侶势力。公社頒布了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剝夺一切教会财产的命令。公社把一切学校向人民免費开放，并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和教会的任何干涉。公社下令一切公务人員，其中包括法官，都須由选举产生，宣布他們随时可以撤換，并且限制他們的俸給最高不得超过六千法郎，从而彻底鏟除了国家的官僚制度。不管这些决定本身多么合理，它們終究跟馬克思和恩格斯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501頁。

② 參閱同上书，第501頁。

二十五年来所坚持的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正式宣布过的那些观点⁴⁷⁷有着某种矛盾。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終极結果，必然是称为国家的这一政治組織的消亡，但只是逐漸地消亡。这个組織的主要目的始終是用武力保障少数有产者从經濟上压迫多数劳动者。随着独占一切財富的少数人的消失，武力压迫亦即国家政权的必要也将消失。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还強調指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加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必須先掌握有組織的国家政权，用它来镇压資本家阶级的反抗并重新組織社会。然而，总委员会宣言对巴黎公社一开始就用火与劍坚决摧毁寄生国家一事所表示的贊許，是和《共产党宣言》的这些观点不一致的。

当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意識到这种矛盾：在1872年6月对公社记忆犹新时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中，他們直接援引总委员会宣言做了修正。这个修正表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但是后来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傾向作斗争时，又放棄了这个修正意見，完全重复了《共产党宣言》的旧观点。巴枯宁派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利用了总委员会的宣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巴枯宁本人嘲笑說，馬克思的思想已被公社一古脑儿拋棄了，这迫使馬克思違反一切邏輯在公社面前摘下帽子，并且同意了公社的綱領和目的。实际上，如果一次甚至未經准备而只是由于受到野蛮攻击才突然发动起来的起义，竟能用几道简单的法令廢除整个国家机器，那岂不证实了巴枯宁所不厌其烦地宣揚过的东西嗎？这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2頁。

是不管帶着某種善意或者某種惡意都可以從總委員會宣言中讀到
478 的東西，因為宣言把只是作為可能性潛藏在公社本質中的東西描繪成了實際上已經存在的東西。不管怎樣，巴枯寧的活動所以在1871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活躍，就是因為巴黎公社給整個歐洲工人階級造成了強烈的印象。

宣言在結尾處說：“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中。那些殺害它的劊子手們已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不管他們的牧師們怎樣禱告也無法使他們解脫。”^① 宣言一發表就造成了很大的轟動。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它已引起了一片慌亂，而我此刻則榮幸地成了倫敦受誹謗最多、受威脅最大的人物。這對於一個度過了二十年單調而枯燥的田園生活的人來說，的確大有好處。政府的報紙《觀察家週報》以向法庭起訴來威脅我。由它去吧！反正對這幫匪徒我是毫不介意的！”^② 風波剛一起來之後，馬克思立即聲明他是宣言的作者。

在往後的幾年中，馬克思有時甚至受到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指責，說他使國際為公社擔負了完全不應由它擔負的責任，從而使國際陷於危險。用他們的話來說，馬克思可以保護公社，反駁那些不公正的攻擊，但同時也應該極力避免跟公社的錯誤和失策發生干係。這就是自由派的“大政治家們”所特有的策略，但是馬克思正因為他是馬克思，所以不能同意這種策略。他從不自欺欺人地希望用這種辦法來減少目前威脅着他的危險，從而犧牲自己事業的未來。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522頁。

② 參閱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頁。

(四) 国际和公社

由于一古脑儿地接受了公社的全部遗产，国际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各国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诽谤攻击是最不值得重视的。相反地，国际甚至因此而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进行宣传的手段。总委员会由于公开反驳这些攻击而至少得到了在英国大 479 报上发表言论的某种机会。

帮助公社的许多逃亡者成了总委员会的一个沉重的负担⁴³³。这些逃亡者有一部分逃往比利时，一部分逃往瑞士，但是大部分都逃往伦敦。在国际的经济状况照例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总委员会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了一笔必要的款项，而且不得不一连许多个月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方面，以致妨害了它的正常事务；而由于几乎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大肆攻击国际，这种事务正是需要特别聚精会神地来进行的。

但是，各国政府所发动的进攻，还不算是国际的一个最大的麻烦。虽然开始时这种进攻在个别大陆国家中进行得相当卖力，但是各国政府联合起来一致迫害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企图还是暂时宣告失败了。法国政府早在1871年6月6日就在茹尔·法夫尔的一篇通告中第一个发动了这种进攻；但是这个文件是如此荒谬和虚伪，以致没有得到其他各国政府的响应，甚至没有得到一向赞助一切反动行动、特别是迫害工人阶级的行动的俾斯麦的响应；而且，俾斯麦由于德国社会民主派——不管是拉萨尔派还是爱森纳赫派——站在公社一边而从自己的夸大狂中惊醒过来。

不久以后，西班牙政府也通过它的外交大臣的一篇通告，进行了联合欧洲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第二次尝试。这篇通告中说，一国政府单独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国际和镇压国际在本国的支部的活动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消除这个祸害。如果不是英国政府立即反对，这个号召一定会很快得到响应。格兰威尔勋爵声明，国际“在英国这里”的行动只限于就罢工问题提供意见，并且没有多少款子来支持这种罢工。至于构成它的纲领的一部分的革命计划，与其说反映英国工人的观点，无宁说反映国际的外国会员的观点，因为英国工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工资问题。但是外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受法律的保障。如果他们违反这些法律，参加反对同英国友好的国家的军事行动，他们就将因此受到惩罚。而目前对于居住英国境内的外国人，是没有任何理由采取非常措施的。对于不合理的要求所做的这种合理的反驳，当然引起了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纸的一片抱怨，说什么只要英国国土成为一个用英国法律保障那种不断阴谋破坏其余一切欧洲国家的行为的避难所，对付国际的一切措施就实际上不会发生效力。

如果说各国政府反对国际的联合十字军征讨因此而没有组织成功，那末从另一方面说来，国际本身也未能摆出一个严整的阵势来对付大陆各国对国际支部所施加的迫害。这是最使国际伤脑筋的事，因为国际感到它的根基已在英法德三国发生了动摇，而它曾经认为，正是这三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它的最有希望的支柱，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工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工人阶级又在不同程度上享有立法机关的选举权。这些国家对于国际的重要性，在下面这个事实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总委员会里有英国人二十人，法国人十五人、德国人七人，但瑞士人和匈牙利人总共各二人，波

兰人、比利时人、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意大利人各一人。

在德国，拉薩尔自始就把他的活动建立在本国的基础上。馬克思曾为此对他大加斥責。不过，正如不久以后事实所表明的，德国工人政党因此而避免了社会主义发展在其余一切欧洲大陆国家所遭到的那种危机。但是战争毕竟引起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短时期的停滞：它的两个派别都埋头于自己的事务，因而无暇顾及国际。此外，两派都曾反对吞并亚尔薩斯和洛林，维护巴黎公社，而爱森納赫派——总委员会只承认它是国际在德国的分枝——的勇往直前的行动，还曾使它比拉薩尔派更多地受到叛国罪名和其他罪名的威胁。据俾斯麦自己供认，正是由于倍倍尔在火热的議會演說中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法国公社社員，才第一次引起了他的疑心。而这种疑心現在爆发为一連串针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暴力行动。但是，爱森納赫派对待国际的态度中的一个远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情况，是它自从組成为一国范围内的独立政党以后，就跟国际日益疏远了。⁴⁸¹

在法国，梯也尔和法夫尔在乡村貴族的国民議会上通过了一项对付国际的严酷的非常法。这项法律使本来已經为凡尔赛屠夫們的血腥恐怖弄得精疲力竭的工人阶级完全陷于瘫痪状态。那些保卫“秩序”的英雄們的复仇欲竟野蛮到这种程度，甚至要求瑞士和英国引渡公社的逃亡者，硬說他們是刑事罪犯⁴³⁴。他們的这一着在瑞士几乎得手。总委员会因此而同法国断絕了一切联系。总委员会为了使自己的組織內有法国的代表，特地增聘了几位公社逃亡者，其中一部分是早就参加了国际的，一部分則是以革命毅力著称的人物。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公社的重視。但是，尽管这种考虑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措施却没有加强而只是削弱了总委员会。因

为公社流亡者也遭到了一切流亡者所必然遭到的那种命运：他們因不断的內訌而使自己陷入了絕境。馬克思又不得不从法国流亡者那里吃到二十年前他从德国流亡者那里吃到的苦头。馬克思从来不要别人对他自认为是尽自己本分的事情表示感謝。但是，法国流亡者的无休无止的爭吵，終于使他在1871年11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抱怨：“这就是对于我为流亡者几乎奔走五个月并用《內战宣言》挽救了他們的荣誉的酬謝。”^①

最后，国际失去了英国工人这个支柱。破裂的表面化起始于这样一件事情：工联的两位著名領袖、从总委员会成立时起的两名委員魯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奥哲尔甚至是廢除主席职位以前的主席），因关于法兰西內战的宣言而声明退出总委员会。由此产生了一个謠傳，說工联因不滿国际站在公社一边而憤然脱离了国际。但是，这种說法虽然不无一点道理，却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国际同工联的分裂是有它的更为深远的根源的。

国际和工联之間的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桩利害打算的婚姻。双方都需要这种联盟，但是双方都不打算完全融为一体并分担对
482 方的忧患和欢乐。馬克思独具匠心地在国际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为双方拟定了一个共同綱領。但是，工联虽然签署了这个綱領，却只是实际采用了其中合乎自己口味的部分。格兰威尔勋爵在他答复西班牙政府的电文中十分正确地描述了工联对国际的这种态度。工联的宗旨是在資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改善劳动条件。为了达到和保证这个目的，工联也不拒絕政治斗争，但是在选择同盟者和斗争手段时，对于那些不牵涉它的直接目的的問題，它始終是完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167頁。

全不受任何原則性考虑的約束的。

馬克思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工联的这种深深植根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和性格的刻板态度是不那么容易打破的。工联需要国际是为了赢得选举改革，而当这种改革已經实现，它就开始同自由党人勾勾搭搭，因为没有自由党人的帮助，它就不能指望在議會中获得席位。早在1868年馬克思就曾痛罵这帮“阴谋家”，其中也提到了屡次提名自己为議員候选人的奥哲尔。另有一次，馬克思在为总委员会內有宗派領袖布隆泰尔·奥勃莱恩的几名拥护者一事辯护时說，“奥勃莱恩的这些拥护者虽然愚蠢，却往往是总委员会中工联派的必不可少的对立面。他們更革命些，对土地问题的看法是激进的，并且較少民族偏見，不受资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收买。如果不是这样，那早就把他們推出門外了。”^①而且馬克思曾反对一再提出的关于为英国成立单独的联合委员会的提議。他在這個問題上所提出的論据主要就是他在1870年1月1日总委员会通告中所援用的那个論据。这就是：英国人缺乏概括的能力和革命的热情，因此这样的联合委员会可能成为激进的議員手中的工具。

英国的工人領袖退出总委员会以后，馬克思极其激烈地指責了他們，說他們卖身投靠了自由党内閣。这种指責對他們之中的某些人說来也許是正确的，而对其他人說来就不正确了，即便把收买理解为現金交易以外的“其他形式”也是如此。阿普尔加斯作为工联領袖至少享有不下于奥哲尔和魯克拉夫特的威望，而且議會两院甚至认为他是工联主义的正式代表。早在巴塞尔大会之后，483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174頁。

議會里的那些“好意的人們”就正式質問他對這次大會有關公有制的決議抱什麼態度。但是阿普爾加斯並沒有被這種幾乎是公開的威脅所吓倒。1870年，他被選為審議花柳病防治法案的皇家委員會的委員，並且成了工人當中第一個被英王稱為“我的忠實的愛卿”的人。儘管如此，阿普爾加斯還是在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宣言上簽了字，並終生一貫忠於總委員會。

這個人為人在為人方面是無可訾議的，他後來還曾拒絕擔任商務主管部門的職務。但正是從這個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工人領袖退出國際的原因。工聯的最近任務就是爭取對它的各個工會和財政的法律保護。1871年春天由於政府頒布了一項法令，它的這一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了。按照這項法令，只要工會的章程不違反刑法，每個工會就都有權進行合法登記並在財政方面受到法律保護。但是，政府用這一隻手給與的，立刻又用另一隻手奪回去了。

這項法令的後半部取消了聯合自由，因為為了對付罷工而設計出來的各種可以隨意引伸的規定，如禁止“使用暴力”、“威脅”、“恫吓”、“要挾”、“妨害”等等，都不僅得到確認，而且甚至變本加厲了。這是一個道地的非常法：工聯所採取的或者別人協助它達到目的的行動都有干犯刑律的危險，而其他組織所採取的同樣的行動則仍然可以完全不受懲罰。英國的工會史家們用一種委婉的語調說：“當刑法可以隨意引伸擴大到工會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通常採用的那些日常和平手段上去的時候，只是在法律上承認工會的存在，似乎是毫無用處的。”⁴³⁵ 工會第一次被宣布為受法律承認和保護的團體。但是同時，反對工會活動的法律規定也得到了確認甚至加強。

工聯及其領袖當然拒絕了這種達爾人的贈禮⁴³⁶。但是他們進行反抗的結果，只是使政府把法案分成兩部分：一是承認工會合法的法律，一是以嚴重懲罰威脅一切工會活動的刑事補充法。這當然不是什麼真正的成功，而是誘騙工會運動領袖的圈套。這些領袖⁴⁸⁴倒真的落進了圈套。他們把財政看得比他們的工會原則還重。他們所有的人，阿普爾加斯甚至比別人還早，都根據新法律為自己的工會進行了登記。1871年9月，由新工聯運動的代表們（這些人過去曾經是國際和工聯之間的橋樑）組成的工會聯合會議，宣布自行解散。它提出了一個極其敷衍搪塞的理由：“會議成立之初所力求解決的那些任務已經完成了。”

工聯領袖們差堪自慰的也許是，他們雖然已經逐漸資產階級化，却仍然只是把罷工看成是工會運動的一種粗陋的形式。1867年，他們之中就有個人在皇家委員會上宣稱，罷工無論對工人或企業主說來都是金錢的絕對浪費⁴³⁷。因此，他們不遺余力地阻撓1871年爆發的英國無產階級爭取九小時工作日的強大運動⁴³⁸。英國無產階級群眾沒有同他們的領導者一起致力於“國家的”發展，並且為刑事補充法所極度激怒。這個運動從4月1日的散德蘭機器製造工人的罷工開始，迅速地擴展到各機器製造工業中心，並在紐卡斯爾罷工中達到了最高峰。紐卡斯爾罷工在五個月之後以工人的完全勝利結束。但是，機器製造工人的大聯合會卻對這次群眾運動抱著極端否定的態度。直到十四個星期以後，屬於這個聯合會的罷工工人才得到比普通的失業補助金每周多五先令的罷工補助金。這個迅速波及很多其他行業的運動，幾乎完全由九小時工作日同盟承擔起來。同盟是為這次鬥爭而成立的，並且有一個極有才干的領導人——約翰·伯爾溫特。

这个同盟受到国际总委员会的远为热烈的支持。总委员会派委员柯恩和埃卡留斯到丹麦和比利时去阻止当地的工人应英国厂主的代理人的召募。两人的这一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马克思在阿伯尔涅特谈判时忍不住感慨地说，可惜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在沒有遭遇困难的时候就不靠近国际。假如它们能及时地求助于国际，那就可以不誤时机地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看来，国际毕竟从
485 群众本身取得了它因工联领袖的退出而失去的东西的充分补偿。国际有了越来越多的新支部，現有支部的会员人数也日益增加。但是，为英国成立单独的联合委员会的要求也日益紧迫地向国际提出来。

马克思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他长期来不肯做出的让步。因为自从公社失败以后，在最近的将来已經沒有发生任何新的革命的希望，所以他大概已不再认为总委员会直接掌握最强有力的革命杠杆具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他原来的疑虑仍然得到了证实。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使国际的影响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消失得更为迅速。

(五) 巴枯宁主义的反对派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甚至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都不得不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至于国际还完全没有站稳脚跟的那些国家，这种困难当然就更大得多。早在德法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瑞士的罗曼語区产生的不大的危机中心，已經扩展到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巴枯宁派的路綫一时大有压倒总委员会的路綫之势。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既不是由於巴枯寧擴大了他的鼓動活動，也不像總委員會所認為的那樣，是由於他的陰謀。誠然，巴枯寧早在 1871 年年初就為了專心從事新的政治活動而中止了《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但是這種活動是和國際毫無關係的，並且嚴重地損害了巴枯寧的政治聲譽。這指的就是臭名遠揚的涅恰也夫事件。這個事件不能像巴枯寧的狂熱擁護者們那樣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他們硬說，巴枯寧的過錯只是在於他“由於過分善良而過分信任了涅恰也夫”。

涅恰也夫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農奴出身，後來由於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提挈得以進初等師範學校學習。他參加過當時俄國的學生運動，在這個運動中為自己贏得了一定的地位。這並不是由於他的淺薄的學識或平庸的智力，而是由於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對沙皇專制的無限仇恨。但是他的性格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當事情關係到他的事業的利益的時候，他是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考慮的。⁴⁸⁶ 他沒有任何個人的欲求，即使有所需要也極力克制自己。但是，他不惜採取任何行動方式，甚至最不能容許的行動方式，只要他認為這可以使他達到革命的目的。

1869 年春，他帶着雙重的光榮身分出現於日內瓦——從彼得保羅監獄逃出的國事犯和據說是秘密準備全俄革命的全能委員會的代表。這兩種身分都是捏造的，既沒有一個這樣的委員會，涅恰也夫本人也未曾坐過彼得保羅監獄。在他的幾個親密的朋友被捕以後他來到國外，據說是為了影響老一輩的流亡者；按照涅恰也夫的意見，老一輩的流亡者應該用自己的名聲和著作來鼓舞俄國青年的士氣。在巴枯寧那里，他幾乎難以令人理解地達到了這個目的。涅恰也夫，這個“年輕的野人”、“小老虎”——如巴枯寧所稱

呼他的——受到了巴枯寧的敬重，被認為是將以自己的革命毅力摧毀舊俄國的新的一代的代表。巴枯寧無條件地相信那個“委員會”的存在，甚至保證毫無異議地服從這個“委員會”由涅恰也夫傳達給他的命令；同時，他還立即同意跟涅恰也夫一起出版一系列具有極其強烈的革命思想的著作，並把它們輸入俄國。

毫無疑問，巴枯寧是應該和涅恰也夫一起對這些著作負責的，因此我們沒有特別的興趣去研究，究竟是誰寫了那些最壞的小冊子——是巴枯寧還是涅恰也夫。無論如何，那個要求俄國軍官像巴枯寧自己一樣保證無條件地服從“委員會”的呼喚書，那個把俄國盜匪理想化的小冊子，那個充分表現出巴枯寧喜愛“可怕的”觀念和字眼的過火傾向的革命手冊，無疑都出自巴枯寧的手筆⁴³⁹。但是還不能證明，巴枯寧是否參加過涅恰也夫的蠱惑活動；相反地，他自己就成了這種蠱惑活動的犧牲品，而直到很久以後才認清了這個“小老虎”並把他趕走。國際總委員會曾責備巴枯寧和涅恰也夫，說他們由於用必然會引起俄國警察注意的方式把書信、印刷品和電報寄給俄國的許多無辜的人，因而使這些人平白無故地喪了性命。巴枯寧按理是不應受到這種指責的。涅恰也夫在他被徹底揭穿以後親自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他恬不知恥地承認他慣於卑鄙地陷害一切不完全附和他的人；他的目的就是或者毀滅他們，或者把他們完全拉入運動。運用這種方法，他迫使相信他的人在感情衝動的時候在有損他們聲譽的聲明上簽名，或者偷竊這些人的密信，以便日後利用這些信進行各種詭詐。

1869年秋天涅恰也夫回俄國的時候，巴枯寧還沒有識破這種方法。涅恰也夫隨身攜帶了巴枯寧所開的一份證件，裡面證明他是“全權代表”——當然，既不是國際的代表，甚至也不是社會主義

民主同盟的代表，而是欧洲革命同盟（这个同盟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处理俄国事务的某个支部而由巴枯宁的机智发明出来的）的代表。这个组织大概只是纸上的东西，但是巴枯宁的名字还是有足够的威信给涅恰也夫在青年学生中的鼓动增添某种声势⁴⁴⁰。不过，涅恰也夫的活动仍然主要建立在那个骗人的“委员会”上。当他的一个新的信徒、大学生伊万诺夫怀疑这个秘密的最高机关是否存在的时候，他用阴险的谋杀办法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了这个碍事的怀疑者。伊万诺夫的尸体发现以后有许多人被捕，涅恰也夫却逃到国外躲藏起来了。

1870年1月初，他又出现在日内瓦，并且重新玩弄他那套老把戏。巴枯宁非常热情地出来替他辩护，说杀害伊万诺夫的行为是一种政治犯罪，而不是刑事犯罪，因此瑞士没有权利把涅恰也夫交给要求引渡的俄国政府。涅恰也夫本人则巧妙地躲藏起来，以致警察未能将他捕获。但是涅恰也夫却跟他自己的保护人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劝巴枯宁放弃《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革命宣传上面，并且答应由他出面跟出版人解决已经预支的稿费问题。当时生活极度窘困的巴枯宁，把这个许诺只能理解为涅恰也夫或者他的秘密的“委员会”将向出版人代为清还预支的三百卢布。涅恰也夫则用信件发出了“委员会”的“正式决议”，信上落有这个委员会的款，并有斧头、匕首和左轮手枪的花饰。这封信不是寄给出版人本人，而是寄给了出版人和巴枯宁之间的介绍人柳巴文。信中恐吓柳巴文不得要求巴枯宁偿还预支款项，否则便将置之死地。巴枯宁只是从柳巴文的一封辱骂他的信中才得知这一切。他立刻开出新的借据承认这笔债务，并保证只要办得到就立即偿还借款；同时他还发觉涅恰也夫计划袭击辛普朗邮局进

行搶劫一类的罪惡勾当，因而同他一刀兩斷了。

巴枯寧生活中的這段冒險的插曲所暴露出來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輕信，對一個政治活動家說來是不可饒恕的，它給巴枯寧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後果。馬克思早在1870年7月就知道了這件事，而且是从一個可靠的來源——正直的洛帕廷那里知道的。洛帕廷在他5月間居住日內瓦期間，曾經徒勞無益地想使巴枯寧相信，俄國根本就不存在一個什麼“委員會”，涅恰也夫從來也沒有坐過彼得堡監獄，勒死伊萬諾夫完全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謀殺，而他，洛帕廷，對這種情況是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確實的。這就更加加深了馬克思對巴枯寧的本來就有的惡劣印象。俄國政府在通過伊萬諾夫被殺後的大規模逮捕了解到涅恰也夫的所做所為以後，充分利用了這種大好的機會。為了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俄國的革命者，俄國政府第一次把案件交付有陪審員參加的公開審判。1871年7月，在彼得堡開始審判所謂涅恰也夫案件。牽連到這個案件里來的被告有八十多人，主要是大學生。他們大多數被判處長期監禁，甚至被判處去西伯利亞礦山服苦役。

涅恰也夫本人則仍然逍遙法外；他輾轉流徙在瑞士、倫敦和巴黎之間，而在圍城和公社時期正居住在巴黎。直到1872年秋天他才在蘇黎世被一個奸細出賣了。為了阻止瑞士政府以刑事殺人的罪名把涅恰也夫引渡給俄國，巴枯寧曾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在蘇黎世的沙貝利茨那里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這一點是無可指責的。在涅恰也夫終於被引渡以後，巴枯寧寫信給奧格辽夫（他也曾被涅恰也夫愚弄，甚至把赫爾岑死後由他主持的巴赫美齊也夫基金⁴⁴¹全部或一部交給了涅恰也夫）說：“一種內心的聲音告訴我，已經無可挽回地毀滅並且無疑自知其毀滅的涅恰也夫，這次定將從自己的

已經混亂、玷污然而遠非卑劣的本質深處，重新喚起自己本來的全部毅力和勇氣。他將英雄般地死去，這一次決不會在任何事情上 489 背叛任何人。”^① 在這一點上，巴枯寧也是無可厚非的。涅恰也夫在他度過的十年可怕的苦役生活中，一直到死都不曾辜負這種期望；他盡其所能地力求贖回以往的罪過，並且表現了鋼鐵般的毅力，甚至使獄卒也懾服於他的意志。

就在巴枯寧和涅恰也夫決裂的時候，德法戰爭爆發了。這次戰爭立即使巴枯寧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這位老革命家現在希望，德軍的入侵會成為法蘭西的社會革命的信號。不能設想，法蘭西工人會在貴族、君主和軍閥的侵略面前毫無舉動，因為這樣做他們就不僅會出賣自己切身的事業，而且會出賣社會主義的事業。德國的勝利將成為歐洲反動勢力的勝利。巴枯寧反對這樣一種意見，即認為國內革命會削弱人民對外敵的抵抗，並且正是援引法蘭西的歷史來證明這一點。這是對的。但是他發動波拿巴派的具有反動情緒的農民去同城市工人一起進行革命的方案，却無論如何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說，不要給農民提出一些什麼法令、共產主義方案或組織形式——這只會引起農民對城市的反叛；最好激發他們內心深處的革命精神。接下去的都是這一類不着邊際的話。

帝國崩潰之後，吉約姆在《Solidarité》〔《團結報》〕上撰文號召迅速組織武裝義勇軍援助法蘭西共和國⁴⁴²。這是一種真正愚蠢的舉動，特別是因為它出自一個曾經狂熱地反對國際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的人之口。吉約姆的號召實際上只是引起了人們的嘲笑。但是，不應當把 9 月 26 日巴枯寧想在里昂宣布成立革命公社一舉

^① 《巴枯寧給赫爾岑和奧格辽夫的信》，1907 年俄文版，第 444 頁。

与此等同看待⁴⁴³。巴枯宁把革命分子邀請到那里去。他們占領了市政厅，廢除了“国家的行政統治机构”，并成立了“公社的革命联盟”来代替它。但是，克留塞勒將軍的叛变和其他一些人的怯懦，使国民自卫軍得以毫不費力地战胜了这个运动。巴枯宁曾經号召采取坚决的措施，首先是要逮捕政府的代表，但是沒有結果。他
490 本人被俘，但是又被志願步兵队釋放了。他在馬賽又住了几个星期，希望运动能够再起，当这个希望落空的时候，他就在10月末返回洛迦諾。

应当让反动派去嘲笑这次失敗的嘗試。巴枯宁的一个反对者虽然对无政府主义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却并未因此而失去公正判断的能力。这个人非常中肯地写道：“遺憾的是，在社会民主报刊上也听到了嘲笑的声音，而老实說，巴枯宁的嘗試是根本不應該受到这种嘲笑的。当然，不同意巴枯宁及其同道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可以而且應該对他的毫无根据的希望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他当时的行动却是企图喚起法国无产階級沉眠的毅力并动員这种毅力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时去反对資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英勇的嘗試。半年以后，巴黎公社也曾試圖做过大体上同样的事情，而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是受到馬克思的热烈欢迎的。”^①这种态度至少要比萊比錫的《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对巴枯宁在里昂发表的宣言的态度更加中肯而合理；《人民国家报》曾經趁机就巴枯宁的宣言老調重彈地說，連柏林的新聞局都想不出比这更投合俾斯麦口味的东西。

里昂的失敗使巴枯宁深为沮喪。看来已經近在咫尺的革命，

^① 尤·斯切克洛夫：《巴枯宁的生平和事业》，1927年俄文版，第4卷，第46頁。

重新消失在遙遠的遠方，特別是在一度在他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巴黎公社覆滅以後。他對馬克思所進行的那種革命宣傳的憎恨日益加深，因為他越來越認為這種宣傳是使無產階級萎靡不振的主要原因。此外，他的物質生活狀況也是極其悲慘的；他的弟兄們已經不再幫助他，有時他的錢袋里只有五生丁，以致要喝一杯常喝的清茶都不可能。他的妻子擔心他會精力耗竭、意氣消沉；但是他自己這時卻決心在他利用暇時零星撰写的著作中闡發自己對人類命運、哲學、宗教、國家和無政府主義的觀點，有意使這部著作成為自己的遺教。

但是這部著作沒有完成；巴枯寧的不安的精神注定不能得到長期的休息；吳亭仍然在日內瓦挑撥是非，並且在1870年8月使巴枯寧和他的幾個友人由於屬於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支部而被開除⁴⁹¹出日內瓦中央支部。隨後，吳亭又造謠說，同盟支部從來未被總委員會接受加入國際；從萊克和埃卡留斯收到的關於接受加入國際的文件完全是偽造的。這時羅班已遷往倫敦，並且成為總委員會的委員，而他是曾經在《Égalité》〔《平等》〕周刊上猛烈地攻擊過總委員會的。總委員會以此證明了自己的公正無私，因為羅班仍然是同盟的狂熱的信徒。他在1871年3月14日就已提議召開國際的秘密代表會議來解決日內瓦的紛爭。雖然總委員會認為在公社前夜應該拒絕這個提議，但是在7月25日還是決定把日內瓦問題提交9月召開的代表會議討論。就在這次會議上，總委員會應羅班的要求，確認埃卡留斯和萊克通知接受巴枯寧同盟日內瓦支部加入國際的文件是真實的。

這封信剛剛寄到日內瓦，同盟支部就在8月6日自動解散了，並且立即將此事通知了總委員會。表面看來印象應該是非常好

的；在支部得到总委员会反駁吳亭謊言的滿意处理以后，它为了彻底的和解而牺牲了自己。但实际上，正如吉約姆后来所公开承认的，主要的原因并不在这里。当时支部已經失去了任何意义，它在日内瓦的公社流亡者眼中不过是私人爭吵的一具殘骸罢了。而吉約姆正是把这些流亡者看做可以利用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对日内瓦的联合委员会进行斗争的适当人物的。同盟支部就是因为这个緣故而解散的。果然，几个星期以后，同盟的殘部就同公社社員們联合成立了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宣傳和行动支部”⁴⁴⁴；成立时它虽然也声明同意国际的一般原則，但是却保留了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決議所容許它的充分行动自由。

这一切最初是跟巴枯宁毫无关系的。日内瓦支部在自己解散以前甚至沒有向住在洛迦諾的巴枯宁征求意见，这說明他作为同盟的所謂全权領袖的地位是空有其名的。巴枯宁在他的信件里面激烈地反对解散同盟支部，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損害，而是因为他在当时的情况下认为支部的解散是一支卑鄙的暗箭。他
492 写道：“我們不要在挽救国际的团結的借口下做出怯懦的行为。”^①同时，他开始詳細地論述日内瓦的紛爭，来闡明在他看来曾經引起爭論的那些原則；他想借此給他的出席倫敦代表會議的拥护者提供一个指針。

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片断保存了下来；从好的方面来看，它是跟巴枯宁一年前和涅恰也夫一起用俄文撰写的那些小册子大不相同的。这些片断写得心平气和而且有条有理，只是个别地方措

① J. Guillaume, *L'Internationale. Documents et souvenirs (1864—1878)* (屠·吉約姆：《国际。文件和回忆(1864—1878)》)，巴黎，1907年，第2卷，第181頁。

詞激烈；不管對巴枯寧的特殊觀點抱什麼看法，他在这部著作中至少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日內瓦紛爭的根源要比一時的私人爭吵更為深遠；即使私人爭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主要的責任是應由吳亭及其同伙來負的。

巴枯寧一刻也不曾否認過把他同馬克思及其“國家共產主義”分開的那種觀點上的深刻分歧，並且對待自己的對手也遠不是溫和的。但是，他畢竟沒有把馬克思說成是只追求自己的邪惡目的的卑劣人物。他在指出國際產生於群眾之中並且是為忠於人民事業的有識之士所創立之後接着說道：“我們借此機會向德國共產黨的著名領袖，首先是向公民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時也向過去曾經是我們的朋友而現在是我們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的公民菲·貝克爾，表示敬意。他們是國際的真正創造者，只要一般說來個別人物能夠有所創造的話。唯因我們不久就將被迫同他們進行鬥爭，我們就尤其願意向他們表示敬意。我們對他們的尊敬是純潔而且深摯的，但是這種尊敬不會流於偶像崇拜，也決不會使我們成為他們的奴隸。雖然我們承認他們過去和現在對國際的巨大功績，我們仍然要對他們的錯誤的權威理論、獨裁的作風、暗箭傷人的手法、卑鄙的陰謀、淺薄的人身攻擊、骯髒的侮辱和下流的誹謗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這些手段幾乎是德國人進行政治鬥爭時的普遍特點，現在不幸被他們搬到國際裡面來了。”^①當然，這些話是頗為粗魯的，但是巴枯寧從來也沒有發展到否認馬克思作為國際的創立者和領 493
導者的不朽功績的地步。

^① J. Guillaume, *L'Internationale. Documents et souvenirs (1864-1878)* (詹·吉約姆：《國際。文件和回憶(1864-1878)》)，巴黎，1907年，第2卷，第165—166頁。

巴枯寧的這部著作也始終沒有完成。當馬志尼在他于戶加諾出版的周刊上猛烈攻擊公社和國際的時候⁴⁴⁵，巴枯寧還在寫這部著作。巴枯寧立即發表了《一個國際主義者對馬志尼的答復》，而當馬志尼及其擁護者同他進行論戰的時候，他又接連發表了另外一些具有同樣旨趣的小冊子。巴枯寧雖然遭受過一連串的失敗，但是這一次卻獲得了完全的勝利：在意大利一向勢力非常薄弱的國際，現在它的影響一下子在那里迅速擴大起來。巴枯寧所以獲得這種成功，當然並不是由於他的“陰謀”，而是由於他的熱情而雄辯的語言，這種語言特別在嚮往巴黎公社的意大利青年中間激起了革命的情緒。

在意大利，大工業還不大發達。新興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還只是在緩慢地覺醒，而且他們沒有進行自衛和反抗的合法武器。半個世紀來為民族統一而進行的前仆後繼的鬥爭，在各市民階級中樹立並培養起了一種革命的傳統。爭取統一的鬥爭雖然經過了無數次的起義和密謀，但是終究還沒有達到目的，而只落得一個不能不使一切革命分子感到沉痛絕望的結果：起初在法國武器後來又在德國武器的庇護下，亞平寧半島的一個最反動的邦建立了意大利君主國。巴黎公社的英勇鬥爭使意大利的革命青年擺脫了這種消沉的狀態。行將就木的馬志尼面對着那激起他對社會主義的旧恨的新曙光，悵惘地背轉身去，而曾經是意大利的遠為偉大的民族英雄的加里波第則由衷地歌頌了“未來的太陽”——國際⁴⁴⁶。

巴枯寧清楚地知道他的擁護者來自人民的哪些階層。他在1872年4月寫道：“過去，意大利所缺少的不是本能，而是組織和思想。現在，就這二者的发展程度而言，意大利和西班牙或許都可以算是最革命的国家。意大利有着其他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就

是熱情而奮發有為的青年。他們完全脫離了常軌，沒有飛皇騰達的前途，也看不到出路；他們雖然出身於資產階級，但在精神和智力上都不像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青年那樣萎靡不振。現在他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投身於革命的社會主義，接受了我們的全部綱領，即 494 同盟的綱領。”^① 這一段話是巴枯寧寫給他的一位西班牙同志，給這人鼓舞士氣的。巴枯寧沒有親自到西班牙活動過，而是通過他的幾個朋友發生影響的。但是他認為他在西班牙獲得的成功要比在意大利獲得的成功更大。這完全不是憑空的幻想，而是對實際情況的清醒估計。

在工業發展方面，西班牙也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國家。甚至在有現代無產階級的地方，無產階級也備受壓抑，毫無權利，只有武裝起義才可以作為他們在困苦生活中進行自衛的唯一手段。西班牙的最大工業城市巴塞羅納，在歷史上發生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多的街壘戰鬥。而且，長年的內戰使國家陷於四分五裂，一切革命分子都已陷於悲觀絕望，因為在 1868 年秋天趕走了波旁王朝之後，他們落到了外國君主的統治之下⁴⁴⁷，儘管這種統治是極不穩固的。因此，革命巴黎的烈焰所迸發出來的火花，在西班牙也落到了一觸即發的易燃物上。

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況不同，比利時已經存在着群眾性的無產階級運動。但是這個運動幾乎只限於瓦龍人⁴⁴⁸ 居住的地區。它的骨幹是波利納日的革命情緒極高的礦工。他們想用合法手段來改善自己階級地位的願望，由於罷工運動連年遭到血腥鎮壓而

① 馬克思曾在他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這一著作中引用了巴枯寧的這封信的一部分，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8 卷，第 425 頁。

被迎头压制下去。但是，他們的領導者都是一些蒲魯东主义者，因此他們傾向于巴枯宁的观点。

只要考察一下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主义反对派在国际内部的发展情况，就不能不承认，这个反对派只是借用了巴枯宁的名字，因為他們要从巴枯宁的观点中找到这个反对派实际上所由产生的那些社会矛盾和紧张状态的解决办法。

(六) 倫敦第二次代表會議

总委员会决定9月在倫敦召开的代表會議，是用来代替例行的年度代表大会的。

495 1869年在巴塞尔曾經决定下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但是，可尊敬的奧利維耶为了庆祝全民投票而对法国各支部进行的大逮捕，迫使总委员会在1870年7月行使賦予它的权限，把召开代表大会的地址改为美因茲。同时，总委员会向各国的联合委员会提議把总委员会会址从倫敦迁往其他国家，但是遭到了一致的拒絕。战争的爆发使美因茲代表大会也未能召开，于是各联合委员会授权总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日期。

但是，事件的发展使得代表大会不宜于在1871年秋天召开。可以預想，国际的會員在各国所受到的压迫使他們不能向大会派遣足够数目的代表，而少数终于能够出席大会的国际會員一定会遭到他們的政府的报复。国际沒有任何理由再增加自己的牺牲者的数目，因为，为了照顾巴黎公社的受难者，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已經造成极度的紧张了。

因此，总委员会决定像1865年那样先在倫敦召开一次非公开

的代表會議，來代替公開的代表大會。出席這次代表會議的寥寥可數的代表證實了總委員會原來的擔心。代表會議從9月17日開到9月23日，總共出席代表二十三人；比利時人六人、瑞士人二人、西班牙人一人，總委員會委員十三人，其中六個委員只有發言權。

在這次代表會議的範圍廣泛而數目眾多的決議中，例如，有一些涉及工人階級的普遍統計、工會的國際關係和農業無產階級的狀況的決議，在當時的情況下只具有一種純理論的意義⁴⁴⁹。最重要的任務是武裝國際來對付外部敵人的瘋狂攻擊和加強團結來清除從內部敗壞國際的分子。這兩個任務實質上是一致的。

代表會議的最重要的決議是關於國際的政治活動的。這個決議首先援引國際的成立宣言、章程、洛桑大會決議和其他公開聲明，說明工人階級的政治解放是跟它的社會解放分不開的。然後它指出，國際面對着猖狂的反動勢力的反抗，這個反動勢力正在喪⁴⁹⁶盡天良地鎮壓工人階級的解放要求，企圖用暴力來永遠保持階級差別以及建立在這種差別之上的有產階級的統治。決議接着說明，工人階級只有建立起與有產階級的一切舊政黨相對抗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抵抗有產階級的整個暴力。建立獨立的、工人的黨這樣一個政黨，乃是社會革命取得勝利和達到它的終極目的——消滅階級——的必備條件。最後，工人階級還應該利用由於他們的經濟力量而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達到的分散力量的聯合，作為反對他們的剝削者的政治統治的杠杆。基於這一切理由，代表會議提醒國際的全體會員，在工人階級當前所面臨的鬥爭狀況下，工人階級的經濟運動是和它的政治活動不可分的。在組織問題方面，代表會議請求總委員會限制增聘新委員的人數，同時不要總是僅僅限於從同一個民族中遴選。總委員會這個名稱仍然只

限于总委员会使用；各国的联合委员会应冠以各该国的国名，而地方支部则应冠以所在地的地名；代表会议禁止使用一切派别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会议还决定，国际的每个会员照旧每年向总委员会缴纳一个便士的会费。

代表会议建议法国加强工厂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传播出版物；建议英国成立自己单独的联合委员会，而只要各地方组织和工会加以承认，它就会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其次，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另一方面，代表会议否认对所谓涅恰也夫的阴谋负有任何责任，并且委托吴亭根据俄国的资料起草一份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简要报告在日内瓦的《平等》周刊上发表，但发表前要呈报总委员会。

代表会议认为关于巴枯宁的同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自从禁止使用宗派性的和其他标示不同于国际共同目的的特殊任务的名称以后，日内瓦支部已经自动解散了。关于犹拉各支部，代表会议同意了1870年6月29日的总委员会决议，承认日内瓦联合委员会为瑞士罗曼语区的唯一具有全权的委员会。但是同时会议也号召发扬团结互谅的精神，说当国际正在遭受种种迫害的时候，工人尤其必须发扬这种精神。因此会议建议犹拉各支部的英勇的工人重新加入日内瓦联合委员会。同时会议决定，如果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那末分离出去的各支部可以自称为犹拉联合会。然后会议声明说，会议责成总委员会同国际的一切冒牌的机关报——如向资产阶级读者暴露国际内部问题的犹拉的《Progrès》〔《进步报》〕和《Solidarité》〔《团结报》〕——断绝关系。

最后，会议授权总委员会视情况决定下次代表大会或能够代替它的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地点。

总地说来，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不容否认的；代表会议向犹拉各支部提出的解决办法，即承认它们有权自称为犹拉联合会，是这些支部本身也已经考虑过的。只有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决议包含着某种个人摩擦的因素，而缺乏实事求是的观点。即使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有关涅恰也夫案件的消息来攻击国际，这也不过和当时每天都成打地加在国际头上的那些诽谤一样。国际向来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反驳这种诽谤，而只是像对待眼前的秽物一样把它轻蔑地一脚踢开。如果说国际一定要在这件事上打破惯例，那也不应该把调查案件的工作委托给一个恶毒的阴谋家，因为不能期望这个人会比资产阶级报刊对巴枯宁抱更多的善意。

吴亭一开始进行这件委托给他的工作，就编造了一篇他所拿手的关于谋杀未遂的聒人听闻的鬼话。在他准备进行这件工作的苏黎世（据他自己说，在那里他除了巴枯宁领导下的同盟的几个斯拉夫人以外没有其他敌人），据说有一天有八个操斯拉夫方言的人在运河附近的一个僻静地点袭击了他；他们打伤了他，使他跌倒在地，并且无疑地想杀死他，把他的尸体投进运河；幸亏有四个德国大学生路过那里，搭救了他那将来可以报效沙皇的宝贵生命。

撇开这个例外不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都无疑地为增进相互了解打下了适当的基础，特别是在工人运动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时候。但是早在10月20日，由巴枯宁的同盟的残部和一些公社逃亡者在日内瓦组成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就向总委员会请求接受它参加国际。总委员会在征求了日内瓦联合委员会的意见之后回绝了这个请求。于是在马上代替已停刊的《团结报》而出版的《Révolution Sociale》〔《社会革命报》〕上，就对“俾斯麦所操纵的德国人委员会”——这家气势汹汹的报纸认为国

际总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东西——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个出色的暗語馬上得到了广泛的应和。馬克思在給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談到这件事时写道：“这和下面这个不可原諒的事实有关：我是德国人并且确实在总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思想影响。(N. B. [注意]：委员会中的德国委員在人数上为英国委員的三分之二，比法国委員也少。因此，罪过就在于英国和法国的委員在理論方面处于德国委員的支配之下(!)，并且认为这种支配，即德国的科学，是极其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①

但是，11月12日犹拉各支部在桑維耳耶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发动了总攻击。当然，这次代表大会总共只有二十二个支部中的九个支部派了十六名代表出席，而且这少数代表还大部分患有百日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們的发言就更加大言不慚。他們对倫敦代表會議把一个名称强加給他們这一点深感屈辱，虽然这个名称是他們自己曾考虑采用的。但他們还是决定接受这个建議，往后称为犹拉联合会。为了报复这种“屈辱”，他們宣布罗曼語系的联合委员会已經解散。这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在于起草并向国际各联合委员会散发了一篇通告，抗議倫敦代表會議，說它是非法的，并且呼吁在最近期間內务必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

吉約姆所起草的这篇通告一开头就說国际正处在危亡的道路上。国际本来是作为“对一切权威的最大的抗議”而創立的；国际的章程保障了一个支部或支部集团的独立性，而总委员会是作为拥有极其有限的权能的执行机关而設立的。但是，人們逐漸地

499 习惯于对它盲目地信任，以致在巴塞尔甚至导致代表大会本身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176頁。

自願放棄權利，而使總委員會在代表大會做出決議以前有權接受、拒絕或解散個別支部。應該指出，巴塞爾大會的這個決議實際上是在巴枯寧的積極支持和吉約姆的同意下通過的。

通告斷言，從此以後，五年來成員和開會地點迄無變更的總委員會便以國際的“合法首腦”自居了。它把自己看成是某種類似政府的東西，因此它的委員們也就把自己的獨特思想看成是國際內部的唯一具有存在權利的官方理論。其他集團中產生的不同觀點，都被總委員會委員們簡單地看成是異端邪說。這樣，就逐漸地形成了以倫敦為中心而以總委員會委員為代表的某種正統。按照吉約姆的意見，對他們的意圖是無須加以譴責的，因為這些意圖是符合他們的特殊學派的觀點的，但是必須最堅決地反對這些觀點的代表者，因為他們的無限權力必然要起腐蝕的作用。對自己的同輩保持這種權力的人，根本不可能仍然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通告接着說，倫敦代表會議繼續了巴塞爾大會的工作，通過了一些使國際由各獨立支部的自由聯盟變為總委員會手中的一個專橫的等級制組織的決議。為了完成這個建築物，代表會議決議由總委員會決定下次代表大會或代替代表大會的代表會議的召開日期和地點。這就使得總委員會能夠隨意用秘密的代表會議來代替國際的公開大會。因此，必須按照原定的職能來對總委員會加以限制，保留它的負責通信和統計的一般執行機關的任務，並且通過獨立集團的自由聯合來實現他們想通過獨裁和集中來達到的統一。國際在這一方因應成為未來社會的范型。

儘管這樣加意渲染，或許正是因為這樣加意渲染，猶拉各支部的通告並未達到它的目的：它關於盡速召開代表大會的要求甚至在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沒有得到響應。在西班牙，對總委員

会的激烈攻击被看成是巴枯宁和馬克思之間的爭風吃醋；在意大利，人們也跟不願听命于倫敦一样不願听命于犹拉。只有比利时公开主張修改章程，即宣布国际为完全独立的各联合委员会的联盟，而总委员会是“通信和情报的中心”。

但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桑維耳耶通告却得到欧洲資產階級报刊的热烈喝采；它們如获至宝地对它大加贊賞。資產階級报刊特別是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关于总委员会的“可怕的”統治所散布的一切謊言，現在得到了来自国际內部的文件的证实。代替当时已經迅速停刊的《社会革命报》而出版的《犹拉公报》，至少由于能够轉載資產階級報紙上的幸災乐禍的論文而聊以自慰。

桑維耳耶通告所引起的这一片喧嚷，促使总委员会也用一篇題为《所謂国际的分裂》^①的通告对它做了回答。

(七) 国际分裂的根源⁴⁵⁰

总委员会的这篇通告反駁了来自桑維耳耶和其他地方关于它逾越职权甚至伪造章程，以及关于它瘋狂排斥異己等等的指責。就这一方面而言，它的論辯是理直气壮的。可惜的只是，它浪費了大部分笔墨去反駁一些毫无根据的責难。实际上，今天要想弄清楚这些瑣碎的事情，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例如，在国际成立时，由于对波拿巴警察心怀戒惧，巴黎的會員在把章程譯成法文时曾經从“一切政治运动必須作为手段服从于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这句话中刪去了“作为手段”这几个字。事情本来是十分簡單明了的，但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1—55頁。

是人们却纠缠不休地、虚伪地指责总委员会，说“作为手段”这几个字是它后来弄虚作假地加进章程里去的。或者，对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德国工人在战争时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的声明吹毛求疵，企图诬蔑总委员会为“泛日耳曼主义”所支配。

通告彻底地粉碎了这些谎言。如果考虑到，这些谎言的目的在于破坏风雨飘摇中的国际唯一可以用来对付反动势力进攻的集中制，那末也就可以理解通告的结语中为什么用那样激烈的语气径然指责同盟为国际警察效劳了。“同盟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宣扬无政府状态，说这是摧毁集中在剥削者手中的强大社会政治力量的最可靠手段。在这种借口下，它要求国际在旧世界正力图扼杀国际的时候用无政府状态来代替自己的组织。”^①国际受到外敌的压迫越是严重，来自内部的攻击就越是显得无耻，何况这种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没有根据。

但是，通告对事情的这一方面的强调，减弱了它对其他方面的注意力。通告的标题本身就表明，它只承认国际内部有“所谓”分裂。正如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所做的那样，它把全部争论归结为“几个阴谋家”、特别是巴枯宁的阴谋。它重新提出了有关“把各个阶级混为一谈”、巴塞尔大会等过去曾经对巴枯宁提出过的指责，说巴枯宁同涅恰也夫一起把一些无辜的人出卖给了俄国警察，并且专用一节来叙述巴枯宁的两个拥护者被发现为波拿巴警察的奸细这一事实。这一事实对巴枯宁说来当然是极不愉快的，但是并不能损害他的名誉，正像几个月后发现总委员会的两个拥护者是奸细也并不能损害总委员会本身的名誉一样。通告指责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58页。

“年輕的吉約姆”企图把日內瓦的“厂工”說成是可憎的“资产者”，而完全忽略了“厂工”一詞在日內瓦指的是工資优厚的奢侈品制造工人，而且他們在选举方面曾同资产階級政党达成了頗成問題的妥协。

但是，通告的最薄弱方面是对强加給总委员会的关于“正統”的指責的辯护。它的論据是，倫敦代表會議曾經直截了当地禁止各支部使用任何派別名称。当然，就国际是一个工会、协会和教育
502 宣傳团体的相当駁杂的混合体而言，这一措施是正确的。但是总委员会在通告中对这一決議所做的解釋却大有爭論的余地。

通告的原話是这样說的：“无产階級反对资产階級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带有宗派运动的性质。这在无产階級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作为一个階級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有些思想家在批判各种社会矛盾时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矛盾的空想办法，而工人群众則只能接受、宣傳和实行这些办法。这些創始人所創立的宗派就其本性說是閉关自守的，即鄙棄一切现实活动、政治、罢工、工会——总之，鄙棄一切集体的运动。无产階級大都对它們的宣傳始終抱着漠不关心甚至敌視的态度。巴黎和里昂的工人不想理睬圣西門派、傅立叶派和伊加利亚派，正像英国的宪章派和工联派不承认欧文派一样。这些宗派在产生之初本来是运动的杠杆，但是当它們一旦为这个运动所超越，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各宗派，以及晚近的德国拉薩尔派，就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薩尔派許多年来一直妨碍着无产階級的組織，最后終於干脆变成了警察的工具。”^① 通告在另一个地方还把拉薩尔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36頁。

派称为“俾斯麦派的社会主义者”，說他們在自己的警察机关报《Neue Sozial-Demokrat》〔《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之外起着普魯士德意志帝国的走狗的作用。

沒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馬克思是这篇通告的作者。从通告的内容和文体来看，可以推想恩格斯曾經或多或少直接参加了起草工作。但是有关宗派的分析无论如何是出自馬克思的手笔。从他同一时期和友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思想，而他在論蒲魯东的論战著作中也已經第一次發揮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本身正确地說明了社会主义宗派的历史意义，但是馬克思把巴枯宁派、特别是拉薩尔派跟蒲魯东派和欧文派混为一談，那就錯了。

不管我們怎样蔑視无政府主义，认为它無論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不过是工人运动的一种疾病，但我們毕竟不能认为，——特别是 503 在有了半个世紀的經驗的現在，——这种疾病是由外部傳染給工人运动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种傾向是工人階級本身所固有的，并且是在有利条件下、或者尤宁說不利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甚至在 1872 年，也很难理解怎么会产生这种錯誤想法。巴枯宁决不是个胸有成竹的人，他也沒有一套要求工人简单地接受和实行的現成体系。馬克思本人不是也不厌其烦地一再說过，巴枯宁在理論方面等于零，他擅长的只是玩弄阴谋；他的綱領是个东拼西凑的、肤淺的大杂燴！

各宗派創始人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就是他們对一切无产階級群众运动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态度有两重涵义：一方面，他們根本不想理会这种运动，另一方面，这种运动也根本不想理会他們。即使巴枯宁确曾仅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企图把国际攬为己有，这也只能证明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只把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

尽管巴枯宁同馬克思的斗争十分激烈，他却始終承认馬克思的不朽功績，认为国际的創立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巴枯宁和馬克思的分歧，就在于对这种群众运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須遵循的策略抱着不同的見解。不管巴枯宁在这个問題上犯了多大錯誤，他的观点毕竟和玩弄宗派把戏毫无共同之点。

对拉薩尔派更可以这样說。誠然，1872年时拉薩尔派还未抓住社会主义原理的真髓，但是他們毕竟在理論認識和組織力量方面超过了欧洲当时的其他一切工人政党，甚至对于仍然以拉薩尔的鼓动著作为主要精神食粮的爱森納赫派說来也是如此。拉薩尔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广泛基础上开展他的运动的，这就根本杜絕了一切宗派活动的余地。他的后继者施韦澤一貫主張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不可分，因此被李卜克內西指責为“議會迷”。如果說在工会运动問題上施韦澤不幸沒有听从馬克思的警告，那末現在他早已退出了运动，而正如柏林建筑工人罢工的胜利所表明的，拉薩尔派也已开始糾正这个錯誤。他們克服了战争所造成的、运动的暂时停頓，群众也日益团結在他們周围。

504 由于馬克思一向对拉薩尔以及与拉薩尔的名字連在一起的一切东西怀着不可抑制的厌憎，所以我們不必特別重視他对拉薩尔派的攻击。但是就这种攻击出現在总委员会的通告中的来龙去脉而言，这种攻击是有它的特別意义的。这种攻击清楚地說明了国际分裂的真正根源以及这个偉大的組織由于巴黎公社的失敗而陷入的那种不可解决的矛盾。自从那时以来，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对国际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而国际为了对抗这种进攻是必須把自己的一切分散的力量紧密团結起来的。但是公社的失敗也证明了政

治斗争的必要性，而不大大削弱國際的联系是不能进行这种斗争的，因为政治斗争只能在各國的疆界内进行。

不参預政治这种要求，不管它怎样过火，究竟是从对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腐蝕影响的合理疑虑和厌憎出发的；李卜克内西早在1869年的著名演说中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疑虑。巴黎公社失败后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暴露出来的对总委员会的专断的不满，情况也正是如此；不管这种不满怎样过火，它却是从这样一种或多或少明确的認識出发的，即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的生存条件首先是同这个党所属的那个国家联系着的；正像一个人不能脱离自己的影子一样，工人政党也不能脱离这些条件；换句话说，它不能听来自国外的号令。馬克思虽然在國際的章程中就已经确认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不可分，但是他在实践上仍然始終以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國的工人所共通的社会要求为出发点。他所以談到政治要求，例如通过立法程序縮短工作日的要求，也只是因为这些要求是从这种社会要求产生的。关于純政治問題，即涉及国家制度并因国家而異的那些問題，馬克思在工人阶级西受到國際的教育而具有比較明确的認識以前是一直絕口不談的。怪不得他要痛斥拉薩尔，說他按照一个国家的尺寸来剪裁自己的运动了。

有人推測，如果沒有巴黎公社的失敗和巴枯宁的鼓动的逼迫，馬克思还会在很长时期內避而不談涉及个别国家的純政治問題。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定如此的。但是馬克思照例接受了向 505
他提出的挑战。他只是沒有看到：他所面临的任務在國際当时的状况下是不能解决的；而國際越是緊密团結起来对付外敌，它就越是從內部陷于分裂，如果說國際总委员会的領袖竟錯誤到把一个

在他看来是最发达的工人政党，而且是产生在他的祖国的党，称为卖身投靠的警察部队，那末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国际的历史的丧钟已经响了。

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证明。凡是开始形成全国性的工人政党的地方，国际都分裂了。李卜克内西为了施韦澤的所谓对国际的冷淡态度，曾经对他提出了何等尖锐的谴责啊！现在，当李卜克内西自己领导爱森纳赫派的时候，也不得不受到恩格斯的同样指责，而他也仿效施韦澤的榜样，用德国的结社法令来回答这种指责：“我不想现在用我们自己的组织的生存去为此甘冒风险。”倘若不幸的施韦澤竟敢说出同样放肆的话（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末这位似乎务必要有一个“自己的党”的“裁缝大王”就定会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爱森纳赫派的成立给了日内瓦的“德语系支部”第一个打击。1871年瑞士工人党的成立又给了国际在大陆上的这个最老最强的组织以最后的打击。这一年的年末贝克尔就被迫停止了《Vorbote》〔《先驱》〕的出版。

1872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认清事情的这种联系。然而他们却咎由自取地断言，国际本来可以在完成了它的伟大使命（这个使命后来超过了它所力能胜任的程度）之后堂堂正正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却由于个别蛊惑家的阴谋而垮台。实际上，我们不能不同意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以为像国际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组织会被一个极端阴险的人、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家”所破坏，那末，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要比那些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永远不会犯错误，而一听到有人稍微怀疑这一点就周身战栗的诚惶诚恐的信士更为正确。如果他们两人今天还能发表意见，他们一定会辛辣地嘲笑

这样一种要求，即在他們手中永远是鋒利武器的无情批判不可触及他們自己。

他們的真正偉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們从来不犯錯誤，而是在于 506 他們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后从来不坚持錯誤。早在1874年恩格斯就承认国际已經过时了。“要創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就必须像 1849—1864 年那样有一个工人运动的普遍低落。可是对于这一点來說，現在无产阶级世界已經变得太大、太广了。”^①他引以自慰的是，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蘊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并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

1878 年，馬克思在一家英国杂志上駁斥了所謂国际已經失敗和寿終正寢的說法。馬克思写道：“实际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美国以多少是全国的規模組織起来的社会民主工人政党，都是一些国际性的团体，它們已經不是由站在外面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少数散在于各国的支部，而是由那些通过思想交流、互相帮助和共同目标而团結起来并經常积极地直接往来的工人群众本身形成的……

因此，国际并没有死亡，而只是从最初的萌芽期过渡到更高的时期，而它的本来的目标已經部分地成为现实了。它在自己前进发展的过程中，在它的历史的最后一章未能写定以前，是还会发生許多变迁的。”^②

这一段話再一次表现出馬克思的真正的先見之明。在各国工人政党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在新的国际⁴⁵¹产生前十多年，他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19 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15 卷，第 433 頁。

就預見到了它的历史本质。但是，他並沒有預言国际的第二个形态会永世长存，他只是确信，总有一天，新的生命会在国际的廢墟上开花結果。

(八)海牙代表大会

在3月5日的总委员会通告中，曾談到要在9月初召开年度
507 代表大会。那时，馬克思和恩格斯已决定提議把总委员会会址由倫敦迁往紐約。

关于这个提議的必要性和好处，以及关于提出建議的动机，曾經有过許多爭論。有人认为这是用头等的葬仪来埋葬国际，是馬克思想用来掩飾国际的无可挽救这一事实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在总委员会迁往紐約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竭尽全力来支持它，使它能够繼續維持下去。还有人說，馬克思对国际的工作已感到厌倦，想重新致力于他的科学著作。这种說法在某种意义上为恩格斯所证实。恩格斯在1872年5月27日給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提到比利时人关于完全撤銷总委员会的提議，并且补充說：“我本人对这个提議絲毫也不反对，——我和馬克思反正不再参加总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我們几乎沒有写作的时间，而这种情况是必須結束的。”^①不过这是在发火的时候順口說出的。即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拒絕把他們重新选入总委员会，这也不足以成为总委员会必須迁出倫敦的理由。其次，馬克思曾一再表示过，在国际牢牢站稳脚跟以前，他决不为了自己的科学著作而忽視国际的工作。当然，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4卷，第259頁。

馬克思就是現在也不會基于上述理由而在国际处于重大危机时拋棄国际。

馬克思本人在7月29日給庫格曼的信中做了比較真实的說明：“在国际代表大会上（9月2日在海牙召开），將涉及到国际的生死存亡問題，而在我退出之前，我至少要防止那些分裂分子破坏它。”^① 提議把总委员会迁出倫敦，也是防止“分裂分子”的办法之一，因为在那里总委员会已成为日益加剧的爭吵的牺牲品。在总委员会里面根本沒有巴枯宁主义傾向的代表，即或有，也是势力薄弱、不足为慮的。但是在总委员会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委員中間却吵成一团，以致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的小組委员会来解决这种无休无止的爭吵。

甚至馬克思同总委员会的另外两名委員，多年来曾經是他的能干而忠实的助手的埃卡留斯和荣克之間，关系也冷淡起来，而在1872年5月甚至发展到同埃卡留斯公开决裂的地步。埃卡留斯的生活极其困难。他声言要辞去他的国际总书记的职务。他自以为是个不可代替的人物，要求把每周十五先令的微薄薪資提高一倍。然而，英国人約翰·黑尔斯被邀請来接替了他的位置。埃卡留斯不公正地把这件事归罪于馬克思，虽然馬克思总是在英国人面前庇护他的。但是，馬克思曾經不止一次因为埃卡留斯在报刊上泄露国际的内部消息、特别是关于倫敦代表會議的秘密會議的消息而严厉責备埃卡留斯。另一方面，荣克則把馬克思对他的疏远归罪于恩格斯，归罪于恩格斯的专横作风。这或許有一部分道理。很可能，自从馬克思能够和恩格斯每日聚晤以来，他就——即使沒有

^① 參閱馬克思：《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頁。

任何惡意——不再像从前那样跟埃卡留斯和荣克密切往来了。而“將軍”（知友間对恩格斯的称呼）則喜欢使用一种軍人的、多少带有发号施令味道的口吻。这一点甚至他的好友都是承認的。每当輪到他主持总委员会會議的时候，人們总是預料会有風暴般的場面出現。

自从黑尔斯被任命为总書記，他和埃卡留斯之間就产生了勢不兩立的仇恨，而国际的一部分英国會員是站在埃卡留斯一边的。馬克思也沒有得到新的总書記的支持。相反地，当根据倫敦代表會議決議成立了英国的联合委员会，并且于7月21和22日在諾定昂召开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二十一名代表参加）的时候，忠于巴枯宁的“联合委员会的自主权受到威胁”这一口号的黑尔斯，提議不通过总委员会而直接同其他联合委员会发生关系。其次，他还在全体大会上提議修改章程，来限制总委员会的职权。黑尔斯撤回了他的第二个提案，但是第一个提案被通过了。在綱領方面，这次大会虽然沒有表现出巴枯宁主义的傾向，但是却傾向于英国的激进主义。例如，大会主張土地公有，但是决不贊成一切生产資料实行公有，而黑尔斯也同意了这一点。黑尔斯公然策动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总委员会不得已在8月革除了他的职务。

布朗基派在总委员会的法国委員中占着优势，这个派別在引起爭論的两个主要問題——政治活动問題和严格的集中制的必要性問題——上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但是，由于对突然的革命变革的
509 原則上的偏重，布朗基派在当时情况下对国际說来可能比其他派別更具危險性，因为欧洲反动派一直盼望有一个方便的机会来猛扑国际，用自己的压倒的优势力量把它摧毁。实际上，馬克思正是由于担心布朗基主义者掌握了控制权，才想把总委员会的会址由

倫敦遷往其他地方的。為此他選擇了紐約。在紐約可以建立總委員會的國際性的組織並且保障總委員會的卷宗的安全，而後一點在歐洲大陸的一切國家都是做不到的。

在從9月2日開到9月7日的海牙代表大會上，馬克思由於德國人和法國人在六十一名代表中占較大比重而掌握了可靠的多數。馬克思的反對者攻擊他人為地製造了這個多數。但是，就懷疑代表委託書的真實性這一點而論，這種攻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代表大會花了幾乎一半的時間來審查代表委託書。除了一個例外，所有的委託書都被承認是有效的。誠然，馬克思早在6月就向美國寫信，請求把委託書發給德國人和法國人。有些代表不是代表本國的支部，而是代表別國的支部的。另外有些代表由於顧慮警察迫害而用了假名，或者由於同一理由而隱瞞了他們接受委託的支部的名稱。因此，關於這次大會的各種報告所舉的各國出席大會的代表人數是有出入的。

嚴格說來，德國各組織的代表只有八人：伯恩哈特·貝克爾（不倫瑞克）、庫諾（斯圖加特）、狄慈根（德勒斯頓）、庫格曼（策累）、密爾凱（柏林）、里廷豪森（慕尼黑）、肖伊（符騰堡）和舒馬赫（左林根）。其次，馬克思作為總委員會主席，除了紐約以外還從萊比錫和美因茲得到委託書，而恩格斯則從布勒斯勞和紐約得到委託書。萊比錫的赫普納的委託書是紐約的，柏林的弗里德蘭德的委託書則是蘇黎世的。另有兩個取著德國姓的代表——瓦爾特爾和斯瓦姆——實際上是法國人；他們的真姓是赫德蓋姆和丹特萊格。兩個人都是十分可疑的家伙，赫德蓋姆還在海牙就已充當波拿巴的暗探了。就法國代表而言——支持馬克思的弗蘭克爾和龍格，以及自稱為布朗基派的蘭維埃和瓦揚等人，——都是公社流亡者，他

們用了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們的委托书的来源却一直弄不大清楚。总委员会的主席除了馬克思外还有两个英国人（罗契和塞克斯頓）、一个波兰人（弗罗勃列夫斯基）和三个法国人（赛拉叶、庫尔涅和杜邦）。列斯納代表倫敦的共产主义工人联合会。英国的联合委员会派了四名代表，其中有埃卡留斯和黑尔斯，他們两个人在海牙就同巴枯宁派勾搭起来了。

至于巴枯宁派，意大利人沒有派一个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們还在8月的里米尼代表會議上就同总委员会断絕了任何关系。五位西班牙代表，除了拉法格一人以外，都是拥护巴枯宁派的，八位比利时代表和四位荷兰代表也是如此。犹拉联合会派了吉約姆和施維茨盖勃尔，而日内瓦則仍然派老貝克尔为代表。从美国来了四位代表：左尔格，他和貝克尔一样是馬克思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其次是曾是公社社員的布朗基主义者德勒尔；第三个是巴枯宁主义者，而第四个就是那个委托书唯一被认为无效的人。丹麦、奥地利、匈牙利和澳大利亚各派了一名代表。

在审查委托书三天期間內就爆发了激烈的爭吵。拉法格的西班牙代表委托书引起了热烈的爭論，但是終於在少数人放棄投票权的情况下得到承认。在为芝加哥支部发給一个住在倫敦的會員的委托书而展开爭論的时候，英国联合委员会的一位代表說这个會員不是工人运动的公认的領袖。馬克思对此反駁說，不是英国的工人領袖无宁是一种荣誉，因为这些領袖大都向自由派卖身投靠了。委托书虽然被通过了，但是这段話却得罪了一些与会者，而在代表大会后就被黑尔斯及其一伙极力利用来反对馬克思。作为一个一貫对自己的行为負責的人，馬克思本人当然从来也沒有为这段話感到后悔，也沒有收回它們。代表委托书审查完毕以后，为

了預先審核有關巴枯寧及其同盟的幾件聲明而成立了一個五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委員是從那些與有關巴枯寧同盟的爭論關係較少的會員中選出的。委員會的主席是德國人庫諾，委員有法國人呂肯、維夏爾、瓦爾特爾即赫德蓋姆和比利時人斯普林加爾。

直到第四天大會才從宣讀總委員會提交給大會的報告⁴⁵²開始，進入正式的議程。馬克思起草的這個報告由他本人用德語宣讀，塞克斯頓用英語宣讀，龍格用法語宣讀，阿貝勒用法蘭德斯語宣讀。報告用激烈的措詞列舉了波拿巴的全民投票以來國際所遭 511
受的種種暴行。它指出了對巴黎公社的血腥鎮壓，梯也爾和法夫爾的卑鄙行徑，法國的小土地貴族的議會的丑行，以及德國的叛國案的審判。報告還猛烈地抨擊了英國政府對愛爾蘭支部採取的恐怖行動和通過外交使節調查國際分支機構的行為。報告說，除了各國政府的迫害以外，在整個文明世界還展開了一個謊言和誹謗中傷的運動；這個運動散布關於國際的流言蜚語，刊登聳人聽聞的電訊，甚至最卑鄙地偽造官方文件，例如那個最驚人的誹謗傑作，即硬說芝加哥大火⁴⁵³是國際所為並且向全世界宣揚的電報。報告說，奇怪的是為什麼沒有把當時摧毀西印度的颶風歸罪於國際的惡魔般的影响。總委員會用國際的不斷的進展來反駁了上述這些荒誕卑鄙的捏造；國際已經進入荷蘭、丹麥、葡萄牙、蘇格蘭和愛爾蘭，並且在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了發展。代表大會批准了這個報告，並且根據比利時代表的提議對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全體犧牲者表示了敬意和同情。

接着開始討論關於總委員會的問題。拉法格和左爾格論證了為了階級鬥爭的利益而保存總委員會的必要性，認為工人階級反對資本的日常鬥爭沒有一個中央領導機關是不行的；如果現在還

沒有一個總委員會，那末也應該創立一個總委員會。持反對意見的主要是吉約姆。他否認保存總委員會的必要，認為它至多只能作為一個主管通信和統計的中央辦事處而存在，因而要求剝奪它的一切權力。他斷言，國際不是哪一個想出了絕對正確的政治、社會理論的聰明人所發明的，而是從工人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中產生的；按照猶拉支部的意見，這種情況足以保證工人階級目標的統一。

討論直到大會的第五天才結束，而且是在秘密會議上結束的。順便說說，關於委託書是否有效的討論也是關着門進行的。馬克思發表了長篇的演說，主張總委員會的職權不僅應當保留，甚至應當擴大。總委員會應當有權在下次代表大會之前不僅停止個別支部的活動，甚至停止整個聯合委員會的活動——當然要在一定的保證之下。總委員會雖然沒有掌握警察和軍隊，但是它的權威不應受到限制；與其把它貶低到郵筒的地位，不如干脆把它撤銷。大會以三十六票對六票和十五票棄權的多數採納了馬克思的意見。

然後，恩格斯提議把總委員會會址由倫敦遷往紐約。他所舉的理由是，關於總委員會由倫敦遷往布魯塞爾的問題已經討論過幾次，但是布魯塞爾方面一直對此加以拒絕。在目前的情況下，決議已經不容再事拖延，必須把總委員會遷到紐約去。至少應該在一年內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恩格斯的提議引起了普遍的驚愕，而對多數人說來甚至是極不愉快的。法國代表反對得特別激烈，經過他們的力爭，決定進行分段投票，先表決是否需要遷移，然後表決新會址的具體地點。遷移的問題以二十六票對二十三票和九票棄權的微少多數解決；接着有三十人贊成遷往紐約。然後選出了新的總委員會的十二名委員，他們被授權遴選七名新委員。

在同一次會議上開始討論政治工作。瓦揚按照倫敦代表會議就這個問題所通過的決議的精神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政黨組織起來，這個政黨要同一切資產階級政黨嚴格劃清界限並與之相敵對。瓦揚以及龍格特別援引了巴黎公社的經驗，說巴黎公社就是由於沒有一個政治綱領而失敗的。有一位德國代表說，施韋澤就是因為放棄政治活動而變成了警察的走狗的。這個論據更加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同一個施韋澤早在三年前就因為他的“議會迷”而在巴塞爾大會上被德國代表懷疑為奸細了。吉約姆也根據自己的觀點舉出了瑞士的經驗，說那裡的工人跟隨便什麼人達成黨選協定——有時跟激進派，有時跟反动派。猶拉支部根本反對這種勾當。它的會員也是政治家，不過是否定的政治家，因為他們不是要奪取政權，而是要摧毀政權。

爭論拖延到次日，即第六天，也就是大會的最後一天。這一天一開頭就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蘭維埃、瓦揚和其他布朗基主義者因為總委員會遷往紐約的決議而退出了大會。在他們不久後印發的一個傳單上寫道：“正當人們要求國際履行自己的義務的時候，它卻放棄了自己的職責。它逃避革命，跑到大西洋彼岸去了。”^①左爾格接替了蘭維埃的主席職位。然後，瓦揚的提案以三十五票對六票和八票棄權通過。一部分代表已經走了，但是他們當中大部分人留下了贊成這項提案的書面聲明。

最後一天的最後幾小時為關於巴枯寧和同盟問題的五人委員

① 參閱《Internationale et Révolution. A propos du congrès de la Hage par des réfugiés de la Commune ex-membres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國際和革命：關於海牙代表大會。公社流亡者、國際總委員會前委員們所寫》），倫敦，1872年，第8頁。

会的报告所占去。报告以四票对比利时委员的一票通过。委员会认定：第一，证明确实曾有过一个有着与国际的章程针锋相对的章程的秘密同盟，但是不能充分判明这个组织是否依然存在。第二，章程草案和巴枯宁的信件都证明，巴枯宁企图——而且可能已经做到了——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有着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与国际的章程截然不同的章程的秘密团体。第三，巴枯宁曾经企图用欺騙办法霸占别人的财产，为了逃脫所負的債務，他本人或他的代理人曾经使用恐吓手段。基于这些理由，委员会的多数人建議把巴枯宁、吉約姆以及两人的其他一些拥护者开除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人庫諾沒有提出物证；他只是声明，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道义上的确信，并且請求代表大会投信任票。

在这以前就已拒絕出席委员会的吉約姆在主席邀請他答辯时声明說，他不做任何辯护，因为，用他自己的說法，他不願參加这场喜劇。他断言，这个打击不是針對着个別人，而是針對着自由联合的傾向的。这种傾向的代表者，就还在出席大会的人而論，已經对此有所准备并且締結了一項团结公約。接着由一位荷兰代表宣讀了这个公約。公約有四名西班牙代表、五名比利时代表、两名犹拉代表、一名荷兰代表和一名美国代表签名。签名者們表示，为了避免国际的任何分裂，他們准备同总委员会保持行政事务上的联系，

514 但是只要各联合委员会不違反国际的共同章程，总委员会就不得对它們的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干涉。同时必須建議各联合委员会和支部为下次代表大会做好准备，以便促使自由联合（*autonomie fédérative*〔联合自治〕）的原则获得胜利。大会甚至沒有討論这个建議，而以二十七票对七票（八票棄权）决定开除巴枯宁，并以二十五票对九票（九票棄权）开除了吉約姆。委员会有关开除的其余建

議都被否決了，但是大會委託委員會公布有關同盟的材料。

海牙代表大會的這場壓軸戲確是和大會不相稱的。委員會以多數通過的決議因為有一個暗探⁴⁵⁴參加起草而失去任何意義。但是當時這是任何人都不能知道的。此外，如果開除巴枯寧是出於政治上的理由，甚至僅僅由於在道義上確信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搗亂分子”，那末縱然沒有確凿的證據來證明他的一切陰謀，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硬說巴枯寧在財產上不分“你我”，以此來侮辱巴枯寧，則是完全不可原諒的。遺憾的是，馬克思對這件事是負有責任的。

馬克思設法弄到了那個莫須有的“革命委員會”的所謂決議，這個決議曾威脅柳巴文不得要求巴枯寧償還出版人作為翻譯《資本論》的預支稿費而由他轉交給巴枯寧的那三百盧布。這個文件的文字內容不得而知，但是當柳巴文成為巴枯寧的死敵之後，他把這個文件寄給了馬克思並且在信中寫道：“當時我認為巴枯寧無疑地曾經參與策劃這封信。但是應該說，今天當我把全部經過冷靜地重新一一思考過以後，我覺得完全不能證明巴枯寧曾經參與這件事，因為信實際上可能是在背着巴枯寧的情況下由涅恰也夫寄出的。”^①事實正是如此。然而人們卻僅僅根據這封連收信人都不相信具有刑事犯罪性質的信，就在海牙代表大會上指責巴枯寧是騙子。

雖然巴枯寧屢次承認預支稿費的事並且答應設法償還這筆錢，但是由於他長期的窮困，大概始終沒有做到這一點。另一方面，在這個悲慘的事件中，我們關於那個唯一的受害者即出版家本

^① 尤·斯切克洛夫，《巴枯寧的生平和事業》，1927年俄文版，第3卷，第498頁。

615 人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他想必以一种哲人的泰然态度接受了他的职业使他充分习惯了的那种命运。有多少作家，其中包括一些极著声名的作家，預支了出版家的稿费而始終还不起。这当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贊頌的事，但是还从来沒有人因为这种事而把罪人送上絞架。

(九)余痛

不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竭力想維持国际的生存，它的历史还是以海牙代表大会而告終了。他們两人曾經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紐約的新总委员会完成它的使命。

但是，新的总委员会始終未能在美国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子。美国的各个支部之間也有許多分歧，也同样缺乏經驗和联系、智力和物力。新总委员会的灵魂是左尔格。他熟悉美国的情况，并且曾經反对把总委员会迁往紐約。但是，在一度推辞之后，他还是接受了总書記的职务，因为他的善良和忠实的为人使他根本不能在面临重大困难时推卸责任。

在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外交手腕总是不会有好結果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无理由地担心，他們想把总委员会迁往紐約的計劃会引起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的强烈反对。因此，他們曾尽量把这个问题擱置起来，以免过早地增加本来已經很多的导致冲突的口实。但是他們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意外成功仍然造成了痛心的結果。原来預料的反抗不仅沒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了。

比較說来，德国人的反抗要緩和得多。李卜克内西是反对总委员会迁移的，他后来也总是指責这一措施的錯誤。但是当时他正

和倍倍爾一起被羈押在胡貝爾圖斯堡的監獄里⁴⁵⁵。如果說他對國際的興趣已多少有些減弱，那末愛森納赫派的大多數人就更是如此。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它的代表從海牙代表大會所得到的印象。1873年5月3日恩格斯在給左爾格的信中談到這點時寫道：“雖然德國人自己也跟拉薩爾派有嫌隙，他們卻對海牙代表大會感到失望和沮喪，因為和他們自己的爭吵相反，他們希望能在這次大會上看到始終如一的友愛和一致……”^①。這或許是國際 516 的德國會員對於總委員會的遷移不那麼關心的一個非常不令人愉快的原因。

布朗基派的退出要更加危險得多。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除了德國人以外，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倚重布朗基派的，特別是在他們反對觀點完全傾向於巴枯寧派的另一個法國派別——蒲魯東派的時候。使布朗基派特別感到憤慨的是，他們完全正確地看到，總委員會遷移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想剝奪他們實現密謀策略的這個杠杆。當然，他們自己害了自己。由於他們不能在自己的祖國開展運動，他們在退出國際之後就陷入了流亡者的不幸命運。1874年9月12日恩格斯在給左爾格的信中寫道：“法國流亡者已經落得一敗塗地，他們由於純屬私人的事情，而且大部分是由於金錢問題而彼此爭吵不休。我們已經和他們幾乎完全脫離了關係……戰爭、公社和流亡時期的閑散生活使這些人的道德可怕地墮落了。只有窮困才能使這些游手好閑的法國人振作起來。”^②但這仍然不過是聊以自慰罷了。

總委員會的遷移對英國的運動發生了最為顯著的影響。9月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335頁。

② 同上書，第376頁。

18日黑尔斯就在英国联合委员会内提議譴責馬克思，因为他公然說英国工人运动領袖已經卖身投靠。这个提議被通过了，只有一段补充文字由于投票結果贊否各半而被否决了，这段文字說：馬克思本人并不相信这种責难，而只是由于个人目的才提出这种責难的。接着黑尔斯宣讀了把馬克思开除出国际的提案，而另一名會員則提議拒絕海牙代表大会的決議。这时黑尔斯已經完全公开地同犹拉支部的會員們保持着他們在海牙已經秘密建立起来的联系；11月6日，他以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給他們說，旧总委员会的伪善已經被揭穿了。旧总委员会企图借口消灭它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其他秘密团体，而在国际内部建立秘密团体。但是黑尔斯同时強調說，英国人在基本的政治問題上是同犹拉各支部并不一致的。英国人确信积极进行政治活动是有益的，但是他們也承认其他联合委员会由于各国的不同条件而必須拥有的完全自主权。

埃卡留斯以及荣克都成了黑尔斯的热心的同盟者。荣克开始时还有些审慎，后来就比誰都猛烈地攻击馬克思和恩格斯了。他們两人当时犯了许多重大的过錯；他們由于个人的动机而失去了冷靜的判断：先是由于对馬克思更多地听信恩格斯而不重視他們的意見——至少表面看来如此——感到嫉妒和恼火，后来則是由于失去了他們作为总委员会的老委員而占据的显要地位。遺憾的是，正是他們的这种地位更加深了他們所造成的損害。在許多次代表大会上他們都是作为馬克思观点的最坚决和最透彻的說明者而聞名的。現在，当他們以犹拉各支部对这些观点的寬容来证明海牙決議的偏狹的时候，他們也就把所謂馬克思和恩格斯有独裁作風的流言变成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了。

同时，他們所采取的破釜沉舟的作法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在英国、特别是在爱尔兰各支部中，以及在英国联合委员会内部，他們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于是，他們就玩弄了一场类似政变的把戏，向国际的全体会员和各支部发表了一篇宣言，声明英国联合委员会已由于内訌而分裂，不能够进行共同工作了。他們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来决定海牙的各项決議是否有效。宣言对这些決議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埃卡留斯和荣克不反对海牙代表大会承认政治活动的必要性这一点，因为这是多数人所同意的。他們反对的是，总委员会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各联合委员会应在本国执行的政策。联合委员会的少数派⁴⁵⁶立刻在一篇似乎由恩格斯起草的宣言中反駁了他們的謬言，并且反对建議召开的代表大会，认为它是非法的。但是这个代表大会还是在1873年1月26日召开了。大多数的支部贊成召开代表大会并且只有这些支部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一开幕，黑尔斯就猛烈攻击旧总委员会和海牙代表大会，而埃卡留斯和荣克則热烈地支持他。大会一致反对海牙決議并且拒絕承认紐約的总委员会。大会还主張只要国际的多数联合⁵¹⁸委员会认为必要，就召开新的国际代表大会。英国联合委员会就这样分裂了。它的殘存的两派都已无力积极参加1874年的选举，这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工联的行动而推翻了格莱斯頓內閣。工联曾經提出了很多候选人，并且第一次把两名会员选入議會⁴⁵⁷。

根据紐約总委员会的決議于9月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成了所謂国际的死亡的見证。也在日内瓦召开的巴枯宁派的大会，仍然有英国代表二人（黑尔斯和埃卡留斯），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代表各五人，意大利代表四人，荷兰代表一人和犹拉代表六人出席。而出席馬克思派的大会的代表却几乎全是瑞

士人，而且大部分居住在日內瓦。連總委員會都未能派出一名代表。同樣地，英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沒有一人出席大會。出席的只有一個德國人和一個奧地利人。老貝克爾誇口說，在不到三十人的大會代表中有十三人是他從地底下呼喚出來的，為的是用到会人數來提高大會的威信並且為多數人保證正確的方向。馬克思當然沒有這樣欺騙自己。他坦率承認大會的“失敗”，並且勸告總委員會暫時把國際的形式上的組織放到次要地位，而致力於確保紐約的中心點，不使任何白痴和冒險家有機會攫取國際的領導權來敗壞事業的聲譽。事件的進程，事件的必然發展和錯綜關係，將使國際以新的面貌復興起來⁴⁵⁸。

這是在當時情況下能夠做出的最英明和最妥善的決定。但遺憾的是，這一決定的影響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想給予巴枯寧最後一次打擊而被削弱了。海牙代表大會曾委託建議開除巴枯寧的“五人委員會”公布它的調查結果。但是委員會沒有執行這一任務；這可能是由於委員們“散居不同的國家”，也可能是由於它的威信已經極度動搖，因為有一個委員承認巴枯寧是無罪的，而另一個委員在這期間已被揭露是警察的奸細。於是海牙代表大會的書寫委員會（杜邦、恩格斯、勒穆修、馬克思和賽拉叶）代替原來的委員會担起了這一任務。在日內瓦代表大會前幾個星期，委員會發表了一個題名為《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①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是由恩格斯和拉法格起草的。馬克思僅僅參加了最後幾頁的潤飾工作，但是他所負的責任當然並不小於直接的起草人。

要批判地分析這個一般簡稱為關於同盟的小冊子的文件的各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365—515頁。

个细节正确与否，需要用和这个小册子同样的篇幅——十个印張。但是即使我們不去做这种分析，也不会是一个重大的損失。在这样的斗争中双方总是互相猛烈攻击的，而巴枯宁派在进攻馬克思主义者时也是不擇手段的。因此即使有时人們对他們有些苛刻甚至不公平，他們也是沒有权利抱怨的。

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應該說这个小册子也是不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表的其他一切著作的。这个小册子完全沒有他們的其他論战著作中所有的那种独特的魅力和不朽的价值，也就是說，沒有通过否定的批判表現出来的那种新观点的积极的一面。小册子沒有片言只字談到导致国际衰亡的内在原因。它只是《机密通知》和《所謂國際的分裂》这一通告的繼續。它断言，正是巴枯宁及其同盟用阴谋詭計破坏了国际。这个小册子不是一个历史文件，而是一个单方面的起訴书，它的傾向性是在每一頁上都历历在目的。德国的翻譯者认为自己有义务用檢察官的笔法对它加以潤色，把它題名为《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

國際的衰亡根本不是由于秘密的同盟的存在，而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同时，小册子也沒有证明这个同盟的活动造成了哪些实际的結果。海牙代表大会的調查委員會在这方面只好使用“或許”和“可能”一类字眼来支吾其詞。当然，不能不譴責巴枯宁醉心于想入非非的章程草案和热中于虛張声势的宣言的做法。但是，既然沒有不利于他的任何确凿的罪证，那末就應該承认这一切主要是他的蓬勃的想像力在作怪。但是，小册子却用一半的篇幅来叙述“高尚的”吳亭所揭露的有关涅恰也夫案件以及巴枯宁的西伯利亚流放的种种材料，說什么巴枯宁在流放时期就已經显示出勒索者和小偷的本領了。小册子沒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在另外一些地方則把涅恰也夫的言談行為都直接記在巴枯寧的眼上。

特別是關於西伯利亞的一章簡直是一篇低級趣味的小說。據說巴枯寧流放時期的西伯利亞總督是他的什麼親戚。由於這種親戚關係以及巴枯寧對沙皇政府的效忠，他成了西伯利亞的秘密統治者，並且濫用權力，“為了幾個酒錢”而縱容資本主義企業主。當然，這種貪欲有時也為“巴枯寧對科學的仇恨”所抑制。例如，他曾破壞西伯利亞商人想在當地建立一所大學的計劃，而建立大學是必須得到沙皇同意的。

吳亭特別“天才地”渲染了巴枯寧向卡特科夫敲詐大筆錢財的故事。幾年以前波克罕就曾向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明這是捏造的，但是沒有為二人所相信。據波克罕說，巴枯寧是從西伯利亞寫信給卡特科夫，請求寄幾千盧布給他做逃亡費用的。而按照吳亭的說法則是，巴枯寧在逃跑成功之後才從倫敦寫信向卡特科夫借錢。他受着良心的苛責，急於要退還他在西伯利亞流亡時期從一個火酒專賣包稅人接受的賄賂。這畢竟可以算是一種悔過的標志吧，但使吳亭特別感到憤慨的是，甚至這樣一種人類的感情，在巴枯寧那里也表現為向一個他明知是“告密者、文壇的惡霸和俄國政府的爪牙”的人乞討金錢。吳亭的想像力達到了這樣令人目眩的高度，並且還遠未以此為滿足。

1873年10月末，吳亭到倫敦來報告有關巴枯寧的“更加驚人得多的事情”。恩格斯在11月25日寫信給左爾格說：“這個人[指巴枯寧。——梅林]在把他的革命手冊熱心地付諸實踐；許多年來他和他的同盟就專靠敲詐勒索過活，並且有恃無恐地以為，只要這些勾當中有一件宣揚出去，就不免要把一些受人敬重的人物牽連

进去。你簡直想像不到這是一幫何等卑鄙的傢伙。”^① 幸亏在吳亭來到倫敦以前，關於巴枯寧的同盟的小冊子就在幾個星期前發表了。因此，那些“更加驚人得多的事情”就始終在吳亭的熱愛真理的胸懷中秘而未宣。此後不久，吳亭就痛悔前非地投向沙皇慈父的懷抱，靠販賣火酒和供應軍需品來大發其財了。⁵²¹

正是這本關於同盟的小冊子在其中大顯身手的論述俄國的這一部分，使小冊子的政治效果受到最嚴重的損害。它甚至引起了那些同巴枯寧不睦的俄國革命家的反感。巴枯寧對70年代俄國的運動的影響並未縮小，而馬克思卻失去了他在俄國已經贏得的相當大一部分同情。而且正是由於小冊子所獲得的那唯一的成就，小冊子在其餘方面就成為泡影了。它迫使巴枯寧本人退出了鬥爭，但是它絲毫未能損害冠着巴枯寧的名字的運動。

巴枯寧先是用投寄給《Journal de Genève》〔《日內瓦報》〕的一則聲明做了回答。這個聲明證明了小冊子的攻擊所引起的沉痛心情。巴枯寧用海牙調查委員會中有兩名奸細（實際上是一名）這一事實來證明這些攻擊是站不住腳的。然後他以自己已年達六十並且患有日益惡化的心臟病為由表示隱退。“讓另一些更年輕的人去干吧；我自己已經沒有必要的力量，或許也沒有必要的信心來為反對到處高奏凱歌的反動勢力而繼續滾動息息法斯的石頭⁴⁵⁹了。因此我要退出鬥爭舞台，並且只向我的親愛的同時代人請求一件事——忘却。從今以後，我不打攪任何人的安靜，希望別人也不要打攪我的安靜。”^② 他責備馬克思把國際變成了私人報復的工具，但是仍然承認馬克思是這個“偉大而卓越的協會”的主要創立者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357頁。

② 尤·斯切克洛夫：《巴枯寧的生平和事業》，1927年俄文版，第4卷，第316頁。


之一。

巴枯宁給犹拉支部會員們的告別信虽然极其激烈地攻击了馬克思，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比較平靜的笔調写的。他在信中不仅把俾斯麦的外交，而且同样地把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工人必須对之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的反动中心。他这一次也用年龄和疾病來說明他退出运动的理由，說他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斗争，与其說有所助益，无宁說将成为障碍。但是，他所以有理由隐退，无宁是因为日内瓦的两个大会证明了他的事业的胜利和他的对手的失败。

522 当然，巴枯宁拿“健康状况”做理由，曾被人嘲笑为无聊的借口。但是他后来在极端困苦和病痛中度过的那几年，证明他的体力确实已經衰竭了。从巴枯宁給知友們的几封密信还可以看出，他对革命的迅速胜利“或許”已經失去了信心。1876年7月1日巴枯宁死于伯尔尼。他理应死得更为快乐，他理应从工人階級的許多人(即使不是工人階級全体)那里受到更为光荣的怀念，因为他曾为工人階級的利益那样英勇地斗争过并且受过那样多的痛苦。

尽管巴枯宁有过种种的錯誤和缺点，历史却保证他在国际无产階級的先进战士中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虽然，只要地球上存在着庸人，这种光荣的地位总是要引起爭論的，而不管这班人是用警察的夜帽遮起自己的长耳朵，还是用馬克思的獅子皮来极力掩盖自己发抖的脚爪。





第十五章 最后十年

(一) 馬克思在家里

1853年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臨終痙攣之后，馬克思曾經回 523
到自己的书房；同样，1873年，在国际的臨終痙攣之后，馬克思又回
到了书房。不过这一次却是永久的，直到生命的結束。

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曾被称为“慢性死亡”，但这是过分夸
張了。公社失敗以后的斗争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1873年
秋天他害了很厉害的头痛病，很有中風的危險。这种慢性的大脑
受压抑的状况使他不能工作，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如果这病长久
地持續下去，那后果会是很悲慘的。但是經過他和恩格斯的共同
朋友、他完全信賴的曼彻斯特医生古姆佩尔特治疗了几个星期之
后，他終於痊愈了。

遵照古姆佩尔特医生的劝告，馬克思在1874年决定到卡尔斯
巴德去。在以后的两年当中，他又到那里去过。1877年他为了改換
疗养环境，又到諾伊那尔去。但是到了下一年，即1878年，他就
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因为两次謀刺德皇的事件，以及紧接着对社
会主义者的大肆迫害，使他不能再进入大陆。不过，在卡尔斯巴德
的三次疗养仍然对馬克思发生了“神奇的”功效。他差不多完全摆
脫了多年的肝病。現在只剩下慢性胃病和神經过度疲劳，后一种病

的症狀是頭痛，尤其是頑固的失眠。但是在夏天去海濱或避暑地療養以後，這些病也都多少地消失了。不過，過了年它們又重新發作起來。

524 完全恢復健康當然是可能的，只要馬克思允許自己完全休息。在勞苦和獻身的一生之後，年近六十的馬克思是有充分的權利休息的。但是他根本不考慮休息。他為了完成自己的主要科學著作而熱情地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他的研究範圍這時已經顯著地擴大了。恩格斯在談到這一點時說：“對於一個從歷史起源和發展條件來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一個問題自然是要引起一系列新的問題的。原始社會史、農藝學、俄國的和美國的土地關係、地質學，等等，——這一切馬克思都進行了徹底的研究，為的是把論地租的一章寫得空前地完善。他能輕鬆自如地用日耳曼語系和羅曼語系的各種語言閱讀，此外，他還研究古代斯拉夫語、俄語和塞爾維亞語。”⁴⁶⁰但是這些只占去他的工作時間的一半。雖然馬克思退出了公共活動，但是他並沒有停止在歐美工人運動中的活動。他差不多和各國工人運動的所有領導人都通信。他們每當遇到重大事件，總是儘可能親自來向他請教。他越來越成為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顧問；他們最喜歡向他請教，而他也總是樂於給他們以所需要的忠告。

李卜克內西曾經極其動人地描寫了50年代的馬克思⁴⁶¹。拉法格也同樣動人地描寫了70年代的馬克思。他說，他的岳父需要有非常強壯的體質，才能經受住那樣異乎尋常的生活方式和那樣耗費精神的腦力勞動。他寫道：“他的身體也確實是強健的，他的身材在中等以上，肩寬胸厚，體型勻稱；只是軀干和兩腿比起來顯得長了一點，這是猶太人常有的情況。”^①我們可以加上一句：不僅

① 《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頁。

仅犹太人是如此。歌德的体型也是这样的；他也属于民间所说的“坐着的巨人”之列。这种人由于脊骨较长，在坐着的时候身量显得比实际的要高些。

拉法格认为，如果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更多地从事体育活动，他必定会成为一个人。他经常从事的唯一的体育活动是散步。他能一面谈话，一面连续行走几小时，或是攀登小山，而丝毫不感到疲乏。但是他通常也只是为了整理自己的思想才表现出这种能力来。在他的书房里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留有一条由于来回踱步而踏成的长痕，就像草地上的小径一样。

虽然马克思睡得很晚，但他每天早晨总在八、九点钟起来，喝过清咖啡和读过报纸以后，就到书房去，一直工作到半夜甚至更晚一些。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晴朗的傍晚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的时候，工作才中断一下。白天，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钟头。工作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以致使他废寝忘食。他的胃为了大脑的这种繁重工作而付出代价。他吃得很少，常常感到胃口不佳；为了增进食欲，他常吃些味重的菜，像火腿、熏鱼、鱼子酱、酸渍菜等。同时，他也很少饮酒，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禁酒运动推行者，而且，作为一个莱茵省人，他是善于品评佳酿的。但另一方面，他吸烟却吸得很厉害，大量地消耗着火柴。他曾有一次说，《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他写这部书时所吸的雪茄烟的价钱。由于长年的贫困，他不得不吸劣等牌子的烟，因此吸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致医生曾不止一次禁止他吸烟。

马克思把欣赏文学当作精神上的休息。在他整个一生中，文学始终是他的一种慰藉。他在这方面拥有极其广博的知识，但是从来不加以炫耀。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很少发现他在文学方面的

博学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他反駁福格特的論战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为了艺术的目的而大量地征引了欧洲的一切文学作品。正如馬克思自己的主要著作反映着整个的时代一样，他所爱好的文学家都是偉大的世界詩人，他們的作品也都反映着整个的时代，如埃斯庫罗斯、荷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据拉法格說，馬克思每年要把埃斯庫罗斯的原著讀一遍。他始終是古希腊作家的忠实的讀者，而他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卑鄙小人揮鞭赶出学术的殿堂。

馬克思精通上至中世紀的德国文学。在晚近的作家当中，除歌德外，他最欣賞海涅。在他年輕的时候，他似乎不大喜欢席勒，而当时德国的庸人們醉心于他們所不甚理解的席勒的“理想主义”，这种情况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用夸夸其談的貧乏来代替平淡无奇的貧乏罢了”。自从馬克思最后离开德国以后，他对德国文学的兴趣就淡薄了。甚至那些理应受到他重視的德国作家，像赫伯尔和叔本华，他也一次沒有提起过。而理查·瓦格納曲解德国神話叙事詩，却曾受到他的猛烈抨击⁴⁶²。

在法国作家当中，馬克思对狄德罗的評價很高；他认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杰作⁴⁶³。18世紀启蒙运动时期的全部法国文学他都爱好。恩格斯曾經說过，在这种文学中，法兰西精神不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就內容來說，如果考虑到当时科学的状况，那末这种文学的意义就是在現在看来也是极高的，而就形式的优美來說，更是后无来者。馬克思的看法和恩格斯是一致的，他擯斥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特別不喜欢沙多勃利昂的故作高深，他的拜占庭式的夸張和感情的卖弄——总之，不喜欢他在文字上的那种过火的矯揉造作⁴⁶⁴。馬克

思非常欣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⁴⁶⁵，认为它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希望在完成自己的巨著之后写一部评论《人间喜剧》的书，但是这个计划也像其他许多计划一样，始终没有完成。

从马克思定居伦敦以后，英国文学就在他的文学爱好中上升到了第一位。莎士比亚的巨大身影在他心目中遮没了其他一切作家，成了他全家的崇拜对象⁴⁶⁶。可惜，马克思从来没有谈论过莎士比亚对决定着自已时代的命运的各种问题的态度。关于拜伦和雪莱，他却谈论过。他说，凡是热爱和了解这两位诗人的人都会认为，拜伦死在三十六岁的盛年是一件幸事，因为倘若他活得更长一些，他无疑会成为反动的资产者。相反，雪莱在二十九岁就与世长辞，是值得惋惜的，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家，永远会是属于争取社会主义的先进斗士之列的⁴⁶⁷。马克思非常喜欢18世纪的英国小说，特别是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认为这部小说也是以它所特有的方式反映了自已的时代。此外，马克思还认为瓦尔特·司各脱的某几部小说是这一类作品中的典范。

马克思在文学鉴赏方面，正如他对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脱的偏爱所表明，是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成见的。但是他也绝不是那种常常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或甚至奴颜婢膝相联的“纯粹美学”的信徒。在文学方面，马克思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不能 527
用任何死板公式来衡量的具有独到见解的学者。因此，他在选择文学读物方面完全没有洁癖，有时对于那些使学院审美家们望而生畏的读物，他也并不嫌弃。像达尔文和俾斯麦一样，马克思爱读长篇小说。他特别喜欢惊险小说和幽默小说；从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和菲尔丁，下而至于保尔·德·科克和因写了《基度山恩仇

記》而內疚的大仲馬。

除了文艺以外，馬克思还时常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創造領域寻找休息。特别是在精神痛苦和遭遇重大不幸的日子里，他常到数学中去寻求逃避，因为数学对他有一种鎮靜的效力。恩格斯和拉法格都曾断言，馬克思在数学方面有一些独到的发现，是否确实如此，我們这里不去談論。看过他的遺稿的数学家們却有不同的看法。

但尽管如此，馬克思却既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只是在节日才遙望一下世界的瓦格納⁴⁶⁸，也不是胸中住着两个灵魂的浮士德。他爱說的一句話是：“为世界工作”。凡是有幸能够献身于科学的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知識服务于人类。这种志趣使馬克思身心經常保持青春活力。在家里和在朋友們当中，他总是一个最随和、愉快而有風趣的談伴。从他那寬闊的胸膛里时常发出纵情的欢笑。那些寻訪这位“紅色恐怖的博士”（从巴黎公社时期起，人們就这样称呼馬克思）的人，发现他实际上既不是一个阴郁的狂热分子，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幻想家，而是一个談笑自若的俗世的人。

任何人在讀他的书信时，有时都会驚訝这位天赋极高的人怎么会在不知不觉之間从极度緊張的暴怒状态輕易地轉到平靜而深刻的哲学思考上来。傾听他談話的人大概也对他的这一特点同样感到驚訝。例如，海因德曼在談到他和馬克思的談話時說：“当他激怒地談到自由党、特别是談到它的爱尔兰政策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的深邃的小眼睛像火一般地燃燒起来。他皺着濃眉，寬大而坚强的鼻子和整个面孔都由于激动而抽搐。他滔滔不絕地傾吐着强烈而尖銳的詞句，这些詞句显示出他的性格的熾烈和他對我們的語言的惊人的熟練。他盛怒时的激动同他轉而闡述自己对当代

經濟事件时的宁靜态度恰成鮮明的对照。他毫不費力地从預言家和猛烈的譴責者一变而为宁靜的哲学家。而我从一开始就認識⁵²⁸到，在这一方面，我还要做許多年的学生才能学到他的本領。”⁴⁶⁹

虽然馬克思这时在資产階級社会中已經比二十年前著名得多，但他仍旧远离所謂的社交生活。例如，海因德曼是通过一个保守党議員的介紹才注意到馬克思的。但是馬克思的家在70年代初却成了一个极其活跃的交往的中心，成了公社流亡者的一种“正义避难所”，这些人在那里总是能得到指教和帮助。这群好动的人自然也惹起了不少的煩惱和麻煩。当他們逐漸散开以后，連殷勤好客的馬克思夫人都不禁如釋重負地叹了一口气說：“真够我們受的。”

但是他們当中也有例外。1872年，曾經是公社委員和公社机关报編輯的查理·龙格和馬克思的女儿燕妮結了婚。他和他妻子的一家，不論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上，从来都不像拉法格那样亲密。但他也是一个能干的人。关于他，馬克思夫人曾这样写道：“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容易发火，喜欢吵嚷和爭辯。但是我必須称贊他說，他在皇家学院讲课是很准时的，他的上司对他很滿意。”龙格的幸福婚姻曾因为第一个孩子的死而一度阴暗，但是那时他們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大胖小子”——茁壮地成长起来，引起了全家特别是外祖父的欢乐。

拉法格夫妇也是公社的流亡者，住在馬克思家邻近。他們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了。在命运的这一沉重打击下，拉法格放棄了医业，认为干这一行不来某种程度的招搖撞騙是不行的。馬克思夫人說：“他背棄了药王爺，多可惜！”幸而拉法格天性乐观，世界在他眼中总是燦烂的，他“像个黑人似地工作着”，而他的妻子又是他的一位不倦的、朝气蓬勃的帮手。但是，他所經營的那家影印石

印社却生意清淡。他要对付大資本家的竞争是困难的。

馬克思的第三个女儿那时也有了一个追求者——法国人利沙加勒；这人曾参加公社的战斗，后来写过一部公社史⁴⁷⁰。爱琳娜·馬克思似乎对他頗有好感，但是她的父亲怀疑这人是否可靠。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以后，这件事终于沒有结果。

1875年春天，馬克思一家又搬到倫敦同一个区里的另一所房子里。他們迁居到哈佛斯托克崗的梅特兰公园路41号。馬克思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年，并且在那里逝世。

(二) 德国社会民主党

529 德国社会民主党避免了老国际的其他所有分枝在轉变为一国的工人政党时所經歷的危机，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一国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1874年1月10日，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失败的几个月以后，党庆祝了自己在議會选举中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获得了三十五万張选票和九个議席，其中三席屬于拉薩尔派，六席屬于爱森納赫派。

老国际衰亡的最后一个最显而易見的原因是：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同这个日益兴盛的工人政党也只是好不容易地才达成協議，而由于他們本是德国人，这个党当然是他們所最熟悉的而且是比其他所有的党更接近他們的理論观点的。他們的脱离实际并不是毫无恶果的。他們站在国际的了望台上观察事物，而这就妨碍了他們洞悉各国的实际情况。就連法国和英国最热心拥戴他們的人都承认，他們并不能透彻地了解英法两国的生活。至于德国，自从他們离开祖国以后，他們就再也沒有能

够同它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甚至在直接有关党的问题方面，他們的判断也经常被他們对拉薩尔以及与拉薩尔的名字有关的一切的无法消除的不信任所蒙蔽。

这一点在新选出的議會第一次开会时表现得最清楚。在爱森納赫派的六名議員中，有两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还在監獄里。其余四人——盖勃、莫斯特、莫特勒和瓦尔泰希——的表现則甚至使得他們自己的拥护者也大失所望。倍倍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各方面的人都沉痛地向他抱怨說，三个拉薩尔分子——哈森克莱維尔、哈賽尔曼和雷默——在議會中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这四名爱森納赫派議員。恩格斯对这种情况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写信給左尔格說：“拉薩尔派已被他們在議會中的代表弄得这样声名狼藉，以致政府不得不开始對他們施加迫害，为的是要重新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它是在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运动。其实，拉薩尔派从选举的时候起就不得不跟着我們的人跑。哈賽尔曼和哈森克莱維尔被选入議會，这真是一件幸事。他們自己在那里日益糟蹋自己的声誉；他們不是跟我們的人一道走，就必定自作自受地干蠢事。不管哪种情况，对于他們來說都是絕路一条。”^①不能想像还有比这更不正确的看法了。

議會中两个党团的代表彼此相处得非常和諧，他們根本不計較哪一个党团在議會讲坛上表现得更为成功。两派在选举斗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使人既不能責备爱森納赫派为半社会主义，也不能責备拉薩尔派同政府勾勾搭搭。两派获得了大致相等的票数；它們在議會中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反对同样的敌人；它們在选举后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375頁。

同样遭到政府凶猛的迫害。它們只是在組織問題上才有分歧，但就是这一个障碍也由于檢察官泰森多尔夫的功名心切而扫清了。他几次从唯命是从的法庭弄到判决书，这些判决书既摧毁了爱森納赫派的較為散漫的組織，也摧毁了拉薩尔派的严密的組織。

因此，这两派的联合就自然而然地临近了。当特尔凯在1874年10月向李卜克内西提出拉薩尔派的和解建議时，当时已經出獄的李卜克内西就毅然决然地、或許有点自作主張地接受了这个建議。虽然倫敦方面对他的做法备加責难，但他的功績并不因此而減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拉薩尔派仍旧是个垂死的宗派，迟早是要无条件投降的。在平等基础上和拉薩尔派进行談判，在他們看来是違反德国工人階級利益的輕举妄动。1875年春天当两派代表的共同綱領草案公布出来时，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勃然大怒了。

5月6日，在恩格斯已經給倍倍尔写了一封詳細的抗議信以后，馬克思給爱森納赫派的領袖們寄去了一封所謂关于綱領的信^①。在这封信中，他空前猛烈地痛斥拉薩尔。他說，拉薩尔能背得出《共产党宣言》，但是为了要替他同专制封建敌人联合起来反对資產階級的做法辯护，他粗暴地曲解了《共产党宣言》，把其他一切階級一概称为反对工人階級的反动的一帮。但是“反动的一帮”这种說法本身根本不是拉薩尔提出的，而是施韦澤提出的，而且是在拉薩尔死后才提出的。当施韦澤提出这个口号时，恩格斯曾无条件地加以贊助。拉薩尔的确是从《共产党宣言》中借用了他所謂

^① 梅林指的是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給倍倍尔的信和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威廉·白拉克的、附有《对于德国工人党綱領的几点意見》的信；这些信由恩格斯在1891年以《哥达綱領批判》为題发表出来。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13—43頁。

的工資铁律。为了这一点，他曾被指責为馬尔薩斯人口論的拥护者，虽然他和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强烈地斥責过这个理論。

如果撇开这封論綱領的信中的这个非常不妙的方面不談，那末这封信就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一篇极有教益的論文。对于联合綱領，它当然是批判得体无完肤的。然而，大家知道，这封非常重要的信只是使对方对自己的方案作了两三处微小而且无关紧要的修改。二十多年后，李卜克內西說，即使不是全体，也是差不多全体的人都贊同馬克思的意見，而且他的建議很可能在联合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票。但是即使那样，終究会有一个不滿意的少数派，而这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里問題不是在于表述科学的原理，面是在于两个派別的实际联合。

关于这封論綱領的信为什么被隱面未提，有一个不那么堂皇、但是却比較切实的解釋：这封信超过了爱森納赫派的思想水平，甚至更甚于超过拉薩尔派的思想水平。誠然，还在几个月以前，馬克思就曾埋怨爱森納赫派的机关刊物上不时发表一些庸人的空論——教員、医生和大学生的作品，而李卜克內西是應該为此而受到斥責的。但是馬克思仍然认为，曾經如此煞費苦心地灌輸到党内而且終于在党内扎下了根子的现实主义观点，会被拉薩尔派从民主派和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唯心主义的法律空談和其他廢話冲洗得一干二淨。

然而在这一点上馬克思是完全錯了。在理論問題方面，两派大致是处在同样的水平上，而如果說它們之間有什么差別，那倒无宁說是拉薩尔派更占优势。爱森納赫派方面对于联合綱領草案絲毫沒有異議。而几乎完全是由拉薩尔分子組成的西德工人代表大会，却对这个草案进行了批評，这个批評在許多方面是接近于几星

期以后馬克思对它所提出的批評的。不过,不必特別重視这一点。532 两派都还离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那种科学社会主义很远。它們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差不多沒有任何概念。而他們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謎也是同样地一窍不通。当时爱森納赫派的最著名的理論家卡·奥·施拉姆不懂得价值論,就是上述情况的一个最突出的例证。

事实上,两派的联合是有利的,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理由反对它,但是他們认为,拉薩尔派在牵着爱森納赫派的鼻子走。要知道,馬克思本人也曾在他的論綱領的信中說过:“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綱領。”^①但是因为在这个新联合的党里,理論的混乱有增无減,所以他們就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不自然的合并的結果,因而他們的不滿情緒也就加强而不是減弱了。

引起他們的不滿的原因与其說在于原来的拉薩尔派,无宁說更多地在于原来的爱森納赫派,这一点当然可能使他們感到为难。恩格斯有一次在談到拉薩尔派时說,他們不久将成为最有見識的人,因为至少在他們的合并后还存在着大約一年的报纸上还没有发表过任何謬論。恩格斯說,受雇于人的鼓动家,这班一知半解的人,是重重地压在他們自己的党头上的大禍害。特別使他恼怒的是莫斯特,因为他“做过整部《資本論》的摘录,却对这部著作毫无理解”,而且竭力替杜林式的社会主义辯护。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写信給馬克思說:“显然,这些人以为杜林由于对你进行了卑鄙的人身攻击,就使他自己成为不可侵犯的了,因为假如我們譏笑他在理論上的无稽之談,那末就会显得我們是在报复他的人身攻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14頁。

击了。”^① 連李卜克內西也不免挨了一頓訓斥：“威廉急于要弥补我們在理論方面的缺陷，要对庸人的每一种指摘都作出答复，并且想描繪出一幅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也会就未来社会的情况提出問題；此外，他还想在理論方面尽可能不依賴我們，而他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功总是比他自己意料的大得多，因为他根本缺乏任何理論。”^② 但是，这一切都和拉薩尔及其傳統毫不相干。

新联合的党由于获得了迅速增多的实际成就，而开始对理論漠不关心起来。不过，这样說是过甚其詞的。党并不是輕視理論本身，而是輕視那在它的突飞猛进中被它看做理論上的細微末节的东西。在党的一些新人周圍，聚集着不被社会承认的发明家和改革家，种痘反对論者，自然疗法宣揚者，以及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天才；这些人希望在已經那样猛醒的工人階級当中得到承认。任何一个表示願意效劳并且奉献出某种治疗社会恶疾的药方的人都被欣然接納，而从学院里潮涌而来的那批人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有利于加强无产階級和科学的联盟。一位大学教授，如果他按照对于“社会主义”的多种多样的理解中的任何一种来向社会主义靠攏，或者表示希望靠攏，他就不必担心他所兜售的知識貨色会受到过分严厉的批評。

杜林特別具有免受这种批評的条件，因为这人在为人方面和在他的活动方面有許多东西吸引着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思想活跃的分⼦。他无疑具有很高的才能和天賦。他沒有资产，早年失明，以大学讲师的困难地位多年来一直在讲坛上宣揚自己的政治激进主义，对統治階級毫不让步，敢于贊頌馬拉、巴貝夫和巴黎公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4卷，第450頁。

②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39頁。

社的活動家們。這自然得到了工人的同情。他的為人的一个阴暗面是他大言不慚地自称精通六門學問。其實，由于他生理上的缺陷，他對這些學問是一門也不精通的。他把他的前輩——哲學方面的費希特和黑格爾，經濟學方面的馬克思和拉薩爾——都一棍子打死。他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夸大狂還沒有十分引起人們的注目，也可能是作為某種缺乏涵養的表現而為人們所原諒，因為考慮到他的精神上的閉塞和生活上的苦鬥，他的這種缺乏涵養是可以理解的。

馬克思完全沒有注意杜林的“卑鄙的”攻擊，而攻擊的內容也不足以促使他作出回答。他長時期無動于衷地看待杜林在柏林黨員當中威信的日益增長，儘管杜林由于深信自己永不會犯錯誤并且創立了自己的“最後真理”的體系而具備了一個天生的教祖的一切素質。甚至當李卜克內西（他這一次倒是忠於職守的）給馬克思和恩格斯寄來一些工人的來信，并且向他們指出黨的宣傳有庸俗化的危險時，他們還不願批判杜林，認為這是一件“過於次要的工作”。直到1876年5月莫斯特給恩格斯寄來一封趾高氣揚的信時，這才似乎到了不能再容忍的時候。

從這時起，恩格斯才着手詳盡地考察杜林的所謂“創造體系的真理”。恩格斯一連寫了幾篇文章進行批判，這些文章從1877年年初起陸續發表在聯合的黨的新中央機關刊物《Vorwärts》（《前進報》）上。這些文章後來發展成為僅次于《資本論》的最卓越而重要的一部科學社會主義的著作^①。但是黨對這部著作的態度却說明，再拖延下去，將會造成真正的危險。1877年5月在哥達召開的年

^① 梅林指的是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所實行的改革。單行本第一次出版於1878年。

度党代表大会，几乎要把恩格斯当作異端来审判，正像御用的大学學閥曾經对付杜林那样。莫斯特提議停止在正式的党刊上发表反对杜林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对于《前进报》的大多数讀者来说是毫无趣味的，甚至引起他們的极大憤怒”。瓦尔泰希木来是莫斯特的死敌，但这一次却附和他說，恩格斯的文章的語調会使人倒掉胃口，并且使《前进报》提供的精神食粮变得难以下咽。幸亏通过了一个折衷的提案才防止了出丑的危險。提案說，为了实际的和宣傳的理由，这个学术論爭應該繼續进行下去，但不要在《前进报》正刊上进行，而應該在該报的学术附刊上进行。

同时，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从1877年10月起出版一种学术性的双周刊。这是卡尔·赫希柏格建議的，并且将由他資助出版。赫希柏格是当时德国許許多多資產階級社会主义信徒中的一个。他是法兰克福的一个彩票商的儿子，年輕，但很富有，为人不自私，能够为事业作出重大的自我牺牲。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对他的私人品德极口称頌。但是从他所发表的政論文章来看，他在写作和政治方面却差得多。在这方面，赫希柏格表现出是一个十分平庸而又枯燥无味的人物，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論，对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点完全是門外汉。由于他看不到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乃是工人階級解放的杠杆，他便希望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发展的途径，为了工人的事业把有产階級、特别是他們当中的知識分子爭取过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还不很熟悉他这个人，曾拒絕給新杂志 535
《Zukunft》〔《未来》〕撰稿。他們曾經和其他許多人一样接到过一份未具名的邀稿公函。恩格斯认为，代表大会的決議，不管在实际宣傳方面怎样值得尊重，在科学方面却一錢不值，不足以使这个杂

志具有科学性，因为科学性是根本不能靠法令来建立的。一个沒有确定不移的科学傾向的社会主义科学杂志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而且，由于在德国流行着形形色色的傾向或者曖昧不明的傾向，誰也不能保证这个杂志的傾向对于他們会是合适的。

从《未来》杂志的第一期就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是多么正确。赫希柏格的发刊詞就是他們在40年代作为在社会主义中起着削弱和軟化作用的东西而加以反对的那一切的可怜翻版。因此，他們就避免了作許多不愉快的解釋。德国党的一位同志問他們是否因哥达代表大会上的辯論而生气，馬克思回答說：“我不生气（就像海涅所說的），恩格斯也一样。我們两个人都把名声看得一錢不值。下面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由于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个人迷信，因此在国际存在的期間，我从来不允許发表那些来自各国的許多令我厭煩的、表彰我的功績的文电；我甚至从来也不答复它們，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責。”他又补充說：“不过像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样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将要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很好地加以利用，——仍然使我們更加小心謹慎地对待‘德国的党内同志’。”^①但是，这些话还是說得很善意的，因为恩格斯仍旧在《前进报》的学术附刊上安然无事地发表他反对杜林的文章。

說到問題的实质，那末，馬克思为那种“腐朽的习气”而深感忧虑，这种习气在群众当中不如在領袖們当中表現得那样厉害。10月19日，他写信給左尔格說：“同拉薩尔分子的妥协已經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如莫斯特）是同杜林及其‘崇拜者’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487、488頁。

的妥协，但此外也是同一帮不大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的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款’入党，——我可以承认他怀有‘最高尚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怜和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① 536

实际上，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时候和这种“倾向”妥协，那末他们就得否定他们过去的一切。

（三）无政府主义和东方战争⁴⁷¹

1877年的哥达大会上，也决定派代表出席同年9月在根特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当选为德国党的代表。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由比利时人发起的。他们这时已经对美妙动听的无政府主义学说感到有些失望，并且想把海牙大会上分裂的两派重新联合起来。巴枯宁派开过几次代表大会：1873年在日内瓦，1874年在布鲁塞尔，1876年在伯尔尼；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在缩小。这个派别曾经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际需要而产生，而现在却由于不符合它的更为实际的需要而瓦解了。

在日内瓦“厂工”和“粗工”之间发生的争执，其矛盾的真正根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3页。

源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是工資优厚的工人，他們享有政治权利，有条件进行議會斗争，但是傾向于同資產階級政党实行种种曖昧不清的妥协。另一方面，是工資低微而又沒有政治权利的工人，他們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自己的体力。爭执的根源就在于两派之間的这些实际的矛盾，而不是像通常所傳說的那樣，在于他們之間的理論分歧，亦即所謂“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矛盾。

虽然人們曾經許多次认为无政府主义已經被彻底埋葬，但它仍旧一次又一次地复活。这一事实說明，当时也和現在一样，事情并不那样簡單。理解无政府主义完全不等于承认无政府主义。同样地，在承认参加議會政治活动的必要性的同时，不能忘記这种活动尽管可以带来一些改良，甚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改良，却能把工人运动引到一条丧失革命精神的死路上去。所以，巴枯宁曾經从自己的拥护者当中举出許多对无产阶级斗争有过巨大贡献的人，这不是偶然的。李卜克内西当然从来也不是巴枯宁的朋友，但是在巴塞尔大会期間，他要求不参預政治，其热烈程度絲毫不亚于巴枯宁。其他如法国的茹尔·盖德、意大利的卡尔洛·卡菲埃罗、塞札尔·德·巴普、俄国的巴維尔·阿克雪里罗得，在海牙大会期間以及其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曾是最热烈的巴枯宁主义者。他們后来終于都变成了同样热忱的馬克思主义者。但是，正如他們当中有些人自己着重指出的，这只是因为他們首先承受了巴枯宁和馬克思之間的共同的东西，而絕不是因为他們简单地拋棄了自己先前的信念。

馬克思和巴枯宁两个人都要求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而他們两人之間的爭論只在于这个运动所应采取的主要途徑。但是現在，巴枯宁派所召集的那几次国际大会表明，无政府主义的道路是

行不通的。

要說明无政府主义在它的几次代表大会⁴⁷²的过程中迅速衰落的情况,那就会离题太远了。无政府主义的瓦解是急轉直下而且十分彻底的。总委员会以及为維持总委员会而征收会費的制度都被取消了。以后,又禁止代表大会就原則問題进行表决,而且好不容易才制止了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企图。然而,在創立組織、制定新綱領和新策略方面,情况更加不妙。在日内瓦大会上,特別就总罢工是不是社会变革的唯一的、可靠的手段这个問題进行了爭論,但是沒有作出任何決議。在布魯塞爾举行的下一次大会上,关于公用事业这个主要議題的爭論也同样沒有結果。巴普曾就这个問題作了一篇报告,事后他受到譴責,說他根本离开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这种譴責是完全有道理的。事情摆得很清楚,如果巴普想把这个问题解釋明白,他就势必要离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經過激烈的辯論以后,这个问题被推迟到下次大会去解决,然而在下次大会上它仍旧未获解决。意大利人宣布說,“召开大会的时代已經結束了”,他們要求“以行动来宣傳”。在两年当中,他們利用国内的饥荒发动了六十次騷动,但是他們的事业却毫无成就。

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墮落为一个僵死的宗派,不仅仅是由于它⁵³⁸在理論观点方面的不可救药的混乱,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对涉及現代无产阶级的最直接利益的問題一概抱着否定的态度。当瑞士开始展开爭取十小时工作制的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根本拒絕参加。当法兰德斯的社会主义者禁止工厂使用童工而发起請願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拒絕参加。当然,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任何爭取普选权的斗争,而在那已經争得了普选权的地方,他們就鼓吹对它进行抵制。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毫无成果、毫

无希望的政策比較起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种种成就越发显得光輝燦爛，于是群众到处都謝絕无政府主义的宣傳了。

1876年无政府主义者的伯尔尼大会曾建議在第二年召开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而这次代表大会在根特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意識到无政府主义不能爭取人民群众。根特大会从1877年9月9日开到15日。参加大会的代表共有四十二人，其中只有十一人是吉約姆和克魯泡特金所領導的无政府主义骨干分子。許多过去拥护无政府主义的人，包括大部分比利时的代表和英国人黑尔斯，都归附到李卜克內西、格雷利希和弗兰克尔領導的社会主义一翼方面来。在李卜克內西和吉約姆之間曾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吉約姆譴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議會选举时把自己的綱領藏到口袋里去。但总地來說，大会的进行是風平浪靜的。无政府主义者沒有唱高調，他們在发言中使用了一种溫和的調子。这使得他們的对手能够礼尚往来地对待他們。不过，拟議中的“團結公約”並沒有能締結，因为双方的观点分歧太大了。

馬克思对于这次大会並沒有期待另外一种結果。他現在正緊張地注視着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俄土战争，期待着那里会发生革命風暴。他給李卜克內西写了两封提供建議的信，其中1878年2月4日的第一封信一开头这样說：“我們最坚决地支持土耳其人，这有两个理由。第一，我們曾經研究过土耳其农民，即土耳其人民群众，并且深信他們是屬於欧洲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农民之列的。第二，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地加速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革的因素已大量地存在），并且因此而在整个欧洲引起轉折。”三个月以前，馬克思在給左尔格的信中說：“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轉折点。俄国——我曾經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

料(官方材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我是由彼得堡的朋友們給弄到的)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大变革的門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于土耳其的好汉不仅打击了俄国军队和俄国财政,而且打击了統率军队的王朝本身(沙皇、王位继承者和罗曼諾夫王朝的其他六个人),变革已提前許多年爆发。……

俄国大学生的胡鬧仅仅是一个預兆,本身毫无意义。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預兆。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經濟上、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正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①事实证明,馬克思的这种观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像馬克思在急不可耐地期待革命的时候所常表现的那样,他把事态的发展过程看得很清楚,却低估了发展过程的长期性。

俄国人最初的失敗随即轉为胜利。馬克思认为他們的胜利是由于俾斯麦的暗中援助,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背信,最后,由于土耳其人本身的过錯。他們本应该以革命手段推翻君士坦丁堡的古老王朝,因为这个王朝是沙皇的最得力的支柱。在这样的最严重的危机时刻不能奋起革命的人民,是无可救药的。

因此,俄土战争不是以一次欧洲革命,而是以一次外交官會議宣告結束。举行这次會議的时间 and 地点,恰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受了似乎是致命的打击的时间 and 地点⁴⁷³。

(四)曙光

在世界的地平綫上,終究出現了新的曙光。俾斯麦希望用来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1頁。

摧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实际上成了这个党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开端。同时，它也消除了这个党和伦敦的两位老人之間产生的那些誤会和磨擦。

540 但是在这以前，还进行了最后一場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毫无愧色地經住了这些迫害，以及 1878 年夏謀刺德皇事件之后进行的选举的考驗。但是，在它准备对付那临头的打击时，它却没有足够地理解到它将遇到的是怎样一种猛烈的仇恨。这个法令刚一生效，当局就立刻忘記了它曾經为消除議会的疑虑而作出的“公正地”实施这个法令的諾言。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机构都被如此无情地粉碎，以致成百的人被拋到街头，生計无着。几星期以后，整个柏林及其郊区都显然違反法令的条文，宣布了所謂小規模戒严。大約有六十个有家口要养活的人被驅逐出境，而这不仅使他們失去了面包，而且使他們失去了祖国。

单是这一点就引起了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几乎不可避免的混乱。如果說，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国际总委员会曾經抱怨救济公社流亡者的工作在好几个月当中妨碍了它的正常工作的进行，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由于随时随地受到警察的迫害，以及由于可怕的經濟危机，他們的任务势必更加艰巨。无可否认，这场風暴把谷粒同糠粃区别开来；近几年来混进党内的許多资产阶级分子表现出他們是靠不住的；有一些领导人有負众望，另一些甚至是比较活跃的领导人，则在反动派的沉重打击下灰心丧气，不敢再用强有力的抵抗去触怒敌人。

这一切都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不快。不过，他們无疑也把必須克服的种种困难估計得过低了。但是他們确实有理由对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的行为感到不滿；这个党团甚至在 1878 年謀刺德

皇事件后进行的选举之后还保存着九个成员。这些議員中的一个，麦克斯·凱澤尔，在討論新的关税率时，竟认为可以发言并投票贊成提高铁类关税，而这一点当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任何人都明白，新关税率的目的是要使帝国国库的岁入增加几亿，保护大地主的地租以抵抗美国的竞争，并且使大工业能够恢复它在开业狂年代的陶醉中给自己造成的损伤。任何人也都知道，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摧毁群众对威胁着他們的不断貧困化的抵抗。

当倍倍尔想替凱澤尔的这种行为辯护，說他曾經仔細研究过铁类关税的問題时，恩格斯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說：“如果他的研究 541 有絲毫价值的話，他就應該知道，德国有两个炼铁厂，‘多特蒙特联合工厂’和‘凱尼希与劳拉工厂’，这两个工厂中的每一个工厂都能够滿足整个国内市場的需要，此外还有不少小一些的企业。他應該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关税純粹是荒唐事。他應該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只有爭取国外市場才能解決問題。因此，不是实行貿易絕對自由，就是破产；而炼铁厂厂主只是在下述情况下才会要求保护关税，即他們組織‘瑞恩’（Ring），也就是說，勾結起来，把壟断价格强加給国内市場，以便按傾銷价格把剩餘产品拋售国外，——这一点他們目前实际上已經在做了。因此，凱澤尔既投票贊成铁类关税，他也就是为这个‘瑞恩’、这个壟断資本家的勾結的利益发言并投票了……”^①。当卡尔·希尔施也在《Laterne》（《灯籠报》）上相当严厉地批評凱澤尔的策略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竟产生这样一种不幸的想法，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因为凱澤尔是在它的同意下发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73—74頁。

的。这样，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这个党团就把一切都搞糟了。馬克思說：“他們已經这样深地陷入議會迷，竟认为他們自己是超乎批評之上的，并且把批評斥为大逆不道。”^①

卡尔·希尔施是一个青年作家，在李卜克内西长期监禁期間升为《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的代理主編。后来他在巴黎住下来，但是在德国非常法頒布以后被逐出巴黎。于是他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自1878年12月中起他在比利时的布雷达市出版了一种周刊，这个周刊的开本和文体同罗什弗尔的《灯籠报》一样，名称也叫做《灯籠报》。这个杂志的开本使它便于装在普通信封里寄往德国，而在德国它就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支点和力量汇合的中心。希尔施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他在原則問題上也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但是他所选择的那种簡洁而犀利的警句的形式不大适合一个工人刊物的要求。在这方面比較成功的是《Freiheit》（《自由》）周报，这是几星期以后莫斯特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协助下在倫敦出版的。但是，这个周报也只是有一个合理的开始，随后就墮入毫无目的的革命儿戏中去了。

542 由于这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是野生的并且不屬德国党领导的刊物的出現，党在国外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的問題就变得迫切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极力主張这一点，而他們終于克服了党内主張保持审慎的保守政策的有势力集团的頑强反对。同莫斯特取得協議已經不可能了，但是希尔施已停止出版《灯籠报》，并且表示願意担任新的机关刊物的主編。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信任希尔施，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4頁。

因此也答应为新刊物撰稿。新刊物将以周刊的形式在苏黎世出版。出版的筹备工作委托给住在苏黎世的三个党内同志：被逐出柏林并任保险公司经纪人职务的施拉姆、卡尔·赫希柏格和被赫希柏格请来作文学顾问的爱德华·伯恩施坦。

但是他们显然并不十分急于完成委托给自己的任务。这种拖延的原因到1879年7月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那时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刊物《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这刊物预定一年出两期。它的宗旨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中曾加以说明。这篇文章的署名是用三个星标。不过它的作者只有赫希柏格和施拉姆；伯恩施坦仅仅写了几行字。

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一种浅薄无聊和不懂策略到难以置信程度的胡说八道。它数说党的种种罪行，说什么党缺乏“良好的风度”，只知一味申斥别人，党讨好群众而轻视有教养的阶级，——总之，就是无产阶级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招惹庸人们生气的一切东西。文章最后得出一个务实的明智的结论，要党决心利用非常法所强加于它的闲暇来闭门思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这种可恶的胡说激怒了。他们给党的领导成员分送了一封私人的通告信^①，信中断然要求：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即使为了实际的理由而必须让他们留在党内，也不能给予他们在负责的机关里发表言论的权利。其实赫希柏格并没有被授予这种权利，他只不过是僭取这种权利罢了。他正是这样完全专断地要求苏黎世的“三星”有权监督希尔施所领导的编辑部，并且反对按照《灯笼报》的风格来编报。于是，希尔施和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5—362页。

543 倫敦的二老就拒絕和这个新刊物发生任何关系了。

关于这件事的繁多的通信，只有一些片断保存下来^①。从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完全不同意“三星”的无理要求。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加以制止，却令人难以理解。赫希柏格亲自到了伦敦，在那里只见到了恩格斯。他那混乱的观点给恩格斯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虽然不管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都不怀疑他的意图是良好的。而且，由于双方都很激动，彼此很难在当时取得一致的意见。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如果新的周刊按照赫希柏格的方式来编辑，那末他们将不得不公开反对这样“糟蹋”党和理论。“这样，我们就预先警告了这些先生们，而他们也充分了解了我们，知道这就是表示：服从或决裂！如果他们想让自己丢脸，那就活该他们倒楣！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他们给我们丢脸。”^②

幸而事情并没有走到极端。福尔马尔担任了苏黎世的《Soz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的主编。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他把这个报编得够“蹩脚”的，不过毕竟还没有引起他们的公开抗议。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就这个问题同莱比锡方面的人通信争论，而且往往争论得十分激烈”^③。其实“三星”也并不是危险人物。施拉姆干脆打了退堂鼓，赫希柏格时常外出旅行，而伯恩施坦在形势的压力下完全摆脱了垂头丧气的情绪，就像许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书信，包括他们在1879年9月17—18日合写的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的草稿等，都已译成俄文发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41—42、43、44—46、47—61等页。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3—3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97页。

多同志过去在困难处境的影响下情绪低落而这时也同样振作起来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比开始时更多地理解到德国党的领导所不得不对付的那些巨大的困难，而这一点也大大有助于缓和人们的情绪。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那些比较安静地住在国外的人，不应该给那些在国内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并忍受重大的个人牺牲的人增加麻烦——这只会使资产阶级和政府快意。”^①几星期以后，双方甚至达成了正式的和解。

544

1880年12月31日，福尔马尔辞去了他的主编职务。德国党的领导方面为了迁就两位老人，决定请卡尔·希尔施做他的继任者。由于希尔施这时已迁居伦敦，因此倍倍尔决定到那里去亲自和他谈判。同时，他也早就打算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问题彻底谈清楚。他带着伯恩斯坦同行，为的是消除伦敦方面对伯恩斯坦还抱有的成见，虽然后者这时已完全证实了自己是好样的。这次卡诺萨之行⁴⁷⁴（党内这样称呼这次伦敦之行）完全达到了目的。只是希尔施最初表示同意担任主编，随后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说 he 希望在伦敦编《社会民主党人》。这一点遭到了拒绝；结果，伯恩斯坦被任命为主编，起初是临时的，后来就成为常任的。他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伦敦方面的人很为满意。一年以后，当举行反社会主义者法令颁布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时，恩格斯欢欣鼓舞地指出：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这样英勇地战斗过。

法国方面情况也有了好转。在1871年5月流血的一周以后，梯也尔向惊魂未定的凡尔赛资产者们宣布说，社会主义在法国已经死亡了。他已经忘记，在1848年6月的屠杀以后，他曾经做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97页。

同样的一次虛假的預言。大概他以为血流得越多，效果就越大吧。的确，如果計算巴黎工人在巷战中，以及由于死刑、放逐、苦役和流亡而遭受的損失，那末 1871 年牺牲的人数达十万之多。然而梯也尔这一次又彻底搞錯了。1848 年以后，經過两个十年，社会主义才从使得它头晕眼花的打击下苏醒过来并且发出声音。而 1871 年以后只經過五年，社会主义就重新宣布了自己的存在。1876 年，当軍事法庭还没有停止自己的血腥的勾当，当公社的保卫者們还在繼續遭到枪杀时，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就在巴黎召开了。

当然，这首先只是宣告自己存在。大会是在資產階級共和党人的庇护下召开的，因为这些人希望在反对保皇派地主的斗争中得到工人的支持。大会的決議所涉及的都是像舒尔采-德里奇在德国所主張的合作組織这样的无关宏旨的問題。但是可以預見到，
545 事情是不会到此为止的。自 1803 年同英国簽訂貿易协定时起慢慢地发展起来的大机器工业，在 1870 年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发展。它面临着一些非常艰巨的任务：治疗战争在整整三分之一的法国土地上所造成的創伤；为建立新軍国主义的龐大建筑积累資金；末了，补偿因 1870 年前法国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亚尔薩斯的割让而蒙受的損失。大工业滿足了对它提出的这些要求。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工厂，产生着工业无产階級。在旧国际的全盛时代，只是在法国东北部的几个城市里才有工业无产階級。

这就是茹尔·盖得迅速获得成功的原因。盖得带着他那鼓动性很强的口才投入了 1876 年巴黎代表大会以后兴起的工人运动。盖得最初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不久前离开了无政府主义。他的观点缺乏理論上的明确性，这一点从他在 1877 年創办的《Égalité》（《平等报》）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資本論》已經譯成法

文出版，但盖得对于馬克思却一无所知，而只是由于卡尔·希尔施的介紹才第一次知道馬克思的理論。然而他非常明确而坚定地掌握了土地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資料公有的思想。由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演說家和机智的論辯家，他善于用无产階級解放斗争的这个最新的口号唤起法国工人的热情，而这个口号在旧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通常正是受到那些法国代表們最激烈的反对的。

1878年2月，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里昂召开；这次大会的組織者打算使它成为巴黎大会的翻版。但是盖得已經把一个由二十个代表組成的少数派爭取到自己的旗帜下来。这样，在资产階級和政府看来，事情就变得危險了。于是它們又开始迫害工人运动。对《平等报》編輯們的罰款和监禁，迫使这家报纸停刊了。但是盖得和他的同志們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們继续頑强地工作。在1879年10月于馬賽召开的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上，他們已經爭取到代表的大多数，这个多数派立刻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組織起来准备进行政治斗争。《平等报》复活了，并且得到了拉法格这样一个积极的撰稿人。这个刊物的几乎所有的理論文章都是他写的。稍后，馬隆（过去也是一个巴枯宁主义者）出版了《Revue Socialiste》（《社会主义評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这个刊物，給它寄去了几篇文章。

1880年春，盖得到倫敦去同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 546
这个年輕的党起草竞选綱領。他們就所謂最低綱領达成了協議。这个綱領的开头是一个說明共产主义的任务的簡短緒論，而在后面的經濟部分中只提出了那些直接来自工人运动的要求。誠然，沒有就每一个別条文取得一致意見。盖得坚持要在綱領中列入法定最低工資的要求，馬克思則认为，如果法国无产階級还幼稚到需

要这样一种誘餌，那在目前就根本不值得起草什么綱領了。

但是馬克思对于这个綱領的看法并不那么坏⁴⁷⁵。总地說来，他认为这个綱領是使法国工人摆脱含糊不清的詞句并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馬克思根据这个綱領所引起的反对和同情得出結論說，法国终于产生了真正的工人运动。在这以前只有宗派，而宗派自然是坚持它們的創立人所提出的口号的。同时，无产階級群众則跟着激进派或冒充激进的資产者走。在紧要关头，他們为这些激进派战斗，而到第二天，这些取得了政权的人就屠杀和放逐工人。因此，当法国政府被迫大赦公社社員而使他們有可能回国时，馬克思就欣然同意他的两个女婿返回法国。拉法格到法国去同盖得合作，而龙格則在《Justice》（《正义报》）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編輯职位。这个报纸是领导着极左翼的克列孟梭創办的。

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按照馬克思的观点来看却更为有利。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热心地閱讀并且更为重視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在年輕的俄国学者当中，馬克思拥有許多信徒，甚至还有一些私人朋友。但是当时俄国的群众运动——如果說得上是群众运动的話——的两大派別即民意党和黑分党⁴⁷⁶，却同他的观点和学說毫不相干。这两个派別都是完全站在巴枯宁的立場上的，至少以它們最重視农民这一点而論是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它們的主要問題表述如下：俄国的农民村社，这种当
547 时已經大大衰落了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直接过渡到更高級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呢，还是必須首先經歷西欧历史发展所曾經經歷过的那种瓦解过程？

对于这个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給維拉·查苏利奇譯的《共

产党宣言》俄文新版写的序言中作了“目前唯一可能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能够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俄国村社土地所有制就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这个观点说明了马克思所以热烈同情民意党的原因；这个党的恐怖政策已经使沙皇成为被革命拘禁在加特契纳⁴⁷⁷的囚徒。对于放弃革命政治活动而只限于进行宣传的黑分党，马克思却抱着比较严厉的态度。可是，那样大力地把马克思主义精神灌输到俄国工人运动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却恰恰是这个党的成员。

最后，英国也露出一线光明。1881年6月，一本题为《一切人的英国》的小书出版了。这本书是海因德曼写的，算是民主党人联盟的纲领。民主党人联盟是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种激进团体（一半是无产阶级的，一半是资产阶级的）中产生出来的组织。有关劳动和资本的几章几乎可以说一字不差地转述甚至照录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海因德曼既没有提到《资本论》，也没有提到它的作者。他只是在序言的结尾处说，他这本书的理论内容以及相当大一部分实际材料都应归功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海因德曼引用马克思的著作的这种奇特方式已经够使人不快了，而他在马克思面前表白自己的一番话则更给人一种恶劣的印象。他说，马克思的名声很不好，英国人不喜欢受外国人教训，等等。从此马克思就和海因德曼断绝了关系，并且认为他是一个“靠不住的家伙”。

但是，同一年在英国的一家月刊的12月号上发表的贝尔福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页。

特·巴克斯的一篇論馬克思的文章⁴⁷⁸，却使馬克思很為滿意。固然，馬克思發現這篇文章里所引用的傳記資料有許多錯誤，而關於他的經濟原理的敘述也有許多不正確和混亂的地方，但它是英國
548 所發表的第一篇充滿了對最新思想的真正熱情並且大膽地向英國庸人挑戰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倫敦西區的牆上用大字廣告加以宣傳，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馬克思把這件事寫信告訴了左爾格。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這個向來如此漠視毀譽的鋼鐵般的人這一次稍稍有點感到得意了，而這是完全可以諒解的。這封信是在內心深為激動的情況下寫的，這一點從馬克思的最後一句話可以看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早在11月30日就接到了這一期雜誌，而這篇文章使我的親愛的妻子在最後的日子裡得到了一些快樂。你知道，她對這些事情向來是多麼深切地感興趣的。”馬克思夫人在1881年12月2日逝世。

（五）暮色

正當政治地平綫上到處都豁然開朗——而這對馬克思來說總是最重要的事——的時候，暮色卻日益逼近馬克思本人和他的家庭。自從歐洲大陸拒他於門外而不讓他到溫泉去進行療養以後，他的舊病復發了，這使得他或多或少喪失了工作的能力。從1878年起，他就沒有為完成他的主要著作而工作。差不多在同一个時候，或者稍晚一些，他又開始為他妻子的健康擔憂了。

馬克思夫人由於一向具有和諧心靈的幸福的寧靜，因而得以享有一個比較無憂無慮的晚年。這一點，馬克思夫人在因左爾格

的妻子失去两个正当少壮的孩子而写信去安慰她时也谈到过：“这种事情是多么沉重，在这样的损失之后需要多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心灵的平衡，这在我是太熟悉了。但是生活却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忧虑、日常的琐碎的操心事和微小的烦恼帮了我们的忙。那重大的悲痛逐渐被每天的眼前痛苦所麻痹，于是我们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间减轻了。当然，创伤并不会彻底痊愈，尤其是在一个母亲的心上。但是在心灵中却会逐渐产生对新的痛苦和新的快乐的新的感受力，甚至新的敏感性，于是你就会怀着一颗破碎的同时又充满了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颗心最后停止跳动而永恒的宁静终于来临为止。”又有谁比这位饱经忧患和艰苦奋斗的妇女更配这样轻松地死去，更配这样从容地辞别人世呢？然而她却沒有这样从容安息的福分：在她停止呼吸以前，她还得忍受 549 极大的痛苦。

1878年秋天，马克思初次写信告诉左尔格说，他的妻子“健康情况很不好”^①。一年后，他就写道：“我的妻子的病仍很危险，我自己也远沒有完全复原。”^②在长久不能确定病因之后，终于判明马克思夫人患的是癌症，这种病将使她在可怕的痛苦中慢慢地然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只要想一想这位妇女在漫长的一生中对马克思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此感到多么沉重。她自己则比她丈夫以及所有身边的人更为沉着坚定；她以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抑制着自己的痛苦，在家人面前经常做出快乐的样子。1881年夏天，当她的病严重恶化的时候，她还有勇气到巴黎去看她的两个已婚的女儿。由于病情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医生們也同意她去作这次冒險的旅行。馬克思在1881年7月22日給龙格夫人的信中通知她說，他們两个就要到她那里去：“請馬上回信，因为你媽媽在得知你要她从倫敦給你帶什么东西去以前，是不肯动身的。你知道，她喜欢張罗这样的事情。”^①这次旅行就馬克思夫人的病情所允許的情况來說，进行得总算是順利的，但是在回来的时候馬克思自己却害了胸膜炎，并发了支气管炎甚至初起的肺炎。这场病非常危險，但是多亏爱琳娜和海倫·德穆特的自我牺牲的悉心看护，終于平安地过去了。关于这些悲惨的日子，爱琳娜写道：“在前面的大房間里躺着我們的母亲，旁边小房間里躺着摩爾。这两个难舍难分、相依为命的人竟不能再同居一室。

.....

摩爾又一次战胜了病魔。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已經有力气走到母亲房里去了。他們在一起又都变得年輕起来，像是一对正在共同走进生活的、热恋中的少男少女，而不像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翁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正在彼此永远訣別。”^②

当1881年12月2日馬克思夫人逝世的时候，馬克思的身体还很弱，因此医生不允許他伴送他的爱侶的这段最后的旅程。馬克思在給燕妮·龙格的信中說：“我遵从了医生的命令，这也是因为亲爱的亡人在臨終前几天曾表示希望不要举行什么仪式；她說：‘我們不注重外表’……

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她很快就咽了气…… 正像唐金医生向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142頁。

② 參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頁。

我預言的那樣，這個病具有一種逐漸虛脫的性質，就像由於衰老所致一樣。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沒有臨終的掙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鄉；她的眼睛比任何時候都更大，更美，更亮！”^①

恩格斯在燕妮·馬克思的墓前發表了演說。他稱頌她是她丈夫的光榮而忠實的伴侶，並且用下面的話結束了他的演說：“用不着我來談她個人的種種品德。這些品德，她的朋友們都知道，並且永遠不會忘記。如果曾經有過一位以使別人幸福為自己的最大幸福的婦女，那就是她。”^②

(六) 最后一年

馬克思比他的妻子只多活了十五個月。但是在這整個期間，他的生活只不過是一種“慢性死亡”。恩格斯在馬克思夫人逝世的那天說過：“摩爾也死了”，這話是說得不錯的。

由於在這個短時期內兩位朋友多半分居兩地，因此他們的通信最後還活躍了一個時期。馬克思的生命的最後一年就在這些通信中陰郁而壯麗地逝去。頻頻發作的病痛破壞了他的安寧。人類的無情命運就這樣摧毀了這位思想和行動的巨人。

只有那種為他畢生獻身的事業獻出最後一分力量的熱望，才把他仍同生活維系在一起。1881年12月16日他在給左爾格的信中寫道：“當我從最近的一場病中脫身出來時，我已經是一個雙重的殘廢人：精神方面，由於我妻子的去世而一蹶不振，生理方面，由於病後遺留下來胸膜硬化和呼吸道過敏的痼疾而衰弱不堪。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166、167頁。

② 同上書，第15卷，第599頁。

可惜，我还得把一些時間完全花費在恢复我的健康上面。”^①这段時間一直延續到他逝世的一天，因为恢复他的健康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的。

医生們起先把他送到威特島的文特諾尔，然后又把他送到阿尔及尔去。1882年2月20日他到了阿尔及尔，但是由于旅途寒冷而在路上再一次害了胸膜炎。不幸，阿尔及尔的这个冬天和春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多雨而寒冷。他在5月2日轉移到蒙特卡罗，但是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他患着胸膜炎，經過一次又湿又冷的旅行到了那里，然而那里的天气也一直很坏。

直到他在阿尔让台住到龙格夫妇家里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轉。大概家庭生活对这一点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馬克思在附近的恩吉安洗硫磺矿泉浴，也治好了他的老病支气管炎。然后，他和女儿劳拉一同到日内瓦湖畔的維維去住了六个星期，这也使他的健康情况大有起色。当他在9月回到倫敦时，他看上去精神很飽滿，而且时常毫不費力地同恩格斯登上高出他的住宅約三百英尺的汉普斯泰特荒阜。

馬克思打算重新开始工作，因为医生們虽不让他在此間过冬，却允許他在英国南部沿海过冬。当11月的雾季开始时，他就动身到文特諾尔去，但是在那里也像春天在阿尔及尔和蒙特卡罗一样，又遇到阴湿多雾的天气。他又患了感冒，不能在新鮮空气里作有益健康的活动，而只能蜷居室内，以致身体越来越衰弱。科学研究工作是根本談不到了，尽管馬克思对科学上的一切发现，甚至那些与他的工作範圍并无密切关系的科学发现（例如德普勒在慕尼黑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171頁。

电气展覽会上所作的种种試驗)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他的书信一般都流露出一种抑郁沮丧的情緒。当年輕的法国工人党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时,他对他的女婿們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也感到不滿,“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魯东主义者,而拉法格則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們見鬼去吧!”^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脫口說出了一句后来常被一切庸人所利用的話,即:他本人無論如何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⁴⁷⁹。

1883年1月11日,他的女儿燕妮的意外的死訊給了他致命的最后一击。就在第二天,馬克思带着严重的支气管炎回到倫敦,同时并发的喉头炎使得他几乎不能吞咽。“他以坚忍的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只好成公升地喝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相应的硬食。”^②2月間,肺部发生膿肿。由于十五个月来不断服 552
用各种药物,以致药物对他的身体已不再起任何作用,而只是使他食欲减退,消化不良。他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医生們还没有放棄希望,因为支气管炎已經差不多痊愈了,而吞咽食物也比較容易了。因此,死亡是意外地来临的。3月14日午后,卡尔·馬克思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安詳而毫无痛苦地长眠了。

恩格斯虽然对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深感悲痛,却也为这来得突然的死亡感到安慰。“医术也許能使他再拖上几年,使他毫无希望地消磨殘生而不是立刻死去,以此为医学技术增光。但这絕不是我們的馬克思所能忍受的。面对着許多未完成的工作,渴望去完成它們而又苦于无能为力,这样活着对他來說会比安然死去痛苦千倍。他常喜欢讲伊壁鳩魯說过的一句話:‘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

①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4卷,第652頁。

② 參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1頁。

幸，对于生者才是不幸。’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着这位偉大的天才憔悴衰老，消磨殘生，去給医学增光，去受他在年富力強時痛罵過的庸人們嘲笑，——不能！他的逝世要比這強過千倍，我們後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要比這強過千倍。”^①

3月17日，星期六，馬克思被安葬在他夫人的身旁。他的家人十分明理地免除了“一切儀式”，因為那會顯得和馬克思的一生極不調和。只有幾個忠實的朋友站在墓穴旁邊：恩格斯，馬克思早在共產主義者同盟時期的兩個老同志列斯納和羅赫納，從法國來的拉法格和龍格，從德國來的李卜克內西，還有兩位著名的科學家——化學家肖萊馬和生物學家雷伊·郎凱斯特。

恩格斯用英語向他的亡友致最後的告別詞。他簡短、誠懇而又真實地表述了馬克思對於人類曾經具有並且將永遠具有的意义。我們就用恩格斯的這些話作為本書的結束：

“3月14日下午兩點三刻，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讓他一個人留在房裡還不到兩分鐘，等我們再進去的時候，他已經坐在安樂椅上靜靜地睡去了——永遠睡去了。

553 這個人的逝世，對於戰鬥着的歐美無產階級，對於歷史科學，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位巨人的逝世所造成的虛空，我們不久就會感覺到。

正如達爾文發現生物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迄今為各種思想體系所重重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有了衣食住，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活動；所以，直接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

^① 參閱《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402頁。

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形成为基础，而当时人们的国家制度、法律观点、艺术乃至宗教观念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就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来加以说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本末倒置。

而且不止于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过去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暗中摸索，而随着剩余价值的发现，这一领域就豁然开朗了。

一个人能有两种这样的发现，已可说是不虚此生了。甚至只有一种这样的发现，就算是幸福的了。可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方面，甚至在数学方面，都有独到的发现。他研究的范围很广，而且没有一种研究是肤浅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的。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一种新发现，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效果的新发现都使他感到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刻会对工业和整个历史发展发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的各种发现的进展，不久前还注意到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采取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第一个使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就是他的本分。能像他那样热情、顽强而卓有成效地斗争的人是不多的。1842年任《莱茵报》的编辑；1844年参加巴黎出版的《前进》554


報》的編輯工作；1847年為《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撰稿；1848年到1849年出版《新萊茵報》；1852年到1861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寫作許多戰鬥性的小冊子；參加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的各個組織的工作；最後，創立了集這一切工作之大成的偉大的國際工人協會，——確實，一個人即使沒有做過其他任何事情，只此一件也足以使他感到自豪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是遭人嫉恨和受人誣蔑最多的人。無論專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曾把他驅逐出境；無論保守的資產者或極端民主的資產者都爭先恐後地紛紛誹謗他，詛咒他。他把這一切當做蛛網一樣抹去，不予理睬，只是在迫不得已時才給以答復。現在他逝世了，受到整個歐洲和美洲——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千百萬革命戰友的崇敬、愛戴和哀悼，而我敢大膽地說：他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過一個私敵。

他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①



^① 參閱《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3—405頁。



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无论就本书的性质或本书的目的而言，给它附上一个学术性的参考书目 555 都是不适宜的。因此我只限于略做说明，给那些想深入探讨个别问题的读者指出一些主要途径，以便使他们自己能按照这些主要途径容易地找到岔出去的小路。

在有关马克思的大量的、日益增加的文献当中，传记性的作品是比较少的。诚然，短篇的传略一直是有的，但是这些作品一般错误都很多，而且随着这些东西日益频繁地辗转传抄，它们也就变得越来越淡薄无聊。恩格斯第一次使这方面有了一些头绪：他先是在白拉克的《*Volkskalender*》〔《人民历书》〕(1878年)上发表了一篇传略〔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页〕。继而他又为《*Handwörterbuch für Staatswissenschaften*》〔《政治学辞典》〕(耶拿，1892年；第5卷，第1130页以下)写了一篇有关马克思的文章〔恩格斯：《亨利希·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下卷，第255—261页〕，这篇文章虽然十分可靠，却仍不免有个别错误。

在传记作品当中还有一部作品是值得注意的：威·李卜克内西：《*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s. Ein Lebensabriss und Erinnerungen*》〔《忆马克思。传略与回忆》〕(纽伦堡，1896年；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150页)。该文所叙述的主要限于50年代的事情；但是如果把许多个别不确切的地方抛开的话，它是对这一时期作了出色的描写的。克拉拉·蔡特金的一个为发表而加以扩充的报告《*Karl Marx und sein Lebenswerk*》〔《卡尔·马克思及其生平事业》〕(爱北斐特，1913年；俄译本，莫斯科，1922年)，虽然具有另一种形式，却同样以其热情的笔调而著名。这一著作是建立在对题材的深切理解上的，并由于它的附录而把读者一步一步地引入马克思的蕴藏在他的著作中的那个思想世界，从而具有特殊的价值。相反地，约翰·斯巴哥的《*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纽约，1910年；俄译本，列宁格勒，1924年)却是一个道地

的拼拼湊湊的作品。

馬克思傳記的主要史料(有关1850年以前的)是四卷的所謂«Nachlassausgabe»〔《遺著》〕, 尽管它早已不是馬克思的遺著中的唯一出版物(全名: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herausgegeben von F. Mehring» 556 〔《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薩尔遺著。梅林編》〕)(斯图加特, 1902年)。这部作品总算安然地度过了几乎十五年, 在1913年第2版的引言中对某些細节作了訂正。古斯达夫·迈尔关于«Rheinische Zeitung»〔《萊茵报》〕、关于«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以及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大大地补充了第1卷, 而后来被伯恩施坦所发现并被发表在«Neue Zeit»〔《新时代》〕(第33卷, 上卷, 第19頁以下)上的拉薩尔給馬克思的五封信則补充了第4卷。在这一出版物的引言和注释中, 我根据手稿和已出版的資料闡述了許多傳記性的材料, 因此本书的前几章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是这些东西的摘录而已。

第二个主要史料(有关1850年到1870年二十年間的)是四卷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全名: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 bis 1883, herausgegeben von A. Bebel und Ed. Bernstein» 〔《1844年至1883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編》〕)(斯图加特, 1913年)。这一宏伟的作品甚至受到敌人的巨大尊敬。在学术著作中对这一著作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的, 我想指出: 伯恩施坦在«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庫》〕(第38卷)中的著作; 古·迈尔在«Zeitschrift für Politik»〔《政治杂志》〕(第7卷)中的著作; 梅林在«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庫》〕(第5卷)中的著作; 海·翁肯在«Preußische Jahrbücher»〔《普魯士年鉴》〕(第155卷)中的著作; 施穆勒在«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立法、行政和国民經济年鉴》〕(第39卷)中的文章。

第三个主要的史料(有关1870年到1883年間)是同左尔格的通信(全名: «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oh. Phil. Becker, Jos. Dietzgen,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an F. A. Sorge und andere» 〔《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給左尔格等人的书信和书信摘录》〕)(斯图加特, 1906年)。书信原件和其余的手稿材料都被左尔格交給了規模巨

大的纽约公共图书馆。

通信方面的那些篇幅较小的出版物（同库格曼、魏德迈、弗莱里格拉特等人的通信），我在谈到这些人时再加以列举。在这里我只认为有义务怀着真挚的感谢心情提一提在我的全部写作期间卡尔·格律恩堡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所给予我的支持。这一杂志尽管办得时间不很久，却由于它的主编极其能干而成为一切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

青年时代 使我获得有关马克思的系谱资料的诉讼文件，我是在维也纳的毛特涅尔和巴本海姆二氏的极为完善的图书馆里看到的。再参阅梅林：《Splitter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有关卡尔·马克思传记的零星资料》〕，载《新时代》，第29卷，上卷，第4页（附有关博士考试的若干细节材料）。梅林：《Die von Westphalen》〔《冯·威斯特华伦一家》〕（载《新时代》，第10卷，下卷，第481页）。

黑格尔的弟子 爱琳娜·马克思在《新时代》（第16卷，上卷，第4页）上全文刊载了马克思给双亲的信。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科本：《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 557（莱比锡，1840年）；布鲁诺·鲍威尔：《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复类福音作者批判史》〕（莱比锡，1841年）；卢格：《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通信和日记》〕（柏林，1886年）。《Doktor-dissertation》〔《博士论文》〕（载《遗著》，第1卷，第63页；中译本《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Anekdoten zur neuest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苏黎世，1843年）；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的《莱茵报》全份保存在柏林王室图书馆。古·迈尔的《Die Anfänge des politischen Radicalismus im vor-märzlichen Preußen》〔《三月革命前普鲁士政治激进主义的开始》〕（载《政治杂志》，第6卷）提供了从档案中搜集来的有关这一报纸的历史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方面的演变情况的丰富资料。伯恩施坦于1902年在他的《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社会主义文献》〕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卢格的八封信对于阐明报纸的内部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这一报纸上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现在已收入《遗著》，第1卷，第171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5页以下）。再参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通信与遗著》〕（海得尔堡，1874年）。

流寓巴黎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这

唯一的一部包括头两期的双期合刊号是1844年3月在巴黎出版的。作为引言的通信,还有发表在那里的馬克思的两篇論文和恩格斯的两篇論文現在被編入了《遺著》的第1卷,第360頁(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07—418、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頁)。古·迈尔的《Der Untergang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und des Pariser «Vorwärts!»》〔《〈德法年鑑〉和巴黎的〈前进报〉的消亡》〕(載《Grünbergs Archiv》〔《格律恩堡文庫》〕,第3卷)提供了有关該杂志的历史的档案材料,卢格,《Aus früherer Zeit》〔《回忆录》〕(柏林,1886年)。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理論中属于自己的精神财产的那个东西,見于1852年3月5日他写給魏德迈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452頁〕。參閱梅林:《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Marx und Engels》〔《有关馬克思恩格斯傳記的新資料》〕(載《新時代》,第25卷,下卷,第163頁)。再參閱普列汉諾夫:《Über die Anfänge der Lehre vom Klassenkampf》〔《阶级斗争学說的最初阶段》〕(載《新時代》,第21卷,上卷,第275頁;中譯文載《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卷,第512—570頁)和罗特施坦:《Verkünder des Klassenkampfes vor Marx》〔《馬克思以前阶级斗争的宣告者》〕(載《新時代》,第26卷,上卷,第836頁)。有一整份《前进报》現存維也納市立圖書館;馬克思在这一報紙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論文收入《遺著》,第2卷,第41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年輕的恩格斯可以說是被古·迈尔在他的文章《Ein Pseudonym von Friedrich Engels》〔《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笔名》〕(載《格律恩堡文庫》,第4卷)中重新發現的。恩格斯給他青年时的几个友人的信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这些信被迈尔发表在《Neue Rundschau》〔《新观察》〕(1913年9月和10月号)上。我們希望迈尔准备詳細論述恩格斯早期文学和政治活动的著作能够早日問世。恩格斯和馬克思合著的《Die Heilige Familie》〔《神圣家族》〕(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3—268頁),轉載在《遺著》第2卷上并附有詳細的注釋。恩格斯:《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萊比錫,1845年;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69—587頁)。

亡命布魯塞爾 伯恩施坦在他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轉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施蒂納的論战著作的一些大的片断。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真正

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参阅《遗著》第2卷。魏特林：《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Mit einer biographischer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von Mehring〔《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附梅林所著的传记性引言和注释〕（柏林，1908年）。蒲鲁东：《Correspondance》〔《通信集》〕，第2卷，第198页。马克思：《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哲学的贫困》〕（斯图加特，1885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71—198页）。在党的档案库中保存有几乎一整份的《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收入《遗著》第2卷。保存下来的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比較少的材料，现在编入马克思：《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in Köln》，Mit Einleitung von Engels und Dokumenten. Vierter Abdruck mit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 von Mehring〔《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附恩格斯的引言和有关文件。第四版附梅林的引言和注释〕（柏林，1914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57—536页）。贝尔特兰：《Die socialdemokratische Bewegung in Belgien vor 1848》〔《1848年前比利时的社会民主运动》〕（载《新时代》，第23卷，下卷，第277页）。罗特施坦：《Aus der Vor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国际前史》〕（载《新时代》，增刊第17号）。威·沃尔弗：《Gesammelte Schriften》，herausgegeben von Mehring〔《威廉·沃尔弗全集》。梅林编〕（柏林，1909年）。马克思：《Lohnarbeit und Kapital》，Mit Einleitung von Engels〔《雇佣劳动与资本》。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1891年；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7—83页）。马克思恩格斯：《Kommunistischer Manifest》〔《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61—504页）。经过作者之一重新审订过的最近一版是1890年在柏林出版的。

革命和反革命 《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莱茵报》〕——它的许多社论载《遗著》第3卷。梅林：《Freiligrath und Marx in ihrem Briefwechsel》〔《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的通信》〕（载《新时代》，增刊第12号）。拉萨尔和马克思——参阅《遗著》第4卷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58年版）第2、3卷。

流寓伦敦 《Revue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新莱茵报评论》〕。单行本的出版物有马克思：《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

reich 1848 bis 1850». Mit Einleitung von Engels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 1895年; 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1卷, 第95—218頁); 其他作品, 其中包括許多每月述評与书評, 以及恩格斯的«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559 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第7卷, 第127—235頁; 載《遺著》第3卷)。关于金克尔案件的詳細說明最初見于以档案資料为依据的几篇文章中,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1914年的《普魯士年鉴》上。关于伦敦流亡者的生活, 參閱梅林的«Neue Beiträge» [《新資料》]; 这些資料是从馬克思同魏德迈的通信中得来的。馬克思: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斯图加特, 1914年; 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1卷, 第219—321頁)。馬克思: «Ent-hüllungen»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8卷, 第457—536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 在这一章里所闡述的資料基本上是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取得的; 在这里我們对个别細节的資料来源就略而不提了。

克里木战争和危机 由于这一章已經付印, 所以我来能为这一章利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列一书: «Gesammelte Schriften 1852 bis 1862», herausgegeben von N. Rjasanoff [《馬克思恩格斯1852—1862年間著作集》。梁贊諾夫編](斯图加特, 1917年)。这一著作的前两卷(到1855年)已經有一千頁以上了; 还有两卷沒有出版。但是已經出版的两卷, 作为傳記資料来看, 价值是不大的, 以致我并不需重新审訂或是补充我的本文。一般說来, 只是加深了这样一个印象, 即为«New-York Daily Tribune» [《紐約每日論壇报》]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馬克思必須忍受的苦难的最輕的部分。德納不是报纸的真正所有者, 而只是它的真正所有者——格里利和麦克·埃克拉特——的代理人这样一个事实, 还不能使我們有理由像編訂者那样得出結論說, 德納对馬克思的态度不管怎样还是正确的。馬克思在同他的十年交往当中决沒有料到, 德納不过是在患难之中对他表示同情的一位朋友。梁贊諾夫所編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兩卷的文章与短評具有十分不同的价值; 它們的一部分, 作为附带的但是內容丰富的作品, 可以补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作品, 而另一部分, 特别是編入第2卷的那部分, 則不过是“地地道道的报纸通訊”; 把这些文章拿来重新发表, 恐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不满意的。关于在这一章中所提到的烏尔卡尔特、哈尼、琼斯和其他人, 參

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古·迈尔: «Zwei unbekannte Briefe von Marx an Lassalle» [《馬克思給拉薩尔的两封人們所不知道的信》] (1855年), 載«Frankfurter Zeitung» [《法蘭克福報》] (1913年8月10日)。馬克思: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政治經濟學批判》] (柏林, 1859年;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13卷, 第3—177頁)。

王朝的兴替 恩格斯: «Po und Rhein»; «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zwei Abhandlungen, herausgegeben von Bernstein [《波河与萊茵河》; 《薩瓦、尼斯与萊茵》。伯恩施坦編的两篇論文] (斯图加特, 1915年;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13卷, 第247—299頁, 第633—680頁)。拉薩尔: «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 (柏林, 1892年)。福格特: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我对〈总汇报〉的控告》] (日内瓦, 1858年)。馬克思: «Herr Vogt» [《福格特先生》]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馬克思同拉薩尔、弗萊里格拉特、魏德迈的通信, 特别是同恩格斯的通信。

国际的創始 有关国际的較早的著作(戴斯社、維列塔爾等人的著作)完全过时了; 魯道夫·迈耶尔的«Emanz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 [《第四等級的解放斗争》] (柏林, 1874年), 只要加以必要的注意, 有时是可以利用的。耶克的«Die International» [《国际》] (萊比錫, 1904年; 俄譯本, 莫斯科, 1926年第2版) 是对这个伟大組織的历史进行科学論述的第一个嘗試。耶克最初作为紀念国际成立四十周年的报告而写的这册小书, 現在讀起来还有用处。它只是在一个方面, 誠然是重要的方面陈旧了, 这就是它片面地尖銳指責一切具有非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分子, 特别是巴枯宁。耶克沒有充分看透吳亭的陰謀和波克罕的捏造, 而过分相信馬克思有关巴枯宁的同盟的那本小冊子。除去耶克的著作之外, 还有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六个年度的《先驅》(从1866年到1871年), 仍然是有关国际历史的比較好的參考資料。关于施韦澤的所謂背叛, 当然我在正文中沒有再提一个字。关于这一点參閱施韦澤的«Politische Aufsätze und Reden», herausgegeben von Mehring [《政治論文与演說》。梅林編] (1912年)。古·迈尔: «J. B. von Schweitzer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馮·施韦澤和社会民主党》] (耶拿, 1909年)。

对施韦澤的为人和他的政策作了精彩描述的是亨·勞芬堡: «Geschichte

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im Hamburg, Altona und Umgegend» [《汉堡、阿尔托納及其近郊的工人运动史》] (汉堡, 1901年)。倍倍尔: «Aus meinem Leben», 2. Band 1—137 («Die Periode des Herrn von Schweitzer») [《自传》, 第2卷, 第1—137頁(《馮·施韦泽先生时期》)] (俄譯本:《倍倍尔自传》, 列宁格勒, 1925年)。倍倍尔只是重复旧的, 早已被駁倒的指責, 却没有对反駁进行批判。关于1865年国际的伦敦會議, 參閱麦·巴赫在《新时代》(第20卷·上卷, 第549頁)上的文章。«Briefe von Karl Marx an L. Kugelmann» [《卡尔·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 (載《新时代》, 第20卷, 下卷, 第26頁; 中譯本:《致庫格曼书信集》,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資本論》 論述学說史的《資本論》第4卷的全部保存下来的断片都被考茨基編为一部书出版: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剩余价值学說史》] (斯图加特, 1905年; 中譯本:《剩余价值学說史》, 三联书店1957年版)。所有有关《資本論》的通俗解释的作品所以都过时了, 只是因为这些作品仅限于論述《資本論》第1卷。第1卷的“大众版”是考茨基191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有关这一經典著作的大量文献, 其特色与其說是它們的內容, 无宁說是它們的篇幅, 而且不仅仅对于反对者才可以这样說。就知識的淵博, 語言的华美, 探討問題时邏輯上的明确性和思考的独立性而論, 就进一步發揮《資本論》的思想这一点而論, 罗莎·卢森堡的«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Ein Beitrag zur ökonomischen Erklärung der Imperialismus» [《資本积累論。关于从經濟上解释帝国主义的問題》] (柏林, 1913年; 俄譯本:《資本积累論》, 第1—2卷, 第5版, 莫斯科, 1934年)是最接近于这部典范著作的。所謂奥地利馬克思主义者(埃克施泰因、希法亭等人)將此书批評得体无完肤的那种手法, 乃是馬克思主义僧侶的拿手好戏。

国际的全盛时代 本章和下一章的参考資料除去《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和報紙《先驅》之外, 还应当注意到有关巴枯宁的文献: 巴枯宁: «Oeuvres» [《著作集》] (第1—6卷, 巴黎, 1907—1913年)。詹姆斯·吉約姆: «L'Internationale. Documents et Souvenirs» [《国际。文件与回忆》] (巴黎, 1905—1910年)。麦克斯·涅特劳: «Bakunin und die Internationale in Italien bis zum Herbst 1872» [《巴枯宁和1872年秋天以前意大利的国际》] (載《格律恩堡文庫》, 第2卷, 第275頁); 麦·涅特劳: «Bakunin und die Internationale in Spanien 1868—1873» [《巴枯宁和1868—1873年間西班牙的国际》] (載《格律恩堡文庫》, 第4卷, 第243頁)。麦·涅特劳: «Bakunin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von 1868—1873》〔《巴枯宁和 1868—1873 年間的俄国革命运动》〕(載《格律恩堡文庫》，第 5 卷，第 357 頁)。勃魯普巴赫爾：《Marx und Bakunin》〔《馬克思和巴枯宁》〕(慕尼黑，1913 年)。如果我着重強調了这批文献对于研究国际历史的必要性，那末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真正的智慧和真理。恰恰相反，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的作者完全合理地要求公正地对待巴枯宁，但是却沒有要求同样公正地对待馬克思。然而，不可听一面之詞这句老話对于写历史也是适用的。斯切克洛大的《Michael Bakunin》〔《米哈伊尔·巴枯宁》〕(斯图加特，1913 年；俄譯本：《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巴枯宁的生平和事业》，莫斯科，1926 年版)是一部好书。作者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故去的巴枯宁采取公正的态度。《机密通知》全文刊載在給庫格曼的一封信里(載《新时代》，第 20 卷，下卷，第 472 頁；載《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92—96 頁)。

国际的衰微 馬克思：《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mit Einleitung von Engels〔《法兰西内战》。附恩格斯的导言〕(柏林，1891 年；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 卷，第 452—525 頁)。这一著作包括国际关于战争和公社的三篇宣言。馬克思在信中談到的有关公社的意見，參閱《新时代》，第 20 卷，上卷，第 708 頁。起义期間馬克思同公社委员会委員所进行的通信的少数断片，收入《新时代》，第 29 卷，上卷，第 734 頁。《Mémoire présenté par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à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de l'Internationale》〔《国际工人协会犹拉联合会致国际各联合委员会的备忘录》〕(桑維尔耶，1873 年)。《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 Circulaire privé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所謂国际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机密通告》〕(日内瓦，1872 年；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8 卷，第 7—55 頁)。麦·巴赫：《Die Spaltung in der englischen Internationale》〔《英国国际的分裂》〕(載《新时代》，第 21 卷，下卷，第 21 頁)。《Ein Komplot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不伦瑞克，1874 年(所謂《Allianzbroschüre》〔《同盟小册子》〕)。

在这里就考茨基和梁贊諾夫极力要扼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本书的企图讲几句话，看来是合适的。

尽管我关于拉薩尔所說的一些异端的言論引起了考茨基对我的公开警告，說我“反对馬克思”，还說我“辜負”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但是我依然公开地坚持执行自己的写作傳記的計劃。不仅如此，我甚至敢于在杂志《新时代》⁶⁶²上我所主編的《杂感栏》里（參閱《新时代》，第31卷，下卷，第985頁）評論勃魯普巴赫尔关于馬克思和巴枯宁的著作时不把这部书罵得狗血噴头。我指責这部书对馬克思进行了某些攻击并有不公正之处，但我仍然說它是一部“有益的和值得贊揚的书”，因为它消除了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者对巴枯宁所作的一系列不公正的指責，而在这些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决沒有把我自己排除在外。我的評論的主要內容可以归結为，国际是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之后死亡的，因此，它的死是一个无比光荣的死，而决非死于那些丧尽天良的蠱惑家的卑鄙阴谋之手。

我所讲的只限于这些，但是梁贊諾夫却針对着我的短短六頁的文章发表了篇幅在十倍以上的一个小冊子，而考茨基还乐于为这小冊子提供《新时代》上面的篇幅（參閱梁贊諾夫：《Sozialdemokratische Flagge und anarchistische Ware》〔《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的商品》〕，載《新时代》，第32卷，上卷，第5、7、8、9、10和13期）。当然，梁贊諾夫一句話也沒有談到我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結論。甚至他为了歪曲我的話或是夸大由于我的疏忽而造成的一些不重要的毛病而想从我的文章中找到的两三个錯誤，也同我认为本质上是最重要的东西毫无关系。他的目的就在于把我說成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既无相应的知識，又无判断能力，甚至沒有应有的善意来总括地論述馬克思。經過他的描述，我可以說成了挂在集市摊子上的那些塗着朱紅顏色的鬼脸，而那摊販就站在这些鬼脸前面吆喝着：“瞧这怪玩意儿吧！”

梁贊諾夫当然是十分适于扮演这种摊販的角色的。他是这样一种文体的能手，这种文体是他从他素所欽佩的波克罕那里学来的，而关于这种文体馬克思曾說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話：“只要是他一拿起笔来，那就糟了！他既缺乏机智，又无风趣。而且他沒有任何必要的知識修养。他很像是为了打扮自己的面孔而把各种顏色刺到面皮里去的野人。他总爱玩弄一套陈腔濫調。几乎他的每一句話都本能地戴上一頂小丑的尖帽。”但是梁贊諾夫却不仅仅是本能地这样做的。如果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而摆出一副严峻的面孔的話，那末这个“严肃的研究者”（他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和自己一类的人物）就变成了一个拙劣的伪造者。为了在自己的小冊子里面向我开几个卑劣的玩笑，他把波克罕1869年夏天在格維多·魏斯所出版的《Zukunft》〔《未来报》〕

上发表的反对巴枯宁的一系列文章的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在这里梁赞诺夫引了我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我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未来报》的编辑部，而在同一个地方还指出我参加编辑部的时期是1870年1月。梁赞诺夫把这个日子满不在乎地抛到字纸筐里去，并且捏造出一个说法，好像我在1869年6月25日，而且正是在6月25日，在《未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一来，他就通过小小的隐瞒和小小的伪造给自己扫清了一块场地，然后就得意洋洋地嘲笑起所谓我在《未来报》编辑部所扮演的那个“小毛孩子”的角色，虽然，在1869年的夏天，我同该报编辑部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最疏远的关系。连资产阶级杂志对社会民主党的作家都耻于干出的这种蠢事，考茨基竟然毫不躊躇地在二十年来我极其热心为之撰稿的《新时代》上干出来。

但是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西塞罗对卡提利纳的指责吧：在头一页上他们就指责我，说我在评论勃鲁普巴赫尔的文章里叫卖“最腐朽的商品”，⁵⁶³并且引起了这样的危险，即“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把无政府主义者先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发出的那一切指责，如所谓诽谤狂、无耻的谎言、伪造、隐瞒蒙混、道德感的空前混乱等等，偷偷地运进党的文献”。如果在小册子的第一页上，这种危险还只是“迫在眉睫”的话，那末在第二页上，它已经开始出现，说我“对伟大的死者进行了用道德来粉饰、用伪善来掩盖的谩骂”。我的一条最严重的罪名是，我想搞掉现代工人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而把巴枯宁推出来代替他作为真正的教主，或者用梁赞诺夫本人的那种插科打诨的调子来说，我想把“马克思说成是克罗狄乌斯，把巴枯宁说成是哈姆雷特的父亲，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说成是王后，而把梅林说成是哈姆雷特，这个哈姆雷特想再一次劝说王后，要把比较坏的一半抛除，而同另一半更加贞洁地继续生活下去”。跟着，梁赞诺夫就又从这悲剧的高潮陷入他更加熟悉的小丑胡闹的境地，并且指责我，说我盲目相信勃鲁普巴赫尔和吉约姆的“令人作呕的”胡说，而根据这两个人的说法，马克思的国际只是一件外衣，“这件外衣掩盖着一个由没有良心的和道德上迟钝的耶稣会教徒们组成的不信神的帮派”。

的确，梁赞诺夫也曾举出了两个减轻我的罪名的情况，第一是我的极大的无知，“对于对象只有表面的认识，而有关对象的文献，只要不是用德语发表的，就全然不知”。第二是我深感良心有愧，因为我诽谤巴枯宁比之诽谤吴亭和同他一伙的人还要厉害。梁赞诺夫也只有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才能给后面的这个说法找到根据。他闭口不谈我在他所引用的、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史》的一段話里为巴枯宁受到的这样一种指責辯护的事实，即他是出于純个人的动机才反对馬克思的。他还閉口不談我是用巴枯宁的教养和生活的过程本身来解释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論的。但是梁贊諾夫却加重点地引用了我后面这个本身是正确的說法，即在巴枯宁同馬克思进行斗争时，巴枯宁的个人虛榮心和个人嫉妒心“起了某种作用”。現在，在有关巴枯宁的所有新材料出現之后，我乐于放弃这个說法。但是“机智的”梁贊諾夫却完全錯誤地认为，我是由于这些新材料才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而把巴枯宁抬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思想領袖的地位上去的。如果梁贊諾夫以为我当时的評語是对巴枯宁的誹謗当中最恶毒的誹謗，那末或者是他不了解自己所喜爱的波克罕和吳亭（但这样的事情对于像他这样的“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是难以設想的），或者是他的确精神失了常。

单是这本东西就足以证明，要我来写馬克思的傳記无异于要驴子弹六弦琴。事实是否如此，請讀者看一下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再自己做出判断吧。这两章进一步詳細論证了我在对勃魯普巴赫尔的书的短評中所勾画的一个粗略的輪廓。被馬克思主义僧侶看成是难以补偿的罪行的，首先是在执行每一个历史学家应尽的义务时，我在巴枯宁和馬克思之間的爭論中不仅听取了馬克思派的证人的申述，而且听取了巴枯宁派的证人的申述；其次是，我按照每一个馬克思主义历史家的本分，把国际的历史不是看成是卑鄙无耻的阴谋家推翻毫无缺点的英雄的一出悲喜剧，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現象，而只有从伟大的历史联系上才能解释这一現象的兴起和灭亡。

564 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僧侶們已經談得够多了，因为考茨基本人通过他在1914年8月4日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以及他那臭名昭著的发现——国际“本质上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而“在战争时期則不是有效的工具”——已經足够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的特点。

最后十年 拉法格：《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an Karl Marx》〔《忆馬克思》〕（載《新时代》，第9卷，上卷，第10頁；載《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86頁）。馬克思：《Programmbrief》〔《关于綱領的信》〕（載《新时代》，第9卷，上卷，第561頁；參閱《哥达綱領批判》，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11—47頁）。在倍倍尔的《自传》（第2卷，第318頁）上可以看到恩格斯的一封信。斯切克洛夫：《Die bak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nach dem Haager Kongress》〔《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派的国际》〕（載《新时代》，增

刊第 18 号)。马克思关于东方战争的意见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 (第 156 页) 和李卜克内西的《Zur orientalischen Frage》〔《关于东方问题》〕(莱比锡, 1878 年) 一书的附录。关于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最初几年间的争论, 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和倍倍尔的《自传》。马克思夫人的最后一封信, 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 (第 151 页)。关于马克思最后的生病、去世和安葬, 参阅恩格斯同左尔格的通信 (第 186 页) 和苏黎世的《Sozialdemokrat》〔《社会民主党人》(周刊)](1883 年 3 月 22 日)。



譯者注釋

- 1 指梁贊諾夫发表在《新时代》第32卷上卷第5、7、8、9、10、13期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的商品》一文。参閱本书《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說明》(本书第668頁以下)。——第2頁。
- 2 原来是一句常常为人引用的拉丁格言。出自羅馬喜劇作家忒伦底烏斯的喜劇《自己折磨自己的人》(《Heautontimōrūmenos》)。原文为：“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原意是說:不管人达到怎样高的理性发展阶段,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終究是人,因而必然帶有人所固有的一切弱点。馬克思在1853年12月1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87頁),在1860年2月23日給弗萊里格拉特的信中(見本书第367頁),都曾用过这句格言。1865年,馬克思在他回答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一些問題的《自白》中也說:他最喜欢的格言是:“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参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5頁)。——第3頁。
- 3 伏尔泰写的著名史传性著作有:《查理十二传》(《Histoire de Charles XII》, 1731),《路易十四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XIV》, 1731)和《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帝国史》(《Histoire de l'empire de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1759—1763)等。他的著名史詩《亨利亚特》(《Henriade》, 1728)也是以眞实的历史人物、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主人公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充滿了軼聞和插話,以文笔生动优美著称。史詩《亨利亚特》則以丰富的想像,画一般的笔触,描繪了圣巴托罗繆的屠杀,巴黎的围城等等。伏尔泰有过一句名言:“除了枯燥无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見伏尔泰的喜劇《流浪子》[《L'Enfant prodigue》]的前言)——第3頁。
- 4 繆斯是希腊神話中司文艺和科学的女神,宙斯和姆涅莫辛娜的女儿,据古希腊詩人海西阿德說共有九个:优脱卜(司抒情詩和音乐),塔利亚

(司喜劇、牧歌), 美利波美娜(司悲劇), 泰爾普西霍拉(司合唱舞蹈), 愛拉脫(司愛情詩), 波麗欣尼亞(司贊歌), 烏拉尼亞(司天文學), 卡麗奧卜(司敘事詩), 克麗娥(司歷史)。此句喻指把歷史提高到藝術和科學的地位。——第3頁。

- 5 指著者將此書獻給克拉拉·蔡特金一事。參見本書里封的獻詞。——第4頁。
- 6 按希伯來語言譯為拉比, 原意為教師; 研究和負責解釋猶太教教律和教義的學者, 裁斷有關教律的爭執問題, 同時也是教團的領導者和祭司。——第5頁。
- 7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時曾為了維持普魯士軍國主義而鼓勵工場手工業和商業, 改革行政制度, 並曾準備解放農奴等。反動的沙文主義德意志史學會荒謬地給他以“大帝”的稱號。參閱注33。——第7頁。
- 8 拿破侖法典指法國在1804年頒布的民法典。這部法典的基本原則是徹底捍衛資產階級所有制。它援用於法國人占領的德國西部地區, 為資本主義關係在這一地區的發展开辟了道路。1815年萊茵省歸併普魯士後, 普魯士政府曾經力圖在萊茵省推行普魯士法律, 恢復貴族的封建特權, 遭到了萊茵省的堅決反對。——第7頁。
- 9 1819年9月20日德意志聯邦議會為了鎮壓日益高漲的大學生運動(參閱注29), 壓制自由氣氛, 根據所謂“卡爾斯巴德決議”(參閱本書第25頁腳注), 頒布了書報檢查令, 規定對二十印張以下的書籍進行檢查。這個檢查令的第二條曾允許對違背宗教的一般原則的個別宗教和某一宗教的一定內容加以批評(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1卷, 第11、13頁)。——第8頁。
- 10 莫澤斯·門德爾森是德國啟蒙時代的通俗哲學家, 出身於貧苦的猶太人教師的家庭。曾企圖從理性上證明神的存在和靈魂的不死。著有《斐多或論靈魂不死》(《Phädon oder über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1767), 《早晨或論神的存在》(《Morgenstunde oder über das Dasein Gottes》, 1785), 等等。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 “同一個朗格在他談到黑格爾的方法和對這種方法的應用時所說的話簡直是非常幼稚的。第一, 他完全不懂黑格爾的方法, 因而, 第二, 也就更加不懂我應用這個方法所做出的批判方式。在某一方面他使我想起了莫澤斯·門德爾森。這個不學無術的典型人物曾經寫信給萊辛, 問他為什麼想到要嚴肅地對待‘死狗斯賓諾

莎’！”（《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參閱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59 頁）馬克思在 1870 年 7 月 20 日給恩格斯的信中也曾說：“……这在哲学上完全是比莫泽斯·門德尔森毫无逊色的胡說，是卖弄聪明的、气势凌人的、自以为无所不曉的夸夸其談。”（《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參閱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392 頁）——第 8 頁。

- 11 甘斯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的編訂者。馬克思在柏林大学讀書時曾听过他的法学課程，在使馬克思轉向黑格尔哲学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是与反动的历史法学派（參閱注 18）相对立的一个法学学派的領袖。所謂小船的舵手当指此。——第 8 頁。
- 12 海涅生于杜塞尔多夫的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此处当指他于 1825 年改宗新教一事而言。——第 8 頁。
- 13 格奥尔格或約翰·浮士德是德国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据說生于士瓦本，自称为“哲人的哲人”，以医生、占星术者、魔术师、炼金术者的身分漫游德国和意大利各地。他认为地上的物质快乐具有最高的价值，并为了获得这种快乐而与恶魔交往，出卖灵魂，最后墮入地獄。这个傳說最初見于德文著述的是 1587 年在法兰克福的舒匹斯书店出版的《約翰·浮士德博士的生平》（《Historia von D. Johann Fausten》）。浮士德傳說成了許多文学作品和乐曲的主题。其中最著名的是歌德的長詩《浮士德》。歌德曾在《浮士德》中写道：

“人們的精神总是易于弛靡，
动輒貪爱着絕对的安靜；
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們的努力为能。”

（《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第 1 部，第 17—18 頁）

——第 9 頁。

- 14 七年战争是从 1756 年到 1763 年間以奥地利、法国、瑞典、薩克森、俄国和西班牙为一方，以普魯士、英国和葡萄牙为另一方之間所进行的战争。普魯士軍隊曾于 1757 年 11 月 5 日在罗斯巴赫（在德意志西部边境）附近战胜法軍，使普魯士国家得以免于崩潰的威胁。七年战争的结果，普魯士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疆界。——第 13 頁。
- 15 維尔夫們（Welfen）——德国公爵家族，在 11—12 世紀时特別强大，統治着巴伐利亚、薩克森公国及其他一些地区，13 世紀时这个公爵家族

- 的領地變成不倫瑞克一路涅堡公園。——第 14 頁。
- 16 这是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一书的献詞中所說的話，參閱《博士論文》，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4 頁。
- 17 埃德加爾·馮·威斯特華倫于 1846 年參加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曾在《反克利蓋的通告》上簽名（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3 頁）。——第 15 頁。
- 18 历史法學派是 18 世紀末產生于德國的法學中的一個反動學派。這一學派把國家和法看成是所謂“人民精神”自我發展的結果，維護當時德國現行的封建的法，反對對現行的法進行任何批判，說什麼法的來源不是法律而是習慣。馬克思在談到這一學派時說它“以昨天的卑鄙行為來為今天的卑鄙行為進行辯護，把農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陳旧的、祖傳的、歷史性的鞭子——的每個呼聲宣布為叛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454 頁）。該派的創始人是古斯塔夫·胡果，著名代表人物是薩維尼。——第 18 頁。
- 19 这三冊詩歌的標題是：《詩歌集》（《Buch der Lieder》）、《愛之書》（《Buch der Liebe》）（第 1 部）、《愛之書》（第 2 部）。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在把這些詩歌送給梅林時曾寫信告訴他說：“我必須告訴您，我父親對這些詩歌是很不重視的，每當二位老人家談到這些詩歌時，他們就對青年時代的這種孩子氣的傻事發出由衷之笑。”（梅林，《馬克思恩格斯的遺著》〔《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柏林，1923 年版，第 1 卷，第 25、26 頁）——第 18 頁。
- 20 席勒寫過一些以勞拉為題的詩歌，如《勞拉的幻想》、《彈鋼琴的勞拉》、《勞拉的魅力》、《勞拉的憂愁》等等，均屬於席勒早期的抒情詩試作。——第 19 頁。
- 21 薩提爾亦譯羊人，是希臘神話中長有公山羊耳朵和角以及母山羊尾巴和腳的半人半獸的山林神，酒神狄奧尼斯的侍從。希臘悲劇便是從扮成羊人的合唱隊所唱的贊美酒神的歌中演變出來的。後來還曾流行過由羊人組成合唱隊的滑稽歌劇。公元前 5 世紀的詩人克伊里洛斯（Chorilos）便曾有“羊人劇王”之稱，此處所說的獻身于“繆斯的舞蹈和薩提爾的音樂”，當指埋頭于詩歌寫作而言。——第 20 頁。
- 22 馬克思在 1837 年 11 月 10 日給他父親的信中寫道：“但是，直到看了最近寫的這些詩，才突然像叫魔杖打了一下似的，——唉！這一擊在起初

- 真是毁灭性的，——一个真正的詩歌王国像遙远的仙宮一样在我面前閃現了一下，而我所創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了。”（《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2頁）——第20頁。
- 23 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給他父亲的信里曾写道：“在生病期間，我把黑格尔从头到尾讀了一遍，还看了他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見面，我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在俱乐部的会员里有几个讲师和在柏林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魯滕堡博士。这里的爭論表現出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把我自己同我想避免其影响的現代世界哲学联在一起的紐帶，越来越紧了；但一切声音都靜止下去，我陷入了一种真正的諷刺狂，而这种情况在这样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之后，是很容易发生的。”（《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4頁）——第20頁。
- 24 馬克思的幼女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在《关于青年馬克思的信》中說：“他（指馬克思。——譯者）父亲的像片、我母亲装在鏡框里的旧像片……他都帶在身旁。馬克思死的时候，这些照片仍在他的衣袋里。恩格斯把它們和馬克思一起装入棺材。”（《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頁）——第24頁。
- 25 在黑格尔逝世以后，黑格尔学派分为左右两派，右派也称老年黑格尔派，左派也称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代表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利益，企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无神論的和革命的結論，来論证德国需要进行資产階級改革的必要。主要人物有施特劳斯、卢格、鮑威尔兄弟等。——第24頁。
- 26 1819年德国大学生桑德将沙皇的代理人、作家科采布杀死。反动派以此事为借口，大肆鎮压大学生运动，把自由民主运动的参加者都称为“煽动者”。从此，对德国一切自由民主运动的殘酷迫害都以查究“煽动者”为名载入历史。——第24頁。
- 27 中世紀的浪漫主义，亦称反动的浪漫主义，是德国产生于19世紀上半叶的反动思潮。在哲学方面，它是对启蒙运动的知性万能主义的理想主义反动，強調神秘的直观，把哲学贬为神学的婢女。謝林是这方面的代表者之一。在政治方面，它和历史法学派（參閱注18）有血緣关系，以中世紀为理想，強調历史的傳統和秩序，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复古主义。參閱本书第27頁脚注1。——第25頁。
- 28 汉堡神学家雷馬路斯写了一本启蒙主义的和宗教批判的书《理性信仰

辯護》，但他不敢發表。死后，萊辛以“無名氏”的名義把它發表了一部分，書名《無名氏著作片斷》。——第26頁。

- 29 大學生運動是1815年在德國爆發的旨在爭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統一的民主運動。它的核心是1815年6月12日在耶拿創立、尔后又在全德國傳播開來的大學生協會，運動的頂點是1817年10月17日為紀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和萊比錫大會戰四周年而召開的瓦特堡大會。大學生們在會後的示威遊行中發表為統一德國而鬥爭的演說，並將一些臭名昭著的反動著作（如科采布的《日耳曼帝國史》等）以及象徵德國反動勢力的假髮和假帽、軍帽和棍杖付之一炬。1819年8月卡爾斯巴德會議後被殘酷鎮壓下去，大學生們的吶喊也沒有在人民羣眾中得到反映。一部分成員後來組成了主張採取個人恐怖手段的“不羈者協會”（“Bund der Unbedingten”）。——第26頁。

29a 誕生應為即位之暇。——第28頁。

- 30 “Mene Mene Tekel Upharsin”——見《舊約》，《但以理書》，第5章；巴比倫王伯沙撒用從上帝神殿中掠來的金器大宴群臣，忽有人的指頭顯出，在牆上寫下這一行無人懂的字。哲人但以理應召前來識讀，說它的意思是：“上帝已數算你國的年月到此完畢；你被稱在天平里顯出你的虧欠；你的國分裂，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第29頁。

- 31 《吠陀經》是古印度婆羅門教的根本聖典，約產生於公元前6世紀以前。“吠陀”（Veda）的原意是“知識”。三部《吠陀經》（Trayi Vidya）指《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珠吠陀》，中國舊稱“三明”。吠陀又是印度文藝和宗教哲學的最古文獻。——第29頁。

- 32 桑蘇西宮，亦譯無憂宮，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仿凡爾賽宮的樣式在波茨坦建造的行宮。——第30頁。

- 33 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被沙文主義的史家尊為啟蒙運動的代表者，德國文學的培養人。這是因為在他統治時期有萊辛、歌德、席勒等大文學家輩出，出現了德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他為了附庸文雅，經常召請一些文人、學者、音樂家到他的桑蘇西宮中舞文弄墨，並曾親炙萊布尼茨和伏爾夫的德國啟蒙哲學，著有《反馬基雅弗里論》（«l'Anti-Machiavel», 1740）一書。他蔑視自己祖國的語言，講法國話，用法文寫作，1750年曾延聘伏爾泰到他的宮中“傳播法國文化”，任伏爾泰為侍從，給以兩萬法郎的年俸，而實際上是要伏爾泰為他潤飾法文詩。伏爾泰在接到他的手稿時曾說：“王上又要我替他洗褲內衣了。”而弗里德里希二世則

- 說：“我再需要他一年，橘子的汁水曬干之后，自然要丟掉皮兒的。”參閱注 7。——第 30 頁。
- 34** 施特勞斯和鮑威爾的觀點的對立，用鮑威爾自己的話來說，是“類和自我意識，實體和主體的對立”。施特勞斯企圖從歷史的批判的觀點，根據福音故事，塑造出基督的真實形象，同時，認為福音故事不是個人的有意識的虛構，而是整個民族或教團的共同意識的產物。鮑威爾批判他沒有給自我意識的中介活動留下餘地，認為福音故事是為了某種宗教目的而有意識地編造出來的，同時根本不承認歷史上的耶穌。施特勞斯對此所做的駁斥，載於他的《Streitschriften》〔《論爭文集》，杜賓根，1836 年〕。——第 31 頁。
- 35** 指新教正統派，這一派正像 19 世紀初天主教徒中的教皇至上論派反對教會中的理性主義傾向一樣，主張回到正統的路德教，否認科學有權利從哲學和歷史的觀點來批判宗教。這一派的領袖，柏林大學神學教授亨格施坦堡曾在他的《福音派教會報》上激烈攻擊黑格爾，說他把基督教變成了泛神論，因而必然導向無神論。——第 32 頁。
- 36** 學院的自由(Akademische Freiheit)，也叫大學的自由。原指由教皇或帝王給與的大學內部的裁判權(Internal jurisdiction)，後來轉指大學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不受干涉而享有的教學、思想、研究和學習的完全自由。——第 34 頁。
- 36a** 喻指教授職位。——第 37 頁。
- 37** 盧克萊茨的教育詩指的是他的哲學詩篇《物性論》(《De rerum natura》)，這個詩篇最全面而系統地敘述了古代原子論。有三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譯本。——第 40 頁。
- 38** 見《舊約》，《羅馬書》，第 13 章，第 1 節。——第 41 頁。
- 39** 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名字的希臘文原意是“先知者”。據海西阿德的《神譜》所載，普羅米修斯曾為了維護人類的利益而欺騙宙斯，宙斯怒而奪走了人間的煙火。普羅米修斯盜取天上的火給予人間，被宙斯下令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岩上。正文中普羅米修斯的自白和對話，見于古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被鎖住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desmotes》)。按照這個劇的情節，普羅米修斯因拒絕神使海爾梅斯的誘騙和恫嚇，在宙斯所發的雷電中連同懸岩崩沉海底。——第 44 頁。
- 40** 普魯士政府於 1841 年 12 月 24 日頒布的新書報檢查令，雖然表面上規

- 定不得对作家的写作活动加以限制，“不得阻撓人們严肃而謙遜地探討真理”，然而却禁止“在出版物中传播錯誤的和破坏性的理論”，从而使放寬书报检查的諾言化为烏有。馬克思批判这个新检查令的文章，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31頁。——第46頁。
- 41 《哲学界軼文集》的全名是《德国現代哲学和政論界軼文集》（*«Anekdoten zur neuest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是1843年年初《萊茵报》被查封的时候由卢格通过苏黎世和温特图尔两地的“文学社”出版的。文集共分两卷，收載的主要文章有馬克思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报检查令》、《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費尔巴哈的仲裁人》，以及費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等。——第46頁。
- 42 教皇至上論派（来自拉丁文的 *ultramontani*，意为“山之彼方”，即阿尔卑斯的彼方，喻指梵蒂岡），是天主教中一个极端的流派的护拥者，他們否认民族教会的独立性，维护羅馬教皇干涉各国世俗事务的权力，相信教皇“絕對无謬”。最初产生于15世紀。19世紀在西欧各国懼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反动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但由于维护教皇的无限权力，故与王权有一定的矛盾。——第48頁。
- 43 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于1815年5月22日发布王室命令，答应建立“人民代議机关”，即在普魯士各省成立省等級會議，設置全普魯士的代議机关并实施宪法。国王还曾委派一个委员会拟定宪法草案。但由于国王懼于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立宪諾言沒有实现。——第51頁。
- 44 指雅科比的小册子《四个問題以及东普魯士一居民对这些問題的回答》（*«Vier Fragen, beantwortet von einem Ostpreußen»*, 1841）。雅科比在这本匿名发表的小册子中批評了普魯士的国家制度并要求在普魯士实行人民代議制和出版自由。——第52頁。
- 45 参閱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34頁。——第59頁。
- 46 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曾說：“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萊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报头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卷，第8頁）——第59頁。
- 47 “自由人”是1842年夏天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成立的一个脱离实际

- 生活和沉醉于抽象哲学爭論的无神論者小組。除去“博士俱樂部”先前的成員之外，還有泰奧多爾·米格博士、《藝文》雜誌的出版者里德爾、卡斯巴爾·施米特（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作者麥克斯·施蒂納）等等，而它的核心人物則是鮑威爾兄弟、愛·梅因、路·布爾、麥·施蒂納等。馬克思在1842年寫的許多信中，以及在《神聖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都曾對這一派加以批判。——第60頁。
- 48 海爾維格在1841年發表了革命的政治詩集《生者的詩》（«Gedichte eines Lebendigen»），以強烈的革命熱情和優美的文筆而名噪一時。1842年秋天為了替雜誌《來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物色撰稿人，曾經做了一次周遊全德的旅行，在各地像凱旋將軍一樣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並曾在柏林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召見。——第61頁。
- 49 這是一種文字遊戲。原文是 Orthodoxen，本來是正統派信徒的意思，此處拆成 orthod-oxen，便成為“正統派公牛”了（Oxen 是 Ochs 一詞的多數，原意為公牛，亦有蠢人之意）。——第63頁。
- 50 指馬克思在《萊茵報》上分五次連載的《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一文。馬克思在報紙上只闡述了他預定答復的五個問題中的前兩個問題。這五個問題就是：（1）關於分配木材的問題；（2）摩塞爾河沿岸地區居民對1841年12月24日的內閣法令和該法令所給予的較大的出版自由的態度；（3）摩塞爾河沿岸地區的毒瘡；（4）摩塞爾河沿岸地區的吸血鬼；（5）有關改善這種狀況的辦法的建議。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210—243頁。——第66頁。
- 51 《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Vorto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寫作於1842年，由於書報檢查而未能在德國出版。最初在瑞士問世，收入《德國現代哲學和政論界軼文集》中。中譯文載《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三聯書店1961年版，上卷，第101—119頁。——第69頁。
- 52 費爾巴哈會說：“曾經在柏林，而現在在鄉間！何其荒誕！但是不然，我的親愛的朋友！你看，我在這里，在大自然的泉源上，又完全洗掉了那些由柏林的國家哲學撒在我腦子裡的沙子……邏輯學我是在一個德國大學里學的，但光學——觀看藝術——却是在一個德國鄉村中學的。”又說：“一個哲學家，至少是我所理解的哲學家，應該把大自然看成自己的女友，他不是應該從書本上，而是應該面對面地來認識她。”（《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三聯書店1961年版，上卷，第239頁）——第70頁。

- 53 參閱《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三聯書店1961年版，上卷，第112頁。
——第72頁。
- 54 指斯特拉斯堡。——第74頁。
- 55 九月法令是法國政府在1839年9月頒布的反動法令。這項法令限制了陪審人員的裁判活動，增加了定期刊物的現金稅，並規定對反對私有制和現存國家制度的言論處以監禁和大量罰款的懲罰。——第74頁。
- 56 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書1843年第二版序言中寫道：“當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新謝林哲學還沒有經報紙正式宣布為‘國家權力’。新謝林哲學是壞良心的哲學，好多年來，它一直由於怕見光明而在黑曆中蠕行，因為它知道，它公開於世之日也就是它滅亡之時。新謝林哲學的虛妄，可笑之至，它所提出的論據，只有名稱和題目，而且，是怎樣的稱和題目呵！新謝林哲學，是19世紀的哲學的卡里奧斯特羅要的通神術的把戲。確實，如果這種把戲早一些出現，那末，戲的序言也許就要另一種寫法了。”（《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三聯書店1962年版，下卷，第24頁）——第75頁。
- 57 1842年10月巴枯寧在《德意志年鑑》上用筆名茹爾·埃利亞札爾發表了《德意志的反動勢力》一文，批判了中庸之道和妥協。——第78頁。
- 58 這些信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335—353頁。馬克思的信的中譯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07—418頁。——第78頁。
- 56 庸俗主義亦譯庸人氣味、市儈習氣，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方式，它的特征是眼界狹隘，對現實抱着妥協調和的態度，自私自利，對統治者奴顏婢膝。庸俗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作為一定社會集團（例如19世紀的德國小資產階級）的行為和道德，曾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毀滅性的批判。——第79頁。
- 60 指巴枯寧和費爾巴哈。阿納卡雷斯，公元前6世紀時的斯基台（在今黑海北岸。——譯者）人，曾僑居雅典，據第歐根尼·拉爾修證明，希臘人曾把他列為希臘七大哲人之一。1843年5月巴枯寧在給盧格的信中說：“鬥爭在這里，僅僅在這里開始，而我們的事業是如此強有力，以致我們少數幾個被捆綁了雙手、流落天涯的人，單靠戰鬥的吶喊就足以使他們無數人潰退和恐懼。就這樣干吧！我，斯基台人，將在你們這里，在想成為希臘人的德意志人這里，打開你們的枷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346頁）巴枯寧在這段話里是以流亡

异国的哲人阿納卡西斯自命的。費爾巴哈則在1843年6月的信中說：“……我們應該通過思想和詩歌給新的一代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一切都要從頭做起，需要許多聯合力量的巨大工作。不要讓舊制度留下一絲一毫的殘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348—349頁）費爾巴哈常自稱自己的哲學是新哲學。——第79頁。

- 61 《伊加利亞旅行記》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卡貝於1840年分兩卷出版的空想主義小說，原名《威廉·卡里斯達爾勳爵在伊加利亞的旅行和奇遇》（*Voyage et aventures de lord William Carisdall en Icarie*）。卡貝在這本書中描繪了他虛構的國家伊加利亞的共產主義社會，相信人的善意和強者的寬大，以為一切改革靠道德和正義感就可以和平地實現。——第81頁。
- 62 1844年5月15日盧格在給費爾巴哈的信中寫道：“他（指馬克思。——譯者）用一封正式的絕交信和我決裂了，因為我對海爾維格的那種性格使然的無聊享樂生活做了可能是過分激烈的批評。他借口海爾維格是個天才而替海爾維格辯護，並且相信他的遠大的前途。”（A. Ruge: *Briefwechsel* [《盧格書信集》]，第1卷，第345頁）——第83頁。
- 63 指1848年3月在德國爆發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到處依靠人民起義掌握了政權或參加了政權。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在這次革命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是正確的。但是這次革命由於大資產階級害怕無產階級而與反動的容克聯合，革命的主要問題，即統一德國和使德國民主化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成為一次沒有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這次革命的經驗時說：“他們（指德國工人。——譯者）應認識自己的階級利益，儘可能迅速地採取自己獨立的黨的立場，一瞬間也不要讓民主主義的小資產者用花言巧語誘惑他們離開無產階級黨獨立組織的道路。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參閱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94頁）——第84頁。
- 64 指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1845）。他說在社會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個人，為了個人的自由，要反對現存世界上的一切。他反對共產主義，說將來的社會不應該是共產主義的，而應該是獨立的、自由的手工業者的聯盟。他還大量引用聖經中有關精神統治世界的無稽之談來宣揚對精神力量的信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對他作了徹底的批判（參閱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116—530頁）。——第85頁。
- 65 这两篇文章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19—467頁。列宁在論述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时写道：“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已表明他是一个革命家，主张‘对現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主张进行‘武器的批判’；他訴諸群众，訴諸无产阶级。”（《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卷，第29頁）——第85頁。
- 66 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曾写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結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們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謂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紀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經济学中去寻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8頁）恩格斯在《卡尔·馬克思》（1869）一文中談到馬克思分析和批判黑格尔的观点所做出的結論时写道：“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結果得出这样一种見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繪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輕視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09頁）——第85頁。
- 67 指实践派和理論派。实践派否定哲学，想通过直接行动来影响和改变現存关系。理論派則把反对現存制度的斗争局限于哲学的批判。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59頁。——第87頁。
- 68 高卢是法国的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第一共和国时代国旗上的图案。此处用来象征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識。高卢一詞的拉丁文(Gallus)原义即是雄鸡的意思。——第89頁。
- 66 指鮑威尔于1842年11月17—19日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犹太人問題》和1843年收入《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張》文集的《現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第90頁。
- 70 指弗里德里希二世。參閱注7和33。——第91頁。
- 71 指的是法国复辟时期(1815—1830)的历史家梯叶里、基佐、米涅和梯也尔的历史著作。恩格斯在《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

中曾說：“自从采用大工业的时候起，即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約的时候起，在英国，誰都知道，两个階級，即占有土地的貴族 (landed aristocracy) 和資产階級 (middle class) 夺取統治权的意向，曾經是該国全部政治斗争的重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朝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使人们意識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从米涅到梯也尔，都曾經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紀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梯叶里的主要著作有《关于法兰西史的考察》(«*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 Fr.*», 1840)，《第三等級史論》(«*Essai sur l'hist. du tiers état*», 1850) 等。基佐的主要著作有《法兰西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 1828—30)、《英国革命史論》(«*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1828—30) 等。米涅的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24) 等。梯也尔的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1823—27)，《执政时代和帝国时代史》(«*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1845—62) 等。他們虽然在解释社会現象方面提出了許多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推测，例如关于社会的階級划分、关于階級斗争是历史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些推测，但是还没有科学地理解階級和階級斗争，沒有把階級和等級区别开来。再“第三等級”是指与貴族、僧侶这两个特权等級相对立的、負有納稅义务的等級，即农民、市民(包括正在形成的資产階級)而言。狭义說来則专指資产階級。——第98頁。

- 72 馬克思从1843年底开始在巴黎研究了許多英法經濟学家的著作并做了摘录。其中有欧仁·毕莱、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詹姆士·兰德达尔、約翰·劳、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約翰·雷姆赛·麦克庫洛赫、詹姆士·穆勒、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薩伊、卡尔·沃尔夫甘克·赫利斯托夫·許茨、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亚当·斯密等(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第1版，第1部分，第3卷，第411—583頁)。这一研究的成果便是著名的《1844年經濟学—哲学手稿》。他在这部手稿中通过对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批判，揭示了資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以及导致这种异化消灭的私有制的矛盾性，同时还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第98頁。

- 73 馬克思关于階級斗争学說的这段話，是在1852年3月5日給魏德迈的信中說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

- 63頁。——第98頁。
- 74 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說：“法國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別：一派起源于笛卡兒，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0頁）前一派的主要代表是拉美特利，后一派的主要代表是爱尔維修。——第98頁。
- 75 爱尔維修的主要著作是《精神論》（《De l'Esprit》，1822），《論人及其智力和教育》（《De l'homme,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éducation》，1773）；霍尔巴赫的主要著作是《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則》（《Système social, ou Principes naturels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1822），《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規律》（《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s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1770）。两人的著作都曾在馬克思流寓巴黎时期与恩格斯合写的《神聖家族》中被大段地引用。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5—166、169—170頁。——第98頁。
- 76 欧仁·苏写过《流浪的犹太人》（《Le Juif errant》，1844—1845），《人民的秘密和世界的秘密》（《Les mystères du peuple et les mystères du monde》，1849—1857）等許多社会小說、历史小說。其中最轰动一时的是小市民的感伤的社会小說《巴黎的秘密》（《Mystères de Paris》，1842—43）。恩格斯在《大陸上的运动》一文中写道：“欧仁·苏的著名小說《巴黎的秘密》給輿論界特别是德国的輿論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調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級’所遭受的貧困和道德敗坏，这种笔調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現在却是穷人和受輕視的階級了，而构成小說內容的，則是这些人的生活 and 命运、欢乐和痛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594頁）后来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施里加（齐赫林斯基）时对《巴黎的秘密》做了詳尽的批判分析（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68—98、207—268頁）。——第99頁。
- 77 拉梅耐著有《一个信徒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1834）一书，

用基督教說教的形式来进行假革命的蠱惑宣传，以便利用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作为封建反动派的工具。毕舍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曾参加反对贵族—教权反动派的运动，领导了法国烧炭党人的密謀組織（仿意大利烧炭党組織而在1820年底1821年初建立的，目的在于推翻波旁王朝）。他曾提出过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的計劃。恩格斯在批判哥达綱領時曾說：“……綱領把拉薩尔从毕舍那儿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只字不改地提出米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毕舍之提出这一要求，則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者，为了与他們作斗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39頁）关于基督教社会主义，参閱注324。——第99頁。

- 78 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經濟学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1819）。毕萊的主要著作是《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 1840）。裴柯尔的主要著作是《社会經濟和政治經濟的新理論，或关于社会組織的研究》（«Théorie nouvelle d'économie sociale et politique, ou Études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1842）。維达尔的主要著作是《財富的分配，或社会經濟方面的分配的公正性》（«De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ou de la justice distributive en économie sociale», 1846）。——第99頁。
- 79 貝朗热在七月王朝时代写了許多关于貧民和无产者的歌謠，攻击資產階級，带有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馬克思曾在民主联合会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員的賀詞中称他为“不朽的貝朗热”（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578頁）。乔治·桑則曾受到圣西門和列魯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的小說《康素蘿》（«Consuelo», 1842）、《安东納先生的罪恶》（«Le Péché de M. Antoine», 1847）等等中反映出来。——第99頁。
- 80 指1830年11月和1834年2月爆发的里昂絲織工人的两次起义，达两次起义虽然都被殘酷鎮压下去，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到里昂起义時所說的，“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开始在欧洲最先进國度的历史上进居于前列了”（上引书，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頁）。——第99頁。
- 81 見海涅的《共产主义、哲学和僧侶》一文，載《海涅全集》（六卷集），柏林

建設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4 卷，第 455 頁。——第 100 頁。

- 82 1843 年 9 月馬克思在從克羅茨納赫給盧格的信中寫道：“所以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相反地，我們應當盡量幫助教條主義者認清他們自己的原理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416 頁）——第 100 頁。
- 83 參閱《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462 頁。——第 100 頁。
- 84 指 1839 年 5 月 12 日由布朗基派的“四季社”組織的起義。起義者企圖占領市政廳，但因沒有得到群眾的支持，起義被毫不費力地鎮壓下去。布朗基本人被判死刑，後來改為終身監禁。——第 100 頁。
- 85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 年英文版和 1890 年德文版上分別給法國社會主義民主黨加了兩個注解。在 1888 年英文版上說：“當時這個黨在議會中的代表是賴德律-洛蘭，在著作方面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報紙方面的代表是《改革報》（«Réforme»）。他們所發明的名稱——社會主義民主黨——是他們曾經用以表明民主黨或共和黨中一部分多少塗上社會主義顏色的人的。”在 1890 年德文版注中則除了上述基本內容外又補充了一句：“……所以，它同現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不同有如天淵之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503 頁）——第 100 頁。
- 86 這個黨的領袖之一路易·勃朗曾著有《勞動組織》（«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1839）和《社會主義——勞動權利》（«Le socialisme, Droit au travail», 1849）。他在《勞動組織》一書中反對無產階級的暴力行動，認為正確地組織勞動是治好社會疾病的萬應靈藥。他主張國家應該貸款給工人建立工人工場，這種工場的数量逐漸增加，最後將排擠掉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同時他要求資本家參加新的勞動組織，就像十字軍中的勞動者和資本家進行騎士式的合作一樣。——第 101 頁。
- 87 1844 年海涅為《德法年鑑》寫了《給國王路德維希的頌歌》（«Lobgesänge auf König Ludwig»），發表了詩集《新詩集》（«Neue Gedichte», 1844），而著名的《時事詩篇》（«Zeitgedichte»）大部分是在馬克思的思想影響下寫的（參閱注 96）。《西里西亞織工之歌》（«Die schlesische Weber»）是聲援 1844 年西里西亞織工起義的作品，詩中詛咒了“上帝”、“富人的國王”和“虛偽的祖國”。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一文中對這首詩做了很高的評價，並且說：“德國當代最杰出的

- 詩人亨利希·海涅也參加了我們的隊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91—592頁)。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1844)是詩人根據1843年年底返回故鄉漢堡途中的見聞和感受寫的，詩中穿插着民間的傳說、離奇的譬喻和個人的幻想，對德國的丑惡的現實進行了无情的抨擊。——第103頁。
- 88 指《亨利希·海涅評路德維希·白爾尼》(《Heinrich Heine über Ludwig Börne》，1840)一書。白爾尼曾指責海涅的作品缺乏所謂“傾向性”。海涅則對這種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淺薄和偏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第103頁。
- 89 “短縮速步”(“Kurzer Hundetrab”)是馬術中的一種跨度小而速度較急促的步法，此處當系喻指白爾尼的潑刺而缺乏含蓄的文体而言。——第105頁。
- 90 燕妮·馬克思在《動蕩的生活簡記》中提到巴黎時期時曾說：“那時我們住在聖日耳曼城郊瓦諾街，和盧格、海涅、海爾維格、莫伊勒、托爾斯泰、巴枯寧、安年柯夫、貝爾奈斯以及 tutti quanti [其他許多人] 都有來往。”(《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49頁)燕妮信中所提的托爾斯泰是俄國自由派地主格利高里·米哈伊洛維奇·托爾斯泰(1808—1871)。梅林所說的俄國政府的密探則是雅科夫·尼古拉也維奇·托爾斯泰(1791—1867)，而這個托爾斯泰是同馬克思毫無關係的。恩格斯也曾因奧格斯堡《總匯報》上發表的一篇通訊而一度誤把俄國密探雅·尼·托爾斯泰當成他和馬克思的朋友格·米·托爾斯泰(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41—42、72—73頁)。——第105頁。
- 91 “青年德意志”是19世紀30年代產生於德國的一個文學團體。海涅和白爾尼都曾對這個團體發生很大的影響。它的名稱來源於該派作家之一魯道夫·文巴爾克的文集《美學的出征》(《Ästhetische Feldzüge》，1834)中的獻詞：“獻給你，青年德意志……”。它的主要作家有谷茲考、勞貝、蒙特等。他們的藝術作品和政論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反抗情緒，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德國文學中民主傾向的發展和現實主義方法的确立。但是他們思想上不成熟，政治上也不堅定。這一派作家中的大多數人後來墮落成為庸俗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第106頁。
- 92 西里西亞織工起義是德國工人第一次大規模的自發的起義，發生在

- 1844年6月4—6日。起义者冲进了剥削者的住宅，摧毁了票据、营业账簿和堆存的货物，并且抗击了最初前来镇压的武装士兵。但起义终于被强大的武力残酷地镇压下去。在这次起义的影响下，在德国和奥地利也爆发了工人起义和罢工。——第108頁。
- 93 指織工起义前夕在西里西亚紡織工业区流行的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第110頁。
- 94 灰姑娘是格林童話《灰姑娘》(«Aschenbrödel»)中的主人公，一个受继母虐待的女孩子，每天在厨房里像婢女一样地劳动，夜間睡在灶旁灰堆上，后来嫁给了一个王子。此处喻指无产阶级。——第110頁。
- 95 “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半宣传性和半密謀性的团体。它的前身是1834年由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創立的“德意志被遗弃者同盟”。领导人有舒斯特尔、海尔曼·艾韦貝克和海尔曼·梅列尔等。它在法国同“四季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把影响扩大到瑞士和德国，在理論上也由无产阶级化的小私有者的社会理論逐步轉向共产主义。这个同盟在1839年5月12日参加了布朗基派发动的起义并被镇压下去。此后重心便从巴黎移到伦敦，在組織上也逐渐由德国的变成国际的。1847年1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信同盟领导者願意改組同盟并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作为綱領基础之后同意参加了这个同盟。1847年6月該同盟改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111頁。
- 96 1844年海涅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許多諷刺、嘲罵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普魯士內政的詩篇，如，《中国皇帝》(«Kaiser von China»),《安心》(«Zur Beruhigung»),《新亚历山大》(«Der neue Alexander»),《顛倒的世界》(«Verkehrte Welt»),《教会长老普罗米修斯》(«Kirchenrat Prometheus»)等等。——第112頁。
- 97 1848年革命以后在德国的許多邦建立了陪审法庭。法庭由一个皇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審員)組成。和过去的陪審員不同，他們参加全部审判，并且不仅是确定罪行，而且規定处罚方法。法庭成員都是从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中特別挑选出来的。——第113頁。
- 98 民間讀物(Volksbuch)是16世紀时流行于德国的民間故事书。书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过去的传说(如《齐格弗里特》)；有的是南方民族的和东方的故事；有的是同时代的人物(如《滑稽大王欧伦什皮格尔》、《浮士德博士》等)。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間讀物》一文中曾說，这种书可以使疲倦归来的农民忘却疲劳，把他們的嶠瘠的田地变成芬芳的

玫瑰園，可以把手工業的作坊，把受折磨的學徒的頂樓變成一個詩的世界；還可以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權利和自由，喚起他們的勇氣和對祖國的愛（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年俄文版，第344頁）。——第116頁。

- 99 雅科布·伯麥生於西里西亞的格爾利茨附近的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先是牧人，後為鞋匠。靠自學成為神秘主義哲學家，把路德神學同占星術、煉金術和中世紀的猶太神秘哲學結合起來，猜測到了世界和萬物的矛盾本性。他說，神既是善又是惡，既是光明又是黑暗，既是愛又是恨，既是天國又是地獄，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既是全又是無，既是一又是多，既是根本的活動又是永遠的靜止。這些對立的本原在神的內部統一着，同時這些對立的性質、源泉、痛苦（Qualität-Quelle-Qual）又貫穿着世界和萬事萬物，而神的啟示只有通過這些對立的鬥爭才是可能的。他曾因他的主要著作《朝霞》（«Aurora», 1612）被教會視為異端，遭到禁止寫作的處分。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一書中談到培根的哲學觀點時曾說：“在物質的固有的特性中，運動是第一個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這裡所說的運動不僅是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更是趨向、生命力、緊張，或者用雅科布·伯麥的話來說，是物質的痛苦〔Qual〕。”（《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卷，第163頁）恩格斯在《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一書中給伯麥的Qual做了一個注解：“伯麥的‘qual’，與外來的痛苦相反，乃是能動的本原，它由從屬於他的事物、關係或個人的自發發展中產生出來，並且自己又引起這種發展。”——第117頁。

- 100 指法國1830年7月推翻波旁王朝的資產階級革命。工人、大學生和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政權卻落入金融貴族手中，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被捧上王位，建立了七月王朝。這次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歐洲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和自由主義革命，使德意志的薩克森、不倫瑞克、黑森、巴伐利亞均為革命浪潮所席卷。“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就是七月革命後在德國湧現出來的。——第117頁。

- 101 1839年3—4月恩格斯在《德意志電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論性作品《烏培河谷來信》（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93—518頁）。此後他還在《德意志電訊》上發表了《德國的民間讀物》（1839）、《恩斯特·摩里茨·阿倫特》（1841）、《謝林論黑格爾》（1841）等文（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1956年俄文版，第

- 344 頁以下)。此处当指《烏培河谷来信》。——第 117 頁。
- 102 虔誠主义是路德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 17 世紀的德国。創始人是菲力浦·雅科布·施本納(1635—1705)。这一派摒弃教会的一套表面的仪式,主张使宗教深入日常生活,通过宣揚虔誠和“精神的自我完善”来加强宗教的影响。他們甚至把跳舞、看戏、游园、讀非宗教书籍都宣布为“罪恶”。曾在威斯特伐里亚、符騰堡和莱茵其他地区的中小資產階級中广泛流行。恩格斯在《烏培河谷来信》中对虔誠派教徒做了十分生动的描述(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498—508 頁)。——第 118 頁。
- 102a 門采尔最初曾和“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家白尔尼、古茲考等人合作,后来基于他的基督教日耳曼的信念,不滿“青年德意志”派的資產階級激进主义傾向,轉而对白尔尼、古茲考等人进行攻击、誹謗和告密,从而挑起了德意志联邦議会对“青年德意志”派的鎮压。白尔尼写了《排法主义者門采尔》(《Menzel der Franzosenfresser》, 1837), 对投靠反动陣营的門采尔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恩格斯对此书的評价,見《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 1956 年俄文版,第 318 頁。——第 118 頁。
- 103 莽汉泼息,或泼息·霍士泼,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以性情暴烈著称。——第 119 頁。
- 104 恩格斯在 1842 年 7 月《德意志年鉴》第 160、161 和 162 期上发表了《評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現代文学讲义〉》一文,对接近“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荣克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519—534 頁)。——第 120 頁。
- 105 “把……据为己有”原作者漏引,今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 部分,第 2 卷,《序言》,第 XXV 頁补。——第 120 頁。
- 106 席勒的剧作《强盜》中的人物,被忤逆不孝的儿子篡夺了王位,并被囚禁在林中古塔里。——第 120 頁。
- 107 指布魯諾·鮑威尔。——第 122 頁。
- 108 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次会晤,恩格斯在 1895 年 4 月底給梅林的信中写道,“11 月底我在赴英途中再訪編輯部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了馬克思,这就是我們的十分冷淡的第一次会晤。馬克思那时正在反对鮑威尔,也就是說,反对使《萊茵报》主要地只是宣传神学問題、无神論等等,而不去服务于政治討論和行动。他还反对埃德加爾·鮑威尔那种單純追求‘最极端的’表現的、空談的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在埃德加爾

- 那里随后又很快地被貌似激进的其他空談所代替。由于我和鲍威尔有通信的联系，当然也就可以說是他們的同盟者，而正是由于他們的緣故，那时我对馬克思是抱着怀疑态度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9卷，第412—413頁）——第122頁。
- 109 1832年6月7日英国上院批准了一个选举法改革案。这次改革打破了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政治壟断，为工业資產階級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議会的方便之門。英国工人階級曾經支持資產階級爭取选举改革的运动，并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次改革却没有使工人階級获得选举权。从此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尖銳化起来，爆发了以选举改革为口号的群众性工人运动，成为宪章运动的濫觴。——第123頁。
- 110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序言中說：“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学范疇的天才的大綱（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訊交換意見，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9頁）。——第124頁。
- 111 馬尔薩斯的人口理論认为人口是按几何級数增长的，而生活資料是按算術級数增长的，人口增长速度高过生活資料增长速度，是造成貧困、疾病、犯罪、战争的原因。为了使人口数量和生活資料相适应，他主张节制生育并歌颂瘟疫、飢饉、繁重劳动和战争。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曾給与这一仇視人类的理論以毁灭性的批判。馬尔薩斯的主要著作是《論人口律和人口对未来社会改良的影响。評葛德文先生、孔多賽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观点》（*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1798），通称《人口論》。——第124頁。
- 112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学—哲学手稿》序言中說：“不消說，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外，我还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这門科学方面的內容丰富而又富有独创性的德国著作……只有赫斯收入文集《二十一張》中的几篇論文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經濟学—哲学手稿》，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頁）。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一文对馬克思的启发很大，帮助他克服了对資產階級社会、无产階級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認識到必須从資本主义經濟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

- 制度。——第 124 頁。
- 113 指法国 1830 年的七月革命。參閱注 100。——第 130 頁。
- 114 英国在 1799—1800 年通过了主要以禁止工人組織工会为目的的結社法。1824 年英国議會废除了这个法令。第二年又通过了一个修正法案，它虽不否认工会的存在是合法的，却把工会可能进行的每項活动視为非法。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却从此有了长足的发展。——第 131 頁。
- 115 英国爭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早在 18 世紀末便已开始，19 世紀 30 年代这一斗争开始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階級群众。由于土地貴族的代表力求在反对工业資产階級的斗争中利用这一深得人心的口号，他們在議會里維護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从 1833 年起，在議會里拥护这一法案的首要人物是“托利党人慈善家”艾釋黎助爵。1847 年 6 月 8 日英国議會终于通过了一个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 132 頁。
- 116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8 頁。——第 136 頁。
- 117 參閱《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的 1892 年《德文第二版序言》，載《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8 頁。——第 137 頁。
- 118 彼·盖斯克尔著有《英国的工业居民，他們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因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調查》（《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Machiner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1833）。据恩格斯說，他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导言》中所敘述的无产階級发展史，主要是以盖斯克尔的这一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的。关于毕萊的著作，參閱本书注 78。馬克思在《1844 年經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引用毕萊的著作。——第 137 頁。
- 119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 卷，第 17 頁。——第 146 頁。
- 120 費尔巴哈于 1845 年写成《宗教的本质》一书，1846 年該书由維干德收入文集《后裔》中。恩格斯在 1846 年 8 月 19 日給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后裔》上翻閱了費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除了一些写得中肯的地方以外，全是老一套。在一开头只談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勉强比

- 較嚴格地守着經驗的基地，可是后来步調就紊亂了。仍舊是本质、人等等。”再參閱1846年10月中旬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均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146頁。
- 121 1846年恩格斯曾在《德國公民手冊》上發表了《〈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斷〉的前言和結束語》一文，在《萊茵年鑑》上發表了《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一文，兩文均寫於1845年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654—676頁）。——第147頁。
- 122 憲章運動在19世紀30年代初產生於英國。列寧曾稱之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卷，第276頁）。這個運動以1838年5月8日作為準備提交議會的一項法案即“人民憲章”而得名。憲章包括六點：普選權（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議會每年改選一次；秘密投票；各選區一律平等；取消議員候選人的財產資格限制；發給議員薪金。——第154頁。
- 123 《反克利蓋的通告》是1846年5月11日在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的。這個通告會石印分發給所有的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由於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要求，克利蓋於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主編的《人民論壇報》第23—24號上發表了這一文件。《通告》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3—20頁。——第156頁。
- 124 全國改革協會是1845年在美国創立的一個群眾性的組織。組織的核心是由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組成的“青年美国”。協會的宗旨是要求无偿地分給每一個劳动者一块土地。40年代後半期協會宣傳土地改革，反對使用奴隶的種植場主及土地投机分子，並提出了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廢除奴隶制和取消常備軍等民主要求。許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但是一度参加过全国改革协会的克利蓋和他的集团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引誘德国侨民脱离爭取民主的斗争。——第156頁。
- 125 指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6年初在布魯塞爾建立的。委員會的任務是：建立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間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間的联系，互通有关各国和各地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組織革命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宣传和口头宣传。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向个别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英国的革命宪章派建議在他們本國建立同样的

- 委員會。委員會為建立國際無產階級政黨準備了基礎。——第156頁。
- 126 指1572年8月24日(聖巴托羅繆節)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對玉格諾教徒的大屠殺。玉格諾教徒被殺者在巴黎有三千多人,在全國約有三萬人。——第157頁。
- 127 見《共產黨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和恩格斯為1890年德文版所加的附注(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卷,第4頁)。——第159頁。
- 128 引自喬治·桑的歷史小說《揚·瑞日卡》(1843)的序言。——第167頁。
- 129 1839年費爾巴哈在《德意志年鑑》上發表了他跟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徹底決裂的第一部著作《黑格爾哲學批判》(載《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三聯書店1961年版,上卷,第45—84頁)。馬克思曾寫道:“費爾巴哈在他向黑格爾作第一次堅決進攻時以清醒的哲學來對抗醉熏熏的思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59頁)。——第167頁。
- 130 馬克思在他1845年春天寫於布魯塞爾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所以,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並說費爾巴哈“撇開歷史的進程,孤立地觀察宗教感情,並假定出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類個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6、8頁)。——第168頁。
- 131 畢希納把思維和物質等同起來,把思想本身看成是物質的東西。他還把資本主義競爭看成是生存鬥爭這一自然界的規律的體現,從而宣布資本主義是一種“合乎自然的”制度。福格特則認為人腦產生思想,恰如肝產生胆汁、腎臟產生尿一樣。他並用自然科學理論來對社會現象做反科學的說明。費爾巴哈所說的“往後退”是指作為出發點的問題,即意識是自然界的產物;“往前進”是指對人的歷史、對意識的作用的看法問題。費爾巴哈在這裡是把唯物主義跟機械唯物主義、庸俗唯物主義混為一談了。——第168頁。
- 132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530頁。——第168頁。
- 133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了要發行公債以擺脫財政困難,於1847年4

- 月 11 日在柏林召开了各省等級議會的第一屆聯合會議。由于國王拒絕滿足資產階級的最初步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絕給國王以借款的保證。國王為了報復，于同年 6 月解散了聯合省議會。这样就加重了國內的反抗情緒，加速了德國革命的到來。——第 170 頁。
- 134 1789 年 5 月 5 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為了克服財政危機而召开了三級會議。由于路易十六拒絕向第三等級作出任何讓步，這次會議成為導致 1789—1794 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原因。——第 170 頁。
- 135 此處當指恩格斯于 1847 年 6 月 10 日在《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第 46 號上發表的《保護關稅制度還是自由貿易制度》一文。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66—69 頁。——第 170 頁。
- 136 指李斯特在斯圖加特和杜賓根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1841）一書。他在这本書中闡述了他的保護關稅理論。——第 170 頁。
- 137 大陸體系亦稱大陸封鎖，是 1806 年拿破侖第一為了消滅英國的經濟優勢，對付英國工商業的競爭而宣布的一項禁止同英國進行貿易的措施。普魯士、荷蘭、西班牙和俄國都曾被逼參加。後隨拿破侖帝國的崩潰而廢除。——第 170 頁。
- 138 即《〈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一文，此文實際上是馬克思一人寫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207—222 頁。——第 171 頁。
- 139 陪審制產生于 12 世紀以後的英國。最初陪審員只起事實報告人或證人的作用，後來發展為能對被告人做出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在資產階級國家里，由于陪審員的選舉有居住年限、教育程度和財產的限制，所以陪審員都是資產階級人物。1848 年革命後在德國許多邦也開始建立了陪審法庭（參閱注 97）。——第 172 頁。
- 140 英王查理一世在 17 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被廢黜，并于 1649 年 1 月 30 日被處死。路易十六在 18 世紀末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于 1793 年 1 月 21 日根據國民議會的決議被判處死刑。——第 173 頁。
- 141 指恩格斯至早在 1847 年 4 月寫成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一文。這篇文章是恩格斯對《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一章的修改增訂，生前迄未發表，1932 年才第一次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中。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 卷，第 641—692 頁。——第 174 頁。

- 142 《Ça ira》是弗萊里格拉特于 1846 年在瑞士发表的一部包括六篇詩作的詩集。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只批评了这部詩集中的两篇：《开航之前》和《这怎么办》。“Ça ira”最初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 1776 到 1785 年間曾任美国駐法大使）所喜用的用語，后因 18 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同名歌曲而变为流行語。那首歌曲收尾的叠句是：“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把貴族吊死在路灯柱上！”（“Ah! ça ira, ça ira. Les aristocrates a la lanterne!”）——第 175 頁。
- 143 即《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322—356 頁。——第 175 頁。
- 144 小型战争是 18—19 世紀軍事書籍中使用的一个術語，指正規軍小股部队結合着游击队和民兵而采取的軍事行动。此地当系喻指机动灵活的斗争。——第 177 頁。
- 145 1846 年秋德朗克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了他的一部最大的政論著作《柏林》。这本书描繪了革命前夜整个德国的社会生活，不仅反对了容克地主和官僚制度，而且批判了国王本人。——第 178 頁。
- 146 恩格斯在 1883 年 6 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周刊第 24 期上的《帮工匠之歌》一文中曾称維尔特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最卓越的詩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 1956—1957 年出版了詩人的五卷本全集。——第 178 頁。
- 147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派左翼代表人物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員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間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 1845 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組織。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 1845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各国民主派會議的筹备工作，而这个协会就是在这次會議上成立的。1848 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 1853 年彻底瓦解。——第 178 頁。
- 148 关于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參閱本书第 6 章第 4 节。恩格斯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宣言的評論，見于《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 卷，第 46 頁。——第 179 頁。
- 149 公元前 2 世紀在犹太产生的教派。它否定私有财产、奴隶占有和战争，但不想进行反对剝削者的斗争，放弃政治活动，而主张过禁欲主义的、消极靜观的生活。曾对原始基督教的产生发生影响。——第 180 頁。
- 150 德国工人协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魯塞爾建立的，目的是对流亡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

- 义思想。协会中的优秀分子都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181頁。
- 151 “民主协会”的成员包括无产阶级革命者（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该协会成了国际民主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期间，该协会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1848年3月初比利时当局驱逐了马克思并逮捕了协会中最革命分子以后，该协会的活动就变成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182頁。
- 152 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决定利用大会讲坛揭露坚持自由贸易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伪善口号，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但是由于大会主席的阻难，已经准备好讲稿的马克思没有得到机会在会上发表。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维尔特发表了一篇演说。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参阅恩格斯的《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258—296頁。——第184頁。
- 153 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是卡尔·沙佩尔等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领导。马克思在1849年9月，恩格斯在同年11月分别参加了该协会。1850年9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因协会的大部分委员站在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尔希—沙佩尔集团）一边而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1918年在伦敦的该协会为英国政府所封闭。通过《共产党宣言》时的会址设在伦敦磨坊街。——第184頁。
- 154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44—459頁。——第185頁。
- 155 恩格斯所说的草稿是指他在1847年10月22日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委员会会议上受托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亦即用问答体写的《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357—374頁）。——第190頁。
- 156 济贫法最初产生于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朝。主要内容是责成教区对

- 貧苦工人进行救济；征收济貧捐；举办法律規定的慈善事业。产业革命后为了緩和进一步尖銳化了的矛盾，济貧法的内容不断有所发展。1834年由輝格党内閣頒布了新济貧法。按照新济貧法，失业工人和貧民要到习艺所中接受职业訓練，条件之恶劣有“穷人的巴士底獄”之称。——第193頁。
- 157 巴士底獄原是14世紀建于巴黎的一个深沟高垒的要塞。从16世紀起成为主要收容政治犯的監獄。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起义人民攻占了这座要塞監獄，成为18世紀末法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开端。——第193頁。
- 158 指德国1848年的三月革命，參閱注63。——第195頁。
- 159 指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这是推翻了七月王朝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2月24日国王被迫宣布退位，逃亡英国。在巴黎則成立了主要以資產階級共和派为代表的临时政府。25日临时政府在工人的要求下宣布共和，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196頁。
- 160 列奥波特即列奥波特一世，即位前为撒克斯·科布尔克公爵，生于科布尔克。——第196頁。
- 161 指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列奥波特先是（1816）同英国莎洛特公主結婚，莎洛特死于1817年。列奥波特即位后第二年（1832）又同路易·菲力浦之女路易莎結婚。——第196頁。
- 162 1848年3月13日維也納爆发了以工人学生为主力的人民群众的起义。起义者的主要要求是宪法、陪审制和新聞自由。起义推翻了奥地利反动政府，迫使梅特涅逃亡国外。皇帝斐迪南被迫发布敕令，答应頒布宪法，同时給予資產階級以广泛的政治权利。——第197頁。
- 163 1848年3月18日柏林工人在全体人民支持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并通过英勇的街垒战斗迫使国王政府將軍队撤出柏林。人民在柏林取得的这一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已在德意志的許多邦内开始的革命运动。參閱注63。——第197頁。
- 164 指《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卷，第3—5頁）。这一文件是1848年3月21—29日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写成的，1848年3月30日左右以传单的形式发表。《要求》是作为指示性的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第197頁。
- 165 黑紅金(Schwarz-Rot-Gold)三色曾是德国大学生协会和1848—1849

- 年德国民族统一运动的标帜。黑紅金共和国当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言。——第 199 頁。
- 166 国民議会的會議自 1848 年 5 月 18 日至 1849 年 5 月 3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关于这次會議初期的情况，参阅恩格斯的《法兰克福議會》一文，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卷，第 14—18 頁。——第 200 頁。
- 167 指 1848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二届联合省議會。会上通过了协商法和普魯士国民議會选举条例，批准了政府在 1847 年第一届联合省議會（参阅注 133）上遭到否决的公債。选举条例規定要召开一个“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的議會。这个选举条例所規定的两級选举制，保证了资产阶级和普魯士官吏在議會中取得多数。这届联合省議會也于 1848 年 4 月 10 日被解散。——第 201 頁。
- 168 1848 年 6 月 6 日康普豪森在柏林議会上說：“是的，我們以为立宪制度的精神要求我們挺身做一个崇高的人物……我們像盾牌一样护卫着王朝，承受了一切危險和攻击！”——第 201 頁。
- 169 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汉泽曼政府发給人民武器遭到拒絕后，于 1848 年 6 月 14 日攻占了軍械庫。这次行动是自发的和沒有組織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很快地驅散了人民，并解除了他們的武装。——第 202 頁。
- 170 1846 年 6 月 24 日《新萊茵报》第 24 号上的《汉泽曼內閣》一文中說：“当我们想到汉泽曼先生很快就会从他那令人头晕目眩的高位上摔下来的时候，我們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汉泽曼內閣还在未組成之前，还在連片刻的生存乐趣都未能享受的时候，就已經注定要灭亡。”（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卷，第 117 頁）——第 202 頁。
- 171 指 1848 年 6 月 23—26 日巴黎六月起义的战斗。这次起义是由于制宪會議公布解散国立工厂的法令而引起的。战斗从 23 日一开始便极为激烈，直到 26 日起义的工人才在劊子手卡芬雅克的殘酷鎮压下失败。卡芬雅克把大量重炮运往前綫，威胁工人投降，但工人拒絕屈服，結果大部分起义工人与障地同归于尽。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施行了白色恐怖政策。除了在战斗中被屠杀的五百多起义者之外，事后还有一万一千多起义者被屠杀，連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也难幸免。在二万五千人被捕者中有一半被流放或处以苦役，其中大都是工人。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說：六月起义是“現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間的第一次

- 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7 卷，第 34 頁）——第 203 頁。
- 172 古希腊人和羅馬人有把用月桂树枝編成的花冠贈給胜利者和优秀詩人的习俗。后来人們就用桂冠象征荣誉或凱旋。这里是說报刊应歌頌备受压迫的平民即无产阶级，并維護他們的利益。——第 204 頁。
- 173 指馬克思的《六月革命》一文。这篇坚决捍卫起义的巴黎工人的文章在 1848 年 6 月 29 日的《新莱茵报》发表后，剩下的大部分股东也都停止支持《新莱茵报》。——第 204 頁。
- 174 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中写道：“……就以近七十年来看，德国曾經为了英国的黄金而派它的雇佣兵去帮助英国人鎮压爭取独立的北美洲人。第一次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又受別人嗾使，像一群疯狗似的去咬法国人；他們在不伦瑞克公爵凶恶的声明中威胁說要把巴黎彻底毁灭；他們和逃亡国外的貴族串通起来反对法国的新秩序，为此获得了英国的奖賞。当荷兰人在近两个世紀中好不容易第一次有了理智的想法（結束奥伦治王朝的昏庸統治，把国家变为共和国）的时候，德国人又充当了戕害自由的劊子手。瑞士也可以說出不少关于它的邻居德国人的罪状。匈牙利要想很快地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朝廷給它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是很困难的。德国雇佣兵甚至还被派到希腊去扶助那里的可爱的奥托的小小王位，德国的警察甚至被派到葡萄牙去。还有在 1815 年以后召开的各种會議，奥地利向那不勒斯、都灵、洛曼尼雅的进军，监禁伊普西朗蒂，法国在德国的压力下发动了反对西班牙的奴役性战争，德国支持唐·米格尔、唐·卡洛斯，汉諾威军队充当英国反动派的工具；在德国的影响下比利时被分裂和热月化；甚至在俄国内地，德国人也是专制君主和小暴君們的支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卷，第 177 頁）。——第 205 頁。
- 175 馬基雅弗里在他的《君主論》（*Il Principe*，1532）一书中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甚至抛弃道德原則、背信弃义也是正当的。他的这种尊崇权术的政治主张，被称为馬基雅弗里主义。——第 205 頁。
- 176 指 1848 年在波茲南即在普屬的所謂波茲南大公国发生的起义。起义是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在普魯士发生的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1848 年 3 月 20 日在波茲南市举行了有手工业者、工人和聚集在城市的农民的反普群众性示威。貴族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建立了“全国委员会”。波茲南

的許多地方的普魯士政權被打倒。農民參加了爭取獨立和土地的武裝鬥爭，但起義的武裝隊伍後來因奪取了領導權的“全國委員會”的叛賣行為，終於遭到失敗。——第 206 頁。

- 177** 指 1830 年 11 月在华沙爆發的反沙皇統治的武裝起義 (1830—1831)。引起起義的客觀條件是沙皇和波蘭貴族的專制統治和波蘭王國 (即俄屬波蘭) 的資本主義的比較迅速的發展過程。近因則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打算把波蘭軍隊派出去鎮壓法國的革命。1830 年 11 月 29 日維索茨基所領導的一個秘密貴族軍事團體在华沙發動了起義。得到城市貧民的援助的起義一度取得勝利。但因取得了政權的貴族拒絕實施農民改革，妨礙人民群眾把起義變成革命，使起義遭到了失敗。沙皇俄國在殘酷地鎮壓了起義之後，在波蘭王國建立了軍事警察制度，反動勢力和民族壓迫在波蘭各地都加強了。——第 206 頁。
- 178** 指 1846 年 2 月相繼爆發的克拉柯夫起義和加里西亞農民起義。克拉柯夫起義是一次由小貴族和資產階級分子掌握了領導權而得到城市貧民支持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加里西亞農民起義則是反封建性質的自發起義。奧地利統治者先是挑撥加里西亞農民與小貴族的起義部隊衝突，等到粉碎了克拉柯夫起義以後，又出動大軍鎮壓起義農民。1848 年 2 月 22 日恩格斯在布魯塞爾舉行的 1846 年克拉柯夫起義兩周年紀念大會上說：“克拉柯夫革命結果是失敗了，這次失敗是非常慘痛的。讓我們對犧牲的英雄們致以崇高的敬意，並對他們的失敗深表惋惜，對因這次失敗而遭受更大奴役的兩千萬波蘭人民，表示我們深切的同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538 頁）。——第 206 頁。
- 179** 根據 1848 年 4 月 11 日簽訂的雅羅斯拉韋茨協定，普魯士答應波蘭人在波茲南實行“民族的改組”，即建立波蘭部隊，委任波蘭人擔任行政和其他職務，在行政和訴訟事宜中使用本民族語言。但是普魯士當局背信棄義地撕毀了這個協定，利用它和波蘭起義部隊達成的協議來殘酷地鎮壓波茲南的民族解放運動。答應波蘭人實行“民族的改組”的諾言沒有實現。——第 206 頁。
- 180** 參閱《法蘭克福關於波蘭問題的辯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卷，第 371—431 頁。——第 207 頁。
- 181** 1791 年憲法反映了波蘭小貴族中最進步的人士和城市資產階級的意向。這個憲法廢除了聯邦議會的決議案必須一致通過的原則 (*liberum*

veto)和国王的被选举权,規定政府向联邦議會負責,并給予城市资产階級以許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权利。这些措施反对大貴族和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巩固了中央政权。1791年宪法由于承认地主和农民之間所簽訂的贖买契約具有約束力,而使农奴制关系稍稍緩和。——第208頁。

- 182 參閱《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卷,第322—342頁。巴枯宁的小册子是指1848年在克頓(Koethen)出版的《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Aufruf an die Slaven. Von einem russischen Patrioten Michael Bakunin. Mitglied des Slavenkongresses in Prag»)一书。——第209頁。
- 183 馬扎尔人是匈牙利人的自称,馬扎尔人占匈牙利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語言属芬兰烏格尔語系的烏格尔語族。在羅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也居住有一部分馬扎尔人。——第209頁。
- 184 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在維也納會議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三十四個邦和四个自由市。联邦既沒有統一的軍隊,也沒有財政經費,它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特点,阻碍了德国的发展。它的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主席的联邦議會(參閱注186)。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瓦解,于1850年恢复。普奥战争后为北德意志联邦(參閱注357)所代替。——第211頁。
- 185 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同丹麦在一个王朝統治之下的結合(即共戴丹麦国王为君)是从1460年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一世在位时开始的。——第211頁。
- 186 联邦議會是根据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決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由德国許多邦的代表組成,会址設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联邦議會沒有实际权力,不过是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工具。——第212頁。
- 187 埃德尔丹麦人党(Eiderdänen,即丹麦自由党)的名称来自埃德尔河(Aider)。埃德尔河是什列斯維希和邻近的德国地区交界处的河流。这个党的主张是把直到埃德尔河的什列斯維希公国并入丹麦,而他們的口号就是Danmark til Eideren! [丹麦到埃德尔河]。——第213頁。
- 188 科伦民主协会成立于1848年4月。成員除了小资产者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參加民主协会并積極參予协会的領導工作。1849年4月馬克思及其拥护者着手創立无产階級政党后,就和小

- 資產階級民主派斷絕了組織關係，並退出了民主協會。——第 218 頁。
- 189 科倫工人聯合會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於 1848 年 4 月 13 日在科倫成立的。最初處於同盟盟員哥特沙克的影响下。他忽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务，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國”。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了哥特沙克的宗派主義政策，改變了它的政治路綫。1848 年 10 月馬克思被選為聯合會主席。1849 年德國反革命得勝後，科倫工人聯合會失去了政治性質，變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協會。——第 218 頁。
- 190 指 1848 年 8 月 13—14 日在科倫召開的第一屆萊茵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有十七個民主團體的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參加了大會的工作。大會通過了必須在工人和農民中進行工作以及在農村中建立組織的決議。——第 219 頁。
- 191 馬克思在 8 月 22 日給普魯士內務大臣屈韋特爾寫了申訴書(申訴書的原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卷，第 451—454 頁)以後，內務大臣屈韋特爾於 1848 年 9 月 12 日通過批准科倫行政區政府的決議的方式駁回了馬克思的申訴。接着，普魯士政府就援引《外人居留法》把馬克思當作外國人驅逐出普魯士。——第 222 頁。
- 192 從迫害基督教的掃羅變成擁護基督教的保羅的故事，見《新約》，《使徒行傳》，第 9 章以下。這裡喻指弗萊里格拉特從不革命的人變成擁護革命的人。弗萊里格拉特在 1841 年寫的《寄自西班牙》一詩中說：“詩人的尖塔，高出黨派的閣樓”。這樣就宣布了詩歌脫離政治和為藝術而藝術的反動口號。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甚至決定給詩人以個人年金。但普魯士反動勢力日益加劇的鎮壓活動把詩人推上政治詩歌的道路。在 1844 年秋天弗萊里格拉特發表的詩集《信仰的象徵》的序言中，詩人聲明他已從“詩人的尖塔”降到“黨派的閣樓”，並誓言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貢獻給反對反動派和爭取祖國自由的鬥爭。詩人還在序言中堅決拒絕了國王的年金。——第 223 頁。
- 193 1846 年夏天，拉薩爾曾派人到哈茨費爾特伯爵的情婦處去打聽可以作為伯爵的罪証的一份文件。被派去的人在科倫順手牽羊地拿走了估計會藏有這一文件的匣子，結果為警察所查獲。於是哈茨費爾特伯爵向拉薩爾提出控告，說他是盜竊的主使者。拉薩爾在 1848 年 8 月的持續七天的公審中為自己作了辯護，結果被宣告無罪。後來他把這一演說以《關於文件匣的演說》這一標題出版了單行本。——第 225 頁。
- 194 梅林的這本書在評價拉薩爾和拉薩爾派的活动方面，在理解馬克思和

恩格斯同拉薩尔及其拥护者做斗争的意义方面，都犯了一些比較严重的錯誤。梅林认为拉薩尔是可以“同馬克思并列而无愧”的“革命者”（本书第 396 頁），說拉薩尔的继承者施韦泽“曾坚持原則性的社会主义的立場”（本书第 499 頁），等等。梅林既然对拉薩尔及其拥护者做出这样的评价，当然也就看不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薩尔及其拥护者的斗争的实质。他把馬克思同拉薩尔的意见分歧說成是“最复杂的心理问题”，是“偏見”（本书第 399 頁），說什么馬克思“对死后的拉薩尔比对生前的拉薩尔批評得更加严厉，也更加不公平了”（本书第 400 頁），等等。他还否认拉薩尔主义的宗派主义性质，不相信拉薩尔派同俾斯麦政府相勾結的事实。实际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薩尔及其拥护者的分歧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綱領、策略、組織問題上以及德国統一道路問題上的原則分歧。拉薩尔創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件事本身对于德国工人运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为工人运动提出的綱領却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他根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学說，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組織。因此，他认为不必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只要通过普选权和在容克一资产阶级国家資助下建立的生产合作社（參閱注 315），就可以逐渐地把反动的普魯士国家变成“自由的人民国家”，并且从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根据他从李嘉图和馬尔薩斯那里剽窃来的“工資铁律”（參閱注 317）理論，反对罢工，否认工会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反对工人争取提高工資的斗争。他站在普魯士民族主义的立場上，支持在普魯士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統一（參閱注 294）。拉薩尔力图使德国工人同欧洲无产阶级的总的政治斗争隔离开来，施韦泽也用种种借口极力阻撓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至于拉薩尔和拉薩尔派同俾斯麦秘密勾結的事实，也为梅林死后揭发出来的文件所证实：拉薩尔用支持俾斯麦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和吞并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办法，来换取俾斯麦同意实行普选制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諾言；而施韦泽所主办的拉薩尔派的中央机关报也从俾斯麦那里領取津貼。梅林对馬克思著作中对拉薩尔派的尖銳的原則性的批判大都略而不提，把《哥达綱領批判》中彻底揭露拉薩尔派的反无产阶级性质的部分称为“非常不妙的方面”（本书第 629 頁），也是非常錯誤的。总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薩尔和拉薩尔派的斗争，为在德国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奠定了基础，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树立了光輝的榜样。而集中地批判了拉薩尔主义的《哥达綱領批判》，直到今天仍在为反

对和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提供着锐利的武器。这些伟大的意义是决不容曲解和低估的。——第 226 頁。

- 195 1848 年 10 月 6 日，維也納的學生、小資產階級和工人為了阻止奧地利反動派派兵支援駐匈軍總司令耶拉契奇而發動了起義。起義者一舉攻下了軍械庫，武裝了大約十萬人，迫使皇帝逃出了維也納，政府軍隊也調離城市，革命一時取得了勝利。11 月 1 日，起義的維也納為文迪施格雷茨的軍隊所攻陷，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但是這次起義具有巨大的意義，因為它破壞了反革命的軍事計劃，擋住了反動派給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國所準備的打擊。——第 226 頁。
- 196 馬克思是在 8 月 27 日從柏林到達維也納的。第二天他便參加了這裡的民主聯合會會議，會上討論了 8 月 23 日巷戰後的形勢問題。直到 9 月 6 日為止，馬克思在這裡會晤了各民主團體和工人組織的領導人，同奧地利國會的德國捷克黨團領導人討論了奧地利的民族問題以及捷克工人与德國工人的相互關係問題，並在維也納工人聯合會會議上論述了西歐的社會關係和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做了關於僱傭勞動與資本的報告。9 月 7 日馬克思提前返回科倫。——第 227 頁。
- 197 馬克思於 1848 年 11 月 3 日發表在《新萊茵報》上的《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告德國人民書》一文中說：“不管《民主主義者代表大會的告人民書》怎樣，我們還是希望人民從睡夢中蘇醒過來，並給予維也納以他們在目前能力所及的唯一幫助，這種幫助就是戰勝本國的反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 卷，第 530 頁）弗萊里格拉特則在《維也納》一詩中寫道：

“你應該在自己的國土上保衛維也納。

先把國內的反革命鎮壓！

為了把他們消滅在維也納城下，

先要把我們本國的耶拉契奇們打垮。”

（《弗萊里格拉特選集》，俄文版，第 189 頁）

——第 228 頁。

- 198 黑黃旗是當時奧地利的國旗。——第 228 頁。
- 199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 卷，第 39 頁。——第 230 頁。
- 200 關於《新萊茵報》在 1848 年 12 月間發表的論述普魯士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 卷，第

- 96—172 頁。——第 233 頁。
- 201 根据維也納會議的決議，萊茵河兩岸的土地划入普魯士版圖。此外，還給普魯士國王的稱號加上了萊茵大公的頭銜。1815 年 4 月 5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為慶賀這個地區并入普魯士而發表了一篇宣言，允諾在萊茵省和全國實行代議制。——第 234 頁。
- 202 沃尔弗的《西里西亞的十億》應是從 1849 年 3 月 22 日起在《新萊茵報》上連載的。沃尔弗在文章里指出封建主從農民的口袋里壓榨了折合十億法郎的款項。他要求西里西亞的地主儘快地歸還這筆款項，要求無償地取消各種勞役和現金代役租，并要求分割上西里西亞大地主的巨大領地。這篇論文起了喚醒整個德國的作用，使報紙的訂戶大大增加。文章引起了統治集團的巨大驚恐，但是受到農民的熱烈歡迎。反動的《新普魯士報》認為這篇文章是“一篇共產主義的文章，它的目的在於教唆西里西亞的農民去反對大地主，甚至煽動他們去暴動。”
- 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一文中寫道：“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許多鼓動性文章當中，只有少數文章獲得了像在 3 月 22 日到 4 月 25 日發表的這八篇文章所獲得的那樣巨大的成功。”（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9 卷，第 78 頁）——第 237 頁。
- 203 指 1847 年 12 月下半月在布魯塞爾德國工人協會所作的報告。馬克思根據這一報告寫成了《僱傭勞動與資本》這一著作，在《新萊茵報》上以社論的形式於 1849 年 4 月 5—8 日和 11 日首次發表（但由於馬克思離開科倫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刊載的文章中斷了）。這一著作的發表有助於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德國工人中間的傳播。這部著作的單行本是 1880 年在布勒斯勞首次出版的，以後又在霍廷根—蘇黎世出版過。1891 年又出版了由恩格斯校訂并作序的新版。恩格斯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使文章的敘述符合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進一步發展。——第 237 頁。
- 204 帝國憲法是 1849 年 3 月 28 日在法蘭克福議會通過的。它反映了當時議會中民主黨和自由資產階級中間派的妥協。憲法里面充滿了矛盾：既規定了民主自由，又把行政權授與以皇帝為首的帝國政府；與土地相聯系的封建勞役和租稅並未廢除，而必須贖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這部憲法只是一紙空文，沒有實行其各項條文的任何力量。德國的幾乎所有的大邦（普魯士、薩克森、巴伐利亞、漢諾威等）的政府都拒絕承認這部憲法；只有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導下在萊茵省、德勒斯頓、巴登和普法爾茨發動武裝鬥爭的群眾是它的唯一維護者。——第 237 頁。

- 205 欽波拉索火山(Chimborazo)是南美厄瓜多尔中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火山,高六千二百七十二公尺,山頂終年积雪。——第 238 頁。
- 206 額魯特蒙古人的一支,17 世紀初自阿尔泰山地区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这里所說的西方卡尔梅克人喻指西方的野蛮的反动势力。——第 239 頁。
- 207 弗莱里格拉特在《〈新莱茵报〉的告別詩》中写道:
 “別了! 只是并非永別!
 他們消灭不了我們的精神, 弟兄們!
 当钟声一响, 生命复临, 我还要生气勃勃地
 回到你們身边!
 当最后的王座傾覆,
 当人民走上法庭
 喊出无情的声音: ‘你們有罪’,
 那时候我还要重新回到你們身边。
 我这个被放逐的叛乱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到处起义的人民的战友,
 将在多瑙河畔和莱茵河边,
 用言語和武器参加战斗!”
 (《弗莱里格拉特选集》,俄文版,第 196 頁)
 ——第 240 頁。
- 208 秩序党是 1848 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階級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統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联合而成的。从 1849 年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該党一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議會中占据领导地位。——第 241 頁。
- 208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 卷,第 125 頁。——第 241 頁。
- 210 莫尔比昂省在法国西北部,南部面临大西洋,为布列塔尼(Bretagne)的一部分。关于法国当局要馬克思迁往莫尔比昂的事情,參閱 1849 年 8 月 23 日馬克思自巴黎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 卷,第 131—132 頁)。——第 241 頁。
- 211 羅馬省沿第勒尼安海的一片沼地,位于齐斯特尔那与提尔拉齐尼之間,占地七百五十平方公里。在古羅馬共和国时期这里原是一片肥沃富庶的地区,但后来因排水工作不善,逐漸变为一片沼泽,成了热病流行之

- 所。——第242頁。
- 212 參閱1849年8月23日馬克思從巴黎寄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卷，第132頁。——第243頁。
- 213 指《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9—125頁。——第246頁。
- 214 指《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127—235頁）。這一著作論述的是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歷史。恩格斯在同遭受失敗的最後一批起義軍戰士到瑞士後即開始撰寫這一著作。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在這一著作中抨擊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第246頁。
- 215 克里奧洛是拉丁美洲土生的白人，尤指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兒。美斯提左是白人（尤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兒。——第247頁。
- 216 指格·弗·道梅爾的《新時代的宗教。創立綜合格言的嘗試》（G. Fr. Daumer: «Die Religion des neuen Weltalters. Versuch einer combinatorisch-aphoristischen Grundlegung»），基佐的《英國革命為什麼會成功？英國革命史討論》（Guizot: «Pourquoi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a-t-elle réussi? 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托馬斯·卡萊爾的《當代評論。（一）當前的時代。（二）模範監獄》（«Latter-Day Pamphlets», Edited by Thomas Carlyle—No. I: «The Present Time. —No. II: Model Prisons»）。馬克思和恩格斯評論這些著作的文章，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236—242、247—253、300—312頁。——第247頁。
- 217 恥辱柱是一種刑罰，即把罪犯拴在廣場的柱子上，列舉出他的罪名，使之當眾受辱。與中國歷史上的枷杻示眾相仿。正文所說的政治恥辱柱，是一種譬喻的說法。——第249頁。
- 218 《射手奧托》（«Otto der Schütz»）是金克爾在1846年發表的使他成名的抒情敘事詩。——第251頁。
- 219 1849年9月馬克思被選入倫敦德國流亡者救濟委員會。該委員會附設於當地的德國工人教育協會。為了消除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流亡者對流亡倫敦的無產階級分子的影響，委員會根據馬克思的提議改組成為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領導的社會民主主義流亡者委員會。後因該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受到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于

- 1850年9月退出該委員會。——第254頁。
- 220** 神圣同盟是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簽訂的反應同盟，一直存在到1833年。神圣同盟成立后不久，法國和歐洲的其他許多國家也都參加了這個同盟。同盟的目的是維護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所確定的國界的不可侵犯性，鎮壓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19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同盟實際上陷于瓦解。——第256頁。
- 221** 工人聯誼會是斯蒂凡·波爾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國工人和手工業者的組織。波爾恩是工人運動中改良主義路線的代表，他使聯誼會的活動局限于組織經濟罷工和爭取實現一些滿足手工業者狹隘行會利益的措施（如給小生產者以貸款和組織合作社等）。但是由於它的地方分會有很多處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的領導之下，所以在1848—1849年革命中曾積極參加了革命鬥爭。1849年春季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籌建無產階級政黨，曾經想利用工人聯誼會組織。1850年該會活動遭到政府禁止，但是它的若干分會還繼續存在了許多年。——第258頁。
- 222** 1850年5月31日法國頒布的新選舉法實際上取消了普選權。新選舉法規定，只有那些有三年居住資格和列入納稅人名單的公民才算是選民。這就使許多人喪失了選舉權，特別是夏季從農村到城市來的短工。根據新法令失去選民資格的人數在三百萬左右。巴黎一地的二十二萬選民中就有十四萬多人喪失了投票權。——第259頁。
- 223** 指恩格斯于1850年夏天在倫敦寫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383—483頁）。——第261頁。
- 224** 指根據馬志尼的倡議于1850年6月在倫敦成立的歐洲民主派中央委員會。該會由於內部矛盾重重以及法國和意大利民主派流亡者的關係惡化而于1852年3月實際陷于瓦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5—6期上批判了它的1850年7月3日的成立宣言（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535—540頁）。——第262頁。
- 225** 大英博物館是設于倫敦的英國國立的收藏文學、科學、藝術等方面文獻古物的機構。它是在1753年根據議會的法令以科頓、哈雷和斯隆三人的收藏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包括圖書館、獨立的自然史博物館，以及手稿部、古代東方部、希臘羅馬古物部、版面繪畫部等等。由於藏書不斷增加，它從19世紀初到本世紀初曾經有過幾次擴建。到最近為止，

- 它的藏書有六百萬冊、手稿六萬份，紙草三千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均曾在它的圖書館的閱覽廳做過研究工作。——第 267 頁。
- 226 在古代希臘有一首模擬荷馬敘事詩的諷諧敘事詩《鼠蛙之戰》(*Βαρραχομυομαχία*)，作者不詳。詩的內容講的是鼠王的兒子在池邊飲水，遇到蛙王，於是雙方各自吹噓自己那裏如何如何好。蛙王要老鼠騎在自己的背上去池子那邊看一看，但是中途遇到水蛇，老鼠驚吓落水而死，結果引起鼠族和蛙族之間的一場大戰。這裏用來比喻一場無聊的爭吵。——第 268 頁。
- 227 盧格是在呂根島 (Rügen) (現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出生的，而呂根是波美拉尼亞的一部分，所以馬克思說盧格是“波美拉尼亞的思想家”。——第 268 頁。
- 228 “阿爾諾德·文克爾里德”是半傳說的瑞士戰士，反對普魯士壓迫的解放戰爭的參加者；相傳在 1336 年 6 月 9 日，當瑞士人同奧地利公爵列奧波特二世的軍隊在森帕赫城下作戰時，他舍身殺敵決定了瑞士人的勝利。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流亡中的大人物》這本小冊子中把阿爾諾德·盧格戲比為阿爾諾德·文克爾里德。小冊子中說：“和阿爾諾德·文克爾里德一樣，他(指阿爾諾德·盧格。——譯者)也沒有發現自由的道路(Gasse)，他自身就是‘自由’的陰溝(Gosse)。”(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8 卷，第 316 頁)在《高尚意識的騎士》一文中則把盧格直接稱為“阿爾諾德·文克爾里德·盧格”(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 卷，第 547 頁)。——第 268 頁。
- 229 這些文章就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8 卷，第 3—115 頁)。恩格斯在這些文章里闡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 1848—1849 年德國革命的最重要問題的看法。恩格斯的這些文章是應當時埋頭於經濟研究工作的馬克思的請求而寫的，在寫作時他利用了馬克思所提供的若干補充材料並經常同他交換意見，文章寫好之後，均經馬克思過目。這些文章發表時署名是馬克思，直到 1913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書信發表之後，大家才知道這些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第 269 頁。
- 230 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 269 頁。
- 231 雨果的《小拿破侖》(*Napoléon le Petit*)是作者因反路易·波拿巴而亡命布魯塞爾時(1852)發表的。小拿破侖是雨果給路易·波拿巴起的諷刺性的外號。——第 271 頁。

- 232 蒲魯东著有《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1852)一书,闡述了他对波拿巴政变的看法。——第 271 頁。
- 233 “Hic Rhodus, hic salta!” 原来的意思是:“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原話出自《伊索寓言》中《說大話的人》(參閱《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7--28 頁)。內容是說一个爱說大話的人,夸口說他在罗陀斯島作过一次精彩的跳跃,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比得上他,还說那里在場的人們可以給他作证。但是旁边的一个人对他說:“朋友,如果真是这样,你何必举出证人,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意思是要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本領,說空話是沒有用的。罗陀斯在希腊語中是一个島名,也作玫瑰花讲。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里把这句話写成“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Hier ist die Rose, hier tanze”)——第 272 頁。
- 234 汪东圆柱是为了紀念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而于1806—1810年在巴黎江东广场用从敌人繳获的大炮澆鑄的,柱頂有拿破侖第一的銅像。1871年5月16日根据巴黎公社在4月12日做出的決議予以拆毀,因为它“是野蛮的紀念碑,是暴力和虛榮的象征”。这样,馬克思的預言便無論从政治意义上說,还是从实物意义上說都實現了。——第 272 頁。
- 235 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的政变。——第 273 頁。
- 236 弗莱里格拉特在 1851 年 1 月給魏德迈的杂志《革命》写的詩中把金克尔比做一个卖免罪符的人。他写道:
 “……靠免罪符未必能赶走
 自由的敌人,
 不,乞求者从未推翻过帝王的宝座;
 不,革命不能是販賣的商品;
 ……………
 革命不会期待
 人們向他投擲施舍。”
 (《弗莱里格拉特选集》,俄文版,第 223 頁)
 ——第 275 頁。
- 237 1851 年 9 月法国当局逮捕了在 1850 年 9 月脫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維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員。由于維利希—沙佩尔集团

- 采取小資產階級的密謀策略，指望立即組織起義，致使法國和普魯士警察當局能夠靠領導巴黎的一個地方支部的奸細舍爾瓦爾捏造了所謂“德法密謀”。馬克思在《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這一著作中徹底揭穿了普魯士警官施梯伯為製造“德法密謀”而捏造的一切偽證（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472—487頁）。——第276頁。
- 238 德國中世紀民間史詩《尼伯龍根之歌》中的英雄、尼德蘭首都萊騰的王子齊格弗里特擁有尼伯龍根族的寶藏，這寶藏後來成了紛爭的根源。——第277頁。
- 239 指《流亡中的大人物》，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259—380頁。——第277頁。
- 240 見馬克思在1853年4月寫的《希爾施的自供》一文，這篇文章公開揭露了曾一時迷惑了他的班迪亞的行為（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44—48頁）。——第277頁。
- 241 馬克思在1855年9月6日給丹尼爾斯的夫人阿瑪里亞·丹尼爾斯的信里說：“這是一個溫文爾雅的、最高尚的人，在他身上，堅毅的性格、卓越的天才和美好的儀表以一種稀有的和諧結合在一起……他的早亡，不僅對於他的家族和友人，而且對於科學、對於勞苦大眾，也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因為他在科學方面是有遠大前途的，而對勞苦大眾來說則是他們的忠誠的先進戰士……我失掉了一位我所最敬愛的友人……我希望能有一個機會，給那些剝奪了他的生命的人以比在一篇追悼文中所能給予的報復更為嚴厲的報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12頁）——第280頁。
- 242 進步黨是1861年6月成立的德國資產階級政黨。這個黨的著名活動家有瓦爾德克、微耳和、舒爾采-德里奇、福爾肯貝克等。進步黨的綱領提出如下一些要求：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德國，召集全德議會，成立對眾議院負責的強有力的自由派內閣。由於害怕人民革命，進步黨不支持普選權和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基本民主要求。1866年該黨右翼另行成立了一個聽命於俾斯麥的民族自由黨。——第280頁。
- 243 還在科倫審判案之前，沙佩爾便會通過伊曼特向馬克思表示悔悟，並希望回到同盟里來。馬克思雖不會立刻表示和解，但是也沒有拒絕沙佩爾的這種表示，同時提出要沙佩爾同維利希公開決裂作為先決條件。馬克思直到1856年才同徹底認識自己錯誤的沙佩爾完全和解。此後

- 沙佩尔始終是馬克思的忠誠的朋友。——第 280 頁。
- 244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8 卷，第 457—536 頁。——第 280 頁。
- 245 奧·維利希曾在 1853 年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4 日的《美文学杂志和刑法报》上发表《卡尔·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对馬克思进行誹謗。——第 282 頁。
- 246 《高尚意識的騎士》(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 卷，第 537—571 頁) 应写于 1853 年 11 月并在阿·克路斯和約·魏德迈的协助下于 1854 年 1 月在紐約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駁斥了維利希的誹謗，揭露了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冒險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第 282 頁。
- 247 參閱馬克思著《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 頁。——第 282 頁。
- 248 这里是說歌德和黑格尔由于对統治者采取了妥协调和的庸俗态度，才得到了他們的賞識。发辮是指他們头上的假发的发辮，是高位者的标志，一般也用以喻庸俗、陈腐、反动和官僚气。——第 286 頁。
- 249 传说基督在这里被釘在十字架上。——第 286 頁。
- 250 指拿破侖在 1815 年 6 月滑铁卢一役失敗后被流放于大西洋上的圣海伦那島并死于該島一事。 第 286 頁。
- 251 指歌德。歌德在 1775 年应魏瑪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請到魏瑪任国务大臣。——第 286 頁。
- 252 指黑格尔。黑格尔在 1818 年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在职期間写了《法哲学》一书，成了官方的普魯士国家哲学家。——第 286 頁。
- 253 馬克思在《第六届萊茵省議会的辯論(第一篇論文)》中是这样說的：“作家当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應該为了掙錢而生活，写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87 頁)——第 288 頁。
- 254 根据希腊神話，赫菲斯特(Hephaestus)是宙斯和希拉的儿子，火与金属制品之神。他曾受宙斯之命把普罗米修斯鎖在高加索山的悬岩上。參閱注 39。——第 291 頁。
- 255 參閱 1868 年 4 月 30 日馬克思从伦敦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57 頁)。——第 292 頁。
- 256 梅兰希通于 1815 年在符騰堡大学任希腊語教授期間受到在同校任神

- 学教授的路德的影响,成为路德的最亲密的战友。1521年著有《神学綱要》(《Loci Communes rerum theologiarum》)一书,将路德神学加以体系化。但是他比路德更多妥协的倾向。他为了調和新旧两派的矛盾,力图扩大同天主教的一致点,以此与路德的关系屡屡陷于紧张。路德死后虽成为路德派教会的领导者,但仍与严格的路德主义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第293頁。
- 257 从1794年起席勒和歌德开始了在文学史上为人所称道的十年合作时期。1779年席勒甚至从耶拿迁居魏瑪,得到魏瑪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授予的贵族称号。二人在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之下各自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著作:歌德完成了《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1794—1796)和《海尔曼和多罗塞亚》(《Hermann und Dorothea》,1797)等,席勒完成了《华伦斯坦》(《Wallenstein》,1796—1799)《威廉·退尔》(《Wilhelm Tell》,1804)等戏曲;两人合力写作了批判当时社会的《警句》(《Xenien》);两人的通信集也成为了解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德国文学的最珍贵的文献。但是在魏瑪,席勒和歌德的关系也并不是亲密无間的。席勒在給洪堡尔特的信中曾埋怨歌德“悠閑蹣跚”,对魏瑪政府也抱着批判态度。他在1803年10月10日給柯尔納的信中談到耶拿人学(設在魏瑪)的思想腐敗时曾說:“我并未袖手旁观,我确曾劝告这里的政府和公爵采取有力的步骤;但是这里恶势力横行,一切善良的对策都受到拒斥。”在这样的心情下詩人曾考虑离开魏瑪。——第293頁。
- 258 閃族人包括西南亚洲和北非的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古代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此处指馬克思的犹太人血統。——第294頁。
- 259 桑乔·判札是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訶德的侍从。——第295頁。
- 260 恩格斯在《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书中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的高些,看的远些,观察的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远不会有現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平的。”(上引书,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頁)——第295頁。
- 261 参阅保尔·拉法格,《忆恩格斯》,載《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4頁。——第299頁。

262 指 1815 年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的英军统帅威灵顿和普军统帅勃留赫尔。拜伦对拿破仑的态度虽然经历过种种矛盾，但总的說来是同情的，而对复辟后的法国王朝及其英国盟友則抱着輕蔑的态度。他写过《拿破仑頌》、《拿破仑的告別》等等。在 1816 年 3 月发表的《譯白法文的頌詩》中曾写道：

“首領覆沒了，但不是由于你們，
滑铁卢的胜利的將軍！”

——第 300 頁。

263 參閱 1851 年 4 月 11 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 卷，第 214—215 頁。——第 300 頁。

264 克里木战争(1853—1856)是俄国同主要是土耳其、英、法之間的战争。1853 年沙俄为了掠夺黑海海峡并扩张自己在巴尔干半島上的势力对土耳其发动进攻，英法两国为了同沙俄爭夺近东的霸权，于 1854 年对俄宣战，而克里木則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1855 年沙俄由于政治上的腐敗和軍事技术、經濟方面的落后而战败，1856 年締結了不利于沙俄的巴黎和約。——第 301 頁。

265 蓝皮书是英国議會和外交部发表的資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 17 世紀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經濟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資料。馬克思为了写《資本論》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頁文章，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載有英格兰与苏格兰調查委员会和工厂視察員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认为这些报告是研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文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曾大量引用蓝皮书的材料。——第 304 頁。

266 諾恩堡(紐沙特尔公国)原是普魯士的藩屬。1806 年拿破仑战争时期諾恩堡并入法国。1815 年，它根据維也納會議的决定参加了瑞士联邦，但同时保持了对普魯士的藩屬关系。1848 年 2 月 29 日諾恩堡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成立共和国，結束了普魯士的統治。1856 年 9 月，諾恩堡的貴族发动叛乱，目的是要恢复他們的封建特权，恢复普魯士国王的宗主权。叛乱者为瑞士政府所逮捕，普魯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当局在答复时則要求普魯士国王放弃对諾恩堡的权利。1857 年 3 月 5 日欧洲国家召开了关于諾恩堡的會議。——第 307 頁。

267 指馬克思的《帕麦斯顿勳爵》一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 卷，第 387—461 頁)。这一組文章是馬克思在 1853 年

- 10月初开始撰写的,原定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連載,但馬克思也同意在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報》上同时发表。《人民報》在1853年10月22日到12月24日間共登載了八篇,并給这些文章加了《帕麦斯顿勋爵》这一总标题。《紐約每日論壇報》則拖到1854年初才发表,而且只发表了四篇,并且采取社論的形式,标题也不相同。两个报纸上文章的文字略有不同。这組文章发表后不少报纸曾加以轉載。——第308頁。
- 268 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給拉薩尔的信里說,“我不願与这位先生为伍,我同他只是在一点上,即在评价帕麦斯顿上有共同处,其他一切問題我都持有正相反的意見,这一点在我們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第308頁。
- 269 在1855年末和1856年初,《自由新聞》轉載了馬克思关于帕麦斯顿的所有八篇文章,并作为《〈自由新聞〉小丛书》的第5号单独印行,題为《帕麦斯顿勋爵传》。单行本并标出了作者的名字。——第309頁。
- 270 參閱哈尼:《关于恩格斯》,載《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6—217頁。——第310頁。
- 271 諾曼人(按斯堪的那維亞語是北方人的意思)是斯堪的那維亞各部族(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的一个分支。10世紀時曾侵占法国的諾曼底,故亦称諾曼底人。1066年諾曼人侵占了英格兰,而諾曼底公爵成为英格兰国王即征服者威廉。所謂出身于古老的諾曼氏族当指是諾曼人的后裔而言。——第310頁。
- 272 摩尔(来自希腊文 *μαυρός*, 意为黝黑的)在8世紀前原指北非各国(埃及除外)的原住民。后来欧洲人亦用以泛指黑皮肤的人。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卡尔·馬克思》一文中說:“‘摩尔’这个名字是常用的,几乎成为他正式的名字了。不仅我們这样叫馬克思,所有亲密的友人也这样叫他。”(《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5頁)——第312頁。
- 273 參閱威廉·李卜克內西:《忆馬克思》,載《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150頁,特别是125—130頁。——第313頁。
- 274 1665年在伦敦曾发生过后来蔓延于全英的黑死病,这次疫病在英国历史上称为 Great plague (大瘟疫)或 London plague (伦敦瘟疫)。因傳染致死者近七万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丹尼尔·狄孚(Daniel Defoe)的《瘟疫之年手記》(《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便是描述这次大瘟疫的。——第315頁。

- 275 英国当鋪門口都挂着三个鍍金的圓球。——第 316 頁。
- 276 这里指拉薩尔。关于梅林对于拉薩尔的看法的錯誤，參閱注 194。——第 316 頁。
- 277 沃尔弗通过恩格斯的介紹于 1853 年 9 月到曼彻斯特的一个德国商人家中担任家庭教师。他在这里一直到去世，經常同恩格斯見面，討論最重要的政治問題和无产階級政党策略問題。馬克思也經常和他通信，并把自己写的文章寄給他。——第 316 頁。
- 278 參閱 1855 年 12 月 14 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119—120 頁。——第 318 頁。
- 279 參閱 1856 年 3 月 7 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146 頁。——第 320 頁。
- 280 1857 年的危机开始于美国。当时美国有四千九百个企业宣告破产。在法国和英国，随着危机的到来，失业者大量增加，英国的失业者在 1858 年比 1853 年增加了六倍。这次危机一直延續到 1859 年，促进了欧美工人运动的高涨。——第 320 頁。
- 281 參閱 1857 年 4 月 22 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220—222 頁。——第 321 頁。
- 282 參閱馬克思 1857 年 12 月 21 日給拉薩尔的信和 1857 年 12 月 22 日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9 卷，第 193、445、446 頁。——第 325 頁。
- 283 參閱 1858 年 1 月 28 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 卷，第 329—330 頁。——第 325 頁。
- 284 馬克思对此书的評語參閱 1858 年 2 月 1 日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97—99 頁。列宁在《拉薩尔〈爱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說：“为什么馬克思把拉薩尔的这本著作叫做‘小学生的’作文……这是显而易見的。拉薩尔简单地重彈黑格尔的調子，抄襲他的話，无数次地反复咀嚼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个别論点，用无数的学究气、书呆子气十足的廢話来充塞自己的著作。”他还說：“总之，ΣΣ〔总而言之〕，馬克思的評論是正确的。拉薩尔的这本书不值得一讀。”（《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8 卷，第 385—386、402 頁）——第 325 頁。
- 285 指 1858 年 1 月 25 日英国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的女儿維多利亞公主（1840—1901）同普魯士王儲弗里德里希-威廉（后来的弗里德里希

- 三世)結婚一事。——第 326 頁。
- 286 指《哲學的貧困》，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71—198 頁。——第 327 頁。
- 287 指 1859 年 4 月 29 日—7 月 8 日的法國和皮蒙特(皮蒙特本是意大利的薩丁王國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亦泛指整個撒丁王國)對奧地利的戰爭，亦稱法意奧戰爭。戰爭是由拿破侖第三發動的，他企圖在“解放”意大利的名義下通過勝利的“局部”戰爭掠奪領土，借以鞏固他在法國的統治。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則希望通過戰爭實現在薩瓦王朝統治下的意大利統一。奧軍在馬振塔和索爾費里諾戰敗(參閱注 326)後，拿破侖第三由於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日益發展和不願意促成意大利統一而同奧地利單獨締結了維拉弗蘭卡和約。戰爭結果，法國獲得薩瓦和尼斯，倫巴等併入撒丁王國。威尼斯省則在 1866 年以前一直由奧地利統治。——第 336 頁。
- 288 薩丁王國是 1720—1861 年間薩瓦王朝統治下的一個王國，領土除薩丁島之外還包括薩瓦、尼斯、皮蒙特。根據 1815 年維也納會議的決定，它又取得了包括熱那亞在內的利古里亞。——第 337 頁。
- 289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9 年 4 月 3 日拒絕擔任法蘭克福議會在 3 月 28 日選他擔任的德國皇帝，借口是神授的君權不能由選出的議會批准授予。他還表示，這一帶有革命氣味的“皇位可能給他帶來最大的不幸”。——第 337 頁。
- 290 在克里木戰爭(參閱注 264)中，奧地利表面上雖然保守中立，但是它卻以最後通牒的形式於 1854 年 8 月迫使俄軍退出前一年(1853 年 6 月)占領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希亞，並根據 6 月 14 日和土耳其締結的條約占領了它們。自此便形成了奧俄之間的對立。——第 339 頁。
- 291 1831 年路易·波拿巴曾在意大利加入燒炭人的團體，還一度參加該黨的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9 年寫的《歐洲的金融恐慌》一文中曾經談到奧爾辛尼被處死前後路易·波拿巴因受意大利燒炭黨人恫嚇而失魂落魄的情形(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3 卷，第 190—191 頁)。——第 340 頁。
- 292 指 1815 年 6 月 8 日在維也納會議上通過的聯邦條例(Bundesakte)。——第 341 頁。
- 293 威廉一世開始擔任普魯士攝政時(1858 年 10 月)所宣布的“自由主義的”方針被資產階級報刊吹捧為“新紀元”(Neue Ära)。威廉的政策

实际上是在于加强普魯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障地，根本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自由主义改革。“新紀元”实际上为1862年9月俾斯麦执政时的公开的容克地主的军事专政作好了准备。——第342頁。

284 这个小册子出版于1859年5月。小册子是匿名的，只注明“来自民主的声音”。拉薩尔在这本小册子中所阐述的观点，表现出了他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统一道路問題上的原則分歧。拉薩尔站在普魯士民族主义的立場上，希望奥地利失败，借以实现普魯士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统一；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从革命的立場出发，主张站在奥地利方面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因为当时同沙皇俄国结成联盟的法国是欧洲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列宁在談到这个問題时曾說：“我們(与梅林的意見相反)认为，馬克思是对的，而拉薩尔在当时，也像他向俾斯麦献媚的时候一样，是机会主义者。拉薩尔設法使普魯士和俾斯麦获得胜利，使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缺乏足够的力量。这样一来拉薩尔便倒向民族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馬克思則提倡和发揚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怯懦行为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魯士出面反对拿破侖，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拉薩尔的眼睛不是朝下，而多半是朝上，瞅着俾斯麦。俾斯麦的‘胜利’，决不能說明拉薩尔的机会主义是对的。”(《列宁全集》，參閱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卷，第119—120頁)——第344頁。

285 勃魯姆的被杀是指法兰克福議會左翼領袖罗伯特·勃魯姆因参加1848年10月維也納起义而被奥地利反革命军队杀害一事。关于奥里穆茨，請參閱本书第337頁脚注。霍尔施坦是指1848—50年普魯士站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起义者一边参加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因受到奥地利的压力而不得不与丹麦締結和約一事。布隆采耳是指庫尔黑森起义时期普奥两国的先头部队于1850年11月在布隆采耳城下发生的一次小規模冲突。在这次冲突中，奥地利由于得到俄国的支持而迫使普魯士让了步。拉薩尔提到这些事件是为了煽动德国人对奥地利的仇恨，替他的普魯士民族主义立場辯护。——第345頁。

286 1805年拿破侖在烏尔姆(10月)和奧斯特利茨(12月)击败奥軍，奥地利被迫締結和約。按照条約的規定，它失去了威尼斯、伊斯特里亚和达尔瑪提亚等地，并支付了大量賠款。——第349頁。

287 民族联盟是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大会上成立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联盟的

- 宗旨,是要在普魯士的領導下統一全德(奧地利除外)。聯盟于1867年11月解散。聯盟的盟員則創立了民族自由黨,成為俾斯麥的主要支柱之一。——第350頁。
- 298 指意大利違反拿破侖的初願于1870年終於在薩瓦王朝統治下獲得了全國統一一事。——第351頁。
- 299 指1849年5月在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領導下在萊茵省、德勒斯頓、巴登和普法爾茨發動的以失敗告終的武裝起義(參閱注204)。——第353頁。
- 300 Hermann 原來是凱路斯奇人(Cherusci)的領袖阿爾米尼烏斯(Arminius)的訛稱,公元9年他曾在條多堡森林中全歼羅馬總督瓦魯斯的三個軍團約二萬人。17世紀末洛恩施坦(Lohenstein, 1635—1683)的長篇小說《英勇的人民英雄阿爾米尼烏斯,或海爾曼》出版後,人們使用海爾曼來稱呼阿爾米尼烏斯。以海爾曼為刊物的名稱,帶有資產階級狹隘民族主義的氣味。——第353頁。
- 301 參閱1859年5月18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卷,第456頁。——第354頁。
- 302 指恩格斯的《意大利戰爭》一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477—490頁。這篇文章是恩格斯于1859年7月20、28日和8月3日左右寫成的,發表在1859年7月23、30日和8月6日的《人民報》上。——第355頁。
- 303 1849年5月30日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由於受到驅逐的威脅而遷到斯圖加特。由於普魯士國王拒絕接受王位和帝國攝政奧地利大公約翰的政變,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左派和極左派)占優勢的議會于1849年6月6日選出了由弗·拉沃、卡·福格特、格·西蒙、弗·許列爾和阿·貝黑爾等五人組成的帝國攝政,企圖靠議會的幫助保證革命獲得勝利。但是6月18日該議會為符騰堡的軍隊所驅散。——第356頁。
- 304 水晶宮(Crystal Palace)是為1851年在倫敦舉行的首屆世界工商業展覽會而在海德公園用金屬與玻璃建造的,1854年移至錫登安姆(Sydenham),成為美術展覽館和舉辦音樂會的場所。1936年毀于火。——第359頁。
- 305 《華倫斯坦的陣營》(«Wallensteins Lager»)是席勒花了七年時間于1799年最後完成的巨大三部曲《華倫斯坦》的第一部。這部戲曲以德國的三十年戰爭為主題。歌德會積極參加這部戲曲的寫作。參閱注257。

——第 360 頁。

306 席勒学会成立于 1859 年 11 月。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起初恩格斯曾对该学会的活动抱批判态度。在学会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 1864 年担任学会理事，后来又任学会主席。1868 年 9 月恩格斯因该学会理事会在其离开曼彻斯特期间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去学会讲演而辞去主席和理事职务。1870 年 4 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学会理事，但已不再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第 360 頁。

307 “不管一切的一切”是弗莱里格拉特发表在 1848 年 6 月 6 日《新莱茵报》第 6 号上的《不管这一切》（«Trotz Alledem»）一诗中的叠句。——第 368 頁。

308 “Philister über mir”是从“Philister über dir”（“非利士人拿你来了”）这个成语变化来的。按《旧约》中《士师记》第 16 章，同力大无旁的参孙为敌的非利士人（Philister）以重赏唆使同参孙相爱的女人大利拉打探参孙何以有这样大的气力。参孙连续三次对她撒谎。每当大利拉按照参孙所说的办法把他捆住并要预先埋伏起来的非利士人捉他时，她都假惺惺地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最后参孙把他取得力量的秘密告诉了她，结果终于被非利士人捉住并被剜掉了眼睛。

后来“Philister über dir”就有了“危险迫临你的头上”的意思，这里 Philister 当指敌人而言。但在一般用语中，Philister 有市侩，庸人的意思。

马克思所说的“Philister über mir”，直译似应是宁可让“庸人反对我”的意思。这里译为“反对庸人”系意译。——第 368 頁。

309 梅林对《福格特先生》一书的评价是不正确的。首先，马克思写作这部著作是为了维护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在“诽谤攻击面前进行辩解”。马克思本人在 1860 年 2 月 23 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就曾说过：揭露福格特“对于从历史上证实党的正确，对于党将来在德国的地位具有决定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30 卷，第 373 頁）。其次，这本书也是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因此，它的意义决不是“得不偿失的”。恩格斯在 1860 年 12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是你曾经写过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2 卷，第 622 頁）——第 372 頁。

310 巴黎的一座皇宫，曾为拿破仑第三的官邸。始建于 1564 年。1871 年

- 巴黎公社时期毀于战火。——第 374 頁。
- 311 協商派是指 1848 年柏林的普魯士國民議會中拥护“同國王協商”制定憲法這一“協商”原則的一派議員。——第 380 頁。
- 312 這是歌德在 1802 年寫的两首十四行詩的第二首(«Natur und Kunst, sie…»)中的詩句, 這首詩的最后三句是:
- “追求偉大事物的入必須全力以赴,
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現自己,
而規律只能給我們以自由。”
- (載《歌德編年詩集》[«Goethes Gedichte in zeitlicher Folge»], 島崎出版社, 第 1 卷, 第 489 頁)
——第 383 頁。
- 313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 南軍將領杰克遜率領他的一旅士兵據說在一次战斗中“像石壁一樣地”(巴納德·畢將軍語)擋住了北軍的進攻, 因而得到了 Stonewall Jackson [石壁·杰克遜]的綽号。——第 384 頁。
- 314 斯多葛派是公元前 4 世紀产生于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別, 創始人是基提昂(在塞浦路斯)人芝諾。因他在雅典的 Stoa Poikile (廣場附近的柱廊) 聚眾講学, 故有斯多葛(来自 stoa——柱廊——一詞)派之名。这一哲学是古代奴隶占有制崩潰和希腊文化衰落時期的哲学, 最初有較多的唯物主义傾向, 后来則是唯心主义占优势。斯多葛派主要研究倫理問題, 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德行, 而不是享乐。一般用以喻指克己寡欲, 能够忍受生活上的各种痛苦和不幸的人。——第 386 頁。
- 315 舒尔采-德里奇鼓吹用工人自己的錢創辦儲蓄貸款銀行, 組織消費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 說这样可以在資本主义範圍內改善工人階級的状况, 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者免于破产。恩格斯曾把他的这种荒謬主張称为“貯錢箱鼓動”。拉薩尔則主張在国家帮助下組織生产合作社, 說这样“工人們就有可能去和資本家进行自由的、力量相匹敌的競爭”。拉薩尔关于生产合作社的观点是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參閱注 77), 梅林在本书中說是从《共产党宣言》得来的, 是錯誤的。——第 390 頁。
- 316 弗兰契斯卡·庫格曼在《偉大的馬克思的二三事》一文中說: “关于黑格尔, 馬克思用这位哲学家自己的話說, 在他的学生中除了罗生克兰茨以外, 沒有一個人了解他, 而即使是罗生克兰茨对他的了解也是不正确的……”(見《回忆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318 頁)。罗生克兰茨 (Karl Rosenkranz, 1805—79) 是中派黑格尔主义者的

代表，曾任科尼斯堡大学教授。著有《邏輯理念的科學》(«Wissenschaft der logischen Idee», 1858—59), 《康德哲學的歷史》(«Geschichte der Kantischen Philosophie», 1840), 《黑格爾傳》(«Hegels Leben», 1844), 《科學的體系》(«System der Wissenschaft», 1853), 等等。——第 392 頁。

- 317** 拉薩爾的“工資鐵律”斷言工資的高低決定於人口增殖的多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如果工資超過工人及其家屬的最低生活費，就會提高出生率，而人口增加又會降低工資。如果工資低於工人及其家屬的最低生活費，就會降低出生率，而人口減少又會提高工資。他由此得出結論說，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是沒有意義的。拉薩爾的“工資鐵律”是從馬爾薩斯和李嘉圖那里剽竊來的，而不是如梅林所說的從《共產黨宣言》中得來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了拉薩爾的“工資鐵律”(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 卷，第 26—28 頁)。——第 393 頁。
- 318** 指 1869 年由斯蒂芬斯等七名裁縫工會會員在費拉得爾菲亞創立的“勞動騎士團”。它的綱領有空想性質，主張階級合作，設想通過合作社使工人擺脫剝削，而否定政治鬥爭。該團領導對罷工持否定態度，並且不正確地將熟練工人和資產階級等同看待。這一組織的黃金時代是 1886 年，當時曾擁有會員七十多萬。——第 395 頁。
- 319** 根據希臘傳說，阿齊里斯是佩列歐斯和帖提司的兒子，是一個勇武出眾的英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殺死特洛伊國王普利亞姆的長子海克托。史詩便以海克托的葬儀而結束。但根據荷馬之後的詩篇，阿齊里斯本人在特洛伊被攻克之前，由於踵部中巴里斯的箭而陣亡。——第 400 頁。
- 320** 暗指《伊索寓言》中的一則寓言《年老的獅子》中的驢子。——第 400 頁。
- 321** 馬志尼在 1831 年建立了一個共和主義團體“青年意大利”，提出了“自下而上地”建立統一的、獨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綱領。他認為爭取實現意大利統一的基本手段是人民起義。他雖然也提出了“備受壓迫者的社會解放”的問題，但他是從正義這種抽象概念出發的，並且認為工人問題的解決要靠“勞資合作”。——第 403 頁。
- 322** 指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之間的鬥爭。——第 403 頁。
- 323** 光華派原定在 1848 年 4 月 10 日以強大示威的形式向議會遞交號稱有五萬七十七萬人(實際上不過一百九十七萬多人)簽名的請願書(參閱本

书第309頁脚注)。政府懼于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浪潮,决定禁止工人示威游行,并在威灵頓率領下,以武力威胁工人。在这种威胁下,宪章运动的領袖菲格斯·奥康瑞尔等临时取消了这次示威游行。英国政府乘胜逮捕了許多領袖,把他們长期監禁,并且向工人发动了进攻。自此以后,运动虽然又延續了几年,但是已經失去了对群众的号召力。1849年宪章运动領袖人布朗特尔·奥伯萊恩和雷諾等人又在伦敦建立了一个以爭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为目的的“全国改革同盟”。这个同盟在1866年加入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展开了活动,成为在国际倡議下于1865年春在伦敦建立的“改革同盟”的一个分支机构(參閱注349)。——第404頁。

- 324** 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想派別,它的代表者企图給基督教教义塗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把基督教說成是劳动人民利益的維護者和使他們摆脱一切社会灾难的唯一手段。它最初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垂死的封建階級敌視资产階級社会的一个思想表現。它宣揚和平的社会改革,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工人的生产合作社,鼓吹各階級間的容忍和調和。在19世紀30—40年代,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英国和法国均有发展。在英国,它的代表除了托利党的“青年英国”集团以外,还有作家金斯萊、莫利斯、拉德劳等。金斯萊著有描写手工业者和雇农的艰苦劳动的《酵母》(《Yeast》,1848)和《阿尔頓·洛克》(《Alton Locke》,1850)等。莫利斯著有描写未来的空想社会的《約翰·保尔之梦》(《The Dream of John Ball》,1888)和空想小說《烏何有之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1)等等。《共产党宣言》曾对这一思潮加以批判(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493頁)。——第404頁。
- 325** 指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第404頁。
- 326** 在法意奧戰爭中,法軍于1859年6月4日在通米兰的要冲上击败了奧軍,攻占了馬振塔,然后进入米兰;奧軍由于在馬振塔战敗而不得不撤出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索尔費里諾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軍事要冲,1859年6月24日法国和皮蒙特的軍隊在这里击败了奧地利軍隊,决定了有利于法国和皮蒙特的战争結局。关于这两个战役,恩格斯都有专文論述(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427—434,457—461頁)。——第405頁。
- 327** 1860年5月伦敦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石匠工会、鑄工工会、混合木工协

会等各大工会代表会议选出了工联“理事会”。它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发动，领导了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理事会”曾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的提议，在它的会议上多次讨论加入国际的问题。1867年1月14日“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的原则，但拒绝与国际建立组织上的联系。此后，工联“理事会”仍通过它在总委员会中的成员与国际保持接触。——第407页。

328 1863年1月在波兰有十五个地方同时爆发了争取波兰国家独立的起义。领导起义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革命政府，并发布了组织人民军的命令，波兰农民热烈地参加了游击队。起义到1865年4月终于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日内瓦1830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中说：“1863年的波兰起义曾引起英法工人对本国政府的国际暴行一致表示抗议，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66页）——第407页。

329 俄普奥三国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曾三次瓜分波兰。经过这三次瓜分，封建农奴制的波兰贵族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就不复存在了。——第407页。

330 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来为创立严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为培养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队伍所进行的斗争，对国际的成立无疑地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这里所说的“由于种种外部的情况，思想领导权自动地落到了他（指马克思。——译者）的身上”，是不正确的。——第410页。

331 指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工人在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蓄奴诸州一边而进行的斗争。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并逮捕乘“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的事件，准备向北部各州宣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终于迫使反动派未能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第414页。

332 指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沙皇专制政府对东北高加索山区的最后征服。——第414页。

333 1864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开始在巴黎展开活动，这个支部的创始人是具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工人托伦和利穆赞，他们都参加过

1864年9月28日圣馬丁大厅的會議。同时，参加过1864年9月28日會議筹备工作的法国律师昂利·勒弗尔也以国际的創始人之一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勒弗尔同总委员会的法国通訊書記勒留貝以及在伦敦的法国小資產階級流亡者的其他代表人物保持着友好的联系。1865年1月1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了莫·赫斯的一篇文章，文章指責托伦同波拿巴派有联系。馬克思委托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席利进行調查，判明这种指責来自几个靠近《联合》杂志的人，而勒弗尔則是該杂志的編輯之一。馬克思为了把一部分受資產階級合作社派影响的法国工人吸引到国际的队伍中来，并且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曾要求总委员会采納勒弗尔的建議，委派他为国际在法国的“报刊辯护人”。这个委派引起巴黎支部成員的不滿；2月24日有三十三个国际會員在巴黎举行會議，會議表示完全信任托伦和利穆贊，并且要求領導职务只能委派工人担任。总委员会曾专为这个問題举行了會議并做出了專門的決議。下文中所說的“法国鍋子”的喧騰（本书第424頁）和“法国人的无謂爭吵”（本书第426頁）均指此。

再此句中的日罗姆·波拿巴疑系約瑟夫·波拿巴（1822—1891）之誤。約瑟夫·波拿巴是拿破侖第三的堂弟，綽号普隆-普隆，他的官邸設在巴黎的罗亚尔宮。他領導的一个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曾企图通过广泛的社会煽惑宣传，并通过伪装成拿破侖第三的政策的对派来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現存制度的斗争。文中所說的冒充紅色煽动家即指此。莫泽斯·赫斯的文章原來說的是“罗亚尔宮的……朋友”（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0頁），而馬克思在1865年1月25日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对托伦的誣蔑時說的是“普隆-普隆主义者”（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卷，第247頁），似均可证明巴黎皇宮中的“紅色煽动家”是約瑟夫·波拿巴。而且日罗姆·波拿巴早在1860年就死了。——第417頁。

334 參閱《〈萊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207—222頁。——第418頁。

335 起草賀信的工作曾委托給为制定綱領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綱領性文件批准之后成为总委员会的常設执行机关，称为常务委员会。馬克思作为德国通訊書記是常务委员会的委員，并通过常务委员会領導了总委员会的工作。馬克思起草的賀信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贊同，1864年11月29日經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然后通过美国駐伦敦公

- 使亚当斯轉交林肯总统。1865年1月28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馬克思曾在給威廉·李卜克內西的信中指出，在林肯給他收到的賀信的回信中，只有給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賀信”。——第424頁。
- 336 这篇报告是由总委员会委員約翰·韦斯顿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引起的。韦斯顿企图证明，货币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沒有好处，并由此做出工会“有害”的結論。——第425頁。
- 337 伏尔泰本人是个自然神論者，他对僧侶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紀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而言。——第429頁。
- 338 彼得一世痛恨妨碍国家复兴的保守恶习，极力消灭經濟、技术、国家組織、文化和习惯方面一切落后的东西。凡是阻碍他的改革的，他都坚决果断地予以扫除，在反对落后和野蛮方面絕不妥协。列宁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产階級性》一文中說：“……彼得为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速学习西欧，不惜以野蛮的手段对付野蛮”（《列宁全集》，參閱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卷，第315頁）。——第429頁。
- 339 据希腊神話，紛爭女神爱利斯由于未被邀請参加特提斯和佩列欧斯的婚礼，而在婚礼的宴会上投下一个金苹果，上写：“給最美的女人”。希拉、雅典娜和阿芙洛迪特女神爭執不下。后由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把苹果判給阿芙洛迪特。她为了答謝，帮助他搶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遂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因。——第429頁。
- 340 指德国1848—1849年的革命年代。——第430頁。
- 341 參閱馬克思的《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9卷，第164—165頁。——第431頁。
- 342 指1866年普魯士和奥地利之間的战争。这次战争結束了普奧之間多年的爭雄局面，为德意志在普魯士霸权下的統一奠定了基础。在这次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的有德意志的几个邦（汉諾威、薩克森、黑森选帝侯邦等），普魯士則和意大利結成了同盟。軍事行动于6—7月間在波希米亚境內和意大利境內展开。奥軍于7月3日在捷克的科尼格列茨城（現名格拉杰茨—克拉洛維）附近的薩多瓦慘敗之后，奥地利开始議和，并于8月23日在布拉格簽訂和約。根据和約，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的权利让給普魯士，偿付了一笔不大的賠款，并把威尼

- 斯地区交給了意大利王国。早在1815年由維也納會議建立的、联合着三十多个邦的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普魯士领导下沒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由于这次战争，普魯士吞并了汉諾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騷大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第431頁。
- 343 指1878年5月24日提交帝国議會審議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草案。当时因多数議員反对而未获通过。同年保守派在議會选举中得势以后，俾斯麦对草案稍加修改又在10月19日向議會提出，結果以多数票通过。参閱注473。——第434頁。
- 344 布赫尔在1848年时曾是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属于中間派左翼，参加了1848—1849年的革命。革命失敗后逃亡伦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这次革命中的小資产階級活动家的小冊子《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曾經几次提到他(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339、343、370頁)。1864年后在普魯士外交部任职。——第434頁。
- 345 1860年2月普魯士政府的陸軍大臣馮·罗昂向議會提出改組軍隊的提案，要求把平時兵力从十四万人增加到二十一万七千人，延长現役期，并取消国民后备軍。資产階級因为害怕受容克影响的軍隊可能变成反对資产階級利益的工具而拒絕通过这个提案，但是却批准了“維持軍隊的战争准备状态”的撥款。1862年3月当自由派在議會选举中取得多数时，这个多数派把軍事改革的全部經費都否決了，并要求成立对議會負責的内閣。政府解散了議會并指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国王任命俾斯麦組織内閣。俾斯麦根本不要議会的同意就进行軍事改革，而这在自由資产階級看来是违反宪法的。軍事改革問題就这样演成了宪法紛爭。紛爭直到1866年普魯士战胜奥地利后才解决。——第438頁。
- 346 普魯士的后备軍是1813年时为了反抗拿破侖的軍隊而作为民团产生的。后来德国其他各邦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后备軍原由四十岁以下服滿三年現役和二年預备役的人組成。1860年普魯士軍事改革以后，后备役軍人的年齡降到三十二岁以下(二十七岁到三十二岁)。后备軍分第一类和第二类，均在特別需要时才应征服役。在战争时期，第一类后备軍往往被編入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軍是守备部队的增援部队，在和平时期則遣散回家。——第439頁。
- 347 罗曼語包括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勃洛万斯語(在法国西南部)、法兰西語、意大利語、薩尔特語、后罗曼語(在意大利和瑞士的部分地区)、东罗

曼語(在羅馬尼亞和阿尔巴尼亞等)。本書中所說的羅曼語系國家和羅曼語系支部，主要是指法國、比利時、瑞士等國家和講法語的支部而言。——第 441 頁。

- 348 格萊斯頓提出的選舉改革法案將選民的財產資格從十英鎊降為七英鎊，遭到輝格黨內羅伯特·陸所領導的阿达拉姆集團的反對。這個集團退出輝格黨而加入托利黨，造成了輝格黨內閣的倒台。——第 442 頁。
- 349 根據國際總委員會的倡議並在它的直接參加下，於 1865 年春在倫敦建立了改革同盟，這是領導英國工人爭取第二次選舉法改革的群眾運動的政治中心。總委員會的一些委員，主要是英國工聯的領袖，參加了同盟的領導機關。改革同盟按馬克思的主張提出國內所有男性成年居民都有選舉權的要求，在英國工人階級隊伍中得到了廣泛的響應，並且獲得了前此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工會的支持。——第 443 頁。
- 350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368 頁。——第 444 頁。
- 351 指在《共和國》週報上連載的《向工人駁斥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一些政治經濟學論點》一文而言。穆勒的觀點曾對英國無產階級的上層分子有影響。——第 444 頁。
- 352 參閱 1866 年 4 月 6 日馬克思從馬蓋特給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 4 月 10 日的回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367—371 頁。——第 445 頁。
- 353 指馬克思所草擬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213—223 頁)。馬克思所寫的《指示》作為總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曾在大會上宣讀。《指示》共有九點(另有兩點，即“國際信貸”和“宗教問題”是預定讓法國人提出動議的)，即關於協會的組織問題，國際聯合行動問題，縮短工作日問題，男女兒童和少年勞動問題，合作勞動問題，工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問題，直接稅和間接稅問題，波蘭問題，軍隊問題。——第 445 頁。
- 354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352 頁。——第 451 頁。
- 355 指恩格斯於 1865 年 2 月底在漢堡出版的《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政黨》。這篇文章原是根据馬克思的建議為《社會民主黨人報》寫的，後因與施韋澤決裂而決定印成小冊子發表(參閱《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3 卷，第 249—264 頁)。這本小冊子論證了在

- 德国业已形成的革命形势下无产阶级的策略，并分析了改组普鲁士军队的問題(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1—87頁)。——第452頁。
- 356 參閱1867年6月10日馬克思从伦敦給庫格曼的信，載《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第452頁。
- 357 北德意志联邦是根据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的建議在1867年成立的。它包括十九个邦以及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的三个自由市。联邦的建立是德意志在普魯士领导下重新統一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參閱注342。——第454頁。
- 358 1867年拿破侖第三向尼德兰国王兼卢森堡大公提出购买卢森堡的建議，并要求普魯士同意这个建議作为对他在1866年普奧战争时期保持中立的补偿。这个建議因遭到普魯士的反对而一时几乎在普法之間酿成战争。后来根据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尼德兰、卢森堡、普魯士以及俄国于1865年5月11日签订的伦敦协定，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这一危机才得以解决。——第454頁。
- 359 庸俗经济学产生于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它的最早的代表是法国的薩伊、英国的馬尔薩斯和后来的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庫洛赫。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庸俗经济学家沒有科学的誠实态度，抱着偏見有意識地維護資本主义制度。在19世紀上半期，它的批判目标主要針對着空想社会主义，在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問世后則集中火力攻击馬克思的经济学說。——第458頁。
- 360 指19世紀30年代法国里昂絲織工人的两次起义(參閱注80)和1816年爆发的英国乡村雇农焚烧谷垛的大規模騷动。——第464頁。
- 361 最早提出“节欲說”的庸俗经济学家是英国人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他认为社会愈是进步，便愈是需要节欲。資本家把利潤的一部分不用于个人生活上的消費，而把它作为資本积累起来，这便是实行节欲。甚至整个資本，从資本家必須不断努力克制把它蕩尽这种誘惑說来，也是节欲的产物，而資本的利息則是对节欲的酬报。所以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6)一书中說：“我用节欲一詞代替那种被当作生产工具来看的資本一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批判了这种“节欲說”(參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7—748頁)。——第464頁。

- 362** 这一节是罗莎·卢森堡写的(参阅本书作者序言)。她在本节中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理论意义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例如她说:“……我们不应到《资本论》后两卷中去寻求政治经济学上一切最重要问题的完满的现成的答案,而只应寻求一部分这样的问题的提法,以及有关应该按照什么方向去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指示”。这种看法与她在资本积累理论方面的错误有关。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相反,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1913)一书中发挥了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在只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有什么资本积累的,因为资本积累问题的核心在于剩余价值中积累部分的实现,而对于这部分剩余产品的需要则既不能来自资本家的消费,也不能来自工人的消费。因此她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忽略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扩大来自何处的問題。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积累是靠吞没、冲刷“非资本主义培养基”,即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现的。当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消灭后,资本主义就将因不能继续发展而自动崩溃。她在这里是把积累部分的实现問題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問題混为一谈了。卢森堡既然抱着这样的观点,当然不能正确理解诸如《资本论》第二卷中所阐述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問題等等。——第467頁。
- 363** 共济会是1723年产生于英国的一个宗教性的秘密結社,后来传播于其他国家。它是按照中世紀泥水匠(共济会余員在英語叫 freemason,直譯就是“自由的泥水匠”的意思)基尔特的行規組織起来的,内部等級森严,居于最高等級的大都是貴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共济会号召人們按友爱、平等、忠实和互助的原則联合起来,通过自我認識和自我修养来消除人类社会的罪恶。由于他在对抗性社会中鼓吹博爱,因而起了巩固剝削制度和吸引劳动群众脱离革命斗争的反动作用。——第477頁。
- 364** 参阅1868年10月26日马克思从伦敦給庫格曼的信,載《致庫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71頁。——第480頁。
- 365** 1868年7月底恩格斯为德国一家文艺性的报纸《凉亭》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該报沒有发表。1869年7月恩格斯对原稿又进行了加工,标题为《卡尔·马克思》(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07—413頁)。寄給《未来报》,发表于該报1869年8月2日第185号。李卜克内西把这篇传记轉載在1869年8月21日

- 的《民主周刊》第34号附刊上，但是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說拉薩尔不是一个有創見的思想家，他的許多著作的內容都是从馬克思那里抄襲来的，并且把馬克思的著作庸俗化。——第480頁。
- 366 恩格斯除了1868年3月21日和28日刊載在《民主周刊》上的书評外，还先后在1867年10月至1868年5、6月这一期間写过八篇評介《資本論》第1卷的文章。其中为《萊茵报》和《双周評論》写的两篇未能发表。这些文章均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81頁。
- 367 指弗·阿·朗格在1865年发表的《工人問題》(《Die Arbeiter Frage》)一书。——第482頁。
- 368 詩人弗萊里格拉特在英国失业潦倒后，他在德国的一些崇拜者为他募集了一笔捐款，据传有六万塔勒。——第482頁。
- 369 費尔巴哈在他的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幸福論》(《Der Eudämonismus》，1867—1869)中說：“德行和身体一样，需要飲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如果人們挤住在一起，如像在英国的工厂中和工人住宅……中，如果人們甚至缺乏足够量的新鮮空气(关于这点，請參閱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这一著作至少提供了大量极其有趣的，无可爭辯的，虽然是使人战栗的事实)，那末也就根本談不上道德了，那末德行最多也不过是工厂主和資本家老爷們的专利品了。如果没有生活上最必要的东西，那末也就沒有道德的必要性。”(參閱《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上卷，第569頁)——第483頁。
- 370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的《致讀者》中說：“我既然担任起这种校正工作，也就不能不把这种工作应用到当作根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上来，使某些論述簡單化，使別一些論述更为完全，加进若干补充的历史材料和統計材料，增添若干批判的注解等等。不管这个法文本可能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会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那些精通德文的讀者來說也有参考价值。”(《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20頁)——第485頁。
- 371 指《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606—611頁。——第485頁。
- 372 指1867年2月比利时政府枪杀馬尔舍恩罢工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的事件。——第486頁。
- 373 1867年2月，巴黎銅匠为拒絕按企业主的要求退出互助会而开始罢工。

由于总委员会的协助,巴黎工人得到英国工联的援款,胜利地保住了自己的組織。——第 486 頁。

- 374** 在《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上这句话原来是这样说的:“用什么实际手段把国际协会变成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的共同的中心?”(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608 頁)——第 487 頁。
- 375** “和平自由同盟”是 1867 年在維·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下在瑞士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組織。1867—1868 年巴枯宁参加了这个同盟。同盟成立初期曾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 488 頁。
- 376** 这是燕妮·马克思在 1867 年 10 月 5 日給約·菲·貝克尔的信中所說的話。該信曾載于 1867 年 10 月《先驅》杂志第 10 期。这封信的部分譯文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635—636 頁。——第 488 頁。
- 377** 芬尼亚社社員(来自爱尔兰語 *fine*——爱尔兰古代居民的称呼)是 1858 年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間、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成立的一个秘密組織“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成員。这个組織的宗旨是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芬尼亚社社員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識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批評芬尼亚社社員的密謀策略及其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錯誤,但是对他們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評价。1867 年 2—3 月間,芬尼亚社社員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敗,在各郡分散举行的起义遭到鎮压,許多领导人被捕。9 月 18 日,为了营救两名被捕的领导人凱利和迪集而在曼彻斯特組織了对囚車的武装襲击。凱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五名被捕的芬尼亚社社員原来均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馬瓜伊尔)后来被赦免,另外一人(康当)改判終身監禁,其余三人(拉尔金、阿林和奧勃萊恩)于 1867 年 11 月 23 日被处决。——第 489 頁。
- 378** 暗检室是法国、普魯士、奥地利和許多其他国家邮政机关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勾当。暗检室从欧洲君主制时代起便已存在。——第 492 頁。
- 379** 參閱注 358。——第 493 頁。

- 380 1867年12月国际巴黎理事会理事的住宅遭到搜查。在法国警察搜查时所沒收的信件当中,有一封信是法国通訊書記欧·杜邦于1867年11月23日写給繆拉的,信中告知协会的法国會員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的运动的情况。法国当局就利用这封信給国际安上組織芬尼亚社社員进行密謀的罪名。——第493頁。
- 381 沙勒罗瓦矿区事件发生在1868年春天。由于矿主把每周生产减少四天,工資降低10%,工人宣布了罢工,因而遭到了武装鎮压。——第493頁。
- 382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19頁。——第495頁。
- 383 科尼格列茨战役所造成的基础,主要指北德联邦的建立而言。參閱注342。——第496頁。
- 384 德意志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階級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階級民主派組成。它反对普魯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魯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內的所謂“大德意志”計劃,执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傾向的代表。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統一德国。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党在1866年并入了德意志人民党,但它除了反普魯士情緒和力求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統一問題以外,与德意志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薩克森人民党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該党的基本部分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第496頁。
- 385 1868年8月22—26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汉堡举行的大会表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經驗的启发下开始抛弃拉薩尔的教条。大会原則上贊成罢工运动,但又表示反对实际組織罢工,原則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領導繼續阻撓联合会加入国际。——第499頁。
- 386 參閱馬克思:《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358頁。——第500頁。
- 387 參閱1868年8月26日馬克思从伦敦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101頁。——第500頁。
- 388 1868年9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了代表二百零六名,代表十四万二千多工人。这次大会根本拒絕那些加入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領導的紐伦堡組織的各个工人协会派代表参加。柏林大会

- 后成立了一些工会，但它們是按拉薩尔派的宗派主义組織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联合会。这个組織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第 500 頁。
- 389** 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于 1868 年 9 月 5—7 日在紐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派埃卡留斯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決議，并选出一个由十六名委員組成的委员会負責实地执行这一決議；这十六人于 1868 年 9 月 22 日被总委员会批准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执行委員。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組織工会的決議。——第 501 頁。
- 390** 1868 年 6 月 29 日在伦敦克利夫兰人厅举行的紀念 1848 年巴黎无产階級六月起义的大会上，法国小資产階級民主主义者皮亚发表了一篇演說，号召对拿破侖第三采取恐怖手段。許多报纸在关于那次會議的报道中把皮亚說成是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总委员会考虑到这会在工人心中破坏国际的威信，而且会給波拿巴政府提供一个它求之不得的迫害国际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會員的借口，于是在 1868 年 7 月 7 日的會議上根据馬克思的建議做出决定，不承认皮亚的演說，并公布了決議。于是皮亚所在的伦敦法国人支部发生了分裂，无产階級分子杜邦、荣克、拉法格等退出了該支部，以此对皮亚的挑撥性和冒险性的策略表示反对。皮亚一伙人則繼續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一再支持总委员会內反对馬克思路綫的各个反无产階級的小集团。——第 502 頁。
- 391** 參閱 1868 年 8 月 4 日和 8 月 6 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92—95 頁。——第 502 頁。
- 392** 梅林在本书許多地方錯誤地替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进行辯护，并且做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叙述。巴枯宁主义作为看不見前途的沒落小資产階級和流氓无产者的世界观，反对无产階級专政，不了解无产階級的革命作用，否认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不要无产階級政党，強調个人的“最完全的自由”。这一切都决定了巴枯宁的組織的宗派性质和密謀的、恐怖的策略。梅林由于未能深刻理解馬克思主义的无产階級专政学說而模糊了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否认无政府主义的宗派性质，看不到巴枯宁及其組織的活动的破坏性，对巴枯宁做了不正确的評价。例如，他在分析巴黎公社經驗时，竟把“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握取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原

理，同《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国家逐渐消亡的原理对立起来，说什么“那岂不证实了巴枯宁所不厌其烦地宣扬过的东西”（本书第565页）。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所提出的新原理说的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同时，他们是把公社看做新型国家的雏形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的。而这是与巴枯宁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般地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念毫无共同之点的。梅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巴枯宁派的许多重要文件（如《所谓国际的分裂》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中所提到的事实，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做了不正确的说明。他极力替巴枯宁开脱对涅恰也夫事件所负的责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实际上，涅恰也夫事件正是巴枯宁的密谋恐怖策略的合乎逻辑的表现。此外，梅林硬说巴枯宁在巴塞尔大会前后根本未进行任何阴谋活动（参阅本书第527页）等等，也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巴枯宁“同盟”的成立就是这种阴谋活动的结果。至于梅林屡屡引证的巴枯宁对马克思的“颂扬”，正如梅林自己也知道，是出于巴枯宁的策略上的考虑（参阅本书第529页）。然而梅林却对此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参阅本书第596页）。——第502页。

- 393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参加同盟临时委员会的除巴枯宁外，还有布罗塞、杜瓦尔、格塔、裴隆、扎哥尔斯基和约·菲·貝克尔，但貝克尔不久后就同巴枯宁决裂了。——第504页。
- 394 在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而写并于1851—1852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以马克思的名义连载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曾有这样一段赞扬巴枯宁的话：“在德勒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起义群众差不多又完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们。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蒙卡奇监牢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107—108页）后来马克思在《米哈伊尔·巴枯宁》一文中说：“在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中，我也尽我所知，在德国著作家中第一个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特别是参加德勒斯顿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322页）。——第508页。
- 395 1853年8月23日《晨报》发表了署名为“弗·馬·”（烏尔卡尔特的拥护

者弗兰西斯·馬克思)的短評《俄國間諜巴枯寧》，給巴枯寧加上了勾結沙皇政府的罪名。8月24日該報又刊登了戈洛文、赫爾岑等反駁“弗·馬·”的信。這封信公然說對巴枯寧的誣蔑發端於“一家德國報紙”(暗指《新萊茵報》)。為此，馬克思寫了《米哈伊爾·巴枯寧》一文寄給《晨報》編輯進行駁斥(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第321—323頁)。——第509頁。

396 農民村社是封建制度下農民使用公有土地的普遍形式，是在原始氏族公社瓦解之後產生的。俄國的村社發展到19世紀實際上已經變成沙皇政府按連環保原則向農民征收賦稅的方便工具。俄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美化俄國的村社，把它看成是俄國農村中社會主義關係的萌芽。赫爾岑在對歐洲革命感到失望之後，曾把他的全部希望放在俄國的農民村社上面，以為利用農民村社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核心，就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直接達到社會主義。列寧和普列漢諾夫都曾批判過這種幻想。——第509頁。

397 哥薩克最初是由逃脫封建壓迫的農奴、奴隸、市民形成的自由人，他們住在俄羅斯國家的邊疆地區，於16—17世紀形成為哥薩克人。因哥薩克人驍勇善戰，在歷史上沙皇政府屢用收買哥薩克上層分子的办法使哥薩克成為鎮壓農民戰爭和對抗革命運動的工具。——第512頁。

398 指巴枯寧於1842年10月發表在《德意志年鑑》上的《德意志的反動勢力》一文。他在这篇文章的結尾處預言革命即將到來時寫道：“讓我們相信永恒的精神吧，只是因為它是一切生命的難以理解的、永恒創造的泉源，所以它才破壞和消滅。破壞的歡樂同時也就是創造的歡樂。”——第512頁。

398 參閱1868年11月17日馬克思從倫敦給恩格斯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4卷，第140頁。

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直接反駁巴枯寧的文章似只有一篇，即《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參閱注182)。這篇文章分為兩部分，分別刊登在1849年2月15日和16日《新萊茵報》第222和223號上。馬克思在上信中提到論巴枯寧宣言的“兩篇論文”，想系指此。——第512頁。

400 1868年12月15日總委員會會議上宣讀了約·菲·貝克爾寄來的同盟綱領和章程。馬克思在同一天後半夜(梅林說是12月18日後半夜，疑誤)將這兩個文件轉寄給恩格斯，請他提出自己的意見。恩格斯在12月18日寫了回信(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次通信，參閱《馬克思恩格斯

- 通信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163—166 頁）。——第 513 頁。
- 401 这个決議草案是 1868 年 12 月 22 日馬克思在考虑了恩格斯的意見之后用通告信的形式写出的。这个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寄发給协会的所有支部，它以《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标题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382—384 頁。——第 515 頁。
- 402 指总委员会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1869 年 2 月 27 日的第二次来信的复信。复信是馬克思起草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393—394 頁。——第 517 頁。
- 403 參閱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在 1869 年 8 月底—9 月初为巴塞尔大会所写的《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417—434 頁。——第 518 頁。
- 404 1868 年 9 月 18 日在西班牙的加的斯爆发了革命起义，起义的主要参加者是海軍。起义者发出了废黜出身于波旁王室的女王伊薩貝拉的宣言，伊薩貝拉慑于籠罩全国的革命形势而逃亡国外。西班牙議会在經過长期爭論后决定迎普王威廉一世的亲属、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列奥波特继承王位，因而有使西班牙变成普魯士的反法基地的危險。——第 520 頁。
- 405 1869 年 8 月 7—8 日在爱森納赫城召开了德意志、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主义派工人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領導的工人协会联合会自动解散了，并和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分裂出来的“民主工人联合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納赫派）。这个党接受了国际的規章并加入了国际。党员人数在建立时大約有一万人。——第 521 頁。
- 406 卡特尔一般指經濟上的一种垄断联合形式，参加者只在某些方面（如价格、市場等）受协定的約束，而在生产經營方面仍保持独立性。亦泛指一般的协定、联合。例如俾斯麦曾在 1887 年的大选中与民族自由党建立过“卡特尔”，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第 521 頁。
- 407 1872 年 1 月恩格斯在反駁巴枯宁派的桑維耳耶代表大会对总委员会的所謂权威主义和专政原則的攻击时会說：“但是这些恶劣的巴塞尔決議是怎样产生的呢？說起来非常簡單。它們是由比利时代表提出来的，而且当时誰也沒有像巴枯宁和他那些在目前这份通告上签字的朋友們，其中包括施維茨盖勃尔和吉約姆，那样热烈地表示拥护它們；的确，

当时情况不同。当时这些先生們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論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們都觉得不够。而現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发现葡萄原来是青的。現在总委员会应当被貶低到简单的統計通訊局的地位，只求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声誉不致受到損害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卷，第520頁）——第522頁。

408 參閱《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14—416頁。——第522頁。

409 土地和劳动同盟是1869年10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在埃卡留斯根据馬克思的指示为该同盟起草的綱領（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657—663頁）中，除了一般民主的要求如改革财政稅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縮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馬克思曾把它看做是在英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徑之一。但是，到了1870年秋天，該同盟由于资产阶级分子影响的加强而逐漸同国际失去了联系。——第524頁。

410 參閱注471。——第531頁。

411 指馬克思所起草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語系联合委员会》这一通告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35—443頁。——第531頁。

412 1870年春季在瑞士由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这些政治流亡者都受过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車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影响。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綱領和章程寄給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給馬克思，請他担任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俄国支部的綱領規定了如下的任务：1. 利用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其特殊方式和方法决定于国内状况本身）在俄国宣传国际协会的思想和原則；2. 协助在俄国工人群众中建立一些国际支部；3. 帮助建立俄国劳动阶级之間的巩固的和团结一致的联系，并通过互助来促使他們共同的解放目的能够較順利地实现。

俄国支部的成員尼·吳亭、安·特魯索夫、叶·巴尔田涅娃、格·巴尔田涅夫、伊·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科尔文-克魯科夫斯卡娅都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支部曾试图同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但实际上在1872年便解散了。——第535頁。

413. 指由馬克思署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日内瓦的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63—464頁。——第536頁。
414. 恩格斯为了以爱尔兰历史为例，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制度和办法，并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对爱尔兰历史和现实的歪曲，曾經研究了大量的文献和各种历史资料，其中有古代和中世紀著作家的著作、年表、古代法律汇编、各种法令、民間传说、古代文学作品、游記以及許多历史、考古、經濟、地理和地質方面的著作，做了十五本筆記，并曾学习古爱尔兰語。他計劃写作的《爱尔兰史》，只完成了第一章《自然条件》和第二章《古代的爱尔兰》的一部分（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525—571頁）。为写作《爱尔兰史》而搜集的材料有一部分收入《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10卷。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以及国际的繁重的实际工作，使得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但是他在研究爱尔兰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却运用到以后的理論工作和政治活动方面。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利用了研究古爱尔兰克尔特人社会制度时所做出的一些科学結論。——第539頁。
415. 1869年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展开了要求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員（參閱注377）的运动，在許多次群众大会上通过了請願书，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英国政府首脑格萊斯顿拒絕了爱尔兰人的請求。1869年10月24日伦敦举行了抗議示威游行，馬克思也参加了。总委员会根据馬克思的提議討論了爱尔兰問題，并于1869年11月30日通过了馬克思提出的《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決議草案》（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433—434頁）。——第539頁。
416. 燕妮在1870年2月27日至4月19日为《馬賽曲报》写了八篇文章，其中有的文章是父女二人合写的。除第二篇外在报上发表时均署名燕·威廉斯。馬克思曾为了保守秘密而用阿·威廉斯为笔名写过几封信。燕妮文章的譯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卷，第670—700頁。——第540頁。
417. 1870年5月8日拿破侖第三的政府为了巩固搖搖欲墜的政权而举行了全民投票。提付表決的問題是这样提出的：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贊同，就意味着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国际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行业工人

- 协会联合会于1870年4月发表宣言揭露这一阴谋并号召工人拒绝参加投票。结果有一百五十万人投反对票，一百九十万人未参加投票。在全民投票准备阶段，政府为了用“红色危险”恐吓中等阶层而大肆诽谤工人组织，镇压工人运动。巴黎联合会的一些会员以进行阴谋，准备暗杀拿破仑第三的罪名被捕。同时在里昂、卢昂、马赛及其他城市也开始逮捕国际的会员。从1870年6月22日到7月5日对巴黎联合会会员进行第三次审判时，完全暴露了指控的捏造性质。——第540页。
- 418 指1870年7月19日开始的普法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巴黎公社。——第541页。
- 419 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1870年9月1—2日普法两军在色当城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由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为普军击溃，拿破仑第三被俘。色当之役是普鲁士由防御转为侵略的分界。此处即指这次战役以前。下文的“色当以后”亦同。——第542页。
- 420 1862年9月30日俾斯麦就任普鲁士宰相时曾说：“能够决定当前各种重大问题的，不是演说和多数表决，而是铁和血。”这首先指的是他要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来“自上而下地”解决统一德国的问题。——第543页。
- 421 指设在不伦瑞克地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第545页。
- 422 莱茵同盟是1805年法国打败了奥地利后于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同盟。有十六个邦参加了这个同盟，后来又有五个邦加入，它们实际上是拿破仑法国的藩属。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德国战败后，莱茵同盟便瓦解了。——第548页。
- 4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过信件交换了对于普法战争的态度以后，又在1870年8月22—30日之间在曼彻斯特共同拟定了对不伦瑞克委员会的答复。1870年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关于战争的宣言引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卷，第282—284页。——第550页。
- 424 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16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也就成了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657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才利用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争得了对他的普鲁士领地主权的承认。——第552页。
- 425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

- 魯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簽訂的和約。和約規定把普魯士的很大一部分土地，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屬地割讓給法國。俄國則必須承認法國在德國占領的地方並同意成立華沙大公國（這是法國在俄國邊界上的一個進攻基地）。這個和約引起了德國人的極端不滿，為1813年的反拿破侖統治的解放運動播下了火種。——第553頁。
- 426 麥茨是洛林的商業與文化中心，斯特拉斯堡則是亞爾薩斯的商業與文化中心。對兩地的堡壘表示氣憤，喻指普魯士覬覦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地的野心。——第553頁。
- 427 赫叩利斯是希臘神話中具有超人力量的英雄，歲神、溫泉神和司丰饒之神，是宙斯與安菲特利昂之妻阿爾庫梅耐所生之子。曾受阿爾哥斯王之命完成了十二項英雄業迹。——第555頁。
- 428 1791年8月奧地利皇帝和普魯士國王在不爾尼茲簽訂宣言，號召歐洲各國武裝干涉革命的法國。普奧干涉軍在1792年9月2日攻陷凡爾登。法國人民在公社的保衛祖國的號召下紛紛拿起武器開赴前綫，於1792年9月20日在發爾密附近擊敗普奧干涉軍。國民議會就在發爾密一役勝利後廢除了法國的君主制，宣布成立了共和國。——第556頁。
- 429 1618至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是德國各新教諸侯同天主教諸侯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間的戰爭，後來由於有法國、英國、瑞典、荷蘭、丹麥等參加進來而演變成全歐洲的戰爭。戰爭以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結束。由於這次戰爭，德國的許多邦，如薩克森、勃蘭登堡、普法爾茨人口減少一半甚至更多，捷克的人口從1618年的二百五十萬人減少到1650年的七十萬人。耕地、礦井和城市工商業均遭到慘重破壞。——第557頁。
- 430 梯也爾從1848年6月屠殺後曾是秩序黨（參閱注208）的領導者。此處當泛指逃到凡爾賽去的、以梯也爾為首的維護舊“秩序”的反動派。——第559頁。
- 431 法國警察報紙《巴黎報》利用一封偽造的信，硬說國際的法國會員和德國會員之間存在着矛盾。敵視國際的各國資產階級報刊都轉載了這封偽造的信。1871年3月21日恩格斯受馬克思之托草擬了致《泰晤士報》編者的信，因為該報也轉載了《巴黎報》的這則挑撥性的報道。此外馬克思還曾寫信給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機關報《人民國家報》編輯部和比利時的《工人報》編輯部，駁斥《巴黎報》散佈的這一謊言和其他誹謗。——第560頁。
- 432 在公社委員會中占少數（約二十五名委員）的蒲魯東派分左右兩派，右

派否认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左派则承认政治斗争并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多数派除布朗基主义者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人和赞成保持小私有制并“限制”大资本的新雅各宾派。布朗基主义者不重视社会经济措施，主张由一小群革命者实行专政。从巴黎公社成立时起多数派和少数派就在一切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第 560 页。

- 433** 从 1871 年 6 月起总委员会就为逃亡伦敦的公社社员募集款项，发放救济物资，安排工作。马克思负责组织总委员会的这一工作。7 月，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援助公社流亡者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荣克等总委员会委员都参加了。1871 年 9 月 5 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因筹备伦敦代表会议而退出了这个专门委员会。后来虽然专门委员会撤销了，总委员会在 1871—1872 年间仍然十分重视救济公社社员的工作。——第 567 页。
- 434** 法国政府在 1871 年 5 月 26 日给法国驻外国的外交代表发出一个通告电，要他们要求有关政府把公社流亡者当作刑事罪犯引渡给法国。——第 569 页。
- 435** 引自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韦伯所著《工联史》（《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4）一书。——第 572 页。
- 436** 达耐人是古希腊的部族之一，亦泛指希腊人。“达耐人的赠礼”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味吉尔的长诗《埃涅阿斯》中所述希腊人计陷特洛伊城时所使用的木马，喻指危险的赠品。味吉尔的《埃涅阿斯》第二部中有这样半句为人广泛传诵的诗句：“我害怕达耐人，甚至是送礼的这耐人”（“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第 573 页。
- 437** 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书记阿兰曾于 1867 年在议会专为调查工会运动情况而成立的“皇家委员会”上宣称：“我们相信，所有的罢工都是一种金钱上的浪费，不但对工人，就是对雇主也是如此。”——第 573 页。
- 438** 英国机器工人在 1871 年发动了历时五个月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罢工。这次罢工没有得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支持，而是由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共同组成的“九小时工作日同盟”领导进行的。这次罢工赢得了胜利。——第 573 页。
- 439** 《致俄军军官》的呼吁书于 1870 年出版于日内瓦，署名“米哈伊尔·巴枯宁”。巴枯宁在这篇呼吁书中写道：“这个组织是强有力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纪律，它的成员是赤胆忠心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每一个成员

都无条件地服从无所不知又不为任何人所知的唯一的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他要求会员只說“他被命令說的話”，要“无条件地、严格地照办上面所給予他的一切命令和指示，不要問也不要企圖知道，他自己在組織中处于哪一級，自然他只是希望让他承担尽可能多的任务，但同时又耐心地等待把任务委托給他”。把盜匪理想化的传单是指1869年在日内瓦匿名出版的《革命問題的提法》。在这个传单里有这样一段話，“搶劫是俄国人民生活最光荣的形式之一。盜匪是英雄，保卫者和人民的复仇者，是国家的……不可調和的敌人，是拚命反对一切官僚貴族的文明和官方僧侶的文明的战士……誰不理解搶劫，誰就对俄国人民的历史一窍不通。”《革命手冊》是指1869年夏天巴枯宁写的《革命家手冊》。这个《手冊》共分四部分，二十六条。在談到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时說，革命家“对待自己冷酷，对待別人也必須冷酷”。在談到革命家对待社会的态度时說，“革命家进入国家的、等級的和所謂有教养的世界并在其中生活，只是因为他抱着最彻底地和最迅速地破坏这个世界的信念。如果他怜惜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他就不是革命家。他不应当在摧毁现状、关系和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人面前躊躇不前。他必須一視同仁地仇恨一切的一切。”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3年4—7月在拉法格参加下所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中曾对这些传单和小冊子做了批判和揭发。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439—483頁。——第576頁。

- 440 涅恰也夫带着巴枯宁給他的“欧洲革命同盟”代表的头銜和巴枯宁簽署的委托书回到俄国后，在俄国的許多城市建立了“人民裁判协会”这种密謀組織，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彻底破坏”，散发无政府主义的传单，到处进行招搖撞騙，致使一些怀有革命情緒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居民为他对沙皇統治的尖銳批評和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所迷惑而参加了他的組織。——第577頁。
- 441 1858年俄国地主巴赫美齐也夫交給赫尔岑一笔宣传費，称为巴赫美齐也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为两部分，其中的一半由奥格辽夫交給了涅恰也夫。赫尔岑死后，涅恰也夫从奥格辽夫得到了基金的另一半。——第578頁。
- 442 巴枯宁分子詹·吉約姆和加·布朗于1870年9月5日在瑞士的紐沙特尔发表了一篇《告国际各支部》的宣言。宣言从非階級的立場出发，把法国的资产階級共和国說成是“欧洲自由的体现”，建議国际会员組

- 織义勇軍拿起武器去保卫它。——第 579 頁。
- 443 1870 年 9 月 4 日里昂由于接到色当战败的消息而爆发了起义。巴枯宁在 9 月 15 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借以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綱領。这个企图由于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缺乏同工人的联系并且沒有明确的行动計劃而遭到失敗。——第 580 頁。
- 444 “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是 1871 年 9 月 6 日代替 8 月間解散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而成立的。除了同盟支部的旧会员如茹科夫斯基、裴隆等以外，还有盖德、馬隆等法国流亡者参加了这个組織。——第 582 頁。
- 445 在 1871 年 11 月 1—6 日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协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不久，馬志尼为了抵制国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阻止在意大利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組織，对国际和馬克思本人进行了誹謗性的攻击。馬志尼在 1871 年 7 月 13 日《人民羅馬》第 20 期上发表的《告意大利工人书》中說：“协会由設在伦敦的总委员会指揮，其灵魂是卡尔·馬克思，这是一个具有大智大慧，但是像蒲魯东一样有一副破坏性的头脑的人，一个不容异己的性格，即嫉妒別人的影响的人。……协会的三个基本原则是：第一，否认上帝，即否认一切道德；第二，否认祖国，使它溶合在公社的集合体中，而互相仇視似乎是公社必然遭到的命运；第三，否认财产，也就是說，剝夺工人的劳动果实，因为个人财产权无非就是人人都有权支配他所生产的东西。”恩格斯通过文章和发言对这种誹謗进行了毁灭性的回击（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7 卷，第 418—420、687—689 頁）。馬志尼在 1871 年 6 月号的《現代評論》杂志上发表了指責巴黎公社的文章。——第 584 頁。
- 446 加里波第欢迎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并曾被缺席选入国民自卫軍的中央委员会。他曾协助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称国际为“未来的太阳”。——第 584 頁。
- 447 1868 年的西班牙革命赶走了波旁王朝的伊薩貝拉之后，曾决定迎霍亨索伦家族的列奧波特继承王位，但因遭到拿破侖第三的反对，列奧波特放弃了授与他的王位。最后终于确定迎意大利的薩瓦王朝的阿馬迪烏斯为西班牙国王。參閱注 404。——第 585 頁。
- 448 瓦龙人指操法語瓦龙方言的比利时人，占比利时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主要居住在比利时南部的埃諾、納繆尔、列日等省。由于瓦龙人居住的是工业区，所以瓦龙人的大部分是工业无产阶级。——第 585 頁。

- 449 倫敦代表會議共通過了十七項決議。關於各項決議，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卷，第451—460頁。梅林說關於工會的國際聯繫和農業無產階級的狀況的決議只具有純理論的意義，是不正確的。實際上，這些決議與“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組成一個整體，補充了關於必須建立獨立工人政黨的 basic 思想，指出了工人政黨與群眾聯繫的具體道路，對於同無政府主義做鬥爭和教育無產階級革命幹部具有巨大的意義。——第587頁。
- 450 梅林在這一節里對第一國際解體的原因是理解得不正確的。他有意無意地把國際解體的原因歸之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敵對派別，特別是拉薩爾派和巴枯寧派的不調和態度。例如他說：“……全世界的反動勢力對國際發動了猖狂的進攻，而國際為了對抗這種進攻是必須把自己的一切分散的力量緊密團結起來的”（本書第596頁）。又說：如果說國際總委員會的領袖竟錯誤到把一個按照他的觀點說來是最發達的工人政黨，而且是產生在他的祖國的黨，稱為賣身投靠的警察部隊，那末這就“無可辯駁地證明國際的歷史的喪鐘已經響了”（本書第598頁）。實際上，正如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所說：“第一國際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隨之而來的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無比迅速向前發展的時代，即工人運動廣泛發展的時代，各民族國家內相繼成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的時代。”（《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卷，第31頁）而海牙大會提出建立獨立工人政黨的任務和做出開除巴枯寧的決議，正說明國際的活動已為在各國建立獨立的工人政黨奠定了基礎，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原則和組織原則對各種小資產階級的、宗派主義的社會主義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第592頁。
- 451 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成立的第二國際。——第599頁。
- 452 關於這篇報告，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143—152頁。——第605頁。
- 453 指1871年10月8日在芝加哥發生的著名大火災。據稱損失兩億美元，死亡數百人。——第605頁。
- 454 指冒充德國代表的法國人赫德蓋姆，參閱本書第603頁。——第609頁。
- 455 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由於反對吞并亞爾薩斯和洛林，於1872年被俾斯麥政府以“叛國”罪名判處了兩年要塞監禁。——第611頁。
- 456 聯合委員會的少數派是指1872年8月由居住愛徹斯特的外國流亡工

- 人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这个支部积极地反对英国联合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分子，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爭取巩固英国联合会的斗争。恩格斯应这个支部的请求代为起草了《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致不列颠联合会所有支部和全体会员》（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卷，第220—225页）。——第613页。
- 457 1874年，两个矿工工会的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伯特当选为議員，不过他們不是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而是作为自由党人进入議会的。——第613页。
- 458 參閱1873年9月27日馬克思給左尔格的信，载《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16页。——第614页。
- 459 息息法斯是希腊神話中的科林斯王，据说他因触怒宙斯而被罰在地獄中向山上推运巨石，但巨石推上山后又立即滚下，以此反复推运永无息止。一般用以喻指折磨人的劳动或費力不討好的工作。——第617页。
- 460 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在收入《政治学辞典》（«Handwörterbuch für Staatswissenschaften»，耶拿，1892）的《亨利希·卡尔·馬克思》一文（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下卷，第260页）中說的。——第620页。
- 461 指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忆馬克思》。參閱《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150页。——第620页。
- 462 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納的四部曲《尼伯龙根的指环》中有这样一句歌詞：“誰曾听說过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馬克思在1882年春天写的一封信（此信已佚失）中用最尖銳的詞句批評了瓦格納，說是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歪曲。馬克思說：“在原始时代，姊妹做妻子，这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197—198页）——第622页。
- 463 1865年馬克思在回答当时在英国和德国頗为流行的一些問題的《自白》中曾說他所热爱的散文家是狄德罗。1869年4月15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今天偶然发现家中有两本《拉摩的侄儿》，特寄一本給你。这独一无二的杰作又将給你新的喜悅。”（《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卷，第212—213页）——第622页。
- 464 馬克思在1854年10月26日和1873年11月30日給恩格斯的信中两次提到沙多勃利昂。他在后一封信中提到沙多勃利昂时說：“……这个作家我向来是討厭的。这个人在法国很有名气，因为他在一切方面都

是法国 *vanité* [虛榮心] 的最典型的化身，而且这种 *vanité* 不是穿着 18 世紀的輕浮佻健的服裝，而是穿着一身羅曼蒂克的化裝，通過生造的詞句炫耀出來的；故作高深，拜占庭式的誇張，感情的賣弄，變幻無常的色彩，*word painting* [文字的雕琢]，矯揉造作的戲劇性，*sublime* [崇高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聯書店 1958 年版，第 4 卷，第 471 頁）——第 622 頁。

- 465 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是包括九十餘篇長短篇小說的描繪當代生活的多卷集小說的總名稱。《人間喜劇》分三大部門，即“風俗研究”、“哲學研究”和“分析研究”。第一部門又分為“私生活寫真”、“政治生活寫真”和“農村生活寫真”。例如屬於“哲學研究”的有《路易·朗倍爾》（《*Louis Lambert*》，1834）；屬於“分析研究”的有《婚姻生理學》（《*La physiologie du mariage*》，1829）；屬於“私生活寫真”的有《夏倍上校》（《*Le Colonel Chabert*》，1832），等等。恩格斯在 1888 年 4 月給瑪·哈克奈斯的信中寫道：“巴爾札克，我認為他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他在《人間喜劇》里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我從這裡，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們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46—447 頁）關於馬克思要寫一部評論《人間喜劇》的著作的話，是拉法格在他的《憶馬克思》一文中說的。——第 623 頁。
- 466 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說：“他特別熱愛莎士比亞，曾經專門研究過他的著作，連莎士比亞戲劇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馬克思一家對偉大的英國戲劇家有一種真誠的敬仰。馬克思的三個女兒都能背誦莎士比亞的作品。”（《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70—71 頁）——第 623 頁。
- 467 馬克思的幼女愛琳娜·馬克思和她的丈夫艾威林在 1888 年第 6 期《新時代》上發表的《社會主義者雪萊》一文中說：“馬克思對於詩人，正如對於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一樣，是知道和了解得很清楚的。他平常總向我們說：‘拜倫和雪萊的真正區別在於，凡是了解和喜歡他們的人，都認為拜倫在三十六歲逝世是一件幸事，因為拜倫要是活得久一些，就會成為反動的資產者；相反地，這些人惋惜雪萊在二十九歲時就死了，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馬克思恩格斯

- 論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 卷，第 261 頁）——第 623 頁。
- 468 瓦格納是歌德的长詩《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从事制造“人造人”的研究。在《浮士德》第一部《夜》一节中瓦格納說：
- “啊！假使人只这般地因在书斋，
每逢年时岁节才偶而出外，
只从老光眼鏡底下遙瞻外界，
又怎能用言說来指导世界？”
- （歌德：《浮士德》，參閱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 部，第 28 頁）
——第 624 頁。
- 469 引自海因德曼的自传《我的冒险生活的记录》（《The Record of an Adventurous Life》，1911）。——第 625 頁。
- 470 指《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一书。有三联书店 1962 年版中譯本。——第 626 頁。
- 471 东方战争即俄土战争。1877 年 4 月俄国利用巴尔干斯拉夫人反抗土耳其統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而向土耳其宣战。1877 年 11 月俄軍逼近君士坦丁堡，翌年 2 月在該城附近圣斯蒂芬村簽訂了有名的圣斯蒂芬和約。根据和約，土耳其承认塞尔維亞、門的內哥罗和羅馬尼亞的独立，并且对俄国割地、賠款。后来在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压力下，在 1878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召开了有英法德奥俄等国外交官参加的柏林會議，談判修改圣斯蒂芬和約問題。会上俄国被迫让步，在 7 月 13 日簽訂了柏林条約。——第 635 頁。
- 472 指 1873 年的日內瓦大会、1874 年的布魯塞尔大会、1876 年的伯尔尼大会和 1877 年在比利时的根特召开的大会。1881 年 7 月无政府主义者还在伦敦召开了一次大会，产生了“劳动人民国际协会”即“黑色国际”，但未发生什么影响。1891 年、1893 年和 1896 年也举行过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大会，但都不过是一些小規模的宗派會議。——第 637 頁。
- 473 指俾斯麦借口謀刺德皇事件而于 1878 年 10 月 19 日在柏林帝国議會通过《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原名是《鎮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一事，時間与柏林會議（參閱注 471）大体相同。根据这个法令，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組織、群众性的工人組織、工人报刊都被禁止，社会民主党人从德国寄出的社会主义书刊都被沒收。法令最初規定有效期为二年半，后来延长至 1890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一时受到沉重打

告，但很快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影響下，由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組織了地下鬥爭，充分利用罷工鬥爭這一武器，迫使德國議會在1890年1月25日否決了俾斯麥提出的延長這個法令的議案。反對《反社會主義者非常法》的勝利鬥爭，是德國工人運動史上極其光輝的一頁。——第639頁。

474 卡諾薩是意大利北部的城堡。1077年1月，被開除教籍和廢除帝位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在這裡卑躬屈節地哀求他的敵人羅馬教皇格里哥里七世恕罪。——第645頁。

475 參閱1880年11月5日馬克思給左爾格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70—371頁。——第648頁。

476 民意黨是俄國民粹派的一個秘密的革命恐怖組織，是在“土地與自由”社分裂後於1879年8月產生的。民意黨的最近目標是推翻專制制度和建立基於“人民意志”的民主共和國。民意黨雖然提出了必須進行政治鬥爭的問題，但是卻把這一鬥爭歸結為密謀和個人恐怖。黑分黨是“土地與自由”社分裂後在1879年秋天成立的革命民粹派的組織。黑分黨人最初否認政治鬥爭的必要性，譴責民意黨人的恐怖策略，基本上同意“土地與自由”社的綱領。後來黑分黨人的觀點發生顯著的變化，有些人轉入民意黨，另一些人轉向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等著名黑分黨人於1883年在日內瓦創立了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

關於馬克思對民意黨和黑分黨的評論，參閱1880年11月5日馬克思給左爾格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71—372頁）。——第648頁。

477 帝俄皇宮所在地，位於列寧格勒西南四十五公里。——第649頁。

478 指巴克斯在《現代思想》（《Modern Thought》）月刊上連載的《現代思想的指導者》一文。——第650頁。

479 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給康·施米特的信中寫道：“唯物史觀現在也有許多朋友，而這些朋友是把它當做不研究歷史的借口的。正像馬克思關於七十年代末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曾經說過的，‘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4頁）——第655頁。



馬克思傳記年表

- 1818年5月5日 卡尔·馬克思誕生于特利尔城。
- 1830年10月 进特利尔中学。
- 1835年9月24日 毕业于特利尔中学。
- 10月15日 进波恩大学法律系。
- 1836年10月22日 轉入柏林大学法律系。
- 1837年4—8月 研究黑格尔哲学,并結識青年黑格尔派布·鮑威尔、弗·科本等。
- 1841年3月30日 毕业于柏林大学。
- 4月15日 以博士論文《論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获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证书。
- 7月 到达波恩。研究路·費尔巴哈的新著《基督教的本质》。
- 1842年4月 开始为《萊茵报》撰稿。
- 10月15日 到科伦担任《萊茵报》主編。
- 11月下半月 在科伦首次会见弗·恩格斯。
- 11月底 同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小组“自由人”决裂。
- 1843年3月17日 退出《萊茵报》編輯部。
- 6月19日 和燕妮·馮·威斯特华伦(1814年生)結婚。
- 3—9月 同阿·卢格磋商出版《德法年鉴》杂志。
- 10月底 因《德法年鉴》决定在巴黎出版而移居巴黎。
- 1844年2月 《德法年鉴》双刊号出版,其中載有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論犹太人問題》。
- 2月底 和恩格斯建立通信关系。
- 3月26日 阿卢格决裂。《德法年鉴》停刊。
- 4—8月 写《1844年經济学—哲学手稿》。
- 8月28日左右 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

- 9—11月 和恩格斯合写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 1845年2月3日 因在巴黎被逐而迁往布鲁塞尔。
- 2月24日左右 《神圣家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 1846年初 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 3月30日 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
- 1846年夏 和恩格斯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章节。
- 1847年1月20日 会见正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代表约·莫尔, 并和恩格斯一起同意加入该同盟。
- 6月初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委托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代表他前往参加。
- 7月初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 8月5日 在马克思领导下, 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成立, 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
- 8月底 和恩格斯组织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
- 11月29日— 和恩格斯赴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12月8日 受托以宣言的形式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
- 12月9日— 和恩格斯着手写《共产党宣言》。
12月底
- 12月下旬 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上作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
- 1848年2月24日左右 《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 3月3日夜 被警察逮捕, 经监禁后全家被逐出比利时。
- 3月5日 到达巴黎。
- 3月11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 马克思当选为主席。
- 4月6日左右 和恩格斯离开巴黎, 回德国直接参加革命。
- 4月11日以后 和恩格斯在科伦积极准备出版大型政治日报《新莱茵报》。
- 6月1日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在科伦创刊。

- 9月26日** 《新萊茵報》因科倫宣布戒嚴而被禁止出版，10月12日復刊。
- 1849年2月7日** 馬克思和恩格斯因《新萊茵報》被控侮辱檢察長和誹謗憲兵而受審，他們在法庭上發言揭露普魯士政府的罪行。
- 2月8日** 馬克思被控以“煽動叛亂”而出席科倫陪審法庭受審，他發言證明人民有權用革命來回答王權的反革命行為。
- 5月19日** 由於馬克思被逐，《新萊茵報》用紅色油墨出版最後一號(301號)。
- 6月3日左右** 到達巴黎。
- 8月26日左右** 被逐出巴黎，來到倫敦，在這裡一直住到逝世。
- 8月底—9月底** 和以前的倫敦中央委員會一些委員重新組織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
- 11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到達倫敦。
- 9—12月** 積極準備出版繼續《新萊茵報》的刊物《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後來恩格斯也參加了這一工作。
- 1850年1—2月** 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首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着手改組同盟。
- 3月6日**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1期在漢堡出版。該雜誌從這一期起刊載了馬克思的《1848—1850年》的連載文章。1895年恩格斯再版了這部著作，標題是《1848—1849年法蘭西階級鬥爭》。
- 9月15日** 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尖銳地批判了維利希和沙佩爾的冒險政策。同盟發生分裂。決定把中央委員會遷往科倫。
- 11月中** 恩格斯移居曼徹斯特。
- 11月26日** 《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最後一期合刊號(第5—6期)在漢堡出版。
- 1851年1—12月** 繼續緊張地研究政治經濟學，同出版商商談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著作。
- 8月8日左右** 接受《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撰稿邀請，為該報經常撰稿直到1862年。

- 1851年8月21日—
1852年9月24日 恩格斯应馬克思的請求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組文章。
- 1851年12月—
1852年3月 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 1852年5月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約·魏德迈主办的《革命》杂志第1期在紐約出版。
- 11月17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馬克思的提議宣布解散。
- 1853年1月下半月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巴塞尔出版。
- 5月20日 写《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
- 1854年1—12月 繼續研究政治經济学。
- 1854年底—
1855年10月 为民主派的《新奥德报》撰写有关英法局势和克里木战争的文章。
- 1857年1—4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紐約每日論壇报》写关于英国侵略中国的一組文章。
- 7月 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軍事条目。
- 8—9月 写《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
- 10月—
1858年3月 为完成政治經济学著作而加紧进行研究。
- 8月31日—
9月28日 写了四篇关于对华貿易史和关于天津条約的文章。
- 1859年6月11日 《政治經济学批判》第1分册在柏林出版。
- 7月3日左右 担任《人民报》的实际领导工作。
- 1860年12月1日 《福格特先生》在伦敦出版。
- 1861年10月—
1862年11月 密切注視美国內战的进展, 写論美国內战的大批文章。
- 1862年1月—
1863年1月 完成《剩余价值学說史》的主要篇章的写作。
- 1863年8月 着手撰写三卷《資本論》的新手稿。
- 1864年9月28日 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馬克思当选为协会临时委员会委員。
- 11月1日 国际工人协会临时委员会會議一致通过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临时委员会被确定为协会的領

- 导机构即总委员会，马克思在其中担任德国通讯书记职务。
- 1865年2月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声明中严厉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报》奉行的向俾斯麦政府献媚的政策，并表示拒绝为该报撰稿。
- 4月12日** 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大会上讲话揭露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的机会主义。
- 12月** 写完三卷《资本论》的新手稿。
- 1866年1月—
1867年3月底** 最后校阅《资本论》第1卷手稿，准备付印。
- 1866年9月3—8日**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了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并按照《指示》通过了各项决议；批准了以马克思草拟的临时章程为基础的章程。
- 1867年9月14日** 《资本论》第1卷在汉堡出版。
- 1868年9月6—13日**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和讨论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总结报告；根据马克思提出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和缩短工作日的决议。
- 11月23日** 写信给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声明由于协会对拉萨尔派的妥协态度，他退出协会。
- 12月22日** 总委员会会议一致赞同马克思写的关于拒绝巴枯宁的同盟加入国际的决议草案。
- 1870年7月26日** 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他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 9月9日** 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他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 9月20日** 恩格斯摆脱商务，移居伦敦；马克思推荐恩格斯为总委员会委员。
- 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他所写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得到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 6月28日—
7月28日** 《法兰西内战》由恩格斯译成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

- 9月17、18日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會議通过馬克思提出的关于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調查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建議。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国际的組織原則作了发言。
- 1872年3月5日 馬克思向总委员会提出他和恩格斯写的、揭露巴枯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通告《所謂国际的分裂》。
- 9月1—7日 参加并领导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馬克思力爭把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目标写入国际的章程；大会決議开除巴枯宁和吉約姆；决定將委员会迁往紐約。
- 1875年5月5日 寄給威·白拉克一封信，信中附有寄給爱森納赫派领导的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批評意見——《哥达綱領批判》。
- 1879年9月17—18日 和恩格斯联名給倍倍尔、李卜克內西、白拉克等人写了一封通告信，严厉批評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对以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別采取調和态度，要求消除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党机关报的任何影响。
- 1880年5月初 和恩格斯帮助盖得制訂法国工人党綱領。
- 1881年12月2日 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
- 1882年2—10月 因健康状况恶化去阿尔及利亚、法国和瑞士疗养。
- 11月— 从事《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3版的准备工作。
- 1883年1月
- 1883年3月14日(午后2时45分) 卡尔·馬克思在伦敦逝世。
- 3月17日 卡尔·馬克思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恩格斯发表墓前悼詞。
- 1885年7月初 恩格斯整理的《資本論》第2卷出版。
- 1894年年底 恩格斯整理的《資本論》第3卷出版。
- 1895年8月5日(晚上10时30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



人名索引

(按譯名首字的讀音和漢語拼音字母次序排列。條目后
系原書頁碼,檢索時請查印在本書正文頁邊的數碼。)

a

阿蘭,威廉(Allan,William 1813—1874)

——英國工人運動的活動家,機器製造
工人聯合會總書記。——第344頁。

阿貝勒(Abeelee)——見萬·登·阿貝勒,
昂利。

阿爾寧,蓀蒂娜·馮(Arnim,Bettina von
1785—1859)——德國浪漫派女作家。
——第117頁。

阿蓋爾,阿契波德·肯貝爾(Argyle, Ar-
chibald Campbell 1607—1661)——
蘇格蘭貴族,因參加反對查理一世的起
義而被處死刑。——第35頁。

阿蓋爾,阿契波德·肯貝爾(Argyle, Ar-
chibald Campbell 1629—1685)——
蘇格蘭貴族,因參加反對詹姆斯二世的
起義而被處死刑。——第35頁。

阿普爾加斯,羅伯特(Applegarth, Ro-
bert 約1834—1924)——英國工人運
動活動家,木工,木工聯合會總書記(1862
—1871);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的委員,后
來是工聯的典型機會主義的活動家。
——第344、440、482—484頁。

阿爾坦施泰因,卡爾(Altenstein, Karl

1770—1840)——普魯士宗教、教育、醫
務大臣(1817—1838)。——第43、45、
49、50、53頁。

阿克雪里羅得,巴維爾·波利索維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
—1928)——俄國社會民主黨人,70年
代曾是民粹派分子,俄國第一個馬克思
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的創立者之一;
後來是孟什維克的領袖之一,蘇維埃政
權的凶惡敵人。——第537、547頁。

ai

埃爾哈特,約翰·路德維希·阿爾伯特
(Erhardt, Johann Ludwig Albert
約生于1820)——科倫的店員,科倫共
產黨人案件的被告之一,被法院宣判無
罪。——第246頁。

埃卡爾斯,約翰·格奧爾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國
工人,正義者同盟盟員,后為共產主義
者同盟盟員,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後來接近英國工會改良主義領袖。
——第167、230、232、239、273、345、
346、360、361、362、375、412、413、425、
438、440、442、484、491、507、508、510、

- 517, 518 頁。
- 埃克施泰因, 古斯塔夫(Eckstein, Gustav 1875—191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中派分子,《新时代》的編輯之一。——第 560 頁。
- 埃斯庫羅斯 (Aischylos 公元前 525—456)——古希腊卓越的剧作家, 古典悲剧的作者。——第 525 頁。
- 爱尔維修, 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杰出的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 无神論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102, 103 頁。
- 艾釋黎, 安东尼·庫柏(Ashley, Anthony Cooper, 从 1851 年起为舍夫茨别利伯爵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籠絡人心地支持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 128, 129 頁。
- 艾希曼, 弗兰茨·奥古斯特(Eichmann, Franz August 1816—1860)——莱茵省省长, 普富尔内閣的内务大臣, 保守党人。——第 213 頁。
- 艾韦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 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50 年退出同盟。——第 113, 149, 190 頁。
- 艾希霍恩, 約翰·阿尔勃萊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反动分子, 宗教、教育、医务大臣(1840—1848)。——第 50, 51, 53, 54, 59, 63 頁。
- 艾希特迈耶尔, 泰奥多尔(Echtermeyer, Theodor 1805—1844)——《哈雷年鉴》的編輯人之一, 青年黑格尔分子。——

第 45 頁。

ao

- 奥托, 卡尔·烏尼巴特(Otto, Karl Wunibald 約生于 1809)——德国化学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1852)。——第 246 頁。
- 奥哲尔, 乔治(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領袖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主席, 后来成为叛徒。——第 344, 345, 361, 364, 375, 379, 413, 416, 481, 482 頁。
- 奥本海姆, 达哥伯特(Oppenheim, Dagobert 1809—1889)——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萊茵报》的出版負責人之一。——第 62, 63, 78 頁。
- 奥勃萊恩, 詹姆斯·布隆泰尔(O'Brien, James Bronterre 1805—1864)——英国宪章运动活动家, 企图用各种空想的方案使工人放弃阶级斗争的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第 482 頁。
- 奥尔辛尼, 菲利契(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 恐怖主义者, 爭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統一的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 后因謀杀法国皇帝拿破侖第三被处死刑。——第 292 頁。
- 奥格辽夫, 尼古拉·普拉东諾維奇(Огарев, 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1813—1877)——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詩人和政論家, 赫尔岑的朋友和战友, 曾同他一道在国外参加创办自由俄国报刊。——第 483 頁。
- 奧利維耶, 艾米尔(Ollivier, Emile 1825—191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共和主义者, 后来成为波拿巴分子, 首相(1870 年 1—8 月)。——第 456, 457, 495 頁。

奧斯渥特, 弗里德里希 (Oswald, Friedrich)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笔名。
——第 119 頁。

奧維狄烏斯, 即普布里烏斯·奧維狄烏斯·納索 (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 43—約公元 17) —— 卓越的羅馬詩人。——第 40 頁。

奧艾爾斯瓦爾德, 漢斯·魯道夫 (Auerswald, Hans Rudolf 1792—1848) —— 普魯士將軍,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 屬於右派, 1848 年 9 月法蘭克福人民起義時被殺。——第 309 頁。

ba

巴赫, 麥克斯 (Bach, Max) —— 奧地利歷史學家, 社會民主黨人。——第 560、561 頁。

巴拉, 茹爾·德 (Bara, Jules de 1835—1900) —— 比利時國務活動家, 自由主義者, 司法大臣。——第 417 頁。

巴貝夫, 格拉古; 真名弗朗斯瓦·諾埃爾 (Babeuf, Gracchus; 真名 François-Noël 1760—1797) —— 法國革命家, 空想平均共產主義的杰出代表, 1796 年“平等派”密謀的組織者。——第 533 頁。

巴克斯, 厄內斯特·貝爾福特 (Bax, Ernest Belfort 1854—1926) —— 英國社會主義者, 社會民主黨人聯盟 (1881) 和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創立者之一, 後來成為改良主義者 and 社會沙文主義者。——第 547 頁。

巴枯寧, 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 俄國革命家, 無政府主義思想家之一, 馬克思主義的凶惡敵人, 第一國際的會員, 1872 年因進行破壞和

分裂活動而被開除出國際。——第 26、86、87、108、114、120、174、181、190、426—433、435—438、441、442、444—454、477、478、485—494、497、499、501、503、504、510、513、514、518—522、537、546、560—563 頁。

巴爾貝斯, 阿爾芒 (Barbès, Armand 1809—1870) —— 法國小資產階級革命家, 一些秘密的共和主義團體的組織者之一, 1848 年革命的參加者, 後來在政治上未起作用。——第 109 頁。

巴爾扎克, 昂諾萊·德 (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 —— 偉大的法國作家, 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第 526、527 頁。

bai

白爾尼, 路德維希 (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 —— 德國激進派和文學批評家, 激進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著名代表者之一, 晚年成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擁護者。——第 106、107、118 頁。

白恩士, 莉希 (Burns, Lizzy 死于 1878) —— 愛爾蘭女工, 弗·恩格斯的第二個妻子, 瑪麗·白恩士的妹妹。——第 414 頁。

白恩士, 瑪麗 (Burns, Mary 死于 1863) —— 愛爾蘭女工, 弗·恩格斯的第一個妻子。——第 327、328、414 頁。

白拉克, 威廉 (Bracke, William 1842—1880) ——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愛森納赫派的領袖之一, 社會民主黨的黨團成員 (1877—1879)。——第 555 頁。

拜倫, 喬治·戈登 (Byron, George Gordon 1788—1824) —— 英國的杰出詩人, 革命浪漫主義的代表, 希臘民族解放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第 261、526 頁。

ban

班迪亚, 亚诺什(约翰)(Bangya, Janos [Johann] 1817—1868) ——匈牙利记者, 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军的团长; 后来成为警探。——第244页。

班贝格, 路德维希(Banberger, Ludwig 1823—1899) ——德国政治活动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319页。

bao

鲍威尔, 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布鲁诺·鲍威尔之弟。——第121、125、126、129、130、138、144、274、302页。

鲍威尔, 艾格伯特(Bauer, Egbert)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兄。——第121、125、126、138、144页。

鲍威尔, 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最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著有一些有关早期基督教史的著作;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46、47、49—54、58—61、63、71—74、90、92、93、96、97、99、113、120、121、124—130、132、133、138、139、143、144、151、274、557页。

鲍威尔, 亨利希(Bauer, Heinrich)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第113、167、170、181、226、227、229、230页。

bei

倍克, 卡尔·伊西多尔(Beck, Karl Isidor 1817—1879) ——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 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第117、163页。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人和领袖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25、420、422、424、441、458—461、463、464、469、480、515、529、530、540、542—544、556、560、563、564页。

贝塔(贝特齐希), 亨利希(Beta [Betzsch], Heinrich 1818—1876) ——德国小资产阶级记者。——第307、310页。

贝克尔, 伯恩哈特(Becker, Bernhard 1826—1882) ——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拉萨尔主义者, 圣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4—1885); 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1872); 后参加爱森纳赫派。——第353、509页。

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德国政论家,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1852);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198、199、211、234、246、247、274、275页。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 第一国际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 参加过国际的历史大会; 《先驱》杂志的编辑人(1866—187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 313、361、362、372、376、377、419、426、433、435、436、438、450、453、454、492、505、510、518、556、560 頁。

貝朗熱，比埃爾-讓·德 (Béranger, Pierre-Jean de 1780—1857) ——最卓越的法國民主詩人，著有一些政治諷刺作品。——第 103 頁。

貝爾奈斯，斐迪南·卡爾·路德維希 (Bernays, Ferdinand Karl Ludwig 1815—1879) ——德國激進政論家，1844 年參加巴黎德國流亡者的報紙《前進報》編輯部，後來流亡美國。——第 85、89、109、113、114、149 頁。

貝爾特蘭，路易 (Bertrand, Louis 生于 1856) ——比利時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活動家，歷史學家。——第 558 頁。

蓓蒂納 (Bettina) ——見阿爾寧，蓓蒂納。

ben

本涅迪克，路德維希·奧古斯特 (Benedek, Ludwig August 1804—1881) ——奧地利將軍。——第 369 頁。

bi

比斯利，愛德華·斯賓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 ——英國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學家，小資產階級激進派，實證主義者，曾積極參加 60 年代的民主運動。——第 345、347、375、410 頁。

比斯康普，埃拉爾特 (Biskamp, Elard) ——德國民主主義者，政論家，曾參加 1848—1849 年革命，後流亡。——第 303、304、306、309 頁。

彼得一世 (Пётр I 1672—1725) ——從 1682 年為俄國沙皇，從 1721 年為全俄皇帝。——第 264、363 頁。

俾斯麥，奧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 ——普魯士國務活動家，從 1862 年任首相，德意志帝國的宰相 (1871—1890)。——第 297、337、354—357、366、367、369、371、383、384、420、421、459、462、463、465、470、471、474、475、479、480、490、521、527、539 頁。

畢萊，歐仁 (Buret, Eugène 1810—1842) ——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第 103、133 頁。

畢舍，菲利浦·若塞夫·本沙門 (Buche, 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 ——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學家，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之一，主張在國家支持下創辦生產合作社，後來參加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第 103、331、333 頁。

畢希納，路德維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 ——德國資產階級學者，生理學家，庸俗唯物主義的代表。——第 157、305、412 頁。

畢爾格爾斯，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 ——德國激進政論家，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後來成為自由主義者。——第 246、247、274 頁。

bie

別林斯基，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 ——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文學批評家，政論家和唯物主義哲學家。——第 428 頁。

別爾納多特，讓·巴蒂斯特·茹爾 (Bernadotte, Jean Baptiste Jules 1763—1844) ——法國元帥，從 1818 年為瑞典和挪威國王，名查理十四世約翰。

——第 81 頁。

bo

波蒙, 弗兰西斯 (Beaumont, Francis 1584—1616) ——英国剧作家, 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第 139 頁。

波旁 (les Bourbons) ——法国的王朝 (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102, 127 頁。

波尔恩, 斯蒂凡, 真名西蒙·布特米里希 (Born, Stephan; 真名 Simon Buttermilch 1824—1898) ——德国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曾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 在革命期间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第 165, 169, 182, 210—212, 229 頁。

波克罕, 西吉兹蒙德·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 ——德国政论家, 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 1848—1849 年革命, 后来流亡瑞士和英国。——第 318, 320, 329, 365, 432—434, 445, 446, 450, 453, 520, 560, 562, 563 頁。

波拿巴, 路易 (Bonaparte, Louis) ——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 日罗姆 (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 ——拿破仑第一之弟, 威斯特伐里亚的国王 (1807—1813), 从 1850 年为法国元帅。——第 292, 306, 353 頁。

波特尔, 乔治 (Potter, George 1832—1893) ——英国右翼工联主义者, 木匠, 第一国际会员, 英国工联报纸《蜂房》的创办人和编辑, 他在该报上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公开代理人。——第 413 頁。

波利亚科夫 (Поляков, Н. П.) ——马克思《资本论》的彼得堡出版人。——第

445 頁。

伯麦, 雅科布 (Böhme, Jakob 1575—1624) ——德国哲学家, 神秘主义者。——第 117 頁。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主编 (1881—1890), 在恩格斯逝世后成为叛徒,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极端机会主义派领袖。——第 25, 542—544, 556—559 頁。

伯恩斯坦, 亨利希 (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巴黎报纸《前进报》的创办人 (1844), 1848 年后移居美国, 在那里参加了国内战争 (1861—1865)。——第 108, 109, 114, 158 頁。

伯恩施太德, 阿达尔贝特·冯 (Bornstedt, Adalbert von 1808—1851) ——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第 108, 109, 158, 159, 169, 180, 181 頁。

勃朗, 让·若塞夫·路易 (Blanc, Jean-Joseph-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1848 年革命的活动家, 临时政府和卢森堡委员会委员,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后流亡国外。——第 85, 104, 112, 166, 313 頁。

勃拉斯, 奥古斯特 (Braß, August 1818—1876) ——德国记者, 40 年代的民主主义者, 后来成为俾斯麦的拥护者。——第 355 頁。

勃鲁姆, 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 1848 年 10 月参加维也纳的保卫, 该城被反

革命軍隊攻陷后被枪杀。——第189、296、299、304、308頁。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威廉，伯爵(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1792—1850)——普魯士反动的国务活动家，首相(1848—1850)，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与非皇族女子結婚所生之子。——第205、206頁。

勃兰肯堡，莫里茨·馮(Blanckenburg, Moritz von 1815—1888)——德國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第323頁。

勃留赫尔，盖勃哈德·莱伯列希特(Bliicher, Gebhardt Leberecht 1742—1819)——普魯士元帅，德意志人民反对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第261頁。

勃魯普巴赫尔，弗里茨(Brupbacher, Fritz 約生于1875)——瑞士政治活动家，社会民主党人，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是瑞士共产党党员。——第561—563頁。

柏拉图(Platon 公元前約427—約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51、52、55頁。

bu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82)——普魯士官僚，政論家，1848年曾为普魯士国民議會議員，居中偏左，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318、319、336、365—368、384頁。

布莱特，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論者，后为自由主义者，在自由派內閣中屢任大臣职位。——第344、346頁。

布朗基，路易·奧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四季社”和一些密謀的組織者，1830年和1848年巴黎起义和革命的参加者。——第103、341頁。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國政論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國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領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305—307、310、312、315、316、338頁。

布里茲倍恩，阿尔伯特(Brisbane, Albert 1809—1890)——美国記者，《紐約每日論壇报》的主編，宣传傅立叶的學說。——第199頁。

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見卡尔·威廉·斐迪南。

cai

采德利茨，男爵(Zedlitz, Freiherr von)——柏林警察厅长。——第324頁。

蔡特金，克拉拉(Zetkin, Clara 1857—193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創立者之一，曾領導反对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第28、555頁。

cha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被处死刑。——第101、373頁。

查苏利奇，維拉·伊万諾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曾参加民粹主义运动，后来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

社”的創立者之一，后来站到孟什維克的立場上。——第 547 頁。

查理-阿尔伯特 (Carlo Alberto 1798—1849) —— 薩丁国王 (1831—1849)。——第 290、291 頁。

da

达烏，路易·尼古拉 (Davout, Louis-Nicolas 1770—1823) —— 法国元帅，参加过拿破侖的历史出征。——第 35 頁。

达尔文，查理 (Darwin, Charles 1809—1882) —— 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动植物物种起源學說的創始人。——第 150、527、553 頁。

达拉什，阿尔伯特 (Darasz, Albert 1808—1852) —— 波兰政論家，曾参加 1830—1831 年的起义，波兰流亡者的各种民主組織的积极活动家。——第 233 頁。

达来朗-貝里戈爾，沙尔·莫里斯·德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1754—1838) —— 法国著名外交家，以政治上的极端无原則和重裝著称。——第 81 頁。

大仲馬；即亚历山大·仲馬(父) (Dumas, Alexandre (père) 1803—1870) —— 法国著名作家，許多传奇小說的作者。——第 527 頁。

dai

戴斯杜，奥斯卡 (Testut, Oscar) —— 法国历史学家，曾根据警察机关的档案写过一部关于国际的书。——第 559 頁。

dan

丹尼尔斯，罗兰特 (Daniels, Roland 1819—1855) —— 德国医生，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員，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第 166、216、246、247、273 頁。

丹尼尔遜，尼古拉·弗兰采維奇；笔名尼古拉-遜 (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ович；笔名 Николай-он 1844—1918) —— 俄国文学家和經濟学家，80—90 年代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在許多年中間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书信往来，完成了盖·亚·洛帕廷开始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一书的俄譯工作。——第 409 頁。

丹特萊格，埃米尔；笔名斯瓦尔姆 (Dentraygues, Emile；笔名 Swarm) —— 法国铁路職員，第一国际的會員，海牙大会的代表；在 1873 年迫害第一国际會員的审判案期間發出突自己的同志。——第 509 頁。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 伟大的意大利詩人。——第 525 頁。

dao

道梅尔，格奧尔格·弗里德里希 (Daumer, Georg Friedrich 1800—1875) —— 德国作家和哲学家，一些有关宗教史的著作的作者。——第 221 頁。

de

德納，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 —— 美国进步記者，實产階級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出版人，該報在 1851—1862 年期間刊登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論文。——第 199、238、245、253、268、277、559 頁。

德·巴普，塞札尔 (De Paeppe, César 1842—1890) —— 比利时工人運動活动

家，第一國際的會員，幾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比利時工人黨的創立人之一（1885）。——第 361—363、425、442、537 頁。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國政論家，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新萊茵報》編者之一；曾流亡英國，後退出積極的政治活動。——第 165、182、200、273 頁。

德勒爾，西蒙（Dereure, Simon 約 1838—1900）——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布朗基主義者，第一國際的會員，幾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巴黎公社的積極參加者之一。——第 510 頁。

德穆特，海倫；愛稱琳蘅（Demuth, Helene; 愛稱 Lenchen 1823—1890）——馬克思家的女僕和忠實的朋友，從年輕時起便同他們生活在一起。——第 201、245、320、322、327、329、549 頁。

德普勒，馬賽爾（Deprez, Marcel 1843—1918）——法國物理學家，曾研究中能傳送問題。——第 551、553 頁。

德薩米，德奧多（Dézamy, Théodore 1803—1850）——法國政論家，唯物主義者，空想共產主義的革命派的著名代表。——第 88 頁。

德斯特爾，卡爾·路德維希·約翰（D'Estl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德國醫生，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1848—1849 年革命期間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員，曾參加 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後流亡瑞士。——第 166、211、215 頁。

德謨克利特（Demokritos 公元前約 460—約 370）——偉大的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原子論的創始者之一。——第 52、54—58、139 頁。

di

狄慈根，約瑟夫（Dietzgen, Joseph 1828—1888）——德國工人，社會民主黨人，自學的哲學家，曾獨立地達到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第一國際海牙大會的代表。——第 406、509、556 頁。

狄德羅，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傑出的法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無神論者，法國革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之一，啟蒙運動者，百科全書派的領袖。——第 526 頁。

笛卡兒，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傑出的法國二元論哲學家，數學家 and 自然科學家。——第 102 頁。

迪茨，奧斯渥特（Dietz, Oswald 死于 1864）——德國建築師，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同盟分裂後加入維利希—沙佩爾集團，後參加美國國內戰爭。——第 243 頁。

迪斯累利，本杰明，比肯斯菲爾德伯爵（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國國務活動家和作家，保守黨的領袖，首相（1868 和 1874—1880 年）。——第 367、373、411 頁。

du

杜邦，歐仁·克洛維（Dupont, Eugène Clovis 約 1831—1881）——法國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的活動家，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幾次代表大會的參加者。——第 412、510、518 頁。

杜林，歐根（Dühring, Eugen 1833—1921）——德國哲學家，庸俗唯物主義者，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思想家，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第 164、

367, 407, 532—535 頁。

杜普勒, 弗朗斯瓦 (Duplex, François 死于 1906) —— 法国工人, 第一国际在日内瓦的法国人支部的創立者, 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蒲鲁东主义者。——第 361, 362 頁。

dun

敦克尔, 弗兰茨·古斯塔夫 (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 ——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家。——第 280, 294, 295 頁。

en

恩贝尔, 雅克 (Imbert, Jacques 1793—1851) —— 法国的布朗基主义革命家, 流亡比利时,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1848 年二月革命后为推勒里宫警卫队长。——第 189 頁。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 —— 弗·恩格斯之父, 工厂主。——第 116 頁。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 第 25, 53, 79, 85, 107, 113, 114, 116—129, 132—145, 147, 149, 150, 157, 159—169, 171, 174—178, 181, 182, 189—191, 200, 202, 203, 210, 211, 215—218, 220—222, 225—227, 230—238, 238, 239, 243—248, 250, 252—263, 265—271, 273, 274, 276—279, 281, 282, 288, 289, 294, 295, 297—305, 307, 308, 312, 315, 316, 319, 323—337, 347, 352—357, 359—361, 363—366, 368—371, 373, 375, 381—384, 395, 404—407, 410, 413, 414, 419—422, 424, 429, 431—435, 440, 443, 448, 450, 453, 455, 458, 450, 461 464, 466,

470, 471, 476, 477, 492, 502, 505—509, 512, 515—520, 523, 524, 526, 527, 529, 530—536, 540—547, 550—552, 555—561, 563, 564 頁。

恩斯特·奥古斯特 (Ernst August 1771—1851) —— 汉诺威国王 (1837—1851)。——第 289 頁。

fa

法齐, 让·沙克 (詹姆斯) (Fazy, Jean Jacques [James] 1794—1878) —— 瑞士国务活动家和政論家, 激进派, 日内瓦政府的首脑 (1846—1853 和 1855—1861)。——第 304, 306, 310 頁。

法夫尔, 茹尔 (Favre, Jules 1809—1880) ——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政府成员 (1870—1871), 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的参加者之一。——第 464, 471, 479, 481, 511 頁。

fei

菲尔丁, 亨利 (Fielding, Henry 1707—1754) —— 英国现实主义作家, 启蒙运动者。——第 526, 527 頁。

菲力浦斯, 里昂 (Philips, Lion 死于 1866) —— 卡·马克思的舅父。——第 30, 321, 322 頁。

费格勒 (Vögele, A.) —— 伦敦一家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第 306, 307, 310 頁。

费利叶, 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Ferrier, François Louis August 1777—1861) —— 法国海关官吏, 经济学家。——第 159 頁。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 —— 德国激进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后为自由主义者。——第 107 頁。

费舍尔, 爱德华 (Fischel, Edouard 1826

—1863)——德國政論家，烏尔卡爾特的擁護者。——第315、317頁。

費希特，約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國哲學家，主觀唯心主義者。——第256、533頁。

費爾巴哈，路德維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馬克思以前德國最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第37、78—81、83、84、86、87、92、93、97、99、101、103、124、129、188、138—141、144、149、157、158、408、557頁。

fen

芬克，格奧爾格，男爵 (Vincke, Georg, Freiherr de 1811—1875)——普魯士政治活動家，1848—1849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左派領袖之一。——第323頁。

fu

弗勒徹，約翰 (Fletcher, John 1579—1625)——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的時代人。——第189頁。

弗利切，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德國工人，拉薩爾主義者，全德工人聯合會的組織者之一。——第422、424頁。

弗略里，查理；真名克勞塞，卡爾·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 (Fleury, Charles; 真名 Krause, Carl Friedrich August 約生于1824)——普魯士警探。——第245頁。

弗洛孔，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8)——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臨時政府的成員 (1848)。——第104、186、

180、182頁。

弗蘭格爾，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普魯士將軍—元帥，反動分子。——第194、196、205頁。

弗蘭克爾，列奧 (Frankel, Leo 1844—1896)——匈牙利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巴黎公社的積極參加者，馬克思的擁護者，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的創立人之一 (1890)。——第473、474、509、518、538頁。

弗里布爾 (Fribourg)——法國羅版工人，後為廠主，第一國際會員，倫敦代表會議和日內瓦代表大會 (1866) 的代表，右翼蒲魯東主義者，後來脫離工人運動。——第361、364、376頁。

弗蘭克爾 (Fränkel)——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同盟于1850年分裂後參加維利希—沙佩爾集團。——第230頁。

弗呂貝爾，尤利烏斯 (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國激進政論家和進步著作出版家。——第79、83、89、125、144頁。

弗里德蘭德，胡果 (Friedländer, Hugo)——第一國際會員，海牙大會代表。——第509頁。

弗里德蘭德，麥克斯 (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德國政論家，拉薩爾的表兄弟，維也納的《新聞報》的編輯之一。——第279、302頁。

弗里德里希，卡爾·尼古拉 (Friedrich, Karl Nikolaus 1828—1885)——普魯士親王，將軍。——第369頁。

弗萊里格拉特，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國詩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新萊茵報》

- 的編輯之一，后来脱离革命运动。——第 91, 116, 137, 163, 201—204, 214, 216, 222, 237, 239, 243, 249, 252, 269, 271—274, 276, 302—305, 307—311, 313—316, 322, 330, 337, 370, 407, 408, 556, 558, 559 頁。
- 弗里德里希二世，史称“大帝”（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 30, 46—49, 52 頁。
- 弗里德里希七世（Friedrich VII 1808—1863）——丹麦国王（1848—1863）。——第 193 頁。
- 弗罗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oblewski, Walery 1836—1908）——60 年代波兰革命运动和国际革命运动以及巴黎公社的著名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海牙大会代表，曾参加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内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第 510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 40, 60, 471 頁。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 59, 63, 64, 67, 72, 74, 76, 89, 113, 114, 159, 193, 212, 228, 290, 293 頁。
- 伏尔泰，弗朗斯瓦·马利；真姓阿鲁埃（Voltaire, François-Marie; 真姓 Arouet 1694—1778）——法国著名作家，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27 頁。
- 孚赫，尤利乌斯（Faucher,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德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之一。——第 126, 128, 129, 274, 303 頁。
- 福伦（Vollen）；兄弟二人，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August Adolf Ludwig 1794—1855）和卡尔（Karl 1795—1840）——反抗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15 年后参加大学生反政府的运动。——第 304 頁。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議員（1848—1849），属于左派；后流亡国外，是拿破仑第三的走狗。——第 157, 304—321, 365, 432, 525, 559 頁。
-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的編輯人。——第 543, 544 頁。
- 傅立叶，弗朗斯瓦·马利·沙利（Fourier, François-Marie-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03—105, 127, 129, 199 頁。

gai

- 盖勃，威廉·利奥波特·奥古斯特（Geib, Wilhelm Leopold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森纳赫派，从 1874 年起是帝国议会議員。——第 529 頁。
- 盖得，茹尔（Guesde, Jules 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創立者之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宣传者，后来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537, 545, 546 頁。
-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Geiger, Wil-

helm Arnold)——普魯士警官，1848年是法院偵察員，後來任科倫警察局長。——第200頁。

蓋拉赫，卡尔·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馮 (Gerlach, Karl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von)——普魯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人物之一，科倫行政區長官(1839—1844)。——第77頁。

蓋斯克爾，彼得 (Gaskell, Peter)——英國醫生，自由主義者，著有關於工人狀況的書。——第133頁。

gan

甘斯，爱德华 (Gans, Eduard 約1798—1839)——德國法學教授，黑格爾主義者。——第31、38頁。

ge

歌德，約翰·沃尔弗干格·馮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偉大的德國詩人。——第30、34、107、116、117、163、250、256、257、329、524、525頁。

格林，罗伯特 (Greene, Robert 1560—1592)——英國作家，莎士比亞的先驅者。——第139頁。

格林，威廉 (Grimm, Wilhelm 1786—1859)——德國語言學家，德國民間童話和中世紀史詩的整理者之一。——第322頁。

格林，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德國語文學家，威·格林之兄，德國民間童話和中世紀史詩的整理者之一。——第47、260、322頁。

格萊夫 (Greif)——普魯士警探，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的證人 (1852)。——第245頁。

格雷培，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提安·路德維希 (Graeber, Friedrich Christian Ludwig 生于1818)——恩格斯的同學，後來是牧師。——第116頁。

格雷培，威廉 (Graeber, Wilhelm 生于1820)——恩格斯的同學，後來是牧師。——第116頁。

格里利，霍雷斯 (Greely, Horace 1811—1872)——美國政治活動家和記者，《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出版者和編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1862年期間曾在該報發表文章。——第559頁。

格列維，茹爾 (Grévy, Jules 1807—1891)——法國資產階級國務活動家，右翼共和黨人，共和國總統 (1879—1887)。——第464頁。

格律恩，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第117、140—144、149、163頁。

格萊斯頓，威廉·尤爾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國反动政治活動家和國務活動家，19世紀後半期自由黨的領袖，首相 (1868—1874, 1880—1885, 1886 和 1892—1894)。——第348、373、411、416、439、455、456、518頁。

格蘭威爾，喬治·利未森·高厄，伯爵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of 1815—1891)——英國資產階級國務活動家，輝格黨人，外交大臣 (1851—1852, 1870—1871, 1880—1885) 和殖民大臣 (1868—1870 和 1886)。——第479、482頁。

格雷利希，海爾曼 (Greulich, Hermann 1842—1925)——瑞士社會民主黨的創

立者之一和它的右翼領袖，社会沙文主义者，工人运动和苏联的敌人。——第538頁。

格律恩堡，卡尔 (Grünberg, Karl 生于1891) ——德国作家，共产主义者。——第556頁。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 (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1760—1831) ——普鲁士政治活动家，將軍和元帅，在德国人民反抗拿破侖統治的解放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第190頁。

gu

古姆佩尔特，爱德华 (Gumpert, Eduard 死于1893)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523頁。

谷兹考，卡尔·斐迪南 (Gutzkow, Karl Ferdinand 1811—1878) ——德国作家，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之一；1838—1842年是《德意志电訊》杂志編輯人，恩格斯曾在該刊发表文章。——第118—120頁。

ha

哈尼，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 ——英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宪章运动左翼領袖之一，《北极星报》和其他宪章派出版物的編輯人，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166、267—269、559頁。

哈登堡，卡尔·奥古斯特，公爵 (Hardenberg, Karl August, Fürst von 1750—1822) ——普鲁士国务活动家，首相 (1810—1822)，推行过一些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 (1810—1813)；神圣同

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者。——第36頁。
哈布斯堡 (Habsburger) ——所謂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从1273到1808，有間断)，西班牙 (1516—1700)，奥地利帝国 (从1804) 和奥匈帝国 (1867—1918) 的王朝。——第290、291、298頁。

哈赛尔曼，威廉 (Hasselmann, Wilhelm 生于1844)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薩尔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80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29頁。

哈茨费尔特，索菲娅，伯爵夫人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 ——拉薩尔的朋友和拥护者。——第202、203、275、338、356、357、367頁。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 (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薩尔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71)，《前进报》的編輯之一 (1876—1878)，帝国議會議員。——第529頁。

hai

海涅，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 ——伟大的德国革命詩人和政論家。第29、31、32、39、70、85、89、90、103、104、106—108、113、114、116—118、137、141、202、257、273、525、535頁。

海德尔，約翰·哥特弗利德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 ——德国作家和艺术理論家。——第35頁。

海因岑，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 ——德国政論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过1849年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流亡国外。——第163、164

頁。

海爾梅斯, 卡尔·亨利希(Hermes, Carl Heinrich 1800—1856) —— 德國反動政論家, 1842年是《科倫日報》編輯之一, 普魯士政府的密探。——第78頁。

海爾維格, 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Herwegh, Georg Friedrich 1817—1875) —— 德國著名詩人,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第72、76、80、85、90、106、112、158、174、181、182、201、308、429頁。

海因德曼, 亨利·迈尔斯(Hyndman, Henry Mayers 1842—1921) —— 英國政治活動家, 社會民主黨人聯盟的創立者和領袖之一, 社會沙文主義者。——第527、528、547頁。

海尼克修斯, 約翰·哥特利勃(Heineccius, Johann Gottlieb 1681—1741) —— 德國法學家, 著有一些有關羅馬法史的著作。——第39頁。

han

漢澤曼, 大卫·尤斯图斯(Hansemann, David Justus 1790—1864) —— 普魯士政治活動家, 萊茵地區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 首相(1848年7—9月), 實行同反動派妥協的叛變政策, 後來不再從事積極的政治活動。——第184—186、196、197頁。

hao

豪夫, 威廉(Hauff, Wilhelm 1802—1827) —— 德國作家, 晚期浪漫主義的代表。——第116頁。

he

荷馬(Homeros 約公元前9世紀) ——

半傳說的古希臘敘事詩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史詩的作者。——第36、525頁。

赫斯, 莫澤斯(Hess, Moses 1812—1875) —— 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 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 第一國際的會員, 布魯塞爾大會(1868)和巴塞爾大會(1869)的代表。——第62、70、85、134、140—144、147、148、164、168、169、175、353、425、440、446頁。

赫伯爾, 弗里德里希(Hebbel, Friedrich 1813—1863) —— 德國劇作家。——第526頁。

赫德爾, 艾米爾·亨利希·麥克斯(Hödel, Emil Heinrich Max 死于1878) —— 德國工人, 1878年因謀刺德皇威廉一世被處死刑。——第366頁。

赫爾岑,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 —— 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作家和政論家, 唯物主義哲學家, 1847年流亡國外, 在國外出版文集《北極星》(1855—1869)和報紙《鐘聲》(1857—1867)。——第430、432、446、451—453、488頁。

赫普納, 阿道夫(Hepner, Adolf 1846—1923) ——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第一國際海牙大會代表。——第509頁。

赫德蓋姆(Heddeghem) —— 見萬·赫德蓋姆。

赫希柏格, 卡尔(Höchberg, Karl 1858—1885) ——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 機會主義者, 資助過一些社會民主主義出版物。——第534—536、542、543頁。

赫拉克利特, 愛非斯的(Herakleitos aus Ephesos) (公元前約540—約480) ——

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创始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52、56页。

hei

黑尔,约翰(Hales, John)——英国工联派的右翼领袖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海牙大会后曾发动诽谤马克思的运动。——第508、510、516—518、538页。

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最大的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阐发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第37、38、40、43、44、47、49、51、52、55—57、59、60、62、66、68、69、79、80、91—93、100、101、107、119、120、123、124、126、133、134、140、141、149、151、153、154、157、158、202、221、250、256、257、283、332、407、533、556页。

heng

亨泽(Hentze)——德国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属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证人。——第214、215页。

亨格施坦堡,恩斯特·威廉(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1869)——德国神学家,反动分子,柏林大学教授。——第49、119页。

hong

洪堡尔特,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冯(Humboldt,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 von 1769—1859)——杰出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114页。

hu

胡登,乌尔利希·冯(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人文主义诗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和它的思想家。——第42、190页。

hui

惠勒,乔治·威廉(Wheeler, George William)——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1865)。——第345页。

huo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先驱。——第161页。

霍尔堡,路德维希(Holberg, Ludvig 1684—1754)——丹麦大作家,现实主义者。——第195页。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狄特利希(Holbach, Paul Henri Dietrich 1723—1789)——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先驱,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102、103页。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1415—1701)、普鲁士王(1701—1918)和德国皇帝(1871—1918)的王朝。——第50、51、205、266、459页。

霍林格,菲戴里奥(Hollinger, Fidelio)——伦敦一印刷所的所有者,承印大多数德国流亡者的报纸。——第304、306、307、310、312、313页。

ji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外务大臣(1840—1847)和首相(1847—1848年2月), 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第89、102、106、113、114、215、221頁。

吉本, 爱德华 (Gibbon, Eduard 1737—1794)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175頁。

吉約姆, 詹姆斯 (Guillaume, James 1844—1916) ——瑞士无政府主义者, 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因进行反对第一国际的分裂破坏活动而被国际根据海牙大会的决议开除; 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37、441、449、453、454、489、491、498、499、501、513—514、538、561、563頁。

季贝尔, 卡尔 (Siebel, Karl 1836—1868) ——德国诗人, 50年代生活于英国, 恩格斯的远亲。——第308頁。

齐金根, 弗兰茨·馮 (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 ——德国骑士, 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第190頁。

jia

加富尔, 卡米洛·本佐, 伯爵 (Cavour, Camillo Benso, Graf di 1810—1861) ——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 皮蒙特政府的首脑(1852—1861)。——第291—293頁。

加格恩, 弗里德里希 (Gagern, Friedrich 1794—1848) ——德国将军, 1848年4月巴登起义时被杀。——第309頁。

加布勒尔, 格奥尔格·安得列阿斯 (Gabler, Georg Andreas 1786—1853) ——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的学生和信徒。——第38頁。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 ——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 通过革命途径争取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战士。——第301、330、344、346、431、432、493頁。

伽利略·伽利莱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为先进宇宙观而斗争的战士。——第79頁。

jie

捷希, 亨利希·路德维希 (Tschech, Heinrich Ludwig 1789—1844) ——斯托尔科市市长, 1844年7月26日谋杀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失败后在柏林被处死刑。——第113頁。

jin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 ——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 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曾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21—226、236—238、241、243、244、302—304、307、310、559頁。

金克尔, 約翰娜, 娘家姓莫凯尔 (Kinkel, Johanna, 娘家姓 Mockel 1810—1868) ——德国女作家和音乐家, 哥·金克尔之妻。——第224頁。

金斯萊, 查理 (Kingsley, Charles 1819—1875) ——英国作家, 40 年代接近宪章运动, 宣揚基督教式的順从和放弃革命斗争。——第 341 頁。

ju

居韦特爾,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提安·胡柏特·馮 (Kühlwetter, Friedrich Christian Hubert von 1809—1882)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內务大臣 (1848 年 6—9 月)。——第 324 頁。

ka

卡貝, 埃蒂埃納 (Cabet, Étienne 1788—1856) ——法国政論家, 和平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第 88, 105, 112, 118 頁。

卡萊爾, 托馬斯 (Carlyle, Thomas 1795—1881) ——英国作家, 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宣揚英雄崇拜, 参加托利党, 1848 年革命后是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敌人。——第 123, 124, 175, 221 頁。

卡本特爾, 威廉·本杰明 (Carpenter, William Benjamin 1813—1885) ——英国著名学者、生理学家。——第 252 頁。

卡菲埃羅, 卡尔洛 (Cafiero, Carlo 1846—1892) ——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 第一国际会员, 后为无政府主义者。——第 537 頁。

卡特科夫, 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維奇 (Кар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1818—1887) ——俄国反动批評家和政論家, 激烈反对俄国文学界和社会运动中的先进派別。——第 450, 520 頁。

卡提利納, 魯齊烏斯·賽爾吉烏斯 (Cati-

lina, Lucius Sergius 公元前約 108—62) ——羅馬貴族, 反对貴族共和国的密謀的組織者。——第 562 頁。

卡尔·威廉·斐迪南 (Karl Wilhelm Ferdinand 1735—1806) ——不伦瑞克公爵 (1780—1806), 1792—1794 年同革命的法兰西进行战争时曾統率反革命的奥普軍。——第 35 頁。

kai

凱撒, 凱尤斯·尤利烏斯 (Caesar, Gaius Julius 公元前約 100—44) ——羅馬国务活动家, 統帥和作家。——第 342 頁。

凱澤爾, 麦克斯 (Kayser, Max 1853—1888)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爱森納赫派, 帝国議會議員。——第 540, 541 頁。

kang

康德, 伊曼努爾 (Kant, Immanuel 1724—1804) ——杰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48, 55, 65, 141, 256 頁。

康拉第, 艾米利 (Conradi, Emilie 1822—1888) ——卡·馬克思的妹妹。——第 30 頁。

康拉第, 約翰·雅科布 (Conradi, Johann Jakob 1821—1892) ——特利尔的工程师, 卡·馬克思的妹夫。——第 30 頁。

康普豪森, 魯道夫 (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1848 年 3—6 月普魯士首相, 推行同反动派妥协的贩卖政策。——第 184, 185, 188 頁。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維奇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 ——大公, 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第 305 頁。

kao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1938) ——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領袖之一, 中派的思想家, 后成为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苏联的凶惡敌人。——第 26, 560—563 頁。

ke

科本, 卡尔·弗里德里希 (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 —— 德国激进政論家和历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第 46—49, 51, 52, 61, 71, 126, 556 頁。

科克, 保尔·德 (Kock, Paul de 約 1794—1871) —— 法国资产阶级作家。——第 527 頁。

科布頓,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第 274 頁。

科尔布, 古斯塔夫·爱德华 (Kohl, Gustav Eduard 1798—1865) —— 德国記者, 反动的奧格斯堡《总汇报》的編輯之一。——第 310 頁。

科苏特, 拉約什 (Kossuth, Lajos 1802—1894) ——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領袖,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領導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腦, 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第 233, 241, 244, 266, 309 頁。

科布尔克——見列奧波特一世。

科利克尔, 魯道夫·阿伯特 (Kölliker, Rudolf Albert 1817—1905) —— 德国著名組織学家和胚胎学家, 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 唯心主义者。——第 252 頁。

柯恩, 詹姆斯 (Cohn, James) —— 英国工人, 倫敦雪茄烟工人联合会主席; 第

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布魯塞尔大会和倫敦代表会議代表。——第 484 頁。

克莱因, 恩斯特·斐迪南 (Klein, Ernst Ferdinand 1744—1810) —— 德国法学家, 一些有关刑法和民法的著作的作者。——第 40 頁。

克莱因, 約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 德国医生, 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1852)。——第 246 頁。

克利盖, 海爾曼 (Kriege, Hermann 1820—1850) —— 德国記者, 40 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140, 147, 148, 167, 211 頁。

克拉普卡, 格奧尔格 (Klapka, Georg 1820—1892) —— 匈牙利革命軍的將領(1848—1849), 革命失敗后流亡国外。——第 309, 318 頁。

克里梅尔, 威廉·兰达尔 (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 —— 英国工联派的領袖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書記, 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344, 361, 362, 375, 413 頁。

克列孟梭, 若尔日·本沙門 (Clémenceau, Georges Benjamin 1841—1929) —— 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 总理(1906—1909 和 1917—1920), 反苏武装干涉的鼓舞者和組織者之一。——第 546 頁。

克留塞勒, 古斯塔夫·保尔 (Cluseret, Gustave-Paul 1823—1900) —— 法国軍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美国內战的参加者, 里昂起义的組織者之一(1870), 巴黎公社参加者。——第 489 頁。

克勞塞維茨, 卡尔·馮 (Clausewitz, Karl von 1780—1831) —— 普魯士將軍和资产阶级最人軍事理論家。——第

190, 261 頁。

克魯馬赫爾, 弗里德里希·威廉 (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 —— 德國傳教士。—— 第 119 頁。

克魯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謝也維奇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 —— 俄國地理學家, 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活動家和理論家之一。—— 第 538 頁。

克里斯提安八世 (Christian VIII 1786—1848) —— 丹麥國王 (1839—1848)。—— 第 192, 193 頁。

kong

孔西得朗, 維克多 (Considérant, Victor 1808—1883) —— 法國政論家, 傅立葉的學生和信徒。—— 第 71, 103 頁。

ku

庫諾, 泰奧多爾·弗里德里希 (Cuno, Theodor Friedrich 1846—1934) —— 德國社會主義者, 第一國際海牙大會代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 後來參加美國的工人運動。—— 第 509, 510, 513 頁。

庫辛, 維克多 (Cousin, Victor 1792—1867) —— 反動的法國唯心主義哲學家, 折衷主義者。—— 第 83 頁。

庫爾涅, 弗雷德里克·埃蒂埃納 (Cournet, Frédéric Étienne 1839—1886) —— 法國政治活動家, 巴黎公社參加者, 屬布朗基派, 第一國際海牙大會代表, 大會後退出國際。—— 第 510 頁。

庫格曼, 路德維希 (Kugelmann, Ludwig 1830—1902) —— 德國醫生, 1848—1849 年革命的參加者, 第一國際會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 曾協助出版和

傳播馬克思的《資本論》。—— 第 370, 373, 375, 379, 382, 384, 406, 408, 412, 451, 456, 470, 472, 478, 507, 509, 556, 560, 561 頁。

庫勒里, 比埃爾 (Coullery, Pierre 1819—約 1903) —— 瑞士醫生, 第一國際會員, 右翼蒲魯東主義者, 曾反對馬克思領導的總委員會。—— 第 437 頁。

la

拉登堡, 阿達爾貝特·馮 (Ladenberg, Adalbert von 1798—1855) —— 普魯士宗教、教育、醫務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2 月)。—— 第 53, 54 頁。

拉法格, 勞拉 (Lafargue, Laura) —— 見馬克思, 勞拉。

拉法格, 保爾 (Lafargue, Paul 1842—1911) —— 法國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 第一國際會員, 法國工人黨的創立人之一, 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和學生, 勞拉·馬克思的丈夫。—— 第 369, 373, 404, 405, 408, 510, 511, 519, 524, 525, 527, 528, 545, 546, 551, 552, 554 頁。

拉馬丁, 阿爾丰斯·馬利·路易·德 (Lamartine, Alphonse-Marie-Louis de 1790—1869) —— 法國詩人、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 1848 年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和實際上的首腦。—— 第 85 頁。

拉梅耐, 費里西德·羅貝爾·德 (Lamennais, Félicité-Robert de 1782—1854) —— 法國神甫,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思想家之一。—— 第 85, 103 頁。

拉薩爾,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 德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 全德工人聯合會的創立人之一

(1863), 支持在反革命的普魯士領導下“自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的政策, 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內機會主義派的創始人。——第 26, 27, 32, 107, 118, 128, 151, 165, 201—203, 207, 216, 218, 248, 269, 271, 275, 276, 279, 280, 288, 293—302, 307, 308, 315—317, 319, 320, 322—324, 329—339, 353, 354, 356, 357, 365—367, 392, 406, 407, 420, 422, 423, 428, 446, 453, 459, 480, 503, 504, 529—533, 556, 558, 559, 561 頁。

拉圖爾, 泰奧多爾, 侯爵拜叶·馮 (Lattour, Theodor, Graf Baillet von 1780—1848)——奧地利將軍, 反動分子, 陸軍大臣 (1848), 1848 年維也納起義時被殺。——第 309 頁。

拉希爾 (Rachil)——見萬哈根·馮·恩賽, 拉希爾。

拉德茨基, 約瑟夫, 伯爵 (Radetzky, Joseph, Graf 1766—1858)——奧地利元帥, 曾扼殺 40—50 年代意大利的革命運動。——第 204 頁。

拉登道夫, 奧古斯特 (Ladendorff, August)——德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第 412 頁。

lai

萊辛, 哥特霍爾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偉大的德國作家、批評家和哲學家, 18 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著名代表。——第 30, 31, 39, 44, 176, 255, 257, 332, 359 頁。

萊布尼茨, 哥特弗里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偉大的德國數學家, 唯心主義哲學家。——第 31, 50, 55, 81 頁。

萊因哈特, 理查 (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國詩人, 亨·海涅的秘書。——第 273 頁。

賴夫, 威廉·約瑟夫 (Reiff, Wilhelm Joseph 約生于 1823)——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1850 年被同盟開除, 曾在科倫共產黨人案件中受審。——第 246 頁。

賴德津-洛蘭, 亞歷山大·奧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國律師和政治活動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之一, 《改革報》的編輯, 臨時政府的成員 (1848)。——第 104, 233 頁。

lan

蘭克, 列奧波特 (Ranke, Leopold 1795—1886)——德國歷史學家, 反動分子。——第 46 頁。

蘭維埃, 加布里埃爾 (Ranvier, Gabriel 1828—1879)——法國小資產階級革命家, 布朗基主義者, 巴黎公社的積極參加者, 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海牙大會代表, 大會後退出國際。——第 509, 512, 513 頁。

lang

郎凱斯特, 愛德文·雷伊 (Lankester, Edwin Ray 1847—1929)——英國學者, 生物學家。——第 552 頁。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國資產階級哲學家, 新康德主義者, 著有關於工人階級的社会改良主義著作。——第 407, 412 頁。

lao

勞貝, 亨利希 (Laube, Heinrich 1806—

1884)——德国作家,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之一。——第117頁。

劳麦,弗里德里希·馮(Raumer, Friedrich von 1781—1873)——德国反动历史学家。——第46頁。

劳芬堡,亨利希(Laufenberg, Heinrich 生于187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后来脱离工人运动。——第560頁。

le

勒克尔,奥古斯特(Reckel, August 1814—1876)——德国画家,1848—1849年革命和1850年1月起义参加者。——第225頁。

勒留貝,维克多(Le Lubez, Victor)——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1866年反对总委员会和馬克思的政策,在日内瓦代表会议上被开除出国际(1868)。——第346、347頁。

勒穆修(Le Moussu)——法国雕版师,巴黎公社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海牙大会代表。——第518頁。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特(Rü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雪茄烟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后参加拉薩尔派。——第246、247、357頁。

lei

雷默,格奥尔格·奥托(Reimer, Georg Otto 1841—1892)——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拉薩尔主义者,帝国議會議員。——第529頁。

雷瑙,尼古劳斯;真名尼古劳斯·宁布什·埃德勒·馮·施特莱雷瑙(Lenau,

Nikolaus; 真名 Nikolaus Niembach Edler von Strehlenau 1802—1850)——奥地利詩人,作品中充滿反封建和反天主教的情緒。——第118頁。

雷馬路斯,海爾曼·賽米爾(Reimarus, Hermann Samuel 1694—1768)——德国自然神論哲学家和語言学家,德国18世紀资产阶级哲学运动的代表。——第44頁。

雷姆佩尔,魯道夫(Rempel, Rudolf 1815—1868)——德国商人,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第144、214頁。

li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最大的代表之一。——第102、122、137、151—153、178、281、284、333、397頁。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端的保护关税論的宣揚者。——第134、159頁。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創立者和領袖之一,帝国議會議員,善于利用議會讲坛揭露普魯士容克地主的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27、271、273、276、288、303、306、308—310、315、316、320、352、353、355—357、371、406、419—422、424、440、441、443—446、449、458—464、469、503—505、507、515、524、529—

532, 536—538, 541—543, 552, 555, 563, 564 頁。

里沙尔, 阿尔伯特 (Richard, Albert 1846—1925)——法国記者, 里昂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会员, 无政府主义者, 曾反对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第 450 頁。

里廷森森, 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德国政論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新萊茵报》的撰稿人, 第一国际会员, 几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第 509 頁。

利奥, 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論家, 反动分子, 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46 頁。

利穆赞, 沙尔 (Limousin, Charles)——第一国际会员, 伦敦代表会職代表。——第 361 頁。

利沙加勒, 普罗斯比尔·奥利維耶 (Lissagaray, Prosper Oliver 1839—1901)——法国記者, 巴黎公社参加者和巴黎公社史家。——第 528 頁。

利希諾斯基, 費里克斯·烏利亞, 公爵 (Lichnowski, Felix Maria, Fürst von 1814—1848)——西里西亚的大地主, 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職員, 属右派, 1848年9月法兰克福人民起义时被杀。——第 309 頁。

liang

梁贊諾夫, 真名大·鮑·哥尔頓巴赫 (Рязанов, Н.; 真名 Д. В. Гольденбах), ——第 26, 559, 561, 562 頁。

lie

列鲁, 比埃尔 (Leroux, Pierre 1797—

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第 71, 83, 85, 103, 105 頁。

列曼, 阿尔伯特 (Lehman, Albert)——德国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同盟分裂后参加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第 230 頁。

列維, 古斯塔夫 (Levy, Gustav)——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拉薩尔主义者。——第 275, 276, 316 頁。

列斯納, 弗里德里希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246, 247, 273, 346, 425, 510, 552 頁。

列列韦尔, 約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波兰杰出的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領袖之一。——第 190 頁。

列奥波特一世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 (1831—1865)。——第 180 頁。

lin

林肯, 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务活动家, 美国总统 (1861—1865), 共和党的組織者之一, 推行許多有助于北方在因内战争中胜利的民主措施。——第 359 頁。

liu

柳巴文 (Любовин, Н. Н.)——俄国民粹派革命家, 洛帕廷的朋友, 馬克思同丹尼尔遜通信往来的中介人。——第 445,

488, 514 頁。

long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3—1903)——法国記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巴黎公社著名活动家, 属蒲魯东派, 后参加可能派, 燕妮·馬克思的丈夫。——第 373, 509, 510, 512, 528, 546, 551, 552 頁。

lu

卢阿, 約瑟夫 (Roy, Joseph)——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法譯者。——第 409 頁。

卢格, 阿尔諾德 (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資产階級激进派,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属于左翼, 50 年代是德国小資产階級流亡者的領袖之一,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 45, 47, 50, 59—61, 66—68, 72—74, 77, 78, 80—91, 95, 101, 102, 106, 108—112, 114, 115, 120, 125, 143, 144, 204, 233, 237, 305, 319, 408, 429, 430, 432, 557 頁。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 1871—1919)——德国工人运动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代表之一, 德国共产党的創建者之一。——第 27, 28, 560 頁。

卢克莱茨 (提图斯·卢克莱茨·卡路斯) (Titus Lucretius Carus 公元前約 99—約 55)——杰出的羅馬哲学家和詩人, 原子論唯物主义的代 表, 无神論者。——第 55, 57 頁。

魯埃爾, 歐仁 (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分子, 第二帝国时代身居国家的要职并对

拿破侖第三有很大影响, 因此綽号“副皇帝”。——第 416 頁。

魯滕堡, 阿道夫 (Rutenberg, Adolf 1809—1869)——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 46, 62, 63, 72, 74—76, 126 頁。

魯克拉夫特, 本杰明 (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派的領袖之一,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几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第 344, 373, 425, 440, 481, 482 頁。

路德, 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新教 (路德教) 的創始人, 德国市民階級的思想家。——第 148, 256 頁。

路登, 亨利希 (Luden, Heinrich 1780—1847)——德国資产階級历史学家。——第 40 頁。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145 頁。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 (1715—1774)。——第 35 頁。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 (1774—1792), 18 世紀末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时被处死。——第 159, 161 頁。

路易十八 (Louis XVIII 1775—1824)——法国国王 (1814—1824)。——第 81 頁。

路易-菲力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81 頁。

lun

伦納德 (Renard)——《萊茵报》的編輯之一 (1842—1843)。——第 74, 75 頁。

luo

罗班, 保尔(Robin, Paul生于1837)——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委員, 巴枯宁主义者, 1869年居住比利时, 是比利时联合委员会委員, 无政府主义报纸《平等报》的編輯之一。——第447—450、453、490、491頁。

罗恩, 阿尔勃萊希特·泰奥多尔·艾米尔, 伯爵(Roon, Albrecht Theodore Emile, Graf von 1803—1879)——普魯士將軍、元帥, 軍政大臣(1859—1873), 曾同莫尔捷凱一起进行普魯士軍隊的改革。——第471頁。

罗契, 約翰(Roach, John)——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海牙大会代表, 会上曾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第509頁。

罗赫納, 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約生于1824)——德国細木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和朋友。——第273、346、552頁。

罗雪尔,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資产階級經濟学家, 政治經濟学中的所謂历史学派的代表。——第257、407頁。

罗伊特, 弗里茨(Reuter, Fritz 1810—1874)——德国作家。——第91頁。

罗曼諾夫(Романовы)——俄国沙皇王朝(1613—1917)。——第539頁。

罗什弗尔, 昂利(Rochefort, Henry 1830—1913)——法国資产階級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出版过周刊《灯笼报》(1858—1869)和《馬賽曲报》。——第452、456、541頁。

罗特施坦, 費多尔·阿罗諾維奇(Рот-

штейн, Федор Аронович 1871—1953)——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第557、558頁。

洛克, 約翰(Lock, John 1632—1704)——杰出的英国二元論哲学家, 感觉論者。——第31、102頁。

洛尔德, 波西沃·巴頓(Lord, Percival Barton 1808—1840)——英国医生, 《大众生理学》一书作者。——第252頁。

洛帕廷, 盖尔曼·亚历山大罗維奇(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 民粹派分子, 70—80年代居住国外,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 曾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开头部分譯成俄文; 馬克思及其一家的朋友。——第409、488頁。

洛伊波德, 亨利希(Leopold, Heinrich 死于1865)——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曾經工作过的一家商店的主人。——第116頁。

洛貝尔图斯-亞格措夫, 約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大地主, 庸俗經濟学家, 資产階級化的容克地主的思想家, “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反动思想的首倡者。——第336、365、367頁。

lü

吕肯(Lucain)——海牙大会(1872)的一名法国代表的假名, 曾参加調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中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第510頁。

吕宁, 奧托(Lüning, Otto 1818—1888)——德国医生和政論家, 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后来是自由主义者。——第140、143、144頁。

呂斯托, 弗里德里希·威廉 (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 —— 德國軍事作家。——第 330 頁。

ma

馬丁, 昂利 (Martin, Henry 1810—1883) —— 法國歷史學家。——第 364 頁。

馬拉, 让·保尔 (Marat, Jean-Paul 1743—1793) —— 18 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杰出活動家, 雅各賓派領袖之一, 《人民之友》的編輯。——第 127, 208, 503 頁。

馬隆, 边諾 (Malon, Benôt 1841—1893) —— 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左翼蒲魯東主義者, 第一國際會員, 巴黎公社參加者, 后成為可能派分子。——第 545 頁。

馬洛, 克利斯托弗 (Marlowe, Christopher 1564—1593) —— 英國劇作家, 莎士比亞的先驅者。——第 139 頁。

馬克思, 埃德加爾 (Marx, Edgar 1847—1855) —— 卡·馬克思的兒子。——第 201, 271, 272, 322 頁。

馬克思, 愛琳娜 (Marx, Eleanor 1855—1898) —— 英國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的活動家, 卡·馬克思的幼女, 愛·艾威林之妻。——第 29, 270, 273, 322, 327, 528, 549, 556 頁。

馬克思, 弗蘭契斯卡 (Marx, Franziska 1851—1852) —— 卡·馬克思的女兒。——第 236, 242 頁。

馬克思, 罕麗達; 娘家姓普萊斯堡 (Marx, Henriette; 娘家姓 Preisburg 1787—1863) —— 卡·馬克思的母親。——第 29—31, 324, 328 頁。

馬克思, 亨利希 (Marx, Heinrich 1782—1838) —— 馬克思的父親, 律師, 后任特利爾司法顧問。——第 29—35, 37, 40

—43, 200 頁。

馬克思, 亨利希·格維多 (Marx, Heinrich Guido 1849—1850) —— 卡·馬克思的兒子。——第 235 頁。

馬克思, 勞拉 (Marx, Laura 1845—1911) —— 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卡·馬克思的次女, 保·拉法格之妻。——第 25, 26, 201, 245, 273, 321, 368, 404, 408, 444, 551, 561 頁。

馬克思, 列維 (Marx, Lewi 死于 1798) —— 卡·馬克思的祖父。——第 29, 33 頁。

馬克思, 薩繆爾 (Marx, Samuel 約 1778—1827) —— 卡·馬克思的伯父。——第 29 頁。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 —— 法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政論家, 卡·馬克思的長女, 沙·龍格之妻。——第 106, 200, 235, 245, 273, 321, 327, 444, 456, 528, 549, 551 頁。

馬克思, 燕妮; 娘家姓馮·威斯特華倫 (Marx, Jenny; 娘家姓 von Westphalen 1814—1881) —— 卡·馬克思之妻 (從 1843 年), 他的忠實的朋友和助手。——第 33—36, 38, 39, 41, 82, 83, 106, 114, 180, 200, 216, 218, 235, 236, 245, 246, 248, 254, 259, 271—273, 277, 279, 311, 319—322, 327—329, 413, 528, 548—550, 552, 564 頁。

馬克思, 叶娃; 娘家姓莫澤斯 (Marx, Eva; 娘家姓 Moses 死于 1823) —— 卡·馬克思的祖母。——第 29, 31 頁。

馬斯曼, 漢斯·斐迪南 (Maßmann, Hans Ferdinand 1797—1874) —— 德國語言學家, 一些反動德國青年的體育團體的創立者。——第 107 頁。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

—1872) ——意大利資產階級革命家，意大利資產階級在爭取恢復意大利統一的鬥爭時期的共和民主派的領袖和思想家之一。——第233、265、309、330、341、347、413、430—432、493頁。

馬爾薩斯，托馬斯·羅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英國牧師和經濟學家，仇視人類的反動的人口論的宣揚者。——第123、177、178、333、531頁。

馬基雅弗里，尼古洛·倍爾納多 (Machiavelli, Niccolò Bernardo 1469—1527) ——意大利歷史學家和作家，資本主義關係萌芽時期意大利資產階級思想家之一。——第187頁。

mai

麥克庫洛赫，約翰·拉姆賽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第137頁。

邁爾，古斯塔夫 (Mayer, Gustav 1871—1931) ——德國著名歷史學家 and 社會主義文獻研究者。——第556—560頁。

邁斯納，奧托·卡爾 (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 ——漢堡的民主著作出版家。——第382頁。

邁耶爾，海爾曼·尤利烏斯 (Meyer, Hermann Julius 生于1826) ——德國百科辭典出版人和書商。——第406、407頁。

邁耶爾，魯道夫·海爾曼 (Meyer, Rudolf Hermann 1839—1899) ——德國保守派政論家和經濟學家，洛貝爾圖斯的信徒。——第560頁。

邁耶爾，齊格弗里特 (Meyer, Siegfried 約1840—1872) ——德國社會主義者，

1866年去美國，積極參加創立第一國際紐約支部。——第383頁。

邁耶爾，尤利烏斯 (Meyer, Julius 死于1867) ——威斯特伐里亞的企業主和政論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第144頁。

man

曼托伊費爾，奧托·泰奧多爾，男爵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 ——普魯士反動國務活動家，內務大臣 (1848—1850) 和首相 (1850—1858)。——第36、213、225、266、324頁。

mei

梅因，愛德華 (Meyen, Eduard 1812—1870) ——德國政論家，青年黑格爾分子，後來是民族自由黨人。——第46、72—74、126、211、274頁。

梅爾伯，賈科莫 (Meyerbeer, Giacomo 1791—1864) ——德國作曲家，鋼琴家和音樂指揮，法國歌劇派的最著名代表。——第108頁。

梅利奈，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 ——比利時將軍，祖籍法國，1830年比利時資產階級革命和比利時民主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第169頁。

梅特涅，克雷門斯·文索爾·洛塔爾，公爵 (Metternich, Clemens Wenzel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 ——奧地利反動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外務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神聖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43、89、108頁。

梅蘭希通，菲力浦 (Melanchthon, Phi-

lipp 1497—1560)——德国新教神学家和教育家，路德的战友。——第 256 頁。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維克 (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 ——波兰革命家，1848—1849 年革命和 1830—1831 年及 1863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中民主派的領袖之一。——第 190 頁。

men

門采尔，沃尔弗干格 (Menzel, Wolfgang 1798—1873) ——德国反动作家。——第 118 頁。

門德尔森，莫泽斯 (Mendelssohn, Moses 1729—1786) ——德国哲学家。——第 31、96 頁。

meng

蒙特，泰奥多尔 (Mundt, Theodor 1808—1861) ——德国作家，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第 117 頁。

mi

弥勒，弗里德里希 (Müller, Friedrich) ——普鲁士官吏，科伦警察局长。——第 200 頁。

米凯尔，約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 ——德国政治活动家，40 年代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 227、274、275、288 頁。

密尔凯 (Milke) ——德国排字工人，全德工人联合会會員，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 (1872)。——第 509 頁。

mo

莫尔，托馬斯 (More, Thomas 1478—1535) ——英国人文主义作家，空想共

产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第 105 頁。

莫尔，約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領袖者之一，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陣亡。——第 113、166、167、170、181、198、199、211、222、227 頁。

莫利斯，威廉 (Morris, William 1834—1896) ——英国詩人，画家和社会活动家，80 年代参加英国工人运动。——第 341 頁。

莫斯特，約翰 (Most, Johann 1846—1906)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无政府主义者；1880 年因破坏工人运动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第 529、532—535、541、542 頁。

莫特勒，尤利烏斯 (Motteler, Julius 1838—1907)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实行时期曾負責傳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文件。——第 529 頁。

莫尔特凯，海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伯爵 (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 ——普鲁士元帅和反动作家，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最大軍事思想家之一。——第 458 頁。

mu

穆勒，約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第 375 頁。

na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 ——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30、35、81、127、182、241、294、467、471頁。

拿破侖第二·約瑟·弗朗斯瓦·沙尔·波拿巴(Napoléon II Joseph François Charles Bonaparte 1811—1832) ——拿破侖第一之子, 1815年被波拿巴分子宣布为皇帝, 名拿破侖二世, 1818年获萊赫什塔特公爵封号。——第81頁。

拿破侖第三(路易·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拿破侖第一之孫, 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0), 法国皇帝(1852—1870)。——第210、215、230、241、264、291、292、294、299、301、302、305、318、342、343、367、370、416、417、424、439、456、457、459—463、465、466、468、470、559頁。

納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 ——英国將軍和軍事史家。——第261頁。

ni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1825—1855)。——第189頁。

nie

涅特劳, 麦克斯(Netlau, Max 約 1865—1944) ——奥地利历史学家, 无政府主义者。——第561頁。

涅恰也夫, 謝尔盖·格納迪也維奇(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м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 ——俄国革命家, 1868—1869年

大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一些小组的组织者; 小组活动被政府发现后流亡瑞士, 但被瑞士政府引渡给俄国, 1872年被判处二十年苦役。——第485—489、492、496、501、514、520頁。

nuo

諾比林, 卡尔·爱德华(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 1878年因謀刺德皇威廉一世被处死。——第366頁。

諾特莱克, 彼得(Nothjung, Peter 約 1823—1866) ——德国裁缝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1852)。——第237、246、247頁。

ou

欧門, 哥特弗利德(Ermcn, Gottfried) ——“欧門—恩格斯”公司的共有人。——第121、233、327、329頁。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 ——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38、341頁。

欧斯曼, 若尔日·欧仁(Haussmann, Georges Eugène 1809—1891) ——第二帝国时代巴黎长官; 曾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改建首都。——第462頁。

pa

帕麦斯顿, 亨利·约翰·田浦(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 ——英国反动国务活动家, 政治活动的初期是托利党人, 从1830年起是辉格党的领袖之一, 首相(1856—1858和1859—1865)。——第264、267、268、279、344、346、456頁。

pang

龐巴都, 让娜·安东尼达·布瓦宋, 侯爵夫人 (Pompadour, 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 Marquise de 1721—1764) ——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第 35 頁。

pei

培根, 弗兰西斯, 維魯拉姆男爵 (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1626) —— 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家。——第 271 頁。

裴隆, 沙尔 (Perron, Charles) —— 瑞士画家, 无政府主义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瑞士的創立人之一, 1870 年起不再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第 447—450 頁。

裴柯尔, 康斯坦丁 (Pecqueur, Constantin 1801—1887) —— 法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03 頁。

pi

皮亚, 菲利克斯 (Pyat, Felix 1810—1889) —— 法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发动过反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诽谤运动。——第 424 頁。

皮佩尔, 威廉 (Pieper, Wilhelm 約生于 1826) —— 德国语言学家和記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后流亡英国。——第 227, 243 頁。

皮特曼, 海尔曼 (Püttmann, Hermann 1811—1894) —— 德国激进诗人和記者, 40 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第 140, 141 頁。

pu

蒲魯东, 比埃尔·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 法国政論家, 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創始者之一。——第 71, 85, 90, 105, 112, 122, 130, 142, 145, 146, 148—156, 158, 166, 239, 240, 281, 319, 331, 341—343, 356, 363, 372, 376, 405, 409, 425, 427, 428, 461, 473, 502, 558 頁。

普芬德, 卡尔 (Pfähder, Carl 約 1818—1876) —— 德国画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成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67, 226, 230, 346 頁。

普富尔, 恩斯特·亨利希·阿道夫·馮 (Pfuel, Ernst Heinrich Adolf von 1779—1866) —— 普魯士將軍, 反动軍閥的代表之一, 首相和陸軍大臣 (1848 年 9—11 月)。——第 197, 199, 205 頁。

普拉頓, 奧古斯特 (Platen, August 1796—1835) —— 德国詩人。——第 33, 118 頁。

普尔斯基, 弗兰茨 (Pulszky, Franz 1814—1897) —— 匈牙利考古学家, 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科苏特的拥护者。——第 309 頁。

普卢塔克 (Plutarchos 約 46—約 125) —— 古希腊作家, 道德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55 頁。

普列汉諾夫, 格奧尔基·瓦連廷諾維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 —— 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杰出宣传者和先驅者, 俄国第一个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

社”的創立者之一，后来是孟什維克。
——第 547、557 頁。

qi

齐茨，弗兰茨·亨利希 (Zitz, Franz Heinrich 1803—1877)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属于左派，后来流亡美国。——第 299 頁。

齐格勒，特奥巴尔德 (Ziegler, Theobald 1846—1918) ——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第 30 頁。

齐赫林斯基，弗兰茨 (Zychlinski, Franz 1816—1900) ——普鲁士军官，40 年代初曾以笔名施里加为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主办的一些期刊撰稿。——第 126、132 頁。

qiao

乔治·桑，真名阿芒第纳·欧罗尔·露西·杜班，杜德宛男爵夫人 (George Sand, 真名 Amandine Aurore Lucie Dupin, baronne Dudevant 1804—1876) ——法国著名女作家。——第 109、157 頁。

qiong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 ——英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詩人和政論家，宪章运动左翼領袖之一，一些宪章派机关报刊的編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166、266—270、313、342、559 頁。

rong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勃 (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 ——德国政論

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的出版負責人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 62、63、67、111、166、274 頁。

荣克，海尔曼 (Jung, Hermann 1830—1901) ——瑞士钟表工人，1848—1849 年革命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第 361、364、375、376、412、425、440、441、453、491、507、508、517 頁。

荣格尼茨，恩斯特 (Jungnitz, Ernst 死于 1848) ——德国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第 126 頁。

ruo

若米尼，昂利 (Jomini, Henry 1779—1869) ——资产阶级军事理論家和作家，原为瑞士人，曾在法国和俄国军队中服务。——第 261 頁。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 (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 ——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論家，40 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 169 頁。

sai

塞克斯顿，乔治 (Sexton, George) ——英国医生，第一国际會員，1872 年被选入总委员会，海牙大会代表。——第 510 頁。

塞万提斯·薩維德拉，米格尔·德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 ——最卓越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 525、527 頁。

赛拉叶，奥古斯特 (Serrailier, August 生于 1840) ——法国工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員，巴黎公社的积极参加者，海牙大会代表，在会上曾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第 510、518 頁。

sang

桑·乔治 (Sand George) —— 見乔治·桑。

sha

沙伦, 路易 (Chalain, Louis 約生于 1845) —— 法国工人, 第一国际会员, 曾在巴黎对国际的第三次审判案中受审, 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后来退出国际。——第 457 頁。

沙培尔, 馮 (Schaper, von) —— 萊茵省省长 (1842—1845), 反动普魯士官僚的代表。——第 74、76 頁。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約 1812—1870) —— 德國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的領袖之一, 后来又接近馬克思。——第 113、166、167、170、181、182、198、199、206、211、227、230、231、244、247—249、273 頁。

沙貝利茨 (Schabelitz) —— 德国出版家和书商。——第 234 頁。

沙貝利茨, 雅科布 (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 —— 德国出版家和书商, 前者之子。——第 247、248、488 頁。

沙伊勃勒, 卡尔·亨利希 (Schaible, Karl Heinrich 1824—1899) —— 德国医生和作家, 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流亡伦敦。——第 313 頁。

沙多勃里昂,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1768—1848) —— 法国作家, 反动浪漫派的首脑。——第 526 頁。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 伟大的英国剧作家和诗人。——第 36、139、317、525、526 頁。

sheng

圣保尔, 威廉 (Saint-Paul, Wilhelm) —— 1843 年《萊茵报》的书报检查官。——第 77、78 頁。

圣西门, 克劳德-昂利·德·卢伏洛阿 (Saint-Simon, Claud-Henri de Rouvroy 1760—1825) ——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03、104 頁。

shi

施旺, 泰奥多尔 (Schwann, Theodor 1810—1882) —— 著名的德国組織学家和生理学家。——第 252 頁。

施蒂納, 麦克斯; 眞名約翰·卡斯巴尔·施米特 (Stirner, Max; 眞名 Johana Caspar Schmidt 1806—1856) —— 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 46、63、71、91、126、132、133、138、139、143、144、151、558 頁。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Carl August) —— 德国经济学家, 19 世紀 80 年代曾批判馬克思主义。——第 532 頁。

施拉姆, 康拉德 (Schramm, Konrad 約 1822—1858) —— 德国革命家, 記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从 1849 年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馬克思,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217、227、230、231、273、279 頁。

施拉姆, 魯道夫 (Schramm, Rudolf 1813—1882) —— 德国政論家, 小资产阶级

- 民主主义者,后来拥护俾斯麦。——第 542、543 頁。
- 施莱登,馬提阿斯·雅科布 (Schleiden, Matthias Jakob 1804—1881) ——德国植物学家,有关植物細胞结构的一些著作的作者。——第 252 頁。
- 施里加 (Szeliga) ——見齐赫林斯基,弗兰茨。
- 施穆勒,古斯达夫 (Schmoller, Gustav 1838—1917)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556 頁。
- 施泰因,夏洛塔·冯 (Stein, Charlotte von 1742—1827) ——歌德的女友。——第 257 頁。
- 施梯伯,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普鲁士警察官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組織者之一 (1852)。——第 225、226、243—245 頁。
- 施韦林,馬克西米利安·亨利希·卡尔,伯爵 (Schwerin, Maximilian Heinrich Karl, Graf von 1804—1872) ——普鲁士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内务大臣 (1859—1862),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 324 頁。
- 施韦泽,約翰·巴普提斯特·冯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1833—1875) ——德国政論家,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領導者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編輯,支持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政策。——第 338、353—357、363、367、371、406、419—425、440、441、443、446、449、458、459、503、505、512、531、560 頁。
-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 (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多卷的《世界史》的作者。——第 46 頁。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德国哲学家和政論家,著名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第 44、45、49、54、119 頁。
- 施馬尔豪森,索菲亚 (Schmalhausen, Sophie 1816—1883 年后) ——卡·馬克思之姊。——第 30、33、39 頁。
- 施馬尔豪森,威廉·罗伯特 (Schmalhausen, Wilhelm Robert 1817—約 1865) ——卡·馬克思之姊丈。——第 30 頁。
- 施普茨海姆,約翰·克利斯托夫 (Spurzheim, Johann Christoph 1776—1832) ——著名的德国顯相士。——第 252 頁。
- 施梯格利茨,亨利希 (Stieglitz, Heinrich 1801—1849) ——德国詩人。——第 117 頁。
- 施奈德尔第二,卡尔 (Schneider II, Karl) ——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辯护人 (1852)。——第 198、206 頁。
- 施維茨盖伯尔,阿德馬尔 (Schwitzguébel, Adhémar 1844—1895) ——瑞士工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犹拉联合会的領導者之一,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第 510 頁。
- 施莱厄尔馬赫,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丹尼尔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Ernst Daniel 1768—1834) ——德国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119 頁。

shu

舒尔采,約翰 (Schulze, Johannes 1786—1869)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主义

者。——第 43 頁。

舒尔采-德里奇, 弗兰茨·海爾曼 (Schulze-Delitzsch, Franz-Hermann 1808—1883)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60 年代是资产阶级进步党的领袖之一。——第 331, 396, 413, 544 頁。

舒馬赫, 古斯塔夫 (Schumacher, Gustav) ——德国工人, 第一国际会员。——第 509 頁。

叔本华, 阿尔都尔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 ——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47, 526 頁。

叔尔茨, 卡尔 (Schurz, Karl 1829—1906)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参加者, 后来流亡美国, 在那里成为国务活动家。——第 198, 201, 225, 229 頁。

si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 122, 281, 284, 397, 399 頁。

斯巴哥, 約翰 (Spargo, John 生于 1876) ——美国社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者。——第 555 頁。

斯瓦尔姆 (Swarm) ——見丹特萊格。

斯宾諾莎, 巴魯赫 (別涅狄克特·德)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de] 1632—1677)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論者。——第 50 頁。

斯普林加爾, 罗什 (Springard, Roche) ——第一国际会员, 海牙大会代表, 曾参加調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中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第 510 頁。

斯切克洛夫, 尤里·米哈伊洛維奇 (Стеклов, Ю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生于 1873)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历史学家。——第 561, 564 頁。

司各脫, 瓦尔特 (Scott, Walter 1771—1832) ——杰出的英国作家。——第 526 頁。

su

苏, 欧仁 (Sue, Eugène 1804—1857) ——法国作家。——第 103 頁。

ta

塔西佗, 普卜利烏斯·科尔奈利烏斯 (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約 55—約 120) ——罗马著名历史学家。——第 40 頁。

塔里約尼, 瑪麗亞 (Taglioni, Maria 1804—1884) ——著名法国女舞蹈家, 原为意大利人。——第 117 頁。

tai

泰勒, 巴亞德 (Taylor, Bayard 1825—1878) ——美国作家和旅行家, 《紐約每日論壇报》的撰稿人。——第 279 頁。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 (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 ——普魯士軍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澳大利亚。——第 198, 201 頁。

泰列基, 亚历山大 (Teleki, Alexander 1821—1892)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309 頁。

te

特尔凱, 卡尔·威廉 (Tölcke, Karl Wil-

helm 1817—1893)——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薩尔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者之一。——第530頁。

特萊契克,亨利希·哥塔尔特·馮(Treitschke, Heinrich Gotthard von 1834—1896)——德国反动政論家和历史学家,帝国議會議員(1871—1888),民族自由党人。——第319頁。

ti

梯也尔,路易·阿道夫(Thiers, Louis-Adolphe 1797—1877)——法国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共和国总统(1871—1873),鎮压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第464、472、474、481、511、544頁。

梯叶里,奥古斯丹(Thierry, Augustin 1795—1856)——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第102頁。

提波,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Thibaut, Anton Friedrich Justus 1772—1840)——德国法学家,民法专家。——第39頁。

tuo

托伦,昂利·路易(Tolain, Henry-Louis 1828—1897)——法国工人,右翼蒲魯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1871年作为巴黎公社的叛徒和敌人被开除出国际;后为参議員。——第343、345、353、361、364、376、405、417頁。

wa

瓦劳,卡尔(Wallau, Karl 1823—1877)——在布魯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后为美国茲市市长。——第165、168頁。

瓦揚,爱德華·馬利(Vaillant, Edouard

Marie 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海牙大会代表;后为改良主义者。——第509、512、513頁。

瓦尔兰,路易·欧仁(Varlin, Louis Eugène 1839—187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左翼蒲魯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和它的法国支部的組織者之一,几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杰出活动家之一,1871年5月为凡尔賽分子杀害。——第361、376、417、438、442、474頁。

瓦蓋納,海爾曼(Wagener, 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論家,《新普魯士报》編輯,俾斯麦的拥护者。——第180、323、357、367、384頁。

瓦格納,理查(Wagner, Richard 1813—1883)——著名德国作曲家。——第526頁。

瓦尔德克,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奧(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德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普魯士国民議会左翼領袖之一和副議長;从1860年起为进步党人,众議院議員。——第30、323頁。

瓦尔泰希,卡尔·尤旦烏斯(Vahlteich, Karl Julius 1839—191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書記,后参加爱森納赫派,帝国議會議員。——第529、534頁。

瓦尔特尔(Walter)——見万·赫德蓋姆。

瓦列斯罗德,路德維希·萊茵霍尔德(Walesrode, Ludwig Reinhold 1810—1869)——德国記者,民主主义者。——第48頁。

瓦尔涅波尔德(Warnebold)——德国律

师。——第383頁。

wan

万·登·阿貝勒, 昂利(Vanden Abeele, Henry)——第一国际海牙大会的比利时代表, 参加反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派。——第510頁。

万·赫德盖姆; 假名: 瓦尔特尔 (Van Heddeghem; 假名 Walter)——出席第一国际海牙大会的代表, 曾参加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中的破坏活动的委员会; 1873年被揭露是法国警探。——第509、510頁。

万哈根·冯·恩塞, 卡尔·奥古斯特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95—1858)——德国作家和自由派的文学批评家。——第47、49頁。

万哈根·冯·恩塞, 拉希尔 (Varnhagen von Ense, Rahel 1771—1833)——卡尔·奥古斯特·万哈根之妻, 以她在柏林的文艺沙龙著名。——第117頁。

wei

威灵顿, 阿瑟·威尔斯里, 公爵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反动国务活动家和统帅, 曾指挥滑铁卢战役中的反法联军。——第261頁。

威斯顿, 约翰 (Weston, John)——英国工人, 散文主义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347頁。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亲王, 普鲁士国王 (1861—1888) 和德国皇帝 (1871—1888)。——第293、322、323、458、462、463、465頁。

威斯特华伦, 埃德加尔·冯 (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1890)——燕妮·

马克思之弟, 40年代参加德国民主运动。——第36頁。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冯 (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普鲁士反动国务活动家, 内务大臣 (1850—1858), 燕妮·马克思的异母兄。——第36、266、324頁。

威斯特华伦, 卡洛琳·冯 (Westphalen, Karoline von 死于1856)——燕妮·马克思的母亲。——第82、83、272頁。

威斯特华伦, 克利斯提安·亨利希·非力浦·冯 (Westphalen, Christian Heinrich Philipp von 1724—1792)——不伦瑞克公爵的朋友和秘书, 燕妮·马克思的祖父。——第35頁。

威斯特华伦, 路德维希·冯 (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燕妮·马克思的父亲, 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第35、36、60、82頁。

威斯特华伦, 燕妮·冯 (Westphalen, Jenny von)——见马克思, 燕妮。

维埃, 约翰·弗里德里希 (Wiehe, Johann Friedrich)——伦敦一家印刷所的排字工人。——第310、312、313頁。

维贝尔 (Weber)——柏林司法顾问, 马克思对《国民报》的诉讼中的辩护律师。——第317頁。

维达尔, 弗朗斯瓦 (Vidal, Francois 1814—1872)——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中的改良派的代表之一。——第103頁。

维尔特, 格奥尔格 (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 流亡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165、169、182、187、239、246、273頁。

維干德, 奧托 (Wigand, Otto 1795—1870)——德國書商和出版家, 曾出版激進作家的一些著作。——第 59、60、132、144 頁。

維利希, 奧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魯士軍官,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1849 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 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時是宗派主義—冒險主義集團的領袖之一, 1853 年流亡美國, 在那里參加了北方對南方的國內戰爭。——第 215、222、226、227、230、231、236、237、243、244、247—249、262 頁。

維夏爾 (Vichard)——第一國際會員, 海牙大會代表 (1872), 曾參加調查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在第一國際中的破壞活動的委員會。——第 510 頁。

維列塔爾 (Villetard)——法國歷史學家。——第 559 頁。

維塔烏斯 (Wiethaus)——《萊茵報》的書報檢查官。——第 74、77 頁。

維登布魯赫, 路德維希·馮 (Wildenbruch, Ludwig von 1803—1874)——普魯士外交官, 1848 年為駐哥本哈根公使。——第 194、195 頁。

魏斯, 格維多 (Weiß, Guido 1822—1899)——德國記者, 民主主義者, 《未來》雜誌的編輯。——第 406、562 頁。

魏德邁, 路易莎 (Weydemeyer, Louise)——約瑟夫·魏德邁之妻。——第 321 頁。

魏德邁, 約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國工人運動和美國工人運動著名活動家, 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德國 1848—1849 年革命和美國內戰的參加者, 在美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戰

友。——第 144、145、148、201、218、235、236、238、239、241—243、321、346、357、556、557、559 頁。

魏特林, 克利斯提安·威廉 (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國工人運動初期的著名活動家, 空想的平均共產主義的理論家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後流亡美國并很快脫離工人運動。——第 70、88、90、112、113、145—149、166、167、232、341、558 頁。

wen

文克爾曼, 約翰·約阿希姆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1717—1768)——德國古代藝術史家, 18 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代表。——第 40 頁。

文德霍爾斯特, 路德維希 (Windthorst, Ludwig 1812—1881)——德國保守的政治活動家, 漢諾威的司法大臣 (1851—1853 和 1862—1865), 天主教的中央黨的領袖, 曾反對俾斯麥推行的德意志帝國的集權化。——第 470 頁。

weng

翁肯, 海爾曼 (Oncken, Hermann 1869—1946)——德國的反動流派的資產階級歷史家, 沙文主義者。——第 556 頁。

翁魯, 漢斯·維克多·馮 (Unruh, Hans Victor von 1806—1886)——普魯士政治活動家, 溫和的自由主義者, 從 1848 年 10 月起是普魯士國民議會議長, 繼而為進步黨的創立者之一, 後為民族自由黨人。——第 205 頁。

wo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爾 (Vauban, Sebastien le Prestre 1633—

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要塞建造和防卫的专家。——第261頁。

沃尔弗,斐迪南(Wolf, Ferdinand)——德国政論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新萊茵报》的編輯之一(1848—1849);后来退出政治活动。——第165、169、182、239頁。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名活动家,《新萊茵报》的編輯之一(1848—1849),法兰克福国民議会极左翼的議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64、165、168、169、181、182、199、200、211、212、227、238、239、242、270、273、276、308、324、328、329、558頁。

WU

烏兰德,路德維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浪漫主义詩人。——第47頁。

烏尔菲拉斯(Ulfilas, Wulfila 約311—約383)——西哥特的教会政治活动家,主教,哥特字母的制定者。——第260頁。

烏尔卡尔特,大卫(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和政論家,在著作中宣揚亲土耳其的观点,英国在近东的偵察网的組織者之一。——第267、268、306、315、365、559頁。

吳亭,尼古拉·伊薩柯維奇(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акович 1845—1883)——俄国革命家,1863年流亡瑞士,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組織者之一,进行过反对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的斗争,后来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并返回俄国(1883)。——第448、450、453、490—492、496、497、519—521、560、563頁。

xi

西姆桑,馬丁·爱德华·西吉斯蒙德·馮(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von 1810—1899)——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議員,继而是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長,后来是民族自由党人,60—70年代是帝国議会議長。——第323頁。

西賽罗,瑪尔庫斯·土利烏斯(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罗马杰出的演說家,作家和国务活动家,貴族共和国的思想家,折衷主义哲學家。——第55、562頁。

西斯蒙第,让·沙尔·利奧納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Simonde-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学家,資本主义的小資产階級批評家。——第103、175頁。

希尔施,卡尔(Hirsch, Karl 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記者,一些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編輯。——第541、542、544、545頁。

希尔施,威廉(Hirsch, Wilhelm)——普魯士密探,钻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进行破坏的好細。——第245頁。

希法亭,魯道夫(Hilferding, Rudolf 1877—1941)——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領袖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苏联的凶恶敌人。——第560頁。

席勒,弗里德里希·馮(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伟大的德国詩人和剧作家。——第30、35、39、256、307、310、329、525頁。

席利,維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律師,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为

第一国际會員。——第 201、273、308、361 頁。

xiao

肖伊, 亨利希 (Scheu, Heinrich 1845—1926)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 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代表, 后来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第 509 頁。

肖萊馬, 卡尔 (Schorlemmer, Karl 1834—1892) ——德国大化学家, 共产主义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552 頁。

xie

謝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約瑟夫·馮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 客观唯心主义者, 科学的敌人, 宗教的捍卫者。——第 54、83、84、120 頁。

xing

兴克尔代, 卡尔·路德維希·弗里德里希 (Hin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 ——柏林警察长官, 从 1853 年起为内务部警务司长。——第 225 頁。

xue

雪萊, 派尔西·毕希 (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 ——杰出的英国詩人, 革命浪漫主义者, 无神論者。——第 526 頁。

ya

雅科比, 阿伯拉罕 (Jacoby, Abraham 生于 1832)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之一, 后流亡美国。——第 246 頁。

雅科比, 約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德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普魯士国民議会左翼領袖之一, 70 年代参加社会民主党。——第 64、66、76、85、406、420、450、465 頁。

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 ——古代伟大思想家, 在哲学方面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 奴隶主階級的思想家。——第 50—52 頁。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ros III) (公元前 356—323) ——古代的著名統帥和国务活动家。——第 113 頁。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 ——俄国皇帝 (1855—1881)。——第 448、539 頁。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 ——俄国皇帝 (1881—1894)。——第 521 頁。

ye

耶克, 古斯达夫 (Jaech, Gustav 1868—1907) ——德国記者和历史学家, 社会民主党人。——第 560 頁。

yi

伊曼特, 彼得 (Imandt, Peter) ——德国教师, 1848—1849 年革命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 馬克思的拥护者。——第 201、273、320 頁。

伊壁鳩魯 (Epikouros 公元前約 341—約 270) ——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論者。——第 52、54—59、97、552 頁。

伊薩貝拉二世, 瑪麗·路易莎 (Isabella

II, Marie Luise 1830—1904) ——西班牙女王(1833—1868); 为1868年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第439頁。

ying

英梅尔曼, 卡尔·列勃莱希特 (Immermann, Karl Leberecht 1796—1840) ——德国作家, 批评家和戏剧活动家。——第118頁。

you

优塔, 路易莎 (Juta, Louise 1821—1893) ——卡·马克思之妹。——第30頁。

优塔, 约翰·卡尔 (Juta, Johann Karl 1824—1886) ——德国书商, 卡·马克思的妹丈。——第30頁。

yu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伟大的法国作家。——第239頁。

yue

约翰 (Johann 1782—1859) ——奥地利

大公, 1848—1849年为德国的帝国摄政。——第184頁。

约翰逊, 本杰明 (Jonson, Benjamin 约1573—1637) ——英国剧作家, 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第139頁。

zhan

詹姆斯二世 (James II 1633—1701) ——英国国王(1685—1688)。——第35頁。

zuo

佐尔格尔, 卡尔·威廉·斐迪南 (Solger, Karl Wilhelm Ferdinand 1780—1819) ——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 艺术理论家。——第39頁。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Sor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908) ——德国共产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美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在美国的第一国际的积极会员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34, 335, 419, 510, 511, 513, 515, 516, 520, 529, 535, 539, 543, 548—550, 556, 564頁。



人名譯名对照表

Abeela	阿貝勒(參見 Van den Abeele, Henry)
Aischylos	埃斯庫羅斯
Alexandr II (Александр II)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r III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ros III	亚历山大大帝
Allan, William	阿兰, 威廉
Altenstein, Karl	阿尔坦施泰因, 卡尔
Applegarth, Robert	阿普尔加斯, 罗伯特
Argyle, Archibald Campbell (同姓名者二人)	阿盖尔, 阿契波德·肯貝尔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
Arnim, Bettina von	阿尔宁, 蓓蒂娜·馮
Ashley, Anthony Cooper	艾释黎, 安东尼·庫柏
Akeselrod, Pavel Borisovich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阿克雪里罗得, 巴維尔·波利索維奇
Auerswald, Hans Rudolf	奥艾尔斯瓦尔德, 汉斯·魯道夫
Babeuf, Gracchus (眞名 François Noël)	巴貝夫, 格拉古(眞名弗朗斯瓦·諾埃尔)
Bach, Max	巴赫, 麦克斯
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培根, 弗兰西斯, 維魯拉姆男爵
Bakunin, Mikhail Aleksandrovich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Balzac, Honoré de	巴尔扎克, 昂諾萊·德
Bamberger, Ludwig	班貝尔格尔, 路德維希

Bangya, Janos (Johann)	班迪亚, 亚諾什(約翰)
Bara, Jules de	巴拉, 茹尔·德
Barbès, Armand	巴尔貝斯, 阿尔芒
Bauer, Bruno	鮑威尔, 布魯諾
Bauer, Edgar	鮑威尔, 埃德加尔
Bauer, Egbert	鮑威尔, 艾格伯特
Bauer, Heinrich	鮑威尔, 亨利希
Bax, Ernest Belfort	巴克斯, 厄內斯特·貝尔福特
Beaumont, Francis	波蒙, 弗兰西斯
Bebel, August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ck, Karl Isidor	倍克, 卡尔·伊西多尔
Becker, Bernhard	貝克尔, 伯恩哈特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 Johann Philipp	貝克尔, 約翰·菲力浦
Beesly, Eduard Spencer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Belinskii, Vissarion Grigorievich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別林斯基, 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
Benedek, Ludwig August	本涅迪克, 路德維希·奥古斯特
Béranger, Pierre-Jean de	貝朗热, 比埃尔-让·德
Bernadotte, Jean Baptiste Jules	別尔納多特, 让·巴蒂斯特·茹尔
Bernays, Ferdinand Karl Ludwig	貝尔奈斯, 斐迪南·卡尔·路德維希
Bernstein, Eduard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trand, Louis	貝尔特兰, 路易
Beta (Bettiech), Heinrich	貝塔(貝特齐希), 亨利希
Bettina	蓓蒂納(參見 Arnim)
Biscamp, Elard	比斯康普, 埃拉尔特
Bismarck, Otto	俾斯麦, 奥托
Blanc, Jean-Joseph-Louis	勃朗, 让·若塞夫·路易
Blankenburg, Moritz von	勃兰肯堡, 莫里茨·馮
Blanqui, Louis Auguste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ind, Karl	布林德, 卡尔

Blücher, Gebhardt Leberecht	勃留赫尔, 蓋勃哈德·萊伯列希特
Blum, Robert	勃魯姆, 罗伯特
Böhme, Jakob	伯麦, 雅科布
Bonaparte, Jérôme	波拿巴, 日罗姆
Bonaparte, Louis	波拿巴, 路易(參見 Napoleon III)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波克罕, 西吉茲蒙德·路德維希
Born, Stephan	波尔恩, 斯蒂凡
Börne, Karl Ludwig	白尔尼, 卡尔·路德維希
Bornstedt, Adalbert von	伯恩施太德, 阿达尔貝特·馮
Börnstein, Heinrich	伯恩施坦, 亨利希
Bourbons, les	波旁
Bracke, William	白拉克, 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ss, August	勃拉斯, 奧古斯特
Braunschweiger, Herzog von	不伦瑞克公爵(參見 Karl Wilhelm Ferdinand)
Bright, John	布莱特, 約翰
Brisbane, Albert	布里茲倍恩, 阿尔伯特
Brupbacher, Fritz	勃魯普巴赫尔, 弗里茨
Bucher, Lothar	布赫尔, 洛塔尔
Buchez, Philippe-Joseph-Benjamin	毕舍, 菲力浦·若塞夫·本沙門
Büchner, Ludwig	毕希納, 路德維希
Buret, Eugène	毕萊, 欧仁
Bürgers, Heinrich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urns, Lizzy	白恩士, 莉希
Burns, Mary	白恩士, 瑪丽
Byron, George Gordon	拜伦, 乔治·戈登
Cabet, Étienne	卡貝, 埃蒂埃納
Caesar, Gaius Julius	凱撒, 凱尤斯·尤利烏斯
Cafiero, Carlo	卡菲埃罗, 卡尔洛
Camphausen, Ludolf	康普豪森, 魯道夫

Carlo Alberto	查理-阿尔伯特
Carlyle, Thomas	卡萊尔, 托馬斯
Carpenter, William Benjamin	卡本特尔, 威廉·本杰明
Catilina, Lucius Sergius	卡提利納, 魯齐烏斯·賽尔吉烏斯
Cavour, Camillo Benso	加富尔, 卡米洛·本佐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塞万提斯·薩維德拉, 米格尔·德
Chalain, Louis	沙伦, 路易
Charles I	查理一世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沙多勃利昂, 弗朗斯瓦·勒奈
Christian VIII	克里斯提安八世
Cicero, Marcus Tullius	西賽罗, 瑪尔庫斯·土利烏斯
Clausewitz, Karl von	克劳塞維茨, 卡尔·馮
Clémenceau, Georges Benjamin	克列孟梭, 若尔日·本沙門
Cluseret, Gustave-Paul	克留塞勒, 古斯塔夫·保尔
Cobden, Richard	科布頓, 理查
Coburger	科布尔克(參見 Leopold I)
Cohn, James	柯恩, 詹姆斯
Conradi, Emilie	康拉第, 艾米利
Conradi, Johann Jakob	康拉第, 約翰·雅科布
Considérant, Victor	孔西得朗, 維克多
Coullery, Pierre	庫勒里, 比埃尔
Cournet, Frédéric Étienne	庫尔涅, 弗雷德里克·埃蒂埃納
Cousin, Victor	庫辛, 維克多
Cremer, William Randall	克里梅尔, 威廉·兰达尔
Cuno, Theodor Friedrich	庫諾, 泰奥多尔·弗里德里希
Dana, Charles Anderson	德納, 查理·安德森
Daniels, Roland	丹尼尔斯, 罗兰特
Danielson, Nikolai Frantsevich (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笔名 Nicolai-on, Николай-on)	丹尼尔逊, 尼古拉·弗兰采維奇(笔名尼古拉-逊)
Dante, Alighieri	但丁, 阿利格埃里

- | | |
|-------------------------------------|---------------------------|
| Darasz, Albert | 达拉什, 阿尔伯特 |
| Darwin, Charles | 达尔文, 查理 |
| Daumer, Georg Friedrich | 道梅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
| Davoust (或 Davout), Louis Nicholas | 达乌, 路易·尼古拉 |
| Demokritos | 德谟克利特 |
| Demuth, Helene (Lenchen) | 德穆特, 海伦(琳蕪) |
| Dentraygues, Émile (笔名 Swarm) | 丹特莱格, 埃米尔(笔名斯瓦
尔姆) |
| De Paepe, César | 德·巴普, 塞札尔 |
| Deprez, Marcel | 德普勒, 马赛尔 |
| Dereure, Simon | 德勒尔, 西蒙 |
| Descartes, René | 笛卡儿, 勒奈 |
| D'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 德斯特尔, 卡尔·路德维希·
约翰 |
| Dézamy, Théodore | 德萨米, 德奥多 |
| Diderot, Denis | 狄德罗, 德尼 |
| Dietz, Oswald | 迪茨, 奥斯渥特 |
| Dietzgen, Joseph | 狄慈根, 约瑟夫 |
| Disraeli, Benjamin | 迪斯累利, 本杰明 |
| Dronke, Ernst | 德朗克, 恩斯特 |
| Dühring, Eugen | 杜林, 欧根 |
| Dumas, Alexandre (père) | 仲马, 亚历山大(大仲马) |
| Duncker, Franz Gustav | 敦克尔, 弗兰茨·古斯塔夫 |
| Dupleix, François | 杜普勒, 弗朗斯瓦 |
| Dupont, Eugène Clovis | 杜邦, 欧仁·克洛维 |
| Eccarius, Johann Georg |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
| Echtermeyer, Theodor | 艾希特迈耶尔, 泰奥多尔 |
| Eckstein, Gustav | 埃克施泰因, 古斯塔夫 |
| Ehrhard, Johann Ludwig Albert | 埃尔哈特, 约翰·路德维希·
阿尔伯特 |
| 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 艾希霍恩, 约翰·阿尔勃莱希
特·弗里德里希 |
| Eichmann, Franz August | 艾希曼, 弗兰茨·奥古斯特 |

Engels, Friedrich (父子二人同名)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pikouros	伊壁鳩魯
Ermen, Gottfried	欧門, 哥特弗里德
Ernst August	恩斯特·奥古斯特
Ewerbeck, August Herrmann	艾韦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
Faucher, Julius	孚赫, 尤利烏斯
Favre, Jules	法夫尔, 茹尔
Fazy, Jean Jacques (James)	法齐, 让·沙克(詹姆斯)
Ferrier, François Louis August	费利叶, 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Feuerbach, Ludwig	费尔巴哈, 路德維希
Fichte, Johann Gottlieb	费希特, 約翰·哥特利勃
Fielding, Henry	菲尔丁, 亨利
Fischel, Edouard	费舍尔, 爱德华
Fletcher, John	弗勒彻, 約翰
Fleury, Charles (本名 Krause, Carl Friedrich August)	弗略里, 查理(真名克劳塞,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Flocon, Ferdinand	弗洛孔, 斐迪南
Follen, August Adolf Ludwig	福伦, 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維希
Follen, Karl	福伦, 卡尔
Fourrier, François-Marie-Charles	傅立叶, 弗朗斯瓦·馬利·沙利
Fränckel	弗廉克尔
Frankel, Leo	弗兰克尔, 列奥
Freiligrath, Ferdinand	弗萊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ibourg	弗里布尔
Friedländer, Hugo	弗里德兰德, 胡果
Friedländer, Max	弗里德兰德, 麦克斯
Friedrich II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VII	弗里德里希七世
Friedrich, Karl Nikolaus	弗里德里希, 卡尔·尼古拉
Friedrich Wilhelm III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 | | |
|------------------------------------------------|-----------------------------|
| 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 弗利切, 弗里德里希·威廉 |
| Fröbel, Julius | 弗呂貝爾, 尤利烏斯 |
| Gabler, Georg Andreas | 加布勒爾, 格奧爾格·安得列
阿斯 |
| Gagern, Friedrich | 加格恩, 弗里德里希 |
| Galileo Galilei | 伽利略·伽利萊 |
| Gans, Eduard | 甘斯, 愛德華 |
| Garibaldi, Giuseppe | 加里波第, 朱澤培 |
| Gaskell, Peter | 蓋斯庫爾, 彼得 |
| Geib, Wilhelm Leopold August | 蓋勃, 威廉·利奧波特·奧古
斯特 |
| Geiger, Wilhelm Arnold | 蓋格爾, 威廉·阿諾爾德 |
| George Sand | 喬治·桑 |
| Gerlach, Karl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von | 蓋拉赫, 卡爾·亨利希·愛
德華·弗里德里希·馮 |
| Gibbon, Eduard | 吉本, 愛德華 |
|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 格萊斯頓, 威廉·尤爾特 |
| 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 格奈澤瑙, 奧古斯特·威廉·
安東 |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 歌德, 約翰·沃尔弗于格·馮 |
| Graeber, Friedrich Christian Ludwig | 格雷培,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
提安·路德維希 |
| Graeber, Wilhelm | 格雷培, 威廉 |
|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 格蘭威爾, 喬治·利未森·高厄 |
| Greely, Horace | 格里利, 霍雷斯 |
| Greene, Robert | 格林, 羅伯特 |
| Greif(f) | 格萊夫 |
| Greulich, Hermann | 格雷利希, 海爾曼 |
| Grévy, Jules | 格列維, 茹爾 |
| Grimm, Jacob | 格林, 雅科布 |
| Grimm, Wilhelm | 格林, 威廉 |
| Grün, Karl | 格律恩, 卡爾 |
| Grünberg, Karl | 格律恩堡, 卡爾 |

Guesde, Jules	蓋得, 茹尔
Guillaume, James	吉約姆, 詹姆斯
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約姆
Gumpert, Eduard	古姆佩尔特, 爱德华
Gutzkow, Karl Ferdinand	谷茲考, 卡尔·斐迪南
Habsburger	哈布斯堡(王朝)
Hales, John	黑尔斯, 約翰
Hansemann, David Justus	汉泽曼, 大卫·尤斯图斯
Hardenberg, Karl August	哈登堡, 卡尔·奥古斯特
Harney, George Julian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senclever, Wilhelm	哈森克莱維尔, 威廉
Hasselmann, Wilhelm	哈賽尔曼, 威廉
Hatzfeldt, Sophie	哈茨費尔特, 索菲娅
Hauff, Wilhelm	豪夫, 威廉
Hausmann, Georges Eugène	欧斯曼, 若尔日·欧仁
Hebbel, Friedrich	赫伯尔, 弗里德里希
Heddeghem	赫德盖姆(參見 Van Heddeghem)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Heine, Heinrich	海涅, 亨利希
Heineccius, Johann Gottlieb	海尼克修斯, 約翰·哥特利勃
Heinzen, Karl	海因岑, 卡尔
Helvétius, Claude-Adrien	爱尔維修, 克劳德·阿德里安
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亨格施坦堡, 恩斯特·威廉
Hentze	亨泽
Hepner, Adolf	赫普納, 阿道夫
Herakleitos aus Ephesos	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海德尔, 約翰·哥特弗利德
Hermes, Carl Heinrich	海尔梅斯, 卡尔·亨利希
Herwegh, Georg Friedrich	海尔維格,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Herzen, Aleksandr Ivanovich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諾維奇
Hess, Moses	赫斯, 莫泽斯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von	兴克尔代, 卡尔·路德維希· 弗里德里希·馮
Hilferding, Rudolf	希法亭, 魯道夫
Hirsch, Karl	希尔施, 卡尔
Hirsch, Wilhelm	希尔施, 威廉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托馬斯
Höchberg, Karl	赫希伯格, 卡尔
Hödel, Emil Heinrich Max	赫德尔, 艾米尔·亨利希·麦克斯
Hohenzollern	霍亨索伦
Holbach, Paul Heinrich Dietrich	霍尔巴赫, 保尔·昂利·狄特 利希
Holberg, Ludwig	霍尔堡, 路德維希
Hollinger, Fidolio	霍林格尔, 菲戴里奥
Homeros	荷馬
Hugo, Victor	雨果, 維克多
Humboldt, Alexander Friedrich Wilhelm von	洪堡尔特, 亚历山大·弗里德 里希·威廉·馮
Hutten, Ulrich von	胡登, 烏尔利希·馮
Hyndmann, Henry Mayers	海因德曼, 亨利·迈尔斯
Imandt, Peter	伊曼特, 彼得
Imbert, Jacques	恩貝尔, 雅克
Immermann, Karl Leberecht	英梅尔曼, 卡尔·列勃萊希特
Isabella II, Marie Luise	伊薩貝拉二世, 瑪麗·路易莎
Jacobi, Abraham	雅科比, 阿伯拉罕
Jacoby, Johann	雅科比, 約翰
Jaekch, Gustav	耶克, 古斯达夫
James II	詹姆斯二世
Jerôme Napoleon	日罗姆·拿破侖
Johann	約翰
Jomini, Henri	若米尼, 昂利

Jones, Ernest Charles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son, Ben (Jamin)	約翰遜, 本(杰明)
Jottrand, Lucien-Léopold	若特兰, 律西安·列奥波特
Jung, Georg Gottlob	荣克, 格奥尔格·哥特洛勃
Jung, Hermann	荣克, 海尔曼
Jungnitz, Ernst	荣格尼茨, 恩斯特
Juta, Johann Karl	优塔, 约翰·卡尔
Juta, Louise	优塔, 路易莎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努尔
Karl Wilhelm Ferdinand	卡尔·威廉·斐迪南
Katkov, Mikhail Nikiforovich (Катков, 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卡特科夫, 米哈伊尔·尼基佛 罗维奇
Kautsky, Karl	考茨基, 卡尔
Kayser, Max	凯泽尔, 麦克斯
Kingsley, Charles	金斯莱, 查理
Kinkel, Gottfried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Johanna (娘家姓 Mockel)	金克尔, 约翰娜(娘家姓莫凯 尔)
Klapka, Georg	克拉普卡, 格奥尔格
Klein, Ernst Ferdinand	克莱因, 恩斯特·斐迪南
Klein, Johann Jacob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ock, Paul de	科克, 保尔·德
Kolb, Gustav Eduard	科尔布, 古斯塔夫·爱德华
Köllicker, Rudolf Albert	科利克尔, 鲁道夫·阿伯特
Konstantin Nikolaevich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
Köppen, Karl Friedrich	科本, 卡尔·弗里德里希
Kossuth, Lajos	科苏特, 拉约什
Kriege, Hermann	克利盖, 海尔曼
Kropotkin, Pyotr Alekseevich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谢 也维奇
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克鲁马赫, 弗里德里希·威廉
Kugelmann, Ludwig	库格曼, 路德维希

- | | |
|-----------------------------------------------------------------|-------------------------------------------|
| Kühlwetter, Friedrich Christian
Hubert von | 居韦特尔, 弗里德里希·克里
斯提安·胡伯特·馮 |
| Ladenberg, Adalbert von | 拉登堡, 阿达貝尔特·馮 |
| Ladendorf, August | 拉登道夫, 奥古斯特 |
| Lafargue, Laura | 拉法格·劳拉 (參見 Marx,
Laura) |
| Lafargue, Paul | 拉法格, 保尔 |
| Lamartine, Alphonse-Marie-Louis de | 拉馬丁, 阿尔丰斯·馬利·路
易·德 |
| Lamennais (La Mennais), Félicité-
Robert de | 拉梅耐, 費里西德·罗貝尔·德 |
| Lankester, Edwin Ray | 郎凯斯特, 爱德文·雷伊 |
| Lange, Friedrich Albert |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
| Lassalle, Ferdinand | 拉薩尔, 斐迪南 |
| Latour, Theodor | 拉图尔, 泰奥多尔 |
| Laube, Heinrich | 劳貝, 亨利希 |
| Laufenberg, Heinrich | 劳芬堡, 亨利希 |
|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 賴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
斯特 |
| Lehmann, Albert | 列曼, 阿尔伯特 |
| 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 萊布尼茨, 哥特弗里德·威廉 |
| Lelewel, Joachim | 列列韦尔, 約阿希姆 |
| Le Lubez, Victor | 勒留貝, 維克多 |
| Le Moussu | 勒穆修 |
| Lenau, Nicolaus (真名 Nikolaus
Niembusch Edler von Strehlenau) | 雷瑙, 尼古劳斯 (真名尼古劳
斯·宁布什·埃德勒·馮·
施特萊雷瑙) |
| Leo, Heinrich | 利奥, 亨利希 |
| Leopold I | 列奥波特一世 |
| Leroux, Pierre | 列魯, 比埃尔 |
|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 萊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
| Lessner, Friedrich | 列斯納, 弗里德里希 |
| Leupold, Heinrich | 洛伊波德, 亨利希 |

Levy, Gustav	列維, 古斯塔夫
Lichnowski, Felix Maria	利希諾斯基, 費里克斯·馬利亞
Liebknecht, Wilhelm	李卜克內西, 威廉
Limousin, Charles	利穆贊, 沙爾
Lincoln, Abraham	林肯, 亞伯拉罕
Lissagaray, Prosper Oliver	利沙加勒, 普羅斯比爾·奧利維耶
List, Friedrich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Lochner, Georg	洛赫納, 格奧爾格
Locke, John	洛克, 約翰
Longuet, Charles	龍格, 沙爾
Lopatin, Hermann Aleksandrovich (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洛帕廷, 蓋爾曼·亞歷山大羅維奇
Lord, Percival Barton	洛爾德, 波西沃·巴頓
Louis XIV	路易十四
Louis XV	路易十五
Louis XVI	路易十六
Louis XVIII	路易十八
Louis-Philippe	路易-菲力浦
Lyubavin, N. N. (Любавин, Н. Н.)	柳巴文
Lucain	呂肯
Lucraft, Benjamin	魯克拉夫特, 本杰明
Lucretius (Titus Lucretius Carus)	盧克萊茨(提圖斯·路克萊茨·卡路斯)
Luden, Heinrich	路登, 亨利希
Lünning, Otto	呂寧, 奧托
Luther, Martin	路德, 馬丁
Luxemburg, Rosa	盧森堡, 羅莎
MacCulloch, John Ramsay	麥克庫洛赫, 約翰·拉姆賽
Machiavelli, Nicolo Bernardo	馬基雅弗里, 尼古洛·倍爾納多
Malon, Benôt	馬隆, 邊諾
Malthus, Thomas Robert	馬爾薩斯, 托馬斯·羅伯特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曼托伊費爾, 奧托·泰奧多爾

- | | |
|-----------------------------------|-------------------|
| Marat, Jean-Paul | 馬拉, 让·保尔 |
| Marlowe, Christopher | 馬洛, 克利斯托弗 |
| Martin, Henry | 馬丁, 昂利 |
| Marx, Edgar | 馬克思, 埃德加尔 |
| Marx, Eleanor | 馬克思, 爱琳娜 |
| Marx, Eva (娘家姓 Moses) | 馬克思, 叶娃(娘家姓莫泽斯) |
| Marx, Franziska | 馬克思, 弗兰契斯卡 |
| Marx, Heinrich | 馬克思, 亨利希 |
| Marx, Heinrich Guido | 馬克思, 亨利希·格維多 |
| Marx, Henriette (娘家姓 Preisburg) | 馬克思, 罕丽达(娘家姓普莱斯堡) |
| Marx, Jenny (娘家姓 Westphalen) | 馬克思, 燕妮(娘家姓威斯特华伦) |
| Marx, Jenny | 馬克思, 燕妮 |
| Marx, Laura | 馬克思, 劳拉 |
| Marx, Lewi | 馬克思, 列維 |
| Marx, Samuel | 馬克思, 薩繆尔 |
| Massmann, Hans Ferdinand | 馬斯曼, 汉斯·斐迪南 |
| Mayer, Gustav | 迈尔, 古斯达夫 |
| Mazzini, Giuseppe | 馬志尼, 朱泽培 |
| Meissner, Otto | 迈斯纳, 奥托 |
| Melanchthon, Philipp | 梅兰希通, 菲力浦 |
| Mellinet, François | 梅利奈, 弗朗斯瓦 |
| Mendelssohn, Moses | 門德尔森, 莫泽斯 |
| Menzel, Wolfgang | 門采尔, 沃尔弗干格 |
| Metternich, Clemens Wenzel Lothar | 梅特涅, 克雷門斯·文索尔·洛塔尔 |
| Meyen, Eduard | 梅因, 爱德华 |
| Meyer, Hermann Julius | 迈耶尔, 海尔曼·尤利烏斯 |
| Meyer, Julius | 迈耶尔, 尤利烏斯 |
| Meyer, Rudolf Hermann | 迈耶尔, 魯道夫·海尔曼 |
| Meyer, Siegfried | 迈耶尔, 齐格弗里特 |
| Meyerbeer, Giacomo | 梅尔伯, 賈科莫 |

Mieroslawski, Ludwig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維克
Milke	密尔凱
Mill, John Stuart	穆勒, 約翰·斯图亚特
Miquel, Johannes	米凱尔, 約翰
Moll, Joseph	莫尔, 約瑟夫
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莫尔特凱, 海尔穆特·卡尔· 伯恩哈德
More, Thomas	莫尔, 托馬斯
Morris, William	莫利斯, 威廉
Most, Johann	莫斯特, 約翰
Motteler, Julius	莫特勒, 尤利烏斯
Müller, Friedrich	弥勒, 弗里德里希
Mundt, Theodor	蒙特, 泰奥多尔
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納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 特里克
Napoleon I Bonaparte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eon II	拿破侖第二
Napoleon III (Louis Bonaparte)	拿破侖第三(路易·波拿巴)
Nechaev, Sergei Gennadievich (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涅恰也夫, 謝尔盖·格納迪也 維奇
Netlau, Max	涅特劳, 麦克斯
Nikolai I (Николай I)	尼古拉一世
Nobiling, Karl Eduard	諾比林, 卡尔·爱德华
Nothjung, Peter	諾特榮克, 彼得
O'Brien, James Bronterre	奧勃萊恩, 詹姆斯·布隆泰尔
Odger, George	奧哲尔, 乔治
Ogaryov, Nikolai Platonovich (Огарев, 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奧格辽夫, 尼古拉·普拉东諾 維奇
Ollivier, Emile	奧利維耶, 艾米尔
Oncken, Hermann	翁肯, 海尔曼
Oppenheim, Dagobert	奧本海姆, 达哥伯特
Orsini, Felice	奥尔辛尼, 菲利契
Oswald, Friedrich	奧斯渥特, 弗里德里希

Otto, Karl Wunibald	奥托, 卡尔·乌尼巴特
Ovidius (Publius Ovidius Naso)	奥维狄乌斯 (普布里乌斯·奥维狄乌斯·纳索)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帕麦斯顿, 亨利·约翰·田浦
Pecqueur, Constantin	裴柯尔, 康斯坦丁
Perron, Charles	裴隆, 沙尔
Pyotr I (Петр I)	彼得一世
Pfänder, Carl	普芬德, 卡尔
Pfuef, Ernst Heinrich Adolf von	普富尔, 恩斯特·亨利希·阿道夫·馮
Philips, Lion	菲利浦斯, 里昂
Pieper, Wilhelm	皮佩尔, 威廉
Platen, August	普拉顿, 奥古斯特
Platon	柏拉图
Plekhanov, Georgii Valentinovich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Plutarchos	普卢塔克
Polyakov, N. P. (Поляков, Н. П.)	波利亚科夫
Pompadour, 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	龐巴都, 让娜·安东尼达·布瓦宋
Potter, George	波特尔, 乔治
Proudhon, Pierre-Joseph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ulszky, Franz	普尔斯基, 弗兰茨
Püttmann, Hermann	皮特曼, 海尔曼
Pyat, Felix	皮亚, 菲利克斯
Rachil	拉希尔 (参见 Varnhagen von Ense Rahel)
Radetzky, Joseph	拉德茨基, 约瑟夫
Ranke, Leopold	兰克, 列奥波特
Ranvier, Gabriel	兰维埃, 加布里埃尔
Raumer, Friedrich von	劳麦, 弗里德里希·馮
Reckel, August	勒克尔, 奥古斯特

Reiff, Wilhelm Joseph	賴夫, 威廉·約瑟夫
Reimarus, Hermann Samuel	雷馬路斯, 海爾曼·賽米爾
Reimer, Georg Otto	雷默, 格奥尔格·奥托
Reinhard, Richard	萊因哈特, 理查
Rempel, Rudolf	雷姆佩尔, 魯道夫
Renard	伦納德
Reuter, Fritz	罗伊特, 弗里茨
Ricardo, David	李嘉图, 大卫
Richard, Albert	里沙尔, 阿尔伯
Rittinghausen, Moritz	里廷豪森, 摩里茨
Roach, John	罗契, 約翰
Robin, Paul	罗班, 保尔
Rochefort, Henry	罗什弗尔, 昂利
Röckel, August	勒克尔, 奥古斯特
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洛貝尔图斯-亚格措夫, 約翰· 卡尔
Romanov (Романовы)	罗曼諾夫
Roon, Albrecht Theodor Emil	罗恩, 阿尔勃莱希特·泰奥多 尔·艾米尔
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罗雪尔, 威廉·格奥尔格·弗 里德里希
Röser, Peter Gerhard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特
Rotshtein, Fedor Aronovich (Ротштейн, Федор Аронович)	罗特施坦, 費多尔·阿罗諾維奇
Rouher, Eugène	魯埃爾, 欧仁
Roy, Joseph	卢阿, 約瑟夫
Ruge, Arnold	卢格, 阿尔諾德
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呂斯托, 弗里德里希·威廉
Rutenberg, Adolf	魯滕堡, 阿道夫
Ryazanov, N. (Рязанов, Н.) (眞名 Goldenbakh, D. B; Гольденбах, Д. Б.)	梁贊諾夫(眞名哥尔頓巴赫)
Saint-Paul, Wilhelm	圣保尔, 威廉

Saint-Simon, Claude-Henri de Rouvroy	圣西門, 克勞德-昂利·德·卢 伏洛阿
Sand, George	桑, 乔治(參見 George Sand)
Schabelitz, Jakob	沙貝利茨, 雅科布
Schabelitz, Karl Heinrich	沙貝利茨, 卡尔·亨利希
Schaible, Karl Heinrich	沙伊勃勒, 卡尔·亨利希
Schaper, von	沙培尔, 馮
Schapper, Karl	沙佩尔, 卡尔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謝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約 瑟夫·馮
Scheu, Heinrich	肖伊, 亨利希
Schiller, Friedrich von	席勒, 弗里德里希·馮
Schily, Victor	席利, 維克多
Schleiden, Matthias Jakob	施萊登, 馬提阿斯·雅科布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Ernst Daniel	施萊艾爾馬赫爾, 弗里德里希· 恩斯特·丹尼尔
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施洛塞尔, 弗里德里希·克利 斯托夫
Schmalhausen, Sophie	施馬爾豪森, 索菲亞
Schmalhausen, Wilhelm Robert	施馬爾豪森, 威廉·罗伯特
Schmoller, Gustav	施穆勒, 古斯塔夫
Schneider II, Karl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
Schopenhauer, Arthur	叔本华, 阿尔都尔
Schorlemmer, Karl	肖萊馬, 卡尔
Schramm, Carl August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Konrad	施拉姆, 康拉德
Schramm, Rudolf	施拉姆, 魯道夫
Schulze-Delitzsh, Franz-Hermann	舒尔采-德里奇, 弗兰茨·海 尔曼
Schulze, Johannes	舒尔采, 約翰
Schuhmacher, Gustav	舒馬赫, 古斯塔夫
Schurz, Karl	叔尔茨, 卡尔
Schwann, Theodor	施旺, 泰奥多尔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施韦泽, 約翰·巴普提斯特·馮
Schwerin, Maximilian Heinrich Karl	施韦林, 馬克西米利安·亨利 希·卡尔
Schwitzguébel, Adhémar	施維茨盖伯尔, 阿德馬尔
Scott, Walter	司各脱, 瓦尔特
Serrailier, Auguste	赛拉叶, 奥古斯特
Sexton, George	塞克斯頓, 乔治
Shakespeare, William	莎士比亚, 威廉
Shelley, Percy Bysshe	雪莱, 派尔西·毕希
Sickingen, Franz von	济金根, 弗兰茨·馮
Siebel, Karl	季貝尔, 卡尔
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von	西姆桑, 馬丁·爱德华·西吉 斯蒙德·馮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利奧納 尔·西蒙德·德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Solger, Karl Wilhelm Ferdinand	佐尔格尔, 卡尔·威廉·斐迪南
Sorge, Friedrich Albert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 特
Spargo, John	斯巴哥, 約翰
Spinoza, Baruch [Benedictus de]	斯宾諾莎, 巴魯赫〔別涅狄克 特·德〕
Splingard, Roche	斯普林加尔, 罗什
Spurzheim, Johann Christoph	施普茨海姆, 約翰·克利斯托夫
Stein, Charlotte von	施泰因, 莎洛特·馮
Steklov, Yulii Mikhailovich (Стеклов, Ю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斯切克洛夫, 尤里·米哈伊洛 維奇
Stieber, Wilhelm	施梯伯, 威廉
Stieglitz, Heinrich	施梯格利茨, 亨利希
Stiener, Max (眞名 Johann Caspar Schmidt)	施蒂納, 麦克斯(眞名約翰·卡 斯巴尔·施米特)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ue, Eugène	苏, 欧仁

Swarm	斯瓦尔姆 (參見 Dentraygues)
Szeliga (眞名 Franz Szeliga Zychlin von Zychlinski)	施里加 (眞名弗兰茨·施里加·齐赫林·馮·齐赫林斯基)
Tacitus, Publius (?) Cornelius	塔西佗, 普卜利烏斯·科尔奈利烏斯
Taglioni, Maria	塔甲約尼, 瑪麗亞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达来朗-貝里戈爾, 沙尔·莫里斯·德
Taylor, Bayard	泰勒, 巴亞德
Techow, Gustav Adolf	泰霍夫, 古斯达夫·阿道夫
Teleki, Alexander	泰列基, 亚历山大
Testut, Oscar	戴斯杜, 奥斯卡尔
Thibaut, Anton Friedrich Justus	捷波, 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
Thiers, Louis-Adolphe	梯也尔, 路易·阿道夫
Thierry, Augustin	梯叶里, 奧古斯丹
Tölcke, Karl Wilhelm	特尔凱, 卡尔·威廉
Tolain, Henri-Louis	托伦, 昂利·路易
Treitschke, Heinrich Gotthard von	特萊契克, 亨利希·哥塔尔特·馮
Tschech, Heinrich Ludwig	捷希, 亨利希·路德維希
Uhland, Ludwig	烏兰德, 路德維希
Ulfilas (Wulfila)	烏尔菲拉斯
Unruh, Hans Victor von	翁魯, 汉斯·維克多·馮
Urquhart, David	烏尔卡尔特, 大卫
Utin, Nicolai Isaakovich (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акович)	吳亭, 尼古拉·伊薩柯維奇
Vahlteich, Karl Julius	瓦尔泰希, 卡尔·尤里烏斯
Vaillant, Edouard Marie	瓦揚, 爱德华·馬利
Van den Abeele, Henry	万·登·阿貝勒, 昂利
Van Heddeghem (假名 Walter)	万·赫德盖姆 (假名瓦尔特)
Varlin, Louis Eugène	瓦尔兰, 路易·欧仁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万哈根·馮·恩賽, 卡尔·奥古斯特
Varnhagen von Ense, Rahel	万哈根·馮·恩賽, 拉希尔
Vauban, Sebastien le Prestre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 特尔
Venedey, Jakob	费奈迭, 雅科布
Vichard	維夏尔
Vidal, François	維达尔, 弗朗斯瓦
Villetard	維列塔尔
Vincke, Georg	芬克, 格奥尔格
Vögele, A.	費格勒
Vogt, Karl	福格特, 卡尔
Vollmar, Georg Heinrich von	福尔馬尔, 格奥尔格·亨利 希·馮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眞姓 Arouet)	伏尔泰, 弗朗斯瓦·馬利(眞姓 阿魯埃)
Wagener, Hermann	瓦盖納, 海爾曼
Wagner, Richard	瓦格納, 理查
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瓦尔德克, 貝奈狄克特·弗兰 茨·利奧
Walesrode, Ludwig Reinhold	瓦列斯罗德, 路德維希·萊茵 霍尔德
Wallau, Karl	瓦劳, 卡尔
Walter	瓦尔特尔 (參見 Van Hed- deghem)
Warnebold	瓦尔涅波尔德
Weber	維貝尔
Weerth, Georg	維尔特, 格奥尔格
Weiss, Guido	魏斯, 格維多
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魏特林, 克利斯提安·威廉
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威灵頓, 阿瑟·威尔斯里
Weston, John	威斯頓, 約翰
Westphalen, Christian Heinrich	威斯特华伦, 克利斯提安·亨

Philipp von	利希·菲力浦·馮
Westphalen, Edgar von	威斯特华伦, 埃德加尔·馮
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馮
Westphalen, Jenny von	威斯特华伦, 燕妮·馮 (參見 Marx Jenny)
Westphalen, Karoline von	威斯特华伦, 卡洛琳·馮
Westphalen, Ludwig von	威斯特华伦, 路德維希·馮
Weydemeyer, Joseph	魏德迈, 約瑟夫
Weydemeyer, Louise	魏德迈, 路易莎
Wheeler, George William	惠勒, 乔治·威廉
Wiehe, Johann Friedrich	維埃, 約翰·弗里德里希
Wiethaus	維塔烏斯
Wigand, Otto	維干德, 奧托
Wildenbruch, Ludwig von	維登布魯赫, 路德維希·馮
Wilhelm I	威廉一世
Willich, August	維利希, 奧古斯特
Windthorst, Ludwig	文德霍爾斯特, 路德維希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文克尔曼, 約翰·約阿希姆
Wolff, Ferdinand	沃尔弗, 斐迪南
Wolff, Wilhelm	沃尔弗, 威廉
Wroblewsky, Walery	弗罗勃列夫斯基, 瓦列里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 希·恩斯特
Zasulich, Vera Ivanovna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查苏利奇, 維拉·伊万諾夫娜
Zedlitz, von	采德利茨·馮
Zetkin, Clara	蔡特金, 克拉拉
Ziegler, Theobald	齐格勒, 特奥巴尔德
Zitz, Franz Heinrich	齐茨, 弗兰茨·亨利希
Zychlinski, Franz	齐赫林斯基, 弗兰茨



报 刊 索 引

(按譯名首字的讀音和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条目后系原书页碼,检索时請查印在本书正文頁边的數碼。)

bei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

——英国周刊,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出版到1852年为止,起初在里子,从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菲·奥康瑞尔;在40年代杂志主编为乔·哈尼,从1845年9月到1848年3月恩格斯曾为该刊撰稿。——第138,166,268頁。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保守主义报纸,90年代以前为俾斯麦的私人御用报纸;1852—1918年用这个名称出版。——第355頁。

ben

《笨拙》(《Punch》)——英国讽刺杂志,从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75頁。

bi

《比尔商业信使报》(《Bieler Handelscourier》)——見《瑞士商业信使报》。

bian

《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法国资产阶级日报《政治和文学辯論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簡称;1789年在巴黎创刊。——第103頁。

chen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1794年起在伦敦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第430頁。

dan

《但泽报》(《Danziger Zeitung》)——第74頁。

de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革命民主派的杂志,由馬克思和阿·卢格主编,在巴黎用德文出版;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合刊号。——第79、81—83、89、91、96、101、108、109、113、122—125、132、133、143、429、432、556、557頁。

《德意志电訊》(《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民主派的文学杂志,从1838年到1848年在汉堡出版。——第

118, 119 頁。

《德意志年鑑》(《Deutsche Jahrbücher》)

——青年黑格爾派的文學—哲學雜誌
《德意志科學和藝術年鑑》(《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簡稱, 1841年6月至1843年1月出版。——第59, 60, 76, 80, 81, 86, 87, 90, 119, 125, 132, 432 頁。

《德國公民手冊》(《Deutsches Bürgerbuch》)——“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年鑑, 1844年12月至1846年出版。——第140—142 頁。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1847年1月到1848年2月德國政治流亡者在布魯塞爾出版的報紙, 從1847年9月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成為該報的經常撰稿人, 實際上掌握了它的編輯業務, 該報成為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報。——第158, 159, 163—165, 304, 354, 554, 558 頁。

《德意志科學和藝術哈雷年鑑》(《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爾派的文學—哲學雜誌, 1838—1841年在哈雷出版, 1841年易名為《德意志科學和藝術年鑑》(《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第45, 46, 50, 59 頁。

《德意志帝國立法、行政和國民經濟年鑑》(《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e》)——1871—1939年在柏林出版的雜誌。——第556 頁。

deng

《燈籠報》(《La Lanterne》)——法國

進共和主義周刊, 1868—1869年在巴黎出版, 從1874年7月到1876年2月在布魯塞爾出版。——第541 頁。

《燈籠報》(《Die Laterne》)——社會主義派的諷刺性周刊, 從1878年12月到1879年6月在布魯塞爾用德文出版。——第541, 542 頁。

fa

《法蘭克福報。商業新聞》(《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 德意志人民黨的機關報, 1856年創刊。——第371, 559 頁。

gai

《改革報》(《La Réforme》)——法國日報, 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的機關報, 1843年到1850年在巴黎出版, 從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這個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第166 頁。

gong

《工人辯護士報》(《The Workman's Advocate》)——第一國際機關報, 從1865年9月到1866年在倫敦以這個名稱出版, 1866年2月改名《共和國》(參見該條), 1867年6月停刊。——第374 頁。

《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第一國際的機關報周刊, 1866—1867年在倫敦出版, 1866年6月以前馬克思為編輯之一, 1866年2月至6月恩格斯也參加編輯工作。——第374, 375 頁。

guan

《觀察家週報》(《The Observer》)——保

守派的周刊,1791年在伦敦创刊。——第478頁。

guo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日报,后成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48—1915年在柏林出版。——第311—313、315—317頁。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第365、367頁。

hai

《海尔曼》(《Hermann》)——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刊物,1859年到1870年用德文出版的周刊。——第302、303頁。

he

《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傅立叶派的日报,1843—1855年在巴黎出版,主編为維·孔西德朗。——第103、129頁。

hong

《紅色共和主义者》(《The Red Republican》)——宪章派的周刊,1850年6月到11月在伦敦出版。——第268、269頁。

ji

《寄語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s》)——厄内斯特·琼斯主編的宪章派杂志,1851年5月到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268頁。

jin

《进步报》(《Le Progrès》)——第一国际无政府主义各支部的机关报,1868—1870年在瑞士用法文出版。——第437、497頁。

jue

《觉醒报》(《Le Réveil》)——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机关报,从1868年到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第446頁。

ko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1802年起在科伦出版的德国日报;在1848—1849年反映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卖身投靠的政策,同《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不断进行激烈的斗争。——第62、63、78、111頁。

《科学評論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右翼黑格尔分子的杂志,1827年至1847年在柏林出版。——第45頁。

lai

《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Der deutsche Bote aus der Schweiz》)——民主杂志,1842—1846年在苏黎世和文特堡用德文出版。——第80頁。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保守主义日报,1844年到1848年初在科伦出版。——第160、162、354頁。

《莱比錫总汇报》(《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1837—1843年出

版的德国自由主义日报，从1843年起改而采取保守主义方向。——第76頁。

《萊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总共出过两期：第一期于1845年8月在达尔林加特出版，第二期于1846年末在贝尔维尤（在德国和瑞士边界）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利用該杂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第140、141頁。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1842年1月1日到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是对普鲁士专制政府怀有反对情緒的萊茵资产阶级代表創办的，某些青年黑格尔分子也应邀为該报撰稿。从1842年4月起馬克思成为《萊茵报》的撰稿人，从同年10月起成为該报的編輯之一；在馬克思的主編下，該报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該报施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制度，后禁止它出版。——第61—63、66—68、70—80、93、103、105、111、119—121、125、201、268、553、556、557頁。

liang

《凉亭》（《Die Gartenlaube》）——小资产阶级文学杂志，从1853年1月1日在萊比錫出版的周刊。——第307、310、406頁。

《双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1865年在伦敦出版的激进资产阶级杂志，后成为保守党的机关刊物。——第410頁。

ma

《馬賽曲报》（《La Marseillaise》）——左派共和主义者的日报，从1869年12月到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第452、456頁。

mei

《每日电訊》（《Daily Telegraph》）——1855年在伦敦創刊的资产阶级日报，1937年与《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同保守党领导有密切联系的财政资本的机关报。——第313頁。

《每日新聞》（《Daily News》）——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日报，1846—1928年在伦敦出版。——第471頁。

min

《民主評論》（《The Democratic Review》）——宪章派的杂志，从1849年6月到1850年9月在伦敦出版的月刊。——第268、269頁。

《民主周刊》（《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1868—1869年在萊比錫出版；1869年易名《人民國家》。——第406、420、422、423、432頁。

niu

《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1841年到1924年出版的美國日报，在19世紀40—50年代具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傾向，反映资产阶级中具有民主情緒的一部分人的观点；1861—1865年美国内战后变成反动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51年10月到1862年3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該报

撰稿。——第199、238、252、253、259、262、263、267、268、273、276、279、282、299、303、321、324、325、554、559頁。

ping

《平等》(《L'Égalité》)——周刊,第一国际罗曼語系各支部的机关刊物,从1869年到1872年在日内瓦出版;1869年年終以前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从1870年1月起开始贯彻总委员会的路线。——第438、444、447、449、450、451、491、496頁。

《平等报》(《L'Égalité》)——从1877年到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社会主义报纸;1880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第545頁。

pu

《普魯士年鉴》(《Preußische Jahrbücher》)——1858—1935年在柏林出版的杂志。——第556、559頁。

《普魯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保守主义日报,政府的官方机关报;从1848年5月到1851年6月以这个名称出版。——第74頁。

qian

《前进报》(《Vorwärts!》)——1844年1月到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纸,每周出两次;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积极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使该报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第108—110、113—115、158、303、473、554、557頁。

《前进报》(《Vorwärt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1878年在莱比錫出版,1891—1933年在柏林出

版。——第534、535頁。

ren

《人民报》(《Das Volk》)——1859年5月7日到8月20日在伦敦出版的德文周刊;德国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刊物;从第六期起,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为之撰稿;从1859年6月11日起马克思成为该刊物的实际领导人;该刊物由于缺乏经费而停刊。——第303、304、306、309、310、312頁。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日报,1853—1933年在柏林出版。——第316頁。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宪章派的机关报,周刊,1852—1858年由厄内斯特·琼斯主编在伦敦出版,曾得到马克思的支持和指导。——第266、268頁。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到1876年在莱比錫出版,是1868年创刊的《民主周刊》(参见该条)的继续。——第461、464、490、541頁。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第555頁。

《人民论坛》(《Der Volks-Tribun》)——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刊;从1846年1月5日出版到1846年12月31日。——第147頁。

《人民之友》(《Freind of the People》)——宪章派的机关刊物,从1850年12月到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的周刊。——第268頁。

《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u Peuple》)——比利时工人和民主组织的机关报,1861—1868年出版,从1866年起是第

—国际在布鲁塞尔的机关报。——第372頁。

ri

《日内瓦报》(«Journal de Genève»)——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日报,后成为反动报纸,1828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第521頁。

rui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资产阶级民主报纸,1853—1909年在比尔(瑞士)用德文出版。——第306,311頁。

she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无政府主义日报,从1871年10月26日到1872年1月4日在日内瓦出版,从1871年11月起是犹拉联合会的机关报。——第498,500頁。

《社会民主党人》(«Der Sozialdemokrat»)——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周刊,从1879年9月到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到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第543,544,564頁。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可能派代表之一边·马隆創辦的杂志,从1885年到1914年在巴黎出版。——第545頁。

《社会主义文献》(«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爱·伯恩斯坦于1901—1905年在柏林出版的杂志。——第557,558頁。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

关报,1864—1871年在柏林出版,1865年2月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1871年该报改名《新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Neue Sozial-Demokrat»),1876年停刊。——第353—355,357,363,406頁。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社会改良主义杂志,1879—1880年在苏黎世出版。——第542頁。

《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1888—1933年在杜宾根出版的杂志。——第556頁。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1910—1930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杂志。——第556頁。

《社会明镜。捍卫无产阶级并阐明现代社会关系的机关报》(«Der Gesellschaftsspiegel. Organ zur Vertretung der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und zur Beleucht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 der Gegenwar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1845—1846年在爱北斐特出版,共出版十二期。——第140—142頁。

shi

《十字报》(«Kreuzzeitung»)——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的反动的君主派日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的别名,在标题处繪有十字图形。——第74,213,357頁。

tai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保守派的重大日报, 1785年在伦敦创刊。——第134、413、419、473页。

te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1757年在特利尔创刊, 从1815年起以这个名称出版, 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 从40年代中期起处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影响之下并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第140、144页。

tuau

《团结报》(《La Solidarité》)——巴枯宁派报纸, 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无政府主义各支部的机关报, 1870年4月到9月以这个名称在纽沙特尔出版, 后以《革命团结报》(《La Solidarité révolutionnaire》)的名称在日内瓦出版。——第454、489、497、498页。

wai

《外省通讯》(《Provinzial-Correspondenz》)——普鲁士政府机关报, 周刊, 1863—1882年在柏林出版。——第465页。

wei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 从1845年1月到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 从1847年1月到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140、141、143、144、148、

《未来》(《Die Zukunft》)——社会改良主义杂志, 从1877年10月到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第535、536页。

《未来报》(《Die Zukunft》)——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 1867—1871年先在科尼斯堡, 后在柏林出版。——第406、450、562页。

wen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 从1843年12月出版到1844年10月。——第113、125、128、128、130、132页。

xi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 从1849年5月到1860年7月在科伦出版。——第234页。

xian

《先驱》(《Der Vorbote》)——第一国际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的中央机关报, 月刊, 1866—1871年在日内瓦出版。——第372、376、413、426、433、436、454、505、560页。

xin

《新观察》(《Die Neue Rundschau》)——1890年至1932年在柏林和莱比锡出版的杂志。——第557页。

《新时报》(《Die Neue Zeit》)——工人报纸, 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 从1858年6月26日到1859年4月16日在伦敦出版。——第303页。

《新时代》(《Die Neue Zeit》)——理论

性杂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6、556—558、560—562、564頁。

《新聞报》(《Die Presse》)——资产階級自由主义报纸，1848年到1894年在維也納出版。——第253、279、302、324、325頁。

《新萊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团结了广大民主階层的革命无产阶级机关报，从1848年6月1日到1849年5月9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出版，列宁在1914年称该报为“至今所曾有过的最好的、无与伦比的革命无产阶级机关报”。——第162、183、185、186、188—191、193、195—200、203—206、209—214、217、237、239、263、265、266、269、322、334、335、340、355、429、433、554、558頁。

《新英格兰报》(《New-England Zeitung》)——德国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1848—1853年在美国波士顿用德文出版。——第248頁。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Neue Sozial-Demokrat》)——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71—1876年在柏林出版。——第502頁。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刊，1834年由罗·欧文创办，出版到1846年，起初在里昂，从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2年7月以前以另一名称出版；从1843年11月到1845年5月恩格斯为该刊撰稿。——第138頁。

《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1月到10月出版的月刊，在汉堡印刷，共出了六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杂志上对1848—1849年革命进行了总结，拟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这个杂志上首次发表了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第217—221、226、231、234、239、258、305頁。

xing

《星期六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保守派的周刊，从1855年到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409頁。

xuan

《喧声》(《Kladderadetsch》)——德国自由派和后来的民族自由派的諷刺性杂志，184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475頁。

you

《邮报》(《Die Post》)——1855年在柏林創刊的报纸，每天出两次。——第74頁。

zheng

《正义报》(《La Justice》)——法国激进资产阶级日报，1880年由克列孟梭创办。——第546頁。

《政治杂志》(《Zeitschrift für Politik》)——1907—1936年在柏林出版。——第556頁。

《政治学辞典》(《Handwörterbuch fü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555頁。

zhong

《钟声》(«Колокол»)——1857—1867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出版的革命报纸,先在伦敦出版,而从1865年起在日内瓦出版,因赫尔岑把他办的“自由俄国印刷所”迁往那里,尽管赫尔岑有过个别错误并曾经动摇过,该报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却起过重大的作用。列宁认为,在国外办俄国自由报刊进行革命鼓动,是赫尔岑的巨大功绩。——第430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反动日报,创刊于1798年,从1810年到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以空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伪装出现,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曾揭露它的这种伪

装。——第70、71、75、306、308—312、315、316、355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日报,政府的正式机关报,从1789年到1889年以该名称在巴黎出版。——第213、292页。

zi

《自由》(«Freiheit»)——先在伦敦(1879—1882),后在纽约(1882—1910)用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周报),1880年起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去。——第541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1855—1865年在伦敦出版的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杂志。——第268、306、312、313页。



报刊译名对照表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文学总汇报》
«Allgemeine Zeitung»	《总汇报》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
«Bieler Handelscourier»	《比尔商业信使报》
«The Commonwealth»	《共和国》
«Daily News»	《每日新闻》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
«Danziger Zeitung»	《但泽报》
«The Democratic Review»	《民主评论》
«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和平民主日报》
«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民主周刊》
«Der deutsche Bote aus der Schweiz»	《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Deutsche Jahrbücher»	《德意志年鉴》
«Deutsches Bürgerbuch»	《德国公民手册》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德法年鉴》
«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社会主义文献》
«L'Égalité»	《平等》
«L'Égalité»	《平等报》
«The Fortnightly Review»	《双周评论》
«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法兰克福报。商业新闻》

«The Free Press»	《自由新聞》
«Freiheit»	《自由》
«Friend of the People»	《人民之友》
«Die Gartenlaube»	《凉亭》
«Der Gesellschaftsspiegel. Organ zur Vertretung der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und zur Beleucht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 der Gegenwart»	《社会明鏡。捍卫无财产階級并闡明現代社会关系的机关报》
«Handwörterbuch für Staatswissenschaften»	《政治学辞典》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Hermann»	《海尔曼》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e»	《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經济年鉴》
«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年鉴》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	《科学評論年鉴》
«Journal des Débats»	《辯論日报》
«Journal de Genève»	《日内瓦报》
«La Justice»	《正义报》
«Kladderadatsch»	《喧声》
«Kölnische Zeitung»	《科伦日报》
«Kolokol» («Колокол»)	《钟声》
«Kreuzzeitung»	《十字报》
«La Lanterne»	《灯笼报》
«Die Laterne»	《灯笼报》
«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	《莱比錫总汇报》
«La Marseillaise»	《馬賽曲报》
«Le Moniteur Universel»	《总汇通报》

«The Morning Advertiser»	《晨报》
«National-Zeitung»	《国民报》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 Ökonomische Revue»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新莱茵报》
«Die Neue Zeit»	《新时报》
«Die Neue Zeit»	《新时代》
«Der Neue Sozial-Demokrat»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New-England Zeitung»	《新英格兰报》
«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
«The Northern Star»	《北极星报》
«Die Neue Rundschau»	《新观察》
«New-York Daily Tribune»	《纽约每日论坛报》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北德总汇报》
«Notes to the People»	《寄语人民》
«The Observer»	《观察家》
«The People's Paper»	《人民报》
«Die Post»	《邮报》
«Die Presse»	《新闻报》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普鲁士年鉴》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	《普鲁士国家通报》
«Le Progrès»	《进步报》
«Provinzial-Correspondenz»	《外省通讯》
«Punch»	《笨拙》
«The Red Republican»	《红色共和主义者》
«La Réforme»	《改革报》
«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Rheinischer Beobachter»	《莱茵观察家》
«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 schaftlichen Reform»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
«Le Réveil»	《觉醒报》

«La Révolution Sociale»	《社会革命报》
«La Revu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评论》
«The Saturday Review»	《星期六评论》
«Schweizer Handelscourier»	《瑞士商业信使报》
«Social-Demokrat»	《社会民主党人报》
«La Solidarité»	《团结报》
«Der Sozialdemokrat»	《社会民主党人》
«Staatsanzeiger»	《国家通报》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德意志电讯》
«The Times»	《泰晤士报》
«La Tribune du Peuple»	《人民论坛报》
«Triersche Zeitung»	《特利尔日报》
«Das Volk»	《人民报》
«Volkskalender»	《人民历书》
«Der Volksstaat»	《人民国家报》
«Der Volks-Tribun»	《人民论坛》
«Volks-Zeitung»	《人民报》
«Der Vorbote»	《先驱》
«Vorwärts!»	《前进报》
«Vorwärts»	《前进报》
«Westdeutsche Zeitung»	《西德意志报》
«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
«The Workman's Advocate»	《工人辩护士报》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政治杂志》
«Die Zukunft»	《未来报》
«Die Zukunft»	《未来》



«La Révolution Sociale»	《社会革命报》
«La Revu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评论》
«The Saturday Review»	《星期六评论》
«Schweizer Handelscourier»	《瑞士商业信使报》
«Social-Demokrat»	《社会民主党人报》
«La Solidarité»	《团结报》
«Der Sozialdemokrat»	《社会民主党人》
«Staatsanziger»	《国家通报》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德意志电讯》
«The Times»	《泰晤士报》
«La Tribune du Peuple»	《人民论坛报》
«Triersche Zeitung»	《特利尔日报》
«Das Volk»	《人民报》
«Volkskalender»	《人民历书》
«Der Volksstaat»	《人民国家报》
«Der Volks-Tribun»	《人民论坛》
«Volks-Zeitung»	《人民报》
«Der Vorbote»	《先驱》
«Vorwärts!»	《前进报》
«Vorwärts»	《前进报》
«Westdeutsche Zeitung»	《西德意志报》
«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
«The Workman's Advocate»	《工人辩护士报》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政治杂志》
«Die Zukunft»	《未来报》
«Die Zukunft»	《未来》



«La Révolution Sociale»	《社会革命报》
«La Revu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评论》
«The Saturday Review»	《星期六评论》
«Schweizer Handelscourier»	《瑞士商业信使报》
«Social-Demokrat»	《社会民主党人报》
«La Solidarité»	《团结报》
«Der Sozialdemokrat»	《社会民主党人》
«Staatsanzeiger»	《国家通报》
«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	《德意志电讯》
«The Times»	《泰晤士报》
«La Tribune du Peuple»	《人民论坛报》
«Triersche Zeitung»	《特利尔日报》
«Das Volk»	《人民报》
«Volkskalender»	《人民历书》
«Der Volksstaat»	《人民国家报》
«Der Volks-Tribun»	《人民论坛》
«Volks-Zeitung»	《人民报》
«Der Vorbote»	《先驱》
«Vorwärts!»	《前进报》
«Vorwärts»	《前进报》
«Westdeutsche Zeitung»	《西德意志报》
«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
«The Workman's Advocate»	《工人辩护士报》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政治杂志》
«Die Zukunft»	《未来报》
«Die Zukunft»	《未来》

